

THE HOLOCAUST

A New
History

大屠杀

一部新的历史

[英国]劳伦斯·里斯——著
朱任东——译

译林出版社

安东尼·比弗

《诺曼底登陆》的作者

这是一部关于大屠杀历史的极为清晰的著作，它不仅很好地解释了大屠杀的起因和怪诞心理，而且厘清了它的混乱发展脉络。

伊恩·克肖爵士

《地狱之行：1914—1949》的作者

劳伦斯·里斯的这部杰作是独一无二的，它以极具可读性的方式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其中既有这段历史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也有大屠杀受害者的痛苦回忆，以及作恶者令人不寒而栗的讲述。

安德鲁·罗伯茨

《战争风云：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史》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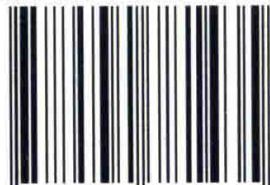
本书中有许多此前从未出版过的大屠杀受害者和纳粹施害者的证言，它探寻了大屠杀的每一个方面，从这一想法的开启，到灭绝营的解放，里斯为我们完整讲述了那段最令人类蒙羞的历史。

THE HOLOCAUST

A New History

上架建议：畅销·历史

ISBN 978-7-5447-8143-5



9 787544 781435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定价：78.00元

THE HOLOCAUST
A New History

大屠杀

一部新的历史

[英国]劳伦斯·里斯——著
朱任东——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屠杀：一部新的历史 / (英) 劳伦斯·里斯 (Laurence Rees) 著；朱任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4

书名原文：The Holocaust: A New History

ISBN 978-7-5447-8143-5

I.①大… II.①劳… ②朱… III.①纳粹大屠杀—史料 IV.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22497 号

The Holocaust: A New History by Laurence Rees

Copyright © Laurence Rees 2017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7-196号

大屠杀：一部新的历史 [英国] 劳伦斯·里斯 / 著 朱任东 / 译

责任编辑 陈 锐
装帧设计 水玉银文化
校 对 戴小娥
责任印制 单 莉

原文出版 Penguin, 201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31
插 页 4
版 次 2020 年 4 月第 1 版 202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8143-5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25-83658316

致 谢

本书是积二十五年之力写成的，所以并不奇怪，有很多人一直在帮助我，他们应当得到我的感激。与我一起工作的众多不同制作团队中有许多很有才华的成员，我特别要向他们表示极大的感谢。首先，我要提到我的德国同事蒂尔曼·雷默和德特勒夫·西伯特，他们多年来致力于历史研究，令人叹为观止。在各个不同时期给予我特别帮助的还有坦尼娅·巴彻勒、绍柳斯·伯齐尼斯、马丁纳·卡尔、萨利恩·克莱贝尔、旺达·科西娅、米凯拉·利希滕斯坦、埃洛迪·马约、纳瓦·米兹拉希、多米尼克·萨瑟兰、安娜·塔波斯卡、埃琳娜·雅科夫列娃。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所有人。我在这里也要纪念弗兰克·斯塔克博士。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研究员，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洞察力的知识分子，曾为我的许多电视片出过力。如果没有他开创性的新闻工作，我们对前纳粹党员的几次最为重要的采访就无从谈起。我很自豪地称他为我的朋友。2016年2月他不幸英年早逝，我们所有人都怀念他。

本书还得益于德国历史学家朱莉娅·皮奇不懈的研究，她审阅了本书的手稿，并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评论。此外，我还要感谢所有版权人允许我引用他们的资料，包括胡佛研究所允许我引用海因里希·希姆

莱的日记，当然还有英国广播公司(BBC)。

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受到了许多专业历史学家的影响，特别是多年来一直可以和我亲爱的朋友伊恩·克肖爵士讨论这一历史。任何对这个问题有过兴趣的人，都知道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巨大天赋。从最初的设想到最终的定稿，他一直在鼓励和帮助我完成这本书。我还要感谢另外两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和安德鲁·罗伯茨，他们在出版前阅读了这本书，并给了我丰富且明智的建议。

几年前，我通过自己的教育网站 WW2History.com 和世界上许多关于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著名思想家就这段历史进行过探讨，从中获益良多。其中包括奥马尔·巴托夫教授、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教授、理查德·埃文斯爵士、诺伯特·弗雷教授、理查德·奥弗里教授和亚当·图泽教授。我还要特别提一下戴维·塞萨拉尼教授，我和他共同从事奥斯维辛项目，相互之间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无论是关于大屠杀还是世界上的其他问题。2015年10月，他去世了，世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者。

在我的出版商维京公司，我要感谢我的编辑丹尼尔·克鲁，他对这本书表现出极大的信心，同样要感谢的还有文字编辑彼得·詹姆斯。我还必须提到我的前任编辑、伊伯里出版社的艾伯特·德佩特里奥，我亏欠了他很多。和往常一样，我要感谢我的文学代理人安德鲁·纳伯格。

此外，我要感谢大屠杀教育基金会多年来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主席保罗·菲利普斯、首席执行官凯伦·波洛克和教务主管亚历克斯·毛斯。

我在这本书里的每一步都得到了妻子海伦娜的帮助，她的评论总是切中要害。没有她，这本书会减色不少。我的孩子奥利弗、卡米拉和本尼迪克特给了我愉快的鼓励，特别是在这本书遇到困难的时刻。

这本书我要献给我的女儿卡米拉，她是牛津大学历史学系的毕业生。不仅因为她是我最棒的女儿，而且因为她仔细阅读了整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

最后，我要感谢接受采访的人，我们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记录了他们的证言。因为有几百人，在此不能一一列出，但我的感激之情同样真诚而深切。

劳伦斯·里斯

2016年9月于伦敦

导 言

对纳粹来说，弗雷达·温曼的罪行很简单：她是犹太人。1944年5月，在法国的圣埃蒂安，她被亲德的法国民兵组织“米利斯”抓捕，连同她的双亲和三个兄弟，一道被送往巴黎近郊臭名昭著的德朗西集中营，然后再被运往位于德占波兰的奥斯维辛—比克瑙。

1944年6月初，火车载着弗雷达一家以及其他近千名犹太人，穿过比克瑙那座红砖岗楼，一直开进了营地。当火车车厢门打开，她们重见天日时，弗雷达却感觉自己来到了“地狱”：“气味！这气味真难闻！”但她此时还不知道比克瑙的真正用途。这个地方很大，到处都是囚犯，也许新来的人都会被送去干活吧。

当她和家人站在铁路旁被称为“斜坡”的地方时，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来自某个特别部门的囚犯，穿着好似睡衣一样的制服，向新来的人们喊道：“把孩子交给年长的女人！”于是，有位二十多岁的年轻母亲把一个婴儿递给了弗雷达的母亲。

犹太人被命令在“斜坡”上排成两支队伍：一支是男人，另一支是妇女和孩子。弗雷达感到不解，于是她和母亲一起站到妇女和孩子那支队伍里，母亲手里还抱着那个婴儿。当队伍排到母亲时，一个党卫军

医生——弗雷达相信那就是门格勒博士——让她站到右边去。弗雷达也想跟着母亲过去，但她回忆道：“门格勒把我叫了回去，他说，‘你往左边走’。我说，‘不，我不会和母亲分开的’。然后他若无其事地说，‘你的母亲会照顾孩子的，你得和年轻人一起去’。”

弗雷达“不懂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开，也不懂为什么要把孩子交给年长的女人，我妈妈只有四十六岁。我对这里发生的所有事都感到困惑，它们都来得太快了”。

当弗雷达的母亲带着婴儿离开时，队伍也排到了她的父亲和三个兄弟，他们被允许继续待在一起。但当他们站在“斜坡”上时，弗雷达的大哥大卫看到他们的母亲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认为他们最小的弟弟马歇尔应该和母亲一起去。他觉得如果母亲能够照顾马歇尔的话，可能对弟弟“更好些”。于是大卫让弟弟陪母亲一起去，马歇尔很听话，跑去和他的母亲团聚了。无意之中，大卫把马歇尔送上了不归路。

他们不知道，此刻他们刚刚经历了党卫军医生的筛选，他在几秒之内就决定了哪些人可以暂时活着，哪些人将立刻死去。这趟火车上的很多人将被送往比克瑙的毒气室迅速杀死，包括弗雷达的母亲以及她怀里的婴儿。纳粹不愿意让孩子、老人和病人在集中营多活一个小时。

弗雷达、她的父亲和三个兄弟都被选中去劳动，尽管纳粹最终打算杀死所有的犹太人，但这至少延缓了死亡的来临；而大卫把马歇尔送到母亲身边，让他确定无疑地加入了立刻死亡的那群人。马歇尔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在筛选时是两可的，所以党卫军医生不会在乎他是否和母亲一起死去。正如弗雷达所说的，大卫的决定“在其他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在奥斯维辛那个毫无人道可言的地方，“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在“斜坡”上，年轻的母亲们被告知交出她们的孩子，那是因为只有这样她们才能通过党卫军医生的筛选。即便母亲年轻而健康，党卫

军医生在最后筛选时也很少会把她和孩子分开，以免在新来的人群中引起恐慌。迎接新人的囚犯知道弗雷达的母亲年龄过大，不会通过筛选。既然她肯定会死，婴儿也肯定会死，那就把两者放在一起好了。这样，那位年轻的母亲就有可能活过这一天。

这是一种怎样的世道呢？正直和道德的标准会如此不可理喻地颠倒。哥哥出于关心让弟弟和母亲在一起，却变成了让弟弟送死；让一位年轻的母亲活过这一天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她的孩子从她手中夺走并杀死。

更广泛地来看，纳粹为什么决定要消灭这一整群人？为什么他们要带走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向他们注入毒气，枪毙他们，让他们挨饿，把他们打死——想尽一切办法置他们于死地？这场种族灭绝在纳粹所做的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二十五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并制作了一系列关于纳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视纪录片。在我工作的过程中，去了许多不同的国家，拜访过数百名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包括那些深受纳粹之苦的人（就像弗雷达·温曼）、旁观者以及犯下过罪行的人。这些为我的影片搜集的证词只有一小部分曾经出版过。

“大屠杀”是有史以来最为臭名昭著的恶行，我们需要弄清楚这种丑恶是如何发生的。正是为此目的我进行了尝试，本书不仅使用了这些新鲜的史料，也参考了最新的学术成果和当时的档案。

目 录

致 谢 /1

导 言 /5

1. 仇恨的起源 /1
2. 纳粹党的诞生 (1919—1923) /14
3. 从革命到投票箱 (1923—1933) /30
4. 巩固权力 (1933—1934) /56
5. 《纽伦堡法》 (1934—1935) /86
6. 教育和帝国的形成 (1935—1938) /96
7. 激进化 (1938—1939) /120
8. 种族战争的开始 (1939—1940) /153
9. 西欧的迫害 (1940—1941) /181
10. 毁灭性战争 (1941) /207
11. 通往万湖之路 (1941—1942) /243
12. 搜捕和屠杀 (1942) /273
13. 纳粹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 (1942) /296
14. 屠杀和胁从 (1942—1943) /314
15. 压迫与反抗 (1943) /333
16. 奥斯维辛 (1943—1944) /357

17. 匈牙利的灾难 (1944) /377

18. 屠杀的终结 (1944—1945) /403

后 记 /424

注 释 /430

1. 仇恨的起源

1919年9月，阿道夫·希特勒写了一封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信。不过，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写这封信时希特勒还是个无名小卒。他三十岁了，但没有家，没有事业，没有妻子，没有女朋友，没有任何亲密的朋友，回忆中充满了破碎的梦想：他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但被艺术圈拒之门外；他曾渴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战胜协约国贡献力量，然而只是见证了德国在1918年11月的屈辱失败。他很痛苦，很愤怒，想寻找发泄的对象。

这封信写于1919年9月16日，收信人是一位名叫阿道夫·格姆里希的战友。在信中，希特勒明确指出了是谁不仅要为他的个人境遇负责，还要为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负责。他写道：“我们之中有一个非日耳曼的外来种族，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独特性……却拥有和我们这些人一样的全部政治权利……凡是使人变得高尚的东西，无论是宗教、社会主义还是民主，对于他们来说都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以满足他们对于金钱和控制的欲望。他们的活动引发了国民中的种族肺结核。”¹希特勒所认定的敌人就是“犹太人”。他还补充说，不管是怎样的德国政府，其“最终目标”都必须是“彻底清除犹太人”。

这是一份了不起的文件。因为它不仅让我们洞察了这个后来发动大屠杀的人在1919年时的思想，它还是希特勒自己反犹信仰的第一个确凿的证据。在五年后写的自传《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声称，在20世纪初期，当他还是维也纳一个苦苦挣扎的艺术家时，他就开始憎恨犹太人了。但一些学者早就怀疑他关于自己过去历史的轻描淡写²，怀疑他在维也纳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期间是否真的已经有了这些强烈的反犹观点。³

不过，这封信并不意味着希特勒的反犹思想是在1919年9月突然形成的。其中谈到的当下流行的反犹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就弥漫于德国各地，甚至信中所写的这些想法，没有一条是希特勒的原创。虽然他后来成了最为恶名昭著的反犹主义者，但这些都是植根于过去对犹太人长期的迫害历史当中的。

反犹主义并非新鲜事物，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例如，在基督教初起时，尽管耶稣生来就是犹太人，在《圣经》的某些段落中却强调“犹太人”是和他对立的。在詹姆斯王译本的《约翰福音》中，记载了犹太人“企图杀死”⁴耶稣，有一次他们甚至拿起石头砸他。⁵而耶稣对犹太人说，他们是“魔鬼”的孩子。⁶

于是，犹太人有害的思想被写进了最神圣的基督教文本；一代又一代神父给犹太人打上了“背信弃义”的耻辱烙印，称他们“唯愿主耶稣基督死去”。⁷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在基督教主宰的中世纪欧洲，犹太人被迫害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在许多国家，犹太人被禁止拥有土地、从事某些职业和自由选择栖居地。在许多欧洲城市的不同时期，犹太人被迫生活在贫民区，衣服上佩戴特殊的身份标记——在13世纪的罗马，那是一个黄色的徽章。少数对犹太人开放的职业之一是放债，因为基督徒不被允许从事“高利贷”。正如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所描写的那

样，犹太债主变成了一个令人憎恨的角色。在1543年的德国，马丁·路德发表了《论犹太人及其谎言》，他称犹太人“不过是小偷和强盗，他们每天吃的、穿的没有一样不是靠可憎的高利贷从我们这里攫取的”。他号召民众“把他们从这个国家永远地驱逐出去……赶走他们！”⁸

启蒙运动给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带来了变化。在这个科学和政治进步的时代，许多传统信仰受到质疑。比如，犹太人是否应该被这样对待？抑或他们仅仅是偏见的受害者？1781年，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威廉·冯·多姆写文章支持解放犹太人，他指出：“所有犹太人被诟病之处都是由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造成的。”⁹1789年，在《人权宣言》颁布后，法国的犹太人在法律上成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19世纪的德国，许多关于犹太人的禁令被解除，包括那些限制犹太人进入的行业。

不过所有这些自由都是有代价的。在德国犹太人获得这些新机遇的同时，这个国家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19世纪后半期，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改变得像德国那样迅速，煤炭年产量从1850年的一百五十万吨增加到1906年的一亿吨¹⁰，人口数量从1871年时刚刚超过四千万增长为1911年的六千五百多万。1871年，德国统一，在政治上也发生了变化。在所有这些剧变之后，许多人对这个新国家的文化和精神本质提出了深刻的疑问，最重要的是，成为“德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些相信“人民”(Volk)的力量的人给出了一个答案。虽然这个词通常被翻译成“人民”，但其背后的含义并不是这两个字所能完全概括的。在民族主义(völkisch)理论家看来，这是把一群语言相同、拥有共同文化遗产的人与祖国的土壤联系起来的一种近乎神秘的力量。为了应对城市的突然扩张和新工厂所带来的污染，他们渲染德国乡村的荣耀，尤其是森林的力量。威廉·海因里希·里尔教授的《土地和人

民》是对“人民”最著名的颂歌之一。他写道：“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来自森林的遗产是他们复兴和强大的源泉，他们就会走向灭亡。我们必须保护森林，不只是为了在冬天还能让炉膛生火，更是为了让民族的脉搏保持鲜活，让德国人坚守德国的文化。”¹¹里尔的话写于19世纪中叶，他警告道，危险不仅仅是城市的扩张，还有现代性的象征——铁路。“特别是农民，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在一条铁路旁继续保持‘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害怕自己变成另一个人。那些想要夺走我们特有生活方式的人并非良善的，他们更像是来自地狱的幽灵。”¹²

后来，“人民”的概念对希特勒和纳粹党影响甚巨。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甚至在1936年发行了一部名为《永恒的森林》的电影，赞美森林的力量和农民的重要性。“我们的祖先是一个森林民族，”电影发行时的新闻稿这样说，“他们的上帝住在神圣的森林里，他们的宗教是从森林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人可以离开森林活下去，因砍伐森林而获罪的民族将会湮没无闻……”¹³影片中的最后一条评论强调了人民和森林的关系：“热爱森林的人民将永存！”¹⁴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最受青年欢迎的是“候鸟”运动，这个运动呼吁青年男女到乡村去，唤回德国人民和土地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精神运动，”一名加入“候鸟”的少年弗里多林·冯·斯鲍恩说，“是对威廉帝国时代工商业泛滥的反动。”¹⁵当时还有年轻人加入了诸如德国体操联盟这样的团体参加户外锻炼。“在德国体操联盟时，我第一次看到了万字符，”该团体的一名成员埃米尔·克莱因说，“四个F——Frisch（新鲜）、Fromm（虔诚）、Fröhlich（快乐）、Frei（自由）——拼成了你青铜徽章上的一对万字符，你戴着它作为身份的标志。”¹⁶很多民族主义团体都采用了万字符。可能是由于类似的标记在德国考古文物中被发现，他们就认为这个古老的符号曾被过去的各种

文化所使用，它代表了和祖先的联系。

所有这些新生事物给德国犹太人带来了麻烦，因为他们被排除在了“人民”的概念之外。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城市，过着职业的生活，这就成了那些民族主义理想的对立面——犹太人基本上并不“来自森林”。在1855年十分畅销的小说《借方和贷方》¹⁷中，主角犹太商人维特尔·伊兹格被描写成一个可恶的人，痴迷于敛财，欺骗诚实而天真的德国人。伊兹格是一条寄生虫，和农民耕耘大地的崇高理想相比有霄壤之别。

当然，并不是说每个认同“人民”理念的人都是反犹分子，但对于民族主义运动来说，犹太人在总体上成了新德国一切错误的标志。如果你是一个农民，发现自己难以应付城市的突然扩张和铁路横穿而过的现实——你可以归咎于犹太人；如果你是一个店主，发现客人不再光顾你这里而是拥向新的百货商店——你可以归咎于犹太人；如果你在一个作坊里制作手工艺品却卖不出去，因为市场上充斥着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品——你还是可以归咎于犹太人。

当然，这些指责都是有偏见的。如果说德国犹太人生活在城市，如果说他们开设了百货商店和工厂，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排斥在“人民”所允许的工作之外已有数百年之久。简而言之，犹太人先是被禁止拥有土地，然后又被指责不依附于土地。对于德国来说，这种对犹太人愈演愈烈的反感是很奇特的，因为本来就没有多少犹太人居住在德国，只有不到1%的德国人是犹太人，许多德国人从未接触过犹太人。不过，没有犹太人并不妨碍反犹太主义的兴起。

旧的基督教教义对犹太人的偏见，并没有随着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而消失，反而得到了加强。保罗·拉加德是最坚定的民族主义反犹分子之一，他套用马丁·路德的一些术语大放厥词。在1887年出

版的《犹太人和印度—日耳曼人》中，他写道：“我们反对犹太人，因为在19世纪的德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犹太人所代表的观念、习俗和诉求还是大洪水后人类分裂那个时期的……因为在基督教世界中，犹太人是来自亚洲的异教徒。”在拉加德看来，犹太人是“一个对数千年历史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的民族”。¹⁸

认为犹太人是新德国的异己势力和秘密政治掮客的错误观念，也影响了泛德联盟领导人海因里希·克拉斯，他写出了《如果我是皇帝》一书。克拉斯的书出版于1912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两年前，他把“恢复国民生活健康”的必要性，与“把犹太人的影响完全清除或扭转至可接受的无害程度”¹⁹的需求联系到了一起。克拉斯提出了各种针对犹太人的限制性措施，呼吁犹太人所有的或者聘请了犹太作家的报纸“公开事实真相”，并要求犹太人退出陆海军现役，并禁止其从事教师和律师等职业。

与民族主义及传统基督教的反犹主义并存的，还有一条极为不同的反犹路线。在希特勒1919年9月的信件中，就包含了“基于理性的反犹主义”这一想法。希特勒们的“现代”反犹主义，试图依靠伪科学的理由来证明他们对犹太人仇恨的合理性，认为犹太人应该受到蔑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是因为他们的“种族”。

这种观念认为，人类以种族相区别，而某些种族优越于其他种族。它得到一些半吊子知识分子的吹捧，如亚瑟·德·戈比诺于1855年出版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²⁰。戈比诺是一个外交官，并非科学家，但他想出了一个由“黑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构成的世界，“黑种人是最低等的，位于阶梯的底层”，黄种人“明显优于黑人”，但他们“不能创造文明社会；他们没有精神力量，无法挖掘美和活力的源泉”。种族的最高层次是“白种人”，他们“非常甚至极端地热爱自由”。因此，“历史的

经验”是“所有的文明都来自白种人，没有他们的存在一切都无从谈起。社会只有保持当初高贵族群的血脉才能变得光辉和伟大……”戈比诺还认为，所有的欧洲“文明”——包括“日耳曼民族”——是由从印度迁移到欧洲的被称作“雅利安人”的族群创造出来的，“至少大体如此”。

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是一位作家，他生于英国，后来成为德国人。他于1899年出版了《19世纪的基础》一书，提出了有关反犹太主义的一整套纲领。此书拥有广泛的读者，并不限于德国国内。里兹代尔爵士在该书英文版的引言中给予了热情的推荐，称“此书一跃而跻身于本世纪最杰出的著作之列”，张伯伦的“学识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好的世界指日可待”。²¹张伯伦认为，雅利安人代表了终极理想，而犹太人的表现则恰恰相反。尽管一些犹太人乍一看很难从雅利安人中区分出来，但真相是，所有犹太人都是以“卑劣手段获取巨大财富”的“亚洲异族”。²²然而，只有犹太人和日耳曼人设法保持了自己种族的“纯粹性”，因此也意味着这两个种族将要为夺取霸权展开激烈的斗争。

很容易看到，张伯伦和希特勒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在1923年见面，张伯伦称，在见面后他的“思想状态”发生了“剧变”。²³作为回报，纳粹把张伯伦接纳为他们中的一员。在1925年9月张伯伦七十岁生日时，纳粹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以巨幅版面加以庆贺，对《19世纪的基础》推崇备至。

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张伯伦和戈比诺所说的“优等人”——被这一种族理论所蛊惑。仅仅通过外貌就能评估一个人的价值，这是一种很诱人的想法。在德国流行的小说《赫尔穆特·哈林加》(1910)中，一位法官无法相信哈林加有罪，仅仅是因为他看上去很纯净。²⁴似乎纳粹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对此也十分注意。在1938年视察一支党卫军部队时，一名士兵因为其“外貌”而“吸引”了他的目光。仅仅

是因为外貌，这个人就被希姆莱判定是一个“有能力的、充满活力的德国人”，在调查了这个士兵的背景之后，希姆莱指示给他晋升。²⁵

“传统”反犹主义、“人民”反犹主义和“种族”反犹主义的混合毒品中还加入了一个新的元素，那就是优生学运动的兴起。“优生学”一词（字面上的含义来自希腊文“优秀种族”）是由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创造的。在其1869年出版的《遗传的天才》一书中，高尔顿提出，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谁可以繁殖后代？他写道，人类进行“谨慎的选择”，“通过明智的婚姻在几代人后产生一个拥有很高天赋的种族是有可能的”。社会已经认识到，“每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天赋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对于人类，有责任去研究这一影响的程度，并以一种对自身无害且最有利于人类未来的方式加以训练”。²⁶

高尔顿从未主张以暴力阻止某些人生育，但其他人并不这么想。1895年，一个德国的优生学支持者艾尔弗雷德·普洛兹（他称之为“种族卫生学”），提出了让医生根据婴儿的种族价值来决定其生死的可能性。他还认为：“支持种族卫生学的人不会反对战争，因为他们把战争看作民族生存斗争的手段。”他甚至认为，在一场战斗中可以把“劣等的”人当作“炮灰”放在特别危险的地方。²⁷

有许多优生学运动的先驱并不反犹，例如普洛兹认为犹太人属于“雅利安种族”；但他们的教导对反犹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种族卫生学”是一个国家健康的核心，再加上休斯顿·张伯伦关于犹太人是“雅利安人”的种族威胁的说法，为反犹主义浪潮增加了一个潜在的灾难性因素。传统的反犹主义是基于宗教的，如果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他们就有机会摆脱迫害。但“犹太性”是一个人所固有的东西的理念——纳粹相信这是基于血缘的——意味着这是无法摆脱的。你的“种族”是

你无法控制的，命运如此。可想而知，你可以是最亲切、最慷慨的人，但如果你的“种族”被视为劣等的或有害的，你就会身处遭到迫害的危险之中。

希特勒在1919年9月的信中明确指出，“犹太人绝对是一个种族，而不是一个宗教团体”，这是他反犹信仰的基础。这意味着，对于他来说，犹太人信仰什么宗教无足轻重，因为“几乎没有一个种族全体只信仰一种特定宗教”。

尽管纳粹进行了一场检测犹太人“血液”的徒劳研究，但他们从未找到一种科学的方式来鉴定一个人是否犹太“种族”的一员。因此，当纳粹最终开始迫害并屠杀犹太人时，他们认定“犹太性”的标准仍然只是宗教，通过你的祖辈中有多少人信仰犹太教来判断你是不是犹太人。尽管如此，纳粹始终认为犹太人是“种族”的而非“宗教”的。对于希特勒的世界观来说，“种族”在人类历史上的首要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他决不会让科学上的小事来妨碍他的信仰。

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一点警示需要说明。由于德国的反犹主义在希特勒以及纳粹党兴起之前就已存在，很容易会让人想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犹太人的仇恨直接导致了第三帝国的大屠杀，恐怖的降临似乎存在某种必然性。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重要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尽管德国反犹团体气势汹汹，却并没能说服国内其他人支持他们。根据一次统计，在1893年的德国国会，只有十六名代表来自反犹党派，另外还有其他党派的十二名代表支持他们的观点。²⁸绝大多数德国选民——达到95%之多——在投票箱前并不支持公开反犹的党派。

当然，这些统计数字并没有体现出对犹太人潜在的偏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德国，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反犹主义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在当时，欧洲许多其他国家都存在着反犹主义。实际

上，德国原先的反犹主义不应被夸大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你生活在20世纪初期，要你预测哪个国家会实行消灭犹太人的政策，你基本上不会想到德国，而很有可能会选择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犹太人遭受反犹暴力的程度是恐怖的。1903年4月，在对基什尼奥夫犹太人的大屠杀（俄国人也用这个词）中，数百间房屋和商店被毁，四十九名犹太人被杀害。荒唐的是，犹太人被说成谋杀小孩的凶手，用他们的鲜血来制作逾越节面饼。两年后的1905年10月，在敖德萨大约有一千六百座犹太人的房屋被毁，数千名犹太人死伤。²⁹这只是当时俄国屠杀犹太人的大量事实中的两例。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共有大约二百万名犹太人逃离俄国，他们都在寻求一个更好和更安全的居住地。在这一时期，德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德国的犹太人如果听说关于发生在基什尼奥夫和敖德萨的恐怖袭击，他们会认为自己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文明的国家，没有发生这样的暴行。

难以准确考证的是，希特勒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于犹太人的态度。1908年至1913年间，他生活在维也纳，对时任市长卡尔·鲁伊格十分崇敬。鲁伊格是个反犹分子，曾经声称犹太人在新闻界和金融界的势力已经达到“可怕的恐怖状态”，他要把基督教人民从“犹太人的主宰”下解放出来。³⁰他还相信犹太人是“德国人民的头号敌人”³¹。当时的希特勒是否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维也纳卖画的时候已经准备和犹太经销商打交道。³²一位著名学者认为，希特勒受到了维也纳反犹主义的影响，但在和犹太人交往时采取了“务实的”态度。³³对此我们的确无从知晓。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希特勒完全赞成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渴望找到机会投身战争。1914年8月，他自愿参加一个巴伐利亚团，因此成为一名德国而非奥地利的士兵。希特勒是一个坚定的泛日耳曼

主义者，虽然生为奥地利人，但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个德国人。他是一个勇敢的士兵，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把这枚勋章别在自己的夹克上；但他从未说起过当时推荐他获得勋章的军官雨果·古特曼是一名犹太人。³⁴

到1916年，战局开始对德国不利，前线陷入僵局，后方食物短缺，德国总参谋部的速胜计划被认为是一种幻想。人们开始为德国的失利寻找替罪羊，犹太人成了很多人批评的对象。普鲁士的战争部长称他的部门不断接到大量来自“普通民众”的投诉，说是“大批有犹太信仰的人逃避前线的兵役”。³⁵最后进行了一场人口调查，以确定有多少犹太人实际参加了战争，但结果从未公布。有可能是，德国当局看到犹太人公平承担了战争的义务，为了不让他们洗刷污名，因而将其隐瞒了。

事实上，德国犹太人参军的比例与非犹太人是相同的，然而谣言坚称他们回避了对祖国的责任。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盾报》上刊登过一个粗俗的故事：“一所犹太人的野战医院在前线落成，配备了最新的医疗器械，员工是清一色的犹太人。等待了八周之后，他们迎来了第一个伤员——他发出痛苦的尖叫，因为打字机砸中了他的脚。”³⁶

犹太人被当成替罪羊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16年，著名的犹太实业家和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写信给他的朋友，预言道：“犹太人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愈多，他们的敌人就会愈顽固地去证明是犹太人躲在后方操纵战争投机，仇恨将会成倍增长。”³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的局面，为反犹主义者提供了更多指责犹太人的机会。首先是因为在1918年11月停战后爆发了一场社会主义起义。《鲁尔回声报》宣称：“胜利的红旗必将飘扬在整个德国。德国必将成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俄国一道成为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的跳板。”³⁸1919年4月，革命者宣布在巴伐利亚成立

“苏维埃共和国”。共产主义者欧根·列维涅强行在慕尼黑推行极端的社会主义政策，把昂贵住宅的主人们赶跑，让穷人住进去。他们还采用了暴力来达到目的——4月30日有十名犯人被处死。1919年5月，右翼民兵组织“自由军团”穿过巴伐利亚进入慕尼黑，击败了共产党人。他们对革命者进行血腥报复，杀死了一千多人。

许多共产主义革命的关键人物是犹太人。因此，像弗里多林·冯·斯鲍恩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立刻就加入自由军团的年轻人发现，只要把犹太人和共产主义附会到一起就很容易为自己的反犹主义辩护。“被派到巴伐利亚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几乎全是犹太人，”他说，“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俄国，犹太人处在非常显赫的地位。所以，在德国渐渐形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相互一致、走得很近的印象。”³⁹

犹太人不仅因为挑起德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而受到指责，他们还因为输掉战争、旧帝制倒台、接受《凡尔赛条约》，以及20世纪20年代初期魏玛政府统治下的恶性通货膨胀而受到指责。

反犹主义者称犹太人卷入了所有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中。例如他们指出，犹太律师胡戈·普罗伊斯参与起草了魏玛宪法；犹太政治家胡戈·哈泽于1917年担任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另一名犹太政治家奥托·兰斯贝格，曾作为司法部长前往凡尔赛在战后和会上听取协约国的要求；而犹太实业家和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在战时曾就职于战争部，后来还担任魏玛政府的外交部长。

以上情况属实，但并不代表全部真相。且不说犹太政治家在集体决策时只是其中一员，要他们承担全部责任是荒谬的，当他们在压力下崩溃时，对其个人进行任何指责都是不合理的。例如，胡戈·普罗伊斯确实参与起草了魏玛宪法，但最终版本不是他写的，里面有些条款也不

是他起草的。同样，当奥托·兰斯贝格收到协约国在凡尔赛提出的要求时，反犹主义者从来不提，他对此极力反对并提出了辞职。至于胡戈·哈泽和瓦尔特·拉特瑙，他们在战后不久就被暗杀了——哈泽死于1919年，拉特瑙死于1922年——所以他们无法为魏玛共和国之后的行政失误负责。

当一些事实被忽略，而另一些事实被夸大的时候，偏见就会流行。许多德国人在身处悲惨境地时没有心情去审视自己的情绪。数以百万计的人因协约国的海上封锁而缺乏食物——为了逼迫新政府签署《凡尔赛条约》，封锁持续到了1919年夏天。德国人还承受了1918年造成巨大痛苦和伤亡的流感大暴发。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还有对于迫在眉睫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很多人转向了反犹主义，以此作为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痛苦。西奥多·埃申伯格在一战结束时只有十四岁，他记得父亲“突然成了一个反犹的种族主义者，之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过。全世界的革命者、银行家、出版商，全都成了犹太人”⁴⁰。

正是在战败和怨声载道的背景之下，德国南部出现了一支新的政治力量——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

2. 纳粹党的诞生(1919—1923)

纳粹党的诞生源于德国政治环境的根本变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德国的反犹主义者并不只是向犹太人泼出更多的脏水,而是把仇恨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1912年,泛德联盟领导人海因里希·克拉斯称,“如果我是皇帝”就有权攻击犹太人。克拉斯设想的是,他所要求的变革可以在以皇帝为首的既定政治体制中实现。但在1919年,一个反犹主义领袖是不可能以“如果我是魏玛共和国总统”来号召对犹太人发起攻击的。政府不再被视为可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个途径,因为政府本身就是犹太人“问题”的一部分。

在所有这些不满之下,反犹团体蜂起。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反犹团体是“德国人民保卫与反抗联盟”,它成立于1919年2月。到1922年,该联盟有十五万名成员,他们每个人都签署了一份章程,要求“消除犹太人恶劣而毁灭性的影响”¹。

巴伐利亚尤其成为反犹团体的滋生之地。例如在慕尼黑,每一个希望加入道力会的人都要发誓“自己和妻子身上没有犹太人或有色人种的血脉”²。一旦符合标准入了会,会员们就将听到创始人鲁道

夫·弗赖赫尔·冯·塞伯滕多夫天花乱坠般的说辞。他的观点在1918年德国军队战败时成了令人深信不疑的预言。他宣称，现在“我们的死敌是犹太人。我们不知道这场混乱会带来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猜测。战斗的时刻即将来临，苦难的时刻、危险的时刻即将来临！我们在这场战斗中处境危险，因为敌人不喜欢我们对犹太种族无限的憎恨。现在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了……兄弟姐妹们！现在不再是沉迷于演说、会议和盛宴的时候了！现在是战斗的时候，我渴望并将去战斗！战斗到万字符[道力会的标志符号]获得胜利……现在我们要的是日耳曼帝国，现在我们要说，犹太人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³

另一个道力会的主要成员是迪特里希·埃卡特，他在五十岁以前是个酗酒的剧作家，并对三十岁的希特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埃卡特是一名反犹主义者无疑，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改编了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其中的巨妖被换成了夸张的犹太人形象。⁴在他的另一部作品《父亲》中，埃卡特讲述了一个记者试图揭露媒体中犹太人权力腐败的故事：该记者创作了一个剧本以警醒世人有关犹太人的危险，但犹太人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使其最终流产。在这个本应是讽刺的扭曲事件中，基本的历史并不暗淡：埃卡特的剧作讲述了一个因为是犹太人而遭遇失败的剧作家，而他的这部剧作本身也没有获得成功，可想而知，埃卡特当时也会将其归咎于犹太人。⁵在埃卡特看来，“犹太人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其他所有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可以永远隐匿，只要有人去揭开它的秘密”⁶。此外，他还写道，一旦世人了解了犹太人，“没有人”会让犹太人活下去，“如果他们突然看到了他是什么，他想要干什么，他们会发出惊恐的尖叫声，并在下一分钟掐死他”。⁷

埃卡特是慕尼黑的一个小政治团体“德国工人党”的支持者，该党和道力会有着松散的联系。正是通过这个党，他和希特勒形成了一种

特殊的纽带。1919年9月12日，也就是希特勒写下那封关于反犹太主义信件的前一周，他参加了工人党在慕尼黑一个啤酒馆的集会。工人党是巴伐利亚许多极右翼小党中的一个，它们的调调基本都差不多：德国士兵输掉了战争，是因为后方的犹太奸商“背后捅刀”，犹太人煽动共产主义革命，支持可恶的魏玛民主。在集会上，希特勒展现了才华，被党主席——一位名叫安东·德雷克斯勒的铁路工程师——所赏识。德雷克斯勒察觉到了希特勒用强硬措辞进行自我表达的能力，力促他加入该党。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是迪特里希·埃卡特对希特勒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奇怪的是，埃卡特所看重的希特勒的品质，恰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希特勒的战友们认为“古怪”⁸的地方。希特勒不能容忍批评，社会阅历不足，无法进行正常的谈话，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这些在埃卡特看来，都成了积极的品格。毫无疑问，埃卡特相信在德国战败后很多人都深感愤怒，而希特勒正是这种愤怒的化身，他对当前形势应当怪罪于谁的极端观点，迎合了慕尼黑迷茫大众的口味。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获得了铁十字勋章的普通士兵，这就把他和输掉战争的旧的领导层精英们区别开来。“乌合之众必须被严厉地恐吓，”埃卡特说，“我不能利用军官，人们已经不再尊敬他们。最好的人选是一个明白该说什么话的工人……他不需要太聪明，政治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生意。”⁹因此，埃卡特做出了关于希特勒的预言：“他是德国未来的人物，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谈论他。”¹⁰

至于希特勒，他和埃卡特的关系是最为亲密无间的。他崇敬埃卡特，几乎视之为英雄。当第一次遇见埃卡特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在智识上就像是喝奶的孩子，不过令我宽慰的是，即便是他，一切也并非自然而然——他所有的成就都是经过思考和耐心努力的结果”¹¹，埃卡

特“在我们的眼里就像闪耀的北极星”¹²。

直到1923年埃卡特去世之前，这对奇怪的组合——一个早衰的秃顶酒鬼，一个拙于社交的前士兵——有过很多一同冒险的经历，有些行动如神话般离奇。例如，后来有文章写道，1920年3月，他们乘坐一架轻型飞机到柏林，试图和刚刚在“卡普政变”中推翻政府的右翼革命者接触，航程穿越风雨，以至于希特勒向飞机外呕吐。最后他们降落在柏林，埃卡特冒充商人，希特勒则假扮他的助手。为了装得更像，希特勒还戴上了假胡子。他们来到了短命政变的领导者沃尔夫冈·卡普的总部阿德龙酒店，却被新闻官告知卡普不在那里。埃卡特看着新闻官，并告诉希特勒他们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这个新闻官显然是犹太人。希特勒立刻说道，他已经意识到卡普政变会失败，因为“卡普政府的新闻主管……是个犹太人”¹³。

在这一所谓的失败的柏林之行三周前，德国工人党——现已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在慕尼黑的皇家啤酒馆通过了包含二十五点的党纲。党纲主要是由希特勒和安东·德雷克斯勒草拟的，其中第四点写道：“只有这个民族的成员，才能取得国家公民的资格……因此，犹太人不能成为这个民族的成员。”¹⁴ 倒数第二点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反犹政策，宣称纳粹“反对国内外的犹太唯物主义思想”。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希特勒无数次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会议和集会上宣讲他的反犹主义信仰。他说，“解决犹太人问题是民族社会主义者的中心问题”，纳粹只能以“强力”来加以“解决”。¹⁵ 他还宣称，“犹太人在搞破坏并一定会搞破坏，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建立社区生活的活动观念”¹⁶，“没有解决的办法，除非这些犹太分裂者丧失为害的能力”¹⁷。希特勒甚至攻击是犹太人给德国带来了民主——“民主根

本不适合德国人，那是犹太人的东西”¹⁸，并且重复着传统的反犹太主义老调：“犹太人是人民的强盗。他们[犹太人]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文明，却摧毁过许多。他们没有任何一件值得一提的东西是自己创造的。”¹⁹

希特勒向他的听众强调，永远不会有“好”犹太人这样的事情，个人的行为和成就是毫无意义的。对于希特勒来说，“一个犹太人‘体面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他身上携带着自然赋予他的那些特性，他永远无法摆脱那些特性。他对我们是有害的”²⁰。在希特勒看来，纵容犹太人“只会招致一场狂热的攻击”，因为“平等”被给予了那些“明确非我族类”的人。²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正式宣布的方针是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不过在1921年3月《人民观察家报》——这是纳粹在迪特里希·埃卡特帮助下收购的一家报纸——的一篇文章中，希特勒走得更远，他建议用囚禁犹太人的办法来保卫德国。“犹太人对我国人民的暗中破坏必须被制止，”他写道，“如有必要，可以把他们的煽动者关进集中营。简言之，我们的人民必须从头到脚清除所有的毒素。”²²

在纳粹党的草创阶段，希特勒激进的反犹太主义已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说明当时每一个加入纳粹的人都对犹太人有如此强烈的愤慨。某些人受到了蛊惑，像埃米尔·克莱因，主要是出于对战争失败的幻灭和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我们是战争中成长的年轻一代，”他说，“我们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征召入伍，看着他们在车站戴上花环出发去法国打仗，看着他们离开哭泣的母亲远去。”²³然后，他的父亲回来了，战争失败了。1919年，“当时慕尼黑崩溃了，我们突然看到了红旗，因为共产党人来了。他们在车上炮轰整座城市，散发传单，喊着‘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的口号宣传他们的政党和革命”。

埃米尔·克莱因的反犹思想，是从所谓共产主义和犹太教之间的联系萌生而来的。“当时据我观察，那些[在慕尼黑的‘苏维埃共和

国’] 掌权的人基本上是犹太知识分子——好吧，有整整一长串。巴伐利亚发生的可怕罪行，犹太人难辞其咎，这也是‘犹太共和国’这一说法的由来。”在接触了纳粹党的言论之后，克莱因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反犹主义，相信犹太人不仅是共产主义的幕后推手，还要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负责。他认为，包含在纳粹党纲中的“对抗犹太人”，“不应只针对犹太人本身，还要针对国际犹太金融势力……所以，不是反对犹太人的个体，而是要反对来自华尔街犹太人的资本主义。那时，‘华尔街’经常被提及”。

然而，希特勒所做的更多，他不仅鼓吹了一种仇恨的学说，告诉纳粹党的拥趸们是犹太人该为德国的问题负责——他还要给人们以希望。他描绘了一个全新的德国，阶级差别将会消失，所有的“雅利安”德国人将会团结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之下。埃米尔·克莱因被纳粹的想法所吸引，他认为纳粹“想要根除阶级差别，不分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还是中产阶级，这些都曾是根深蒂固的割裂国家的观念。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很喜欢它……因为国家必须团结一致”²⁴。

后来成为纳粹组织“德意志少女联盟”头面人物的尤塔·吕迪格也希望看到一个团结一致的德国：“事实上，首先是家庭，其次是家族，再次是社团，最后是国家和欧洲，这并非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是一种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理想……这是一种真正的没有阶级差异的理念，不像之前童子军之类的青年运动大多只是由文法学校里的男孩子参加，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有自己的圈子。我们已经把年轻的工人和学校里的青年团结成了一个整体。他们之间没有区别，没有人会问：‘你父亲是做什么的？’”²⁵

吕迪格关于“无阶级”德国的思想，集中体现在纳粹上台后的一次经历中。“那是圣诞节前不久，所有的人都在筹集资金，特别是在当时被

称为‘民族团结日’的那一天。参加活动的纳粹党主要成员既有部长也有实业家，他们冒着风雨站在街上。”一位外国的富人走近一位德国实业家，问他为什么要站在寒冷的街角去请求人们捐献零钱，只需自己“在罐子里放上一千马克”就行了。那个德国实业家转头对吕迪格简短地说道：“他们根本不懂。”

布鲁诺·哈赫内尔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加入纳粹党，他也被“人民共同体”的概念所吸引。“很简单，德国社会之前长期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为了跨越鸿沟，需要建立一个人民共同体，以确保知识分子和工人能够团结起来。‘人民共同体’的概念出现在[纳粹党的]标语中，‘公共的利益是第一位的’，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一遍又一遍地说过。我们自认为不仅是民族社会主义者，还是有国家意识的社会主义者。”²⁶

正如战争期间关押在英国的一位德国高级军官的秘密证言所说：“有些事情是永久性的，它们将持续数百年。并非指[纳粹建造的]公路——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组织方式，特别是吸纳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他[希特勒]已经为工人在国内争得一席之地，而之前从未有人做到过……所有人为共同事业奋斗的原则，企业家真正成为代表德国劳工以及其他各类资本的受托人的理想，听起来很容易，但从来没有人做到过。”²⁷

然而，纳粹赞成“无阶级社会”还有一个黑暗的想法。因为希特勒教导说，要实现这种“无阶级”的新生活，只能先把其他“种族”从“纯正”的日耳曼民族中排除出去。希特勒说：“可以说，我们自己是不存在阶级之类东西的，它们不可能存在。阶级就是种姓，而种姓就是种族。”²⁸在希特勒看来，“无阶级”的德国首先要接纳“种族”至上的观念。犹太人因此成了每一个德国人在纳粹“无阶级”理想下团结起来

的一个障碍，是犹太人阻止德国人变得幸福和繁荣。如果他们的“权势”得不到消解，就不可能有进步，也无法走出泥潭。在1922年9月的讲话里，希特勒总结了他所看到的德国的困境：“我们德国人的前景是：六千万人民看到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少数几个犹太银行家手中。”²⁹

纳粹党并不是同时推动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唯一组织。根据1921年的《德国民族主义运动年鉴》，有多达七十个组织都认为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可以让人民得到复兴。³⁰其中，在巴伐利亚北部弗兰克尼亚的一个小党——德国社会主义党，在1920年出版了一种报纸。该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试图说服社会主义者接受右翼极端分子的理由，它写道，左翼政党宣称要“打击所有的资本，也包括犹太大借贷商”，但他们实际上都是犹太人赞助的：“难道你真的相信罗斯柴尔德、门德尔松、布雷施罗德、沃伯格和库恩家族会让你靠近他们所提供的资金？完全不要相信这些谎言！只要门德尔松、布雷施罗德和库恩这些兄弟家族还是你们的老板，只要你们党团的领导还是犹太人的雇佣兵，你就对这些富豪毫无威胁。如果你不能独立自主，如果你背后还有异族的阴影，你就会遭到诱惑和愚弄。那些阴暗的异族人感兴趣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你。”³¹

文章的作者是一位三十六岁的教师，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后面将在德国的反犹煽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的名字就是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和希特勒一样，施特赖歇尔在战争中也获得了铁十字勋章，但他出生在德国，并非像希特勒那样出生在奥地利。他在巴伐利亚西南部的奥格斯堡长大。在他的童年时代，这个地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口激增，好几千犹太人拥入这一地区。当施特赖歇尔追溯自己对犹太人的厌恶时，他称是因为自己五岁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他的母亲从一家犹太商店购买了一些布料，后来发现是劣质的，母亲流着

泪说这是典型的犹太人的欺骗。³²

1921年秋，施特赖歇尔加入了德国劳动社团(Deutsche Werkgemeinschaft)，他对犹太人开始了更为极端的人身攻击。他声称，纽伦堡的犹太人诱拐基督教儿童并且杀死他们，为的是给逾越节烤面饼涂上血——和十几年前煽动俄国基什尼奥夫大屠杀的“血谣”如出一辙。1922年9月5日，施韦因富特的地区法院举行了关于施特赖歇尔“攻讦宗教罪”的审判，一位陪审员说：“施特赖歇尔曾指责犹太人仍保持杀人祭祀的习俗。他[施特赖歇尔]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东方担任军官，那里的人很直率地谈到犹太人在仪式上杀人。他补充道，在德国，每年复活节都有一百个孩子神秘消失，‘这些孩子到哪里去了？’”³³

在1922年的另一次讲话中，施特赖歇尔称，“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行动起来，把犹太人赶下地狱”，并“把那些说谎的混蛋们抓起来”，那不应该被视为犯罪。³⁴他还说，犹太人已经被“证明”对德国“幸灾乐祸”，如果“[德国]人民知道战争秘密条约的内容，他们会把犹太人杀光”。³⁵

虽然施特赖歇尔的激烈言辞在特定的人群中很受追捧，但有时也免不了会引起冲突。在一次集会上他激怒了很多听众，他们相互扭打起来，集会也被迫终止。劳动社团领导人对施特赖歇尔的批评毫无作用。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具有侵略性和危险的人，对犹太人和异民族有着刻骨的仇恨，因此，他正是希特勒和纳粹党想要的那种人。近二十年后，希特勒回忆这一时期，称迪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地跟他说施特赖歇尔是个“疯子”，但埃卡特“总是补充道，如果不给施特赖歇尔这样的人以支持，民族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指望胜利”。³⁶

1922年末，施特赖歇尔前往慕尼黑，第一次聆听希特勒讲话。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他描述了这一经历：“刚开始是慢慢的，声音很

轻，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有力，最后的力量是压倒性的……他在三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展现出巨大的思想宝藏，语言华丽而激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个人的话语是一种神圣的召唤，当地狱威胁要吞噬一切时，他是来自天堂的使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出于头脑还是发自内心，每个人都能理解他。他为每个人说话，为全体德国人民说话。就在午夜之前，他以激动人心的号召结束了演讲：‘蓝领和白领工人们！德国人民共同体的心灵和行动需要你们！’”³⁷

现在，施特赖歇尔认为他命中注定要追随希特勒，他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般的转变。在纽伦堡审判时，他说：“我在午夜前看到了这个人，他已经说了三个多小时的话，浑身是汗。我旁边的人说似乎看到了他头上的光环。我经历了一个超凡脱俗的过程。”³⁸不久以后，施特赖歇尔劝说自己的支持者加入纳粹党，接受希特勒的领导。192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反犹报纸《先锋报》，并担任这份臭名昭著的报纸的主编，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个时期，希特勒还吸收了一些后来成为纳粹运动骨干的人入党。恩斯特·罗姆、赫尔曼·戈林、汉斯·弗兰克、鲁道夫·赫斯等，这些人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决定追随希特勒的。他们中有些是易受煽动的年轻人，但罗姆和戈林这样的人都是顽强务实、社会阅历丰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人。他们都曾当过军官，在战斗中表现卓越。在德国战败后，他们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有无数的政党可以选择，但最后选择了服从这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前士兵。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见证了希特勒语言的力量。他们看到他如何能够吸引新的追随者——就像施特赖歇尔那样。不过，更重要的在于希特勒和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在政治上，希特勒不需要再说服他们什么。希特勒只要通过他的演讲，给他们描绘一个明晰的愿

景和能够把这一愿景变为现实的激烈手段。

希特勒的演讲总是以绝对肯定的姿态出现，这是必需的前提。他阐述了德国陷入困境的原因，然后告诉听众这些麻烦应该如何解决，没有争辩，没有讨论。希特勒极为强烈地认为他是对的，他主宰一切。1923年，在慕尼黑的一次集会上，卡尔·亚历山大·冯·穆勒教授看着希特勒走上讲台。他之前曾在私人场合见过一两次希特勒，但现在出现在其眼前的男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希特勒。他后来写道：“憔悴、苍白的脸庞似乎被内心的愤怒扭曲了。冷酷的火焰从他凸出的双眼中迸发，似乎是在寻找仇敌去征服。这种神秘的力量是群众赋予他的，还是他感染了群众？我写下了‘狂热、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带着意志力的残酷核心’。衰退的中产阶级也许认同这个人，但他绝非其中一员，他无疑来自完全不同的黑暗深处。”³⁹

在以往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许多人都渴望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为他们开辟出一条穿过四周荆棘的道路。正如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斯特凡·格奥尔格在1907年写道：“伟大的人！伟大的事业！人民和精英向往伟大的人！伟大的事业！”⁴⁰现在希特勒的出现似乎应验了这一命运。就像纳粹的支持者布鲁诺·哈赫内尔所说：“我们的目标是让一个强人来拥有决定权，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强人。”⁴¹

希特勒很快就成为纳粹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在1922年1月的备忘录中，他指出了之前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错误。他们很聪明但有着“天真的空想”，“缺乏一个年轻健壮民族的灼热呼吸”，希特勒认为，这场运动需要的是“烈性子人的冲动力量”。⁴²他发现施特赖歇尔、罗姆和戈林正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他所谓的“斗争和行动的党”所需要的人。

因此，希特勒不仅提供了一个激进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世界愿景，不

仅分析了德国为何输掉了战争又输掉了和平，不仅给出了一个“无阶级”国家的许诺，他还向年轻人指出了一条激动人心、危险和有计划的前进道路。“旧的党派只是在口头上给他们的年轻人以教导，”希特勒在1922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说道，“而我们则要求年轻人身体力行。我告诉你们，如果年轻人在最后关头不去寻找最能代表人民命运的出路，而只是研究哲学问题，在这样的时代把自己埋在书堆下或是枯坐在家中的炉火边，那么他不配做德国的青年！我号召你们！加入我们的风暴之师！”⁴³

就在那一年，慕尼黑大学二十一岁的农科学生海因里希·希姆莱试图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吸收了许多激进主义的理念。不过，他并没有被施特赖歇尔那种粗陋和冲动的反犹主义所打动。相反，希姆莱更喜欢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那些伪学术著作，《19世纪的基础》显得较为“客观”，并非完全被反犹主义的“仇恨”所充斥。⁴⁴年轻的希姆莱认为，他可以对单个的犹太人彬彬有礼，不过他仍然认为整个犹太种族是个威胁。例如，1922年1月，希姆莱遇见一位犹太律师，并在日记里称他“非常和蔼可亲”，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法掩饰自己的犹太性”，因为那是融合在其“血脉”里的。⁴⁵希姆莱还赞成以残酷的方式处理狂热民族主义者认为有害于德国的犹太人。1922年6月，当听到德国的犹太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刺而死时，他写道：“我很高兴……他是个恶棍。”⁴⁶

就像许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见过战斗的人一样，希姆莱想证明他是一个勇敢的斗士。当在慕尼黑听完一个1919年曾在波罗的海对布尔什维克作战的将军演讲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在东方有另一场战斗，我会前往，现在我比以前更坚定了这一点。西方已经垂死，东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在东方，我们需要战斗和殖民。”⁴⁷希姆莱

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策划了在东方的种族灭绝，他日记中的这些话不知不觉成了预言。

日记中的希姆莱是个压抑、拘谨的年轻人，对自己想的很多，在和女性的关系上存在问题。他认为自己属于“忧郁”和“严格”的“那一类人”，这类人“在人类社会中必不可少，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他们不尽快结婚或者订婚，有朝一日也终将堕落，因为人类的自然动物性太强大了”。⁴⁸他还认为：“每个人的目标应该是要做一个诚实、坦率、公正的人，从不害羞或恐惧，而这是很难的。”⁴⁹1922年，和许多人一样，希姆莱的事业发展因经济危机而破灭了。他原本希望在完成农科考试后留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政治，但到1922年秋天，他只能去一家化肥公司工作。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因为蔓延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财产缩水，使得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难以继续供孩子们读书。当时，希姆莱还没有见过阿道夫·希特勒，但他已被希特勒的信仰理论和个人魅力所折服，认为其目标相当有吸引力。

当年，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自视为革命者，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生活在一个革命的年代——从1919年共产主义者在柏林和慕尼黑的起义，到1920年右翼的卡普政变。1922年的希特勒对于暴力夺权已经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他已经准备好带领自己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去大干一场。冲锋队起初被委婉地冠以纳粹党的“体操和体育”部门之名，其作用实际上是保护党的集会和殴打政治对手。

1922年10月，希特勒雇了一列火车，把约八百名纳粹冲锋队队员运往巴伐利亚北部的科堡，那里的左翼势力很强大，他的目的就是在科堡挑起冲突。他获得了成功，冲锋队队员在街头和社会主义者打了起来，最终宣布自己获胜。此类行动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清晰看到了纳

粹党的真正本质。

像所有革命者一样，希特勒不关心他的想法能否在投票箱里获得成功。他并不担心大多数德国人是否支持纳粹的政策——比如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对他来说其实无所谓，因为根本看不出大多数德国人支持这种激进的观点。应该指出，纳粹仍然是一个处于边缘的党派，大量的群众看不起他们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信仰。事实上，对20世纪20年代初期德国投票选举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德国人给不赞成反犹的政党投了票。⁵⁰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有很多人在听完希特勒的演讲后感到了厌恶，例如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国会代表的约瑟夫·费尔德。他记得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听了一场希特勒的反犹谩骂，然后告诉朋友，“但愿希特勒永远不会掌权”⁵¹。

然而，似乎1922年给了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革命一个好兆头。就在希特勒带着冲锋队队员冲上科堡街头的那个月，一位革命同志——贝尼托·墨索里尼——看着他的黑衫军向罗马进军并导致了政府的更迭。当年10月底，墨索里尼出任意大利总理。与此同时，德国的经济危机不断扩大。1923年初，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开进了德国领土莱茵兰，作为惩罚德国支付赔款违约的占领，这无疑是很不得人心的，也表明了魏玛政府似乎无力保卫德国的边界。在经济危机之后，纳粹党成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到了11月，大约有五万五千名成员。这是纳粹运动灾难性膨胀的第一个迹象。

在巴伐利亚，州长古斯塔夫·冯·卡尔可以说是那里的独裁者。现在，希特勒试图强迫卡尔和驻巴伐利亚的德国军队支持纳粹等右翼团体的民兵组织向柏林进军。希特勒认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干了什么，现在德国的纳粹党也一样可以干。11月8日夜，纳粹的冲锋队打断了卡尔在慕尼黑啤酒馆主持的集会，并于次日发起了穿越城市的游行。

参加这场后来以“啤酒馆政变”而闻名的人，很多都将在日后的纳粹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希姆莱（他还没有见过希特勒本人）、戈林和施特赖歇尔——所有这些人都是不怕死的革命者。在游行中，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在市中心的统帅堂和音乐厅广场遇上了警察，共有十六名纳粹分子和四名警察在当天的交火中死亡。

整个事件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尽管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希特勒的威胁之下，卡尔答应支持政变，但当他从纳粹控制下逃走之后就立刻反悔。希特勒误以为巴伐利亚右翼当局支持其革命，并且没有准备好他们只能单干时的应急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有本事把这次耻辱的失败转化为一场胜利的宣传。

希特勒于1924年2月被捕并受审。众所周知，由于卡尔当初曾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答应过支持希特勒，巴伐利亚当局自己已经卷入了政变，希特勒便利用法庭作为舞台向世界广播他的政治信仰。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毁灭者”，只是想在德国创造条件“把敌人的铁腕从我们身上掰开”，而没有犯什么“叛国罪”。⁵²希特勒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后悔，相反，他似乎为此深感骄傲。

希特勒被判犯了叛国罪——对他没法给予其他罪名。但法庭是宽大的，法官格奥尔格·奈特哈德是巴伐利亚当权派中同情纳粹的人之一。结果，希特勒被判了最轻的刑期——五年监禁——并且有希望在判决生效前获得很长的缓刑期。

值得注意的是，若要试图理解纳粹党早期的革命和反犹主义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希特勒的个人特质——虽然这也很重要——不如说是巴伐利亚混乱的局面使其成了纳粹的温床。很难想象，若非时代动荡，一个文明的社会怎么能容忍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暴力团伙兴旺发达。

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就陷入了困境，他们

的生活充满了潜在的威胁。恶性通货膨胀耗尽了他们的储蓄，魏玛政府面对外国干预时的表现软弱无力——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侵占莱茵兰尤为耻辱——共产主义革命仍然是个威胁。民主带来的似乎只有混乱，而荒谬的是，纳粹这样一个暴力的政党却声称可以开辟一条走向稳定的道路。结果是，有一小部分德国人——在这一时期仅仅是一小部分——成了他们的支持者。

最后，在一个令人深感痛苦的时刻，希特勒安慰了民众。“听着，”他演讲的潜台词似乎在说，“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你们的错。”接下来在监狱服刑的几个月中，他将详细阐述德国的所有苦难都是谁之错——以及理由。

3. 从革命到投票箱（1923—1933）

希特勒就在离慕尼黑三十英里外的兰茨贝格监狱服刑。那是一座“古堡”监狱，住所比较舒适，对于来访者也没有什么限制。一个纳粹支持者后来说道，在拜访希特勒的时候，他以为“走进了一家熟食店”，崇拜者们已经给这位纳粹领导人提供了丰富的“火腿、香肠、蛋糕、巧克力和很多其他的东西”。¹

在这愉快的环境中，周围还有很多因参加政变而一起坐牢的同志们，希特勒写成了一部著作——《我的奋斗》。尽管文风十分简陋和夸张，但是《我的奋斗》仍然为窥探希特勒的世界观提供了有价值的内容。这本书并不是大屠杀的蓝图——希特勒没有勾勒出一个消灭犹太人的计划——但确实揭露了他的反犹主义本质。他以不曾有过的详细言论解释了他为什么憎恨犹太人。这种因心灵深深陷入偏见而带来的仇恨，今天读来近乎是一种精神错乱。

关于犹太人的主题贯穿了《我的奋斗》这本书。事实上，如果说“犹太人”是希特勒把整个世界观混合在一起的黏合剂，这并不过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希特勒用心良苦，“犹太人”对他是有用的。他认为，“伟大的领袖”应该“只和一个敌人”进行“斗争”。²这在某种程度上

是因为“人民群众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智力是很渺小的，但他们的遗忘力是巨大的”³。不过，希特勒把德国的所有问题都和犹太人联系起来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不能忽视他确实坚信犹太人有着现实的威胁。“任何形式的污秽和放荡，特别是在文化生活中，能说没有一个犹太人参与其中？”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如果你小心翼翼地切开这样一个脓包，你发现经常会眼前一亮——一个犹太人！就像在腐烂尸体里的一条蛆虫。”⁴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不仅仅想勾勒世界发展的轮廓，还展示了他自己从年轻时开始的成长历程。我们已经注意到，对于希特勒在维也纳时是否已经具有反犹思想，存在很大程度的怀疑，但在《我的奋斗》里，他毫不含糊地说，在奥地利首都时期的他已经形成了要摧毁犹太人的观点。他声称，在维也纳憎恨犹太人是出于以下各种原因：犹太人是肮脏的——“从他们的独特外表你就可以知道他们都不喜欢用水清洁”⁵；他们是狡诈的——“没有什么比他们灵敏的舌头和撒谎的技巧更让人大开眼界了”⁶；他们参与性奴交易——“在维也纳可以考察犹太人和性交易甚至是白奴贩卖之间的关系，可能除了法国南部的几处港口外，在西欧的其他城市是找不到的”⁷；犹太人支持的意识形态是他所鄙视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犹太教教义排斥自然的贵族原则……”⁸

希特勒写道，他曾和犹太人大声争辩过，试图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危险。但麻烦的是，“当你想攻击其中某个教徒时，感觉是在用手去抓果冻——就像一团稀泥那样四分五裂，从你的指间涌出，但很快又重新聚合在一起”⁹。他把维也纳时期的自己描绘为一个政治鼓动家，在和犹太人的辩论中“口干舌燥、声嘶力竭”。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自己参加了这样的

辩论。但是，不难理解为何希特勒要把自己战前的形象塑造成这样，那是因为他要在《我的奋斗》中创造一个神话传说——那几乎就是一本生造出来的宗教小册子。他所描绘的觉醒阶段是清晰而合乎逻辑的：在维也纳，作为一个年轻人，正因为他看到了犹太“种族”与生俱来的危险，所以才成了狂热的仇犹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已经知道在后方纵情享乐的犹太人是如何对前线英勇作战的士兵进行阴谋破坏的；一旦战事结束，他终于觉悟到自己的使命——“就我而言，我决定投身政治”¹⁰。

事实与之截然不同。在维也纳以及在德军服役期间，他仍然是在人群边缘的一个孤独者，对政治毫无兴趣，从未和犹太人进行过冗长的辩论。别忘了，他很清楚自己想要的事业——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和《我的奋斗》所说的恰恰相反，即便战争刚刚结束，他对投身政治也未表现出任何意愿。他没有加入任何一个“自由军团”民兵组织，而是继续留在军队中。直到1919年夏天，他被分配到慕尼黑以卡尔·迈耶上校为首的陆军情报部工作，才表现出成为政治家的一点兴趣。

希特勒的麻烦在于，他的真正经历看上去并不像个英雄。事实上，他和大多数人一样，被无法控制的事情所左右。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很可能仍然是一个苦苦挣扎的艺术家，准备把他的画作卖给犹太商人。如果战争不是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他几乎肯定不会涉足政治。但是，希特勒精明地意识到，他将来任何的追随者都不会重视他真实的个人历史。他必须坚持自己生来就是伟大的，必须宣称他左右了所有事件，而不是为它们所左右。

这一点对于整个大屠杀来说值得重视，因为这意味着不能用希特勒命中注定要去犯罪来解释这场罪行。虽然他在写作《我的奋斗》之时已经形成了对犹太人的巨大仇恨，但这种情感的真正诱因，大概是德

国1918年11月的战败与巴伐利亚接踵而来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突然有那么多人被他的演讲所吸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在熟人面前高谈他的艺术见解却无人理睬，而现在谈到政治，他和他的听众们有了共鸣，因为他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情绪和偏见。

然而，希特勒不是鹦鹉学舌般附和听众们的看法。他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如此极端，听众们只有扩大和强化自己的仇恨才能变成他的支持者。每当他在《我的奋斗》里写下一句夸张的话，诸如犹太人“一直是典型的寄生虫、吃闲饭的人，就像有害的病菌一样，只要遇到一点合适的媒介就开始传播”¹¹，他就把追随者们原有的反犹主义界限往前推进了一点，使得笼统或“温和的”反犹主义变得激烈起来。如果一个成年人本来没有反犹主义的偏见，那么感染这种情绪是很困难的。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说：“煽动者只是把溪流开拓成河道的人。在没有水的旱地上，纵使挖掘也是徒劳。”¹²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了一段关于犹太人的最为极端和臭名昭著的话：“如果在战争之初和战争期间，把一万两千或一万五千名品质恶劣的希伯来人关进毒气室，就像战场上成千上万最为优秀的德国工人所受的同样之苦，那么前线数以百万计士兵的牺牲就不会是徒劳的。相反，及时消灭这一万两千个恶棍本可以挽救上百万对未来有价值的真正德国人的生命。”¹³

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毒气杀死，这似乎是明明白白的。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希特勒内心中一定有一个类似的念头，要在将来某个时候给予全体犹太人同样的命运，这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无法透视希特勒的内心看到他的潜台词，不过基本上可以肯定，此时他并非在公开叫嚣灭绝犹太人，关于“毒气”的话只是针对他认为破坏了战争的特定数量的犹太人。没有迹象表明，他想

把这个命运扩大到整个犹太民族，对他们进行全体屠杀。纳粹党的政策一直是迫害犹太人和褫夺其德国公民身份——这一对犹太人未来的设想也是《我的奋斗》一书其余部分的基调。

不过，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这些关于犹太人的表述，确实与之后发生的事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正是因为他相信犹太人躲在后方破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胜利，所以他下了决心不再让犹太人有机会做同样的事。1941年10月25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两年后，他在私下里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二百万人丧命，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那个犯罪的种族应当受到良心的谴责……”¹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这样一个简单的“教训”，从而把大屠杀合理化，这一理念我们后面将会看到。

同样，尽管很难说希特勒在写作《我的奋斗》之时就已经想好要上台之后杀死全体犹太人，但并不意味着他不乐于见到犹太人的消失。如果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可以按下一个按钮，让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消失——对于他和纳粹党没有任何抗议——那他肯定会那么做的。这并不等于他已经有了一个杀死犹太人的计划，仅仅是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如此强烈，几乎可以不顾一切。

在阐述反犹太主义的理论基础时，希特勒谨慎地提到了传统基督教对犹太人的偏见。他说他相信自己是“按照全能的造物者的意愿去行事：捍卫自己，反抗犹太人，为主的事业而战”¹⁵。在两年前的1922年4月慕尼黑的一次演讲中，他关于这一点说得更为清楚：“我身为一名基督徒的感觉指引着我作为一名战士前往上帝和救世主那里，指引着我这样一个曾经孤独、身边只有少数追随者的人，去认识这些犹太人的本来面目，去成为一名伟大的战士而不是受难者——这是上帝的真理！”¹⁶

耶稣本人就是犹太人，这一点对纳粹来说显然很尴尬，但休斯顿·张伯伦的说法克服了这个困难，因而被广泛接受。他认为耶稣可能已经不是犹太人，而是具有雅利安人的血统。在《20世纪的神话》中，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发展了张伯伦的思想，提出了要建立“正面的基督教”，即一个清除了犹太人影响的教派，耶稣的血统来自北欧日耳曼人的祖先。

然而，希特勒本人对于基督教的态度要比表面所看到的更为复杂。在1922年明确表态自己是一名“基督徒”时，其背后的动机几乎可以确定是功利的。因为他很清楚，一旦他称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就可能会失去很多追随者。他说：“我需要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徒以及普鲁士的新教徒来参与一个大的政治运动，别的以后再说。”¹⁷

如前所述，两年后，希特勒在写《我的奋斗》时，没有说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而是用了模棱两可的说法，说他是根据“全能的造物者”的意愿去行动，为了“主的事业”而战斗。基督教徒读到这里的时候会认为“主”就是耶稣，但希特勒的话也可以理解为他相信一个非基督教的造物神让人类自己解决世上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命运之外没有什么来世。他以后所说的话让这种理解很有说服力。例如，他后来批评基督教太“温顺和软弱”¹⁸。1941年，戈培尔写道，希特勒“憎恨基督教，因为它削弱了一切人性的高贵”¹⁹。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真的相信耶稣的神性、复活或其他任何基督教的关键教义。相反，他很谨慎地指出“在许多个千年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上帝的概念存在”²⁰。

整个《我的奋斗》的主旨，除了提到一句“全能的造物者”外，都是反宗教的。在希特勒看来，决定世界本质的不是宗教，而是种族。犹太人是危险的，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犹太人的“整个存在”都是“基于一个巨大的谎言，那就是他们是一个宗教社

团。实际上，他们是一个种族——真的是一个种族！”²¹

希特勒认为，和不同种族的杂交“引起了种族层次的下降”，这是文化衰落的“唯一”原因。按照休斯顿·张伯伦的说法，希特勒始终认为由于犹太人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血统，“犹太人几乎从不娶基督徒女子”²²，所以他们尤其危险。因此，生存斗争的核心就是两个种族上最为纯粹的人民之间的斗争——雅利安人和犹太人。值得说明的是，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事实上，德国的犹太人是欧洲同化程度最高的犹太人群体之一。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进一步提出了两个想法，对后面有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是，他对“种族卫生学”理论家的那一套感兴趣，认为可以通过控制让谁生孩子来保持“种族”的质量。他写道：“禁止有缺陷的人繁殖有缺陷的后代，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道理。如果加以系统地执行，将是人类最为人道的行为。”²³第二个是，希特勒相信，如果国家要蓬勃发展，德国人民必须要得到更多的土地。他明确地指出了要到哪里去寻找额外的“生存空间”，并写道：“如果今天我们谈起欧洲的土地，能想到的只有俄国及其边境的附属国。”²⁴此外，希特勒所觊觎的苏联——比如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肥沃土地——也生活着大量的犹太人。如果希特勒一直追求自己的目标，那么对抗苏联和犹太人就将不可避免。

《我的奋斗》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它非常明确地暴露了希特勒的核心思想。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犹太人威胁的凶恶、种族问题的关键、生育管制的重要，以及德国人民在东部获得土地的需求。书的内容明确直白，似乎希特勒把他的激进想法隐藏在一目了然的表面之下，就像他的第一个传记作者科拉德·海登所说的那样，这真正说明了“隐藏的最好办法就是公之于众”²⁵。

《我的奋斗》对啤酒馆政变的策划和实行只字不提。正是这起事件让希特勒的名字在德国家喻户晓，这个主题肯定会让读者大感兴趣。不过，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让希特勒避免再次提起1923年11月发生在慕尼黑的这起事件。当他1924年待在兰茨贝格这个布置舒适的牢房里时，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得到缓刑释放；而一旦他被释放，他需要与巴伐利亚当局合作，重新组建纳粹党以踏上政坛。为什么要冒险去提到最初卷入政变的那些慕尼黑大人物的名字呢？——这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一种羞辱，因此最好是对此保持沉默。希特勒不能让《我的奋斗》中所表达的那些看法惹恼巴伐利亚当局，成为他重新崛起的障碍。

到1924年底，希特勒希望能尽快获准出狱，但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提出反对，他们提醒法庭希特勒煽动了一场革命，而且从未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过后悔。此外，他被判处五年监禁，却只坐了不到一年牢。²⁶然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支持提前释放他，比如兰茨贝格的监狱长奥托·莱博尔德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称希特勒在服刑期间已经“无疑变得更加成熟和冷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具有智慧的人，尤其是政治智慧，在思想上拥有非凡的意志力和敏锐性”。莱博尔德的报告还透露，他不仅知道希特勒在狱中一直写作，还知道作品的内容：“他把所有时间都投入这本书的写作中，所以过不了几周就可问世。该书的内容包括了他的自传及其关于资产阶级、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德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后来引发1923年11月8日事件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²⁷

1924年12月，莱博尔德写了一份更加起劲的报告，称“应当给予希特勒特别假释”²⁸。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弗朗茨·根特同意这一看法，希特勒于1924年12月21日被释放。希特勒没有忘记根特的慷慨，纳粹掌权之后，他被任命为德国的司法部长。

希特勒在兰茨贝格做出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关于未来的方针，他将着手推翻魏玛共和国，现在准备以民主的方式来夺得政权。“虽然用多数票击败他们比用枪杆子更费时间，但至少这个结果将由他们自己的宪法来保障。”²⁹二是关于犹太人。在1924年夏天写作《我的奋斗》时，他曾对一位同志说：“关于和犹太人战斗的方式，我真的已经改变了看法，我意识到迄今为止我都太温和了。在写书的时候，我已经明白将来需要采用最严厉的手段来争取胜利。我相信，这个问题不仅对于我们的人民，对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因为犹太人是全世界的瘟疫。”³⁰

希特勒出狱后发现，现在德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变得不利于他。协约国已经同意通过道威斯计划调整德国拖欠的赔款，结束对莱茵兰的占领。美国已经给予德国贷款，帮助他们支付赔偿协约国的款项。因此，美国在欧洲经济中扮演了一个比以往更为突出的角色，美国所面临的任何金融问题都会对欧洲产生强烈影响——这将在五年后的华尔街大崩溃中表现出来。但在1924年末，对于德国来说似乎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货币趋于稳定，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将和西方协约国进行谈判，尝试将关系恢复正常化——这一进程最终促成了1925年《洛迦诺条约》的签订。1924年12月的国会选举中，极端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仅共产党的得票率就下降了17%。

因此，两卷本的《我的奋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版时生不逢时，读者寥寥。到1929年，第二卷才卖了一万五千本。部分原因是，这本书写得实在不怎么样——墨索里尼曾有过著名的评论，称该书枯燥至极，无法卒读³¹——当然，也是因为在该书出版时，人们对希特勒的热情已经冷却了。

然而，一战后对犹太人的偏见甚嚣尘上，此时已难以熄灭。德国犹

太人阿尔农·塔米尔20世纪20年代曾在斯图加特上学，记得他的老师“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来挖苦魏玛共和国，而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犹太人画等号的”。他记得自己“虽然还是一个小男孩，但已经知道什么是反犹主义。我父母灌输给我的首先是怎样做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犹太孩子”。当他成为一个少年时，他的犹太血统被朋友“出卖”给了其他伙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看着自己所谓最好的朋友加入其他人当中，齐声喊道‘犹太猪！胆小的犹太猪！’或其他一些侮辱性的词汇。我很快明白自己和他们不同，看上去格格不入。然后，当我哭着跑回家时，我父亲对我说：‘当他们纠缠你时别忍耐，打回去！’结果是，每隔几天就会打一架，衣服破了，流着血回家，但我已经开始自卫了。现在我是这个相当保守的文法学校里唯一的犹太人。尽管有的教师也许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反犹主义，比如一位曾经当过少将的老师，脸上有伤疤，他说，‘是的，在我的团里有正派和勇敢的犹太人’。但听上去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在其他的团或是他不知道的犹太人群体中确实有怯懦可鄙的人。这些话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影响着我们。所有这些言论让我在同学面前成了一个异类。”³²

正当阿尔农·塔米尔在努力调和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犹太人的生活时，在东北方向三百二十英里外的柏林，欧根·列维涅也面临着同样复杂的情绪。他和父亲有着相同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德国可以说是恶名昭著，也可以说是闻名于世——这取决于你的立场。老欧根·列维涅曾是1919年慕尼黑共产主义革命的犹太人领袖，在自由军团重新控制该市后，他被行刑队枪决。对于他的儿子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我被告知他在面对死亡时非常勇敢——事实上，他当时喊出了‘世界革命万岁！’作为一个小男孩，我完全不懂这些事，只知道当他们开枪射击时你必须喊出‘世界革命万岁！’渐渐地，我越来越

担心，如果他们要把我背靠着墙枪决，我还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吗？于是，我小时候经常会反复走向一堵墙，然后转过身来想象自己即将被枪决，因为我感觉到，毫无畏惧地英勇死去是最重要的。而且不知不觉，我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男孩，在那一天到来时，已经可以做到坦然面对。在青年岁月里，我相信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早晚都会牺牲——要么是在街垒中，要么就是在那堵墙下。”³³

欧根的母亲给他讲述了自己在俄国的童年经历。夜里，她和家人围坐在熄了灯的家里，外面有成群结队的反犹分子在游行，向犹太人寻衅。“但共产主义将会结束这一切，”欧根说，“在共产主义下，犹太人将只是一个少数民族，法律将取消反犹主义。”

20世纪20年代，他在德国度过了童年，由于自己的犹太背景，他遇到过一些麻烦。有时在学校被一些小痞子欺负，但因为他喜欢拳击运动，所以可以自卫。总的来说，他说：“我在德国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我喜欢德语，我喜欢德国艺术，我喜欢德国诗歌，我喜欢德国歌曲，我喜欢我的许多同伴……我的意思是，反犹主义是存在的，但如果你对大多数德国人说，‘看，你们将来会有一个杀死六百万名犹太人的政府’，他们会说，‘不，不，这里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他补充说：“我的意思并非所有周围的德国人都善待犹太人，但确实有很多人抱有同情心。”他遇到的很多德国人都能把“犹太国际阴谋”和日常生活中的犹太人个体区别开来。“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当你憎恨‘犹太人’时，并不是憎恨某个犹太人，而仅仅相信‘犹太人’这个群体是不好的——他们钉死了耶稣基督，他们输掉了战争，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坏事情，但并不是指具体某个犹太人。在我上过的一所学校，有一个纳粹分子曾说，‘你真的应该是我们中的一员’。我说，‘看，没有办法，我是犹太人’。[接着]他会说——他和很多犹太人

都这样说过——‘我们说的不是你，像你这样正派的人在新的德国完全没有问题’。毕竟我已经证明自己绝对是个体面的犹太人，因为我加入了击剑俱乐部，所以我不可能是个坏人。”

欧根·列维涅甚至还回忆说，一些纳粹冲锋队队员就有犹太女友——这可能听上去很奇怪，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后来成为希特勒和大屠杀帮凶的约瑟夫·戈培尔也有一个犹太血统的女朋友。戈培尔从1924年起活跃于纳粹党内，当时他和一位名叫埃尔泽的女教师约会，她的母亲是犹太人。戈培尔说他很爱埃尔泽，称她“善良而美丽”，但对她的背景也深感焦虑。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埃尔泽身上的那一部分犹太人精神时常折磨我，使我感到沮丧”³⁴，对他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她是一个混血儿”³⁵。

戈培尔与埃尔泽关系的特别之处在于，当他在感情上依恋埃尔泽的时候，也恰恰是他的反犹主义思想大大加强的时候。就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不久，戈培尔写道，“犹太人是杀死欧洲的毒药”，人们想要“给犹太人的脸上来一拳”。³⁶1924年4月，他成为家乡莱茵兰的纳粹小组的创建者之一，他们第一次开会讨论的主题便是“反犹主义”。后来，戈培尔写道：“我站在人民一边；我的天性和理智都仇恨犹太人，我对犹太人的厌恶是发自内心的。”³⁷不过几周之后，他在日记中提及埃尔泽，称她是“一个可爱、乖巧的孩子，有点乏味，但她是一个忠诚和努力的小仆人，一个可以依赖的人，会尽一切努力来帮助你”³⁸。

戈培尔头脑里可以容纳一对矛盾的思想——他讨厌“犹太人”，但他爱上了一个有犹太血统的女人——这一事实对欧根·列维涅所遇到的情形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对于一些纳粹分子来说，鄙视抽象的“犹太人”却关心某个具体的犹太人是有可能的。20世纪20年代曾是冲锋队队员的布鲁诺·哈赫内尔说：“我有犹太亲戚，在家庭聚会上会见面。

我和两个犹太表兄弟的关系很好。”³⁹虽然这些都不妨碍布鲁诺·哈赫内尔——或是约瑟夫·戈培尔——成为一名坚定的纳粹。

戈培尔走向纳粹之路也是很说明问题的，它展示了政治和经济局势在极右势力兴起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没有证据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戈培尔就是一名反犹分子，在战争结束时，他二十一岁，因一条腿残疾，有明显的跛行而不能参军。既然当不了士兵，他希望能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他的论文导师是马克斯·冯·瓦尔德贝格，也是一位犹太人，不过这似乎对戈培尔没有什么影响。他生命的转折点出现在1923年，当时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开进了莱茵兰。戈培尔出生在莱茵兰西部的小镇莱特，当时正和父母一同生活在家乡。他失业了，和其他数百万人一样经历着恶性通货膨胀和政治上的混乱时期，现在，仇敌又侵占了他的家园；他也和别人一样在寻找出气的对象，并发现犹太人是一只软柿子。

当戈培尔读到希特勒的演讲词时，他得出结论，那个纳粹领袖也许是德国所需要的救世主。1923年3月，他写道，自己发现希特勒“挥洒自如”，因为他有“完全诚实正直的人格，在我们这个充斥着政党利益的世界里很少见……”⁴⁰三天后，他补充说：“希特勒是一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给德国人民带来新信仰的人。我正在读他的演讲词，深受感动并得到了升华，从理智直指内心……如果没有铁石心肠的人，犹太人问题将不可能得到解决。”⁴¹

值得注意的是，戈培尔在见到希特勒之前很久就已经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希特勒的演讲词仅凭字面就足以令他信服，可见在戈培尔走向纳粹之路上，虽然情感因素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理性也同样重要。他四处寻找，想找出是谁应对德国的问题负责，然后他认定是犹太人，最后，他遇到了希特勒，从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对自己仇恨的肯定和鼓励。

戈培尔至少还保留着一点清醒，记得当他1924年8月在魏玛参加一场极右翼分子的集会时，他觉得所遇到的纳粹党徒——说得客气一点——是相当古怪，任何人只要一见到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噘着嘴的、有点病态的狂热分子”⁴²。但戈培尔仍然痴心不改，四个月後，当希特勒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时，他写道：“阿道夫·希特勒自由了！现在我们可以摆脱那些民族主义的后进分子，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万岁，阿道夫·希特勒！现在我们对这一理念胜利的力量又充满了信心。”⁴³

直到1925年7月，戈培尔参加了在魏玛的另一场集会，他终于第一次见到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一经历几乎压倒了一切。“在魏玛简直就是一次复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仍在梦中……怎样的声音，怎样的姿态，怎样的热情。他正是我希望的那个人。”⁴⁴戈培尔已经完全着迷了，他后来写道：“世界大战就在眼前，摧毁犹太人是其必然的结果。”⁴⁵

戈培尔可能对希特勒已经死心塌地，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德国人并非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变得更加繁荣，纳粹党似乎无足轻重，成为政治生活边缘的一个古怪群体。但是，忽略纳粹党的这一发展阶段是错误的，因为通过研究这些年希特勒在党内高层建立决策过程的方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希特勒的领导是如何在大屠杀的岁月中发挥作用的。

当1925年夏天戈培尔聆听希特勒演讲之时，纳粹尚不是一个规范的政党，而是一个由个人领导的“运动”，主要依靠领导者对于追随者的克里斯玛影响力，这一点很重要。“现在我知道那个人是个天生的领袖，”戈培尔在1925年7月的日记中写道，“我愿意为这个人牺牲一切。在最需要的时候，历史把最伟大的人物给了人民。”⁴⁶纳粹党员应该效

忠他们的“领袖”，是因为他在冥冥中注定要来领导他们，在纳粹上台掌权之前，这是纳粹党长期的核心思想。

然而，纳粹并非一个希特勒事无巨细掌控一切的组织。只要希特勒认为他的下属在原则上接受了他的领导，他显然可以在很长时间内放手不管。例如，1925年，戈培尔对于苏联的看法与希特勒截然不同。在1925年11月《人民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中，戈培尔认为，在本质上把布尔什维克政权视为犹太人的成果是错误的，与此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俄国建设更加美好社会的可能途径。这一观点为希特勒深恶痛绝，但这位纳粹领袖在随后的会议中仍然对戈培尔表现出了友善。⁴⁷

到1926年初，戈培尔是纳粹党内一个要求进行改革的派系成员。这个派系想通过竞选让纳粹党变得更为“社会主义”，领导人是在北德工作的巴伐利亚人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一行为越线了——施特拉塞尔和戈培尔似乎在挑战他的权威，这是他永远不会允许的。1926年，在班贝格，他解决了这一威胁，靠的不是和他们辩论，而是发表了一场长达两个钟头的否定他们的演讲。他重申，“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犹太人的阴谋”，德国的“天然盟友”是意大利和英国，但不包括俄国。

戈培尔被击垮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平生最大的失望之一，我再也不相信希特勒了。这是可怕的事情，我已经丧失了内心的信念……我绝望了！”⁴⁸不过，希特勒认识到了戈培尔对纳粹事业的价值，很快抚慰了他的自尊心。希特勒邀请戈培尔到慕尼黑，让他使用自己的私人汽车和司机，亲自花时间陪他并给予赞许。希特勒还笼统谈了自己对德国的看法，一通天花乱坠的说辞重新点燃了戈培尔的热情。“我喜爱他[希特勒]，”他在随后的日记中写道，“他已经把这些事全都想通了……我向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鞠躬！”⁴⁹

希特勒设法让戈培尔——这个显然是他看重的人——放弃了那些不合乎他口味的路线，重新成为他的无条件支持者。而且，他在没有引起个人对抗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希特勒没有直接指责戈培尔，没有试图在辩论中击败他，而是首先对他的信念进行批判，然后用个人魅力来加以弥补。在这里，希特勒并不像人们传统想象中的那种领导者，这种印象主要来自那些老旧的黑白纪录片中他的演讲，好像他肯定是个愤怒、粗鲁和咄咄逼人的上司。但是，这一事件表明，他有能力进行细致的人事管理。不仅如此，这段与戈培尔的交往也说明了，希特勒首先是要确保他自己的终极权威不会受到下属的挑战，而不太关心政策的细节。他只需把大家的目光聚焦于要创建一个怎样的德国这样一个空泛的构想，然后可以放手让追随者们去研究在实践中完成这一构想的具体细节。如果他们设计的方案很不合胃口，那么他就加以纠正。

在这段时间内，戈培尔还见识了希特勒的另一种领导技巧。希特勒很少在纳粹党内定义个人的明确职责，因此，野心勃勃的纳粹分子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例如，在戈培尔被任命为纳粹宣传部长之后，他发现其他人仍然控制着电台、电影和培训演讲者等各项事务。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去进行斗争，把尽可能多的部门纳入自己麾下。这一点使得党内产生了巨大的活力，而希特勒很少介入其下属的地盘之争。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种领导方式对大屠杀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28年，希特勒写了一本反映其思想的新著作。这一次，他几乎完全专注于外交事务。这本所谓的《第二本书》终其一生从未出版过，但为我们观察其政治信仰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大体上，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希特勒是怎样以“种族”问题来指导外交政策的。

希特勒问道，为什么美国兴旺发达，而俄国却相对落后？他通过

“种族”问题看到了答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欧洲“最好的血统”都移民到了美国，所以这个国家繁荣起来也不足为怪。另一方面，“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俄国挤满了劣等种族，所以这个国家不可能变得强大。

希特勒又一次把犹太人放到了舞台中央。“犹太人进行生存斗争的终极目的，是奴役有创造活力的人民，”⁵⁰他写道，“其最终目标是剥夺其他民族的公民权，搅浑他们的血统，削弱高等种族的水平，并主宰这个种族混沌的世界……因此，世界上犹太人的斗争总是以血腥的布尔什维克化告终。”⁵¹

在《第二本书》中，希特勒再次表示，德国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发展，而这一新的地域必须以武力取得。“一个人无法通过乞讨和欺骗，也不能通过劳作和勤奋来获得自由，只能完全依靠战斗来赢得——为自己而战斗。”⁵²

当写下《第二本书》时，希特勒已经确立了自己在民族主义运动右翼的领导地位。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因为创作出了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著作，还运用精明的领导才能收服了约瑟夫·戈培尔，以及接纳那些意见和他并不完全一致的人加入纳粹党。例如，1927年，雷文特洛伯爵加入了纳粹党。雷文特洛在1924年曾参与组建德国人民自由党，现在却决定“毫不迟疑地成为阿道夫·希特勒先生的下属”。为什么雷文特洛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说，这是因为希特勒“已经证明他能够担起领导之任；他在自己的观点、意志和完整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并加以领导。他和纳粹党融为一体，表现出了团结这一成功的必要条件”。⁵³雷文特洛呼吁他的老党员加入纳粹党：“想要取得任何进展的唯一办法，是依靠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唯一的办法！”

雷文特洛强烈赞成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希

特勒在1926年班贝格会议上曾对此进行批驳。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欢迎雷文特洛加入纳粹党。希特勒知道他要做的，是把民族主义各党派召唤到纳粹党的旗帜下，如此才有希望赢得权力，所以他需要忍受各种各样的意见。

雷文特洛和希特勒都赞成的一个政策是反犹主义。1928年3月，雷文特洛提出他需要一部法律以“彻底拒绝接收犹太移民；驱逐1914年以后进入德国的所有犹太人；其余的全部置于《移民法》管理之下，保留今后驱逐他们的权力，并剥夺他们作为德国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⁵⁴。

这项提议没有下文，不过雷文特洛觉得他可以这么提，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了纳粹对于实行反犹主义的信心。尽管魏玛共和国明显表现出了欣欣向荣和现代化，反犹主义依然盘踞在德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在学生和青年群体中反犹主义尤为普遍，所以许多犹太青年不得不组织自己的远足俱乐部以享受乡野之乐。欧根·列维涅就是这一时期一个纯犹太青年协会的成员，他回忆起自己和朋友们在远足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反犹主义者，令他深感惊讶。“别忘了还有部分德国人从未见过犹太人，”他说，“所以很容易产生对犹太人的仇恨。我记得我们在旅行结束后乘火车回柏林，我背着背包，穿着棕色的衬衫。”和欧根他们同在一节车厢的是一个农夫，他开始“咒骂犹太人，我们说，‘看好了，我们都是犹太人’。他大笑起来说，‘你们认为我们乡下人都是傻子，显然你们是干净有型的德国男孩，你们不会真的告诉我你们是犹太人吧’。他是认真的。因为我们并不脏，没有戴侧边发辫，没有穿卡夫坦长衫，没有留胡子，在他的眼里我们和其他德国男孩没有区别。我的意思是，可能鼻子会长一点，眼珠会黑一些，但很多德国人也有长鼻子和黑眼珠。有关‘日耳曼人’的种族观念很滑稽——看在上帝分上，大多数纳

粹长得并不像【所谓的‘雅利安人’】！”⁵⁵

希特勒声称，现在德国的反犹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兴旺。1928年9月，在纳粹党的年度大会上，他说：“反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理念。十年前所没有的，今天出现了。犹太人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再不会消失，我们确定它会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听之任之直到问题解决，我认为我们可以活着看到解决的那一天。”⁵⁶

不过，尽管希特勒卖力吹嘘，但没有证据表明多数德国人支持纳粹及其恶毒的反犹主义。恰恰相反，在希特勒说这些话时，他知道在四个月前，也就是1928年5月的德国大选中，纳粹只得到了2.6%的选票，这对他们来说是个灾难性的结果。然而，五年之内，希特勒就成了德国的总理，这个国家最大政党的党首。引起这个转变的原因，并不是希特勒所吹嘘的德国国内对“犹太人问题”的广泛关注，而是一个和他完全无关的因素——经济危机。

1929年10月，依赖美国贷款维系的魏玛共和国经济被华尔街金融危机摧垮了。在短短一年的时间——从1929年9月到1930年9月——德国失业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从一百三十万人发展到三百万人。1930年3月，在德国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大联盟瓦解后，德国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以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为首的新政府不得不援引《宪法》第48条执行了总统紧急法令。

在1930年9月举行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了超过六百万张选票，成为德国的第二大政党。这是一个惊人的成果。数以百万计曾经拒绝希特勒和纳粹的德国人，突然在绝望的时刻转而投向他们。尽管在1928年希特勒曾吹嘘过反犹主义将蓬勃兴起，但现在他对现实很清醒——这些新的支持者之所以来投奔他，主要不是因为什么反犹信仰。对于他1930年至1933年间演讲的研究表明，犹太人问题在演讲中出现的比

重有所降低。1930年10月，他甚至说：“我们不反对正派的犹太人；不过，如果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同谋，我们便把他们视为敌人。”⁵⁷

希特勒更加关心的是，通过建立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来实现德国的复兴，而不仅是怨恨犹太人。他呼吁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强加给德国的惩罚措施，并警告存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1932年1月，他对杜塞尔多夫一群工业界听众说道，“今天，我们正在德国命运的转折点上”，这是因为德国可能陷入“布尔什维克的混乱”。⁵⁸在这篇冗长的讲话里，他并未提到犹太人。

但这并不说明听众会以为纳粹真的放弃了反犹主义。纳粹的宣传机构一遍又一遍地鼓吹犹太人要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令人憎恨的《凡尔赛条约》和腐朽的资本主义引起的经济衰退负责。因此，当希特勒在演讲中提到上述这些名词时，他的听众们就会明白，这笔账终究是要算到犹太人头上的。

1932年，当二十一岁的尤塔·吕迪格听到希特勒的演讲时，她当然明白“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词的后面隐藏着犹太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肯定是有关系的，”她说，“有一个恶毒的笑话在流传……那就是，幸好俄国的共产主义者中还有一个不是犹太人，这样在星期六[犹太人的安息日]还可以由他来签发出决命令。这是有一点儿恶毒，但共产主义和犹太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肯定的。”⁵⁹

吕迪格说，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被希特勒和纳粹所吸引，主要是觉得他们可以找出让德国摆脱经济萧条的办法，并让德国人团结在同一个目标之下。同时，她也认为，只要他们能成功，反犹计划并不算什么妨碍。“事实上，从帝国时代起，人们就普遍把犹太人视为外来的异类，其他国家或多或少也是如此。”⁶⁰

1932年，二十多岁的银行家约翰内斯·察恩认为：“普遍的看法是，

犹太人在德国已经太过分了。”⁶¹他说的“过分”是指德国犹太人在法律、医学和新闻行业的人数已经多到不成比例。（这不奇怪，犹太人之所以选择这些工作，是因为他们很久以来被禁止从事其他行业。）据察恩说：“如果有朝一日他们人数实在太多，普遍的看法是可以把他们赶回去；但如果最后要把他们杀死，那么在德国，没有人或者只有很少的人会同意……”⁶²

不管怎么说，纳粹党崛起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德国糟糕的经济形势。在这个灾难时期，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只想在政治动荡的环境下找到工作养家糊口。到1933年初，有六百万人失业，德国共产党的支持者和纳粹党不相上下。似乎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极端——一端是共产党，另一端是纳粹党。“一家有三口人，六百万人失业就意味着一千八百万人没有饭吃。”约翰内斯·察恩说，“此时若一个人失业，他能做的只剩下一件事：要么加入德国共产党，要么加入纳粹的冲锋队。因此商界认为，那些人还是加入冲锋队比较好，因为那里讲究纪律和秩序；并且一开始——时至今日你只能这么说——谁也说不清民族社会主义是个有些缺点的好东西，还是个只有一点好处的坏东西，谁也不知道。”⁶³

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在自我开脱。因为，虽然在纳粹发展壮大的1930年到1933年间，希特勒没有强调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但他的许多追随者并没有那么克制。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不仅在《先锋报》上继续刊登反犹太主义的污言秽语，还在1932年的一次演讲中发表了这样的言论：“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认为阿道夫·希特勒是新德国的使者，我们相信是上帝派他来的，为的是把德国人民从无处不在的犹太吸血鬼那里解放出来。”⁶⁴

在此期间，约瑟夫·戈培尔也在继续灌输他的反犹信仰。自从他1926年底被任命为柏林地区的纳粹领导人后，他就把首都的犹太人作

为自己的特殊目标——特别是警察副总监伯恩哈德·魏斯博士。戈培尔在宣传阵地《进攻报》上一个劲儿地称他为“伊西多”·魏斯，“伊西多”是魏斯博士的犹太原名，伯恩哈德则是他的教名。在《进攻报》上，“伊西多”·魏斯遭到了各种各样的丑化：他被形容为一个长着弯鼻子、不值得信任甚至有点像驴的犹太人。魏斯表示抗议，法庭认为驴的漫画确实攻击了他，戈培尔于是重印了漫画，加上了说明文字，称法官也同意魏斯博士长得像驴。⁶⁵戈培尔还支持在街头对犹太人采取行动。1931年9月犹太新年，武装的冲锋队开到柏林选帝侯大道主要的商业街，骚扰任何一个看上去像犹太人的人。那时戈培尔已经抛弃了有犹太血统的女友埃尔泽，转而追求金发碧眼的玛格达·昆特，他们于1931年12月结婚。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纳粹的宣传还瞄准了许多被认为是犹太人把持的经济利益。例如，在德国北部一份纳粹的选举小册子上写道：“一场关于你的灭顶之灾正在汉诺威酝酿和实施中！现有的体制允许美国大鳄‘伍尔沃斯’借助金融资本的支持，在市中心格奥尔格大街建立一座新的吸血鬼商场，这将令你彻底破产。”⁶⁶

很多人都会立刻明白“伍尔沃斯”是对犹太人的攻击，因为纳粹近几年来一直在宣传犹太人经营的大型百货商场对传统零售商构成了威胁。这些商场——现代化的标志——被纳粹看成吸血鬼，从传统商业街吸走了血液。纳粹对百货商场极为仇视，在当初的二十五点纲领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到这一点，其中第十六点要求把百货商场“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

纳粹上台以后，百货商场就成了一个显眼的目标。1934年12月，汉诺威的长官报告说：“针对犹太商场的暴乱再次发生……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日，催泪瓦斯被连续不断地扔进犹太商店和伍尔沃斯商场。

由于中毒症状严重，救护车不得不把十名伍尔沃斯商场的员工送往医院。”⁶⁷事实上，伍尔沃斯商场的创始人F.W.伍尔沃斯是卫理公会的教徒，不是犹太人。

戈培尔赞成这种牵强附会的方法。当普通德国人听到“百货商场”，很多人就认为“这是犹太人的”；当他们听到有关马克思主义危险的演讲，他们就会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犹太人”；等等。戈培尔认为，最强大的宣传就是可以操纵听众，让他们自己得出有关的结论。⁶⁸

但是，即便纳粹支持者的人数有所增长，但大多数德国人仍然反对他们。特别是许多社会主义者发现了他们反犹太主义的卑鄙一面。共产主义的支持者阿洛伊斯·普法勒认为，既然犹太和非犹太德国人“讲同一种语言”，“去同一所学校”，那“为什么你要恨他们？”⁶⁹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人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这很清楚——没人能为自己的出身负责”。在普法勒看来，重要的不是“种族”，而是通过抑制“上层”的权力来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德国。

也有德国媒体预先对纳粹上台的后果发出了警告。例如，1931年1月，犹太记者利翁·弗伊希特万格在《世界晚报》上写道：“民族社会主义者拼命摧毁理性，煽动情绪，准确地说，是驱使人们走向野蛮……一旦第三帝国建立起来，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可以期待的只有一件事——灭绝。”⁷⁰

然而，大多数德国人想要彻底的变革。尽管纳粹尚未获得多数选票，大多数德国人却支持了那些公开声明要摒弃民主制度的政党。在1932年7月的大选中，纳粹党得到了37%的选票，德国共产党得到了14%的选票——两者一共是51%。这个结果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多数选民已不再想要现存的民主政体。德国人民认为，令他们失望的已经不是个别政客或党派，而是整个政治体制。

20世纪30年代初期，德国人对民主的反感溢于言表。“关于民族社会主义为何获胜，最有力的解释就是，这个国家的民主从未赢得过一场流血的战斗。”小说家海因里希·曼在1931年12月写道，“在战败之后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相比于君主制的失败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它看上去像是一条可行的出路——这只是一条出路，谈不上是一个目标，更没有什么充满激情的体验。”⁷¹

“德国人没有民主的传统，”阿尔农·塔米尔说，“从来没有过。直到今天德国也没有公民争取来的民主。”作为一个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长在德国的犹太人，他同样认为希特勒的得志仅仅是因为德国国内的危机。“纳粹兴起的环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那时德国人民饱受压迫和屈辱，在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挣扎，这对纳粹其实是非常有利的，总要有人出来背黑锅。整个纳粹的反犹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永远都是犹太人的错。”⁷²

虽然希特勒在争取选民期间缓和了对犹太人的语气，但纳粹的政策是一贯明确的——正如阿尔农·塔米尔所言：“都是犹太人的错。”1931年10月，纳粹党的高级成员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说，一旦纳粹掌权，可以肯定，“犹太人对德国的掌控将会终结”，这一点将通过“把犹太人从所有阻碍德国经济的领域中驱逐出去”来实现。⁷³因此，1932年7月，支持纳粹的那37%选民把票投向的是这样一个政党，它已经公开宣称如果当选就会迫害犹太人，对此它毫不掩饰。

德国的很多政治精英和纳粹也有共同点，他们希望通过摒弃民主、粉碎德国共产党的威胁来恢复德国的秩序。1932年，八十五岁的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总参谋长冯·兴登堡终于打算废除民主制度，支持建立一个右翼政府。虽然迄今为止，纳粹党已经成为德国右翼最强大的政党，但在他看来，让希特勒成为总理却是不能接受的。在1932年8

月两人相遇时，兴登堡告诉希特勒，他“面对上帝、良心和祖国时，无法说服自己把整个政府的权力交到某个政党手里，尤其是一个对持不同政见者存在偏见的政党”⁷⁴。他在1932年11月再次会见希特勒时重申道，他担心“一个由你率领的实权内阁将不可避免地发展为一党专政，并带来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导致德国国内的矛盾日益激化……”兴登堡补充道，以“他的誓言和良心”⁷⁵对此无法排解。

兴登堡反对希特勒成为总理人选，部分还是出于阶层的考虑，他称希特勒为“波希米亚下士”⁷⁶。不过，他也明确表示过并不支持纳粹的所有政策——尤其是反犹太主义。1932年8月，他写信给“持犹太教信仰德国公民中央联盟”，谴责对犹太人的袭击。在1932年初他竞选连任总统时，国会中的纳粹党代表甚至嘲笑他是“犹太候选人”⁷⁷。

不过，有一些和兴登堡关系亲密的人却是反犹的。1932年时的德国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在次年接受伦敦《标准晚报》采访时说，德国的医疗和法律界内有大量的犹太人，这对英国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有必要清除在德国国内行政事务中担任要职的“国际犹太人”的影响。⁷⁸

兴登堡面临的问题是，他在1932年任命的两个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和库尔特·冯·施莱歇——都没有什么群众基础。他担心未来统治阶层和普通德国选民之间的裂痕会越来越大，最后发展成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冲锋队的街头内战。

希特勒把自己塑造成尊重兴登堡和决心团结德国的年轻爱国者。1933年1月4日，在代特莫尔德的演讲中，他说：“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是德国人民对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共同体的渴望……命运交给我们消除德国人民分裂的重担……”希特勒认为，必须“不折不扣地消除一切”导致国家分裂的因素。他提到“马克思主义”是对人民团

结的威胁，虽然没有明确说到犹太人，很多人会再次听到“马克思主义者”即犹太人代称的提法。⁷⁹

最终，弗朗茨·冯·帕彭设法让兴登堡接受了希特勒。1932年12月，由于缺乏民众的支持，帕彭被迫把总理职位交给了库尔特·冯·施莱歇。老狐狸施莱歇试图为自己的政府建立一个广泛的执政基础，但他失败了。现在帕彭报了仇，提出自己愿意重新进入政府担任副总理，由希特勒担任总理，兴登堡同意了。他们的理由是，帕彭和其他一些非纳粹党人员将进入内阁，以此可以“驯化”总理希特勒。

1933年1月30日，在慕尼黑啤酒馆宣布党纲的十三年后，也是纳粹在大选中仅仅得到2.6%选票的五年后，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现在， he 可以把长久以来的理想付诸实践了。

4. 巩固权力(1933—1934)

上百万德国人认为希特勒的上台是一个积极的进步。他们同意戈培尔的看法,那就是德国“正处在她历史的转折点”¹。一个名叫曼弗雷德·冯·施罗德的学生说:“年轻人都很热情和乐观,信赖希特勒,把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诸多后果视为光荣的使命,尤其是《凡尔赛条约》。所以我们全都意气风发……感觉这是一场民族解放,一个新的起点。”²

一位名叫加布里埃莱·温克勒的年轻秘书证实了这一说法:“我们当然都很兴奋。我们认为一切都会不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回忆道:“所有的年轻人……都喜气洋洋,因为他们都很快乐。”³贡特尔·洛泽1933年时十九岁,他认为:“希特勒的人格是值得信任的——他不但信守自己的诺言,而且会把它变为现实。希特勒的神话已然存在。”⁴

许多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路易丝·索米茨目睹了1933年2月6日在汉堡的一场游行。她有着特殊的家庭历史——尽管她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非犹太人,她的丈夫却是从犹太教皈依基督教的,所以她的描述也是站在这一立场上的。“到了十点,第一拨火炬过来了,”她在日记中写道,“大约两万名褐衫军一个接着一个,就像海中的波浪,火炬照亮了他们激昂的神情。”她回忆道,纳粹冲锋队队员高喊“犹太人

去死”“共和国是狗屎”，唱道“犹太人的鲜血将从他们的刀上喷溅而出”。在末尾一句话旁，路易丝·索米茨接着写道：“那么有谁会把这些当真？”⁵

许多德国犹太人立刻就感到了希特勒上台后的影响。欧根·列维涅当时是一所多元宗教学校的学生，他记得有一个之前对他很友好的非犹太男孩走过来问他：“列文，你带上去巴勒斯坦的船票了吗？”欧根吃了一惊：“你看，反犹主义总是隐藏在表面之下。我把他打倒在地，但有趣的是，他没有爬起来和我战斗。我让他意识到了我是多么生气，他感到内疚，然后就溜走了。所以你看，人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你在不同时刻就可能做不同的事。”⁶

在斯图加特的阿尔农·塔米尔面临着类似的冲突：“班上最蠢的男孩，已经准备要穿冲锋队的制服来上学，他递给我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去巴勒斯坦的船票，走了就别回来，永远。’我准备揍他一顿，但是两位学长插手了。其中一位是将军的儿子，另一位是官员的儿子——他们是班上反犹分子中的‘贵族’。他们调解道，‘那个不是问题……这和他无关。他和那些布尔什维克犹太人无关，和犹太资本家也无关，他是清白的’。然后，我第一次被邀请到他们家去，以此证明也有正派可敬的对手。我当然不会接受，对于这一受到邀请的荣誉，我拒绝了。”⁷

在汉堡，犹太女孩露西尔·艾肯格林也遇上了突如其来的歧视。“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住在同一栋楼的孩子……就不再和我们说话了。他们朝我们扔石头，喊我们的名字，这可能是希特勒上台三个月后的事。我们不明白我们做了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经常会问，这是为什么？每当我们提问时，家里的答案几乎都是：‘哦，这是一个过渡阶段，没关系，会恢复正常的。’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但

是我们无法理解这种变化……他们[父母]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公共汽车或是有轨电车里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站在后面，不要大声说话，不要笑，只是排队走开。但我们不懂，觉得这毫无道理……我们感到害怕，因为走到学校要花四十五分钟。有人冲我们喊叫，其他孩子朝我们吐唾沫。大人们视而不见。虽然我们没有标记，可我们明显感到被打上了标记。”⁸

这些情况说明，很多之前从未表露过反犹情绪的德国人，很容易就变成了政权所希望的样子。其中有些人之前就有这样的想法；其他人则只是随波逐流——尤其是当强大的日耳曼国家有了这样一位以反犹著称的总理之后。

然而，尽管希特勒已被任命为总理，但他还不是德国无可争议的独裁者。他的行为是受一些强大因素制约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他想要控制的目标。首先，他知道需要得到军方的支持。所以他的前几项决定之一——在被任命为总理的四天后——就是和武装部队的领导人会晤，这并非无缘无故。2月3日，他告诉他们，他致力于大规模重整军备，而且正规军无须担心会和冲锋队合并。不出所料，这一消息受到职业军人的欢迎。“一支真正能够保卫德国的军队将建立起来，”那时还是一名年轻军官的约翰—阿道夫·格拉夫·冯·基尔曼斯埃格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行动。”同样令人鼓舞并“对士兵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冯·兴登堡已经对希特勒的表现给予了良好祝愿，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在军队中，兴登堡可不是希特勒能够比拟的”。⁹

1933年2月10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向全国发表了一篇冗长的讲话。他谨慎地避开了所有政策的细节，当他的政治对手要求“告诉我们你计划的细节”时，他只是回应道：“在你们得意之后，在你们插手之后，在你们颠覆之后，德国人民将会得到彻底的重生，就像你们彻底摧

毁了它一样！这就是我们的计划！”他重申，无论如何，没有东西可以令他从“扑灭马克思主义”分心。¹⁰

希特勒正在小心翼翼地前进。他下令于3月5日举行一次投票，为的是通过一项《授权法案》，让他可以摆脱议会进行统治，并且不需要每一条法令都要征得总统冯·兴登堡的同意，以此让他新的独裁合法化。为此，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例如为了获得中央党的支持，他承诺不和任何想要打倒基督教的党派结盟。¹¹

1933年2月27日，风云突变。一位名叫马里纳斯·范·德尔·卢贝的荷兰共产党员在国会大厦纵火。最初，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希特勒看见火焰后“十分愤怒”。“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戈培尔写道。几个小时后，他们发现了犯罪人——一个全身充满马克思主义危险的男人。“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戈培尔说，“一个荷兰共产党员。”¹²在投票前一周发生了这样的事，以及嫌疑人的“恰当”身份，引起了一系列的阴谋论，认为是纳粹策划了国会纵火案，但这从来没有被证实过。

可以肯定的是，这起纵火案给希特勒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次日，兴登堡签署法令，剥夺了德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如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对德国共产党员的围捕也掀起了新的高潮。普鲁士内政部长赫尔曼·戈林招募了大批纳粹冲锋队队员，作为辅警来对付纳粹之前的政治对手。

至于德国的犹太人，尽管在接下来的数月内，冲锋队队员为庆祝胜利对犹太人进行了零星的攻击，但没有发生集体关押的情形，犹太人遭到的更多是羞辱和窘迫，没有杀戮。例如在纽伦堡，鲁迪·班贝尔的父亲和其他一群犹太人被冲锋队带到体育场，他们被迫用牙齿去啃草。鲁迪·班贝尔得知这些，只是因为其他受迫害者的孩子告诉了他。“我父亲不敢说或不想说，”他说，“他回来的时候只是显得很苍老，脸色灰

白,对此……我不觉得有一个连贯的反对犹太人的计划,时不时发生的反犹事件只是为了告诉犹太人在德国人面前要识相些,是为了羞辱他们。人们得到了某些模糊的暗示,可以任由他们解释,他们随便想干什么都可以——无论是反闪米特或是反犹,还是出于义愤,或是仅仅想在同事面前炫耀一番。”¹³

对于冲锋队1933年最初几个月在纽伦堡的行为,鲁迪·班贝尔的评论也许还算准确——纳粹对单个犹太人的迫害方式显然没有什么关联——不过它很快就发展成了全国范围的反犹运动,而且是一场国家鼓励、精心组织的恐怖运动。这场运动发生在纳粹3月5日投票中赢得近44%的选票之后,始于3月7日的莱茵兰,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蔓延到整个德国。冲锋队队员和纳粹的支持者在犹太人的店铺外面示威游行,骚扰犹太店主,往往迫使店铺整日关张。

3月24日,希特勒所盼望的《授权法案》终于获得通过。这一“拯救人民与德国于水火”的法律,给了希特勒摆脱议会的巨大权力,成为纳粹独裁统治的法律基础。四天之后的3月28日,希特勒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抵制犹太商业。这一面向“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党内同志”的号召之所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现在希特勒的新政权已经团结一致,他对于能够再次把“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联系起来感到很欣慰。“德国人民,”他说,“给了马克思—犹太人噩梦一个闪电般的终结。”第二,纳粹声称,逃离德国的犹太人在国外“展开了一场肆无忌惮的叛逆煽动”。第三,他认为,“那些发布谎言和诽谤的就是我们当中的犹太人”,因为在德国的犹太人“有能力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骗子们串通一气”。¹⁴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希特勒就认为存在一个跨越国界的犹太人阴谋,但最近几年他没有在公开场合加以宣传。希特勒显然想向国际社会表明,外国对纳粹政权的批评,尤其是批评其

反犹政策，这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德国犹太人就被当成“人质”来阻止国外犹太人对纳粹的批评，这是一个最早的例子。后来，这成为纳粹回应外国批评的常规办法——外国媒体对德国的攻击越尖锐，德国的犹太人就越倒霉。最后，希特勒本人没有签署这份文件，它只有“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领导者”的签名。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参与其中，这不仅是因为其中的意见合乎他之前的看法。据《人民观察家报》报道，在《授权法案》通过后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他曾表示，必须采取措施打击“海外犹太人的恶劣宣传”，否则“人民自己”将会用“也许不那么愉快的形式”来反对犹太人。¹⁵

这一模式，即利用纳粹支持者进行反犹运动的热情来攻击犹太人，而自己的名字却不出现在任何迫害犹太人的正式命令中——就像这次把犹太人作为“人质”一样——我们会看到将反复出现在今后的历史当中。希特勒后来说，他希望他的将军们像锁链下的斗牛犬，他们应当渴望“战争、战争、战争”，而“我应该做的则是给他们踩踩刹车”。¹⁶这种领导方法——希特勒原则上予以支持，通过下级来发起行动——对于袭击犹太人的冲锋队还是发出战争叫嚣的将军们都是一样的。这样做对希特勒有很多好处——至少 he 可以和那些后来被证明不得人心的政策保持距离，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把责任推给那些无法无天的“匹夫”。不过，希特勒总是掌握着最终的控制权，如果他想停下来，事情马上就能停下来。

一旦外国犹太人举行抗议活动，希特勒就肯定会视其为某个酝酿中的国际犹太阴谋。最著名的一次是1933年3月27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一场群众抗议集会，有五万多名抗议者在大厅内外集会。三天前的3月24日，英国的《每日快报》在头版登出了“犹太（Judea）向德国宣战——全世界的犹太人联合行动”。

两个德国的犹太人团体——“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持犹太教信仰的德国公民中央协会”——在戈林的要求下于3月底派出了代表团前往伦敦，试图阻止对德国的贸易制裁。¹⁷虽然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希特勒扭曲的世界中，这反倒证明了犹太人之间有着超越国界的联系。德国以外的犹太人团体也很清楚他们面临类似的悖论。如果他们什么也不说，就好像放弃了德国的同胞；但如果说了什么，就点燃了希特勒关于“犹太国际阴谋”的幻想。这令他们进退维谷，并使他们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初几年内，对纳粹的反犹主义无法做出统一的反应。

3月24日，“持犹太教信仰的德国公民中央协会”发布了一则新闻，表明这个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犹太人团体就好像在走钢丝。一方面，他们将一些外国媒体的报道斥为“纯属虚构”，那些报道称发现犹太人的尸体被扔在柏林一座犹太墓地外面，而且有很多是女孩。另一方面，他们承认“某些”犹太人成了“政治报复和暴力行为”的对象。他们似乎在说，德国犹太人的情况糟糕，但又不像国外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糟糕。¹⁸

一场抵制犹太人的行动正在策划中，就在行动前一夜，戈培尔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宣布，行动将只持续一天——4月1日星期六——但如果来自外国的攻击不停止，它就会再次实施。纳粹政权又一次试图表明，德国犹太人的福祉取决于其他国家对德国的脸色。希特勒和戈培尔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心理习惯，那就是，他们对德国犹太人的攻击是对外国犹太人攻击的自卫。

在斯图加特，十五岁的阿尔农·塔米尔在恐惧中等待着抵制行动那一天的到来。他已经听说了“朋友挨打的事。我也有一个朋友，他年长一些，当时他碰巧在家。他告诉我外来的冲锋队队员进到村里殴打所有的犹太人，打得很厉害以致他们几周内都无法坐起来。还有人听

说，他们[纳粹]的特殊办法是不让本村的冲锋队队员袭击犹太人，而是把冲锋队从外面调进来”。¹⁹

4月1日，阿尔农感到他“掉进了深渊”：“冲锋队队员进行了游行，并站在所有的犹太人商店前面。他们把油漆涂在商店的橱窗上，三三两两地站在每一个犹太人商店门口。每当人们围观或路过的时候，他们就说，‘德国人不去犹太人商店买东西’，‘犹太人造成了我们的苦难’，等等。我们站在那里看，确实有一两个德国人不顾阻挡进了商店，他们试探性地走了进来，那里一片寂静……那一刻才明白，原来他们可以这样对待犹太人，所有的故事一下都出现了，逮捕、殴打和杀人……我觉得好像掉进了一个深渊里。那时，我第一次直观地认识到现行法律不适用于犹太人。意思是说，你可以对犹太人为所欲为，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辩护，犹太人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人。那是我第一次想到任何人都可以对你为所欲为意味着什么，他们甚至可以把你打死。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我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还不到十六岁。就在那时，我开始远离德国人。我的父母不太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德国邻居们也说，‘这只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都会过去的。他们不是说你，他们说的是别人，有权势的犹太人、有钱的犹太人、国外的犹太人’。”²⁰

对于纳粹分子来说，这次抵制行动的效果差强人意。尽管冲锋队队员有组织地发泄了他们肮脏的仇恨，但同时也显示出这种野蛮的反犹行动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阿尔农·塔米尔所看到的——一些德国人不顾站在外面的冲锋队队员，如往常一样走进商店——带有普遍性。鲜有德国人对纳粹暴徒迫害手无寸铁的店主有兴趣——即便他们是犹太人——这种国家认可的公开抵制行动再也没有重新进行过。

在生活上骚扰过犹太人之后，纳粹转向了法律层面。1933年4月7日，希特勒政府通过了他们的第一个反犹立法。《公职恢复法案》要求

非“雅利安血统”的公务员离职，类似的法律还要求“非雅利安人”的律师停止执业。但在总统兴登堡的要求下，一些人被豁免了，主要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近亲在战争中丧生的人，这就减弱了立法的影响。许多人——包括一多半的犹太律师——得以继续工作。到了4月底，第三个法律公布，限制在公立学校和大学就读的犹太学生数量。

狂热的纳粹支持者希望扩大反犹活动，而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经济的影响，他们之间长期存在矛盾。例如，犹太医生并未包括在1933年3月的限制性立法内，但一些地方纳粹组织则不顾一切地要把他们赶走。很明显，许多希特勒的追随者——无疑是受到他们的领袖充满仇恨的演讲蛊惑——想要变得更快。

许多犹太商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阿尔农·塔米尔的父亲在斯图加特开了一家小烟厂，就在4月的抵制行动后不久，香烟经销商告诉他不能再卖他的香烟了。这不算是个“官方”行动——政府肯定对此表示一无所知——不过，这对阿尔农·塔米尔的父亲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他失去了生意，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

不过，也有一些犹太人发现，他们的生活并未因纳粹而受到很大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边非犹太人的态度。例如，在纽伦堡的鲁迪·班贝尔觉得“课余时间”走在城市中十分安全。但在希特勒上台几个月后，他注意到他就读的多元宗教学校的教学方式发生了改变：一个生物老师开始讲授日耳曼生物学和种族主义的方法——包括犹太人和德国人属于不同种族，以及其他许多种族主义理论。有一次，他发现一张从《先锋报》上撕下来的反犹漫画被扔在他的桌子上。“每个人都在观察，看我的反应会是怎样。我记不得我做了什么，但我很清楚必须对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十分谨慎——为的是不让那些人幸灾乐祸。我想我可能是提起盖子，把它塞进桌子，然后放在那

儿不管了。老师们会保持班级的秩序，所以学生们也知道他们不能做得太过分。”²¹

就像有人公开反犹一样，也有人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来帮助犹太人。欧根·列维涅发现有时候会碰上好心人。希特勒上台后不久，欧根得到了来自一个非犹太家庭友人的警告，告诉他这座公寓已被监视了。欧根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儿子，柏林少共国际的成员。但令他吃惊的是，这位友人竟然是一名纳粹党成员。欧根对他十分感激，至少“他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²²。后来，他发现其他犹太难民“也有类似的故事”。

1933年，大约有三万七千名犹太人离开了德国——约占整个国家五十二万名犹太人的7%。²³许多德国犹太人去了邻国，如法国和荷兰；而拿到美国签证极为困难。希望移民的犹太人还必须与严苛的法律做斗争，它限制了他们可以从德国带走的财富的数量——大多数人几乎什么都没带走。“德国犹太人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央委员会”对大规模的移民发出警告：“盲目地出国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只会让一穷二白的人变得越来越多。”²⁴

也许还有情感的牵绊，使很多人不打算迁走。“我母亲的父母和我们住在一起，”鲁迪·班贝尔说，“也许我的父母可以在国外找到着落，但他们没法带着老人，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母亲不愿让他们自生自灭。我可能[也]受到我父母的乐观的影响——还有来自其他人的乐观——认为事情不会变得更糟。”²⁵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留在德国的犹太人会有多么糟糕的下场，而在当时，希特勒还能在总理办公室待几个月都还说不准。这一点很重要，毕竟过去曾有三个总理都曾试图控制局势，但后来还是被换掉了——为什么希特勒不会是这份名单上的其中一个呢？欧根·列维涅说：“许

多人都认为，‘啊！他无法应对失业，他什么都做不了，他会完蛋，他会许下很多诺言——但是他终将完蛋……’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犹太人留了下来，尽管他们的亲人和孩子恳求他们离开。谁愿意离开舒适的公寓，去做一名一无所有的难民呢？”²⁶

德国犹太人的经历在这一时期有很大的差别，这和地理位置有较大的关系。德国犹太人主要居住在大城市，特别是柏林和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几乎5%的人口是犹太人。²⁷在这些大城市，德国犹太人遭到的肆意攻击比农村要少。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北部被称为弗兰克尼亚的地区，许多乡村出现了“犹太人不受欢迎”的标语。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是弗兰克尼亚的长官，这里反犹情绪高涨。在纳粹统治的初期，最为恶劣的攻击犹太人的案例就发生在弗兰克尼亚，这并非偶然——就在纽伦堡西南三十英里外的小镇贡岑豪森。

1934年3月25日的晚上，二十二岁的冲锋队队员库尔特·巴尔和一些同伴前往贡岑豪森的一家犹太人开的酒吧。那一天是棕榈主日，一个对基督徒有重要宗教意义的日子。一个冲锋队队员听说有一个“雅利安人”可能在这家酒吧喝酒——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当冲锋队队员进入酒吧以后，巴尔声称店主的儿子尤利乌斯·施特劳斯往他脸上吐唾沫——尤利乌斯·施特劳斯否认了此事，但他和他的父亲以及其他家人还是遭到了巴尔的殴打。

一群人聚集在酒吧门口，巴尔打够了之后开始了一番即兴演讲。他质问，“在这样的日子里”，基督徒怎么可能“在一个犹太人的场所喝啤酒。犹太人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把我们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此外，犹太人对世界大战的两百万名死者、[纳粹]运动中的四百名死者和一万名伤者负责。还有，有多少犹太人强奸了德国女孩？有多

少犹太混蛋还在德国横行无忌？现在，如果一个犹太人敢于向一名冲锋队队员吐口水，那么他就是向阿道夫·希特勒和整个运动吐口水”。²⁸一位目击者说，“大约两百人”听了巴尔的演说，他们“一致赞成”。²⁹

然后，尤利乌斯·施特劳斯继续遭到殴打，人们在冲锋队队员的煽动下高喊“揍他！揍他！”³⁰接着，施特劳斯全家被送进了当地的监狱。根据这一事件的官方报告，在监狱里，一旦施特劳斯夫人坚持说她没有做错事，库尔特·巴尔就打她的脸，并说：“你这犹太荡妇，闭嘴。”施特劳斯夫人试图抓住监狱管理员的胳膊躲在他后面，巴尔为此打了她一拳，说道：“你是犹太荡妇，你不能触碰基督徒。”³¹

贡岑豪森的几百名市民——有些报道说超过一千名——走上街头，高喊“犹太人滚开！”犹太人的财产遭到袭击，大约三十名犹太人被捕，两名犹太人死亡，一个是在暴徒威胁他时自杀。另一人——雅各布·罗森费尔德——被发现吊在一个棚子上，几乎可以肯定是被人杀害的。

虽然许多人都参加了暴乱，但只有少数几个冲锋队队员受审。1934年6月，安斯巴赫地区法院还裁定——尽管证据与之相反——两名犹太人都死于自杀。因此，被告只是面临违反治安和造成轻伤的指控。五名被告被释放，十七名被判入狱三至七个月，巴尔被判入狱十个月。没有一个被告是被立即关押的，到了1934年8月21日，除巴尔之外的所有人的判决在上诉后被撤销。

在调查犯罪过程中，“中法兰克尼亚政府冲锋队最高领导人”的副手试图把整个事件归咎于犹太人。他写道，尽管“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始终在阻止犹太人的肮脏交易”，但是“该地区的犹太人现在仍和革命前一样傲慢、自大和无耻。这段时间内，贡岑豪森镇和这一地区的大批居民都对此深感愤怒”。³²

柏林当局担心当地的纳粹组织非法妄为。“我强烈要求，”德国内政部长写信给巴伐利亚当局，“应采取措施使这些骚乱不再出现。警方应当禁止这样的歌曲流行，诸如‘当犹太人的鲜血从刀上飞溅，一切就会好起来！冲锋队的同志们，把犹太人吊死，让那些肥猫靠墙站好！’犹太人问题将由德国政府来解决，而不是贡岑豪森的冲锋队。”³³

事情并没有结束。1934年7月15日，库尔特和两名战友回到贡岑豪森暴乱肇始的酒吧。根据之后对他的起诉书所写的那样，库尔特·巴尔走进房间喊：“举起手来！”然后立刻朝坐在面前的西蒙·施特劳斯[店主]开了两枪，都直接命中头部。他的儿子尤利乌斯·施特劳斯试图逃跑，但巴尔也打中了他。巴尔被带往当地监狱，他透过窗户向聚集在街上的人群大喊：“我枪杀了两个犹太人。我满意了，我捍卫了冲锋队战友们的荣誉！”³⁴

西蒙·施特劳斯伤重不治，但他的儿子活了下来，所以巴尔面临一个谋杀罪和一个谋杀未遂罪起诉。他在1934年10月被判处十年监禁，但四年后就被释放了。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曾呼吁从轻发落巴尔，有人听到他说：“当然，这个犹太人被杀死了，这是错误的。但如果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杀死了，我会很开心。”³⁵

贡岑豪森事件是希特勒就任总理头两年内反犹活动的最高潮，直到1938年的“水晶之夜”，巴伐利亚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不过它意义深远。首先，它揭示了对犹太人的自发攻击是怎样产生的。没有证据表明此类暴行是事先策划的，如果库尔特·巴尔没有在酒吧里发脾气，也许这事就不会发生。但巴尔的行为只是催化剂，骚乱只会在潜在的紧张局势下才有可能发生。之所以有这么多当地人支持巴尔，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憎恨犹太人。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酒吧外的演说讲的都是以传统基督教为基础的反犹主义。法兰克尼亚这一地区

的居民都是虔诚的新教徒，巴尔对犹太人攻击性的言辞都是马丁·路德所常用的。

其次，当地为所欲为的纳粹分子和想要掌控局面的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暴露了出来。事实上，巴尔当时说，向冲锋队队员吐口水就是向阿道夫·希特勒吐口水，是因为他本能地认为希特勒会支持他的行为。最后，这个令人不快的故事也证明了，德国法庭已经被纳粹玷污到何种程度。事实是，一些冲锋队队员在最初的审判中被判有罪，但法律系统随后罔顾罪行的受害者，在冲锋队队员上诉时就将他们释放了。这种模式很快就会司空见惯，因为法治遭到了纳粹的破坏。

1934年5月，贡岑豪森的棕榈主日骚乱两个月后，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又一次展示了他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他在《先锋报》上刊登了臭名昭著的《犹太人杀人阴谋》。头版的漫画上画了两个怪诞夸张的犹太男人，其中一人拿着血淋淋的刀，收集儿童的血。下面的文字说，犹太人施行“迷信的巫术”，试图收集基督徒的血液，用于制作面包。其他插图展示犹太人正用吸管吸一个躺着的孩子的血，以及上韦瑟尔教堂石浮雕的复制品，刻画了一场据说是13世纪的杀生祭祀，一个十六岁男孩被当作祭品——他后来被封为上韦瑟尔的圣沃纳。另一篇文章写道，犹太人的历史是“一条不间断大规模血腥屠杀的链条”。

《先锋报》这一特别版还强调了犹太人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声称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三千五百万”人遭到“枪决、暗杀、虐待和饥饿对待”，至今“犹太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大屠杀仍在继续，杀人者“基本都是犹太人”。这一版《犹太人杀人阴谋》销售了十万份，还有许多被贴在街上的公共报栏里。

《先锋报》上这些耸人听闻的东西引起了广泛的抗议——不仅来自国外，还有国内的基督教徒，以致希特勒最终下令予以禁止。值得注

意的是，他说要查禁这一特别版，不是因为它散布关于犹太人的谎言，而是它涉嫌攻击“基督的圣餐礼”³⁶。这说明，尽管希特勒明白在政治上和《先锋报》这样的极端内容保持距离的必要性，但他并不愿意谴责这些攻击犹太人的文字。

虽然没有出台正式的政策将德国犹太人与其他人口隔离，但犹太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仍然面临被赶走的很大压力。例如，《法兰克福日报》1934年5月26日报道：“星期四晚上五点，万字旗从最后一个离开黑尔斯布鲁克 [在法兰克尼亚] 的犹太人的房屋上升起。黑尔斯布鲁克区现在已经没有犹太人，居民们带着骄傲和满意确认了这个事实。”³⁷该报道接着说，希望其他地区“很快效法，在不久的将来，整个法兰克尼亚将没有犹太人。有朝一日，黎明终将来临，那时整个德国都不再有一个犹太人”。

同样，尽管目前还没有法律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结婚或发生婚外性关系，但也有一些地方纳粹团体侮辱了存在这些关系的男女。1933年8月，犹太律师库尔特·罗森贝格在日记中写道，在下萨克森州库克斯港，“一个雅利安女孩和一个非雅利安男人被游街示众，她的脖子上挂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我是猪，因为我爱上了一个犹太人’，诸如此类。在其他地方，出入犹太人公司的雅利安女孩的名字被公开刊登出来。还有一些地方，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街道和城镇广场”³⁸。

不过，虽然发生了很多国家默许和地方自发的迫害犹太人事件，但仍然要看到哪些事情还没有发生，那就是德国犹太人还没有被送往集中营。最初的临时营地是为了拘押纳粹的政敌，而不是犹太人。在普鲁士，赫尔曼·戈林组织了上千名冲锋队队员当辅警，抓捕之前的政治对手，把他们弄到废弃工厂和仓库改成的临时监狱中，有的甚至是冲锋

队队员自己房屋的地下室。那些被抓来的人经常遭到殴打和侮辱，纳粹则以复仇作为庆祝和狂欢。值得注意的是，1933年3月，巴登符腾堡州的纳粹地方长官威廉·穆尔说道：“我们不会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有人打坏我们一只眼睛，我们就砍下他的头；如果有人打落我们一颗牙齿，我们就把他的下巴打碎。”³⁹

1933年3月，海因里希·希姆莱成为巴伐利亚警察总监。现在他也是另一支保卫力量“党卫军”的头目，这个组织最初只是一群在公众集会上保护纳粹演讲者的保镖。希姆莱试图将其转变为具有纳粹信仰的精英组织，尽管它现在仍是恩斯特·罗姆领导下的冲锋队的一部分。党卫军的许多成员宣誓成为辅警，并以此身份参与到巴伐利亚第一座集中营的管理之中。

在1933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希姆莱为大规模逮捕纳粹的政治对手进行辩护。他那家长式的夸张言辞令他后来臭名远扬，这可以算是早期的一个例子：“我采取了相当广泛的保护性拘留措施……我感到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城市的许多地方已经发生了太多的骚动，我无法保证那些引起骚动的人的安全。”⁴⁰

希姆莱因此声称，之所以把那些人关进集中营是为他们自己考虑，因为在街头他们的“安全”不能得到保证，其他人可能会揍他们。这和当月希特勒对付犹太人联合抵制的逻辑差不多——国家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人民就会起来自己干。⁴¹根据希姆莱所说，“保护性拘留”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纳粹逮捕了那些人，因而居民得到了“保护”；同时那些被逮捕的人也得到了“保护”，免于受到居民的攻击。在这一逻辑之下，那些人从集中营得到释放时被要求签署一份奇怪的声明：“我清楚，如果担心身体健康会受到损害，可在任何时间申请延长保护性拘留。”⁴²

保护性拘留并未取代德国现有的司法制度，而是一种并行的办法。

就如1946年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审判中解释说：“你必须区分这两种办法；那些犯下反对新国家的叛国罪或被证明可能会有这些行为的人，自然是交给法院；但是，其他也许想这么做但还没有做的人，就予以保护性拘留，这些人将被送往集中营。”⁴³这是一种违背所有自然正义法则的观念，但它和《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所展现的原则相一致，即判定人们的标准是基于他们是谁，这和他们做了什么同样重要。这和“犹太人即便受洗也不能成为基督徒，因为犹太人天生就是犹太人”都出自同一种世界观。

这种观念还有另一个后果。集中营中的囚犯并没有在服刑——他们本来就没有犯任何罪行，怎么会服刑呢？因此，没有囚犯知道释放他们的日期。也许明天就会释放，也许永远释放不了。正如一个集中营指挥官后来说：“监禁时间的不确定性是他们最无法忍受的，再坚强的意志也会被拖垮。”⁴⁴

纳粹也不想把这些营地和仅仅作为惩罚措施的普通监狱混为一谈，因为根据纳粹的理论，拘留犯人不应该是一种惩罚行为，而是给予他们改造的机会。“我们必须拯救这些人，”赫尔曼·戈林说，“把他们重新带回到德国民族共同体中，我们不得不重新教育他们。”⁴⁵

1933年3月22日，巴伐利亚的第一个集中营成立，它位于距离慕尼黑市中心仅十英里远的一个小镇，这个地名日后将变得十分出名——达豪。希姆莱亲自视察了城镇郊外的一个废弃工厂，并决定把营地建在这里。这个机构的性质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现在我们掌握着权力，”达豪的新任党卫军指挥官约翰—伊拉斯谟·冯·马尔森—波尼考说，“如果被那些猪接管了，他们肯定会让我们人头落地。所以我们无须多愁善感。在我们的队伍中，任何见不得血的人都不属于这里，他应当离开这里。”⁴⁶戈林称集中营是为了“拯救”那些误入歧途的德国人，希姆

莱说党卫军是为了保卫那些囚犯的“安全”，这段话证明了他们是多么虚伪。

1934年平安夜，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约瑟夫·费尔德亲身体会了一下什么叫“无须多愁善感”。1933年3月，他勇敢地向《授权法案》投出了反对票，作为纳粹的政治对手之一，他是“保护性拘留”的主要对象。他遭到逮捕并被带到达豪，关在一座名为“地堡”的大楼里。“他们拿走了木板床上的稻草袋……并说道：‘你不需要这个，因为你只是一具留在楼里的尸体！’”⁴⁷他独自待在黑暗的房间里，能听到警卫们的喧闹，他们正为庆祝圣诞而狂饮。午夜，一个卫兵回来，打开房间门上的小铁窗，放了一个盘子在约瑟夫·费尔德面前，里面是白香肠和椒盐脆饼。卫兵说：“在行刑之前，这算是一顿美餐。但给你吃纯属浪费，你这个混蛋！我们很了解你！我们会好好对付你的！”然后“砰”的一声关上小铁窗走了。当晚过了一会儿，他带着一根绳子回来，告诉约瑟夫上吊的“最佳方法”。约瑟夫回答说，他还有一个家庭，如果他们想让他死，就得自己动手。“是的，”卫兵说，“我们会那样做的！但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心理折磨还要继续下去。在“地堡”里待了几天之后，约瑟夫被告知，“你明天就要出去了”，但这只是个恶劣的玩笑。他回忆说：“他们不停地说，‘你明天就要出去了’，但只是在给我捣乱。”三四天中，他只能喝水，吃一块面包。每隔四天，他可以喝到一杯茶，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吃一顿热饭。他躺在黑暗肮脏的房间里，吃不到必需的食物，内心极为焦虑，不出所料，约瑟夫发现他的健康开始崩溃。几年前他就得过肺病，现在又加剧了。结果，警卫把他锁进“地堡”的隔离区，那里还有十个犯人，全都患有肺病。“纳粹们非常害怕肺结核，”他说，“这在当时是一种严重的疾病。”

后来，约瑟夫·费尔德的肺病逐渐好转，在达豪被关了一年后释放。集中营里的大多数囚犯都被关了这么久，不过也有些关了几个月就被释放了，有些却始终没有获释，这取决于纳粹的心血来潮。所有被释放的囚犯都被要求发誓永远不会泄露在集中营内的经历，如果他们泄露了，就会被送回来。

至于德国犹太人和早期集中营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1933年3月，希姆莱在讲话中特意强调，一个人不会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成为迫害目标：“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对于我们来说，犹太信仰的公民和非犹太信仰的公民是完全一样的，他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同样的保护，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区别。”⁴⁸这个出自希姆莱之口的声明非常奇怪，纳粹的党纲已经否认了犹太人是“真正的”德国人。他这些虚伪的话不是说给国内的人听的，而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为了回击所谓的“暴行宣传”。实际上，他的冲锋队并没有遵照他的指示。在送往集中营的共产党员和社会党政治家中有一些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常常被甄别出来，受到比其他犯人更严厉的对待。例如马克斯·亚伯拉罕，他在写完《面对死亡的犹太：一位在集中营的拉比》之后离开了德国。这本书出版于1934年，亚伯拉罕记录了他在希特勒执政几个月后落入纳粹手中的经历。

1933年6月，亚伯拉罕因涉嫌袭击一名冲锋队队员而被捕，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并且一直活跃在他家乡拉特诺夫的犹太社区，纳粹可能早就盯上了他。纳粹对他可能还有点私仇，因为在1930年，一个冲锋队队员曾因为袭击他而被判入狱五个月。

他被捕后，先是被警卫用警棍殴打，然后出现了特别残酷的事情——他和其他三个犹太人被迫互相殴打，而冲锋队队员在一旁观看。“我们四个犹太人被迫轮流用棍子打别人，”亚伯拉罕说，“如果我们打

得不够用力，冲锋队队员就以更残酷的折磨来威胁我们。”⁴⁹

亚伯拉罕被送往帕彭堡的一个小营地，在德国北部的奥尔登堡以西三十五英里。犹太新年快到了，卫兵们一直在策划怎么庆祝犹太人的节日。在新年的第一天，党卫军士兵强迫亚伯拉罕和其他几个犹太人走进一个粪坑。“党卫军军士埃弗林向我咆哮，”亚伯拉罕写道，“‘在那儿，拉比，你可以继续祷告！’我们的信仰被玷污，我对此极为抗拒，保持着沉默。”党卫军士兵不停地命令他按要求做，但亚伯拉罕顽强不屈，说：“我不在粪坑里做祷告！”结果，他被拖出粪坑，棍棒和枪托如雨点般砸到他身上。他昏过去后，被送回自己的铺位，“失去意识躺了”两个小时。下午，他苏醒过来后又回到了粪坑，埃弗林军士命令他对犹太人和看管他们的党卫军宣讲犹太教教义。亚伯拉罕说：“和其他宗教类似，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基于‘十诫’和《圣经》里最美好的那句话：‘要爱人如己！’”这时埃弗林打断了他：“闭嘴，你这头猪！我们会教你明白什么叫慈善美德！”亚伯拉罕“受到如此残忍的虐待”，开始“发烧，陷入抽搐中”，“我的身体因为毒打而疼痛，坐卧不安。我迷迷糊糊的，说着胡话，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次日清晨，我快不行了，他们把我送到了病房。在这里都是非犹太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他们悉心照料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同志式的帮助”⁵⁰。

马克斯·亚伯拉罕在被监禁四个月获释，并于1934年离开德国前往捷克斯洛伐克。他最终定居在英国，1977年去世。⁵¹《面对死亡的犹太：一位在集中营的拉比》告诉我们，早在大规模灭绝中心建立之前，冲锋队和党卫军就在集中营用残酷的方式对待犹太人了。

纳粹对集中营并不讳言。它们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关于它们的报道。例如，1934年1月1日，《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如实描绘了达豪“地堡”中的生活：“房间是水泥砌的，每个

房间有一个栅栏窗口(是可以关闭的)。那里很潮湿,而且没有供暖设施。”文章还透露了警卫殴打犯人的情形:“鞭打是用一根牛皮皮带执行的,皮带上有一根三至四毫米宽的钢丝,和皮带一样长(这些都是由犯人制作的)。鞭打——根据处罚轻重从二十五到七十五下不等——由一名党卫军军官计数。另外两个党卫军摠住犯人,一个摠住双手,另一个摠住头,犯人的头上还套着一个麻袋,这样哭喊声就传不出来……有的犯人是用橡皮棍打的,有些人被烟头烫,还有的人上了所谓的美式‘水刑’。”⁵²

1933年,德国共产党员汉斯·贝姆勒发表了另一篇早期的亲历报告——《在杀人魔窟达豪》。⁵³贝姆勒把达豪称为“杀人魔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有少数囚犯在此丧生,但这些集中营仍不能和后来的那些专事杀戮的集中营——像特雷布林卡——混为一谈。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达豪的管理是骇人听闻的,但大多数此时被送到集中营的人都幸存了下来。

1933年4月11日,当贝姆勒被捕时,冲锋队禁不住为抓到了这样一名杰出的共产党员而喜形于色。在监狱里,他们用橡胶警棍毒打他。十四天后,他被送到达豪,脑袋上挨打后被扔进“地堡”的一个房间。就像约瑟夫·费尔德一样,一个警卫来到贝姆勒的牢房,给了他一根绳子,告诉他怎样上吊最方便。不久,贝姆勒听到其他囚犯被折磨的尖叫声,接着,自己牢房的门被缓缓打开,一群警卫进来了,非常残忍地殴打他,一连几天,他碰到哪里都疼,完全无法睡觉。

令人惊讶的是,贝姆勒居然从达豪逃了出去。他把又高又小的窗户上方的一块木板拆了下来,钻过这个缺口,可能在至少一名警卫的协助下,翻过了营地周围的铁丝网。敌人四处抓捕他,但他顺利越过德国边界重获自由。他在西班牙内战中加入了国际纵队,1936年牺牲,时年

四十一岁。

《在杀人魔窟达豪》《面对死亡的犹太：一位在集中营的拉比》，以及《曼彻斯特卫报》和其他报纸的文章，使得纳粹政权的残暴本性从一开始就为世界所周知。然而，和这些著作同时出现的还有大量的不实传言，来为集中营的生活洗白，尤其是在德国。例如，达豪当地的报纸《安珀信使报》在1933年9月报道说，犯人们“安心地”进行体育运动或游戏来打发闲暇时光，有人看到他们“正在愉快地工作”。⁵⁴其他许多德国公民对集中营有着同样乐观的看法。20世纪30年代，慕尼黑的一名女生厄纳·克兰兹说：“你知道达豪的存在，但那只是一个监狱，不是吗？我们知道有共产主义者在那里，还有罪犯。”⁵⁵当时一位年轻的空军军官卡尔·勃姆—泰特尔巴赫相信：“他[希特勒]把所有的职业罪犯都关在那里……他们必须在那里劳动……此外，他还把所有的舞男尤其是同性恋者从街头清理出去，他们就在达豪那个劳动营里，人们对此并不怎么反对。”⁵⁶

不寻常的是，很多人认为像达豪这样的集中营里的犯人就应该待在那里——即使他们并没有被判决有罪。1935年，十几岁的瓦尔特·费尔瑙第一次“听说了集中营这个词”。他回忆说：“父亲朋友的儿子有一次在咖啡馆里和一个有夫之妇打情骂俏，这时那个女人的丈夫走了进来，是个党卫军的中队长，要把我父亲朋友的儿子抓走。他游手好闲，靠他父亲的财产为生，整日就是向女人献殷勤，在酒吧鬼混。他激烈地反抗，给了那个党卫军军官一记勾拳，跃过两张桌子沿着墙滑下来，然后带着他的女朋友——那个党卫军军官的妻子——逃走了。当然，警察不久就逮捕了他。我父亲在午饭时给妈妈讲了这个故事。我们这些孩子，姐姐和我，都在听。然后他说，‘想象一下，阿德尔贝特的儿子，大的那个，被逮捕了。他打了一个党卫军军官，现在被送进了

集中营’。然后我妈妈问，‘会怎样呢？’我父亲说，‘终于，他在那里会知道劳动的意义了！’像我这样十五六岁的孩子就会想，‘哦，那个败家子，没有自己的生活，只会带着陌生女人四处飙车，这下他知道怎样用劳动改变生活了’。”⁵⁷

有的人对政治形势有着更为现实的理解。曼弗雷德·冯·施罗德，一位温文尔雅的银行家之子，1933年加入了纳粹党，他认为集中营是可以理解的——这是“革命”的产物。他说：“你在历史上见过没有令人厌恶一面的革命吗？”⁵⁸奥地利出生的纳粹莱因哈特·施皮茨同意这一观点：“各国革命无有不流血者，我认为我们也在进行一场革命，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⁵⁹

乍一看，有这么多令人厌恶的方面，还有这么多人欢迎这场革命，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如果我们记得德国刚刚经历了一场生存危机，这就不足为奇了。由于经济的崩溃，这个国家的整体结构似乎正在开裂。每个人都知道1917年的俄国发生了什么事，并发自内心地害怕德国会发生这样一场革命。因此，许多德国人痛恨暴力，认为获得和平与安全的最佳途径是支持希特勒和他的冲锋队，他们相信纳粹的革命比共产主义更好，冲锋队会让法律和秩序得以重建。由于纳粹党对迫害目标的定义看上去很明确，就是犹太人、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者，所以大部分德国人感觉良好。如果不是犹太人、共产党员或社会主义者，不和新政权对着干，而只是一个诚实可靠、盼望获得新生的德国人，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受到迫害，而且很可能会赞成纳粹所做的事情。

鉴于希特勒对战斗、斗争和对敌人的镇压强调得很多，如何管理集中营的警卫，对于政权来说自然也是一项挑战。希姆莱的办法是，不仅让党卫军成员进入集中营工作，并且在样板营地达豪建成仅仅三个月后就撤换了指挥官。首任指挥官名叫希尔马·韦克尔，代表了旧式的

思维方式。他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自由军团的老兵，一位典型的被纳粹党革命性质所吸引的“老战士”。现在，在希特勒掌握权力之后，形势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之外。

在希姆莱看来，韦克尔最大的问题是让达豪引起了太多不必要的注意。他在任时发生的主要事件是1933年4月12日四名犹太犯人的死亡。他们被带到营地附近的树林里，在“企图逃跑时”被射杀——这是谋杀的委婉说法。警督舒勒后来说，他认为韦克尔这么做是因为害怕集中营的“共产党员起义”，不过，为什么这些犯人被选中杀害仍然是一个谜。⁶⁰巴伐利亚州检察官办公室随后开始追究此事，这对希姆莱十分不利，他希望能把达豪描绘成一个纪律严明、以改造为重点的地方，这一事件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

1933年5月9日，就在这一事件发酵期间，汉斯·贝姆勒从集中营脱逃。现在达豪已经不仅仅是法外杀人的问题，连警卫是否称职都成了一个问題。次月底，希尔马·韦克尔离职，新任指挥官特奥多尔·艾克将以一种与韦克尔截然不同的方式对达豪，甚至是整个集中营系统产生深刻的影响。

艾克接任达豪指挥官一事，透露出希姆莱在选择党卫军领导者时所看重的个人素质的标准。艾克不是一个容易驾驭的人，和希姆莱几乎完全不同，他喜欢争论，易怒、危险，而希姆莱则为人冷静、有条不紊、一丝不苟——有人认为希姆莱看上去像一个乡村教师。1932年，艾克因策划一起纳粹支持的炸弹袭击而被捕。他被判入狱，在保释期间逃离德国，并在希特勒上台后回国。他认为在他被捕时，普法尔茨的纳粹地方长官约瑟夫·布吕克尔出卖了他，想进行报复，于是他组织武装人员袭击并抓住了布吕克尔。不过，艾克的胜利是短暂的，布吕克尔有强大的关系网，而艾克的行为几近疯狂。他被抓了起来，尽管医生说他没有问

题，他还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是希姆莱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

希姆莱所期盼的，是艾克将来会向他展示极大的忠诚和个人能力。如果没有希姆莱的干预，四十岁的艾克的职业生涯将会一落千丈，而不只是走下坡路。希姆莱给了他一个机会，这样类似的机会也给过别人，尤其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他后来亲自组织了对犹太人的灭绝。1931年，海德里希被赶出海军，是希姆莱救了他。

在艾克的领导下，党卫军新建了“骷髅头”部队，从最初的街头打手变成了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艾克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规，不是为了禁止针对犯人的暴行，而是明确了什么时候可以采用暴力。例如艾克规定：“袭击警卫和党卫军者，拒绝服从命令者，在劳动场所拒绝服从指令者，煽动他人叛乱者，擅离或煽动他人离开队列、工厂者，在行进和劳动时间大声喧哗、扰乱或演讲者”将被处决。⁶¹

艾克强调，他希望自己的部下是强硬和坚决的，尤其是在犯人面前。他说：“凡是对他们表现出丝毫同情的人，都将立即从我们的队伍中消失。我只需要全心全意奋斗的男人，我们中间没有软弱者的位置。”⁶²在这样的话语中，艾克不仅表达了他对部下品质的要求，还试图灌输一种意识，那就是，在达豪的党卫军不仅是一个狱卒，还要做一名优秀的士兵，冷酷无情地和国家的敌人斗争。艾克希望达豪的党卫军能建立起兄弟般的情谊，互相守望照顾，为崇高的事业而共同奋斗。他要求军官不仅要指挥部下，同时也要关心他们。于是，艾克的部下开始“崇拜”⁶³他，这个词出自其麾下一名士兵之口。“即便在那时他还是得到了‘艾克爸爸’的称谓。”达豪的党卫军士兵马克斯·冯·达尔—阿尔米说：“他[艾克]仇恨铁丝网后面的敌人……他宣扬他们的毁灭和湮没，通过演讲和谈话把这种仇恨灌输给党卫军。艾克是一个狂热的党卫军军官和民族社会主义者，非常坚定……‘党卫军必须懂得仇

恨……他们必须具备铁石心肠’。”⁶⁴

艾克还精心挑选了一些犯人——被称为“卡波”——来分担监管任务。利用选定的囚犯来监督其他犯人并不新鲜，在普通的监狱和之前的集中营里都有犯人被认为是“可靠分子”，但艾克非常喜欢采用这种办法，这对党卫军有很多的好处。“卡波”不仅在党卫军不在场时可以代替他们实行监督，还可以恣意处置他们的同伴，这种不确定性和紧张气氛大大增加了犯人们的恐慌。对于“卡波”来说，他们在集中营的生活由于被提拔为监督者而得以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一柄双刃剑。虽然他们拥有了权力，但他们仍然是脆弱的。正如希姆莱在战争期间所说：“他【‘卡波’】的工作是监督犯人确保完成任务……因此他不得不逼迫他的犯人。一旦我们对他不满意，他就不再是‘卡波’。一旦回到犯人中去，他知道当晚就会被其他人打死。”⁶⁵

实行“卡波”制度对党卫军来说还有更长远的好处。由于“卡波”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卫军和犯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意味着党卫军不用自己动手体罚犯人，而可以交由“卡波”去干，卫兵们可以不必沾染犯人的汗水和鲜血。当然，党卫军一直直接参与对犯人的虐待，但“卡波”制度建立了另一种监督和惩罚的模式。这一模式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在奥斯维辛，那里的犯人生活在“卡波”最骇人听闻的残害——甚至是虐杀——阴影之下，他们掌管各个营房以及劳动的具体环节。

后来很多成为集中营指挥官的人都在达豪受到过艾克的栽培，著名的如鲁道夫·胡斯，1940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首任指挥官。1934年，他在达豪时是一名普通的党卫军士兵，在很多方面，他都堪称艾克理想的坚强楷模。他描述了艾克如何向党卫军官兵灌输“他们在对付国家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必须严厉对待犯人。⁶⁶不过，对于胡斯在二战后

所写的回忆录也不可全信。尽管艾克的方法毫无疑问对胡斯有影响，但胡斯后来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屠场的指挥官，原因并不完全在此。就像许多加入党卫军并来到达豪的人一样，他之前的人生经历让他愿意接受艾克所灌输的价值观。

胡斯三十三岁时加入了党卫军，此时个人历史已经血迹斑斑。他生于1900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他还没有成年。他十分勇敢，获得过几次勋章，包括铁十字勋章，十七岁时成为军中最年轻的士官。德国战败后，他加入了自由军团，参与镇压1920年鲁尔的左翼起义。1922年11月，他加入了纳粹党，次年参与刺杀一名被认为是叛徒的自由军团同伙。他很快被捕，被判入狱十年。1928年特赦时他被释放，加入了一个名为“阿塔曼纳”的人民运动团体，该团体宣扬增进与土地的亲密感。在这里，他成了一个农夫，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海德薇格，并引起了支持“阿塔曼纳”运动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注意。

因此，早在胡斯走上特奥多尔·艾克的轨道之前，他不仅做出了一系列的人生选择，证明了他服膺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价值观，还参与了极端暴力活动，坐了五年大牢。如果要培养一个人对犯人的“仇恨和厌恶”，那么胡斯就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不过，这并非说胡斯的回忆录是完全不可信的，他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在达豪观看鞭打犯人的感觉，这当然是真实的。他写道，两名犯人因偷窃香烟，被绑在集中营的“鞭刑区”各抽了二十五鞭。胡斯详细描写了“第一个犯人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小个子装病者，他被按在地上，两名士兵摁住他的头和双手，两个营区头目负责行刑，轮流进行鞭打。犯人一声不吭。另一个犯人是一名体格健壮的职业政治家，他的反应很让人意外。他挨了第一下就大叫起来，企图挣脱。指挥官朝他怒喝，要他保持安静，但他一直叫到打完。我站在第一排，被迫观看了整个过程。我说是被迫的，是因为如果站在

队伍的后面，我就不会去看。事实上，整个过程，即使是殴打第一个犯人，都让我不寒而栗。后来，在战争初期，我执行了第一次处决，但对我的震撼仍然比不上第一次观看鞭打”。⁶⁷

当艾克试图把达豪的党卫军打造为一支专业而又冷酷无情的力量时，在德国北部，另一种模式的集中营也开始运行起来。这一系统由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负责管理——或者只能说是名义上的管理，因为他很难控制当地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在普鲁士，没有一个像艾克那样可以防止卫兵的野蛮行为失控的人。

在德国西北部埃姆斯兰的几座集中营存在比较特殊的问题。党卫军和冲锋队没有协同合作，两者都给当地带来不安。在帕彭堡附近的小镇上，党卫军和冲锋队公然大打出手。⁶⁸党卫军被指控“像蝗虫一样侵入这个地区，他们向小企业赊账，在酒馆里打砸，玷污女孩，他们不管到哪儿都不受欢迎。人们向政府递交了撤出党卫军的请愿书”⁶⁹。在集中营里，守卫们对于向犯人施虐的尺度也看法不一。“囚犯们必须在午夜从床上跳下来，”集中营的一名政治犯⁷⁰写道，“不许穿衣服，他们不得不赤裸着排成一行，遭到毫无怜悯的殴打……这太可恶了——可恶到连一些党卫军也看不下去。一批参与‘惩罚行动’的党卫军开始公开抗议，他们用枪威胁他们的同伙，说：‘够了！住手！不然我们就毙了你！’”⁷¹

到1933年11月，局面更为糟糕，希特勒下令撤出所有党卫军。⁷²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很不高兴，“在集中营外大吵大嚷，大骂‘去你的暴发户共和国！’”⁷³之后不久，他们决定采取更激进的步骤，并称准备叛乱。党卫军卫兵宣布：“就算血流成河，我们也不会让警察来取代我们。”⁷⁴

根据一位集中营犯人瓦尔特·朗霍夫的叙述，“党卫军被一种强烈的好战情绪所驱使”。朗霍夫回忆道：“大门口的警卫加强了，集中营

周围架设了机枪，指挥官弗莱特曼下令：‘对于任何身着警察制服试图靠近集中营的人，劝阻无效后格杀勿论。’在集中营，党卫军把我们[犯人]叫到一边说：‘你们知道，当他们过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给你们武器，我们一起冲锋！然后我们会成立弗莱特曼自由军团，坚持战斗，直到进入奥地利，我们将在那里发动革命！’”⁷⁵

党卫军卫兵要武装犯人并发动“革命”的想法似乎很奇怪，不过他们提到了“弗莱特曼自由军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个人组织的自由军团经常以他们领导者的名字命名，每个成员对指挥官——或称“元首”——都有绝对的忠诚，胜过对抽象的宪法或更高级别的官员。在这里，党卫军想倒退回那段无法无天的革命岁月，他们想要追随自己的领导人——弗莱特曼——而非其他任何人。

党卫军卫兵可能也不是真的打算兵变，酒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某天晚上，警察不得不过来代替他们，因为党卫军酗酒，造成了集中营内部的混乱。“他们在柜子里大便，把盐和糖混在一起，打碎了营房和餐厅的窗户，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⁷⁶次日早晨，即1933年11月6日，那些前一夜喝得烂醉的党卫军官兵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大门，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就把集中营交给了一队警察。

尽管埃姆斯兰的暴力滥行主要是由下级官兵干的，但集中营里出现无法无天的情况，首先是由于高层领导的缺失。现在，正如希姆莱把达豪改造成了一个残忍但还算有序的地方——总比乱成一团要好些，他得到授权在戈林的普鲁土地界上进行集中营改革。尽管在普鲁士，希姆莱名义上仍在戈林之下，但所有的德国警察都归希姆莱掌管。

希姆莱向前跨出一大步，是在“长刀之夜”——处决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特·罗姆和其他与政权对立的人物。到1934年6月，罗姆已经成了希特勒的麻烦，希特勒想解决他。希特勒急切地想要避免冲锋队和国防

军之间潜在的冲突，抱病的总统冯·兴登堡和副总理冯·帕彭也在担心罗姆手下的冲锋队肆意妄为。1934年6月17日，帕彭在一次演讲中警告说：“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持续的犯上作乱后幸存下来……德国不能成为一列冲向天空、没人知道会在哪里停下来的火车。”⁷⁷

1934年6月30日，罗姆在巴德维塞温泉度假村被逮捕并送往慕尼黑的施塔德海姆监狱。次日，两名党卫军军官来到他的囚室——被挑出来执行这一历史使命的两个人之一正是特奥多尔·艾克。正如以前在达豪逼迫犯人自杀的传统，他们给罗姆一支上了膛的手枪让他自杀。在遭到拒绝之后，艾克和米歇尔·利珀特朝他开了三枪。然后他们俩回到达豪，在那里处决了另外二十多人。之后在达豪举行的庆祝活动中，党卫军据说喝掉了超过一千公升的啤酒。⁷⁸艾克说：“我很高兴亲手打死了这头同性恋肥猪[同性恋罗姆]。”⁷⁹

党卫军成员——尤其是他们的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在罗姆事件中证明了自己对希特勒的忠诚。希特勒想让罗姆消失，而希姆莱不假思索地去完成。党卫军的座右铭是“吾之荣誉即忠诚”，希姆莱没有辜负这一诺言。这是第三帝国内部一条重要真理的首次展现：每当希特勒需要可靠无疑的人去完成一项冷酷无情的任务时，党卫军是不二人选。

希姆莱和党卫军参与“长刀之夜”的好处立竿见影。1934年7月20日，党卫军获得了与冲锋队同等的地位——以前希姆莱的上司是罗姆，现在则是希特勒。艾克随后被任命为集中营总监，把他那套管理办法推广到整个“保护性拘留”集中营系统。希姆莱和他的部下现在处于纳粹国家安全机构的中心地位。

至于希特勒，他对德国的控制将进一步稳固。

5. 《纽伦堡法》(1934—1935)

1934年8月2日，长期抱病的总统冯·兴登堡终于死了，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国家首脑。这一任命是对过去十八个月剧变的总结：当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时，内阁中还有很多人希望对其加以限制；现在，所有关于“驯化”希特勒的话题都成为遥远的过去，他是德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在希特勒成为国家首脑之后，每一名军人和公务员都要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许多军官，就像年轻的阿道夫·格拉夫·冯·基尔曼斯埃格一样，对于希特勒打击冲锋队并致力于重整军备感到很满意。另外，基尔曼斯埃格和他的同志们并不感到宣誓效忠希特勒是一件奇怪的事，他说：“普鲁士—德意志的历史上充满了效忠个人的誓言，事实上，我们认为这比效忠于一张纸片要好。就像以前我们对着魏玛宪法宣誓就职，没人知道那是什么。”¹

在这之前的数月中，希特勒已经表明他不打算增强集中营在纳粹国家中的地位。恰恰相反，他试图向全世界表明，实行“总算账”的革命初始阶段已经过去。1934年春，他下令释放数千名政治犯，这一行动日后被希姆莱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所犯下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之

—”²。到1935年夏，整个集中营系统只关押了不到四千人——传统监狱里关押的人数是其二十五倍。

至于德国犹太人，纳粹仍然限制他们在德国境内的权利，同时鼓励他们离开德国。但犹太人移民并不容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决定离开的犹太人面临着两个巨大的障碍。第一个是纳粹想要把他们的资产留下来，第二个问题是得找到一个愿意收容他们的国家。不过，在希特勒上台仅仅七个月后，一项试图解决这一僵局的协议得到了批准，这就是1933年8月25日签署的《哈瓦拉计划》。当时的想法是，德国犹太人用他们的钱来购买德国设备——大部分是农业机械——然后出口到巴勒斯坦。犹太人离开德国——随身几乎没有什么资产——抵达巴勒斯坦后，会获得已销往巴勒斯坦设备的偿还费用。德国企业受益匪浅，因为他们不但能够出口设备，而且在购买他们的零配件时还必须使用外汇。同时，很明显这对移居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也有好处，他们尚可得以保住自己的一些财产。

这个计划出台的背景，是国际犹太人组织的对德国商品的抵制已成为一个现实的威胁。1933年6月，驻耶路撒冷的德国领事海因里希·沃尔夫回国后向同事强调，与犹太人团体进行合作，促成计划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他甚至说，提出这个计划的人之一萨姆·科恩愿意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希伯来文报纸《巴勒斯坦每日邮报》上对德国表示赞赏。³

当然，对于《哈瓦拉计划》是存在争议的。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怀斯谴责了这一计划，认为它破坏了对德国的国际贸易制裁，对希特勒是一个纵容。⁴尽管如此，这一计划对德国犹太人还是带来了许多好处，并一直执行到大战爆发。数以万计的德国犹太人得以利用《哈瓦拉计划》移民到巴勒斯坦，它在这段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保

全犹太人的财产。它表明纳粹当局和犹太机构之间可以进行合作，而正是这种合作的想法激怒了许多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但是，《哈瓦拉计划》肯定没有说到的是，希特勒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在《我的奋斗》中明确表明了这一立场：“他们[犹太人]甚至从没有想过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并在那里生存；他们想的是要为他们的国际诈骗建立一个中央组织，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以免受其他国家干预，成为庇护罪犯的避难所和培养骗子的大学。”⁵虽然希特勒可以接受尽快把犹太人从国内赶走的权宜之计——就像《哈瓦拉计划》，但建立一个犹太人控制的国家仍然被视为一种危险的发展，他绝不会愿意犹太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不管怎么说，希特勒始终谨慎关注着外国对迫害犹太人的批评。他个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并没有减少，他担心的是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自发攻击。正如德国内政部关于贡岑豪森棕榈主日屠杀事件的信中所说的，“犹太人问题应由德国政府处理”，而非当地群众。⁶希特勒的问题在于，他的许多支持者仍然认为，目前把犹太人从主流社会排斥出去的措施还不够严厉。有的地方团体想要禁止犹太人进入游泳池、溜冰场，甚至整个城镇。鲁迪·班贝尔回忆道：“1935年，人们必须越来越小心，因为很多城镇和乡村都有‘犹太人不受欢迎’的标语，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容纳犹太人的地方。”⁷

在法律上正式禁止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性关系之前，纳粹已经开始宣传犹太人“玷污”德国女孩。犹太青年阿尔农·塔米尔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宣传的影响。“对我而言，我只能说，在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想和德国女孩成为朋友或更进一步的小小想法，还在萌芽的时候就被这些宣传犹太人玷污德国女孩的可怕漫画和标语扼

杀了。对于我来说，像其他年轻人一样接近女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害怕给他们以任何轻微的口实。我甚至不想谈论任何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友谊和婚姻，因为一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⁸

1935年4月，副领袖鲁道夫·赫斯警告党员“不要用针对犹太人个体的恐怖行为来发泄情绪”，这样的行为只会让希特勒更加难于“应付对迫害犹太人的不时指责以及海外犹太人的抵制活动”。⁹但自发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四个月后，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抱怨非法的反犹活动对经济造成了破坏，希特勒要靠他获取足够的资金来实施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计划。¹⁰沙赫特并非在道义层面上反对对犹太人的骚扰和迫害，他只是想制止违法行为。言下之意，如果纳粹国家可以编纂一部法律，写明并限制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范围，逐渐停止对犹太人的任意欺凌，这也代表着一种有益的进步。

1935年9月，在纽伦堡国会会议上通过了一部旨在“保护德国人血统和荣誉”的新法案，最终禁止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性关系。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曾在7月末说，禁止通婚的法案正在准备中，但这项法案得到批准的速度惊人。9月12日，德国的医学界领袖格哈德·瓦格纳在演讲中第一次暗示了这一法案即将颁布。第二天，希特勒说他希望能够在纽伦堡通过这样一个法案，但事实上这个法案还是一张白纸。于是，以内政部犹太问题专家伯恩哈德·吕泽纳为首的一支公务员队伍从柏林启程，飞往纽伦堡起草法案。14日，希特勒决定，要给这个一揽子法案再增加一条内容——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于是这一条也被加了进去。

9月15日夜，德国国会在纽伦堡文化协会召开了专门会议。希特勒宣布，他不得不制定这部新的反犹法案，是因为“从四面八方传来对这个种族个别成员挑衅行为的抱怨声”，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防范，

以免导致部分愤怒的群众采取坚决的自卫行动”。希特勒认为，他提出的立法是为了在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保持一种“可以忍耐的关系”，但他警告说，如果“国际犹太势力继续兴风作浪”，他将对局势进行“新的评估”。¹¹

这是一场典型的希特勒式的表演——一个恐吓和谎言的杂烩。正如他在1933年4月应对国际犹太人抵制行动中所做的那样，他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必须的，为的是确保普通民众对于犹太人的愤怒不至于转变为暴力。他还暗示，德国犹太人所受到的待遇将由国际犹太社会的表现决定。希特勒的话中隐含的假设是，如果其他国家不让他推行其政策，德国犹太人将会受到更为严重的迫害。

在希特勒讲话之后，赫尔曼·戈林作为议长发表了演讲，奴隶般地支持了他的元首。乍一看，他的讲话主要集中在希特勒当天所提出的立法法案中最不起眼的部分——德国的“国旗”法。他建议把万字旗作为德国的标志，相对于另外两条明显反犹的法令来说，这似乎是无害的，但它的缘起却值得深究。在此之前，德国有两面法定的国旗——万字旗和德意志帝国黑白红三色旗。希特勒在上台之初仍十分谨慎，不想冒犯总统兴登堡这些老古董，并不坚持要完全丢弃帝国的旧国旗。所以很奇怪，当时的德国商船上都飘扬着两面国旗。1935年7月，在纽约，抗议者登上德国“不来梅”号邮轮，把万字旗扔进了水里。美国人可能认为，万字旗并非德国的唯一法定标志，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并没有受到侮辱。美国的犹太裔法官路易斯·布罗茨基并未如德国所愿进行严肃的处理，这一点激怒了纳粹政府。德国法律学院校长汉斯·弗朗克称布罗茨基是犹太人“威胁”的一部分，这件事是一个“最为可悲也是最为危险的先例，在美国这样高度文明的国家，一个犹太人可以如此贬低自己作为法官的身份，去发泄其种族永恒的仇恨……”¹²

这一新法案改变了纳粹标志的地位，现在——正如戈林的解释——“谁侮辱了这面旗帜就是侮辱这个国家”¹³。戈林自称对美国人“感到遗憾”，因为他们被迫在“不来梅”号事件中见证了“一个厚颜无耻”的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不过从今以后，万字旗将标志着德国永远走在纳粹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值得注意的是，他补充道，“不用说”，“犹太人不被允许举起这神圣徽章的”。在戈林的演讲结束后不久，闻名于世的《纽伦堡法》三部曲——《德国国旗法》、《保护德国人血统与荣誉法》以及取消犹太人公民资格的《德国公民法》获得了通过。

尽管犹太人不应被视为德国公民，也不能与非犹太人发生性关系的观念由来已久，但希特勒从未公开透露过他为何在1935年9月突然决定通过这部反犹法案。对于这一定时精确的动作，有一种可能有说服力的理由：希特勒原本准备在纽伦堡就他的外交政策要求作一个宽泛的说明，但在最后一刻被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劝阻。鉴于希特勒已经召开了这场国会的特别会议，而放在议员面前的只有一部《德国国旗法》，他突然决定推动反犹立法，主要动机是希望弥缝两派人士的鸿沟，一派是在街头迫害犹太人的党棍，另一派是像沙赫特那样要求政府进一步明确对犹太人立场的官员。¹⁴另外，也有可能是希特勒认为反犹立法顺应了《德国国旗法》背后的巨大情绪。他肯定对万字旗漂浮在纽约港水面的情景深感耻辱，而且那是从德国商船的骄傲“不来梅”号上扯下来的。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大战爆发以后，希特勒的行为显然存在一种模式，一旦外国的行为激怒了他，他就会猛烈打击德国的犹太人。¹⁵

实际上，这部新法令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德国各地业已存在的情形。在立法之前，地方纳粹党已经向非犹太人施加压力，使他们无论在生活中还是事业上都与犹太人隔绝开来。尽管如此，《纽伦堡法》仍

不失为纳粹国家对德国犹太人态度的分水岭。现在，是德国法律——而非仅仅是纳粹党人——要求把犹太人从社会中无情地隔离出去。不仅犹太人在法律上已不再是“真正的”德国人，新的法律还侵犯了每一个德国公民的私人生活。德国政府宣布，它有权决定你能和谁发生性关系。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现在可以检查每座私人房屋里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很容易遭到一个卑鄙邻居的告发。昨晚拜访你的那个异性陌生人是谁？他们看起来像“犹太人”吗？更重要的是，国家可以要求确切了解你在关上门后进行了哪些性行为，因为他们对“性关系”的定义非常宽泛。德国最高法院次年宣布，“性关系的概念”并非“包含所有不雅行为，但不局限于实际性交，即除了性交本身，[它还包括]与一个异性伙伴以满足至少一方的性欲为目标的可代替性交的所有性行为”。¹⁶

对于纳粹来说，还有一个问题：谁是犹太人？谁不是犹太人？这些信息对于执行新的法令至关重要。尽管《保护德国人血统与荣誉法》公开宣称“德国人血统的纯正性”对“日耳曼民族的存续”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纳粹分子无法通过检查“血统”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纽伦堡立法中对如何定义“犹太人身份”也没有说法。结果，1935年9月15日通过的法律是无法执行的。直到1935年11月中旬，才公布了定义“犹太人”的规定。这份文件提到了“混血犹太人”和“纯种犹太人”，但仍不得求助于宗教教义来定义谁是犹太人。它说：“祖父母、外祖父母中至少有三人是纯种犹太人，即可定义为（纯种）犹太人。”但接着又说：“只要祖辈中的他/她从属于犹太教区即被视为纯种犹太人。”¹⁷所以，纳粹是根据一个人祖辈的宗教关系来决定其“种族”的。

关于那些混血的德国人该如何处理的问题，令法规的起草者大伤脑筋。有些德国人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过的似乎是一种“雅利安

式”的生活——却有两个祖辈是犹太人。要是换作别人，纳粹肯定会把他/她归为犹太人。于是，纳粹官员想出了一个复杂的解决办法。它不得不再次依靠审查宗教关系：如果你的祖辈中有两人是犹太人——根据法令定义——但你自己并没有和犹太人结婚，生活中也和犹太教没有关系，那么你就不是犹太人了。然而，如果你有两个犹太人祖辈，还和一名犹太人结婚或有犹太教信仰，那么你就是犹太人。

这真的是乱七八糟。法令完全暴露了用血统和种族来定义犹太人是彻头彻尾的谬论。如果纳粹的种族信仰是严肃的，那么同样有两个犹太人祖辈，为何有的人被认为是犹太人，而有的人又被认为不是犹太人呢？他们同样的出身应该意味着体内流淌的“犹太血统”是完全相同的。

尽管如此，希特勒仍宣称《纽伦堡法》是一个成功，呼吁国家“不要偏离法律笔直而精确的道路”¹⁸。他清楚地知道，这些反犹法律不仅是对第三帝国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表述，而且是一种遏制党内狂热分子妄图自发行动的手段。法令通过后的次日，他提醒纳粹党的忠实信徒，他们应该“保持克制”，不要对犹太人“单打独斗”¹⁹。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加入纳粹党的埃米尔·克莱因认为，这些歧视性措施没有什么不对。他说：“不仅德国有种族隔离制度，人们还听说美国也有种族隔离制度。德国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实际上，世界各地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²⁰他的话当然是正确的——并且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当时种族歧视不仅仅在德国存在，但这些话是虚伪的，因为德国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纳粹奉行种族理论的激烈程度令人震惊。

同样十分荒谬的是，许多德国犹太人以相当积极的态度看待《纽伦堡法》。法令虽然是歧视性的，但似乎规定了迫害的限度。“这些是

规则”²¹，德国犹太人应当在规则中生存。新的立法似乎保护了犹太人免遭地方暴徒的任意迫害。

许多德国人并不怎么关心对犹太人采取什么措施。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希特勒上台以后失业率大幅下降——从1933年的六百万人到1936年的不足二百万人。尽管纳粹的数字有水分——比如不计入妇女——但它无疑是成功的。“那是在1934年，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正在改变。”在巴伐利亚长大的厄纳·克兰兹说，“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丝希望，不仅是失业者，而是每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压迫者，在1933年，德国已经崩溃了。我们不能掩盖事实，不是吗？事实就是如此，很多地方都好转了。公务员和白领工人的薪水上涨了。所有的东西都变好了一点，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能记得自己和家庭的情况。你可以看到街头的失业者消失了，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你会注意到它背后一定有一些方法，首先是年轻人投身于体育活动和社区服务，这是很有意义的，他们还开始了高速公路的建设，所有这些为人们提供了工作，使他们不再徘徊街头。是的，这肯定是一段积极的时期，要不然为什么最后群众会跟着这个人走，为什么？”²²

德国在经济上也获得了成功，主要是得到了大笔贷款，军费开支大幅增长。从1933年到1935年，德国军费支出从不到国民总收入的1%提高到近10%——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时期不曾有过的高速增长。²³

在此期间，“犹太人问题”并非焦点所在，希特勒的主要精力在于建设德国武装部队，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至于外交政策，他想一个一个地对付有关国家，而不是借助国际联盟。为此——以及为了重整军备——1933年他上台后不久，德国就退出了国际联盟。两年后，1935年6月，德国驻英国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签署了《英德海军协

定》，划定了在舰队规模上英德之间的比例。这个协定打破了《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但没有给德国带来任何不良后果。希特勒说，《英德海军协定》签署的那天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²⁴

对于读过《我的奋斗》的人来说，这些都不出预料之外。希特勒认为英国是一个可能的盟友，他需要强大的武装力量来为德国占领东方的新领土，这一切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已经说过。然而，他还说过他是多么厌恶犹太人，把他们看作一个致命的威胁。距离他就这个问题采取断然行动还要再过几年——但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

6. 教育和帝国的形成(1935—1938)

为了追求他所谓的“民族国家”(The völkische state)¹,希特勒试图改变整个德国的民族意识。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民族国家必须完成最艰巨的教育任务,有朝一日可能比获得战争的胜利更为伟大。”²这一“教育任务”的重要部分,就是提醒“雅利安”德国人不要忘了犹太人的危险。尽管希特勒可以通过新的立法来迫害犹太人,但他不大可能轻易改变民族的心态。显然,到1935年9月,即《纽伦堡法》颁布的那个月,他那个所谓“艰巨的教育任务”距离完成还很远。

就在9月,萨克森州一位社会民主党支持者写道:“大多数人并不在乎对犹太人的诽谤;他们甚至公开选择进入犹太人的商店,对守在那里的冲锋队队员表现出不大友好的态度……”³两年后,情况依然没有多少改变,巴伐利亚的盖世太保报告说,犹太牛贩子仍然控制着大部分市场,大批农民还是继续和他们做生意。⁴

希特勒很清楚,这个国家的“再教育”需要时间,尤其是要瞄准年轻人,好让他们为未来的艰巨任务做好准备。1935年9月,他在纽伦堡向五万四千名希特勒青年团员讲话:“在我们眼中,未来的德国青年必须像灰猎犬那样修长而敏捷,像牛皮那样有韧劲,像克虏伯的钢铁那样坚硬。

我们必须培养新人，以免因这个时代的退化而导致我们人民的衰朽。”⁵

许多年轻人接受了纳粹的宣传，因为生活似乎变得越来越好——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父母都是如此。“希特勒上台之后，我们突然得到了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长大的威廉·罗斯说，“家里的阴沉气氛改变了，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的气氛总是很不好，我妈妈每天到十一点钟就发愁十二点钟能把什么摆上桌。1934年，我父亲得到了工作，我估计他挣了有三百八十马克，我们的家境大大改善。父亲说这是元首的功劳。好吧，我会怎么想这件事？真的没有给我洗脑的必要，我从小就接受了这些。”⁶

纳粹教育体系下的教师花了大量时间告诉自己的“雅利安”学生，他们比犹太人要优越，因此教导反犹主义时所使用的整体语境是正面的积极的。例如，玛丽亚·毛特记得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北部，老师告诉她：“只有德国人是最宝贵的人类，无与伦比。有一本小册子叫《德国的发明家、诗人和音乐家》，我们看得津津有味，绝对相信我们是最伟大的。”⁷同一时期的慕尼黑女孩厄纳·克兰兹认为：“在教育领域做了很多工作，年轻人有很多机会……一切都被组织起来。我们的生活不像今天这么富裕，但有秩序和纪律。我们也有很多的榜样，很受鼓舞。优秀的作家很受关注，哲学家也一样……好吧，我不得不说这是很有感染力的，你过去常说，如果你每天告诉一个年轻人‘你是特别的’，那么他们最终会信以为真。嗯，我是说他们试图培育出所谓的日耳曼人种，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人，需要那样的人，需要强壮的、能干的人，健康的人。经过那些年的锤炼和强化，‘德国性’就这样形成了。”⁸

告诉孩子们他们比其他人更好是容易的，但灌输“犹太人是危险的”却很难，尤其是当学生们认识那些乐善好施的犹太人时。例如，威廉·罗斯很难把教给他的反犹主义和周围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在他

居住的镇子上有犹太商店,他还记得犹太店主是如何“给孤儿们捐赠衣服”的,因此他“不喜欢《先锋报》上的那些漫画,对此无法理解”。⁹

对于学生们遇到的纳粹宣传与真实的犹太人之间的脱节,老师们的办法就是强调犹太人所谓欺诈性的本质。¹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童书《毒蘑菇》,1938年由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出版社在纽伦堡出版。¹¹其中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孩子从母亲那里学习如何区分毒蘑菇,这是很难的,正如犹太人的邪恶本质,在他们试图“伪装”自己时也是很难被发现的。用故事来进行宣传的好处是很明显的。犹太人在富于魅力和乐于助人时被视为是最好诈的——正如森林中的毒蘑菇,看上去很漂亮,但实际上是最危险的。

犹太人于是被描述为“德国性”的对立面。真正的德国人没有必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本性,而犹太人被迫隐瞒自己的两面派实质。“雅利安”学生是“优异”的,而犹太人是“有毒”的。1937年,弗里茨·芬克写了一篇题为“教育中的犹太人问题”的文章,发表在《先锋报》上。他告诫教师们,必须“把有关犹太人的知识从小就植根在我们年轻人的心里”,让他们明白“犹太人真正的堕落和危险”,这是至关重要的。芬克是一名学校的督察,在他看来,“种族主义和犹太人问题”是纳粹主义的“核心”问题,要让年轻人明白不能接触犹太人,最有力的办法是通过“科学”教育。正如“一群野马”永远不会跟着一头“野猪”走,“每一个物种都自行其道,寻找同类的领袖”。孩子们应该懂得,动物自然而然就会知道什么对自己是好的。芬克写道:“唯有不同种族的劣等成员才会互相混杂,沆瀣一气。显然,杂交的后代总是最糟糕的,总是把各个种族的缺点继承到一起。一位老师在向学生解释《纽伦堡法》对于年轻人的意义时,如果能展示这样的思路,那就会容易得多。孩子们在《纽伦堡法》中看到的将是一种对自然神圣秩序的回归。”¹²

希特勒知道，纳粹的宣传机构更容易对儿童产生影响。对于成年人来说，要把纳粹的犹太人理论和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德国犹太人联系起来可能会有点难度——不过并非完全不可能。例如，1935年，一位年轻的空军军官卡尔·勃姆—泰特尔巴赫非常感谢德国的犹太人，他驾驶的飞机迫降在一片田野上，一个犹太人救了他。为了表达谢意，他想请他的恩人一起吃饭。但令他惊讶的是，这个男人突然说“我是一个犹太人”，并问他“是否顾虑和犹太人在一起”。勃姆—泰特尔巴赫告诉他自己没有顾虑——毕竟这个人救了他的命。“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犹太人可能会有麻烦。”勃姆—泰特尔巴赫说，但这件事并没有改变他对现政权的热情。他说：“特别是在柏林，他们[纳粹]说大部分律师都是犹太人，所以当他们说律师太多了时，我们就明白了。成为反犹分子不一定要去杀人，你不能和他们有亲密的社交关系，不能太喜欢他们，但并不意味着你就要杀人……”¹³在《纽伦堡法》颁布后，勃姆—泰特尔巴赫虽然对犹太人“感到抱歉”，但也承认“对此并不太担心”。

勃姆—泰特尔巴赫对于迫害犹太人的轻松态度，反映了很多德国非犹太人的心情。对于所谓的犹太势力和影响，他们赞成“应当采取一些措施”，一旦后来暴行越轨，他们会感到不安，但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他们熟识和喜欢的犹太人，则会被当成另一个阶层来看待。

纳粹领导层强调，他们所说的不仅是“犹太人问题”的现实方面——譬如柏林的犹太律师的数量——更是深层次的种族问题。对他们来说，从事法律职业的犹太人数量不成比例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种族问题才是真正的根源。“我们将把最好的血统汇聚到一起，”农业部长瓦尔特·达利说，“就像我们目前正从所剩无几的纯种公母马开始培育汉诺威马，所以我们会看到，同样的办法将被用来培育纯正日耳曼人的下一代。”¹⁴

通过这样的声明，纳粹不仅宣传他们恶毒的反犹主义，还帮助他们把反犹种族主义与优生学——在纳粹的词典中被称为“种族卫生学”——联系起来。“种族卫生学”与迫害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在第三帝国初期并不是很明显，但纳粹总是把这两者相提并论。正如他们认为犹太人的血统绝不能和“雅利安人”的血统相混合一样，那些最羸弱的“雅利安人”也不能被允许生育。用瓦尔特·达利的话来说，一个纳粹信徒不会让一匹汉诺威马去和劣等马交配，同样，他也不会让一匹健康的汉诺威马和一匹病弱的同类交配。

希特勒对只允许健康的“雅利安”德国人生育后代极为重视，在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上，他警告说：“由于我们当代的多愁善感的人道主义，我们努力维护弱者，牺牲健康……罪犯被允许生育，人为的溺爱换来的是堕落。因此我们正在培育弱者，失去强者。”¹⁵他甚至说：“如果德国每年有一百万名儿童出生，淘汰掉其中较弱的七十万人到八十万人，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我们会变得更强。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把自己隔离于自然选择之外……”根据这一想法——这是在他成为总理的四年前提出来的——在德国出生的每十个新生儿中可能有七个到八个被杀掉。在他看来，造就“民族国家”基本上意味着要杀死大量“羸弱的”德国人。

因为希特勒相信德国应当进行基因改造，所以不出意料，他上台六个月后签署了《遗传病后代防治法》。该法令要求“遗传健康法庭”命令患有某些疾病的人强制绝育。这些疾病中的一些根本不是“遗传性”的，有些不受社会欢迎的行为，如酗酒，也被纳入绝育之列。

纳粹不是第一个通过强制绝育法案的——美国许多州已经这样做了，但纳粹推动这一法案确实比任何人都更热心。例如，因为这条法令，来自莱茵兰的保罗·埃格特在孩提时代就被强制绝育。他没有“遗

传性”疾病，只是在纳粹眼中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公民。他出身贫困，父亲是个酒鬼。小时候，他向当地农民乞讨，如果不能带饭回家，父亲就会揍他。最后，正如他所说，“当地人不耐烦了”¹⁶，于是他被从父母身边带走，送进多特蒙德附近一个特别的儿童之家，有人告诉他需要做一个疝气手术。直到战争结束，他才明白自己做的不是疝气手术，而是绝育手术。

在希特勒看来，绝育法案只是一个开始。虽然这项新立法意味着后代会甩掉“负担”，不用照顾一些国家最贫困的公民，但对眼下的情况没有帮助。希特勒的真实想法被包装在一部电影《过去的受害者》中，于1937年发行。这部纪录片提倡杀死精神残疾者，在德国的每一家电影院都放映过。电影的旁白说，这一行动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让这些人活着违背了“造物主自然选择的规律和秩序”；其次，“照顾这些人的资金可以更好地利用来帮助健康强壮的孩子”。¹⁷

一些德国医生赞成这种杀人的想法。1935年，精神科医生卡尔·卡纳布写道，德国的“精神病院”里只有“最低等的白痴”，是“精神废墟”。并且，这些“行尸走肉……仅仅是浪费金钱的包袱，应当用无痛苦的方式来加以杀灭”。卡纳布认为，“在一个民族进行生存斗争”的背景下，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这样做是“合理的”。¹⁸

德国的医学界领袖格哈德·瓦格纳在《过去的受害者》首映式上发言表示支持。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他的元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1935年，希特勒就曾告诉他，在未来的战争中，他们应该准备好杀死严重的精神病患者。¹⁹希特勒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可以让他采取这样激进的行动，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在战争的掩护下，他还可以发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在德国，强制绝育得到了大规模推行，约有三十万人到四十万人成

为受害者。²⁰这导致医疗界的作用发生灾难性的转变。医生感兴趣的不再是病人的健康。如果医生决定要按照新法案的标准对病人实施绝育，他们便可以合法地无视病人的异议。格哈德·瓦格纳认为这里没有矛盾，因为他相信医生首要考虑的应该是国家的福祉。²¹因此，纳粹声称，医生具有比以前更为伟大的职责——不仅仅是照顾个人的需要，还要满足整个民族的需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目标。²²

所谓的“民族国家”，意味着国家可以质问你所做的每一项生存选择。纳粹可以调查你详细的家庭背景，以确定你能或不能与谁结婚，以此来评估你是否“有权”生育。如果你怀孕了，所怀的胎儿被认为是对种族有用的，你就会被禁止堕胎。你再也不能选择不工作了，因为这会让你成为“逃避工作者”，并可能受到“保护性拘留”。你甚至无法选择自己的朋友，如果邻居不喜欢你的客人，你就会被指责为“自私者”——这意味着你不是这个种族社区的可靠成员。

然而，尽管有这些约束，大多数德国人仍然支持希特勒。例如在1934年将总统和总理职位合二为一的公投中，有88%的选民支持希特勒在兴登堡去世后成为国家首脑。在1936年的选举中包含了一项全民公投问题，征询选民是否支持希特勒对德国莱茵兰地区的军事重占，结果对纳粹的支持率超过98%。我们应该记住，这些选举是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举行的，没有采取措施来保障真正的选举自由，不能在数字上精确地说明这个政权得到支持的程度——尽管如此，这个结果仍然令人深思。很容易理解，为何研究希特勒的顶尖学者从全部现存的史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1936年的结果是“一种为希特勒叫好的极度夸张的表演”²³。许多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无疑都会同意厄纳·克兰兹在战后回忆时所说的话：“我觉得那是一段【比今天】更好的时光。当

然这么说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我还是要说。”²⁴

对于厄纳·克兰兹茨这样一位20世纪30年代的年轻女性来说，纳粹的统治不仅是正面的部分远大于负面的部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在我们看来是负面的部分——比如集中营、对少数民族的孤立等——都被看成正面的部分。集中营被认为是从街头清除害群之马；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新教育，让年轻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至于对犹太人的排斥，正如银行家约翰内斯·察恩所说的，有的人觉得犹太人在德国已经“走得太远”²⁵。所以，只要你符合纳粹的理想——数百万德国人正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你就可以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之下过得很好。许多人后来都会说，他们没有想到《纽伦堡法》以及其他限制性法案对犹太人的迫害会演变成大屠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此时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对未来有什么计划——但这也是一种误导。数百万德国人能够在希特勒治下享受生活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热情地支持种族理论这一纳粹的核心思想，他们赞同自己比别人强的想法。因此，那些据说不像他们的人很有可能会遭到非人的对待，争论的焦点不在于其他人是劣等的——这一点已经被广泛接受——而在于这些“劣等”的人应当被如何对待。

至于犹太人，《纽伦堡法》已确定把他们排除在新德国之外。渐渐地，犹太人就将自己局限在他们自己的社区之内。在那里，许多人的生活尚可忍受。贡特尔·鲁辛少年时生活在柏林的犹太社区中心，记得他有一个“很好的家”，“我们没有困难……我们上【犹太人】学校，我们回家”。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德国军队服过役，是当地犹太教堂的一位领唱，他“告诉每个人，我是一名德国犹太人，我不会有任何事的”。²⁶

贡特尔的父亲以及其他许多德国犹太人都坚信待在家里是最好

的，在柏林的犹太社区是安全的。大体来看，从1935年夏天到1937年夏天，周围的证据似乎支持了他们的看法。尽管仍有个别针对犹太人的行动，排斥犹太人的规定也在继续出台——例如，从1936年10月起，公务员被禁止去看犹太医生——但系统性的大规模暴力还没有出现。很多人以为政权已经安定下来，孰知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在这段时期，柏林政权对犹太人相对平静的一个原因是，希特勒希望确保1936年奥运会成功举行。在美国，像纽约市长拉瓜迪亚这样的公众人物呼吁抵制奥运会，但美国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说服了美国体育联合会向柏林派出了代表团。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四十八个国家参加了1936年的奥运会，这对于第三帝国来说是个成功的策略。德国不但赢得了最多的金牌，纳粹的宣传机构也大获全胜，它成功地颠覆了奥林匹克的理想，使其沦为吹捧种族主义国家的新闻工具。纳粹的信息被包装在莱妮·里芬施塔尔导演的电影《奥林匹亚》里，在影片开头的画面中，奥运火炬被一位金发运动员带进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这是“雅利安人”理想形象的缩影，他得到了纳粹举手礼的欢迎。

今天看来，最特别的是英国前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对希特勒的评价。1936年9月，他访问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贝格霍夫的高山别墅。劳合·乔治在《每日快报》上发表文章，称希特勒是“一位天生的领袖。拥有富于魅力、精力充沛的人格，并且目标专一、意志坚定、内心无畏”²⁷。他注意到，希特勒被尊为“民族英雄，把他的国家从彻底的沮丧和衰退中拯救出来”。在德国，劳合·乔治发现了一种“团结的热情”，现在“天主教和新教、普鲁士和巴伐利亚、雇主和工人、富人和穷人，全都成了一家人”。他写道，“这里有一种复兴的气氛，非常有利于民族团结”，因此“人民更为快乐”。

有人会问，那么德国犹太人呢？劳合·乔治知道他们在德国受到

迫害——他甚至在文章中提到了这一点。²⁸那么他怎么能说“人民更为快乐”呢？除非他认为德国犹太人不是真正的“德国人”？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劳合·乔治曾经支持过1917年11月的《贝尔福宣言》，英国政府在该宣言中表示“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区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不过，政客们在宣言背后的真实动机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事实上，一位历史学家曾得出结论说：“那些炮制它【《贝尔福宣言》】的人是基督教徒、锡安主义者，但在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反犹主义者，他们认为犹太人控制了世界。”²⁹

在英国，劳合·乔治并非唯一一个无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称赞希特勒的人。新的纳粹主义并未在英国广泛传播——20世纪30年代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英国法西斯联盟从未在选举中获得什么实质性的突破——但反犹主义仍很有市场。例如，德国银行家约翰内斯·察恩在伦敦之行时曾听过英国金融家的反犹言论。³⁰欧根·列维涅认为，他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遇到的反犹主义者比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还要多。“我认为在社交场合英国人【与德国人相比】要更反犹。人们常常非常友善地说，‘毕竟，我们不会毒死犹太人’。是不会……但是他们肯定不会让犹太人加入他们的高尔夫俱乐部。如果你对那些和你很友好的人说，为什么不让某人加入高尔夫俱乐部呢？【他们会回答，】‘亲爱的，你看，如果你让他们中的一个加入，他会把所有的朋友都带来。’”³¹反对接纳外国犹太人的评论也可见诸报端，例如，《星期日快报》的一篇社论宣称：“现在有大量的犹太人拥入英国，他们正在接管我们的国家。”³²

正如欧根·列维涅所描述的那样，在所有这些反犹言辞的背后，是关于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群体的偏见。至于劳合·乔治，他似乎认同犹太人有着经营跨国生意的庞大势力——阿道夫·希特勒也有同样看法，只不过更为极端罢了。³³这一共同点可能使劳合·乔治对德国领导

人赞赏有加——对此我们不能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余晖下，希特勒让劳合·乔治大为折服，再次让他确信德国的发展，翌年，德国将向世界呈现焕然一新的面貌。

1937年在很多地方都是一个转折点。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希特勒言论的疯狂程度又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巴伐利亚啤酒馆的时候。在1937年9月13日纽伦堡的一场演讲中，他称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自古代国家崩溃以来人类文化和文明所遭受的最大威胁”³⁴。最重要的是，他再次把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联系到了一起。他说，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动荡”，这是由“莫斯科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造成的”。他补充道，有人可能会忽视这一联系，“当我有意提出这一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时，那么你们，我党的同志们，就应该明白这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设，而是被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希特勒接着给他的听众上了一堂历史课——尽管是歪曲的历史——从他对“俄国”（希特勒坚持使用“俄国”的称呼，尽管俄罗斯只是苏联诸多共和国的一个）的看法讲起。他声称，犹太人最终“渗透”进了俄国的统治精英阶层，成功地“消灭”了以前的上流阶层。“犹太人”是一个外来种族，“完全控制”了俄国的文化，现在准备利用俄国作为“桥头堡”来征服其他民族。

希特勒编造出一幅近乎邪恶的幻象，称“野蛮的群众”在“自私自利者”的鼓动下将会疯狂起来，把原住民“带上断头台，让他们流血而死”。所有这些混乱的背后都是犹太人，他们知道想要控制一个国家，就必须“设法消灭”那里的精英阶层。希特勒提醒他的听众，在德国“我们都经历过相同的事情”——他指的是德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于1919年发动的柏林“斯巴达克”起义，以及同年早些时候成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希特勒说，德国“对防止布尔什维克瘟疫在欧洲进一步蔓延有着坚

强的意志”。他回顾说，虽然德国过去曾和其他欧洲国家进行过战斗，但这些战争一直是“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布尔什维克是完全不同的。莫斯科的统治者是“野蛮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国际罪犯同盟”，纳粹应当受到赞扬，因为他们阻止了犹太“人渣”对德国工人的支配。此外，今天的德国人比以前更“优秀”，随时准备对付任何想把布尔什维克“威胁”带到德国的人。

希特勒称，是西班牙内战激起了他的这番言论，尤其是因为斯大林给共和军提供了武器和一些战士来反抗国民军。希特勒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的虚伪，这些观点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有了，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便在公众面前肆意妄言。这关系到一个策略问题。在这次演说的五个月前，即1937年4月的一次纳粹党内领导人会议上，希特勒私下解释道，他很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对犹太人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如用一种特殊的徽章来“标记”犹太企业，但行动者们必须要注意，他一直关心的是，“要避免采取今后不得不回头或是对我们有任何损害的步骤。你们必须明白，我总是在认为安全的情况下走得尽可能远——但不会更远。拥有第六感很重要，它可以大体上告诉你：‘我还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因此，虽然这些人都同意犹太人所带来的危险，但他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³⁵这是一篇对希特勒的内心提供了重要视角的谈话，他承认希望更激进地迫害犹太人，但他认为在政治上有必要向最终目标缓慢前进。戈培尔在1937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透露了这一目标：“[和希特勒]谈了很久犹太人问题……必须将犹太人从德国和整个欧洲驱逐出去。这将需要一段时间，但它会实行，它必须实行，元首将完全致力于此。”³⁶

与解决“犹太人问题”策略类似，希特勒在宣扬他的另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希望在苏联西部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时也非常谨

慎小心。在20世纪30年代，他从未公开表达过这一愿望，但在1937年纽伦堡演讲的前一年，他曾在私下里明确表示准备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在这份1936年8月的备忘录中，他任命戈林为经济方面“四年计划”的负责人，重申——在军事上——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德国的国运。由于德国已经人口过密，需要获得更多的土地，因此“[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在于扩展我们的生存空间”³⁷。这里使用的“最终解决”一词是值得注意的——众所周知，消灭犹太人的计划也会用到这个词。这里的“最终解决”阶段指的是开始实际的武装冲突，与开始建立武装力量的过渡阶段相区别。

在1936年9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戈林念了希特勒的备忘录，并称这里的逻辑是明确的——“与俄国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³⁸。两个月后，即1936年11月，戈培尔证实他也知道，这一时刻正迅速接近，德国将不得不与苏联对决。与希特勒共进午餐后，他“和元首进行了一次长谈”，认为“重整军备正在进行，我们正投入惊人的资金，1941年就可以完成……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对抗即将到来……我们必将主宰欧洲”。³⁹

十个月后的1937年9月，希特勒在纽伦堡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把他私下说的话在公众面前进行演讲。尽管他还没有说过德国要入侵苏联，然而他告诉全世界，德国必须重新武装并准备反击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和“俄国”可能的进攻。由于希特勒认为布尔什维克背后有犹太人，和俄国的冲突也意味着和犹太人“威胁”的冲突。事情刚刚初露端倪，就可以明显看到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任何战争都不会是普通的战斗，而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以及——如希特勒所认为的那样——不同“种族”之间的斗争。

政府中对此并不热心的人很快被清除出去了。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曾创造性地重整德国经济，为德国军备建设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但他还是在1937年11月被解职，只是因为他不够激进。沙赫特继续执掌德国国家银行直到1939年1月再次遭到解职。1943年初，他终于摆脱了无足轻重的不管部部长之职。次年7月20日希特勒遇刺后，他被送进了集中营。

沙赫特的倒台反映了很多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支持过希特勒的右翼精英的遭遇。沙赫特的情况也许有些极端——没有那么多人在纳粹国家爬到过如此高位，也没有几个人悲惨到被送进集中营——但从第三帝国创立之初的欣喜到随后对其侵略政策的幻灭，这样的人却并不少见。1937年11月5日，就在沙赫特被解除经济部长之职的几周后，希特勒向几名德国守旧派精英人士阐述他的想法，但他们对此并未表现出强烈支持，于是他们的职业生涯遭到了和沙赫特同样的命运。那天在总理府参加会议的有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立契大将）、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上将）、空军总司令（帝国航空部长赫尔曼·戈林），还有战争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元帅）和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会议由希特勒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记录，在这本臭名昭著的《霍斯巴赫备忘录》中，希特勒公开表示他希望在未来几年中为德国获得更多的领土，为此目的不惜冒战争的风险。他在会上没有提到他最宏伟的野心——入侵苏联，也许是他想集中精力于短期的目标，如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希特勒在会上声明：“德国政策的目标是保护民族共同体并加以扩大。因此，这是一个空间的问题……”这和他1924年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⁴⁰希特勒说，德国要尽快推行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在重整军备中建立起来的领导层日渐老化，不能迁延太久。他还透露，他终于意识到德国与英国建立伙伴关系是多么不现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1936年夏天，德国驻英国伦敦的大使里宾特洛甫没能达成

所希望的同盟。现在，希特勒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英国更有可能成为其对手。

在随后的讨论中，戈林像往常一样支持希特勒，但其他人表示了怀疑。他们尤为担心德国会陷入与苏联以及西方盟国的两线作战。希特勒不想从下属那里听到这些论调，所有表示怀疑的人都在随后几个月中离职。布隆贝格和一个拍过色情照片的年轻妇女结婚而备受非议，于1938年1月27日辞职；弗立契被诬陷为同性恋，被迫在1938年2月4日离职；诺伊拉特在同一天被解除外交部长职务，“晋升”为一个新的内阁委员会主席，那是一个从未开过会的顾问委员会。

所有这些关键岗位的替代者，都比他们的前任更为驯服和好战。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成为外交部长，温驯的瓦尔特·冯·布劳希奇接替了弗立契，希特勒自己取代了布隆贝格并废除了战争部长一职。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在霍斯巴赫会议之后就立即落实这些人事更替，但他抓住了各种机会，比如布隆贝格不合时宜的婚姻。在完成这些更替之后，他推行激烈外交政策的能力大大加强了。

这种更为激烈的外交变化，在霍斯巴赫会议后不到四个月就表现了出来：希特勒和他出生地奥地利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对抗反过来又导致纳粹的反犹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在希特勒就任总理之前，奥地利犹太人在许多方面和他们的德国邻居是相似的。市中心有建于19世纪20年代的华丽的城市会堂，表明了这个世纪上半叶维也纳犹太人的地位。一方面，内部的爱奥尼亚柱和穹顶彰显了维也纳犹太社区的财富和成就；另一方面，低调的入口——在街上几乎看不到——说明了他们所受的压迫，1782年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布的《宽容法令》禁止犹太人建造开放式的礼拜场所。

1867年，奥地利犹太人最终获得了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维也纳

的犹太文化进入黄金时代。这是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作家阿尔图尔·施尼茨勒、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时代——他们都是犹太人。但并非每个奥地利人都对犹太人新近获得的自由感到高兴，尤其有两位政治家表达了恶毒的反犹主义情绪。一位是议员格奥尔格·冯·舒纳勒，他执着于三点看法：与德国结成更为紧密的联盟，反对天主教，仇视犹太人。他的反犹主义更多的是出于种族而不是宗教。他曾说：“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伪装，世代相传的卑鄙谎言。”⁴¹另一位是卡尔·鲁伊格，维也纳的平民市长。他批评犹太人在某些职业中的比重过高，以及所谓的侵蚀政治肌体的方式。“凡是允许犹太人强大起来的国家，”他说，“都迅速地崩溃了；而那些明白应当隔离犹太人的国家，君主制的原则都保留了下来……”⁴²鲁伊格聪明地利用了维也纳人对东欧犹太人，特别是逃离俄国的犹太人大量拥入的担忧。有人呼吁关闭奥地利边境，防止犹太人进入该国，并担心犹太人带来瘟疫和政治革命的种子。鲁伊格在1905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对维也纳的犹太人说：“不要接纳【犹太】社会民主党革命者入境。我明确地警告犹太人：因为【这里】有可能发生和俄国同样的事。我们维也纳人是反对犹太人的，但肯定没有杀人或暴力的倾向。不过，如果犹太人要威胁我们的祖国，我们将毫不留情。”⁴³

奥地利的大部分反犹言论都类似于德国的，但关于“犹太人问题”存在一个主要的差异——犹太人口的比例问题。在德国，只有不到1%是犹太人，而在1890年的维也纳，总人口八十二万人中有十万人是犹太人，约占12%。纳粹在1938年3月进入奥地利时，仅在维也纳就有十八万多名犹太人，可能多达二十万人——整个德国的犹太人都不到这个数字的两倍。因此，对于纳粹来说，奥地利的“犹太人问题”比德国更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列强决定拆分奥匈帝国，奥地利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维也纳新政府希望奥地利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的一部分，但1919年战胜国通过《圣日耳曼条约》禁止两国合并。奥地利人不会忘记这一禁令——它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关于民族“自决”的承诺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地缘现实是无法回避的，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德国在奥地利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和德国一样遭遇了经济困难，虽然比不上德国那样严重。1934年，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下，奥地利纳粹党暗杀了总理恩格尔贝特·多尔夫斯。接替多尔夫斯的库尔特·许士尼格努力在德国面前树立一个独立的奥地利形象，而那位出生在奥地利的德国总理却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就像他觉得每一个“雅利安”奥地利人都是德国人一样。

希特勒向奥地利和许士尼格施加政治压力，但他对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强行合并还心存顾虑。他最大的担心来自墨索里尼，因为意大利保证了奥地利的独立性。希特勒仍希望能通过和平的方式组成联邦，在1936年德奥协定签署后，这种情况出现了可能。在协议条款中，希特勒承认了奥地利的“主权”，作为回应，许士尼格答应将在内阁中安排一名纳粹支持者。

在1938年初的几周，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建议许士尼格前往贝希特斯加登面见希特勒，以消除两国之间的“误会”。那场在1938年2月12日举行的会面是希特勒如何击败对手的最有教育意义的例子之一。希特勒和许士尼格的第一次会谈是在贝格霍夫别墅一楼的书房进行的，希特勒把一系列的指责抛向奥地利领导人：奥地利应该退出国际联盟；奥地利在历史上蓄意破坏与德国的合并；奥地利正在加强对德国的边防；等等。然后，他威

胁说要“结束这一切”，并警告说：“也许某天你在维也纳一觉醒来，发现我们已在那里——就像突如其来的风暴，然后你会自食其果。”希特勒进一步说，在成功入侵之后，这个国家将由纳粹冲锋队和奥地利的纳粹民兵组织“奥地利军团”占领，“没有人能制止他们的复仇——哪怕是我”。⁴⁴

和希特勒的许多政治对手一样，许士尼格只是一介书生——他就读法律专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名政治学教授。希特勒在这样的人面前几乎战无不胜，他会迅速地抛出一连串荒谬的指责，让对方根本无法回答。许士尼格是被这一策略击倒的第一位外国政治家——但还不是最后一个。他似乎不能理解，对希特勒讲书本上的道理是毫无用处的，这位德国领导人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家。他不想达成一个双方都同意的折中办法，而他说的“事实”是对的还是错的并不重要。

希特勒在攻击犹太人时使用了类似的语言手段。例如，他断言各种“海外犹太人”正密谋扰乱纳粹德国，就如同对许士尼格说，“奥地利的全部历史就是永不停歇的叛国罪行”。同样地，那些“哪怕”是他也不能阻止第三帝国狂热分子进行“复仇”的言辞，也和1933年纳粹抵制犹太商店时所说的类似，当时他声称存在人民自行执法攻击犹太人的危险。在这两个场合中，希特勒都装成一种可以阻止激进的温和力量。这是一种赤裸裸但有效的威胁，如果你不接受希特勒提供的条件，就有更糟的等着你。

在贝格霍夫的会面肯定让库尔特·许士尼格深感不安。那天陪着他的奥地利外交官奥托·皮克哈姆博士回忆道：“午餐时，许士尼格完全沉默了……非常沮丧。他的沉默是因为他已经明白和希特勒的会晤不会有什么愉快的结果。”⁴⁵当晚，许士尼格离开了贝希特斯加登，他在威逼之下签署了一份文件，向希特勒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包括同意任命

奥地利纳粹支持者阿尔图尔·塞斯—因夸特为内政部长。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长篇演讲，其中称赞许士尼格“具有高超的见解和真诚的意愿……为两国的利益，也为德国人民的利益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我们都是德国人民的儿子……”⁴⁶四天后，在慕尼黑纳粹党成立纪念日上，希特勒将奥地利和犹太人问题联系到一起，他强烈批评外国媒体关于德国对奥地利真实企图的“肮脏谎言”，特别点名英国的《新闻纪事》，因为它刊登了德国军队在边境集结的消息。根据《人民观察家报》的报道，他宣称，这些“无耻的指控”展现了“犹太国际杀人犯是如何制造和散布谎言的”。此外，“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大力打击德国的犹太暴徒。我们知道他们是国际势力的代理人，因此将对他们全体进行相应的处理”。⁴⁷

许士尼格准备就与德国合并一事进行全民公投，以此来压制希特勒。希特勒在戈林的催促下，在巴伐利亚动员军队，以此来向奥地利施加压力。许士尼格辞职，塞斯—因夸特被任命为奥地利总理。他“邀请”德国军队进入奥地利，于是德军在1938年3月12日上午越过了边境。奥地利军队没有抵抗，上百万奥地利人用鲜花欢迎德军。许多人对纳粹到来寄予新的希望，盼望一个新的、强大的奥地利可以不再受到经济问题的困扰。例如一个奥地利孩子苏西·塞茨说她和她的父母视希特勒为“救星”，因为“我们的确必须属于德国”。⁴⁸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希望德奥合并，现在这个“梦想”似乎真的可以实现了。

埃米尔·克莱因是一名1923年参加过啤酒馆政变的纳粹“老战士”，当他在十五年后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当我听闻合并奥地利正在进行时——那时我正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名地区高级指挥官——我非常兴奋，因为我打小就有一些奥地利亲戚。我没有和上司报告就开车到了奥地利，跟随开过帕绍的部队。我的生命

中不会再有第二次那样的经历，遇到那样的热情！我想不管是我还是士兵们，都从来没有受到过姑娘们如此之多的亲吻。奥地利已经天翻地覆。”⁴⁹

3月12日下午，希特勒越过边境进入了奥地利，就在士兵们走完同样的路程几个小时之后。越过边境的地点是有象征性的——跨过因河，就在他的出生地因河畔的布劳瑙。他耀武扬威地通过欢呼的人群，一路开到林茨市，那是他读书的地方。莱因哈特·施皮茨是一名加入德国外交部的奥地利纳粹分子，当时坐在希特勒后面的第六辆车里，这一时刻他被深深打动了。“我全部的梦想就是奥地利与德国的合并——别忘了奥地利曾统治过德国六百年，德皇加冕就在维也纳的霍夫堡宫。1918年战败以后，对我来说，这只能是一场梦……我必须告诉你，人们的热情就算不是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之八十五，这是压倒性的……我甚至还看到警察和修女举着纳粹旗帜。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和平的大帝国，因为对于奥地利人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奥地利人——战争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输掉了很多战争，对普鲁士的，对英国和法国的，我们已经厌倦了战争……德奥合并是希特勒不依赖战争获得的胜利之一，就像重占莱茵兰一样，他做得井井有条，堪称完美。”⁵⁰

施皮茨说，当时他认为他知道希特勒的野心是什么。“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想要联合除了瑞士和卢森堡以外所有的德语系国家，把它们团结在日耳曼民族旧的神圣罗马帝国之下。他想要废除三十年战争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来的不公，把德国的版图恢复到中世纪时的规模。”

认为希特勒的目标是让说德语的人团聚，而非发动一场征服东方的战争，这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希特勒在公众场合也鼓励这种误解。施皮茨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驻英国伦敦使馆任职，见证了许多英国的

统治精英对于欧洲操德语居民的团结无动于衷。“只要他[希特勒]能做到这一点，他会得到大部分英国当权者的理解。他们全都对此表示理解，这是他们告诉过我的。”

在奥地利，虽然没有推行类似德国的反犹措施，但在“传统上”对犹太人仍有很深的偏见，就像维也纳前市长卡尔·鲁伊格那样。后来成为希特勒摄影师的瓦尔特·弗伦茨，1928年曾去维也纳旅行，当他乘电车时看到了某些维也纳市民对犹太人的态度。“突然，电车在街上猛然刹车，有个人站在轨道上，没有看到驶来的电车。刹车后，电车司机说了一句让我深感震惊的话：‘哦，天哪，是个犹太人。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停下来。’车上所有其他维也纳市民都说：‘是的，你应该那么干，犹太猪！’他们甚至都没看到那个人。”⁵¹苏西·塞茨曾为1938年希特勒进入林茨欢呼，她也是一个对犹太人有看法的奥地利人，虽然她的话不是那么直接。“我必须说，犹太人在奥地利不是那么受欢迎……我们从未觉得他们和我们是同类人，他们是不同的，完全不同。”⁵²

从德军开进奥地利那一刻起，犹太人便陷于危险之中。当时十五岁的瓦尔特·卡莫尔林是一名维也纳犹太人，他说：“街上充满了嘈杂声，所有维也纳人（显然不包括犹太人）都在欢呼雀跃。然后第一个问题来了，犹太人的商店被捣毁。”在德军入侵后不久，“就有人来骚扰你……你完全没有法律保护。没有任何人来保护你，任何人都可以跑来对你胡作非为……”⁵³

无耻的纳粹暴徒让犹太人擦洗街道，以此来公开羞辱他们。瓦尔特·卡莫尔林记得看到一个穿着相当体面的妇女，举着她的小女儿，让她看一名冲锋队队员用脚踢擦地的犹太老人。“他们都笑了，”瓦尔特·卡莫尔林说，“居然她也笑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开心的娱乐，这令我深感震惊。”⁵⁴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目睹了维也纳的很多纳粹暴行。“从奥地利来的各种各样关于纳粹施暴的报道令我吃惊，”他在日记中写道，“犹太男人和女人被强迫打扫厕所，有上百人……就在街上被随意抓去清理纳粹的厕所。”⁵⁵

最初的反犹浪潮大多是自发的行为——各地发生了一系列杂乱的迫害活动，就和希特勒刚刚就任总理时冲锋队所干的差不多。但不久以后，纳粹的领导人就开始阻止这些冲动的暴行，转而代之以制度化的迫害。党卫军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紧随着第一支德国部队进入奥地利，并把自己的总部设在维也纳大都会饭店。他的亲密助手、负责反情报的安全部门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也很快来到这里。3月13日至14日夜——就在德国军队踏上奥地利土地的三十六个小时之后——盖世太保就开始从犹太人的家里掠夺艺术品。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无价的艺术收藏品，就被希特勒、戈林和林茨博物馆所瓜分。在占领奥地利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纳粹查封了犹太组织的办公地点，把他们的领导人关进了监狱。到3月底，艺术界和学术界的犹太人都被清除出去，犹太人还被禁止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犹太人的财产和企业也成了目标，纳粹强占了他们的公寓，接管了他们的百货商店和工厂。这一“雅利安化”的过程不久以后就将在德国重演。

1938年4月1日，第一列从奥地利前往达豪集中营的火车启程。到年底，奥地利约有八千人被送往那里。⁵⁶起初主要是纳粹的政治对手，其中很多人有犹太血统。但到了5月，纳粹就开始转向那些他们称之为“自私”“有罪”，甚至仅仅是“讨厌”的犹太人。⁵⁷在当局展开搜捕犹太人的行动时，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在餐厅吃饭或者在公园里闲坐，也要冒被捕的危险，恐怖达到了如此极端的程度。总的来说，这一年被纳粹送到达豪的囚犯中，有75%是犹太人。在去达豪的火车上，这些奥地利人

经常被殴打和虐待。根据党卫军自己的估计，在他们调查的那一趟旅途中，有70%的人受到了伤害。⁵⁸

一些奥地利犹太人试图和迫害他们的人讲道理。律师兼店主大卫·沙皮拉博士是一名维也纳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伤成了盲人。在他的律师业务被禁止后，商店也被强占了。他和妻子一起去维也纳拜访纳粹官员并递交了请愿书，希望纳粹看到他的军功章后能表现出怜悯之心。但他得到的回答是：“犹太恶棍，让你那些哈布斯堡的玩意儿[勋章]见鬼去吧！滚开，不要回来，否则我就把你扔下楼——也许那样你的眼睛就又能看见了。”⁵⁹

有很多维也纳犹太人自杀，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在纳粹统治下苟活。威廉·夏伊勒写道，他的一个朋友看到“一个犹太长相的人”站在一家酒吧前，“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老式的剃须刀挥向自己的喉咙”。⁶⁰戈培尔在1938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嘲笑道：“在过去，自杀的是德国人，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⁶¹

阿道夫·艾希曼是党卫军安全部一名三十二岁的中尉，在奥地利的恐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对这个国家很熟悉，在林茨上的学——就和希特勒一样。后来，他在奥地利为真空石油公司工作了六年。他在1932年同时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次年他失去了工作，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德国。

艾希曼此时在安全部专门负责“犹太人事务”，已经为德奥合并准备了很长时间，搜集那些被纳粹认为是危险分子的奥地利人的情报。他回忆道：“在几周前就把所有能干活的人找来三班倒，为一个直径几码的巨大圆形档案盘编写卡片。一个人坐在钢琴凳上就可以转动它，并通过编码孔找到任意一张卡片。”⁶²因此，1938年3月，艾希曼带着一份逮捕人员的名单来到维也纳，名单上包括著名的犹太人士。但是纳

粹发现，把犹太社区的头面人物抓起来会造成麻烦，因为纳粹要强迫犹太人移民——在夺走他们的财富之后——这样一来，在犹太人那边就没有领导者可以协调此事了，所以艾希曼得到批准后释放了一些犹太领袖，这样他们可以协助安排出境事宜。有一回，为了讨论犹太组织可以怎样协助纳粹，艾希曼会见了犹太律师约瑟夫·洛温赫兹，然后再把他送回牢房继续关押。⁶³

很快，一个更为迅速的解决方案出现——艾希曼称之为“传送带”⁶⁴。愿意移民的犹太人将被传唤至一栋建筑内，辗转于纳粹官员之间以完成驱逐的手续。1938年8月，设在罗斯柴尔德宅邸内的“犹太移民中心办公室”开始运转。从1938年3月到年底，共有八万名犹太人离开了奥地利。⁶⁵到1939年9月战争爆发前，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十三万人。犹太人被迫自己负担离境的费用，富裕者通过犹太组织对贫穷者进行了捐助。

入侵奥地利和随后的德奥合并，是希特勒政权一个毋庸置疑的成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奥地利犹太人就遭到了攻击、迫害和驱逐，这为纳粹展示了今后的方向。因此，在德国的犹太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更大危险。

7. 激进化(1938—1939)

在纳粹征服奥地利后，希特勒的自信心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德奥合并之后的演讲中，他说他个人“已经为德国人民尽了最大努力”，“我领导的德国已经进入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之一”。¹

希特勒甚至宣称他的存在是神的安排，他夸口说：“相信上帝的人必须承认，当一个民族的命运在三天内被改变，那么这就是神的裁决……”²既然上帝已经命令德国和奥地利联合起来，“主所结合的，人不可分开”³。

尽管希特勒对“上帝”侃侃而谈，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从《我的奋斗》里已经可以看到。⁴事实上，他认为基督教“是头脑有病的人想出来的”⁵。在他看来，生活的目的就是让人类为“保护种族”去生存和死亡。⁶他个人的任务就是带领德国人民走向繁荣和种族纯净的新世界。在这一任务中，他得到了一种神秘力量的帮助，他称之为“上帝的指引”。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936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威胁和警告都不能让我动摇。我按照上帝指引的道路前进，就像梦游者不会怀疑自己一样。”⁷

然而，到了1938年的春天，希特勒觉得完成上帝赋予其使命的时

间已经所剩无几。4月9日，也就是他四十九岁生日前不久，在维也纳的一次演讲中，他哀叹已经用了八年“最好的时光”去夺取权力。⁸所有的一切——担心没有时间去实现自己所追求的伟大，由于奥地利的成功而对自己才能的过度自信，以及对其他国家大力发展军备的焦虑——混合在一起，可以说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纳粹现在开始在德国国内推行更加激进的政策。1938年4月21日，盖世太保针对“逃避工作”的德国人发起了一次行动，拒绝两个工作机会的失业者将被送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6月，刑事警察针对“自私分子”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这一行动的显著之处在于，所有有刑事前科的犹太人也一同被逮捕了。⁹逮捕犹太人的标准很简单，只要有前科的犹太人，曾在监狱里待过一个月以上，¹⁰至于他是否适合工作则无关紧要。这是第一个在全国行动中犹太人受到比别人更严厉对待的例子。

在突如其来的搜捕之下，有两千名犹太人被囚禁起来，那里的条件在纳粹看来亦属骇人听闻。在布痕瓦尔德，很多人只能露宿。对于那里的党卫军士兵来说，犹太人的到来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发泄愤怒和病态残忍的机会。犹太人一进入集中营就会被安排最劳累的工作，一个夏天就有九十多人死亡。只有当他们能向党卫军证明自己很快就可以离开德国时才有可能被释放。

其他德国犹太人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糟。1938年间，一系列反犹条例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自由。犹太医生不能再接收“雅利安”患者，犹太人被禁止从事许多工作，包括旅行推销。纳粹还继续在区别和隔离犹太人方面进行努力，根据1938年8月17日的法令，如果犹太人的名字中没有包含一个“标准”的犹太人名，那么男人要加上一个“伊斯雷尔”的缀名，女人则要加上“萨拉”。¹¹

在官方推行这些迫害犹太人措施的同时，纳粹转而开始骚扰犹太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在柏林，戈培尔热衷于煽动那里的反犹活动。他在1938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在柏林的三百名警察面前训了话。真的要把他们【犹太人】赶走，没有任何心慈手软。合法性已经不再是准绳，而成了烦人的东西。犹太人必须离开柏林，警察会去做的。”¹²所以，柏林的犹太人遭到了纳粹上台之初所没有的攻击。

在其6月讲话的几周前，戈培尔要求柏林警察局长赫尔多夫伯爵提交一揽子加强反犹措施的建议。6月11日，也就是讲话次日，他收到了赫尔多夫给他的建议。虽然这些想法没有得到立即执行，但有很多后来在战争时期被纳粹采用，如强迫犹太人居住在城市隔离区，在衣服上贴上特殊标记等。

除了犹太人、“自私分子”和“逃避工作者”，纳粹还对其他的不同族群采取了措施。首先是“茨冈人”，也就是“吉卜赛人”。这些词语在今日都带有贬义（可以说德语的“茨冈人”比之英语的“吉卜赛人”更甚），但在当时，这些有着深色皮肤，几百年前从印度迁徙到欧洲，并且以流动方式生活的民族都被统称为吉卜赛人。所有迫害他们的法令、折磨他们的集中营，都是以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们的。不管怎样，时至今日，那些被习惯叫作吉卜赛人的民族在多数国家都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术语“辛提—罗姆人”，因为其主体来自名称中的这两个族群。¹³

和犹太人一样，对辛提—罗姆人迫害的历史在纳粹出现很多年前就已存在。16世纪末期，辛提—罗姆人就被指责帮助和煽动土耳其人颠覆神圣罗马帝国。在17世纪至18世纪间，德意志的许多邦都通过了对他们不利的法案：1734年，黑森—达姆施塔特的统治者曾颁布法令禁止辛提—罗姆人进入特定的地区¹⁴；1714年，在美因茨通过的一项法

令中，甚至呼吁杀死辛提—罗姆人。¹⁵他们因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受到诋毁——被说成活得“像狗一样”，还因外貌而被认为“黑暗、肮脏[和]野蛮”。¹⁶

和犹太人一样，辛提—罗姆人被视为得过且过、居无定所的“流浪者”。不过，他们究竟为何受到谴责则从未弄清楚过，是因为他们固有的特质，比如血统，还是因为一些可以改变的社会属性，比如许多人喜欢在乡村游荡而不是把住所固定下来。意大利作家切萨雷·隆布罗索认为辛提—罗姆人天生就具有那些被认为是消极的特质。1902年，他写道，他们具有犯罪的倾向，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罪犯”。¹⁷尽管如此，20世纪初期德国各州通过的反吉卜赛法案大多较为温和，并没有发动全面的种族攻击。1926年7月，巴伐利亚州议会通过一项打击吉卜赛人、流浪汉和逃避工作者的法案¹⁸，其中有条款禁止大篷车不经过警察允许就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

许多在20世纪30年代被纳粹归为吉卜赛家庭的人感到，他们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由于新政权造成的，还应当归咎于几个世纪以来的偏见。“公众一直蔑视辛提—罗姆人，”弗朗茨·罗森巴赫说道，他在奥地利经历过纳粹统治下的生活，“他们一直遭到虐待，一直不被承认，一直被视为二等甚至三等公民。总的来说，我们实际上和他们大部分人没有什么接触。首先，因为他们并不想和我们有任何瓜葛；其次，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不要接近他们，因为他们也不想要我们。这种偏见是基于辛提—罗姆人会偷拐小孩等的说法，我必须说这是不正确的。”¹⁹

赫尔曼·霍伦莱纳来自慕尼黑的辛提家族，他记得在20世纪30年代吉卜赛人所经历的事情：“妈妈送我去学校，但有个老师不喜欢我——我只好站在角落或被赶出去，他还会打我……所以我就辍学了。他还虐待其他辛提人。”学校中对辛提—罗姆人的偏见是普遍的。“在

二年级，一旦得知我们是吉卜赛人，[其他] 小孩们就再也不和我们说话了——我猜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得而知。” 赫尔曼觉得许多德国人会这么看：“如果看到堆狗屎，他们就会说‘吉卜赛！’ [意思是，这是吉卜赛人干的] ——是的，那是德国人的谚语。”²⁰

不过，似乎希特勒并不太关心辛提—罗姆人——在《我的奋斗》中也没有提到他们，纳粹针对他们采取的措施都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并不紧迫的原因是，许多辛提—罗姆人已经在纳粹清理“乞丐”和“危害社会分子”的活动中被抓起来了。《纽伦堡法》中所包含的内容不过是些既定的事实罢了。1935年11月26日，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宣布，在《纽伦堡法》中所禁止的犹太人与“纯种”德国人通婚也适用于吉卜赛人。²¹ 随后，弗里克在1936年1月3日补充说，如果个别吉卜赛人只有“四分之一或更少的外来血统”，那么可以和“雅利安人”结婚。

这项禁令又给纳粹带来巨大的定义问题。从理论上讲，可以用“吉卜赛血统”的百分比来统计，但实际上没有办法实现——原因很简单，计算出一个人拥有多少“吉卜赛血统”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纳粹无法用种族的方式来区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只能采用宗教的定义方法。但这个方法对辛提—罗姆人不适用，因为他们信仰的就是基督教。

在扩大《纽伦堡法》适用性后，纳粹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确定“吉卜赛性”百分比的办法，就像他们之前对“犹太性”的评估一样。为此，1936年初，帝国卫生局在罗伯特·里特尔博士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研究组织，他的团队将着手制作一个庞大的卡片目录，包括德国每一个可能是辛提—罗姆人的人，通过检查每个人的出生和家庭记录、生活方式来决定他是不是吉卜赛人。

希姆莱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次声明，就是从里特尔关于吉卜赛人生活的结论而来，这是一份1938年12月8日散发的题为“打击吉卜赛瘟疫”的传单。该传单指出，“吉卜赛问题”应该被视为一个“种族”问题，要求“定居和非定居的吉卜赛人”都到警察那里去登记。吉卜赛人的生活需要进行“管理”，特别是要防止“进一步的混血”。²²

希姆莱的声明有许多奇怪的地方，其中之一是，“经验表明，混血吉卜赛人在吉卜赛人犯罪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这个奇怪的论断是基于里特尔博士的看法，他认为那些定居下来并与“雅利安”德国人通婚的吉卜赛人，要比过着传统流浪生活、乘着马拉大篷车在乡间旅行的少数“纯种”吉卜赛人更危险。虽然没有可靠的实证证据支持这一命题，里特尔仍然坚持认为对其加以区分是重要的。一些“纯种吉卜赛人”在理论上可以被视为“雅利安人”，因为他们也起源于印度次大陆。但由于大量的吉卜赛人已经与非吉卜赛人通婚，他们的“血液已被污染”，所以特别危险。这种复杂的逻辑导致了很奇怪的情况——正如《打击吉卜赛瘟疫》的传单中所暗示的——对于纳粹国家来说，“混血吉卜赛人”比“纯种吉卜赛人”更成问题。这和犹太人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人的犹太性越多，他就越危险。在现实中，一旦战争开始，对辛提—罗姆人的迫害加剧，区分“纯种”和“非纯种”吉卜赛人就没有实践意义了，但对于洞察施暴者的心态仍然是有价值的。

1938年不仅印发了《打击吉卜赛瘟疫》的传单，政权还用其他方式加强了对吉卜赛人的迫害。在6月的一次针对“逃避工作者”的打击中，有大批辛提—罗姆人被送往集中营——例如，一份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人力报告称登记了二百四十八名吉卜赛人。²³奥地利的辛提—罗姆人也被送往林茨附近新成立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在那里他们被迫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阿道夫·古萨克是一名被纳粹归为吉卜赛人

的奥地利人，他回忆说：“在采石场我们不得不背着沉重的石头，向上爬一百八十级台阶[到营地]。党卫军殴打我们，因此常常有人互相推搡以避免挨打。如果有人倒下，那么就会在脖子后面挨上一枪而完蛋。”²⁴

公众似乎对辛提—罗姆人所遭受的迫害并不关心。1939年1月，奥地利一份警察局报告说，当地人希望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打击吉卜赛瘟疫”，因为这个“民族只会偷窃和欺诈日耳曼人”。²⁵

20世纪30年代末期，纳粹逐渐加大迫害力度的第二个团体，在所有受害者中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受害的原因不像犹太人和辛提—罗姆人是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是因为自己的信仰。这个团体名叫耶和华见证会，其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迫害。正如我们所见，虽然纳粹对大多数基督教派持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但他们完全不能接受耶和华见证会：因为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对于向纳粹敬礼、让孩子参加希特勒青年团、在选举中给纳粹投票，以及加入德国军队这些事一概拒绝。

希特勒掌权后，耶和华见证会打算通过发表一份“事实声明”来澄清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否认他们受到任何犹太金融支持，并声称“英美帝国的犹太商人建立并操控了大企业财团，以此作为剥削和压迫各国人民的一种手段”²⁶。

一位在战争中被捕并在奥斯维辛遭受苦难的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回忆了她入狱前对犹太人的态度。“我从来没有从犹太商店买过东西，”她说，“因为他们总是标出更高的价格，然后他们会给折扣，而愚蠢的人认为自己只要付半价。这是真的，我在但泽见到过。他们会先把价格提高，因为知道人们喜欢杀价——再以某种方式计算价格，这是我的看法，但我并不反对犹太人……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不喜欢犹太人，也不会去一个犹太人的商店买东西。”²⁷

然而，耶和华见证会想说明他们能够与纳粹政权共存的愿望是徒

劳的。正如希特勒和纳粹党看到的那样，耶和华见证会完全是在拒绝遵守新德国所期望的规范，他们的和平主义尤其令人震惊。1933年12月，海德里希说，所有想要传播他们信仰的耶和华见证会成员都是“令人无法想象的狂热分子”²⁸，应当予以逮捕。1933年，达豪的指挥官特奥多尔·艾克用这样的词汇来总结他对宗教的看法：“祈祷书就是给妇人和小孩用的玩意儿。”²⁹

1937年5月，纳粹发布了命令，只要怀疑耶和华见证会成员有不法行为便可以将其送往集中营，他们由此变得岌岌可危。一旦进了集中营，他们往往遭到特别可怕的虐待。在二战后对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看守的审判中，一名在那里工作的建筑工人做证说：“1938年秋天，我正在干泥瓦匠的活，宿舍长佐尔格和布达尔来到现场，命令囚犯们挖一个一人深的坑，然后把一个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巴赫巴放了进去，把土埋到了他的脖子。佐尔格和布达尔笑着戏弄他，当只有他的头露在地面上时，他们就朝他头上小便。然后，他又被继续埋了一小时。当他被挖出来时还活着，但已经站不起来了。”³⁰

后来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的鲁道夫·胡斯被派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做副官，对许多耶和华见证会成员遭受的虐待负有责任。他后来写道，“我一生中曾遇见许多宗教狂热分子”，但萨克森豪森的耶和华见证会成员是“我所从未见过的”。³¹他尤其记得有两个人“几乎是跑向刑场，坚决不要捆绑，因为他们希望向耶和华举起双手。他们欣喜若狂地站在射击靶场的木墙前，似乎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想到的是，第一批基督教殉道者已经出现，他们一直在马戏场上等待野兽把他们撕个粉碎”³²。

根据胡斯的说法，他的老板希姆莱和艾克都对耶和华见证会成员所表现出的对信仰的热忱献身而深感敬佩。“希姆莱和艾克都在多个场

合把耶和華见证会成员的狂热信仰作为榜样。党卫军的所有人必须和他们一样，对民族社会主义理想和阿道夫·希特勒持有同样热烈和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如此，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才能江山永固。”³³

其他囚犯注意到，似乎耶和華见证会成员能比其他人更好地忍耐在集中营所遭受的苦难。艺术史学家以及后来成为心理学家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起初被关在达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被送往布痕瓦尔德。他感到，根据精神病学理论，耶和華见证会成员被认为是极度神经质，甚至有些精神错乱，在危机时刻很容易精神崩溃，但他在集中营里所见并非如此。“他们不仅表现出杰出的道德行为，”战争结束后他写道，“在集中营那样可以迅速把人击垮的环境下，他们似乎可以支撑自己，我的精神科医生朋友和我本人甚至认为他们与周围相处得十分融洽。”³⁴ 奥斯维辛的埃尔泽·阿布特就是如此。“我不害怕，”她说，“因为我认为造物主会帮助我。我们相信上帝会在每一个困难的地方帮助我们。”³⁵

纳粹以越来越激烈的方式去对待那些他们认为是帝国内部敌人的人，也殃及了另一群人——同性恋者。1937年，海因里希·希姆莱在给党卫军领导人的讲话中表明了他对同性恋者的态度，称同性恋者既是“懦夫”又是“骗子”。“不幸的是，我们对付他们并不像祖先那样容易”，他说，因为在以前“同性恋者直接就被淹死在沼泽中……这不是一种惩罚，而仅仅是消除一种不正常的生活。它必须被清除，就像我们拔起带刺的荨麻，堆成一堆烧掉。这不是为了报复，只是那些人不得不离开”。

希姆莱认为，现在处理同性恋问题有着现实的理由，德国有二百万名同性恋者——再加上大战中死去的二百万人——意味着德国“少了约四百万有性能力的男人”，从而“打破”了德国的“性平衡”。希姆莱

说：“在同性恋者中，有人这么想：这是我自己的事，和别人无干。然而，在有关性的方面，任何事都不再是个人的事，它意味着民族的生存和死亡。”³⁶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纳粹经常把他们声称无法容忍的事情和犹太人联系起来，在同性恋问题上更是如此。1930年，在纳粹上台之前，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许诺纳粹将用“驱逐和绞刑”来惩罚那些“心怀恶意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教唆与动物、兄弟姐妹以及同性发生肉体关系，以此妨碍上帝的光辉思想”。³⁷罗森贝格荒谬地宣称，犹太人不仅鼓励同性恋，还鼓励兽交和乱伦。

希特勒对同性恋的态度，至少刚开始并不是那么明确。当他大谈传统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夫妇生育后代的义务时，却容忍了冲锋队头子恩斯特·罗姆大搞同性恋。在冲锋队领导层中经常成为谈资的还有另一位高级头目——副总指挥（相当于中将）海内斯。他对自己的性取向毫不避讳，甚至得到了一个绰号“施密特小姐”³⁸。

最初，当有人向希特勒报告此事时，他选择视而不见。然而，当希特勒在1934年6月准备打击冲锋队势力时，一切都改变了。对他来说，现在批评同性恋是政治上的需要。罗姆在巴德维塞温泉度假村被捕之后——在对面的卧室里，海内斯被发现和一个年轻的冲锋队队员在床上——希特勒随即发表了对冲锋队道德堕落的谴责。³⁹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同性恋行为一直是非法的，不过当局对柏林的同性恋俱乐部时常视而不见。但现在纳粹拒绝任何宽容，1935年，对于他们认为的男性之间的“淫亵行为”，在《德国刑法典》第175款中加入了更为苛刻的限制。此前，法庭仅将鸡奸视为非法——这是很难得到执行的，除非两人当场被抓住——但对“淫亵行为”的新定义，几乎让法庭可以对两人之间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进行惩罚。至于女性同性

恋，虽然没有法律明确禁止女性间的性行为，但政府仍然可以把女同性恋者定义为“自私分子”。

因第175款被定罪的人会被送进普通监狱或集中营，在那里他们可能遭受酷刑，被迫供出另一位同性恋者的姓名。他们甚至会被阉割。法律规定必须要同性恋者同意接受这一严厉的措施，而一旦进了集中营，他们就会遭受无情的压力而被迫同意。⁴⁰在第三帝国时期，共有约一万名同性恋者被送往集中营；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去，有一项调查表明死者可能多达60%。⁴¹

由于纳粹恐怖行动的加剧，20世纪30年代末期还出现了专门的女集中营。第一座女集中营建在萨克森州的利赫滕堡，于1937年12月开始运转。在此之前，女犯人被关押在传统的监狱，或是由普鲁士管理的位于莫林根的一个很小的集中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集中营系统关押的犯人中只有少数是女性，比例不到12%。⁴²但纳粹安全部门似乎正在更多的地方寻找潜在的敌人，被他们盯上的女性越来越多，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1939年春，在柏林北部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拉文斯布吕克女集中营。这座最大的女集中营接纳了来自利赫滕堡的全部犯人，并不断扩大规模。

不过，希特勒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忙于扩大国内的恐怖活动，他的注意力大部分都放在了另一个问题上——战争。

1938年5月30日，希特勒签署命令宣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这是我坚定不移的决心。”⁴³这一行动的无耻借口是，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苏台德地区的德语居民受到了迫害。但实际上纳粹面临的风险很大，在那一年的7月8日，赫尔曼·戈林向工厂主们谈话时透露，德国现在冒着和“法国与英国，还有俄国[和]美

国”开战的危险，并且这是“德国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时刻”。⁴⁴

局势如此紧张，纳粹对帝国内部的敌人加强控制就不令人惊讶了；但政治上的尺度——特别是时机问题——仍然是需要考虑的。1938年6月21日，在一次纳粹党和警察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戈培尔提出了建议，柏林警察局长赫尔多夫伯爵决定不执行之前提出的对柏林犹太人的种种严厉限制。这是纳粹和国际社会关系特别敏感的时期，因为纳粹希望其他国家接收成千上万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这一问题即将在法国日内瓦湖畔的温泉小镇埃维昂莱班的会议上进行讨论。

早在1938年3月德奥合并后，罗斯福总统就提议召开这次跨政府难民委员会会议，但筹备却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此时犹太人的处境比罗斯福提议时更为糟糕。当埃维昂会议的代表住进豪华的皇家饭店时，他们知道对奥地利犹太人的迫害不仅没有让世界各国开放边界，反而有很多国家加强了对移民的控制。

在德奥合并后，荷兰拒绝承认奥地利护照的合法性，卢森堡和比利时在边境加强了安全检查，而英国伦敦外交部也表示，英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高度工业化”并且“人口稠密”，暗示并非大批移民合适的目的地。⁴⁵在1938年3月22日英国议会的辩论中，一位议员警告大批犹太人来到时所要面临的“困难”，警察必须确保“我们的人民得到保护，因为那些家伙可能很容易就会溜进来——毒品商人、白奴贩子和有案底的人”。⁴⁶7月，内政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在一个内阁委员会上说：“反对犹太人进入英国殖民地的情绪……在国内蔓延。”⁴⁷至于瑞士，则实施了严厉的签证限制，以防大批犹太人进入该国，他们甚至拒绝在瑞士国土上举办这次会议。最初会场打算安排在日内瓦，但在瑞士拒绝合作之后搬到了日内瓦湖远处的埃维昂莱班。美国在应对奥地利危机时也没有同意放松移民条例。实际上，当美国人呼吁召开埃维

昂会议时，已经明确说过不会要求任何一个参会国家接纳比现在更多的难民。

罗斯福自己对会议的态度是模糊的。虽然开会是他的主意，但他没有任命政府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而是选择了一个亲密的朋友——美国钢铁公司的前董事长迈伦·C. 泰勒。这甚至都不能算是一次正式帮助犹太人的会议——会议的建议中只是委婉地用了“政治难民”的提法。

尽管很无情，但这一切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虽然罗斯福担心德国犹太人的命运，但他并未准备通过埃维昂会议给予他们什么实际的帮助。美国助理国务卿乔治·斯特劳瑟·梅瑟史密斯在会议前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证明了这一解释。他说，没有几个国家“热心对待这个问题”，他担心代表们只会对帮助“难民”的想法“信口开河”。⁴⁸

尤为重要的是，梅瑟史密斯比罗斯福政府中大多数人都了解纳粹政权的本质。1933年6月，他从美国驻德国柏林大使馆给国务院的威廉·菲利普斯写信，称德国政府正打算“把德国变成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战争机器”，那里“正滋长着一种心态，那就是整个世界都在与德国为敌”，并且“操纵这个政府的人，除了极少数人外，他们的心态是你我无法理解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有通常应该接受治疗的精神病症状”。⁴⁹

因此，虽然罗斯福深知纳粹政权的性质，但他总是小心翼翼，决不尝试过度引导美国的公众舆论。他曾经告诉他的演讲撰稿人塞缪尔·罗森曼：“可怕的是你想领导别人，可回头看却不见一人。”⁵⁰罗斯福知道，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接纳大批难民。⁵¹他并不打算违背选民的意愿，尤其是他在1940年要谋求连任总统。

虽然罗斯福呼吁召开埃维昂会议只是为了把犹太人的命运公之于众，但他仍比自由世界的其他政治家更为同情这个问题。可以把加拿

大总理麦肯齐·金的看法作为一个例子。1938年3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罗斯福请求各个国家和美国一道接收来自德奥的难民时，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浮现出来。简单来说，就是要大规模地接收犹太人。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为解决一个国际问题，却引发了另一个国内问题，那是不值得的。”金承认加拿大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犹太人的避难所，因为“我们地广人稀”，但是“我们必须设法保护这片大陆不出现动荡和大规模的外来混血……我担心如果同意大批接收犹太人会引起骚乱”。⁵²

金很了解德国，他于20世纪初期曾在柏林读书。1937年6月29日，当他会见希特勒时，他告诉希特勒，自己目睹了政权的建设性工作。此外，他“希望这项工作可以继续下去，它是不容破坏的。它必然为其他国家所效法，使人类获得巨大的利益”。金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真正热爱同胞和国家的人，会为他们的利益做出任何牺牲。他自认为是一个解救人民于水火的使者”。金尤其对希特勒的眼睛印象深刻：“它们炯炯有神，表现出敏锐的感知和深刻的同情。”⁵³从他的日记来看，在会见时没有提到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没有提及集中营、压制人权和破坏民主。

次日，金会见了德国外交部长诺伊拉特，诺伊拉特说他“肯定会讨厌和犹太人一起住在柏林”，接着说犹太人已经控制了德国的商业和金融，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打击。⁵⁴金似乎对这些反犹主义言论没有任何反对，相反，他和诺伊拉特继续共进午餐，并称“这是我所参加过的最为惬意的一次餐会”。

尽管如此，对于世界犹太人大会来说，埃维昂会议仍然是“成千上万遭到野蛮迫害，从世代居住的家园被驱逐的犹太人的唯一希望”，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拉比史蒂芬·怀斯送给会议代表一份备忘录，不仅请求国际社会在未来几年向至少二十万名到三十万名德奥犹太人提供

避难所，还提出了另外两个争议更多的问题。第一个是，希望会议应“尽一切可能”说服德国政府允许犹太人原封不动地带走部分财产。第二个是，会议应当接受“讨论犹太难民问题不能避而不谈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避难所的巨大可能性。大多数犹太人很早以前就认识到，只有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才可以恢复离散的犹太社区的正常结构”。⁵⁵

埃维昂会议的代表们绝不可能接受世界犹太人大会的请求。尤其是英国，并不打算在目前宣布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多于犹太人的现状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他们并不准备在埃维昂会议上讨论任何巴勒斯坦事项。外交部担心，帮助“难民”离开德国的努力可能会导致其他东欧国家用相同的手段来驱逐他们的“难民”（大家当然知道“难民”就是犹太人）。根据这种逻辑，外交部官员认为，帮助德奥犹太人“可能反而会使难民问题更为恶化”。⁵⁶

这种担心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20世纪30年代都制定了反犹太人的法律，在波兰大约有三百万名犹太人——是德奥加起来五倍——在埃维昂会议开幕时，他们都生活在种种限制之下。例如在1936年8月，所有波兰商店都必须在标牌上写明业主的姓名，显然哪家商店是犹太人的就一清二楚。次年，犹太人被禁止行医，从事律师行业也受到限制。1938年3月，新的公民法颁布，生活在国外五年以上并且没有和波兰保持“联系”的人都将撤销波兰国籍，这一法令在1938年10月30日生效，这对生活在各地的波兰犹太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⁵⁷

波兰政府也在考虑驱逐犹太人。1937年初，波兰就和法国讨论了向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岛遣送大批犹太人的可能性。马达加斯加岛是法国的殖民地，把那里作为犹太人定居点的想法是由反犹作家保罗·德·拉加德在19世纪提出的，而现在波兰政府准备将它付诸实

现。1937年5月，波兰官员梅切斯洛·勒佩奇率领一支波兰—法国联合派遣队前往马达加斯加岛，以评估这一计划的可能性。但在岛上度过几个月后，勒佩奇和他的团队认为，这里最多只能容纳六万人——对于波兰的三百万名犹太人来说真是杯水车薪。⁵⁸所以，这个荒谬的想法被搁置了——我们后面将会看到，三年以后，纳粹重新拾起了这个计划。

波兰的马达加斯加岛方案对埃维昂会议的代表们是一个重要的警醒，反犹主义并非第三帝国的专利。20世纪30年代欧洲其他国家迫害和清除犹太人的想法在今天的公众记忆中被遗忘了，因为它们与后来纳粹大屠杀的规模和残酷性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埃维昂会议于1938年7月6日开始。美国代表团团长迈伦·泰勒的致辞为整个会议定下了调子，他承认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拒绝在现有每年入境二万七千名犹太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数量。然后，其余的代表团一个接着一个照着同样的脚本发言，他们都对目前的状况感到遗憾，却由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无能为力——高失业率，种族骚乱的担心，更需要农业工人而非从事“文书”工作的人，等等。

只有多米尼加共和国提出愿意接收大量的德奥“难民”，但这很可能是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的宣传噱头。他去年发动了对海地人的大屠杀，死者达两万人，在国际上声名狼藉。最终，去往多米尼加的犹太人寥寥无几，特鲁希略的慷慨许诺成了一纸空言。

后来的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尔亲身经历了埃维昂会议的伪善和夸夸其谈。她写道，自己感到“悲哀、愤怒、沮丧和恐惧”，想朝着那些代表“大喊”，那些纸面上的“数字”都是“活生生的人。如果你们不接纳他们，他们不是在集中营度过余生，就是像孤魂野鬼般在世上游荡”。⁵⁹

1938年7月15日，埃维昂会议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迈伦·泰勒

宣布，经过多次的演讲和讨论，会议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成果——成立了一个“德国政治难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对于当代人类最可怕的危机之一来说，这样的回应真是可怜。

然而，也必须承认，埃维昂会议的代表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处境。正如前述，即便各国政府愿意就每个国家能接受的增加接收难民数量的可能性展开真正的讨论，东欧的一些国家可能会就输出犹太人提出同样的讨论要求。现在各国连接纳几十万名德奥犹太人都疲于应付，再接纳几百万人又有多少可能性呢？同样，如果会议代表认为由于德奥犹太人遭到残酷的迫害，所以应予特别照顾，那会不会让那些东欧国家感到，因为国际社会只接受遭到残酷迫害的犹太人，因此加剧本国的迫害行动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讨论巴勒斯坦的地位问题，埃维昂会议几乎不可能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不仅世界犹太人大会认为“一个犹太国家”可以解决问题，波兰政府也支持让大量犹太人去往巴勒斯坦。⁶⁰在这个方面，英国当局应当为不允许讨论“令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移民出路的巨大可能性”承担罪责。不过，这大概是因为到了埃维昂会议前夕，英国觉得巴勒斯坦麻烦已经太多，不能再给那里的混乱局势增加新的冲突可能。1937年，英国皇家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建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进行分治，这引起了阿拉伯人的骚乱。1939年5月，在骚乱最终平息之后，英国拒绝了巴勒斯坦分治的主张，并宣布不会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犹太人去往巴勒斯坦的移民受到严格限制，很多人猜测是为了保证当地阿拉伯人占多数。对于成千上万想要逃离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来说，这无疑是个灾难性的消息。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言犹在耳，这完全是背信弃义的行为。温斯顿·丘吉尔也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称这个决定是一种“可悲的违约行为”⁶¹。此外，英国政府很明显在安抚阿拉伯人，他们的土地上有英国的战略利益，例如苏伊士运河，犹太人在地缘政治上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正如1939年4月20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一次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内阁委员会会议上说，英国应该“让穆斯林世界站到我们这一边”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如果我们必须得罪一方，那就让我们得罪犹太人而非阿拉伯人”。⁶²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再一次战胜了慈悲为怀的人道主义。

有一些官员甚至在拒绝犹太人请求时还表现出了自己的反犹主义。1938年10月，加拿大移民局局长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布莱尔在备忘录中写道，尽管欧洲的犹太人面临“灭绝”⁶³的危险，但还是不能允许他们大批进入加拿大。早些时候，他在一封写于埃维昂会议后的信中说，这对于犹太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他们就会扪心自问，“为何他们到处不受欢迎”。⁶⁴

埃维昂会议代表们甚至做不到共同谴责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可能有人担心，一旦说出来会让德国犹太人的情况变得更糟。威廉·夏伊勒写道，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似乎并不打算得罪希特勒”。夏伊勒觉得，“他们竟然想安抚造成这一问题的人”，“情形十分荒谬”。⁶⁵

纳粹政权对埃维昂会议成果的评价再犀利不过了。7月13日，《人民观察家报》的头条标题是“没人想要他们”，副标题是“埃维昂犹太会议毫无成果的争论”。⁶⁶1938年9月，希特勒在纽伦堡的演讲中嘲笑“民主帝国”的“伪善”行为。他说，德国因对犹太人“难以想象的迫害”而受到批评，但声言这一迫害的民主国家却拒绝接纳犹太人，称“很遗憾没有空间”来接纳他们。

希特勒表达了他不愿意让犹太人继续待下去的看法——他称犹太人为“这些寄生虫”——理由是人口密度问题。他称德国每平方公

里有一百四十人，而“民主世界的帝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却“少得可怜”。⁶⁷

希特勒在说这些话的同时，已在计划用军事行动为德国获取更多的空间：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就是他十三年前在《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苏联西部地区。他政治生命中的两大执着——对犹太人的种族仇恨和为德国夺得更多土地——交织在了一起。对于希特勒来说，如果那块土地上仍旧住着大批犹太人，那么德国夺取它就没有意义了，而波兰和苏联西部的情况恰恰如此。1938年9月，战争爆发前一年的这次演讲的潜台词，再次预示了降临到数百万犹太人身上的悲惨命运。

当月，希特勒会见了波兰驻德国柏林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在双方一次公开的会谈中，他们谈到了埃维昂会议之后的“犹太人问题”，以及波兰在马达加斯加岛方案上的失败。利普斯基在笔记本上写道：“希特勒心目中有一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那就是向殖民地移民，这和波兰、匈牙利也许还有罗马尼亚的想法是一致的。”在听到这些话后，利普斯基对希特勒说：“如果他能找到这样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将为他在华沙竖立一座漂亮的纪念碑。”⁶⁸

就在希特勒向波兰大使大谈把犹太人送往“殖民地”时，英国正在努力和他达成事关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外交协议。英国政府似乎相信希特勒不想要战争，他是真的关心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居民。1938年9月末，为了解决争端，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慕尼黑会议上同意了德国军队占领德语居民占多数的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可耻的是，捷克人在会议上竟不能发言。英国希望通过这样的绥靖政策来避免战争。

然而，麻烦在于，张伯伦并不明白希特勒在本质上并非传统的政治家，会像所有明智的领导者那样去避免危险的军事冲突。德国外交官

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试图向柏林的英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解释现实的情况。“我再次向亨德森说，这并不是在下一盘棋，而是海平面在上升，不可按照平时普通人的习惯进行假设。”⁶⁹魏茨泽克关于“海平面在上升”的隐喻不仅形象而且精确——至少对于德国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即将遭遇灭顶之灾。

由于战争将在大部分犹太人被赶出德国前爆发，因此在不久的将来，纳粹的犹太人计划可能会被打乱。对于希特勒和纳粹党中的坚定反犹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他们认为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战线后方的叛徒，他们在另一场战争中也会做同样的事。帝国保安部犹太部门的负责人赫伯特·哈根提出了一个实际的对策。他在1938年9月写了一份备忘录，题为“在动员时的部门行动方案”，建议在军队实行动员时逮捕所有外国犹太人，并把所有其他犹太人集中在“特殊营地”强迫进行军火生产。哈根还建议，一些犹太人可能应接受“特殊待遇”，在备忘录中还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这句话的本意可能仅仅意味着一些犹太人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被密切关注，但也有可能是指安全部队认为有必要杀死一些人，因为“特殊待遇”随后成了“灭绝”的委婉代名词。⁷⁰

对于希特勒来说，他对世界犹太人阴谋的执着并未因埃维昂会议的失败而有所削弱。1938年10月9日，他在萨尔布吕肯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知道幕后浮现的是国际犹太魔鬼的险恶身影……一如往昔。”⁷¹现在他决定，如果外国不打算主动带走德国犹太人，纳粹就要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扔到外国大门的台阶上。10月28日，纳粹集中了大约1.7万名居住在德国的波兰犹太人，把他们带到了波兰边境，并试图把他们驱赶进波兰领土。

这一野蛮行动是受到当年早些时候波兰通过的那部法律的影响，

该法律威胁1938年10月30日后剥夺居住在国外的波兰人的公民权。纳粹试图在新法令最后期限前的两天内把波兰犹太人赶过边境。这些犹太人的处境——无论德国还是波兰都不想要他们——十分糟糕。约瑟夫·布罗尼亚托夫斯基被从德累斯顿西部的普劳恩带到波兰边境，他回忆说，“上千名犹太人最后来到一片草场，[在涉过一条涨满水的河沟后]穿着腰以下湿透的衣服穿过田野。当我们接近一个波兰村庄时，一些波兰士兵过来把我们赶回德国边境，殴打和枪击一直没有停过”，在夜里“很多老人和孩子死了”。他们最终被赶到另一段边境，得以进入波兰。“苦难真是可怕，当我们被赶进一个村子时，那里的矿工们在看到这一切苦难和不幸时流下了眼泪，他们都是天主教徒。”⁷²

森德尔和莉娃·格林斯潘是另外两个被带到边境的犹太人。森德尔曾在汉诺威开一家小裁缝店，由于纳粹的反犹法令，他的生意已经很困难。他回忆说，1938年10月，盖世太保来了，并“把我们带上警用卡车，然后又关进囚车，大约二十人一车，开往火车站。街上黑压压的都是人，他们大声叫着：‘犹太人滚蛋！滚去巴勒斯坦！’”⁷³

1936年，他们的儿子赫舍尔十五岁，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已经迁到了法国，但他仍然爱着他的母亲和父亲。在巴黎，他始终冒着被驱逐的风险挣扎求生。当他听到父母的遭遇之后，决定向纳粹报仇。1938年11月7日星期一，他行刺了德国驻法国巴黎大使馆的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拉特在两天后死去。这一天是11月9日，恰巧是纳粹党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慕尼黑啤酒馆政变的纪念日。

戈培尔和其他所有纳粹领导层一起，在慕尼黑参加纪念活动。他对冯·拉特的遇刺津津乐道，因为这给攻击犹太人提供了新的借口。“[11月9日]下午收到了外交官冯·拉特的死讯，”他在日记中写道，“好，现在就好办了。”几小时后，戈培尔在慕尼黑老市政厅的招待会上

面见了希特勒，“我向元首报告了整件事。他决定，放任[反对犹太人的]示威游行继续下去。撤走警察，让犹太人亲身感受一下人民的愤怒。说得没错，我立即向警察和纳粹党发出了适当的指示。然后，我简短地向纳粹党的领导人进行了传达。掌声热烈，每个人都冲向电话机。现在人民要采取行动了”⁷⁴。

戈培尔的日记是虚伪的。犹太人将要经历的不是“人民的愤怒”，而是冲锋队的愤怒。11月9日夜至11月10日凌晨，犹太人的商店和住宅被打砸，犹太教堂被烧毁，犹太人遭到了殴打、逮捕甚至杀害。没有统计多少犹太人死于那天晚上——不过肯定超过九十人，大约三万名犹太人逮捕并被送往集中营。

十八岁的鲁迪·班贝尔在纽伦堡领教了这场袭击，他家的前门被撞开了。当晚冲锋队两次光临他家。第一次仅限于破坏房屋，第二次开始攻击居民。一名同住的老妪被拖出来殴打，然后冲锋队看到了鲁迪并开始揍他，最后他被带到外面，由警卫看着。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冲锋队放他走了。他回到家，发现“家里一片狼藉……第二批[冲锋队]砸裂了管道，水漫过了地板。我到处寻找主阀门来关闭水管，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地方——这里好像受到了空袭，你知道的，到处都是东西，破碎的玻璃、家具、瓷器，满地都是”⁷⁵。

他在楼上找到了他的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冲锋队杀死了他。“我完全蒙了，根本无法理解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因为我们之前过的是普通、正常的生活——‘正常’得加个引号——但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和难以置信的……我真的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发生。以前我当然也听说过集中营，有人已经去了达豪和布痕瓦尔德，但这不一样。这是完全没有必要和毫无道理的暴力。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他们对我个人没有怨恨——他们只是来做他们认为应

该做的事……完全是愚蠢和毫无意义的。”

鲁迪·班贝尔很难接受他父亲被杀的现实，但令他尤为吃惊的是自己身处的德国所出现的矛盾现象。11月10日凌晨的袭击是随意和出乎意料的——然而冲锋队的行动是在国家的保护之下发动的。隔天早上，警察封锁了大楼，好像这是一个犯罪现场似的。他们也阻止抢劫，抢劫仍然被认为是非法的。几天后，鲁迪去了盖世太保的办公室，询问他的家人是否可以揭开封条回到家里。“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奇怪，”他说，“去盖世太保那里竟然没有恐惧感，不知为什么，这个体制中似乎有某种合法性……那是一个我现在无法理解的时期。”

鲁迪·班贝尔感到痛苦的原因之一是，“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愤怒”，因为“如果真的把愤怒发泄出来，那我们可能会更倒霉……但我难以以一种冷静或理智的态度来面对此事。我想纳粹宣传和统治的大环境已经压迫我和其他犹太人忍受了很多东西，直到被驱赶和送进集中营时才明白过来。现在回想起来，简直难以置信我是怎么应对这一切的——或者可以说是什么也没做——没有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显然会有有的回应。但我认为是整个体制的力量在用某种方式压迫我，阻止我用正常的方式来应对”。

在德国，袭击犹太教堂和亵渎犹太《圣经》，即便在纳粹看来也是一种极为堕落的行为。在柏林，贡特尔·鲁辛看到他父亲担任领唱的犹太教堂遭到了破坏：“我去那里见到了我们最神圣的物品，那上面有污秽，非常可怕。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哭泣。”⁷⁶

对于鲁迪·班贝尔来说，没有其他德国人的关心令他们更为痛苦。他记得他的家人从未得到过非犹太人的安慰，大多数人对他们残破的房子视而不见，有“一两个人”还向房屋扔石头。同样，埃森的海因茨·拿骚报道说，当城里的犹太青年中心起火时，一名护士问消防队

员，犹太管理员和他的家人是否还在里面，她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可以安静地死去！毕竟这样可以离冯·拉特远点。离开这里，否则我们连你一起揍。”⁷⁷

在德国其他地方，民众的反应不尽相同。一份警察局的报告称“民众意见对此有分歧”，大部分人认为“所有这些破坏都是没有必要的”。⁷⁸来自巴伐利亚的另一份犹太亲历者报告说：“慕尼黑的基督教居民完全反对这次行动，我看到了来自各方最真切的安慰和同情……一位来自上流社会的完全不知名的雅利安女士对我的妻子说，‘夫人，我为自己是一名德国人而感到羞耻’。另一位不知名的女士送来一瓶葡萄酒。”⁷⁹

这场暴行后来被称为“水晶之夜”——德国人对它态度的分歧也反映在汉堡的乌韦·斯托约翰的父母身上。尽管乌韦的父亲是一名“反犹主义者”，但他对“水晶之夜”“确实很生气”，因为犹太人的“圣殿”遭到了“褻渎”。而他的母亲对此并不在意。在袭击发生后，他们的犹太邻居搬走了。两天后，“一辆运货车来了，汉堡的一名冲锋队高级领导人搬进了他们的公寓”，她很高兴。乌韦记得他的母亲“认为冲锋队领袖住到这儿来棒极了，他非常善于交际，装出和人们很亲近的样子”。⁸⁰

对于上千名在“水晶之夜”后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来说，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一个犹太人写下了他亲眼所见的事：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指挥官脱掉手套，反复殴打一名囚犯，叫他“肮脏的犹太猪”。作者还被强迫观看对试图逃跑的囚犯的惩罚：“有嫌疑的人被绑在鞭刑桌上，两名自告奋勇的冲锋队队员用一根粗牛皮鞭打他……受刑者必须自己大声数到二十五，除非中途失去知觉。即便如此，那些暴徒也不会停止施虐。一旦室长报告受刑者苏醒，马上再打另外二十五鞭。”⁸¹

党卫军的报纸《黑色军团》在“水晶之夜”的几个月前就已经越来越激进，在这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这是必要的，”1938年11

月24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因为我们不想再听外国的吵嚷，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我们要给犹太人问题一个根本解决，计划是清楚的，那就是：彻底驱逐，彻底决裂！”⁸²

另一篇发表于11月7日的文章说：“只要有一个犹太人或是被他们灌输了仇恨而受雇的同伙对一个德国人下了毒手，那么全体犹太人就会遭到应有的报应！对德国人的伤亡负责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们所有人。那些在我们第一次客气的警告前还不明白的人，现在应该明白了……只有一种权力，我们的权力，我们的自卫权，行使的时间和方式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⁸³《黑色军团》后面的文章发出了更为明确的威胁：“犹太人或他们雇来的凶手向一位德国领导人举起了屠刀，从这一天起，德国的犹太人就不会再增多了！希望我们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⁸⁴

党卫军的报纸在这段时间还发出了两个声明，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些死硬分子的心态很有帮助。第一个是，虽然党卫军认为反犹主义并不新鲜——事实上它“在数千年来所有健康的人群和民族中涌动”——但他们相信只有纳粹党决心采取“尽管无情，但有效和实用的”措施。⁸⁵第二个是，党卫军宣称纳粹被迫采取行动反对犹太人，是因为国际社会没能帮助他们离开，所以他们视民主社会的批评家们为伪君子。“无论是罗斯福先生、英国大主教还是其他哪个著名的民主人士，都不会把他们的女儿送上肮脏的东欧犹太人的床；而一旦说到德国，他们就马上回避犹太人问题，只谈‘由于信仰而迫害无辜的人’，好像我们对犹太人的信仰感兴趣似的。”⁸⁶所以说，在战争爆发前，党卫军就宣布他们可以开展对犹太人的暴力行动了，原因有两个：首先，世界上所有“健康”的人都认同反犹主义，但只有纳粹足够强硬，能对犹太人采取必要的措施；其次，如果一定要攻击犹太人，这不是党卫军的错，

而是因为其他国家不再向犹太人提供庇护所。

当《黑色军团》在“水晶之夜”后大谈这些观点的同时，集中营的党卫军正在殴打、鞭笞或用其他方式折磨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这一切告诉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年前，党卫军就已经做好了对犹太人采取激进行动的准备。

国际社会对于“水晶之夜”的反应自然是一片谴责。但和埃维昂会议一样，大多数国家的同情是光说不做。罗斯福的确允许一万两千名持有美国短期签证的德奥犹太人延长逗留时间，但在国会，一个允许增加两万名儿童进入美国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罗斯福没有发表支持演说，提案胎死腹中。

只有在英国，那里接收的难民人数有大幅的增长。在德奥合并以及“水晶之夜”后，限制逐渐放宽，大战爆发前，有五万名犹太人得以从德占区进入英国。⁸⁷ 大约有九千名儿童通过后来被称为“爱心输送”的行动去往英国。鲁迪·班贝尔和他的妹妹就是在战争前夕获得英国签证中的两人。鲁迪记得必须要为移民“做大量的计划”，“每一件衣服——我带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列入表格并由当局批准”。到最后审批的时候，他还必须要出现在法庭上。“有纳粹官员、军官、盖世太保和警察环坐……这很荒唐，一般负责掌管这类事务的人会说，‘哦，你干农活，你去殖民地是为了在那里的农场干活吧’。我说，‘哦，是的’，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说‘是的’……没人会提到‘犹太人’这个词。”⁸⁸

在“水晶之夜”后，所有人都明白希特勒不是一个想要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平交往的正常政治家。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一帮疯子”已经“完全控制”了德国。他认为“[英国政府]当下刻不容缓的目标是改变自身颓废、懦弱、无足轻重的形象”。⁸⁹

尽管戈培尔在日记中曾明确表示，德国领导人批准了反对犹太人的行动，但希特勒在“水晶之夜”后公开或私下的谈话都没有记录保存下来。几乎可以肯定，希特勒不想和暴行扯上关系。他重视自己作为国家首脑的威望，不希望外国领导人追究他个人的责任。一旦德国国内对暴行有不满声音，他的沉默使他保留了谴责纳粹党内极端分子的机会。当时还是一名年轻外交官的曼弗雷德·冯·施罗德记得，有许多人认为“水晶之夜”是“激进的纳粹和冲锋队队员”干的，并未“经过希特勒的同意”。⁹⁰只要看看希特勒在“水晶之夜”的表现，就不会对他在战争期间采用同样的手段感到奇怪，他也从不在公众面前明确提及第三帝国的安全部队正在屠杀犹太人。

1938年11月12日，赫尔曼·戈林在柏林的航空部召开会议，讨论“水晶之夜”后的局势。这是纳粹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少数高级别会议之一，留下了许多会议的速记内容，价值很高。⁹¹首先是暴露了纳粹高层从未认真想过行动的后果，他们直接给自己制造了麻烦——犹太人得以向德国保险公司索赔财产损失，而那些保险公司大多是非犹太人开的；大量打碎的玻璃只能通过国外来重新购买，这样在外汇市场浪费了许多钱。戈林说，“烧毁一个犹太仓库，然后再让一个德国保险公司来赔偿，这真是发疯了”，他宁愿有“二百个犹太人”被杀，也不愿意造成这么多财产损失。

会议还讨论了对犹太人的进一步限制措施。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认为，应该强制犹太人穿上“有特定徽章”的衣服，作用之一是可以避免外国犹太人因为“长相和我们的一样”而“遭到羞辱”，反过来也可以避免外国政府抱怨自己的公民在德国遭到虐待。戈林指出，这一行动再加上对犹太商业的进一步没收和对犹太人活动自由的限制，将

会“在所有城市形成大规模的犹太人居住区”。但海德里希对此并不赞同：“我们无法控制一个犹太人居住区，犹太人可以在整个犹太民族的簇拥中聚集起来，那里将成为犯罪、瘟疫以及诸如此类的永久藏身之所。我们不打算让犹太人和德国人同住一栋房子；但今天，住在公寓或房屋里的德国人会迫使犹太人守规矩。把犹太人置于全民警惕的眼睛之下来加以控制，总比监控一个地区成千上万同样的人要来得好，在那里我没法用穿制服的人来监控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次意见交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未来这两项措施——让犹太人佩戴“徽章”和建立犹太人居住区——一年多后在被占领的东方地区都得到了实行。

这份会议记录也显示出，这些纳粹领导人物之间的辩论是多么古怪。任何想法，无论有多么过分和荒诞，都可以被拿到台面上讨论。戈培尔建议说，“我们应该借此机会拆掉犹太教堂”，以其他建筑或是“停车场”取而代之。他们还讨论了强迫犹太人乘火车时进入特别隔间的问题，但戈培尔说这行不通，“假如火车上只有两个犹太人，而其他隔间却很拥挤，这两个犹太人岂不是独享一个隔间”。戈林反驳说：“我会给犹太人一个车厢或隔间。如果你提到的火车拥挤不堪的情况发生了，相信我，那时就不需要什么法律了。我们会把他踢出去，他一路上都会独自待在厕所里！”

戈培尔建议他们应考虑禁止犹太人进入德国的森林，因为“犹太人的行为是如此富于挑衅和刺激性”，“他们成群地”在柏林郊外的格鲁内瓦尔德森林乱跑。戈林附议戈培尔的意见，并提出了自己奇谈怪论，认为犹太人应当被禁止进入大部分森林，但可以给他们保留一块地方。这片森林可以放养“长相”和犹太人相似的动物——戈林建议养麋鹿，因为它“也有那么一个弯弯的鼻子”。

戈林关于麋鹿的评论，反映了那些参加11月12日会议的人的态

度。对于他们，已经毫无道德约束可言。如果有可能的话，把犹太人送上月球的计划也能被提出来。这些纳粹领导人知道希特勒喜欢听激进的想法，因此他们会感到兴奋，天马行空般展开幻想。

在会议结束时，戈林和他的同事们讨论了一系列反犹的新措施，包括没收——或称“雅利安化”——犹太人的企业，在德国推行类似于艾希曼在奥地利创立的移民办法，以及——纯粹是自欺欺人——让犹太人支付巨款，作为对他们造成“水晶之夜”的赔偿，因为冯·拉特是被犹太人杀死的。最后，戈林总结了仍然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将要面临的处境：“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德国要和外国发生冲突，那么不用说，我们在德国首先要和犹太人来个大摊牌。”⁹²

至于希特勒，他的话现在听上去就像末日预言。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六周年纪念日，他在国会发表演讲，对犹太人进行了明确的威胁。在超过两个半小时的演讲中，他宣称德国只想和其他国家和平相处，但“国际犹太人”在“渴望复仇”。而且，“就在此时此刻，犹太人仍在某些国家宣扬他们的仇恨运动，铺天盖地的新闻、电影、广播、戏剧、文学作品，都在他们的手里”。尤为恶劣的是，希特勒还说，如果欧洲等国的“国际”犹太金融家成功地“把人类拖进另一场世界大战，那么结果将不会是全球布尔什维克化和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的彻底灭亡”。⁹³

这当然是对犹太人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希特勒究竟是何用意呢？倘若发生战争，他的意思是一定要杀死犹太人吗？这很难说，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他在说这番话时头脑中有一个详细的灭绝计划。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希特勒的“消灭”指的是“排除”，因此“解决”纳粹的犹太人“问题”，另一种可能的办法仍是把他们从欧洲大陆强行驱逐出去。希特勒先前的讲话为这种解释提供了论据。他谴责“整个

民主世界”的“无所作为”和拒绝接纳犹太移民，这些国家“对饱受痛苦的贫穷犹太人充满同情的泪水，却依然保持着铁石心肠”。正因如此，希特勒保证德国一定会“驱逐这些人”——也就是犹太人。

1939年1月16日，也就是希特勒“末日预言”演讲的前两周，他会见了匈牙利外交部长伊斯特凡·萨基，通过这次谈话可以进一步弄清他的想法。萨基不是犹太人的朋友，他所在的政府已经在推行反犹太法案。希特勒告诉萨基，“犹太人必将从德国消失，一个人也不留”⁹⁴。他还说，“犹太人问题不只是在德国”存在，他会支持任何一个反犹的国家。从他使用“消失”一词的上下文来看，希特勒的意思是“驱逐”而非“消灭”。

希特勒在1938年1月21日的讲话，还可以为这种解读提供更多的论据。在和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弗兰蒂谢克·查瓦尔科夫斯基的会谈中，他说，德国为“1918年11月9日”的复仇将“摧毁在德国的”犹太人，对于各国来说，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世界上随便哪里”挑一个地方，把“犹太人送到那儿去”。可以告诉那些“充满人性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他们就在这里；他们要么饿死，要么你们就把那些演说付诸实践[言下之意就是照顾他们]”。⁹⁵

尽管总的来说，希特勒的预言不大可能表明他已经准备好为了将来的“世界大战”而拟定了杀死犹太人的详细计划，但在他的头脑中，把犹太人的命运和任何未来的冲突联系起来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如果德国卷入战争，犹太人会遇到可怕的情形——这是他1939年1月30日讲话时的保证。至于是什么可怕的情形——强制驱逐或是更糟糕的——则尚未决定。

与此同时，希特勒对他的欧洲邻国进一步施加了压力。在《慕尼黑协定》之后获得了更大自主权的斯洛伐克，被迫宣布从捷克完全独

立出去。戈林在和斯洛伐克代表会面时，表现了其典型的粗鲁。“你们想获得独立吗？”他说，“[或者应该让]我把你们交给匈牙利？”⁹⁶1939年3月，斯洛伐克人按照要求脱离了捷克。总统约瑟夫·蒂索是一名天主教牧师，在其领导下的新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反犹措施。例如，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他们通过了《63/39号法令》，禁止犹太人从事许多行业，目的是确保犹太人被“排除”在“国民生活”之外。⁹⁷“我们的生活完全乱套了。”琳达·布莱德说。她是一名斯洛伐克的正统犹太人，当时十四岁。琳达“被踢出学校”，爸爸失业了。她深感震惊，因为之前“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鸡犬相闻的邻居”。⁹⁸奥托·普雷斯布格尔也是一名斯洛伐克犹太人，1939年时十七岁，他证实，“过去犹太人和基督教青年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斯洛伐克独立后，“我被送回家，他们告诉我再也不能上学了。我们哪儿也不能去，只好待在家里。先前我们经常去和女孩跳舞——不只是犹太女孩——就像今天的迪斯科。然而现在挂出了牌子：‘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⁹⁹

一俟东部的斯洛伐克与捷克分离，希特勒就命令德军开进剩余的捷克领土，一个小时不到就完成了占领。1939年3月16日，希特勒前往布拉格，宣布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超过十一万名犹太人现在被置于德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很快就受到一系列反犹措施的迫害，包括对犹太商业的“雅利安化”。

希特勒的狼子野心现在昭然若揭。对捷克的占领是无法用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失去的德语领土来解释的。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恐怕已经走到十字路口。我总是说，只要希特勒还在假装把日耳曼人团结到他的帝国，我们也就姑且认为他说得对。但如果他开始吞并其他民族，那么是时候喊一声‘住手！’了。”¹⁰⁰

英国现在愿为波兰、希腊、罗马尼亚提供担保，以应对未来纳粹可能的入侵。罗斯福意识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严重性，决定给希特勒写一封信。1939年4月15日，他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他已要求希特勒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他试图寻求希特勒的“保证”，即德国武装部队将不会“攻击或入侵”三十多个不同国家的“领土和属地”，从芬兰到南斯拉夫，从荷兰到葡萄牙，从瑞典到伊朗。¹⁰¹

罗斯福的信成了希特勒的宣传工具。毕竟，美国总统有什么权力要求德国领导人公开保证不使用军队入侵西班牙或瑞士？4月28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讲时对罗斯福的信大肆嘲讽。他指出，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加入了把讨厌的“凡尔赛命令”强加给德国人民的行列，因此现在不配谈“高呼人类的力量和友谊”——尤其是连国联美国人也不愿意支持。但最让罗斯福尴尬的是，希特勒指出，一些在那张名单上的国家，比如叙利亚，“现在并不拥有自由，因为他们的土地被民主国家的军队占领了，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再如爱尔兰，它所认为的威胁不是德国，而是“英格兰”；还有，看来“罗斯福先生已经意识到，占领巴勒斯坦的不是德国军队，而是英国”。¹⁰²

这标志着希特勒已经毁掉了和美国仅剩的外交桥梁。他在演讲中多次提到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意思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很明显——美国人可能会在欧洲未来的战争中做同样的事。由于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在美国有着深刻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后面将会看到，1941年12月，即美国参战的那个月，成了大屠杀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节点，这并不是巧合。

美国人在未来的战争中可能成为对手，这一点并未妨碍希特勒挑起战争的决心。他知道，如果欧洲战争不加拖延立刻开始，那么德国军队将有机会占领足够多的土地，并在美国决定参战之前赢得战争，这

完全是个时间问题。正如他在1939年8月对将军们所说的那样，“所有这些有利的环境将在两年到三年后不复存在……一个长时间的和平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¹⁰³，现在必须“放下你的同情心”去“狠狠地干”。这才是真正的希特勒的观点。

希特勒要把德国带向战争，但这并不是他曾经计划过的战争。数年前，他还把英国当成一个盟友而非敌人。最近，他也曾希望波兰与纳粹合作，加入德国对苏联的战争，然而现在波兰人也反对他。为了让德国短期内避免树敌过多，他派里宾特洛甫到苏联去，和他在意识形态上最大的敌人斯大林签署一份互不侵犯条约。当希特勒不得不暂时忍耐侵略苏联的渴望时，他的另一项渴望——对犹太人的彻底清算——就可以立即开始了。

8. 种族战争的开始(1939—1940)

德国军队于1939年9月1日星期五入侵波兰,开始了一段恐怖的统治,波兰成为大屠杀的中心。德国人会在波兰土地上建造他们最臭名昭著的灭绝营,而波兰在战争中所遭受的人口损失将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得多。多达六百万名生活在波兰的人——至少有一半是犹太人——失去了生命。这些人绝大多数不是死于战争,而是由于蓄意造成的饥饿、驱逐和屠杀。

德国人用了不到六周就击败波兰军队。这种胜利可以说是由于其优越的军备和战术而取得的,但德国人也得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援助——来自他们意识形态上的敌人。9月17日,在德国人从西面侵入波兰两个多星期后,苏联红军从东面入侵波兰,结果波兰军队被强大的对手们毫无悬念地碾碎了。

在莫斯科,德国和苏联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扔到一边,在同志般的气氛中讨论对波兰的瓜分。9月27日,里宾特洛甫和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安德列夫斯基厅举办的盛宴上互相敬酒。“德国万岁!她的元首和外交部长万岁!”莫洛托夫举着酒杯说道。¹这一友谊自1939年8月德苏协议签署时就开始了——这份协

议包括了一份关于东欧“势力范围”划分的秘密方案。不过，对于希特勒来说，这只是权宜之计——仅仅二十二个月之后，德国就开始了苏联的入侵。

当国防军开进波兰时，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就和陆军最高指挥部商定，派出超过两千名“特别行动队”成员紧跟着军队进入波兰，任务是打击反德的“敌对分子”。海德里希9月被任命为帝国安全总局局长，下令“清洗波兰的上层人士，直至其没有威胁”。于是，在入侵的第一周就有一万六千名波兰人被杀，包括知识分子、牧师、犹太人和其他被认为是“敌人”的人。

侵略者犯下了各种各样的暴行。特别行动队B大队的一员埃里希·埃勒斯在9月的日记中记录了“波兰军官”是如何被草草处决的。他写道：“坑已经挖好，枪已经举起来，他们中有个人还在咬着面包。”²一名特别行动队指挥官赫尔穆特·比绍夫报告说，他刚刚抵达比得哥什，就决定“让十四名波兰和犹太男人作为人质站在酒店的大门前”，这样可以“让路过的波兰人都知道，晚上只要在我们的街道上听到一声枪响，他们中的一人就会被杀。因为就算这样波兰狙击手也不会罢休，所以这些人质的命运已经被注定了”。³一名普通德军辎重团士兵回忆说，他看到党卫军“日耳曼尼亚”旗队在克拉科夫附近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屠杀的时候还有军乐队伴奏。⁴

1939年11月初，纳粹召集克拉科夫的杰格隆尼大学的学者在一个演讲厅开会。他们一到达会场就被枪托殴打，然后被送进集中营。“我所受的完全是天主教式的教育，”大学助教梅切斯洛·布罗泽克说，“我的脑子里完全没有想过会发生[如此]邪恶的事情……它完全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之外。”到了达豪以后，他对这里的苦难充满恐惧，他感到“价值观完全毁灭了。经历过集中营的生活后，我就失去了价值观。我

感到一切都变得毫无价值、毫无意义。这种感觉强烈地折磨着我，让我濒临自杀的边缘”。⁵

至于波兰普通民众，他们很快明白纳粹要把他们变成奴隶。他们被纳粹归入斯拉夫人种，因而被视为劣等种族。“学校[再也]没有了”，迈克尔·普赖斯勒说。1939年9月，他二十一岁，生活在波兰西部。“教堂被关闭了。波兰人不准和德国人一起乘坐公共汽车。他们甚至说：‘波兰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真的像动物那样被对待，他们看我们就好像不是人。”⁶

德国军队中的一些成员也对他们的同胞在波兰犯下的暴行感到震惊。例如，赫尔穆特·施泰夫上校写信给他的家人说：“在这儿我们不像胜利者，倒像是罪犯……这种连同妇女儿童毁灭整个家庭的事不是人干的，他们不再配做‘德国人’，我为自己是一名德国人而感到羞愧。”⁷有一件著名的事，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将军写了一份关于批评德国安全部队在波兰活动的报告送给希特勒，希特勒看后大怒道，“你不要用救世军的那一套来领导战争”，并说他“从来没有信任过布拉斯科维茨将军”。⁸

布拉斯科维茨是个例外，大多数高级军官没有向他们的上级抱怨在波兰犯下的暴行。冯·布劳希奇元帅在11月1日写下的话定下了总基调：“犹太人是德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几个月后，他提醒他的部队：“元首下令执行的民族政策，是为了确保德国人在波兰的生存空间……不可避免地会对被占领土上的波兰居民采取严厉的非常措施。”⁹

在许多情况下，德国军队官兵协助特别行动队执行任务，例如，会告诉他们该去哪里展开行动。¹⁰军队还会为了报复袭击而枪决人质，进而允许德国士兵杀害无辜的波兰平民。¹¹9月初，在比得哥什有近四百名波兰人被杀。

不过，所有这些暴行并不意味着入侵波兰是我们所说的大屠杀开始的标志。尽管在占领波兰的头几个月里有几千名犹太人被杀，希特勒和纳粹高层对波兰的“精英阶层”也进行了同样的杀戮，但对于犹太人的总的态度仍和之前一样——迫害和驱逐。随着战争的爆发，似乎把赶走犹太人的一扇大门关上了，没法再把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到德国以外的国家，不过却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可以把犹太人驱逐到纳粹新帝国的遥远边疆。9月下旬，海德里希称希特勒已经同意了把犹太人赶到东方的建议，作为初步措施，波兰的犹太人将被集中在城市里以便管理。¹²

1939年10月，希特勒宣布，德占波兰将被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将被纳入帝国版图并进行“日耳曼化”，而东南毗邻苏占波兰的那一部分，仍将作为“波兰”保留下来，尽管还是由德国占领。这个地区约有一千一百万人，包括的城市有华沙、卢布林和克拉科夫，被称为“波兰占领区普通政府”，随后简称为“普通政府”。显然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这个地方当成了德国的“垃圾箱”（纳粹的俚语）。但泽—西普鲁士的阿尔伯特·福斯特和瓦尔特高（位于波兹南周边）的阿尔图尔·格赖泽尔都热衷于“净化”自己的地区，想把不要的波兰人和犹太人送到普通政府辖区。希特勒在9月末说，在布格河（德苏在波兰的界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波兰东部土地应该用来容纳“全部犹太人”，而西面仍属于普通政府管辖的地区，可以组建“某种形式的波兰国家”。

生活在普通政府辖区中的犹太人，很快就明白他们处于新种族秩序的最底层。在伊兹比察，一个十二岁的男生托尔维·布拉特发现危险不仅来自德国人，还来自非犹太裔的波兰人。“我[本来]以为，现在我们有共同的敌人——纳粹正在践踏波兰，践踏天主教徒，践踏犹太人——我们会团结在一起。”¹³恰恰相反，他看到的是一些波兰人觉得

“犹太人是二等公民，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很多在伊兹比察附近做生意的犹太商人“遭到殴打”，钱财被“洗劫一空”，因为波兰村民们知道犹太人现在不受国家的保护。信天主教的波兰人甚至互相反目。在德军占领伊兹比察的两周内，托尔维看到一个波兰投敌者“殴打另一个波兰人，原因是他违反了某些德国人定的规矩”。

1939年10月，也就是战争开始后一个多月，把犹太人赶往普通政府辖区的行动就开始了。盖世太保的头子海因里希·缪勒命令帝国保安部官员阿道夫·艾希曼——他曾经在德奥合并后驱逐了大批的犹太人——起草计划，把大约八万名犹太人从卡托维兹驱逐出去，卡托维兹是一座即将被“日耳曼化”的波兰城市。这个计划立即扩大到德国的犹太人，艾希曼开始准备驱逐维也纳的犹太人。他在给西里西亚纳粹长官的一封信中提到，在经过最初的驱逐之后，他必须要给上司提交一份“进展”报告，这份报告“很有可能”会送呈“元首”，由他决定再把多少犹太人送往东方。¹⁴

这些犹太人确切的目的地是桑河边的小镇尼斯科，大约在卢布林以南五十英里，那里是德占波兰最东边的地方。10月末，将近五千名来自维也纳和波兰西部城市的犹太人被送到这个新的“保留地”。他们下了火车以后，有些犹太人被告知要修建营地，但大多数人只是被扔在乡野，没有食物和住所。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半种族灭绝性质，正如普通政府的长官汉斯·弗朗克说：“能最终从肉体上解决犹太种族真是令人高兴，死掉的人越多越好。”¹⁵

就在几天之后，希姆莱就下令停止这些流放行动¹⁶，尼斯科也冷清下来。这基本上是由于实际需要，而非出于意识形态的决策。希姆莱现在遇到了其他问题，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挑战，影响了德国和奥地利进一步向波兰东部流放犹太人。1939年10月7日，他被任命为“强化日

耳曼民族性帝国专员”，这一故弄玄虚的头衔下隐藏着残酷的事实，现在他要负责把大量波兰人从德占区赶入普通政府辖区，以便为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腾出家园空间。作为纳粹和斯大林谈判结果的一部分，许多日耳曼人被允许离开苏联控制的土地——例如波罗的海国家——宣传口号写着“回归德国”或“家在德国”。把这些人运进新的德国，还要给他们提供工作和住房——所有这一切都要在战争中进行——给后勤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纳粹领导层认为，这一工作的种族意义极为重大，因此德国“新鲜血液”的拥入立刻开始了。

可以想象，那些为了给新来者腾地方而从家园被赶走的波兰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迈克尔·普赖斯勒记得，在希姆莱就任新头衔之后几周，某天凌晨两点，传来“一阵敲门声”，一伙纳粹冲进家里。“他们冲进每一个房间，我的姐妹们正在穿衣服，他们还是站在那里，盯着她们。我们穿好衣服，别的什么都不让拿。他们不让带任何东西，包括食物，什么也没有，没有额外的衣服。就是这样——他们不停地催你，你知道这正是德国人的处事方式，所有的事都必须马上执行。然后我们沿街走到一个大厅里，那里还有其他人。最后他们又抓来了更多的家庭，他们把我们带到了火车站。”¹⁷

另一个波兰人安娜·杰佐科沃斯卡和她的家人被从波森（波兹南的德语称谓）驱逐出去。她记得，德国人“突然闯进”她们的公寓，“非常混乱，到处是哭泣哀叫。德国人推搡着我们，打了爸爸的脸。我瘦弱的弟弟开始呕吐起来”。¹⁸

成千上万名像迈克尔·普赖斯勒和安娜·杰佐科沃斯卡这样的波兰人被带上火车，送往普通政府辖区。迈克尔·普赖斯勒和他的家人被安置在普通政府辖区的西部，全家挤在一栋屋子的一个房间里。安娜·杰佐科沃斯卡和她的家人被扔在一个叫格里茨的小镇，全家人蜷缩

在露天广场上。后来有个老人可怜他们，才让他们睡在自家的地板上。

德国人的驱逐不仅残忍，在组织上也十分混乱。1940年1月，普通政府党卫军和警察头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估计约有十一万名波兰人被送到他的辖区——其中有三万人事先未和普通政府商定。¹⁹戈培尔在当月的日记上写道：“希姆莱目前正在转移人口，不过并不是很成功。”²⁰

就在戈培尔写下这段话不久以后，普通政府的长官汉斯·弗朗克不得不决定阻止这种大规模转移。他并不是同情那些被送到这里来的人，而是因为这一行动所造成的混乱。他手下一位高级官员解释说：“如果事先不知道一列火车要开到哪里，你怎么着手进行组织？完全无从着手……我不知道运送的目的地是哪儿，地区长官也不知道……”²¹2月12日，弗朗克、戈林和希姆莱举行了一次会议。弗朗克要求重新安排行动的时间表，未经他的同意不能再运送人员到普通政府辖区，最后勉强达成了一致。

新来的日耳曼移民也发现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般美好。他们曾得到纳粹的承诺，将“回到在帝国的家”，他们十分吃惊地发现，自己抵达的并非期盼已久的“帝国”。当时十七岁的来自爱沙尼亚的日耳曼少女厄玛·埃吉还记得，她和家人发现自己要在波兰而不是德国开始新的生活，感到多么沮丧。“我们毫无心理准备，”她说，“我可以告诉你，当我们被告知要去瓦尔特高时是很吃惊的。”²²

对整个计划的失望并不限于新来这里的日耳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波兰的部分国土取自德国，生活在那里的日耳曼人也不待见他们。“有好几次，我们去欢迎[从沃利尼亚(毗邻波兰东部边界的地区)来的]运送移民的火车，”来自日耳曼家庭的查尔斯·布勒克尔·科尔萨特说，“他们的德语很差劲，没人听得懂他们的口音，我们差

点把他们当成波兰人。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家庭有个男孩，看上去有十岁，也有可能只有九岁……当他和他的德裔父母——‘德裔’得加个引号——一起到来时，他戴着一顶波兰童子军的帽子，用铅笔在那顶方形帽子上画了一个万字符……总的来说，我们对这些移民的素质充满了疑惧，因为他们衣衫褴褛，带着破烂的包裹。后来我们自己也成了难民，带着那些同样的包裹，但在当时我们是想不到的……因此我们私下议论，上帝啊，把那些土生土长的波兰农民家庭赶走，再把这些半波兰移民换进来，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且感觉他们更为落后……此外，他们的穿着和那些波兰农夫一模一样，他们戴着高高的毛皮帽子，穿着没有修剪过长毛的羊皮衣服，蹬着高筒靴，和波兰人一样卷香烟。好吧，我们说：‘走了一批，来了一批，又有什么区别？’对于我们来说，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德国人，可以说，他们只是三等的德国人。”²³

虽然在二月会议以后汉斯·弗朗克继续进行抗议，但向普通政府辖区的流放并未完全停止。从1940年5月到1941年1月，为了给德裔移民腾出空间，共约有九万名波兰人和两千五百名犹太人从瓦尔特高来到普通政府辖区。²⁴1940年5月，希姆莱在一份备忘录中明确写下了自己的态度：普通政府辖区最终将成为一个“剩余劣等人口”²⁵集中的地方。

由于行政上的内讧，纳粹开始更多关注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短期办法——建立犹太人聚居区。由于显然无法马上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运往普通政府辖区，而纳粹的核心思想又认为犹太人都是携带疾病和精神堕落的危险分子，因此在波兰城市中建立专门的区域来隔离他们自然就成了普遍的办法——1938年11月，在“水晶之夜”后举行的会议上，海德里希还曾经担心过犹太人隔离区的“安全”问题。²⁶

第一个隔离区建于瓦尔特高的城市罗兹——德国人把它改名为利

兹曼施塔特。对于纳粹来说，这是一项繁巨的工作，因为在这座城市的七十万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犹太人。在1939年12月10日的一份秘密命令中，该市的德国长官弗里德里希·乌贝尔霍尔写道：“当然，建立隔离区只是一种过渡性安排……最终的目的必然是彻底消灭这一罪恶的渊藪。”²⁷第一份命令发布于1940年2月初，要求犹太人居住在城市指定区域内。5月1日该区域被封闭，之后在该区域外发现任何未经允许外出的犹太人，都有可能被枪毙。

在隔离区诞生之前，罗兹的犹太人已经惨遭纳粹的蹂躏。特别行动队B大队在入侵的第一天就开进了城市，在当地日耳曼人的协助下煽动骚乱，把街上的犹太人抓去强迫劳动。一位名叫大卫·希耶拉克维亚克的犹太人在1939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地的日耳曼人肆意妄为”，犹太人遭到“殴打和抢劫”，有的人被“残酷虐待，一些犹太人被命令停止工作，脱掉衣服，面壁而立，并被告知将在这儿被枪毙。然后向他们射击的枪声响起，虽然没有人被打死，但这反复进行了好几次”。²⁸

1939年9月，纳粹占领这座城市后不久，就禁止犹太人从事纺织业——这是犹太人生计的主要来源——所有犹太人的产业都交给了德国人。犹太人被告知不能乘坐公共汽车，不能拥有收音机，不能参观犹太教堂，也不能开汽车，从11月12日起，犹太人被命令在衣服上佩戴上一颗“大卫星”标记。

不过，罗兹隔离区的建立是犹太人生存状况的一次巨大恶化。隔离区十分拥挤，卫生条件很差。在隔离区被封闭前有七万名犹太人离开了罗兹——要么是被驱逐，要么是逃亡到波兰的其他地方——还有十六万四千人仍然滞留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挤在这个1.5平方英里的区域中。

马克斯·爱泼斯坦是一名十五岁的犹太男孩，也是隔离区中的

一员。在战争前他过着富裕的生活——他的父亲在城市里拥有一座贮木场。现在，他们一家三口只能住在隔离区一栋旧房子的一个房间里。马克斯的父亲一搬到隔离区，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马克斯·爱泼斯坦说，“他的哲学是，我不想再活下去了。他不敢自杀，只是因为你不能。但他说：‘已经结束了，我真的不想这样。我的生活已成过往，我不想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所以他关上了百叶窗，房间里总是漆黑一片……他不刮胡子，只是关着百叶窗坐在那里。他不想看到外面的世界。”但马克斯在母亲的支持下，试着在这个新环境创造美好的生活。“当你还年轻时，”他说，“你不会想到死亡。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但你仍然会想到生活中一些开心的事。”²⁹

埃斯特拉·弗伦基尔是另一个被困在隔离区的犹太少女，她的感觉“就像是一颗炸弹落在我们头顶上……我们已经习惯了反犹主义。反犹主义在波兰也很盛行……波兰反犹主义可能更偏重经济方面的，但德国的反犹主义是：‘你为什么存在？你不能存在！你应该消失！’”。³⁰

纳粹的计划之一是使犹太人隔离区尽可能自治。他们设立了“犹太公会”或“长老理事会”来监督犹太人隔离区，并建立了一支犹太警察部队来维持纪律。德国当局对长老理事会主席说：“你们必须完全保障经济生活秩序、粮食供应、劳工使用、公共卫生和公共福利。你们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发布一切必要的指令去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归属你们的犹太警察部队来推行这些命令。”³¹

纳粹曾想过在入侵波兰后在整个波兰建立犹太公会，现在他们将这个想法付诸隔离区。公会的建立对纳粹有许多重要的帮助。最主要的是，犹太领导集团减少了德国占领者与大多数其他犹太人的接触，这意味着受到犹太人“感染”的风险降低了。1940年1月，就在罗兹犹太

人隔离区封闭的四个月前，罗兹的警察总监曾警告过“伤寒和痢疾”有从犹太人聚居区蔓延的“危险”。³²当然，是因为纳粹之前剥夺了犹太人的食物和医疗保障才造成了这种局面。此外，减少接触的另一个好处是，德国士兵将看不到隔离区的苦难——目睹这些会造成情绪上的不安。还有一个好处是，纳粹将行政责任移交给了隔离区，随之而来也会造成隔离区内的对立。犹太公会将在德国人的压力下挑选出一些将被驱逐出隔离区的人，也就是决定谁会遭遇到更悲惨的厄运，犹太公会成员也会给自己好一些的待遇，这反过来又令其他许多犹太人感到愤怒。一个内部互相对立的隔离区非常符合德国人的胃口。

罗兹的长老理事会主席是一位六十三岁的老犹太人，名叫莫迪凯·哈伊姆·罗姆科夫斯基。罗兹孤儿院的前院长，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专横霸道。身为犹太人隔离区的长老理事会主席，他将成为大屠杀中最具争议的犹太人物之一。

罗姆科夫斯基一开始就知道他只是一个德国的仆人，如果他没有按照要求去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1939年11月11日，早先的犹太公会的所有成员——除了罗姆科夫斯基和另两人外——全部被逮捕并送往华都高施斯监狱。其中二十多人随后被杀害，他们唯一的罪名就是没有像德国人希望的那样效劳。不久以后，新的犹太公会仍然在罗姆科夫斯基的主持下成立，他们非常明白，他们的特权地位很有可能会给自己招致痛苦和死亡。

在隔离区，罗姆科夫斯基的权威是巨大的。“对他的犹太同胞，”一名隔离区的幸存者耶胡达·莱布·格斯特写道，“他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暴君，他的行为就像一个独裁者，谁要是胆敢反抗他那些卑贱的手段，他就把致命的恐怖加到谁的头上。”³³罗姆科夫斯基后来参观了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当地的犹太领袖亚当·切尔尼亚科夫认为他“充满了自

诨”和“自负”。切尔尼亚科夫还写道，罗姆科夫斯基也很“危险”，因为“他一直告诉当局，隔离区在他的庇护下万事太平”。切尔尼亚科夫在读了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出版的报纸后得出结论，罗姆科夫斯基“主要关心”的似乎是“‘他的人民’不应该上街打扰他，给他递建议和请愿书”。³⁴

罗兹隔离区封闭以后，纳粹最初打算让犹太人自行购买食物。结果是，犹太人被迫倾其所有去换取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食品。一名从黑市不公平交易中获利的德国商人后来承认：“我在商言商，他们【隔离区的居民】不能啃一枚戒指，但如果能得到一块面包，就可以活一天或两天。如果我手上有价值一百马克的货物，却可以换到价值五千马克的物品，那么只有傻子才不去交换。”³⁵

雅各布·泽贝斯坦和他的家人没有钱从德国人那里买食物，因为他们索要的价格高得离谱。所以他意识到，如果找不到一种绕开德国人走私食物的方法，他们都得饿死。他知道，他们的生计取决于能否和隔离区外的一个波兰人取得联系。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犹太人基本上只能在隔离区内工作。但雅各布有一项便利条件——他的房子背靠着隔离区的栅栏，因此在隔离区建成之初他能够和铁丝网另一边的波兰人接触。波兰人给了雅各布一条面包；雅各布留了一半给家人吃，在隔离区里卖掉了另一半，然后把他挣来的钱传递给波兰人。“他帮助了我们两个月”，雅各布说。但后来那个波兰人被德国人抓住并杀害了。“不过，”雅各布回忆道，“两个月已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雅各布无法相信德国人会如此残忍。“作为一个人，你无法理解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你身上。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理解呢？隔离区封闭后几个星期，数百人死去……我记得因为太饿了，我妈妈去采杂草回来煮。你【甚至】连马铃薯的皮都吃——这是一种奢侈品，它是有史以来

最好吃的食物。”³⁶

战争的爆发不仅给犹太人和波兰人带来了更多的苦难，也让过去受到纳粹攻击的其他人群面临更大的风险——尤其是在肉体和精神上有残疾的人。他们现在所受到的待遇，反过来又会对大屠杀的发展产生影响。

正如前述，希特勒鄙视残疾人。不过，虽然纳粹实行了强制绝育，但还没有批准可以杀死残疾人——这被委婉地称为“安乐死”。直到战争开始前，这一切才发生了变化。元首总理府的主管菲利普·鲍赫勒给希特勒送去一封信，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封信是一个严重残疾的孩子的父亲写的，他是一名“安乐死”的信徒，请求希特勒允许杀死自己几个月大的孩子。

希特勒授权自己的医生卡尔·勃兰特调查此事，如果这名父亲对儿子病情的描述属实，就可以安排将孩子杀死，勃兰特奉命完成了此事。最新的研究表明，谋杀是在1939年7月底实施的。³⁷ 这比预期的晚了几个月，而且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希特勒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可以很好地掩盖针对残疾人的严厉行动。他将要兑现1935年时对德国医学界领袖格哈德·瓦格纳的承诺：如果未来战争爆发，将“彻底解决”有关精神病患者的“问题”。³⁸

这个孩子的死让希特勒开始允许鲍赫勒和勃兰特去杀死其他同样残疾的孩子——不仅仅是婴儿，也包括年长的孩子。随后一个完整的行政机构被建立起来，以监督这一进程。1939年8月，内政部发布了秘密指示，要求助产士报告患有残疾或瘫痪等疾病的新生儿，然后将这些报告发送给三个不同的医生，每名医生分别在报告上打加号或减号。如果多数人写下减号，孩子就会被送到一个特殊的诊所。在这里，被选

定的孩子通过过量服用吗啡或其他镇静剂被杀死。在官方记录中，他们的死因会写上麻疹之类似是而非的疾病。

整个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一般公众绝不可能了解到这些特殊机构内儿童的遭遇。但在医院内部，犯罪的事实很难掩盖。战争期间，保罗·埃格特——当时他被定为“怠工者”——被送往阿普勒贝克，那里有一座儿童医院，也是一个杀人中心。他记得每隔几周，一位护士会在晚饭期间走进餐厅挑选孩子。第二天早上，孩子们被送到了医生的诊室——据说是要接受白喉或猩红热免疫。但保罗注意到，这些孩子去过诊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他记得，有时被选中的孩子会努力抓住大一点的孩子，试图不被带走，但“医生和护士会说‘快来吧’或类似的话”。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保罗回忆起那些“尖叫声”和孩子们被带向死亡时惊恐的向后“一瞥”，他称，那是“绝望的”，“非常可怕”。³⁹

希特勒不仅想杀死残疾儿童，他还想消灭残疾成年人。在1939年6月或7月——确切日期待考——他要求国家卫生部长莱昂纳多·孔蒂博士扩大“安乐死”的实施范围。元首总理府主管菲利普·鲍赫勒对孔蒂并不感冒，因为他的部门已经在实施儿童安乐死的工作了。鲍赫勒是一个纳粹党内的政治老手，很快就把孔蒂排挤出去，把两项工作都包揽了下来。⁴⁰

这些行政安排表现出了纳粹国家机器的随意性，特别是当涉及诸如杀害残疾人这样的秘密任务时。德国医生在未经任何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就在特别机构中残杀儿童，而绝大多数德国人对此毫不知情——哪怕这一政策已经得到国家正式批准，在政府部门中希望对此进行监督的人也不知情。

对于希特勒来说，只要你能完成他的任务，职务毫无意义。执行这个繁重杀人任务的部门居然是元首总理府，那个机构之前和医疗事务

没有半点关系。鲍赫勒是一位三十九岁的官僚，干的一直是党务工作。他的副手维克多·巴拉克，曾做过希姆莱的司机。他们俩没有取得任何有关医学的资质。⁴¹但在纳粹国家，这些都无关紧要，只要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忠诚，野心勃勃，热衷于自己的职业爬升和对元首的奉献。如果希特勒想要消灭那些身心残疾的人，他们就会去干。

1939年10月9日，维克多·巴拉克主持召开会议，参会人员都是赞成消灭成年残疾人的医学专家。会上他们讨论了工作的机制，决定先要列出所有收治“精神病患者、癫痫病人和智障者”的机构清单⁴²，然后通知指定机构的人员填写表格，说明每个病人的残疾情况。医学专家将研究这些表格，决定谁应该活着，谁应该死，裁决的标准之一是病人是否能干点有用的活。可见，选择的标准不仅是医学，还有经济。⁴³

在当天的会议上还讨论了杀人方法的问题。纳粹意识到，可能要杀死太多的人——估计有七万之众——仅仅通过药物、注射和饥饿是无法应付的。所以巴拉克又向刑事警察头子阿尔图尔·内贝询问大批杀死残疾人的方法。内贝转而建议他找刑事技术学院化学系主任阿尔贝特·威德曼博士谈谈。就像许多卷入这一秘密计划的人一样，年轻的威德曼对此毫无经验，他只有二十七岁，一年前才获得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在战后对他的审判中，威德曼说，内贝曾经告诉他，“人形的动物们”将要在新计划中被消灭掉。在随后一次会议上，威德曼提出了他的专业性意见，认为“一氧化碳气体”会是最好的杀伤剂，建议把一氧化碳“在夜间排入病房，从而导致患者的‘安乐死’”。⁴⁴

为了给这一巨大的杀人阴谋保密，安乐死行动被称为“T4”方案，因为这一方案的总部位于柏林蒂尔加滕大街4号。一些实施者采用了假名，巴拉克自己就化名为19世纪一个臭名昭著的偷猎者“詹纳韦恩”。不过，到1939年底，那些涉案人士还是感到有必要为他们的行动

取得某种官方授权。很可能是鲍赫勒找了希特勒，请求他以书面形式确认这一命令。结果，他们得到了一张希特勒签名的便条，上面写着，对那些因患有“不治之症”而遭受痛苦的人，鲍赫勒和勃兰特博士有职责批准医生给予“慈悲的死亡”。希特勒显然落款了一个较早的日期——“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的那一天，因为这样可以强调做出这一决定和战争爆发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不仅对希特勒来说很重要，因为许多参与此事的人都被灌输：为什么健康人在战场上死去的时候，残疾人和无劳动能力者却可以活下来？⁴⁵

希特勒强烈厌恶残疾人——尤其是精神上残疾的人——这一态度在当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中表露无遗。帝国总理府主管汉斯·拉默斯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是希特勒最亲密的法律顾问。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拉默斯说：“这一次，元首讨论了安乐死问题，在我参加的会议中是第一次。他认为，通过医疗手段让‘无价值的生命’，也就是有严重精神残疾的人死去是适当的。如果我的回忆没错，他还举例说，严重的精神病人只能睡在沙子或锯末上，因为他们经常会把自己搞得很脏——这些病人会吃自己的粪便。他解释了结束这种‘无价值’的生活是多么正确的事情，以及通过安乐死，可以节约在医院、医生和护士上的开销。”⁴⁶

1940年1月4日，在哈维尔河畔勃兰登堡一座被改建为安乐死机构的监狱，威德曼博士进行了一次毒气试验。煤气通过伪装的水管排入一个瓷砖房间，要杀死的病人被告知脱掉衣服进去洗澡，当他们关进这个假淋浴房后，威德曼亲自打开了装有一氧化碳气体的钢瓶阀门。气体通过管道进入房间，二十多名病人死去。随后，房间打开通风，尸体被带走烧掉。

威德曼博士最初打算在病人睡着时向宿舍排放煤气，被认为是不

切实际的想法，但这种假淋浴的方法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杀人方法。从纳粹的角度来看，它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首先，被杀死的病人几乎一直平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对淋浴这样平淡无奇的事情不会有任何担忧。其次，大量的病人可以同时被杀死，需要的工作人员比以往任何杀人手段都要少。最后，假淋浴可以让凶手远离杀戮行为本身，现在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打开一个阀门，不必像注射或枪毙一样直面被害者的眼睛。杀人者在杀人时不但情感上被隔离，在身体上也被隔离了。

卡尔·勃兰特博士亲自见证了勃兰登堡的毒气试验，在二战后的审判中，在关于决定用毒气杀死病人的问题上，他没有提到任何上述的优点。相反，他声称自己在和希特勒谈及选择注射和毒气方法时，希特勒问他：“哪种方式最人道？”⁴⁷勃兰特的回答是“明确的”——毒气。其他一些知道这种方法的纳粹分子后来也声称，他们的说法是一样的。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蒙蔽受害者直到毒气排出的那一刻，使其免于预料自己死亡时的痛苦，这是杀人者对被害者的善举。他们都在表现自己还有一点人性，但在毒气室中死亡会比其他方式来得安详是个谎言，随后灭绝营毒气室工作人员的证词将会证明这一点。⁴⁸

勃兰特博士还坚持说，用煤气杀死残疾人的“实验”只是“医学史上取得重大进展时的一个例子。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起初遭人蔑视，但后来终有一日被人们意识到其价值并得以实行”。⁴⁹他相信自己参与了“医学史上的一大进步”，在推进成人安乐死方案时“问心无愧”。

没有医生是被迫参与这个项目的。如果反对这件事，大可以说比如自己“不能胜任”来逃避；但大多数受邀者都以不同程度的热情参与了此事。有些人认为，通过杀死残疾最严重的人，可以为其他病人提供更多的资金。其他人则赞同官方的观点：纳粹国家中的医生既要关心

病人，也要关心社会的福祉——尤其是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不管医生给自己什么借口，他们都清楚，如果没有自己的参与，这个计划就无法实现。医务人员是整个流程的核心——从最初选择要杀死的病人开始，到安慰将要进入毒气室的病人，打开毒气阀门，确认患者死亡，最后在官方档案上捏造死亡原因，并寄给死者的亲属。

纳粹建造了六个安乐死中心，有五个在德国——分别位于勃兰登堡、格拉芬埃克、贝恩堡、哈达马尔和索嫩斯泰因，还有一个在奥地利的哈特海姆，靠近林茨。最典型的要数索嫩斯泰因的那一座，它位于小镇皮尔纳郊外的一座小山上，离德累斯顿不远。这座建筑最早是一座城堡，19世纪时改为精神病院。从1940年起，这里地下室的几间房间被改建成了一座杀人工厂。一个小房间被作为毒气室，伪装成淋浴房，有密闭的门和停尸房相连。从其他精神病机构挑选出来的病人被用巴士送到这里，路上他们被告知淋浴是新医院的报到流程之一。病人进入假淋浴房后，煤气阀门就会打开。在他们被确认死亡后，尸体被送入隔壁停尸房，嘴里的金牙或黄金填充物会被取走。然后，尸体被送往下一个房间，那里有两座海因里希·科里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焚尸炉，尸体被放置在一个钢架上——通常每次两具——推入炉内。最后，骨灰被扔到大楼后面的山坡上。索嫩斯泰因安乐死中心建成运行期间，从1940年6月到1941年8月，估计共有14 751人被用这种方法处理掉。⁵⁰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1940年帝国安乐死中心的杀人方式和1942年德占波兰的死亡集中营相比，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似性。不仅杀戮技术是一样的，连许多人员都是一样的。1940年1月在勃兰登堡安乐死中心进行第一次杀人试验的两个人，后来都以不同方式帮助实施了犹太人大屠杀。第一个是医学专家埃尔姆弗里德·埃贝尔博士，勃兰登堡安乐死中心的主任。他当年二十九岁，奥地利人，出生在布雷根

茨，毕业于因斯布鲁克大学。埃贝尔毕生都致力于纳粹运动，连个人细节也是如此——他留着希特勒式的小胡子，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根据他的副手阿奎林·乌尔里希的证词，埃贝尔“始终认为”他“有责任”打开煤气阀门。⁵¹ 另一名勃兰登堡安乐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位热心的园丁，说埃贝尔曾经告诉过他，“所有的杂草都要被芟夷”，“不值得活下去的人也应当消失”。⁵² 另一位参加T4任务的官员说，埃贝尔博士对自己的任务极为热衷，他要“把全世界和自己的兄弟都送进毒气室”⁵³。

埃贝尔博士和勃兰特博士一样，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促进医学的发展。在勃兰登堡安乐死中心被杀死的儿童的大脑，被送到柏林的威廉大帝脑研究院神经病理学系主任朱利叶斯·哈勒沃登那里。根据埃贝尔的记录，哈勒沃登教授甚至还拜访了勃兰登堡安乐死中心，参加了安乐死中心的尸检。⁵⁴ 哈勒沃登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说，“这些大脑提供了极好的材料”，“至于它们从哪里来，这真的不关我的事……”⁵⁵

埃贝尔在纳粹国家中的职业轨迹显然蒸蒸日上。很难想象在其他情况下，一个像他那样初出茅庐的医生能给哈勒沃登那样著名的神经病理学专家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埃贝尔博士就像威德曼博士一样，发现杀戮可能是一条让自己快速发迹的通道。

另一个在1月见证了毒气试验，后来参加了大屠杀的人是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他的年龄、教育和生活经历和埃贝尔博士完全不同。五十五岁时他被任命为勃兰登堡安乐死中心的行政主任。他年轻时曾当过木匠，后来当了警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一枚铁十字勋章，在德国战败后加入纳粹党，并继续在警察部队工作。他是个可怕的角色，非常强硬和务实。他的声名是如此狼藉，以至于得到了“疯狂的克里斯蒂安”这样的绰号。在参与了T4行动后，他对直接动手杀人毫不犹豫——他曾经亲自枪杀了四名被送进安乐死中心的女性患者，她

们被认为患有斑疹伤寒。他告诉部下，“精神病人”是“国家的负担”，因此必须加以消灭。维尔特的一个部下称他简直就是“一头野兽”⁵⁶。弗朗茨·施坦格尔是另一个参加安乐死行动的警察，后来掌管一座死亡集中营，他称维尔特是一个“粗俗和好炫耀的人，见到他，我的心就会一沉”。维尔特说话时使用了“可怕的语言暴力”：“他说，‘要消灭这些无用的食客’，那些‘多愁善感’的人令他‘感到恶心’。”⁵⁷1940年初在勃兰登堡安乐死中心共事的维尔特和埃贝尔，两年后将在被占领的东方土地上重逢，届时会有更可怕的情形发生。

残疾人不仅在德国和奥地利被杀害，在纳粹占领的波兰也是如此。1939年秋，但泽党卫军的一个单位“艾曼特别卫队”，和特别行动队一道，在但泽—西普鲁士新近“日耳曼化”的地区枪决了上千名精神病患者。这些受害者并非仅仅因为不能劳动——只要是波兰和犹太病人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草草处决了。⁵⁸

到1940年初，波兰出现了一种杀害残疾人的新方法。一名三十岁的党卫军军官赫伯特·兰格指挥的部队使用了一种移动式的杀人机器——一辆写着“凯撒咖啡公司”的厢式货车。病人一旦被锁进车厢内，瓶装一氧化碳气体就会从外面送入。兰格的车在德国边境和波兰来回行驶，杀死了上千残疾人。⁵⁹对于纳粹来说，这种毒气车比起固定的毒气室有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开往病人就医的地方。不过，这种新的杀人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弊端。比如货车有越来越显眼的危险，因为爬上它后面车厢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但只要这辆车不在某个特定地区做过多的停留，秘密还是可以继续保持下去的。

在德国，对于残疾犹太人的挑选和其他病人起初是一样的，医生看重的是临床标准和病人是否能做有用的工作。但到了1940年4月，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名“种族卫生学”医生并支持T4行动的官员赫伯

特·林登，要求地方当局披露所有辖区内犹太精神病人的姓名。然后，所有这些病人都被选中处死。⁶⁰

战争的爆发也给战前德国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有命令要求集体屠杀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但集中营内的党卫军知道，战争的紧张气氛意味着他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对犹太人随意采取行动。大批波兰犹太人的到来，更加重了党卫军对犹太人囚犯的折磨。柏林附近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党卫军们肆无忌惮地发挥他们残酷的想象力——口渴的犹太囚犯被迫喝下自己的尿液，饥饿的人们互相殴打以争抢食物。⁶¹在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39年11月，有超过二十名犹太人被带出集中营枪决，为的是报复前一天在慕尼黑针对希特勒的一次刺杀行动。⁶²

战争还导致了集中营更多的非犹太人囚犯受到虐待。例如，1940年1月，当时还是萨克森豪森一名党卫军军官的鲁道夫·胡斯命令八百名犯人冒着刺骨寒风在点名场上站了几个小时。高级囚犯——集中营内的年长者——恳求胡斯发发慈悲，但他无动于衷，囚犯们不得不继续站着忍受煎熬。1940年，集中营系统总共有一万四千人死亡。1938年，战前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也只是一千三百人，战争带来了十倍的死亡人数。⁶³

由于纳粹在占领的土地上开辟了新的营地，整个集中营体系因战争而扩大了。1939年9月2日，德军入侵波兰的第二天，就在但泽附近的小镇施图特沃（德语称施图特霍夫）建立了一个集中营。而整个体系中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则要到1940年春才做好运转的准备。

1940年4月，鲁道夫·胡斯从萨克森豪森来到奥斯维辛，成为新任

长官。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所创建和管辖的这个地方将成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屠场。他所收到的命令并非建立一个灭绝营，而是一座达豪集中营更为极致的翻版——那座“模范”集中营由特奥多尔·艾克管辖，胡斯以前曾在那里受过训。这个名叫奥斯维辛的小镇，波兰语叫奥许维兹，位于上西里西亚，是纳粹打算“日耳曼化”的波兰的一部分，建立这座集中营是为了用恐怖来震慑当地的波兰居民。

最初的集中营建在索拉河边，靠近奥斯维辛镇，周围是一圈以前波兰军队的红砖营房。从一开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率就远远高于战前的达豪——在第一批被送往集中营的两万名波兰人中，有超过一半在1942年之前死去。

耶尔希·别列奇是一名波兰政治犯，他是1940年第一批进入集中营的犯人之一。他还记得党卫军卫兵如何从火车站到营地大门一路殴打犯人。“有一个小男孩站在我旁边，也许他十六岁——甚至只有十五岁——他在哭，眼泪直流。他的头被打破了，血滴在脸上……我们很害怕，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我感觉似乎是在地狱，你无法用任何别的方式来描述它。原来，这里就是地狱。”⁶⁴德国人认为别列奇是波兰抵抗运动成员，因而把他送往奥斯维辛，他和其他犯人一起成为兴建集中营的劳工。

耶尔希·别列奇还能回忆起“卡波”们的残忍行为——这些人都是从萨克森豪森到奥斯维辛来的德国犯人——他们负责监督其他犯人劳动。“我看惯了死亡、殴打和虐待，”别列奇说，“三四个月后我就习惯了眼前的景象。”当他成为一名建筑“特别劳动队员”后，亲眼见到一个“卡波”因为对一名犯人的工作不满，操起一把铲子“砍向他的脖子，鲜血喷溅出来，铲子有一半砍进了脖子中。我永远忘不掉这件事……我常常梦见它”。⁶⁵

在1940年，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犹太人，但就像在战前德国境内的集中营一样，犹太人更容易遭到厄运。卡齐米兹·阿布林也是1940年6月第一批被运往奥斯维辛的犯人之一，他记得德国人会从犯人把犹太人“挑出来”，还有“牧师和僧侣”也会“受到和犹太人差不多同样糟糕的对待”。⁶⁶

威廉·布拉瑟于1940年8月抵达奥斯维辛，他回忆说，德国人会挑选出犹太人和天主教牧师，叫他们“唱宗教歌曲和赞美诗”。德国人会“殴打牧师，然后是犹太人，向他们咆哮说他们懒惰，因为唱得不够大声。这种景象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⁶⁷

从开营的那一天起，就有花样百出的手段用来折磨囚犯。惩罚的措施不但残忍——一种常见的方法是把犯人的手反绑在背后，然后系住手腕把犯人吊在杆子上——而且随心所欲，每个犯人都知道他们永远有挨打或更糟的危险，防不胜防。为了加重这些痛苦，德国人坚持让这里的生活节奏快速运转。奥古斯特·科瓦尔奇克1940年底来到奥斯维辛，他看到所有囚犯都在急匆匆地绕着集中营小跑，这幅景象让他想起了“一个人踢了一脚蚁丘，蚁丘塌裂，然后你看到蚂蚁四处乱跑”⁶⁸。

1940年5月，也就是胡斯来到奥斯维辛几天以后，希姆莱概括地论述了他对整个被占东部的设想，这份打算进呈给希特勒的备忘录名为“关于处理东部异族人口的一些想法”⁶⁹——鉴于提议内容的广泛，这个题目可谓十分审慎。备忘录中有一大部分是希姆莱计划在波兰人口中进行搜索，以便找到“上等种族”和“符合我们要求”的儿童。这些孩子将被送到德国，作为德国公民长大。希姆莱认为这一政策不仅让纳粹获得了更多德国的“血液”，而且削弱了波兰人中产生领导阶层的潜力。至于波兰的其他孩子，他们将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只教数数“到500”，并写出自己的名字。“我认为不需要教阅读”，希姆莱说。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让波兰儿童明白，“服从德国人，诚实、勤奋、守规矩是上帝的训诫”。当孩子们长大后，将成为一个“无领导能力的劳工阶级”中的一分子，德国人可以将其用于“修路、采石”和“建筑”。

希姆莱还在他的备忘录中说道，“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完全不是德国人的做法，也是不可能的”——这一观点在大屠杀开始后很快改变。但是，即便他在那时不愿意提到大规模屠杀，他关于犹太人的建议仍然是激进的。“我希望，”他说，“可以通过把他们大规模移民到非洲或殖民地来彻底抹掉‘犹太人’这一名词。”他显然想到了类似于马达加斯加岛计划之类的东西，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波兰人自己在战争前就已经认真考虑过了。这一政策和1939年秋海德里希把犹太人放逐到新德意志帝国东部的计划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希姆莱之所以觉得可以把犹太人送到非洲，是因为其他地方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份文件的日期是1940年5月15日，也就是德国对法国和低地国家发动进攻的五天以后。虽然目前还不确定德军能否取得胜利，但希姆莱的如意算盘是一旦德国获胜，占领了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和卢森堡，那么英国就将乞和，从而德国可以使用从他们对手那里缴获的商船，将犹太人向南运送到马达加斯加岛——德国人现在声称对这块前法属领土拥有主权——或其他一些非洲国家。

现在看来，这好似痴人说梦，但是1940年夏纳粹留下的文件表明，这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备选方案受到了重视。7月3日，也就是法国投降一周后，德国外交部的犹太事务负责人弗朗茨·拉德马赫写了一份备忘录，说道：“法国必须提供马达加斯加岛用于解决犹太人问题。”⁷⁰九天后的，汉斯·弗朗克说，“不再往普通政府辖区运送犹太人”⁷¹，是因为现在的计划是将“整个犹太民族”送到某个“非洲或美洲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岛是正在考虑的目的地，为此法国将割让该岛”。

虽然纳粹的马达加斯加岛方案并非是要立刻灭绝犹太人，但这必将导致数百万人的死亡。因为波兰的委员会已经调查了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战前马达加斯加岛被认为只能供六万名犹太人生存，然而8月15日艾希曼的办公室给拉德马赫发去一份备忘录，称准备安排“四百万”名犹太人去那里定居。⁷²在纳粹的计划中，那里的犹太人不允许组织任何形式的自治政府，而将被置于“帝国党卫军元首”和“警察总监”管辖之下。⁷³之后又有两个迹象表明，纳粹执行的确实是近乎种族灭绝的计划：菲利普·鲍赫勒——成人安乐死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将成为马达加斯加岛“总督”的人选；到1940年夏，拉德马赫更是修订了送往岛上的犹太人数字——从四百万人提高到六百五十万人。⁷⁴

之所以会在1940年夏讨论这一计划，是因为德国人在欧洲西部获得了速胜。在1940年春末的六周内，国防军取得了德国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没能得到的战果。流行的神话告诉我们，这一胜利是必然的，德国军队注定要获胜，因为他们的军队比对手在每个方面都更为装甲化、更为机动化、更为现代化。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西方盟国拥有比德国更多和更好的坦克，在西欧的胜利是希特勒事先所没有预料到的。

德国这一巨大的成功，对于大屠杀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背景，因为胜利的结果使希特勒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临近1939年底时，德国军队中的高层人物曾考虑过将希特勒从政权中赶走。这并非因为他们对德国在波兰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而感到愤怒，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希特勒计划入侵西欧将导致德国陷入灾难。德国军队的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将军在1939年1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陆军司令部没有一个人认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直接听命于希特勒】的命令有任何成功的希望。”⁷⁵一位高级官员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入侵计划完全是“发了疯”⁷⁶。

在1939年11月，这些判断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按照既定方针入侵西欧，德国很可能已经遭到惨败。鉴于同盟国已经掌握了德国先前的意图，德国只有改变战略才能为成功创造条件。新的想法是一场巨大的赌博——通过看似不可逾越的阿登森林向法国城市色当进攻，同时辅以北方向比利时的佯攻。希特勒把他的整个未来和德国的命运，都押在同盟国未能觉察德国装甲部队穿越阿登地区，而等到德国坦克跨过色当的默兹河，在法国中部平原上一路猛冲到英吉利海峡时，一切都为时已晚。这个计划的激进程度或面临的风险怎么说都不为过，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之所以奏效，主要是因为同盟国军事领导人的无能，结果如希特勒所愿，直到局势无法收拾，他们才明白过来德军向色当进攻的重大意义。

现在，希特勒的军事指挥官全都成了他的拥趸。德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威廉·凯特尔——他在法国战役胜利后被提拔为元帅——宣布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领袖”⁷⁷。大部分德国人同样欣喜若狂；1940年7月6日，当希特勒从西线返回柏林时，人潮向他发出歇斯底里般的欢呼，以感激他们的元首所展现出来的天才。

在一片谄媚声中，希特勒对于自己已经成为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伟人之一深信不疑。正如他在1939年8月对将军们所说的那样，“基本上一切都取决于我，取决于我的存在……”⁷⁸在三个月后的11月23日，他在对将领们的讲话中重申，他们现在身处的是一场史诗般的战争，除了“胜利或失败”，别无选择，因此必须要“消灭”敌人，不然自己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根据希特勒的说法，“种族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德国]增长的人口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⁷⁹

西方的胜利给数百万支持纳粹运动的德国人发出了明确的信息，未来不用再担心了。他们可以抛开个人的怀疑和焦虑，因为他们的元

首已经表明他总是正确的。希特勒没有“催眠”这些人，大家信任他并非因为失去了判断力，而是因为近期的事态表明这是最明智的做法。但这种心态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后来当犹太人从街上消失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怀着同样的心情去回避本应有的焦虑——那就是元首知道该怎么办。希特勒在过去知道该怎么办，将来怎么办他也会知道的。如果他要让犹太人比以前更痛苦，那么对于德国这就是正确的，这一政策是应该支持的。

德国在欧洲大陆取得胜利后，希特勒希望英国会来谈和。1940年7月19日，他在国会演讲时呼吁英国能够“识时务”。他说，“我今天仍然很难过，尽管我尽了一切努力”，但还是没有与“英格兰”建立起“友谊”。⁸⁰两个月前当上首相的丘吉尔以及他领导的政府拒绝任何妥协。一旦英国摆明了要战斗到底的决心，希特勒就面临着窘境。他可以指挥他的军队入侵英国，或者把注意力转向东方，面向他1924年在《我的奋斗》中所认定的敌人——苏联。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并不难，他从来都不想和英国作战，因为德国海军缺乏能够保护跨海峡入侵舰队的战船。在1940年7月31日的一次会议上，他向将军们提出了入侵苏联的可能性——不管有没有打败英国。他用一些牵强的逻辑来证明这一行动的正当性，辩解说英国之所以进行战斗，是因为希望苏联最终会来帮助他们。他说：“俄国是英国的救命稻草。”⁸¹因此，希特勒暗示，摧毁苏联在战场上和英国联手的机会，将迫使丘吉尔乞和。这是一个奇怪的论点，因为英国的战争努力依赖的是美国的援助，而非苏联。尽管如此，但没有人反对这个想法。

希特勒并未完全放弃入侵英国的想法，进行空中轰炸的计划仍将继续实施。尽管在1940年7月31日的会议上，海军元帅雷德尔指出了渡海进攻的黯淡前景，入侵英国本土的“海狮”计划还是做了草草的准

备。不过，希特勒不想在这方面浪费太多精力，他寄希望于另一场胜利，在1940年余下的时间内，他在精心策划于次年对苏联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

早在1924年，希特勒就曾说过，德国需要在东方获得土地，而赢得这片新领土所必需的战争正日益临近。

9. 西欧的迫害(1940—1941)

在炮制入侵苏联计划的同时,纳粹必须解决他们在西线取得胜利后产生的一个紧迫问题。现在德国统治着更多的犹太人,应当如何处理他们呢?

从1940年5月到1941年6月入侵苏联前,纳粹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战争第一阶段中反犹政策的灵活性。可以看到,纳粹在这一阶段还没有做出实施大规模屠杀的决定,仍然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长远办法是驱逐出境。

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三个国家中最小的卢森堡,三十万总人口中有三千五百人是犹太人。¹卢森堡国内的“德意志人民”运动呼吁该国“回归”德国,纳粹行政长官古斯塔夫·西蒙²煽动了一场广泛的“日耳曼化”运动,《纽伦堡法》于1940年9月即开始生效,犹太人被迫穿越边境进入法国。纳粹在1940年秋设定了各种期限,他们希望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这个国家。一些犹太人被送到边境,遗弃在那里。³

在邻国比利时,情况有所不同。纳粹入侵前,全国八百三十万总人口中有六万五千人是犹太人。他们大多没有比利时公民身份,而是从

纳粹德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避难而来。与卢森堡不同的是，德国人并没有强迫犹太人离开这个国家，但从1940年10月起，他们就开始推行反犹立法。新法令对犹太人进行了定义，要求犹太人不得从事若干行业。然而，由于街头尚未出现暴力行为，以及纳粹允许犹太人继续在安特卫普的钻石工场工作，使得一些犹太人在1940年夏秋从邻国返回比利时。1940年11月，纳粹的政策开始转变，戈林要求犹太企业进行“雅利安化”，不过起初推行的力度并不大，到次年才开始迅猛起来。

比利时出现过个别反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抗议活动。例如在1940年10月，比利时官员拒绝执行德国提出的反犹措施，尽管后来在高压之下他们还是照办了。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学者，在纳粹剥夺犹太研究人员工作权时也提出过抗议，但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决定留在国内，并被德国人软禁起来。在权力出现真空之下，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1月，以战前担任比利时首相的休伯特·皮埃洛为首的流亡政府宣布，一旦打败德国人，所有被窃取的赃物和财产都将物归原主，而那些试图从别人那里盗取财物的比利时人将被追究责任。虽然这一声明没有特别提到德国强加给比利时的反犹措施，但无形中也警告了那些从犹太人那里偷东西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对于这些话，美国的犹太公会肯定是这样理解的，他们的拉比史蒂芬·怀斯给伦敦的皮埃洛首相去了一封信，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⁴

在被占领的比利时，也有人欢迎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例如，莱昂·德格雷勒领导的极右翼政党雷克斯党开始接受纳粹的思想。一个坚定的雷克斯党成员、种族主义者雅克·勒罗伊说：“所谓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间的区别就是，优等种族是白色人种……在那些岁月里，我们骄傲地属于白色人种。”⁵至于他对犹太人的态度，从他在战后

成为大屠杀的否认者就可以看出来。

对犹太人的仇恨终于在1941年春爆发出来。4月14日，大约两百名属于VNV (Volksverwering) 等民兵组织的比利时亲德分子点燃了安特卫普的两座教堂，然后是大拉比的家。⁶德国人阻止比利时消防队扑灭大火，不让警察追捕凶手。

据悉，那些袭击者刚刚看过一部前一年上映的反犹宣传电影《永恒的犹太人》，这部电影的出名之处在于把犹太人和老鼠做了比较，并且对罗斯柴尔德这样的犹太银行家进行了攻击，指责他们在欧洲各国首都开设银行分支机构，试图控制整个银行体系。这部电影旨在说明犹太人怀有彼此间跨越国界的忠诚，远超过对其居住国的忠诚。

《永恒的犹太人》是迄今为止纳粹拍摄的反犹宣传电影中最恶心的一部。有证据表明，希特勒本人曾插手此事。档案证据和导演弗里茨·希普勒⁷的证词，都强烈暗示希特勒起到了让电影更加极端的作用。弗里茨·希普勒记得，希特勒想通过《永恒的犹太人》“来展示‘证据’，用电影来表达犹太人是一个寄生的种族……他们必须和其他人隔离”⁸。把犹太人和老鼠进行比较，可能是希特勒认为特别出彩的地方，因为他非常厌恶这种动物。“当我在前线时，我开始憎恨老鼠，”在战争期间他说，“一个被遗弃在阵地上的伤员，最怕被这些恶心的东西活活吃掉。”⁹

戈培尔并不相信这些粗陋的用意有什么感染力。1941年7月，他概述了自己和希特勒不同的电影宣传手法。“对这部纪录片有些分歧。元首希望剧本能加入更多斗争性的素材，我宁愿让画面自己说话，而把剧本仅仅限制在解释观众不明白的地方。我认为这是更有效的，因为现在观众在里面看不到艺术。”¹⁰

从票房上看，《永恒的犹太人》是失败的。虽然很多观众不喜欢它——还有妇女在观影的时候昏了过去——但对于狂热分子，就像

1941年4月看了这部电影的比利时民兵组织成员，电影激化了他们的观点，那就是犹太人就像老鼠一样，不得不强行驱逐出去。

正当安特卫普的教堂被焚烧时，另一种大不相同的侵略正在西北部的丹麦上演。1940年4月9日，德军向西线进攻的一个月前，他们向北移动，越过丹麦边境。由于实力悬殊，丹麦人除了接受现实别无选择。第一批德军士兵抵达后两小时，丹麦政府就投降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吃惊，尤其是纳粹已在其他邻国领土上建立了统治。德国人把大部分事务继续交给丹麦人自己处理，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继续担任国家首脑，警察和司法机构的职能几乎和以前一样。

德国人这种相对克制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德国人认为丹麦人在种族上是同胞兄弟——他们和大多数丹麦居民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其次，丹麦只有七千五百名犹太人，仅占总人口的0.2%（这部分是因为丹麦在20世纪30年代拒绝帮助来此寻求庇护的犹太人）。最后，纳粹需要丹麦出口到德国的农产品。因此，丹麦受到了比其他战败国较少的压迫。

在德国入侵的前夜，一个生活在丹麦的犹太男孩本特·梅尔基奥尔吓坏了，他担心曾“直言不讳”批评纳粹的父亲会立即陷于危险之中。¹¹但在德国人到达后，本特的父亲没有受到迫害，丹麦犹太人的生活一如既往。努德·戴比是战争期间的一名丹麦警察，他证实了丹麦犹太人仍然很安全，在工作和家庭上都是如此。“犹太人完全被同化了。他们像其他人一样拥有自己的生意和房子。”¹²

德国人入侵丹麦，是为了去往另一个北欧国家挪威。希特勒想要获取挪威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为了让德国海军可以方便地进入北大西洋，并保护从中立国瑞典运送铁矿石的船只。尽管盟军试图阻止德国占领挪威，但挪威还是在1940年6月的第一周沦陷。维德孔·吉斯

林成为最初的统治者，他曾在1933年组织了挪威纳粹性质的政党，不过几天后，他就被一名真正的纳粹——约瑟夫·特博文（埃森的前地方长官）所取代。

就像在丹麦一样，只有少数犹太人居住在挪威——三百万总人口中约有一千七百名犹太人。但和丹麦犹太人不同，他们遭到了甄别和迫害。这部分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挪威漫长的大西洋海岸线使其比丹麦更容易受到盟军的袭击，德国人在挪威安置了许多海军基地和部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犹太人总是被德国人视为“背后的敌人”，因此被认为对军事设施具有威胁。挪威犹太人的厄运还和吉斯林有关，他和纳粹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因此纳粹有了一个积极反犹的帮手。

1940年夏，吉斯林设法说服希特勒让他重新成为挪威政府的领导人，为挪威总督特博文效劳。1941年3月，吉斯林在法兰克福发表讲话，要求将犹太人逐出挪威。他声称，犹太人让挪威社会堕落，就像“有害的细菌”那样“腐化”挪威人的血液，因此有必要清除犹太人。¹³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挪威的亲德分子已经关闭了许多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

1940年5月10日，德国侵略了另一个像挪威、丹麦、卢森堡和比利时那样试图通过中立来避免战争的国家——荷兰。这个国家四分之三的犹太人都将在大屠杀中丧生，比西欧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要多。比利时和挪威约有40%的犹太人被杀，法国则是25%。荷兰为何有高达75%的犹太人被害一直是个困扰历史学家的问题，本书后面将会对此提出一些解释。¹⁴

与比利时流亡政府不同的是，荷兰流亡政府对于德国占领的反应并不团结。虽然荷兰女王威廉敏娜反对与德国人进行任何合作，但她的总理德克·扬·德·吉尔却持不同的看法。他相信德国是不可战胜

的，荷兰人应该像法国的维希政府一样与纳粹合作。出于这一信仰，德·吉尔在1940年9月秘密地离开英国去了荷兰，随后出版了一本宣传与德国人合作的小册子。¹⁵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荷兰的公务员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决定以专业和勤奋的方式帮助德国人管理国家。正如荷兰流亡政府在1943年所说的那样：“他们【公务员】一辈子都习惯于服从，他们总是为无懈可击地完成任务和认真自觉地尽职而感到骄傲，当然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把同样的责任心和成就感带到了组织严密的掠夺者那里，带到了敌人的利益那里。”¹⁶

几乎所有的荷兰公务员都同意在确认他们是“雅利安人”后裔的表格上签字——这就是所谓的“雅利安认证”。1940年11月，他们同意了德国人把犹太人从公共事业中清除出去的要求。公务员们关心的是表面文章，认为犹太人是被“停职”而不是“被解雇”，¹⁷这听起来似乎不是那么残忍，但实际影响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已经知道后事如何而对荷兰公务员在此期间的作为进行评论。不过，从1941年1月开始，他们帮助德国人完成了将全部犹太人进行登记的任务，其效率令人吃惊。这一全面登记制度对于纳粹后来把荷兰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有很大的帮助。

到1941年6月，针对在荷兰生活的十四万名犹太人，一系列的反犹措施出台。¹⁸他们再也不能去电影院、公园或游泳池了；他们不能拥有收音机，不能上男女混合制学校，也不能做非犹太客户的律师或医生。这些措施都是出自荷兰总督阿尔图尔·塞斯—因夸特之手。他是一个在奥地利长大的纳粹强硬分子，1938年在许士尼格政府的倒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也是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1939年9月入侵波兰后，他曾担任过汉斯·弗朗克的助手，协助管理和迫害普通政府辖区内的

波兰人。因此他被任命为荷兰总督时，对于纳粹在东方的血腥手段可谓驾轻就熟。荷兰由一个残酷的种族主义者塞斯—因夸特统治，而比利时由一位军事长官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统治，这也是两国犹太人死亡率存在差距的因素之一。这并不是说法尔肯豪森是犹太人的朋友。他实施了比利时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部分是与他合作的党卫军头子埃格特·里德干的），但仍不失是一个老派的将军——后来在7月20日密谋案中受牵连而被送进了集中营。

在荷兰，并非所有的机构都像政府部门一样与纳粹进行充分的合作。1940年11月26日，莱顿大学的鲁道夫·克莱韦林加教授对于纳粹要求解雇犹太教授的命令进行了猛烈的还击。在学校的大礼堂，克莱韦林加谴责这份命令“极为卑鄙”，他把纳粹政权和犹太人爱德华·迈耶斯教授做了鲜明的对比，称前者是个“只会滥用暴力的政权”，而后者则是“高贵”的榜样。克莱韦林加说，迈耶斯教授“这个人，是人民的儿子，这位学者，是学生们的慈父，而外国侵略者已经暂停了他的教职……”¹⁹就在这次演讲后不久，克莱韦林加被捕，在监狱里被拘禁了八个月，而莱顿大学也被关闭。²⁰

莱顿大学的犹太学生海蒂·科恩—科斯特那天听了克莱韦林加的演说，她形容他的话“安慰了我充满怀疑的灵魂”。此时此刻，她感到“我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共鸣，尽管寂然无言，但完全明白彼此的心意。我坐在一群有着相同感受、相同观念的人中间，我属于这里”。²¹

海蒂·科恩—科斯特在战前的荷兰没有经历过任何迫害。在这所位于哈勒姆街上的学校里，“没有丝毫反犹太主义的迹象或痕迹……相反，学校在所有方面都有一种完全宽容的氛围：包括出身、性别、宗教和种族”。荷兰的许多犹太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个别的反犹事件，但迫害犹太人的观念违背了荷兰宽容的传统，这

种传统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期犹太人的解放。正是出于这种传统的安全感，许多人感到未来不可能完全黑暗。海蒂·科恩—科斯特写道：“当时，我们认为最坏不过是进德国的劳动营。”

荷兰的经验表明，以先前任何国家反犹的程度来估计纳粹统治下犹太人日后的苦难都是个严重的错误。其他的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纳粹统治的类型、某一行政体系的存续，以及纳粹希望在特定区域内实行反犹迫害的程度。

荷兰还有更多反抗的声音。10月，许多荷兰归正教会的牧师向教会宣读了一封谴责“雅利安化”的信，并于1941年2月从阿姆斯特丹开始，发起了一次抗议纳粹占领的示威。所有这些勇敢的行动都必须被铭记，但在行政官僚层面上，德国人得到了荷兰公务员良好的服务，他们以最为“严谨”和有效的方式和占领军进行了合作。

法国是德国占领的最后一个西欧国家，与其他被征服的国家相比，它受到了非常不同的对待。法国从来没有试图用中立的外衣来躲避德国人。当德军入侵波兰时，法国和英国一起做出了反应，两国都在1939年9月3日宣战。在德国入侵之前，法国人对胜利充满了信心。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称，如果希特勒敢于在1940年春攻击法国，他“绝对”会遭到惨败。²²许多普通法国公民都有这样的乐观态度。据1940年5月10日在巴黎的一位外国记者说，德国人发动进攻的那天，“人们的热情高涨。在街上、咖啡馆、报刊和广播里，人们对德国刚刚犯下的错误感到欢欣鼓舞”²³。

在这种过度自信的背景之下，德国人在六个星期之内就击败了他们，法国人的耻辱感简直难以名状。法国被占领，法军蒙羞，一百五十多万人当了俘虏，被送往德国的集中营。灾难之下，法国人转而求助于一位民族英雄，企图挽回自己的尊严——他就是菲利普·贝当元帅，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此时，八十四岁的贝当已经成为法国人尊严的化身，他庄重、严肃、令人生畏，受命从这场肉体和精神的灾难中挽救法国民众。

贝当成为总理六天后，于6月22日和德国达成停战协定。这份和平条约使德国占领了包括北部和西南部在内的大半个法国，只有法国南部和东南部约占40%的土地名义上还在贝当元帅的新政府管辖下。由于巴黎位于德占区，新政府的首都迁往一个名叫维希的温泉小镇。在维希坐稳交椅后，贝当成了国家元首，对法国公民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他把造成这次国家覆亡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第三共和国的软弱。他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转而采用新的口号——“劳动、祖国和家庭”。

一些一贯反犹的人进入了贝当的政府。例如泽维尔·瓦拉特，1941年春成为贝当政府的犹太人问题专员，随后他对监督驱逐犹太人离开法国的党卫军军官特奥多尔·丹内克说：“我成为反犹主义者要比你早得多。”²⁴还有他的继任者路易·达奎尔，曾在战前组织法国的反犹大会，因煽动种族仇恨而入狱，常常在咖啡馆和犹太人发生冲突。²⁵

贝当政府很快就开始推行反犹太人立法。1940年10月，一部在很多领域剥夺犹太人工作权的《犹太人法令》出台。犹太人不能再担任公务员、警察、记者、教师和军官，只有很少一部分犹太人不在此限——例如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至于来自外国的犹太人，他们受到了最苛刻的待遇，必须被关进法国境内的“特殊集中营”²⁶。

没有证据表明是德国要求维希政府实施这些反犹太人的措施。²⁷事实上，是贝当亲自修改了10月法令的草案，让它变得更为严酷。²⁸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法国当局迫害犹太人完全是出于自愿，而非接受命令。对于法国犹太人来说，当他们明白自己的同胞已经准备好牺牲他

们时，这一打击是毁灭性的。“昨晚我哭了，”雷蒙—拉乌尔·兰伯特在1940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就像一个男人被他唯一挚爱和追随的女人突然抛弃了一样。”²⁹

维希政府的所作所为似乎更令人愤慨，因为法国是启蒙运动和人权观念发源的国家，也是言论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事实上，早在18世纪末期，法国就是第一个解放犹太人的欧洲国家。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出现过德雷福斯事件的国家，19世纪90年代，这名犹太军官遭到了不公指控。在20世纪30年代，莱昂·布鲁姆的左翼政府纯粹因为他的犹太血统而受到攻击。《犹太人法令》显然反映了后一种不宽容的精神，它的序言指出：“在国家的重建工作中，政府必须从一开始就要关注犹太人以及那些外国人的问题，因为他们并不珍惜我们的款待，却对我们的失败立了大功。”³⁰

根据新的法令，外国犹太人受到更多的伤害并非偶然。1940年12月，在法国的大约三十三万名犹太人中，有约十三万五千人不是法国公民，而是从别国逃往法国寻求庇护的。这些法令所称的“外国人”，尤为法国反犹主义者所憎恨，相比于本国犹太人，他们以后将会经历更大的苦难。在大屠杀中，法国当地的犹太人有10%丧生，而在法国的外国犹太人则有40%死于纳粹之手。³¹

从本质上来说，维希政府的政策是隔离并最终审判和驱逐“外国”犹太人，同时“中立化”或者说是同化本国的犹太人。事实上，维希政府对本国犹太人的态度总是模棱两可的。海军上将弗朗索瓦·达尔朗在1942年2月成为法国总理，他甚至说：“我对过去十五年中拥入我们国家的无国籍犹太人毫无兴趣，但是其他优秀的法国犹太人，有权得到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保护。顺便说一下，我自己的家族里就有一些是犹太人。”³²

因此，如果你是战争第一年生活在欧洲沦陷区的犹太人，那么你的待遇不仅取决于居住在哪个国家，还取决于你是不是那里的土著。同样，尽管纳粹并未打算对其统治下的所有犹太人都采取划一的办法，但显然在被占欧洲的大多数地方都有一个核心的原则——正如他们在德国所做的那样，首先是要把犹太人区别并孤立起来。

至于下一步，纳粹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欲望，那就是掠夺犹太人的财富，再把他们从所有的控制区驱逐出去。正如之前我们所看到的，马达加斯加岛成了这一时期犹太人一个可能的去处。但由于马达加斯加岛计划取决于商船是否可以平安地载运犹太人航行数千英里，这一想法只有在英国海军没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英国退出战争，但这是很难做到的。由于德国空军的轰炸无法让英国人回到谈判桌上来，显然德国人不可能成功登陆英国，希特勒对此十分不满，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东方。在1940年9月17日希特勒举行的一次会议后，“海狮计划”被无限期推迟，转而执行进攻苏联的计划。

纳粹无法执行马达加斯加岛计划，并不意味着他们搁置了驱逐犹太人的想法。那年秋天，德国西部巴登州的纳粹长官罗伯特·瓦格纳强行把六千五百名德国犹太人赶过边境进入维希法国。瓦格纳也是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长官，曾经驱逐过这片新近“日耳曼化”的土地上不需要的法国居民。这一经历似乎使他在驱逐犹太人时有了如法炮制的想法。1940年10月22日和23日，当地警方拘捕了犹太人，并强迫他们登上前往维希的火车。他们每人只能随身携带五十公斤物品和一百德国马克。海德里希称：“驱逐犹太人是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进行的，平安无事。普通民众几乎不知道有这次行动。”³³

这一行动使人想起最近在波兰发生的将犹太人从“日耳曼化”土地上驱逐到普通政府辖区的事件。正如普通政府长官汉斯·弗朗克将

军做的那样，维希政府也反对自己的领土被用来接收犹太人。他们接收了九列装载犹太人的火车——七列来自巴登，两列来自萨尔普法尔茨——仅仅是出于其中可能也有法国公民的考虑。³⁴“法国政府不能再给这些外国人提供庇护，”1940年11月18日，维希政府提出了抗议，“迫切建议德国政府应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将他们送回德国，并对法国因他们的逗留而产生的支出进行赔付。”³⁵但纳粹拒绝按照自己手下败将的要求行事，来自德国的犹太人被继续关押在法国西南部的集中营里。其中很大一部分在1942年被运往东部，最终死于纳粹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

1940年秋天这次鲜为人知的行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因为要记住那些在家中突然被赶走的德国公民的痛苦，而且可以通过它来观察各地方的主动性是如何影响最终决策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并非希特勒想到要驱逐巴登和普法尔茨的犹太人，然后命令瓦格纳去执行这项任务。相反，是纳粹地方长官瓦格纳在没有通知法国人的情况下就把德国犹太人送到了边境。据另一份报告称，希姆莱为这一行动大开绿灯，希特勒也是如此。³⁶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希特勒是个好高骛远的领导者，他希望他的下属能够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在驱逐行动前的一个月，他对瓦格纳及萨尔普法尔茨和洛林的纳粹地方长官比克尔说，在“十年之内”，他只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份报告，即他们所在的地区已经完全“日耳曼化”了。他不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完成“日耳曼化”的，也不在乎如果将来什么时候认为之前获得领土的方式是不愉快或不合法的。³⁷

在很多时候，这是希特勒对纳粹上层领导者的典型指示：这是你的目标，用你喜欢的任何方式来完成它。因此，不同的地方长官可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手段。但泽—西普鲁士的长官阿尔伯特·福斯特和瓦尔

特高的长官阿尔图尔·格赖泽尔是一对相互竞争的对手，都热衷于把希特勒的“日耳曼化”政策推行下去，波兰的景况可想而知。阿尔图尔·格赖泽尔下令对波兰人进行检查，看看他们是否可以被归类为日耳曼人，那些被认为不是日耳曼人的人被驱逐出境。而在相邻的行政区，阿尔伯特·福斯特采取了更为放任的态度，把成群结队的波兰人划归为日耳曼人。这不仅引起了两人之间的争吵，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情况：同一个家族中的成员，在福斯特那里的是日耳曼人，在格赖泽尔那里的是波兰人。³⁸对于波兰人来说，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些在福斯特管辖下被归为日耳曼人的人不会被驱逐出境，并且能获得比格赖泽尔管辖下的波兰人更多的食物。尽管如此，福斯特和格赖泽尔都声称他们实现了希特勒的愿望——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同样的情况在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各项政策中都存在，即两个地区的领导人奉行不同的政策，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遵循了他们元首的意愿。阿尔图尔·格赖泽尔在罗兹建立了犹太人隔离区，与此同时，东上西里西亚的长官弗里茨·布拉赫特正奉行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在他的地盘上，党卫军头子阿尔布雷希特·施梅尔特强迫犹太人在各种工厂和建筑工地劳动。³⁹所以在布拉赫特管辖的几座主要城市中，如卡托维兹和本津，犹太人没有被封闭在隔离区中。⁴⁰

上层的愿景式领导，下层的积极主动，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大屠杀发展的特点。同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这些人不仅为自己充满仇恨的意识所左右，还受到他们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影响。

* * *

那年秋天，希特勒还在考虑许多重大的战略问题——其中最重要

的是，他是否应该下令入侵苏联，发动一场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毁灭战争。在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之后，他才做出了最后决定。1940年11月12日，莫洛托夫抵达柏林，和希特勒及里宾特洛甫进行了会谈。他列出了一份关于两国关系的详细清单，例如，德国对于它们之间的缓冲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但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并不想停留在这样乏味的话题上。相反，他们热衷于大谈未来既宏伟又模糊的德意志世界帝国。讲究实际的莫洛托夫和高谈阔论的希特勒之间毫无默契，苏方翻译称这次会面“令人厌烦，显然毫无意义”⁴¹。在这次“聋子对话”后一个月，希特勒于1940年12月18日签发了入侵苏联的命令，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它是以12世纪指挥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命名的。

这一次，德国的将军们对希特勒的史诗般计划几乎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入侵法国的成功，以及纳粹关于苏联人是“劣等人”的思想教育，但同时也因为军事情报表明红军并不构成很大威胁。最近，苏联军队在对芬兰的战争中表现欠佳，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清除了红军中许多最优秀的军官，原因是担心他们在密谋反对他。所有这些让国防军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认为，“俄国巨人将被证明是一只猪尿脬，只要一刺就炸裂了”⁴²。

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决定，对纳粹的犹太人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把犹太人送到“非洲殖民地”的想法被搁置，必须为关押在波兰隔离区的犹太人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如前所述，按照纳粹的设想，这些犹太人隔离区只是在赶走他们之前暂时的措施。

到1940年夏天，罗兹犹太人聚居区的情况已经濒临绝望。8月因缺粮爆发了骚乱，饥饿的犹太人高喊：“我们要面包！我们快饿死

了！”⁴³瓦尔特高的纳粹官员要求汉斯·弗朗克允许犹太人被驱赶进普通政府辖区，因为“瓦尔特高的犹太人情况日益恶化”，而隔离区“建立起来的前提是，犹太人最迟于年中就要开始被驱逐出境”。⁴⁴

汉斯·弗朗克坚持己见，拒绝接收罗兹隔离区的居民。所以，瓦尔特高当局只能自己解决自己造成的问题。由于隔离区的犹太人已经没钱从德国人那里购买食物，纳粹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让犹太人饿死，要么允许他们工作，挣钱购买食物。有两个人分别代表了困境的两面：德国隔离区行政长官汉斯·比伯和级别略低的亚历山大·帕尔芬格。埃斯特拉·弗伦基尔是一名波兰犹太人，在隔离区的犹太公会办公室工作，1940年夏秋与这两名德国官僚都打过交道。她记得帕尔芬格很乐于见到犹太人“饿死”⁴⁵。“犹太人的迅速消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关心的问题，”帕尔芬格在1940年末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也许并不那么可取，不过只要随之而来的影响不触及德国人民的公共利益就行。”⁴⁶而比伯的看法截然不同，正如埃斯特拉·弗伦基尔所说：“比伯非常有商业头脑，说起话来头头是道——而这正是帕尔芬格所缺乏的。他可以一直不停地劝说别人，直到嘴角浮出白沫。”⁴⁷比伯设想让隔离区能够自给自足，可以为犹太人建立工厂和作坊，生产的商品可以换取购买食物的资金。

最后比伯的看法占了上风。纳粹向犹太公会提供了一笔三百万德国马克的“贷款”（以前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资金），以便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这正是隔离区的犹太人领袖罗姆科夫斯基想要的，他曾游说罗兹的市长，希望能在隔离区建立一个工厂体系：“隔离区有八千到一万名各行各业的能手……有制鞋和制靴匠（手工和机器的）、制鞍匠、裁缝（可以量尺寸和大批生产）……圆帽和军帽匠、锡匠、铁匠、橱柜匠、石匠、画家、装订工、装潢工，我可以安排【这些熟练的工匠】为当局

工作……”⁴⁸

这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它标志着犹太人隔离区从临时性的措施——被驱逐前临时关押的地方——过渡到一个理论上可以自给自足的机构。罗姆科夫斯基对此尤为热心，他认为隔离区犹太人生存的关键是让德国人感到他们是有用的，他称之为“劳动自救”。结果，隔离区有工作的人比失业者吃的要好得多。⁴⁹纳粹和犹太人都有兴趣来完善这个新的工厂体系，因为犹太人亲身经历了夏天几乎饿死的痛苦，而纳粹则有钱可赚。

新鲜事物在两边都产生了腐败。瓦尔特高的统治者阿尔图尔·格赖泽尔打算通过搜刮犹太人隔离区来充实自己的荷包，比伯会定期把钱转入格赖泽尔的个人账户。⁵⁰埃斯特拉·弗伦基尔还见过一个装满贵重物品的手提箱，都是从隔离区弄来送给格赖泽尔的。在犹太人方面，罗姆科夫斯基现在拥有比以前更多的权力，因为在新的安排之下，德国人给隔离区的一切供应都要经过他的办公室。他开始不顾他人为自己牟利，在隔离区他的生活水平比任何人都要高，他甚至有一辆四轮马车和车夫。

与此同时，在七十多英里外的东方，位于普通政府辖区内的华沙建立了最大规模的犹太人隔离区，即将与外界隔绝。超过四十万名犹太人被圈禁在1.5平方英里的华沙隔离区之内——在这块小小的地盘上，犹太人数比整个法国、丹麦和挪威的还要多。在华沙的人口中，大约有30%是犹太人，因为数量太过巨大，所以这一隔离区建成的时间也较晚。

战争开始后四个星期华沙就被占领，德国人立刻开始了对这里犹太人的迫害。几天之内，纳粹就命令犹太人建立一个犹太公会，通过这个公会可以向犹太人宣布各种反犹措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华沙

的犹太人被勒令戴上印有蓝色“大卫星”的白色臂章。犹太学校被关闭，财富被没收，犹太人被抓去充当劳工，并且经常受到德国人的折磨。1940年2月，华沙犹太人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写道：“这是他们在黛娜斯公园的车库里玩的游戏，工人们被命令用木鞋互相殴打……一位拉比被命令在裤子里拉屎。他们把工人分成几组，让工人们互相争斗……我见过有人在这些比赛中受了重伤。”⁵¹他还写道：“昨天和今天，妇女都被抓去劳动了，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就是这样。她们被命令用内裤擦洗人行道，然后再湿漉漉地穿回去。”⁵²

犹太人不仅受到德国人的迫害，而且还被波兰人威胁。亚当·切尔尼亚科夫，曾经是一名科班出身的工程师，现在是犹太公会主席，在1939年12月的日记中写道，一个疯狂的波兰女人“袭击犹太人，殴打他们，抢夺他们的帽子”⁵³。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描述了“一群波兰小流氓一连几天殴打犹太人，在【犹太】社区办公室前游行，打碎了街对面房屋的窗户”⁵⁴。还有波兰人认为现在可以对犹太人肆意偷盗。1940年的新年前夜，有两个“陌生人”找到切尔尼亚科夫，说他的公寓被“征用”了。后来得知，“征用”他公寓的人是一个“运送或销售羹汤的司机”——现在轮到切尔尼亚科夫纠结了，不知道该不该要求党卫军惩治这个试图偷走其公寓的波兰人。⁵⁵

在1940年隔离区封闭之后，纳粹采取了和当初罗兹同样的办法——强迫犹太人要么自己购买食物，要么饿死。那个在罗兹关于是否应该让犹太人大批死掉的争论中失利的亚历山大·帕尔芬格，被任命掌管华沙的运输部门，这个部门负责评估隔离区内犹太人交出的物品值多少钱，可以换回多少粮食。帕尔芬格的上任，对华沙犹太人来说是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他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对他来说，有多少犹太人死了，仍然是个“完全不关心”的问题。

就像在罗兹的隔离区一样，那些有贵重物品可以出售的犹太人，或者在隔离区内找到一些有报酬工作的犹太人，有机会免于饥饿。富有的犹太人购买走私到隔离区的食品——根据估计，隔离区中有80%的食物是通过黑市销售的。⁵⁶如果你失业或一无所有，那么你就有可能迅速死亡。绝望中，女人甚至开始出卖自己。1941年1月，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写道，“到处都有在街上徘徊的人”，“昨天，一位长相非常体面的女士拦住了我”。他从这一经历中所洞察到的人性是黯淡的，“死神驱使人们做任何事情”。⁵⁷

海莉娜·比伦鲍姆十一岁时和家人住在隔离区，在一片恐怖中，她是幸运的。她有一个哥哥叫米雷克，是一名医科学生，在一家犹太医院工作。他曾私下为隔离区的犹太富人打针，所以妹妹没有挨饿。她自己过得相对还好，但周围的景象令她震惊。孩子们躺在“人行道上、街上、房子的院子里……他们都【饿得】浮肿了，脸上几乎都看不到眼睛”。她记得有个“高个子皮肤蜡黄的女孩”在街上表演，为的是换几个硬币买食物。女孩唱的“是一首意第绪语歌曲，讲的是他们【德国人】怎样把她从家乡赶走，她的父母和兄弟一个个死去。她祈求上苍：‘还要煎熬多久？难道玻璃杯还没有盛满我们的眼泪？’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女孩”。⁵⁸

和罗兹一样，华沙的隔离区也在几个月后告急。普通政府的经济部门负责人向汉斯·弗朗克写了报告，提出了一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准备让隔离区变成一个“消灭犹太人”⁵⁹的地方，还是准备让他们暂时活下去？如果是后者，则必须为大约六万名犹太人找到工作，以确保他们能购买足够的食物来养活其余的人。帕尔芬格和以前在罗兹时一样，竭力阻止让大批犹太人获得工作，不过，他同样没有成功。1941年4月，汉斯·弗朗克将他解职，代之以马克斯·比绍夫负责，让

隔离区能够开始进行生产。在5月的一次会议上，和罗兹的罗姆科夫斯基处于相同地位的亚当·切尔尼亚科夫获悉，“饿死犹太人”不是纳粹的目的，“增加食物配给和让工人有活干是有可能的”。⁶⁰在这次会议上，切尔尼亚科夫还被告知，“饿殍遍地有碍观瞻”，“必须尽快清理”。

尽管纳粹没有打算有计划地饿死犹太人，也承诺过为隔离区里的每个人提供食物，但那里还是处于饥饿之中。1941年6月，也就是那次纳粹表示要增加粮食配给的会议之后一个月，切尔尼亚科夫写道，他的工作被窗下一群乞丐的哀叫声打断了，“面包，面包！我饿，很饿！”⁶¹

当华沙隔离区内的犹太人在饥饿中挣扎时，纳粹正在其他地方讨论一个计划，准备在入侵苏联以后在那里饿死上百万人。1941年5月2日，国防军的核心后勤部门表示，“整支”入侵部队势将“在俄国就地取食”，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把需要的一切从这个国家拿走，无疑会有上千万[苏联]人饿死”。⁶²这个月底，5月23日，这个部门又完成了另一份题为“东方经济组织的政治经济方针”的文件，该文件估计，由于德国军队抢夺食物，苏联可能有三千万人将死于饥饿。⁶³

这些想法可不是出于权宜之计，德国军队的高层不是凭空知道要饿死三千万人的，他们背后有意识形态的支撑，德国经济学家早就算好了东方土地上有多少人是“多余的”⁶⁴。纳粹占领了新的土地，还要接受数百万“只会吃饭的人”，这有什么好处呢？希姆莱当然明白这个逻辑将导致种族灭绝。在入侵苏联的几天前，他告诉党卫军的高级幕僚，“俄国战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三千万斯拉夫人口”。⁶⁵

纳粹的计划野蛮而大胆，在侵苏战争中打算消灭的人数超过瑞典、挪威和比利时人口的总和。⁶⁶这个想法在他们内心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建立死亡工厂消灭犹太人的想法。如果我们今天问，什么样的人会有

这样的想法？很简单，答案就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我们已经看到，不仅是希特勒，整个纳粹国家都是建立在种族价值比较的铁律之上的，即认为将入侵苏联的德国士兵比那些当地人更有价值。希特勒认为斯拉夫人这个“种族”是“一群天生的奴隶”。⁶⁷此外，一些苏联的斯拉夫人还同时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这意味着纳粹可以有三个单独的理由去憎恨一个苏联公民，更何况一个人同时是斯拉夫人和布尔什维克、犹太人。

按照希特勒的说法，还有另一个明白的无可辩驳的理由，可以去从数百万人手中抢走口粮，再让他们饿死。他说：“不管是人杀死了老虎还是老虎把人吞噬，世界将一切如常。强者实现自己的意志，这就是自然的规律。世界不会改变，它的规律是永恒的。”⁶⁸对希特勒来说，普世的人性意识是软弱的标志，如果你想要什么，就要去努力争取。如果能从别人那里拿到你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你应得的。其他就不必再说什么了，伟大的宗教领袖、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那些人全都是在浪费时间。

1941年3月30日，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解释说，即将到来的与苏联的战争将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并重申“共产主义对我们的未来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接着说：“我们必须忘记双方士兵之间的友谊，共产党员在战争前后都不会是同志。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一点，虽然能够打败敌人，但三十年后，我们又将要同共产主义敌人做斗争。”希特勒呼吁在同苏联的斗争中取消正常的战争规则，并要求“消灭布尔什维克政委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⁶⁹在他的眼中，东方的战争将是一场为德国建立统治而进行的史诗般的战争——一场他多年以来梦想的划时代的战争。

大多数高级军官并未对希特勒的“毁灭性战争”提出异议。有少

数人，如冯·博克元帅反对所谓的“政委令”，即枪毙苏联俘虏中的政委，但博克主要是担心这些杀戮可能会对军纪产生负面影响。更多的军官同意埃里希·霍普纳上校的观点，他说，在“政委令”正式颁布前一个月，即1941年5月2日发布的一项命令中说，未来的战争将是“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古老斗争的延续，是欧洲文明对莫斯科—亚细亚文明的抵抗，为的是挫败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场战斗必须以粉碎当前的俄国为目标，因此要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来加以执行。要以钢铁般的意志和行动来展开每一项军事行动，无情和彻底地消灭敌人，对现行俄国布尔什维克体制的支持者尤其不可留情”。⁷⁰

东方即将到来的战争，也为纳粹解决犹太人应该向哪里驱逐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早在1941年1月21日，艾希曼的手下、帝国保安部驻巴黎官员特奥多尔·丹内克就知悉：“秉承元首的意愿，战争结束后，将在德国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土地上寻求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⁷¹丹内克称，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受命制订一个计划来实现这个“艰巨的任务”，初步打算是把犹太人先驱逐到波兰的普通政府辖区，再把他们运往何处还没有确定。⁷²

海德里希的团队为“犹太人问题”设计了一个“最终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最终解决方案”这个词在这里并非后来的意思。海德里希正在制订的计划不是要在毒气室里消灭犹太人，而是在战争结束后将他们驱逐到德国控制下的某个地方。艾希曼在战争前就在尼斯科尝试过类似的行动，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海德里希打算把犹太人送到更远的地方——新纳粹帝国所征服的苏联土地的极边。

当海德里希正在推进最初版本的“最终解决方案”时，希姆莱正在与维克多·巴拉克探讨另一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大规模

绝育。对希姆莱来说，简易绝育法的好处就是，不仅可以在犹太人身上这样做，还可以针对其他群体。显然，绝育过的劳动者对周围的人没有“种族”威胁，因为他们无法生育。⁷³为此，巴拉克调查了可能的绝育手段——不能让对象知道在他们身上进行了这样的操作。在1941年3月28日的信中，他概述了以下问题：“如果要进行永久的绝育，只有进行长时间的X射线放射才能等效于阉割，高剂量的X射线会破坏卵巢或睾丸的内分泌。”⁷⁴秘密完成这一流程的困难在于，除非身体的其余部分受到铅罩的保护，否则“身体的其他组织都会受伤”。巴拉克建议，“一种可行的处理方法”是，告诉绝育对象“接近柜台”，并用“两三分钟”填写一些文件。当受害者的身体大部分被柜台遮挡时，X射线就可以打开了。巴拉克写道：“如果安装一台双真空管的设备，每天可以绝育一百五十人到二百人，因此，如果能安装二十台这样的设备，每天可以处理三千人到四千人。”⁷⁵我们已经看到，从1933年以来，纳粹就对残疾人以及其他一些不希望他们生育的人实施绝育，包括有心理失常背景的孩子⁷⁶，但巴拉克的建议更为激烈和扩大化。后来希姆莱没有推进这一想法——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将来进一步的绝育试验是在奥斯维辛。

在这一历史时刻，巴拉克的奇谈怪论展现了纳粹是如何绞尽脑汁地寻找各种可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最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办法——从马达加斯加岛到犹太人隔离区，然后是大规模绝育——它们的终点都是种族灭绝。犹太人的确不会因为绝育而集体死亡，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他们就会消失。马达加斯加岛这块犹太人的“保留地”处于党卫军狂热分子的监督之下，这块土地无法养活大量的人，犹太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在犹太人聚居区，他们也最终会灭绝，因为纳粹创造了一个死亡率高于出生率的环境，儿童被视为“只会吃饭的人”。

假设一下，如果当时纳粹采用了上述一种方法，而不是去建立死亡

集中营，世界还会如此震惊吗？那种灭绝方法是否还会被称为“大屠杀”？也许不会，因为纳粹在东方建立的死亡工厂代表了一种特别的恐怖——人类的生命瞬间被冷酷的机械所毁灭，这一罪行象征着工业时代最极端的恶，比纳粹行刑队在东方进行的大规模枪决更让人难以忘怀。不过，我们仍然应该铭记，所有这些可能的方法和死亡集中营一样，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让犹太人灭绝。

1941年春，希特勒对东方战争的渴望暂时被巴尔干事件所打断——随之而来的是，在德军入侵苏联之前，又有很多犹太人出乎意料地落入纳粹统治之手。希特勒的麻烦是南斯拉夫，1941年3月，他以为南斯拉夫在苦口婆心的劝说之下会决定加入《三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最初是在1940年9月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缔结的，后来匈牙利、罗马尼亚这些德国的小伙伴也加入进来。

希特勒希望能确保得到南斯拉夫的承诺，一来使他的军队在进攻苏联时没有后顾之忧，二来德军已计划好在侵苏前先占领希腊，这样也可以减轻希腊战役的压力。1940年10月，意大利发动了一场对希腊的入侵但惨遭失败，希特勒担心一旦德军入侵苏联，盟军会通过希腊发动反攻。直到1941年3月，南斯拉夫声明至少不准备参与未来的战争，希特勒的愿望似乎可以实现了。

3月27日，就在南斯拉夫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两天后，一群塞尔维亚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保罗亲王的政权，希特勒大为震怒。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背叛行为，下令立即入侵南斯拉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并没有开玩笑。”⁷⁷但这一意外的军事行动意味着，原定于5月发动的侵苏战争被推迟了。

德国人在4月6日袭击了希腊和南斯拉夫，进展之神速令人吃惊，只

用了两周不到就击败了南斯拉夫，而希腊的主要领土则在4月底之前被占领。顷刻之间，大约有十五万多名犹太人落入了德国的控制之下。

在南斯拉夫，组成该国的各共和国之间数百年来种族积怨甚深，而纳粹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南斯拉夫本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和平条约的产物，由塞尔维亚王国和原奥匈帝国的部分土地合并而成。现在，纳粹支持建立一个以安特·帕韦利奇为首的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家，之前他曾为独立进行过针对南斯拉夫的恐怖主义活动。帕韦利奇和他领导的乌斯塔沙革命运动都是些极端种族主义分子。他们断言，克族人不是类似塞族人的“斯拉夫人”，而主要是日耳曼人的后裔，只有真正具有克族“血统”的人才能参与克罗地亚的事务。他们对居住在新的克族国家边界内的将近二百万名东正教塞族人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在这场战争中，乌斯塔沙以非常野蛮和残忍的方式对待这些塞族人——杀害了三十余万人（可能多达五十万人）——这是一件值得人们更好认识的战争罪行。四万名生活在克罗地亚的犹太人也很危险⁷⁸，乌斯塔沙认为他们也不算真正的克罗地亚人。1939年，一篇克罗地亚报纸上的社论说：“犹太人不是克罗地亚人，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克罗地亚人，因为从国籍来说，他们是锡安主义者；从种族来说，他们是闪米特人；从宗教来说，他们信仰犹太教……我想问世界各国人民，为了犹太人的利益，我们还要自相残杀多久？……与其自相残杀，不如先杀掉犹太人……”⁷⁹

根据1941年4月30日关于国籍的法律，克罗地亚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身份。三周后的5月23日，又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所有犹太人都要在衣服上打上黄色的补丁。属于克罗地亚犹太人的企业被没收——其他克族人从中获益要超过政府本身——而犹太律师、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都被解雇了。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马上发生了更为糟糕的事情，6

月26日，帕韦利奇指责犹太人牟取暴利，并命令把他们关进集中营。

虽然帕韦利奇无疑对大规模屠杀负有责任，但在意识形态上并非完全和纳粹亦步亦趋。尽管他相信“共产主义和犹太教共同反对克罗地亚民族解放”⁸⁰，但他把决定谁是犹太人的权力抓在自己手中。他创造了“名誉雅利安人”这个词，为的是让一些犹太人——包括那些被认为为克族国家立下功劳的犹太人——免于迫害。帕韦利奇的动机几乎可以肯定有自私的成分——他的妻子是犹太人的女儿，他的一些同事的妻子也是犹太人。

在邻国塞尔维亚，德国人决定在傀儡政府的协助下实行军事管制。虽然整个军事指挥权掌握在一名德国空军将领手中，但负责民政事务的是一名党卫军军官哈拉德·特纳，后来因参与灭绝塞尔维亚犹太人而臭名昭著。

在德国入侵南斯拉夫时，塞尔维亚约有一万六千名犹太人，其中大多数居住在贝尔格莱德。他们立即成为占领军的目标，德国人的迫害方式可谓驾轻就熟：颁布法令查明谁是犹太人，禁止他们从事各种职业，命令他们佩戴识别徽章，并征召犹太男子进行强迫劳动。

在战前属于南斯拉夫的剩余大部分土地被一群贪婪的邻国瓜分，他们均是德国的帮凶。意大利占领了斯洛文尼亚南部、克罗地亚一片海岸地区和黑山；匈牙利吞并了塞尔维亚部分领土，包括诺维萨德市及迤北地区；保加利亚占领了马其顿大部。

在希腊投降之后，英国和希腊的残兵退往克里特岛，希腊被保加利亚、德国和意大利瓜分。意大利人占领了希腊大部、爱奥尼亚岛和基克拉迪群岛，德国人占领了萨洛尼卡，保加利亚人占领了色雷斯大部和马其顿的其余部分。德军在占领后逮捕了一些犹太人，希腊的犹太人社区面临危险，但他们目前受到的迫害并不像克罗地亚犹太人那样严重。

随着希腊和南斯拉夫被征服，希特勒确保了她的南部侧翼，为入侵苏联做好了准备。但是，这些国家是他本来不想用武力征服的国家，只是因为南斯拉夫的政变，以及意大利人在希腊的糟糕表现招来了盟军，使他不得不采取行动。

在征服这片土地之后，希特勒希望只在当地保持最低限度的驻军，足敷弹压之用即可。正如我们所见，希腊和南斯拉夫境内的犹太人在1941年春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但重要的在于规模。虽然纳粹在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腊之后控制了大约十五万名犹太人，但这还不到目前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人数的一半，对于即将在苏联遇到的犹太人来说，这也是个小数目。

希特勒关心的是东方。在苏联领土上进行的这场被他称为“毁灭性”的战争中，大屠杀将会降临。

10. 毁灭性战争(1941)

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发动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入侵。近四百万德国军队和他们的盟友分为三支强大的力量进攻苏联，最初的目标是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和基辅。对阿道夫·希特勒来说，这是他二十多年来一直梦想的时刻——在东方建立一个庞大德意志帝国的开端。

在入侵的前一天，希特勒曾写信给墨索里尼，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这是一封充满谎言和半真半假的信，例如，希特勒称入侵苏联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而这肯定是他最想做出的决定之一；他还大言不惭地声称，“英格兰输掉了这场战争”。但他在信中有一句话确实是对的，他说，决定入侵之后，他感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¹。对希特勒来说，精神上的自由表现为他想要发动一场没有规则、对战败者毫无怜悯的战争。戈培尔在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元首说，我们做的无论对错，都必须取得胜利。我们责任重大，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整个民族……将被消灭。”²

虽然德国的入侵计划已然空前庞大，但希特勒和将军们的自信心仍在膨胀，他们认为打到东方一千五百多英里外的高加索油田只要短

短几个月。³夺取石油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大量的食物和土地也将被征收。至于生活在苏联的人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纳粹打算饿死他们上千万人。⁴

纳粹仇恨的焦点始终是犹太人。为了直接对抗“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组织了四支特别行动队，总兵力三千人，由帝国安全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队组成。这些特别行动队将紧跟军队进入苏联。在1941年7月2日的一份文件中，海德里希明确命令这些部队枪决“为共产党和共产国家服务的犹太人”以及其他的共产党领袖。他还强调，如果“被占领土地上的反共或反犹分子采取自发行动，我们将不予干涉，相反还将秘密鼓励之”。⁵特别行动队不是唯一在后方参与“清洗”的部队。希姆莱在5月21日的命令中要求秩序警察和武装党卫军派出特别部队进入苏联——仅秩序警察就有一万一千人。⁶这些德国警察将与其他安全部队一起参与到屠杀中来。

海德里希关于“不干涉”当地人反犹活动的命令是如何执行的，在考纳斯的例子可见一斑。1941年6月24日，即侵苏战争爆发两天后，德国军队进抵立陶宛的第二大城市考纳斯。许多立陶宛人欢迎德国人，视他们为摆脱斯大林统治的解放者。早在1940年6月，苏联红军就占领了这个国家，首先强迫立陶宛人民接受在他们的土地上驻军，然后斯大林的军队在立陶宛推行了残酷的“苏维埃化”政策：几千名立陶宛人被视为“人民的敌人”而被监禁起来；土地进行了国有化，出现了经济短缺——部分是因为苏联占领军强行用低价购买立陶宛商品。在德国人到来之前，一万七千名立陶宛人被驱逐到西伯利亚。⁷

因为立陶宛的苦难而受到指责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苏联军队，还特指那些犹太人。“许多立陶宛犹太人当上了政治领袖，加入了警察，”后来参加特别行动队的彼得拉斯·基里扬卡说，“每个人都，在

安全部门都是犹太人负责拷问，他们拧紧箍在犯人头上的螺丝，以此来折磨那些老师和教授。”⁸虽然，这种在苏联统治下立陶宛囚犯大多是由犹太人“负责拷问”的想法是可笑的，但人们认为立陶宛犹太人倾向于同情苏联并非捕风捉影。在红军刚刚抵达时，许多犹太人表示了欢迎——他们知道苏联已经废除了一批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限制条令。不过后来，尽管有一些立陶宛犹太人设法在地方政府和安全部队中取得了职位，但也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因拒绝加入苏联国籍而被驱逐到西伯利亚。⁹因此，在苏联统治下立陶宛犹太人的命运肯定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当然，很多立陶宛非犹太人也和苏联占领军合作。当德国军队开进立陶宛时，这些人很轻易地就把舆论焦点集中到犹太人身上。他们指责犹太人，希望以此来掩盖他们与苏联的交易，从而“用犹太人的血来洗白自己”¹⁰。在历史上，这不是犹太人第一次或最后一次成为合适的替罪羊。

1941年6月25日，德国人来到考纳斯的第二天，在市中心的一个车库外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一连串血腥屠杀事件。一群戴着臂章、手持步枪的平民，强迫四五十名犹太人进入车库的前院。一名德国空军侦察机部队的成员威廉·冈齐留斯目睹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个人从[犹太]人群中拉出一个来，举起铁棍‘砰！’的一下，那个人就倒下去了，受害者倒地以后又被打了一下。”¹¹所有犹太人以同样方式被杀：“这些人被依次带到他身边，然后脖子后颈上挨了一下或几下。所有人都被他杀了。”¹²冈齐留斯拍下了屠杀现场，从他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屠杀是在一大群平民和德国武装部队人员面前进行的。他说：“那些平民的行为令人难以置信，其中还有妇女和儿童。铁棍的重击声一响，他们就鼓掌……”¹³

十六岁的维埃拉·斯基奈特也目睹了屠杀，她记得，在行凶时人群中有人喊：“揍那些犹太人！”一个人甚至举起了他的孩子，以便他能看得更清楚。“这个孩子当然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他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维埃拉问道，“你对那些兴高采烈欢呼的人能有什么指望呢？就好像他自己都想要走进那个车库去殴打一下。”她深感恐惧，跑到了附近的一片墓地。“我很惭愧，”她说，“当我来到墓地，我坐下来，心想：‘万能的上帝，我以前听说过打碎[犹太人]窗户之类的事情，这是可以想象的，但这种残暴的行为，殴打一个无助的人……太过分了。’”¹⁴当她回到车库时，犹太人都被杀了，那个砸开他们脑袋的人爬上了尸堆，用手风琴演奏了立陶宛国歌。¹⁵

瓦尔特·施塔勒克博士是负责波罗的海地区的特别行动队A大队的指挥官，他揭示了纳粹与这些行为的关联性。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当地的反犹分子被诱使进行针对犹太人的屠杀……必须要建立这样的印象，即当地居民已经自发地采取了这样的行动，这是对数十年来犹太人的压迫以及最近更为可怕的红色恐怖所表现出来的自然反弹。安全警察的任务是让他们活跃起来并纳入正确的轨道，以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既定的清洗任务。”¹⁶因此，海德里希关于“为共产党和共产国家服务的犹太人”应当被处决的命令，显然只是一份公众可以接受的关于屠杀人数最低数量的声明。

海德里希对于各地指挥官如何贯彻他的命令给予了相当大的自由度，因此，不同的特别行动队杀人的效率也不同。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在迫害和屠杀犹太人方面，命令并不总是明确和固定的。相反，在地方的主动权和高层含混的指示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不过，特别行动队指挥官至少有一个原则是可以遵循的，那就是越残暴越正确。没有杀死足够多的人，甚至还表现出怜悯之心，都会被视为没有卖力工作。

因此，当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视察考纳斯以南九十英里的格罗德诺时，对杀人数字表示了不满。尽管格罗德诺有大量犹太人，但特别行动队第九分队“仅仅”杀死了九十六名犹太人。¹⁷显而易见，当年夏天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没有因为哪个分队杀人“太多”而表示过不满。

在考纳斯屠杀的四天之后，罗马尼亚人也做好了屠杀犹太人的准备。和立陶宛一样，罗马尼亚犹太人经常被指责同情苏联。在1941年6月前，以扬·安东内斯库元帅为首的罗马尼亚政府是一个恶毒的反犹政府。

罗马尼亚人作为纳粹的盟友积极参与了对苏联的入侵。大批罗马尼亚士兵于6月22日进入苏联领土，与德国人并肩作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1940年，苏联占领了比萨拉比亚和罗马尼亚东部的其他领土，现在安东内斯库元帅很高兴能有机会夺回这块土地。

安东内斯库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相信德国会战胜苏联。6月12日，就在入侵苏联之前，安东内斯库拜会了希特勒，并对他说：“拿破仑或者1917年的德国人必须面对空间所带来的巨大问题，现在空中和地面的机械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空间不再是俄国的朋友。”¹⁸

罗马尼亚军队准备趁着这次入侵攻击犹太人，第一个标志就是6月底在罗马尼亚东部的雅西发生的屠杀事件。安东内斯库希望这座城市能清除犹太人，苏德战争一爆发，谣言就开始散布，说是雅西的大约四万五千名犹太人正设法帮助苏联。¹⁹从6月28日到29日的晚上，罗马尼亚人——包括大批警察、反犹组织“铁卫”和普通市民——横扫整个城市，杀害犹太人。德国人也参与其中，赫尔曼·冯·斯特兰奇少校负责联络。斯特兰奇娶了一个罗马尼亚妻子，对这个国家很熟悉。

雅西的一位犹太著名人士回忆道：“我看到人群在混乱中逃离，步

枪和机枪在开火。我被打中两枪，倒在人行道上，我在那里躺了好几个小时，看着熟悉的人和陌生人在我身边死去……我看到一位年迈的犹太男子，他在1916年至1918年的战争后残废，胸前戴着‘坚毅和忠诚’的勋章；他还带着正式解除反犹限制的文件。然而，子弹击碎了他的胸口，他像狗一样在垃圾桶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街道另一边，躺着一个皮匠的儿子，他“正在垂死哭泣：‘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给我点水，我渴。’……士兵们……用刺刀把他们都结果了”。²⁰6月30日上午，该市卫生部门的弗拉德·马里耶维奇来到警察总部时，发现“堆得像木头一样高的尸堆”，他的卡车都很难开进院子。前一天晚上，有太多犹太人被杀，以至于“地上的鲜血漫到了大门，染红了我的鞋底”。²¹

至少有四千名犹太人在这座城市惨遭屠杀，有人估计甚至多达八千人。²²五千多名犹太人被迫登上两列火车被驱逐到南方。密封的火车车厢塞满了人，他们感到呼吸困难，罗马尼亚警卫拒绝给他们水喝。过了几天，他们渴得几乎无法忍受。来自雅西的犹太人内森·戈德斯坦目睹了火车在河边停下时发生的事情：“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跳出车窗去喝水，但[列车长的副官]瞄准他的腿开了一枪，把他打倒在地。孩子尖叫道：‘水，水！’副官抓住他的脚，大声说：‘你要水吗？好吧，让你喝个够！’然后把孩子倒提起来，将他的头浸到巴鲁依河的水里溺死了，最后把他扔进河里。”²³

雅西的屠杀只是个开始。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罗马尼亚人在过去属于他们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相继杀害了超过十万名犹太人。连德国人也抱怨罗马尼亚人的肆意屠杀，例如，冯·舒伯特将军就对罗马尼亚人没有掩埋尸体感到不满，特别行动队第10A分队的指挥官批评罗马尼亚人的行为“缺乏计划”²⁴。很明显，生活在刚刚从苏联手中“解放”的土地上的犹太人首当其冲受到了暴力冲击，犹太人与“布尔

什维克主义”之间的联系再次成为屠杀的一个理由。

1941年夏天，苏德战争对集中营也产生了影响。海德里希7月2日的命令要求，跟随前线推进的特别行动队要杀死“人民政委”，即苏联的政工干部。然而，一些政工人员被捕后没有立即查明身份，直到他们被转移到远离特别行动队的战俘营时才发现，这给纳粹带来了麻烦。这些人从数十万名苏联囚犯中被甄别出来后，如何才能将他们迅速处决？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集中营开始了有系统的大规模屠杀，这一秘密行动的代号是“14f14”。

1941年7月，几百名苏联政委被押往奥斯维辛。营地的波兰囚犯卡齐米兹·阿尔宾回忆道：“他们穿着军服，但不是[普通]士兵的军装，而是军官的制服，非常破烂。他们胡子拉碴，面容消瘦，给我的感觉是一直生活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他们看起来不像简单的士兵，而像是有知识的人。”²⁵ 政委们在大门附近的砾石坑里劳作，他们将在这里工作到死。另一名波兰囚犯卡齐米兹·斯莫伦说：“他们不停地被殴打，那些喊叫声不绝于耳。党卫军在大喊大叫，‘卡波’在大喊大叫，被打的人也在大喊大叫。”²⁶ 政委们被迫在砾石坑里连续劳动几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如果放慢脚步，就会遭到毒打，甚至枪杀。卡齐米兹·斯莫伦说：“过不了几天，他们就都不存在了，这是对数百人的折磨和屠杀。他们死得很惨，就像是恐怖片，但这样的电影永远不会上映。”

苏联政委也被押往其他集中营杀害，党卫军各单位都有自己的杀人方法。例如，在柏林郊外的萨克森豪森，党卫军进行了一番精心策划的表演以欺骗他们。这些政委被带到一个经过特殊伪装的军营，并被告知脱掉衣服，准备进行体检。一旦他们赤身裸体，就会一个接一个被带到一间被称为医生办公室的房间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党卫军会看一下他们，政委们并不知道，党卫军只是关心他们是否有金牙之类的东

西可以在死后拿走。接下来，他们被带到第三个房间，在那里他们被告知要量身高。等他们贴着一根测量尺站好以后，通过一个与相邻房间连接的翻盖小洞，他们的脖子后部就会中弹。“卡波”把尸体运走，马上清理行刑室，为下一次处决做好准备。候诊室里播放着响亮的音乐，以掩盖枪声。

尽管这种杀戮过程颇费周折，但党卫军还是能做到平均几分钟杀死一人。在1941年大约十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杀害了几千名苏联战俘。²⁷但他们没能保守住屠杀的秘密，一名狱友写了一张纸条放进罐子里，没有让党卫军发现。上面的日期是1941年9月19日：“我们刚刚发现又有四百名红军被押到集中营，我们都承受着这些屠杀的沉重负担，屠杀已经夺去了一千多人的生命。以我们目前的处境，还帮不了他们。”²⁸

在屠杀苏联政委时，成人安乐死计划也开始在集中营实行开来。根据代号为“14f13”的行动计划，不适合工作的犯人被选出来送往安乐死中心。1941年7月28日晚，在奥斯维辛，大约五百名生病的囚犯登上了一列火车前往德累斯顿。党卫军告诉他们，离开营地是为了去其他地方进行康复。“他们尚存一线希望，”望着他们离去的卡齐米兹·斯莫伦说，“希望是最后逝去的東西。”²⁹病人被带到索嫩斯泰因安乐死中心被用一氧化碳毒死，他们是第一批死于毒气的奥斯维辛囚犯。他们被选中并非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生病了，他们没有死在奥斯维辛，却死在了德国的心脏地区。

就在几天之后，1941年8月，“T4”安乐死计划受到了威胁。明斯特主教克莱门斯·冯·加伦对“安乐死”的做法进行了强力抨击，也是第三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反抗宣言之一。当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在明

斯特大教堂，加伦说：“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听到有报道说，那些得病一段时间、看上去无法治愈的人，被从精神病医院和疗养院带走，这是奉了柏林的命令。过了很短时间，他们的亲属就会接到通知，说病人已经死了，尸体被焚化了，骨灰可以送还给他们。人们普遍怀疑，精神病人突然大批死亡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为造成的。有人认为，夺走所谓‘无价值的生命’是有正当理由的——如果那些生命对于人民和国家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就可以被滥杀。”³⁰加伦激动地认为：“这不是机器，也不是牛马，唯一的目的是为人服务，为人提供商品，一旦没有用了，我们就可以销毁它们、屠宰它们。不，他们是人，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可以是穷人、病人，也可以是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他们是否因此就丧失了生存的权利？”他说，如果同样的规则被滥用，也可能导致肢体残疾的人被杀死，因此特别警告，东方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即便是“勇敢的士兵”，回家时也可能“严重残疾”。

加伦的干预对希特勒来说尤其不是时候。1941年初，巴伐利亚州的纳粹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曾下令辖区内的学校拆除所有十字架。这一行动不是希特勒要求实施的，也不能完全确定是瓦格纳自作主张，但在纳粹党高层，有人坚决支持对教会进行打击。纳粹党的秘书长马丁·鲍曼在1941年6月曾给所有州的纳粹地方长官发去一封信件——就在瓦格纳在巴伐利亚下令的几周后——其中阐述了打破教会权力的重要性。瓦格纳和鲍曼都是教会的激烈批评者，鲍曼如此热心于采取行动打击教会势力，他可能是听到希特勒说了什么，于是拿起了鸡毛当令箭。³¹

不管为什么会下令从巴伐利亚的学校中移走十字架，这对纳粹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许多巴伐利亚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通过一连串的请愿书、示威游行和公开集会进行抗议。家人写信给

前线的儿子和丈夫，抱怨家里发生的事情。巴伐利亚的纳粹分子埃米尔·克莱因曾参加过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现在正在东线作战，他说：“我们当然很生气，当我们躺在战壕里的时候，居然听到他们在巴伐利亚家乡要把十字架从墙上取下来，我们对此非常愤怒！”³²

希特勒不能失去像埃米尔·克莱因那样的人们支持，于是撤销了关于十字架的命令。大众的想法又一次挽回了希特勒的名声，他们认为希特勒对下属的行为并不知情。一封匿名的抗议信攻击了当地的纳粹：“你在外面套着褐色的衬衫，在里面却是个布尔什维克或者犹太人，不这么做，你就没法背着元首干那些事。”³³

紧接着十字架的问题，加伦的谴责对希特勒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虽然他很想看到加伦因此而倒霉，但他不能激起基督徒支持者的不满。此外，在德国各地运送将要被杀死的残疾人，现在已被推到危险的风口浪尖。

1941年8月24日，希特勒决定终止“T4”行动。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安乐死”都停止了——还有个别医院继续让残疾人饿死，或进行致命的注射——但在特殊杀人中心里成批地使用毒气则不再发生。反过来，这意味着实施“T4”方案的许多人，如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和埃尔姆弗里德·埃贝尔这样具有大规模杀人技术的专家都失业了，不久以后，他们就被要求在其他地方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

不能完全说是因为加伦的干预导致了“T4”行动的终止，因为在十字架事件和其他一些事情之后，希特勒已经开始担心民众的情绪。³⁴然而，这一插曲不仅表现了冯·加伦主教的个人勇气，而且证明了在第三帝国是有可能进行公开抗议的——当然是危险的，但并非完全不能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犹太人问题，冯·加伦主教或其他普通德国民众并未提出过类似的抗议。也许有很多人在内心是反犹的，但这不是没有

行动的唯一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主教会担心抗议将给自身带来影响，于是对迫害犹太人采取了疏远的态度。此外，犹太人被迫害，并未对大多数非犹太德国人产生影响。犹太人历来与其他人近乎完全隔绝，他们住在犹太式的房子里，孩子都上犹太学校。而大多数德国平民在军队中都有亲戚，因此安乐死计划会对他们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他们的亲人在战斗中受重伤后又由政府杀害了呢？

希特勒知道他的许多支持者都是基督徒，没有他们的支持，他的野心就会化为泡影。埃米尔·克莱因既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名忠诚的纳粹，非要他在这两种信仰之间做出选择是愚蠢的。而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没有这种问题，前线的士兵和他们在德国国内的亲戚中很少有人关心犹太人的遭遇，并愿意冒着危险去进行抗议。

在德国国内十字架之争上演之际，希特勒的士兵们似乎将要赢得对苏联的战争。6月底，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被德军攻陷，近三十万名红军士兵被俘。到目前为止，即战争开始后的一周内，德国装甲部队已经差不多走完了到莫斯科路程的三分之一。这不仅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入侵，也是最迅速的入侵。希特勒在与他的助手交谈时得意扬扬地说道：“对于那些问我把边境推进到乌拉尔山是否已经足够的人，我的回答是，我们现在把边境推到那里已经足够了。但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必须被消灭。”他对莫斯科的想法很简单，这个城市必须“从地球上抹掉”³⁵。十天后，即7月16日，希特勒会见了包括戈林、鲍曼和罗森贝格在内的主要纳粹人物，并宣布，他打算在东部地区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去建立一个“伊甸园”，包括“枪决”和“迁徙”，任何“哪怕是不正眼看我们的人”都应该被杀掉。³⁶

7月16日会议后不久，希姆莱下令增派大量在苏联执行屠犹任务的安全部队，人数多达一万六千余人，主要成员是党卫军官兵。当希特

勒说他想在苏联领土上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建立一个“伊甸园”时，希姆莱并不在场，但他对元首的意图心领神会。毕竟，这就是他在第三帝国能够平步青云的原因。在接下去的几周内，他检阅了那些在后方执行杀戮任务的部队——在受检阅的地方，不仅是屠杀人数增加了，屠杀范围也扩大了。到1941年夏秋之交，犹太妇女和孩子已经和男人一样被杀掉，现在连婴儿都成了目标。纳粹再也不能诡称只杀害那些对他们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犹太人了。

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屠杀极为丑陋，但对于纳粹来说，扩大屠杀的范围，包括杀死犹太妇孺并不算背离自己的意识形态。德军士兵已经意识到自己进行的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如前所述，他们被告知要就地取食，因此不得不让“几百万”当地人饿死。6月24日，入侵开始两天后，希姆莱命令康拉德·迈耶教授着手起草“东方总计划”——这是一幅关于纳粹铁蹄下东方的宏大景象，有上千万的苏联男人、女人和孩子将因此死去。就像希姆莱在东线战前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事关生存的问题，因此将是一场严厉而无情的种族斗争。”³⁷

在纳粹看来，为什么要杀掉这些犹太妇女和儿童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那就是一旦犹太男子被杀，妇女和儿童就失去了养家糊口的来源，很可能会因饥饿而慢慢死去。在第三帝国扭曲的人性世界中，一名纳粹分子甚至认为，更人道的做法是迅速杀死她们，而不是让她们饿死。再回到波兰，7月16日——也就是希特勒召开关于在东部建立“伊甸园”的会议同一天——党卫军大队长罗尔夫·海因茨·霍普纳给阿道夫·艾希曼写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有关瓦尔特高的局势：“现在面临一种危险，冬天即将到来，不可能养活所有的犹太人。必须认真考虑是否可以迅速采取一些措施，结束不适合劳动的犹太人的生命。这是最人道的解决办法，肯定比让他们饿死更令人愉快。”³⁸

然而，抽象的谈论扩大杀戮是一回事，对于党卫军官兵来说，站在赤裸的犹太妇孺身边扣动扳机又是另一回事。在1941年夏天和秋天，数千名党卫军官兵第一次以这种方式成为杀人凶手。例如，1941年8月初，第一党卫军步兵旅在乌克兰西部的奥斯特罗格对犹太人进行了屠杀。奥斯特罗格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城镇，有一万名犹太人，现在又有几千人从周围地区来到城里避难。8月4日，党卫军把奥斯特罗格的犹太人强行驱赶到郊区。“他们把我们当牛一样对待，”当时十二岁的犹太男孩瓦西尔·瓦尔德曼说，“他们[党卫军]全副武装，牵着狗，让强壮的[犹太人]搬运病弱的人，有胡子的人都挨了打，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拉比，我们看到他们脸上有很多血。我记得他们[犹太人]哭喊道：‘他们在打我们，我们像狗一样挨打。’”

当犹太人来到一大片沙地时，党卫军命令他们坐下，告诉他们需要挖掘防御工事，但他们很快就明白要被处死。“我们看着父母，”瓦西尔说，“当看到祖母和母亲痛哭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有可怕的事要发生。”³⁹

犹太人在酷暑中等了几个小时后，然后被命令分批脱掉衣服，所有贵重物品都被拿走了。接下来，他们被带到一个露天的大坑边枪决。但党卫军在一天之内无法杀死全部犹太人，所以晚上剩下的人被赶回奥斯特罗格。第二天，杀戮又开始了，直到一名奥斯特罗格的军官提出需要剩下的犹太人干活。⁴⁰几乎整个瓦西尔家族都被纳粹杀害了——包括他的父亲、两个兄弟、两个叔叔以及他的祖母和祖父。瓦西尔和他的母亲被非犹太人邻居藏了起来，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他说：“他们冒着危险，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没人告诉德国人我们藏起来了。”

“在奥斯特罗格的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之间没有任何问题，”非犹太裔的乌克兰人奥列克西·穆勒维奇说道，德国人来的时候他十六岁，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是不能原谅的。我觉得犹太人和我没有区别，我知道下一次就该轮到我了。”奥列克西觉得他和他的家人可能会饿死，因为纳粹“把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拿走了。当时我们有两公顷的土地，他们抢走了玉米和牛……德国人是所有人的敌人，他们就像野兽一样”⁴¹。奥列克西对德国以牺牲当地居民为代价养活军队的计划细节一无所知，但他和他的家人们感觉到了它的影响，因为他们只有到处寻找零星可吃的东西才能挣扎着活下来。

虽然瓦西尔·瓦尔德曼和他的母亲受到非犹太乌克兰人的保护，但不是所有的乌克兰人都对犹太人友好。有许多非犹太乌克兰人因他们的犹太邻居倒霉而从中获利，例如在奥斯特罗格以南五十英里的霍罗基夫，当地人排队以低价购买死亡犹太人的财产。⁴²1941年6月末，利沃夫的街头出现了可怕的情形，乌克兰人参与了对四千名犹太人的屠杀。⁴³暴行肆虐的起因是，人们发现苏联安全部队在德国人到来前杀害了几千名囚犯。

像利沃夫和考纳斯那样纳粹纵容的屠杀的确发生过——有人估计在苏联沦陷的土地上至少发生过六十起这样的事件⁴⁴——但当年夏天和秋天，大部分犹太人是在像奥斯特罗格那样的行动中被德军近距离射杀的。德裔罗马尼亚人汉斯·弗里德里希是第一党卫军步兵旅的一员，亲身参与了这些坑边的屠杀。弗里德里希称他在杀人时“毫无感觉”，他之所以对犹太人缺乏“同情”——或者说是对犹太人的全部“仇恨”——是因为以前犹太人在他的农场买家畜时价钱太便宜了，“伤害”了他的家人。他说，这场战争的“主题”是“反共”，由于“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关系”，尤其因为苏联仅仅是个“半开化”的国家，所以他认为收拾犹太人是理解的。⁴⁵

在一些波罗的海国家，许多当地人与德国安全部队一起枪杀犹太

人。彼得拉斯·基里扬卡就是参加杀戮的立陶宛部队的一员，他认为杀害无辜的犹太平民是正当的，部分是出于他认为犹太人在苏联占领立陶宛期间曾对立陶宛人滥施酷刑——“我们听说他们所做的一切，甚至连妇女也不放过”⁴⁶。他还透露，他的战友都希望能从犹太人那里捞点什么，这种毫不掩饰的贪婪也可能和意识形态一样成为杀人的理由。

一位著名的立陶宛历史学家为参与杀戮的人确定了五个动机：复仇（针对那些据说曾帮助过苏联的人）、赎罪（那些先是和苏联合作，又转而想在纳粹面前表现忠心的人）、反犹、投机（一种迅速适应立陶宛新形势的愿望）和实现自我。在遇见彼得拉斯·基里扬卡后，我相信他符合除了“赎罪”以外的四个动机。⁴⁷

还有一个动机，在上面的清单里没有列出，但几乎可以肯定是彼得拉斯·基里扬卡、汉斯·弗里德里希所怀有的，那就是施虐狂。即便在战争结束很久之后——基里扬卡是在1996年接受采访的，弗里德里希更是在八年以后——他们都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过任何悔恨，在谈到面对面杀人时，似乎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卑鄙的、虐待狂式的兴奋。例如，弗里德里希说犹太人“被吓得呆若木鸡，你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⁴⁸，基里扬卡对枪杀儿童感到“好奇”——“你只要一拍扳机，枪就开火了，然后就这样了。”⁴⁹

基里扬卡的部队还参与了在考纳斯第七要塞的屠杀，尽管他声称自己不在其中。有报告称这些凶手都是性虐狂。“立陶宛的喽啰们夜复一夜地寻找他们的受害者：年轻漂亮的姑娘。”阿夫拉罕·托里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首先是强奸，然后进行折磨，最后再杀掉。他们管这个叫‘剥土豆皮’。”⁵⁰

显然，在旁人看来，特别行动队的一些官兵在杀人过程中寻找的是变态的快乐。司机兼翻译阿尔弗雷德·梅茨纳说：“许多肮脏的暴徒参

加了科曼多灭绝行动，例如，为了好玩而射击孕妇的腹部，然后再把她扔进坑里……在处决前，犹太人必须进行搜身……会检查肛门和性器官以寻找贵重物品和珠宝。”⁵¹

在乌克兰，一名从杀人地点逃走的犹太人迪娜·普罗尼切娃目睹了德国人怎样对暴行乐此不疲，连他们自己所认为的“种族犯罪”也顾不上：“在峡谷的对面，有大约七个德国人带着两名年轻的犹太女人。他们下到峡谷里，找了一个平坦的地方，开始轮奸这两个女人。在他们心满意足之后，就用匕首捅死了女人。他们就这样把两腿张开的裸尸扔在那里。”⁵²

不光是党卫军，在普通的德国国防军中也有这样的虐待狂。在东线后方的游击战中，党卫军成员阿道夫·毕希纳看到无论党卫军和陆军士兵都喜欢折磨苏联平民。“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混蛋，”他说，“他们脱掉村民的衣服，直到一丝不挂，然后再杀掉……我们自己人中，有些人非常热衷于虐待……比如，有必要当着妇女的面向孩子开枪，然后再向妇女开枪吗？这也发生过，那是虐待狂。有这样的军官，他们喜欢虐待别人，喜欢让母亲和孩子们惨叫——他们真的热衷于此，在我看来他们根本不是人。”⁵³

瓦尔特·费尔瑙曾在东线第十四装甲歼击车连服役，对他来说，暴行的原因很简单：“如果你给一个人武器和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然后再让他喝酒，他就会成为杀人犯。”他还说，在东线战场，德国军队内部开始“粗俗化”和“野蛮化”，尤其是在“游击战争”开始以后，“如果遇到一个看上去像是游击队员的人……就把他枪毙了事”。根据瓦尔特·费尔瑙的说法，这些糟糕情绪背后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恐惧”。“你无法相信真正的恐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说，“当我和年轻人认真谈起……战争之类的事情时，我总是告诉他们我有多么害怕。”⁵⁴

早在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就曾要求“沦陷区必须实行坚壁清野”⁵⁵。德国人认为，这意味着他们控制的苏联领土上的所有平民都可能是游击队员。由于纳粹在意识形态上反复宣扬犹太人的威胁，德军很容易将“游击队员”和“犹太人”等同起来。1941年11月20日，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冯·曼施泰因在命令中称：“仍在负隅顽抗的红军及其领袖与我们后方的敌人之间，犹太人充当了牵线搭桥的角色。”曼施泰因接着强调了战争的种族性质：“必须一劳永逸地根除犹太—布尔什维克体制，使其再也不会对我们的欧洲生存空间产生影响。因此，德国士兵不仅要承担消灭这一体制武装支柱的任务，他还是种族观念的肩负者，对他和德国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行的复仇者。”⁵⁶

虽然有些德国国防军军官发出命令，坚持不让他们的士兵参与党卫军和特别行动队的杀戮，但国防军仍旧普遍参与了在东线对游击队的“平定”行动。例如，一名装甲火炮部队的军士沃尔夫冈·霍恩曾在与游击队的战斗中亲自下令烧毁整个村庄，他对此感到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些房子“不值什么钱……我们对放火烧俄国人的房子并不在意……我们并不像对待自己的文明那样对待他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太原始了”⁵⁷。

很多士兵受过多年的纳粹思想熏陶，对于自己的敌人是劣等民族深信不疑。1941年7月，一名士兵写道：“每个人，甚至以前是最为怀疑的人，现在都明白过来，和这些受犹太人煽动的狂热的低等人进行斗争，不仅是必要的，还是迫在眉睫的。我们的元首已将欧洲从注定的混乱中拯救出来。”⁵⁸

虽然刽子手们对杀人乐此不疲，但也有人并不情愿参与其中。希姆莱在1941年夏天到达明斯克时看到了这一点。8月15日，他眼看着大约一百人——根据他的工作日记，这些人“既有游击队员也有犹太

人”⁵⁹——被特别行动队B大队枪决。受害者被迫脸朝下躺在一个坑里，从背后被射杀。然后下一组人爬进坑里，趴在刚死的人身上。

驻东普鲁士元首总部的空军摄影师瓦尔特·弗伦茨曾要求，随希姆莱一同前往明斯克，他想“去看点新鲜的，而不是天天在总部面壁”。弗伦茨对他所看到的“相当震惊”，因为他“不曾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⁶⁰屠杀结束后，“一名辅助警察的指挥官走近我，因为我在空军，他说：‘中尉，我再也受不了了，你就不能把我从这里弄走吗？’我说：‘好吧，但我在警察部队说不上话，我是空军，我可以做些什么？’他说：‘好吧，我再也受不了了——实在太可怕了。’”⁶¹

党卫军高级总队长（中将）冯·德姆·巴赫—泽勒沃斯基声称，他在明斯克这次屠杀后对希姆莱说：“总指挥，这才杀了一百人……看看这个司令部里的人的眼睛，他们全都被吓坏了，这些人的后半辈子都已经没指望了，我们在这里训练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手下？”⁶²

行刑完毕后，希姆莱把刽子手们召集到身边，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解释说，只有“他一个人在上帝和元首面前对此事负责”。他说，他的部下肯定注意到了，他对于完成这项任务也并不感到愉快，但这是必要的。根据巴赫—泽勒沃斯基的说法，希姆莱还告诫他的部下：“应该观察大自然，到处都有斗争，不光是人类，还有动植物，那些不想斗争的就只有死掉……我们人类在对付害虫时所做的也是正确的……”⁶³希姆莱补充说，虽然他们的任务是“艰苦的”，但他“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绕过去，他们必须坚忍不拔”。他不能免除他们的这一责任，不能放任他们。⁶⁴那天晚上，弗伦茨听到希姆莱说：“你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会对我们做什么呢？”弗伦茨说他感到这些话“很可怕”⁶⁵。一个月后，希姆莱的话进一步暴露了他的残忍心态。他说：“即使是摇篮里的雏鸟，也必须像压碎一只

自大的癞蛤蟆一样压碎它。我们生活在铁的时代，必须用铁扫帚来扫地。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必先问自己的良心。”⁶⁶

在8月份目睹明斯克的屠杀之后，希姆莱又驱车前往诺温基的一家精神病院，几乎可以肯定他下令杀害了那里的病人。可能是在此期间或之后不久，他还与特别行动队B大队的指挥官、前刑事警察头子阿尔图尔·内贝讨论了其他大规模杀人方法的可行性，毕竟希姆莱刚刚看到了近距离射杀犹太人可能会引起的心理问题。⁶⁷

又过了几周，内贝在刑警技术研究所的阿尔伯特·威德曼博士协助下，试验了几种不同的杀人手段。威德曼出现在明斯克，标志着有越来越多曾参与过“T4”安乐死计划的人加入了在东线的屠杀。如前所述，正是威德曼帮助设计了安乐死中心的毒气室。

很快，“T4”的杀人技术就被证明在东方难以复制。奥地利和德国的安乐死中心用的是罐装的一氧化碳气体，而把这些罐装气送到被占领的苏联各地是不切实际的——主要是因为成本太高。移动式煤气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但这种车辆的空间有限。纳粹需要的是一种廉价而简单，又能使刽子手不必直面受害者的大规模屠杀方法。

在这方面，人们普遍有误解，认为毒气室之所以成为大屠杀的首选方法，仅仅是因为这样便于纳粹大批量地杀害犹太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在1941年9月基辅郊外巴比亚尔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党卫军警察部队士兵、特别行动队和当地亲德分子用枪决的办法在两天内杀死了近三万四千名犹太人。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杀戮，连同时期的死亡集中营都无法与之相比。毒气室并不是一种比枪决杀人更多的办法，而是一种对凶手来说更轻松的方法。

1941年夏天，纳粹还并不十分确定毒气室是最合适的方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威德曼博士和他的团队竟然还尝试过把精神病患者关

进地堡，然后炸死他们。纳粹认为这个想法并不成功，特别行动队第八分队的军官威廉·加斯克说：“这景象太可怕了，有几个受伤的人哭着从瓦砾中爬了出来……残肢断臂散落一地，有的还飞到了树上。”⁶⁸在这次试验失败后，威德曼和内贝的团队再次把注意力转向一氧化碳。是否有办法在不使用毒气罐的情况下，像在德国那样高效地杀死残疾人？答案就在他们周围——从汽车和卡车排出的废气。在白俄罗斯莫吉廖夫的一家精神病院里，纳粹将病人锁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用管道排入小汽车发动机产生的废气。一开始废气的排量太小，于是他们用卡车上的一台更大的发动机才把房间里所有人都毒死。

除了苏联占领区，其他地方也进行了各种杀人试验。在上西里西亚的奥斯维辛，党卫军想出了另一种杀人的方法。1941年初秋，集中营司令鲁道夫·胡斯的副手卡尔·弗里奇尝试了用一种剧毒的氰化物结晶体来杀死生病的囚犯和苏联战俘，这种药品以前是用来制造杀虫剂的。这种结晶体平时储存在密封罐里，一旦暴露在空气中就会挥发为有毒的气体，它名叫“齐克隆”氢氰酸，简称为“齐克隆B”。

党卫军把囚犯关进奥斯维辛的第11号楼地下室进行试验。第11号楼是一座狱中之狱，是集中营里最为恐怖的地方，也是党卫军审讯和拷打囚犯的地方。不过，就像纳粹第一次用一氧化碳进行试验并不如意一样，弗里奇对“齐克隆B”的第一次试验也并不完全满意。

奥古斯特·科瓦尔奇克是奥斯维辛的一名波兰政治犯，他亲眼看到党卫军如何用泥土和沙子来密封第11号楼的毒气室。在投放毒药的次日，他看到一名党卫军在急急忙忙来回奔跑。原来，也许是因为密封得不够好，也许是“齐克隆B”用量不够，有的囚犯还活着，于是更多的“齐克隆B”被倒进这间临时毒气室。这些不知名的病人和苏联战俘半夜在第11号楼遭受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⁶⁹

通过这一残忍的试验，党卫军掌握了杀害一定数量犯人所需要毒品的确切剂量。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房间越热，里面挤的人越多，毒药就越有效。他们还发现，第11号楼远非进行大规模屠杀的理想场所，正如奥古斯特·科瓦尔奇克所看到的那样，他们面临的困难是“如何搬走尸体”，必须要让其他囚犯进入地下室，扒出尸体，抬回楼上，放在手推车上，然后推到主营区另一端的焚化区烧掉。这一过程费时费工，而且无法对营区其他人保密。经过一番研究后，党卫军想到可以把焚化区中一间存放尸体的房间改造成毒气室，今后可以直接在焚尸炉边杀死囚犯，这个过程就变得简易了。

在1941年夏季和秋季进行的这些试验是在另一场大屠杀的背景下进行的，毒气室之类与这场大屠杀相比可谓相形见绌。1941年下半年，纳粹杀害了数量惊人的苏联战俘。从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到当年年底，德国俘虏了三百三十五万名苏联官兵，其中有二百多万人死去。大约有六十万人死于“政委令”，其余的人死于各种虐待，很多人是被饿死的。⁷⁰正如一位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所说的，如果战争在1942年初结束的话，“这个大规模屠杀计划将成为希特勒政权犯下的最为严重的罪行”⁷¹。

格奥尔吉·塞门亚克是战争初期被俘的苏联战俘中幸存下来的少数人之一。他和其他大约八万名战俘一起被关在一个露天营地，偶尔能喝上几口稀汤。德国人没有给战俘分发碗或杯子，他不得不用军便帽来喝汤。“军便帽是苏联军队的配置，”他说，“本来是用来在夏天戴的，稀汤都从布料里漏走了。”几周后，他被转移到一个更大的营地。在那里，他遇到了另一个问题：虱子成灾。“这导致了斑疹伤寒的流行，人们开始死于斑疹伤寒。而且，虱子太多了，很多人的头发里满是虱子，到处乱爬。不仅头发里有，衣服和身上也都是虱子，如果你俯身抓

起一把沙子，沙子就会动起来，那是里面的虱子在动。”⁷²

苏联战俘试图捉老鼠来吃。“有时候，一个人抓住了老鼠的尾巴，”格奥尔吉·塞门亚克说，“老鼠会转身来咬他的手。它们有两颗门牙——非常坚固的牙齿。所以老鼠会咬人的手，但他不肯松手。他把老鼠打死，撕下一块肉来煮或者烤。”苏联战俘面临绝望，甚至开始吃他们同志的尸体。塞门亚克透露，他的一些同志从尸体上割下臀部、肝和肺，然后烤熟吃掉。

塞门亚克还记得德国人是如何虐待苏联战俘取乐的，由此使人联想起他们是怎么折磨犹太人的。“一个德国人走近一群人，问：‘谁想要食物？’这是一个多么恶劣的问题！你明明看到人们连续几个月都没吃饱，你怎么能问‘谁想要食物’？每个人都想要食物。[德国人说：]‘好，那么谁能吃一整桶粥呢？’有人举起手说：‘我可以。’‘那就站出来。’德国人给了他一桶粥。他当然吃不了整桶粥，但他站在桶边开始吃了起来。他最多只能吃两碗……这已经很多了，他不可能再吃了。他说：‘够了！’桶里的粥还有四分之三，于是他们揍了他一顿。他肯定得挨揍，但至少能吃个饱。”⁷³

1941年夏天和秋天，数百万名生活在纳粹铁蹄下的人们都处于饥饿之中。纳粹按照当年春天秘而不宣的计划，用子弹、毒气和饥饿来屠杀他们所蔑视的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纳粹杀害苏联战俘的想法与他们杀害犹太人的想法是相同的。他们为屠杀而辩护的心理过程是不同的。例如，沃尔夫冈·霍恩就是一个典型，他认为苏联人“不文明，几乎就是野蛮人”，但他认为犹太人不是“野蛮人”，而是聪明的人。霍恩被灌输的是犹太人正在“统治俄国”，这也是德国人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⁷⁴

因此，从逻辑上说，纳粹意识形态认为犹太人是更致命的敌人——

他们不仅是一个劣等民族，而且是一个聪明到可以秘密策划反对德国的“种族”，因此有必要用某种办法来斩尽杀绝。至于苏联战俘，如果他们能做牛做马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让他们为纳粹国家服务。当他们变成“只会吃饭的人”时，他们就该死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1941年10月31日希特勒下令大量使用苏联战俘作为劳工后，战俘的死亡率就下降了。⁷⁵希特勒并不打算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就让犹太人为德国工作。阿尔图尔·格赖泽尔非常想把犹太人驱逐出瓦尔特高，1941年春，他曾建议派七万名犹太人到德国做苦工，但希特勒否决了这一建议。⁷⁶他要的是把犹太人驱逐出去，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工人接回去。

当然，对于入侵苏联之后的屠杀，希特勒不可能决定所有细节。1941年7月，希姆莱向特别行动队发布命令，将屠杀的范围扩大到犹太妇女和儿童，这是否来自希特勒的直接指示还不清楚。不过，希特勒知道特别行动队在干些什么是确定无疑的。他直接收到了报告，上面详细说明了屠杀的人数。1941年8月1日，盖世太保领导人海因里希·缪勒向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传达了一条信息：“特别行动队在东线的工作情况将定期汇报给元首。为此需要准备一些他感兴趣的说明材料，比如照片、海报、小册子和其他文件。”⁷⁷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百分之百地赞成这些行动。8月19日，戈培尔和希特勒会面后在日记里写道：“我们讨论了犹太人问题。元首相信他在国会所作的预言——如果犹太人挑起一场新的世界大战，那么结果将是犹太人的毁灭——正在变成现实……简直是神了。在东方，犹太人已经被迫接受清算；在德国，犹太人已经受到了部分清算，将来还有更多的账要算。”⁷⁸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1941年夏天在苏联占领区扩大屠杀范围时，希姆莱被希特勒委以全权来决定犹太人的命运。他清楚一旦行动开始，希特勒将对此了如指掌，如果元首感到不快，行动就会停止。显然，元

首并没有这样。

在命令下达的整个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屠杀过程的随意性。例如，1941年夏天希姆莱在东线视察特别行动队时，他不经常发出书面命令，而是口头鼓励他们在方便的时间和地点扩大屠杀的范围。即便发出书面命令，措辞也是含糊不清的。就像8月1日，在普利佩特沼泽地作战的党卫军第二骑兵团收到了希姆莱发来的信息：“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被枪决，把犹太妇女和孩子赶进沼泽里去。”党卫军的一名大队长（中校）马吉尔报告说：“把妇女和孩子赶进沼泽并不成功，因为那里还不够深，沉不下去。”⁷⁹

如果希姆莱和党卫军以及特别行动队之间有明确的书面命令，这种模棱两可的沟通就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希姆莱并不想在文字中明确表达杀害犹太妇女和儿童的意思，而希望他的部下能够心领神会，但这支部队只是机械地执行了命令。马吉尔则正确地理解了这条指令是隐晦地要求“杀死妇女和儿童”，于是他在报告中解释了要求他使用的方法——在沼泽中溺水——是行不通的。

我们可以从这次简短的交流中看到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党卫军认为就算在他们自己人之间交流也有必要使用伪装的语言。第二，由于有时高层下达的命令含糊不清，一些低阶军官可能不知道究竟要他们做什么。

这一花招甚至骗过了自己人，有的纳粹官员认为某些屠杀行动未经授权而对其进行阻止。例如，1941年11月15日，德国波罗的海国家专员辛里奇·洛泽写道：“我已经禁止在利耶帕亚任意处决犹太人，因为没有正当的理由这样做。”他要求澄清是否有“清算东部所有犹太人的指示”，因为他“找不到这样的指示”。⁸⁰帝国东部领土部的政治分部领导人的回答十分谨慎，没有提及有这样一份书面“指示”，只是说洛

泽对“犹太人问题”的关切应当通过“口头讨论”得到“澄清”。⁸¹

我们无法确切地明白纳粹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实施大屠杀。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他们意识到公众一旦了解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对于纳粹来说，从冯·加伦主教关于安乐死的抗议中吸取了教训，理应对屠杀活动做更好的保密。纳粹其实并不担心德国的民众抗议，他们更为担心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得知事情的真相。希特勒尤其担心他的威望受影响。他设想德国一旦在战争中获胜，如果能够保守屠杀犹太人的秘密，或至少让他本人置身事外，会对德国国家首脑进行外交活动大有裨益。希特勒自从在1939年决定签署一份授权安乐死计划的文件，而后看到了教会攻击纳粹的方式之后，他就加倍小心不让自己的名字再出现在任何可能引起负面宣传的屠杀行动中。虽然他可以站在国会前，泛泛而谈地预测如果发生世界大战，犹太人将被灭绝，但这和明言屠杀犹太男女老幼的细节是两码事。在希特勒看来，还是确保自己的名字不出现在这一敏感事项中为好。他很清楚书面的命令可能会回来找他的麻烦。正如他在1941年10月提到的那样：“面谈比写信要好得多，至少在争论某些重大问题时是这样的。”⁸²

但是，任何一台复杂的国家机器都不能仅仅依靠口头指令来运行，在必要的时候也会在书面提到屠杀。因此，各式各样的委婉用词都和犹太人的毁灭联系到一起。例如“特殊处理”这样的词语，就是文件中对屠杀的一种代称。同样，“最终解决方案”一词也代表着消灭犹太人的计划，虽然这一词语最初仅仅是指驱逐犹太人。它在1941年7月31日戈林为海德里希签署的一份文件中仍然保留了最初的含义：“1939年1月24日，你们接受了有关以最为适当的移民和撤离的方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为了对这一任务加以补充，我在此要求你们提交一份关于

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组织情况、相关事项以及物质准备等措施的全面蓝本。”⁸³我们知道，这份文件中提到的“最终解决方案”不是指大规模屠杀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从1941年3月起，戈林和海德里希就在讨论这一“最终解决方案”可能的“蓝本”，当时纳粹计划在战后将犹太人驱逐到东部。因此，1941年7月的这次讨论说明，海德里希仍在制订一项将犹太人驱逐到被占领的苏联边远地区的计划，因为在东线战事结束前，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一解释也符合纳粹之前对犹太人的战时政策的主旨，即驱逐他们出境，在中长期内造成种族灭绝的后果。正如大战爆发时被送到普通政府辖区尼斯科的犹太人在饥饿、疾病和迫害中大批死亡一样，如果犹太人被送往马达加斯加岛，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死去，他们一旦被送往苏联被占领区的荒野，其命运也同样是灾难性的。

然而，到1941年夏末秋初，有人开始讨论更改“最终解决方案”的时间表。一些希特勒最狂热的追随者盼望在战争结束后立即驱逐犹太人去东方。8月19日，戈培尔在面见希特勒时要求将柏林的犹太人驱逐出去。戈培尔认为，当德国士兵在东线战斗和牺牲时，七万名犹太人却还能住在这座城市，这是不合情理的。希特勒不同意立即驱逐柏林犹太人，但他接受了戈培尔的一个提议——德国犹太人应该佩戴标记。波兰的犹太人被迫佩戴身份识别徽章已有一段时间了，现在轮到德国犹太人遭受这种羞辱了。

从1941年9月1日起，在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并入德国的地区，六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在衣服上佩戴“大卫星”形状的黄色徽章。这一措施不仅仅是为了识别犹太人，令他们更容易受到骚扰，还让所有非犹太德国人能够明白地看到对犹太人的迫害。尽管有的德国人辱骂了标明身份的犹太人，但也有一些人对这一新的情况感到不安。例如，乌

韦·斯托约翰记得，他的母亲——据他说“可能赞同”驱逐犹太人的想法——也反对将他们“羞耻化”。在汉堡的犹太人被迫佩戴黄色徽章后不久，有一次乌韦和他的母亲走过犹太街区，看到“一个穿着破旧西装的犹太老人走过来，他拿着一个旧箱子，拿箱子的样子就是为了遮掩身上的‘大卫星’标记。他一定是内急了，四下张望，犹豫着能不能进那个[标记着‘犹太人禁止入内’的]厕所。我妈妈停了下来，我想，她为什么停下来？她说：‘你看见他了吗？他是犹太人，不是吗？他进去了，他的箱子挡着大卫星。’她一直等到他出来。当犹太人看到我的母亲时，他的表情突然变得非常焦虑，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恐慌和焦虑。他放下了箱子，可以看到‘大卫星’标记就在那里。我知道母亲以前是怎么想的，我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会怎么做。当然，犹太人也是，[他肯定在想]如果她现在去报警，我就完了。我母亲向他走去，指着‘大卫星’说：‘我们不想这么做。’我对自己说，哇，真是出乎意料。所以，在那一刻，她一定为他感到难过。我敢肯定她以为只要不让犹太人从事商业，让他们干下等的活儿，或者把他们单独安置到一个城镇，诸如此类的一个国家也可以，就像今天的以色列，他们就可以自己过得很好……但这种‘羞耻化’，她觉得很可怕。我心里一热，我想，嗯，也许她并不是我以为的那种激烈的反犹主义者。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他们说：‘不，这太过分了，我们不喜欢这样。’但他们什么都不做，完全不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⁸⁴

在犹太人被迫佩戴“大卫星”后，住在慕尼黑的纳粹支持者厄纳·克兰兹也感受到了类似的情绪：“在和我们平行的街道上有一位布兰卡夫人，她嫁给了一位男爵，但她是一位来自汉堡的犹太店主的女儿……她必须佩戴犹太人的星形标记。我感到很遗憾，这太可怕了，因为这个女人是个很好的女人，这就是你的感觉。但是，真的就像今天

你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身旁走过，你不可能到处去帮忙，当时也是一样的。”⁸⁵

如前所述，戈培尔不仅要求犹太人佩戴标记，还要把他们驱逐出境。不久以后，其他纳粹骨干也表示希望如此。1941年9月15日，汉堡的纳粹地方长官卡尔·考夫曼写信给希特勒，询问是否可以将该市的犹太人驱逐出境。考夫曼希望他们的房产能用来收容在最近的空袭中遭受苦难的非犹太德国人。希特勒现在决定改变他之前的决定，同意授权将犹太人立即逐出帝国，而不是等到战争结束。就在几个星期前，他还对戈培尔说犹太人不能被送到东边去，为何此刻他改变了主意？没人能够肯定。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希特勒是为了报复。8月，斯大林曾决定将居住在伏尔加地区的几十万名德裔居民驱逐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蛮荒之地。无论斯大林的这一行动是否成为直接的导火索，苏德战争的大背景肯定对希特勒的决定产生了影响。

这场战争对德国人来说似乎还算顺利。尽管国防军没能按计划在几周内击败红军，但他们在乌克兰首府基辅周围的战役中赢得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围歼战。1941年9月19日，这座城市被德国军队攻陷，六十万名苏联士兵被俘。“德国士兵再次证明了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希特勒得意扬扬地对他的亲密伙伴说，“许多人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半径超过一千公里的包围战是不可行的。我不得不动用我所有的权威去施加影响，这才勉强通过。”他说，这一成功证明了，“斯拉夫人是一群天生的奴隶，他们需要一位主人”，此外，“最好不要教他们读书”。希特勒不认为占领和管理这片新领土需要大量的德国军队，因为“斯拉夫人”显然是劣等民族。他说：“俄国就是我们的印度，就像英国人一样，我们用一点点人就可以统治这个帝国。”⁸⁶

几个星期后的10月3日，希特勒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声称，红军业已“崩溃”，并且“一蹶不振”。⁸⁷这种认为战争已经接近胜利的信念，可能是希特勒决定把驱逐犹太人的时间表提前的原因之一。既然斯大林已经快完蛋了，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把他们赶走，非要等到对苏战争结束呢？他知道他的朋友，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元帅，一直在东方积极地推行屠杀犹太人的政策，杀戮集中在德涅斯特河附近的地区。9月，罗马尼亚占领了德涅斯特河左岸，将其作为东部的一个省。安东内斯库准备将数千名犹太人从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驱逐到这一新领土的集中营内。1941年夏天，罗马尼亚报纸《时代的召唤》的编辑写道：“万事俱备……对罗马尼亚犹太人的清算进入最后的决定性阶段。我们除了为自己的解放而感到喜悦外，还应该为成为欧洲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先驱而自豪。从德国媒体对安东内斯库元帅言行的赞许来看，我们明白……今天的罗马尼亚即是明日的欧洲。”⁸⁸

显然，希特勒赞成安东内斯库元帅的行动。1941年8月底，他对戈培尔说：“就犹太人问题而言，可以肯定地说，像安东内斯库这样的人比我们之前所做的要激进得多。”⁸⁹六周以后的10月，希特勒还在赞扬安东内斯库：“在我们的盟友中，除了墨索里尼，安东内斯库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人，他是个大人物，从来不让任何东西阻碍他的前进……”此外，希特勒认为，如果安东内斯库想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罗马尼亚，“第一要务”就是必须“排除犹太人”。⁹⁰

希特勒现在决心“排除”旧德国的犹太人。不过，虽然决定将他们驱逐出境很容易，但还是存在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他们应该去哪里？希姆莱再次想出了解决办法。1941年9月18日，他写信给瓦尔特高的阿尔图尔·格赖泽尔，告诉他元首已经决定清除“旧德国及其保护国”的犹太人，因此要把六万名犹太人送到格赖泽尔管辖下的罗兹犹太人

隔离区，明年春天他们还将被送往“更遥远的东方”⁹¹。瓦尔特高的纳粹官员诉苦说，罗兹的犹太人隔离区已经容不下更多人了，于是希姆莱将人数减少到两万人。

1941年10月，第一批犹太人离开汉堡前往波兰。露西尔·艾肯格林记得，当他们被带到车站，开始前往波兰的旅程时，有几个德国人对他们大喊反犹口号，但大部分非犹太居民对此反应冷淡。⁹²在别的地方，一些犹太人说他们的非犹太邻居对他们表示同情，在法兰克福，有人送来了“饼干和其他食物”；在维也纳，当犹太人被遣送出境时，有人“公开地”哭泣。⁹³

这些来自西欧的犹太人对罗兹的情形几乎完全感到措手不及。一位已经在隔离区的波兰犹太人对一群1941年10月从捷克被赶到这里的人这样描述道：“据说他们在询问是否能住到一套有自来水的两房公寓。”⁹⁴但是，这种天真没能持续很久，新来的犹太人很快就明白了隔离区里生死存亡的现实。他们大多数人在波兰犹太人中没有熟人，也没有任何关系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和住房。许多人挤在隔离区的学校里，无事可做，面临断粮。“一个人的肚子会变得松弛，逐渐塌陷，”从布拉格被赶到这里的奥斯卡·罗森菲尔德写道，“一个人会踌躇地，甚至是恐惧地，用手抚过自己不安的身体，摸到骨头、肋骨，摸过腿，然后自我感觉，突然觉得自己最近变胖、变肿了——他对自己身体恶化得那么快感到吃惊……每个人都面对同样一个词、一个概念、一个象征：面包！为了面包，一个人可以变成伪君子、疯子和恶棍。给我面包，你就是我的朋友。”⁹⁵

许多情况证明，这种变化对那些来自西欧的犹太人冲击太大了。“他们肯定很沮丧，”一名先前就在这里的波兰犹太人雅各布·泽贝斯坦说，“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德国犹太人】通常看不起波兰犹太

人——我们和他们绝对不是一类人。突然间，他们意识到自己跌入了和我们同样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不如我们，因为他们无法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生存。”⁹⁶因此，来自德国及其保护国的犹太人死亡率，比已经生活在隔离区的波兰犹太人要高得多。⁹⁷

西欧的犹太人不仅仅是被送到罗兹犹太人隔离区，还有一些运输车辆向东进一步驶入特别行动队控制下的苏联被占地区的杀戮区域。其中一些犹太人被安置在难民营里，许多人在那里死于寒冷，其他人在抵达后不久就被杀害了。例如，1941年11月末，有五列火车从德国和奥地利开往立陶宛，车上所有犹太人在考纳斯下车后即被杀害。在其他地方，白俄罗斯的纳粹专员威廉·库贝在12月质疑，来自“我们自己文化领域”的犹太人是否应该像东部地区的“土著野蛮人”一样对待。⁹⁸就在两周前，也就是11月底，希姆莱在搞清楚事实后甚至试图阻止——当然肯定是临时性的——杀害一列开往里加的火车上的德国犹太人，但他的信件来得太迟了，犹太人都已经死了。⁹⁹所有这些表明，来自旧德国的犹太人眼下的命运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

正当这些西欧的犹太人在苏联沦陷区被杀时，波兰的两个屠杀设施也正在建设中。一个是在罗兹西北四十英里的海乌姆诺，主要是为了杀死罗兹隔离区中被认为没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从阿尔图尔·格赖泽尔的角度来看，西欧的犹太人来到这里后，隔离区已经过度拥挤，他显然需要这么一个地方来缓解这种状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在1941年7月，位于波森的移民中心办公室党卫军头目罗尔夫—海因茨·霍普纳就曾写道，瓦尔特高犹太人的命运一直是一个在许多“讨论”中被提及的话题。他说道，既然所有犹太人在那个冬天都面临挨饿的危险，那儿通过某些“快速方法”把不能工作的犹太人“消灭掉”，可能是一种再“人道”不过的做法。¹⁰⁰

这种“快速方法”——毒气车——之前已经在瓦尔特高使用，辗转于各个医院以杀死残疾人。现在，1941年秋，用毒气车杀死犹太人的计划已经开始部署。负责杀害残疾人的单位指挥官赫伯特·兰格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停放毒气车。他的司机瓦尔特·博迈斯特后来证实，那年秋天兰格曾告诉过他，“我们有一项艰巨但重要的工作要做”¹⁰¹。最终，海乌姆诺村最后被选为毒气车的驻扎地，杀害的犹太人被埋葬在附近的一片森林里。

1941年11月，在波兰建造的另一个屠杀设施位于普通政府辖区卢布林东南七十五英里的贝乌热茨。在入侵苏联之前，德国人在这里建立一个劳动营，用以安置建造苏、德的波兰占领区分界线工事的犹太人，但该营地在1940年末关闭。贝乌热茨的新集中营成为第一座固定的（相对于可移动的毒气车）、专门用以屠杀犹太人的设施。其地理位置在许多方面都对纳粹十分有利，它比较偏僻，远离人口中心，但邻近主要的铁路线，和卢布林、克拉科夫和利沃夫这三座城市之间的交通相当便利——每座城市都有大量的犹太人。

除了在波兰建造的这两处设施外，还有证据表明，纳粹同时还打算在苏联沦陷区的里加和莫吉廖夫建立固定的杀人工厂。¹⁰²10月，希姆莱访问了位于白俄罗斯的莫吉廖夫。次月，托普夫父子公司得到了一大笔订单，要在莫吉廖夫建造一座大型的火葬设施，配备三十二座焚烧炉。¹⁰³这座巨大的火葬场虽然最后未能建成，但它有可能是一座具有屠杀功能的传统集中营的核心地区。¹⁰⁴显然，纳粹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式正在发生一个阶段性的变化。

但是，这一切是否意味着在1941年秋季希特勒已经决定要消灭犹太人？众所周知的大屠杀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吗？当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不仅包括决定将犹太人从旧德国及其保护国驱逐到

东方，在波兰的海乌姆诺和贝乌热茨建造屠杀设施，还包括10月希特勒私下发表的对犹太人的评论。不祥的是，他引用了自己在1939年1月发表的有关“灭绝”犹太人的演讲。1941年10月25日，他说：“站在国会讲台上，我向犹太人发出预言，如果战争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就会从欧洲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两百万人丧命，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那个犯罪的民族应当受到良心的谴责……顺便说一句，群众中流传我们有一个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这并不是坏事。”¹⁰⁵

此外，根据战后阿道夫·艾希曼的证词，1941年秋天海德里希曾对他说：“元首已下令对犹太人实行肉体毁灭。”¹⁰⁶库尔特·莫比乌斯是一名在海乌姆诺营地建立初期就在那里服役的党卫军士兵，他在德国战败后接受审讯时说：“兰格上尉告诉我们，灭绝犹太人的命令来自希特勒和希姆莱。作为警察，我们被训练成把政府的任何命令视为合法和正确的……当时我相信犹太人不是无辜的，而是有罪的。宣传机构一再地向我们灌输，所有犹太人都是罪犯和劣等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衰落的罪魁祸首。”¹⁰⁷

从1941年11月的纳粹报纸《帝国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还能找到更多的证据，戈培尔在上面公开宣称：“犹太人想要他们的战争，现在他们已经得到了战争。不过，他们感受到的还有1939年1月元首在德国国会所作预言的影响力，那就是，如果国际犹太金融组织迫使各国再次陷入世界大战，其结果将不是全球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亡……所有的犹太人，由于他们的出身和种族，都加入了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国际阴谋。他们希望我们失败和毁灭，并尽力去加以实现。在这场战争中阵亡的每一个德国士兵都是犹太人的责任，他们有愧于良心，这就是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的原因……”¹⁰⁸

然而，尽管有上面所述的种种迹象，仍然不能说1941年秋纳粹已

经做出了杀害其占领区内所有犹太人的决定。¹⁰⁹对于1941年秋天的这些事件，一种更为微妙的解释是，希特勒已经同意向东方遣送犹太人，但只有在方便和可行的情况下才这么做，首先还是要考虑国防军的需要。自1939年秋天以来，希特勒就一直想把犹太人赶出帝国——只是还在考虑行动的时机。现在，像戈培尔和考夫曼这样的左膀右臂也在抱怨犹太人仍然留在德国，而东线的战争似乎已经胜利在望了，希特勒才下决心彻底赶走犹太人。他很清楚苏联犹太人遭到了屠杀，如果把来自其他地方的犹太人送过去，后果他应当也很清楚。但是，不管犹太人是刚刚到达就被枪决，还是被毒气毒死，在隔离区饿死，或是长期做苦工后累死——这些细节都是其他人考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只要这些犹太人被驱逐后再也回不来就可以了。因此，虽然希特勒同意把犹太人送往东方的杀戮区域，但他并未明确规定杀害犹太人的具体方法，也没有规定他们要过多久以后死亡。

因此，虽然这是大屠杀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但整个大屠杀并非通过一个单一的、总括性的决策来启动的。在1941年秋天，仍有许多问题未能解决。在西欧沦陷各国的犹太人是否也会被赶到东方去送命呢？如果是，那是在什么时候？还有很多犹太人留在德国，1941年10月至12月间，有四万二千名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及其保护国，但大部分人还没有动身。毁灭他们的时间表是怎样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对于近三百万名波兰犹太人来说，此时此刻，他们的命运是否已经注定？如果此时纳粹就已经决定杀死所有的犹太人，为何只在波兰建造了两个这么小规模杀人中心？难道海乌姆诺和贝乌热茨不是希姆莱主持下为解决当地的“问题”而采取的局部行动吗？简而言之，在某种程度上，这看起来不像是下级在上级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琢磨出来的做法吗？

从当年秋天希特勒自己的话就可以找到对这一解释的证明。1941年10月中旬，他问道：“如果我身边没有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去做那些我无暇去做的事，我该怎么办？我需要坚强的人，做起事情来像我一样充满热情。对我来说，最佳人选是能帮我分担大部分工作的人，能够站在我的立场上做出95%的决定。”¹¹⁰这种心态如何对实际产生影响，可以从1942年春天格赖泽尔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找到一例，其中提到了在瓦尔特高杀死肺结核病人的事。格赖泽尔在是否有权杀人方面受到了质疑，他对希姆莱说：“个人认为，我们不必再就此事向元首报告，尤其是在上次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会议上，他告诉我应按照我的最佳判断行事。”¹¹¹所有这些都表明，那年秋天，希特勒对于犹太人遭到驱逐和虐杀的态度，很可能与他的“日耳曼化”计划相似，当时，他告诉他的纳粹地方长官们，只要能让他愿景成为现实，“他们可以不择手段”。¹¹²

与此同时，在奥斯维辛，党卫军们正在发挥“最佳判断”来升级过去使用的简易杀人设施。他们在讨论新建一座火葬场的计划时，决定进行一些小而重要的改造，使整个建筑变成一座杀人工厂。在1941年10月至1942年1月的某个时间里，他们对原先用以停尸的半地下室中的较小那间墙面上的通风设施进行了重新设计，风扇进行了改造以便迅速排气。对于这一改造，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停尸房将被改为毒气室。管道被埋在凹槽中，这样垂死挣扎的人们就无法将其从墙上拽下来，通风设施的改造是为了在杀人之后排出毒气。¹¹³不过，完全看不出奥斯维辛的这个毒气室是屠杀欧洲全体犹太人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相反，这肯定是各地自行其是的另一个例子，只是因为主营现有的火葬场已经在使用“齐克隆B”毒死囚犯，因此对于奥斯维辛的党卫军来说，让新火葬场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是有必

要的。

正当奥斯维辛的党卫军们正就此进行讨论时，在七百五十英里之外的东方，德军正陷于也许是整个大战中最重要的一系列战役之中。战场上的态势——再加上希特勒盟友一个引人注目的决定——成为纳粹对犹太人政策进一步强硬起来的背景。

11. 通往万湖之路(1941—1942)

1941年10月，德国人似乎在对苏战争中将赢得胜利，在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的大规模包围战中，德国人抓获了六十六万名苏军俘虏，看来通向莫斯科的大门已经敞开。苏联首都出现了恐慌，斯大林的列车正待命出发，开往更为安全的东方。10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拉夫连季·贝里亚问道：“我们该如何保卫莫斯科？我们一无所有，已经不知所措了……”¹

但东线的战争进程即将发生剧变。斯大林决定留在莫斯科集结他的军队，此时恰逢冬季开始降雨，首都周围变成一片泥沼。突然之间，德国人似乎已经不可能在最糟糕的冬季来临之前击败苏联。这对德军来说也许是灾难性的：他们的补给线已经被拉长到崩溃的地步，士兵们几乎没有冬衣，他们原以为对苏战争只要再打几个星期。

在战争的这一关键时刻，希特勒从东普鲁士的大本营返回慕尼黑，庆祝啤酒馆政变的周年纪念日。1941年11月8日，他在洛温勃劳凯勒啤酒馆向党徒们发表演讲。站在上面，他并不轻松。就在一个月前，他向听众宣布，红军已经一蹶不振了，当时看来的确如此。可是现在，他面前的听众想听到更多的好消息，而他拿不出这样的消息来。他不能

宣布东线的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不能说占领莫斯科，甚至连快要占领也不能说。在这样尴尬的状况下，他需要有人来为目前的局势背锅，当然，对于希特勒来说，找替罪羊是很容易的——那就是犹太人。他在演讲中说，尽管犹太人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和英国都有影响力，但“最大的奴隶”是苏联，那里“只有愚蠢的、被迫无产阶级化的劣等人。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庞大的犹太政委组织，实际上是奴隶主”。他声称，德国军队在东线是为着一个崇高的目标而战斗：“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最终希望把欧洲从来自东方的威胁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我们希望阻止东方将其巨大的生育能力、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动员起来对付欧洲，并且反过来希望它们能够为欧洲所用。”为实现这一目标，他用带有威胁性的辞令说：“我们将在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中甄别他们的犹太人。”²

11月15日，德军在泥浆冰冻后继续向莫斯科推进，但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在12月初的最后一次努力中，一些先头部队设法推进到离莫斯科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但这是他们所能到达的最远端了。东线的整个战局——甚至是整个大战的进程——即将发生变化。的确，有充分的理由说，1941年12月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也是大屠杀演变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时刻之一。

12月5日，红军发动了反攻。瓦西里·鲍里索夫是一名来自西伯利亚的士兵，刚被投入莫斯科战役的战场，他记得：“当他们【德国人】看到要和西伯利亚人面对面战斗时，他们会感到恐惧。西伯利亚人是非常强壮的……而他们【德国人】是在温和的环境里长大的，没有西伯利亚人强壮，战斗中他们会更胆怯一些，西伯利亚人则无所畏惧。德国人是弱者，他们不喜欢寒冷，身体也很虚弱。”³

12月7日，就在红军反攻的消息传来之时，希特勒得知日本对珍珠

港发动了袭击。四天后，12月11日，德国对美国宣战。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为什么要在几千英里外的大西洋彼岸树立一个新的强敌？但希特勒认为他只是在做无法逃避的事。1941年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在纽芬兰海岸举行会议，签署了《大西洋宪章》，美国对英国进行战争援助的承诺是显而易见的。就在对美宣战前一个月，即11月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已经批评了美国站在德国的对立面。他称罗斯福对波兰陷于战争负有“责任”，同时也是法国决定参战的幕后黑手。⁴

最关键的是，希特勒认为罗斯福是被犹太人控制的。在1941年12月11日对国会的演讲中，他说，罗斯福做出支持英国抵抗德国的决定，其背后是“无处不在的犹太人”。他断言罗斯福身边有一个“犹太人圈子”，他们被“《旧约》中的贪婪所驱使”。正是犹太人“邪恶的背信弃义”才造成了当前的局面。⁵在希特勒看来，犹太人终于实现了他们的秘密目标——制造了一场可以从中渔利的世界性冲突。

12月12日，即他在国会发表演讲和对美宣战次日，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和五十多名纳粹骨干分子进行了谈话。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道：“至于犹太人问题，元首决心加以说明。他曾向犹太人预言，如果他们要发动另一场世界大战，他们将自我毁灭，这绝非泛泛而谈。世界大战已经爆发，犹太人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看待这个问题必须不带感情，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怜悯犹太人，而是为了我们德国自己的人民。德国人民在东线又牺牲了大约十六万人，挑起这场血腥战争的人将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⁶戈培尔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由于美国的参战，现在发生的是一场“世界大战”，因此“犹太人的毁灭”将“不可避免”。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希特勒的话毫不含糊。

普通政府辖区的长官汉斯·弗朗克也在总理府聆听了希特勒的谈

话。四天后，他和普通政府的其他高官谈起了犹太人未来的命运。他说：“至于犹太人，我要对你们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总要走上一条不归路。元首曾经说过，如果犹太人联合起来发动了又一场世界大战，那么流血牺牲的将不只是被卷入战争的各国人民，欧洲的犹太人也会遭到灭顶之灾……作为一个老民族社会主义者，我不得不说，如果犹太人在战争中幸免于难，而我们却为保护欧洲献出了最好的鲜血，那么这场战争就不能说是成功的。因此对于犹太人，我认为他们终将消失。”⁷

犹太人应当“消失”，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外，弗朗克还提到了现实动机。他说：“犹太人消耗的食物数量也对我们造成了很大危害。”又一次，犹太人只要活着就是对“雅利安”德国人的威胁，这种观念在解释为什么犹太人必须要死时也发挥了作用。作为一名纳粹，你如果不太相信犹太人通过某个国际阴谋引发了战争——鉴于敌对行动开始背后的真实情况，这种观念可能会让一些人难以想象——那至少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犹太人消耗了本应属于非犹太德国人的食物。这又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例子，希特勒一贯喜欢这种方法。如果犹太人不挨饿，那么挨饿的就是德国人。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当天，也就是弗朗克在克拉科夫发表谈话的九天前，波兰第一个主要用以屠杀犹太人的固定设施开始投入运行。它位于瓦尔特高的海乌姆诺，在克拉科夫西北一百六十英里。瓦尔特高的统治者格赖泽尔在屠杀犹太人方面比他的邻居汉斯·弗朗克男爵走得更快。当弗朗克说要把犹太人统统干掉的时候，格赖泽尔实际上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对他来说，在海乌姆诺建造屠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现实需要。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已经拥挤不堪。9月，希姆莱决定再从旧德国遣送数万名犹太人和数千名辛提—罗姆人到此。纳粹自己制造了隔离区拥挤的“问题”，海乌

姆诺则是格赖泽尔解决“问题”的一个出路。

格赖泽尔知道他已经有一种杀人机器，可以迅速地转用于屠杀犹太人，那就是毒气车。1939年12月7日，也就是毒气车部署到海乌姆诺的两年前，党卫军兰格特遣队的毒气车已经开始在波兰西部格涅兹诺的齐坎卡精神病院执行杀死波兰精神病人的任务。⁸现在，在希姆莱和格赖泽尔的批准下，兰格和他的毒气车将开始屠杀波兰的犹太人。还没等海乌姆诺的设施完工，兰格的车辆就已经把犹太人从他们的居所带走开始了屠杀行动。1941年10月底，兰格的车辆驶往罗兹西面六十英里卡利什附近的一所养老院，将病人每次约五十人分批带走毒死。⁹次月，毒气车杀害了来自博恩哈根（科日米内克）劳动营的数百名犹太人。¹⁰

在纳粹看来，为了完成格赖泽尔的任务，需要扩大毒气车的工作范围，而这使他们面临一些挑战。第一个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处理能力的问题。兰格只有一辆毒气车，是一辆侧面刷着“凯撒咖啡公司”字样的厢式货车。这辆车在波兰各地开了近两年，杀死了许多残疾人。为了扩大海乌姆诺的杀人能力，兰格被批准再增加几辆车。¹¹1942年，它们将到达营地开始服役。这些汽车不同于第一辆，第一辆使用的是瓶装一氧化碳，新车是将发动机排出的一氧化碳导入后车厢。这种方式类似于固定毒气室的改进，毒气室最早也使用瓶装一氧化碳，后来改用废气。

但是，如果纳粹希望用这种方法来屠杀罗兹的“非生产性”犹太人，通过更多的毒气车并不能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最初，兰格的货车在波兰各地行驶，把毒气车送到受害者的住所旁，但如果现在要到罗兹犹太隔离区去杀人，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每天开车到隔离区带人离开，就会出现尸体处置和保密的问题。因此，纳粹才把海乌姆诺选

为毒气车的基地。这里是农村，远离主要城市，但和波兰其他地区有着良好的交通联系，罗兹在其东南仅仅四十英里。乡村教堂对面的一座破旧豪宅可以改建为毒气车作业基地，被杀害的犹太人尸体也可以埋在附近的森林里。毒气车在杀人过程中的主要长处——机动性被放弃了，换来的是纳粹认为更重要的一点——保密。

经过四到六周的准备，海乌姆诺的杀人工厂已经可以投入运行。第一批受害者来自周围的村庄，1941年12月7日，大约七百名犹太人被送到这里。¹²他们被关在大宅子里过夜，德国人告诉他们，在前往德国工作前，他们需要接受消毒。¹³从第二天开始，他们被成群地送上毒气车，尸体埋在几英里外的树林中。

战后，海乌姆诺的党卫军看守库尔特·莫比乌斯详细描述了杀人工厂的运作方式：“[在村庄大宅子里]犹太人在我们监督下脱光衣服，不分男女，贵重物品都已经丢弃了，波兰工人用篮子收集起来。在通往地下室的通道上有一扇门，上面写着‘去洗澡’。过了这扇门，有一段楼梯可以下到地下室，那里有一条通道，起初一直向前，过了几米后是一个直角拐弯，在这里人们必须向右拐走上斜坡，毒气车就停在那里，车门开着。斜坡被木篱笆密实地围着，一直到车门。通常，犹太人会迅速而顺从地走进毒气车，他们对[接受消毒的]许诺深信不疑。”¹⁴

莫比乌斯承认，犹太人有时也不会“迅速而顺从地”进入货车。被迫为德国人工作的波兰工人就得把他们拉上斜坡，推进车里。索菲娅·泽克是一个住在海乌姆诺的十一岁女孩，她记得自己听到犹太人被推入货车时的情景：“他们尖叫得很厉害——这是无法忍受的。有一次，他们带着孩子，孩子们大叫起来。我妈妈听到了，她说孩子们在叫：‘妈妈，救救我！’”¹⁵

一些波兰人被迫在海乌姆诺协助德国人进行屠杀，然而他们却开

始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对此加以利用。根据毒气车司机瓦尔特·博迈斯特交代：“有时候，会从送往毒气车的犹太人中挑出一个女人……可能是波兰人自己选的。我想他们是在问她是否愿意和他们发生性关系。在[大宅子的]地下室里，有一间专门为此预留的房间。女人会在那里过夜，有时是好几天，任由那些波兰人蹂躏。然后，她会和其他人一起在毒气车里被杀。”¹⁶另有消息来源称，在海乌姆诺，至少有一名犹太妇女被多名党卫军成员强奸并杀害。¹⁷

海乌姆诺主要是为了处死从罗兹隔离区送来的犹太人之用，但是1942年1月2日第一批从罗兹送来的却不是犹太人，而是纳粹所说的“吉卜赛人”。这些罗姆人于1941年11月被从奥地利送到罗兹，被关押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近五千人被铁丝网隔离在一个特殊区域内，没有足够的食物和住所，六百多人感染了斑疹伤寒。情急之下，纳粹想要马上毁掉这个吉卜赛人营地。1月9日，将近四千五百名罗姆人被送往海乌姆诺，他们被杀害并埋葬在森林中。¹⁸

1942年1月16日，第一批来自罗兹的犹太人抵达海乌姆诺。他们是被隔离区以莫迪凯·哈伊姆·罗姆科夫斯基为首的犹太自治机构挑选出来的。在1941年12月20日的一次演讲中，罗姆科夫斯基宣称，“由我最为信赖的同事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确定了名单”¹⁹，优先驱逐隔离区内的“不良分子”。虽然现在大家还不知道那些遭驱逐的人会死去，但大多数罗兹的犹太人都对此深感恐惧。隔离区虽然糟糕，总好过在外面未知的恐怖。

海乌姆诺的毒气车并不能让人很快死去，被困在里面的人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窒息而亡，村民们在货车经过时能听到传来的尖叫声。当货车抵达森林，车门被打开，一队犹太人——他们在死亡的威胁下为德国人劳动——必须先把尸体分开，然后扔进乱葬坑。一个掌管森林

“特别劳动队”的德国人住在索菲娅·泽克的家里，她记得他的鞋子上散发着腐烂尸体的“可怕”气味。²⁰

死于海乌姆诺的犹太人估计在十五万人至三十万人之间——庞大的数量代表了一项可怕的罪行，虽然对于波兰的三百万名犹太人来说，这还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如果纳粹想屠杀的不仅是波兰的犹太人，而是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他们就不能仅靠像海乌姆诺这样的地方自发行动——他们需要一项来自国家层面的统一举措。1942年1月20日，当第一批罗兹的犹太人来到海乌姆诺四天后，在柏林郊区的万湖召开了一次会议，很多人认为会议就是为此目的而举行的。

不难理解，为什么大众普遍认为万湖会议是大屠杀进程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实际上是罪行最终定格的时刻。大屠杀的发展进程是复杂的，有时并不符合直觉。要是有这么一个时间点，一切问题都在此刻定论，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如果不是1941年秋天希特勒所做的决定，那就是1942年这场柏林郊外的湖滨会议。可是，如果认为历史是这样的，那就错了。万湖会议只不过是整个大屠杀进程中的一个中转站。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写信给国务秘书、部分党卫军军官和其他有关官员，邀请他们到柏林郊外万湖路56—58号参加会议。他随函附上了戈林1941年7月31日来信的副本，内容是授权他组织会议，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因此，出席会议的十五人对会议的目的以及海德里希是否有权召集均无异议。受邀的党卫军军官既有高阶军官——党卫军师队长（少将）、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缪勒，师队长（少将）、党卫军种族和安置办公室主任奥托·霍夫曼，以及党卫军地区总长（中将）、帝国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也有相对低阶的军官——党

卫军一级大队长（中校）、安全部的所谓犹太人问题“专家”阿道夫·艾希曼和二级大队长（少校）鲁道夫·兰格博士。兰格博士受邀是因为他和特别行动队A大队在拉脱维亚亲手屠杀犹太人的经历。其他与会者包括外交部次长马丁·路德、司法部的罗兰·弗赖斯勒博士以及来自普鲁士政府的汉斯·弗朗克的秘书约瑟夫·布赫勒博士等。会议的原定日期是1941年12月9日，但后来推迟到1942年1月20日。

在万湖做出的决定必须由帝国政府各个部门共同采取行动，因此必须对这些决定进行记录，光靠口头命令是不够的。阿道夫·艾希曼复制的一份会议记录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虽然它是用刻意隐晦的语言写成的，但人们还是得以通过它深入了解到参与“最终解决方案”执行的纳粹高官们的想法。

海德里希宣布，希特勒已经同意，现在不必强迫犹太人“移民”，而可以把他们“疏散到东方”。²¹对于与会者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旧德国的数千名犹太人早已被驱逐出境。新鲜的地方在于海德里希所说的“疏散”的规模，他说欧洲可能有一千一百万名犹太人将受到“最终解决方案”的影响，其中还包括纳粹尚未控制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和英国（文中指称英格兰）。纳粹现在打算把所有这些——或者说在他们魔爪控制下的——犹太人，送到东方去组成几个“大型劳工团”。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犹太人会通过“自然损耗”而“淘汰掉”。海德里希特别提到，少数犹太人能够在这种“自然选择”中生存下来，也许他们被证明是“适应者”，并可能形成一种“生殖细胞”，犹太人可以从自我“再生”。因此，对于这些犹太人必须进行“相应处理”——他的意思只能是将他们杀死。

因此，海德里希宣布的不是新的方针，而是原有政策的延伸。最早是想把犹太人驱逐到外国去，然后演变成一项在战争结束后将犹太人

驱逐到纳粹控制的领土极边的计划，现在演变成在战争仍在进行时就要把犹太人送到东方去迫害致死。海德里希承认，每次“大规模疏散”的“时机”将取决于战争进展的情况。实际上，纳粹进行大屠杀的能力是在未来六个月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汉斯·弗朗克的代表约瑟夫·布赫勒问，在普通政府辖区是否可以开始实行“最终解决方案”？要杀死的犹太人已经在那儿了，所以不存在太多的“运输问题”。在缪勒提出请求之后，会议讨论了“最终解决方案”实施中的“各种”可能的“方法”——这显然是对各种可行的杀人手段的委婉说辞。会议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有关定义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混血犹太人”应作何处理？海德里希还称，少数犹太人，比如得过军功章的人，可能会被遣送到布拉格北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一个特殊的“隔离区”内，而不是直接送到东方。这句话证明，尽管会议纪要用词十分隐晦委婉，但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将面临可怕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在万湖会议上没有说过的事。海德里希并没有说犹太人会被送到波兰的集中营，并在那里受到“相应处理”。他明确表示，犹太人将被送往东方，在劳工团队中干活。如果他说了犹太人将在纳粹占领的波兰被杀，那么会议记录肯定会多少有所反映，但事实是没有。海德里希确实提到，犹太人在被送往“更遥远的东方”前，将“先行”被送到“沿途的隔离区”²²。因此不难想象，在万湖会议之后的几个月里，由于实际所限，波兰成了犹太人被送到的最东边的地方，因此他们在波兰的土地上被杀害。然而，在海德里希主持万湖会议的时候，他似乎仍然认为犹太人最终会被驱逐到苏联被占领的地区。

万湖会议也是党卫军在“最终解决方案”中保证自己主导地位的一个契机。比如，海德里希对于汉斯·弗朗克的代表约瑟夫·布赫

勒支持党卫军在这场浩大行动中的领导地位应该感到高兴，布赫勒是晚些时候才被增加到与会者名单上的，之前党卫军驻普通政府辖区的代表曾警告过希姆莱，说汉斯·弗朗克也想掌控其辖区内的犹太人政策。²³海德里希和希姆莱不想重复此前在驱逐波兰人去普通政府辖区时与弗朗克发生的冲突。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俩还必须确保由次长马丁·路德作为参会代表的外交部也接受党卫军的领导。他们应该还记得，1940年夏天，外交部曾积极地想在马达加斯加岛计划中发挥作用。这样，把所有热衷于此的人都召集到万湖来，海德里希显然是打算扫清在政治上的障碍。

据艾希曼说，海德里希对会议的进展感到高兴：“会议结束后……海德里希、缪勒（盖世太保头子）和我坐在壁炉旁。我第一次看到海德里希抽着一支雪茄或是香烟之类，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他喝了干邑，我很久没看到他喝酒了，通常他都不喝。”²⁴

难怪海德里希很高兴，因为没有人反对党卫军的主导地位。看来纳粹领导人不会在这一关键的政策问题上发生内讧，也没有人反对将欧洲犹太人驱逐到东方去劳作至死的原则。应该说这是在他预料之中的，毕竟他可以推断，自6月开始东线就已经开始枪杀苏联的犹太人，而10月以后，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不断在波兰和其他地方的隔离区死亡。剩下的仅仅是一些实际问题，如在西欧扩大驱逐犹太人的范围，以及迅速提高杀死更多犹太人的处理能力等。

万湖会议绝不是大屠杀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只是次级官员讨论如何实现他们主子的愿望的一次会议。没有一个关键性人物出席了会议，没有希姆莱、弗朗克，也没有戈培尔——当然更没有希特勒。关于犹太人命运的重大决定，是在万湖会议的前几个月中做出的。即便如此，也不存在这样一个决定，即希特勒在某一天宣布，“所有犹太人

都必须以这种方式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死去”——真正的决定是一项接着一项建立起来的，直到那些参加万湖会议的人都觉得灭绝犹太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也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例如，怎样消灭三百万名波兰犹太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屠杀他们的最后时间表在好几个月后才公布出来。

这次会议说明了这段历史的另外一面。“大屠杀”这个词会让我们误以为有一个单一的计划来屠杀犹太人，但纳粹在万湖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看来，“犹太人问题”有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的确，有一个来自希特勒的整体愿景，那就是消灭犹太人，但如何完成这一目标却可以采用很多方式。在万湖，海德里希首先谈到一个“解决方案”——把欧洲的犹太人驱逐到苏联的荒原上，让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修路，并最终在一个时期内灭亡。这个主意和马达加斯加岛方案相去不远——如果有必要的话，把犹太人远远地送走，任其自生自灭。在万湖还讨论了一种“解决方案”，对于纳粹来说也许是更紧迫的问题，那就是普通政府辖区里有大量的犹太人。他们可能会在更短的时间内、被以不同的方式屠杀——尽管这个问题在会议上悬而未决。与此同时，另一个“解决方案”已经在执行——在苏联枪决犹太人。今天，所有这些杀戮行动都被称为“大屠杀”，但在当时，它们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快慢不同，各行其是。

尽管如此，万湖会议仍然有着巨大的情感意义。的确，这些与会者既不愤怒，也没有发疯。他们都是成功人士，肩负着艰苦和困难的工作，大多数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坐在万湖圆桌旁的十五个人，八个有博士学位。他们在优雅和谐的环境中讨论了犹太人的灭绝，海德里希在邀请函中写道，会议提供午餐，讨论时还将提供干邑。会场建筑是一

栋时尚的别墅，有一个可以俯瞰湖面的阳台——这里是柏林最优美和最受欢迎的休闲场所之一。

万湖优美的环境和罗兹隔离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这些人坐在豪华会场喝着白兰地时，海乌姆诺的受害者正在一辆毒气车的后车厢里窒息而死。不仅如此，这次会议似乎说明了如此精明、优雅、老到的人可以做出怎样的事情来。也许他们中没有人能亲手杀死犹太人——艾希曼自称具有“敏感的天性”，一见血就“反感”²⁵——但他们可以热情地支持一项将一千一百万人从这个世界上抹掉的政策。如果人类可以做出这样的事，还有什么他们不能做的呢？

最后，了解万湖会议的战争背景是很重要的。当海德里希和他的同事们在柏林郊外会面时，德国军队正在莫斯科西面苦苦挣扎。德国士兵没有能够抵御严寒的被服和装备，去和来自西伯利亚的苏联有生力量作战，他们只是勉强顶住了红军的突破。德国国防军无敌的神话已经破灭了。

“莫斯科附近的德国军队处境凄凉，”那年冬天，苏军连长费奥多·斯维尔德洛夫说，“我记得很清楚，1941年7月的德国人，他们很自信、强壮、高大，卷起袖子扛着机关枪向前行进。但后来，他们变得沮丧、蜷缩，那些傲慢的家伙裹在从村里老妇人那里偷来的羊毛巾里……当然，他们仍然在开枪自卫，但已经不是我们在1941年早些时候面对的德国人了。”²⁶

在这种背景下，纳粹领导人花费时间去策划驱逐数百万名犹太人似乎令人惊讶。如果他们把全部精力都用于赢得战争，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吗？为什么要在德国军队为避免灭顶之灾而战斗的同时，还要浪费资源去实现大规模驱逐平民的宏大计划呢？

答案是，像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一个矛盾。他们认为后方的犹太人和莫斯科城下的红军都是同样的敌人。尤其是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车之鉴，希特勒和他的同事们坚持认为，犹太人可能会破坏国内的士气，并在背后向德国军队“捅上一刀”。

正如赫尔曼·戈林所说：“这是一场伟大的种族战争。说到底，要么日耳曼和雅利安人在这里获胜，要么就是犹太人统治世界……”²⁷戈林不过是在鹦鹉学舌，希特勒一直认为，这场战争与其他战争不同，这是一场为日耳曼民族未来的存在而进行的生存斗争。1942年1月30日是希特勒就任总理的周年纪念日，他在柏林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只能以两种方式结束，要么是雅利安人的根绝，要么是犹太人从欧洲消失。我已经在1939年9月1日的德国国会上说过这件事了。”当然，希特勒并不是在1939年9月1日说过这个“预言”，真正的日期是在此七个月前，即1月30日。他发现将它改为9月1日更有利一些，因为那是德国军队入侵波兰并发动战争的日子。对希特勒来说，重要的是战争和犹太人命运之间的联系，历史的准确性是无关紧要的。在当天的演讲中，希特勒继续说：“这场战争的结果将是消灭犹太人。这一次将适用真正的犹太古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战争越是扩大，反犹主义就越是会传播——世界上的犹太人将会给出证明。它将在每一个集中营里生长，将在每一个家庭中生长，他们都会知道，为什么必须在最后时刻做出牺牲。这一时刻即将到来，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敌人至迟将在这个千年得到终结。”²⁸

就在万湖会议召开的十天后的十天，那些与会者就聆听了希特勒的这场演讲，因此他们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即将在对

付“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敌人”中发挥作用。万湖会议并没有引起骤然的紧张，显得和这栋别墅周围的宁静格格不入。海乌姆诺的毒气车正在工作，贝乌热茨第一座专门用以杀害犹太人的毒气室也正在建设中，但奥斯维辛在1月份没有建造什么新的杀人设施，曾用来做杀人试验的主营地火葬场仍被作为简易毒气室使用。

到目前为止，除了苏联战俘外，当地被认为无法胜任劳动的犹太人也都被送进奥斯维辛的火葬场杀死。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第一批犹太人是何时到达的，只知道大体是在1941年秋天到1942年初之间的某个时间。他们的死标志着奥斯维辛集中营功能的转变，这些犹太人并不是以战俘的身份进入集中营的，而是从周边地区被直接送到了这里。

波兰政治犯约瑟夫·帕钦斯基目睹了一群犹太男人是怎样在主营地火葬场被杀害的。他在党卫军的行政大楼里干活，就在火葬场的对面。他设法爬上阁楼，推开屋顶的瓦片，看看下面发生了什么。“他们[党卫军]对这些人非常客气，”他说，“‘请拿好衣服，收拾好东西。’这些人脱去衣服，然后被赶进[火葬场]去。一个党卫军爬上顶楼平台，戴好防毒面具，打开[屋顶上的]一个窗口，把药倒了进去，然后关上窗。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尽管墙体很厚，但你还是能听到一阵巨大的尖叫声。”²⁹为了掩盖尖叫声，党卫军发动了“两辆摩托车”，但他还是听到“人们惨叫了十五到二十分钟，声音越来越轻。如果有人发现了我，我也会被毒死的”。³⁰

战后，奥斯维辛党卫军成员汉斯·施塔克告诉审讯人员，1941年10月，他就参与了这样一起屠杀事件。他“奉命”亲自“把‘齐克隆B’倒进去”，因为“只有一名卫生兵在场”。他说，由于“齐克隆B”是“颗粒状的，倒进去的时候会落到人们身上，于是人们就开始大声喊叫，因为他们终于明白过来……过了一段时间……毒气室打开了，死尸狼藉，

那真是可怕景象”。³¹

如前所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是用火葬场的一个停尸间临时建造的，一直存在噪声、保密和容纳人数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安乐死计划的原负责人、目前正在贝乌热茨监督建造毒气室的克里斯蒂安·维尔特所希望避免的。

由于贝乌热茨将成为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等其他专用死亡集中营效法的榜样，因此值得花点时间来研究其建设的思想。从设计思想来说，贝乌热茨与后来最恶名昭著的集中营奥斯维辛—比克瑙大不相同。贝乌热茨规模很小，营地大致呈方形，每边长约三百码，一侧与附近的铁路平行。这个空间被分成两部分，离铁路较近的一边有一个点名广场，刚来的犹太人脱衣服的营房，警卫和少数犹太劳工的住所，以及一个存放没收犹太人财物的地方。另一边就是执行灭绝的地方，一道栅栏将其和抵达区域分开，中间有一条狭窄的通道相连，被称为“管道”。在灭绝区内有焚烧和掩埋尸体的地区以及三个毒气室。毒气室都被做成贴着淋浴间瓷砖的木屋，为了确保密封，双层墙壁间填满了沙子，内壁衬有白铁皮。

在建造营房的过程中，维尔特和他的团队显然借鉴了在安乐死计划中的经验。就像安乐死中心的病人一样，在贝乌热茨被杀的犹太人事先被告知要洗澡，唯一的区别只是毒气没有采用瓶装一氧化碳，而是来自放置在假淋浴间外面的柴油坦克发动机。

与奥斯维辛相比，贝乌热茨是一座纯粹的杀人工厂，这种独特性是奥斯维辛所始终不具有的。当然，这也解释了贝乌热茨规模为什么这样小，因为没有必要有太大的空间，几乎所有来这里的人都将在几个小时内死去。同样，由于纳粹想要杀死的人数有限，像贝乌热茨这样的专用死亡集中营肯定也只能存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奥斯维辛的设想是建

成一座象征纳粹统治的近乎永久的建筑，而贝乌热茨则只是一个临时的地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许多建筑都是用砖建造的，而贝乌热茨的大部分建筑用的是木头。所有的专用死亡集中营都会给人一种短暂的感觉——这些地方似乎都是粗制滥造、拼凑而成的。

此外，贝乌热茨和其他专用死亡集中营与奥斯维辛相比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纳粹希望它们永远成为秘密。奥斯维辛和传统的集中营诸如达豪和萨克森豪森一样，都建在大城镇的附近，没有任何可隐瞒之处。对纳粹来说，这里是作为一个恐怖的象征，在发挥震慑公众的作用上还有积极的一面。只有当集中营后来建造了毒气室进行大规模屠杀时，某些区域才有必要进行遮掩。而贝乌热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秘密的地方，在建造新营地时被迫劳动的一百五十名犹太人在完工后即被杀害，成为新毒气室的第一批试验品。³²

就像海乌姆诺是为了解决罗兹隔离区“无用的”的犹太人而建造的一样，贝乌热茨被用来屠杀卢布林附近“无用的”犹太人，后来扩展到西面的克拉科夫和东南部的利沃夫。1942年3月，营地做好了屠杀的准备。当月，来自卢布林和利沃夫的犹太人就被赶到这里，至4月中旬，约有四万五千名犹太人在毒气室里死亡，尸体被就近掩埋。

贝乌热茨作为杀人中心自1942年3月开始运行，到当年年底结束。没人知道那里确切的死亡数字，但据可靠的估计，有大约四十五万人到五十万人在此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犹太人，也有一些是辛提—罗姆人。只有极少数人——有报道说仅有两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这也是另一个和奥斯维辛的不同之处，我们今天很清楚奥斯维辛是一个综合性的集中营，既是劳动营，也是死亡营，那里从未完全专注于灭绝犹太人。由于种种原因，那里有数千人幸存下来。但是，想要在贝乌热茨幸存下来，唯一的机会就是在抵达后被挑中，成为极少数在营

地劳动的工人，然后再想办法逃跑。

1942年8月，来自利沃夫隔离区的鲁道夫·雷德尔被送到贝乌热茨，他是唯一一个记录了集中营生活的人。当他被装进一列开往贝乌热茨的火车时，他明白了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尽管纳粹设法保守秘密，但“在贝乌热茨将要发生什么”的传闻还是在流行。³³在开往营地的途中，“大家都默不作声，我们意识到正在走向死亡，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完全冷漠，连一声悲叹都没有”。刚刚到达贝乌热茨，他们就被命令从距离地面超过三英尺的车厢上跳下来，而且是在汹涌的人潮中。有些人，特别是老人和孩子，“摔断了手脚”。

犹太人被集中到一起，一名党卫军开始讲话。“每个人都想听，”鲁道夫·雷德尔写道，“希望在我们心中突然浮现——‘如果他们对我们说话，也许我们会活下去，也许我们会得到某种工作，毕竟……’”³⁴党卫军告诉犹太人，首先他们必须洗澡，然后将进行强迫劳动。“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幻想的时刻。片刻之间，人们松了一口气。周围完全平静了。”

男人和女人被分开。男人被要求脱掉衣服，再通过“管道”进入毒气室。女人被带到一座军营，在那里她们被剪掉头发。德国人用她们的头发进行各种工业生产，例如编织毛毯。雷德尔说，就在剃发时，女人们开始意识到她们就要死去，“会发出哀叹和尖叫声”。

剪完头发后，女人们跟着男人们进了毒气室。就像毒气车厢一样，贝乌热茨的毒气室毒死人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雷德尔记得听到那些被关在里面的人“呻吟”和“尖叫”了约一刻钟。³⁵

雷德尔没有被立刻杀死，因为他被挑中成为几百个在营地强迫劳动的犹太人之一，他们做的是清空毒气室以及掩埋尸体等工作。如果白天党卫军觉得哪些工人表现不好，晚上他们就会被带到一个乱葬坑

边枪毙。第二天，会有更多新来的犹太人来接替他们的工作。

工作完全是噩梦，当雷德尔和其他工人掩埋死者时，“我们不得不从一座坟场的一边走到另一边，到达另一座坟场。我们的腿被母亲的鲜血浸没，我们行走在尸堆上——这是最糟糕、最可怕的事情……”³⁶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我们就像没有意志的人一样到处移动，我们就是行尸走肉……像机械一般经历了那可怕的生活”³⁷。

灭绝犹太人的报告很快送到戈培尔那里。通过1942年3月27日的日记，我们不仅深入了解到他本人对犹太人命运的见解，还可以看到做出屠杀犹太人决定的总体背景。关键的是，他指出了希特勒是种族灭绝的幕后推动者：“这是相当野蛮的流程，无须多言，而犹太人也所剩无几了。总体上说，其中的60%必须得到清算，只有40%仍然可以用于劳动……对犹太人的审判确实是野蛮的，但他们完全应该受到惩罚。元首在预言中说，如果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开始，犹太人的下场将以最可怕的方式变成现实。在这些问题上，个人不应当被多愁善感所支配。如果我们不阻止犹太人，他们就会毁掉我们。这是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没有任何其他政权能够如此广泛地集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元首也是坚定的捍卫者和倡导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彻底的解决办法，因此这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谢天谢地，在战争期间，我们可以做许多在和平时期不可能做到的事。在普通政府辖区的城镇里，空出来的隔离区现在挤满了被从德国赶出去的犹太人，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过程又将重复出现。犹太人的生活不是玫瑰花床，今天他们在英美的代表正组织和宣传对德国的战争，他们在欧洲的代表就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是绝不为过的。”³⁸

在万湖会议之后，第一批来自外国的犹太人被集体移交给纳粹，他

们来自斯洛伐克。1942年春天，这批斯洛伐克犹太人坐上发往奥斯维辛的列车的过程将再次说明，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的进展绝对不是直线向前的。

我们已经知道，斯洛伐克是1939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在纳粹压力下解体后形成的。斯洛伐克政府从一开始就支持纳粹及其反犹太主义思想。例如，1941年10月20日，希姆莱在会见斯洛伐克总统和总理时建议，可以将该国九万名犹太人中的一部分驱逐到普通政府辖区。³⁹

当时，德国非常希望斯洛伐克能够提供一批可用于强制劳动的工人，斯洛伐克政府起初并不热心，但后来他们想到了另一个办法，询问是否可以提供两万名犹太人来当工人。斯洛伐克政府是一个强烈反犹太的政府，他们很乐意借此机会把犹太人赶走。1942年2月16日，德国外交部对这一询问做出答复，说准备“在最终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过程中”接纳这批犹太人。⁴⁰但后来德国人发现，斯洛伐克人打算把一个个家庭交给他们，德国人并不想要，他们只想要能干活的犹太人。鉴于万湖会议，这一事态的发展似乎显得有些奇怪，纳粹不是想把他们所有能找到的犹太人都驱逐到东部吗？但实际上这仅仅是模式之一罢了。艾希曼和其他负责实际执行万湖会议方针的人都清楚，波兰的集中营根本没法容纳来自斯洛伐克的无劳动能力的犹太人。1942年2月，离贝乌热茨投入运行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斯洛伐克当局坚持自己的立场。2月，艾希曼的驻斯洛伐克代表迪特尔·维斯利尼与斯洛伐克总理伏伊特·图卡及其办公室主任伊兹多尔·科索博士举行会议，讨论了这一问题。斯洛伐克人坚持认为拆散家庭是“违背基督教的”。维斯利尼认为这不过是一句伪善的话，实际上斯洛伐克当局只是认为把那些养家的犹太人赶走后，照顾那些剩下的犹太人要花钱并且很麻烦。⁴¹斯洛伐克人建议，如果德国人接收的不

仅仅是劳动力而是整个家庭，他们会对因此产生的“费用”进行补偿。

双方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其可笑程度令人吃惊。德国人每接收一个犹太人，斯洛伐克就付给德国五百马克。作为回报，德国人承诺，他们不会对犹太人留下的财产所有权提出要求，这些犹太人永远不会返回斯洛伐克。这意味着，一个领袖是天主教神父——约瑟夫·蒂索——的欧洲国家同意向纳粹付钱，让他们把犹太人带走，条件是他们永远不会回来。虽然斯洛伐克当局在讨论这一协议时并不确切地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在这些犹太人身上，但应该知道他们正被送进可怕的危险之中。斯洛伐克政府怎么能假装不知道呢？因为就在和维斯利尼会晤的几天之前，希特勒就在柏林体育宫的一次演讲中说，“这场战争的结果将是消灭犹太人”⁴²。

直到4月10日，海德里希才和斯洛伐克人签署了协议，最初从斯洛伐克送到奥斯维辛来的都是年轻健壮的人。琳达·布莱德是一名十八岁的斯洛伐克犹太姑娘，也是首批被强行遣送出境的人之一。“1942年3月24日，”她说，“‘赫林卡近卫军’（斯洛伐克人民党的民兵组织）的士兵来到每户人家，把所有从十六岁到二十五岁的女孩都集合起来。”琳达和其他女孩被关在斯洛伐克东部斯托普科夫镇的一座大房子里。她并不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告诉我们，‘你们要去德国工作，你们会把钱寄给你们的父母，然后父母会过来和你们团聚’。那我会有什么感觉？我很开心。因为我们可以工作，然后父母会有钱，最后过去和我们一起团聚”。⁴³

赫林卡近卫军现在控制了这些犹太人——他们找到了机会侮辱犹太人。西尔维娅·维塞拉是一名犹太青年妇女，1942年3月被赫林卡近卫军带走，她回忆道：“有些斯洛伐克士兵的行为真的很愚蠢，例如他们故意在地板上排泄，我们不得不动手清除污迹。他们称我们为‘犹太

婊子’，并且踢我们。他们的表现真的很差劲。他们还对我们说‘要教你们犹太人如何工作’，但我们都是曾经工作过的穷苦女人……当你的人格被剥夺时，你真的感到很耻辱，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你突然变得毫无价值，就像动物一样。”⁴⁴

迈克尔·卡巴奇是一名负责看管犹太妇女的赫林卡近卫军士兵，后来强迫她们登上前往波兰北部的火车。他三十岁出头，是个坚定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相信其政党的反犹主义宣传。“这都是政治问题。”他说，“国家告诉我们，犹太人是骗子，剥削斯洛伐克人，从来不想工作，却过着轻松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并不怜悯他们的原因。”卡巴奇自己的反犹主义更有点儿机会主义的色彩，而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看，”他说，“我曾经和一个犹太女孩约会过。她父亲以前有一家大商店。他送给了我一份礼物，是一幅犹太人的肖像。我知道，如果他们发现我有这样的东西，我会被抓起来的。我不得不把它扔进河里。”⁴⁵

卡巴奇说，他在赫林卡近卫军过着“不错的生活”：“我们有很好的薪水、住宿和食堂，我们不能抱怨。”士兵也有机会偷走犹太人的财产。卡巴奇本人承认偷过一双鞋。“当犹太人来到营地后，我们会拿走他们的财物和衣服。所有犹太人都必须给我们看他们的东西，士兵们会把值钱的东西拿走。”⁴⁶卡巴奇对他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感到十分轻松：“我没有把他们送进毒气室！我只是把他们运送到波兰边境，在那里德国人接管了运输，天晓得后来他们被运到哪里去了。”⁴⁷

在被赫林卡近卫军看守期间，琳达·布莱德相信她会被送到德国去工作。但在3月26日，当她被带到车站上火车时，她看到了“只有装牲口的车厢”。“普通客车在哪里？”她问道。“我们已经开始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了。你进来的时候，在车厢里有两个桶。其中一个装满了水，另一个空着，用来当马桶。”不久之后，她明白过来了，“我们不是去

德国，我们要去的是波兰”。

琳达·布莱德是3月末从斯洛伐克到达奥斯维辛的第一批人之一，她们也是第一批进入集中营的女囚犯。她们刚一到达，穿过奥斯维辛主营写着“劳动使你自由”标语的大门，就挤进了其中一个监狱区。当时发生了一场争斗，几百名斯洛伐克妇女“尖叫着和推搡着”，为的是争抢监狱区内寥寥几个厕所。琳达·布莱德和其他女人们睡在光秃秃的地板上，抱在一起取暖，因为“3月的波兰天气很冷”。次日，她不得不在党卫军面前脱掉衣服，一位“妇科医生”检查她最隐私的部位，以看她是否“藏有黄金”，然后她被迫赤身裸体在消毒冰水里洗澡。“党卫军对我们说，‘你们犹太人是肮脏的，你们有虱子，你们必须要弄干净’。”⁴⁸

所有斯洛伐克犹太妇女都进入了营地。那时，从每一批新来的人中挑出一部分直接送去杀死的罪恶程序尚未开始实行，并不仅仅是因为第一批人都是适合劳动的犹太人，同时也是因为集中营主营地火葬场内唯一的毒气室并不适合用来进行大规模屠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纳粹的困难是不可能火葬场秘密地进行杀戮，因为该建筑物靠近党卫军行政办公室，也靠近囚犯居住的营房。

这个“问题”即将由奥斯维辛的党卫军解决，一个新的营地正在建造中。这个营地所在的村庄距离奥斯维辛集中营一英里半，波兰人称之为布热津卡，德国人称之为比克瑙。1941年9月，希姆莱下令在比克瑙建立一个能够关押十万名囚犯的营地。比克瑙原本是为苏联战俘准备的，但在1941年10月底，希特勒决定把苏联战俘用于其他地方进行强迫劳动，因此希姆莱认为比克瑙可以用来安置犹太人。随后，1942年2月27日⁴⁹，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胡斯和党卫军其他官员会面，决心将拟议的新火葬场的地点从拥挤的主营移至新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广

阔空间。

在等待新火葬场建设期间，奥斯维辛的党卫军想出了一个过渡性的办法——这个办法不仅可以增加毒死犯人的数量，还可以保证绝佳的隐秘性。在比克瑙的一个偏远角落，远离任何其他住所，有一座名为“小红屋”或“一号地堡”的小别墅。党卫军把别墅的窗户砌上了砖，并将里面的两个房间改建成毒气室。在小屋的墙顶上，他们打了一些窗口，通过这些窗口，他们可以把“齐克隆B”的晶体扔进去。这是一台相当原始的杀人机器，但与主营地火葬场内的毒气室不同，这里没有人会听到犹太人窒息时的尖叫。不过，当党卫军解决了一个问题时，他们又创造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置死者。“小红屋”的尸体无法在火葬场的焚尸炉里烧掉，因为那里远离火葬场。唯一的办法似乎是掩埋尸体，但这需要很多工人，而且无论对囚犯还是党卫军都可能有害健康——比克瑙的地面排水状况尤为糟糕。

尽管党卫军在处理尸体时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小红屋”意味着他们可以比以前杀害更多“无用的”犹太人。在“小红屋”投入使用几个星期后，一百码外的另一座小屋，也就是所谓的“小白屋”，也如法炮制变成了毒气室。

1942年夏初，从斯洛伐克开始运来整家整家的犹太人。党卫军现在开始在铁路旁尘土飞扬的地上进行挑选，这条铁路位于奥斯维辛主营地和比克瑙之间。在这个被称为“斜坡”的地区，党卫军的医务人员花几秒钟时间甄别每一个新来的人，那些可以进行强迫劳动的人站到一边，而那些被认为可以立刻杀掉的人站到另一边。

1942年7月，伊娃·伏特瓦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她和家人来到了奥斯维辛。这是多年迫害的结果。当她还在学校读书时，就听到过赫林卡近卫军高呼过“斯洛伐克属于斯洛伐克人，巴勒斯坦属于犹太

人”，以此来庆祝斯洛伐克的独立。“一看就知道，”她说，“他们都是些没有道德观的激进分子。”⁵⁰她觉得自己出生的国家抛弃了她，感到心烦意乱。她说：“我无法面对这件事，即使到今天，我也不能。”1942年，赫林卡近卫军的一个军官住在她的村子里，看上了她父亲的房子。因此，她的家人成了首批被驱逐出境的犹太家庭之一，7月17日，伊娃和她的父母亲离开斯洛伐克，挤进了“畜运车厢”。

在奥斯维辛的斜坡上，她的父亲被挑中站到一边，伊娃和她的母亲站到另一边。她说：“从那一刻起，我就再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我父亲的消息。当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看上去忧心忡忡、悲伤无望。”⁵¹她的父亲被带走，在毒气室里被杀害，而伊娃和她的母亲被派到一个建筑队。这项工作对身体要求很高，囚犯几乎得不到食物或水。结果，伊娃的母亲生病了。“她发烧了，上牙有黑影——这是致命伤寒的一个明显症状，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那天晚上，她告诉我她要去[营地的]医院，我哭了，求她至少再多待一天，不要去那儿，因为从来没有人从那里回来过。”现在，伊娃知道，“人们是直接被带到了毒气室”。第二天，当伊娃收工回来时，得知母亲不顾她的恳求已经去医院了。三天后，一位在医院工作的人告诉伊娃，她的母亲“已经死了”。不久之后，伊娃被派往收尸队，从营地各处收集尸体。在一堆遗骸中，伊娃发现了一副眼镜。“我知道它是我妈妈的——她曾被德国‘卡波’打了一巴掌，左边镜片被打裂过。”伊娃拿着眼镜哭了起来，“她[母亲]所有的痛苦、疾病和不幸都浮现在我的眼前”。她留着“眼镜作为母亲最后的记忆。直到感染了胃伤寒，他们只得烧掉我藏眼镜的枕头，我就这样失去了这份对母亲最后的回忆”。⁵²

即便被选中进行劳动，还是有许多新来的人在几个星期内死去——特别是在新成立的主营妇女营区。奥斯维辛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变成了纳粹体系中最大的妇女集中营之一。1942年4月，有超过六千七百名妇女被关押在主营区，到1942年8月妇女营区迁往比克瑙时，估计每三名妇女中就有一人死亡。⁵³在比克瑙，情况也没有好转。疾病流行，“卡波”相当野蛮，食物不足，工作令人疲惫不堪，尤其是那些被迫挖大沟来改善排水的人。

1942年被送到奥斯维辛的斯洛伐克犹太人弗里科·布莱德说：“我们发现自己身在比克瑙。当时，我对那里一无所知，然而我一见到它，就感到那是地狱。”就在弗里科到达比克瑙不久后的一个夜晚，一个看管他的“卡波”走近他，说需要人手去“装货”，但没有提到是什么“货”，这个“卡波”向弗里科保证，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将得到一些面包。很快，他看到自己的任务是“把尸体”搬上马车。开始干活以后，他看到了一具“非常漂亮的女人”的尸体。“她还在我脑海中，”弗里科说，“她一定是刚刚到集中营，肯定是自杀的……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月光照耀着她……很漂亮。”⁵⁴

从1940年春天集中营建立之日起，死亡就一直存在于奥斯维辛。但是，斯洛伐克犹太家庭的到来和随后在斜坡上进行的甄别，预示着一个新的恐怖时代。那些被选中立刻杀害的人可能是这里最短暂的访客。老人、孩子和病人都在改造的小屋边等待被毒死。在收尸队干活的斯洛伐克犹太人奥托·普雷斯布格尔说：“他们过去常常坐在那里，一定是在吃从家里带来的东西。党卫军和狗站在他们周围。他们当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不想告诉他们，这对他们来说更糟糕。我认为把他们带到这里的人根本不算人，而是一些丛林里的野兽。”⁵⁵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胡斯在回忆录中写道，犹太人走到他们的死亡之地，“一座在花果满枝的树木掩映下的木屋后花园”。他记得有一个女人，她很清楚地知道即将发生的事，低声对他说：“你怎

么能杀死这么漂亮可爱的孩子呢？你真的一点良心都没有吗？”⁵⁶ 胡斯称自己面对这样的场景时感到“心惊肉跳”，但这并未影响他继续执行杀人程序。

来自斯洛伐克的犹太人不仅仅被驱逐到奥斯维辛。至少有二万四千人被转移到位于卢布林东北约五十英里的索比堡，这里是继贝乌热茨之后第二座建有固定毒气室的新杀人中心。和贝乌热茨一样，这里靠近铁路，但地点更偏远一些，在距布格河几英里远的森林和沼泽里。索比堡周围的乡村宁静安详，风景如画，营地建筑的设计也很有吸引力。1943年4月被转移到这里的托伊维·布拉特说：“我把索比堡想象成一个烧人和施放毒气的地方，所以它看起来一定像地狱一样。”当时，有关这个地方真正功能的“流言”已经传了好几个月，“现在我看到的是漂亮的房子，还有指挥官的别墅，种着绿植，还有一座小栅栏和鲜花”⁵⁷。

1942年5月，第一批犹太人运抵索比堡。执掌这里的是三十四岁的弗朗茨·施坦格尔，一个参加过T4安乐死行动的老手。来这里之前他曾拜访过贝乌热茨，并被那里“无处不在的臭味”所震惊。他看到坑里有“数千具尸体”，亲自了解了集中营管理的实际问题。有人告诉他：“一个坑已经满出来了。他们把太多的尸体扔了进去，腐烂得太快，以至于下面的液体把尸体往上推，推上来又翻过去，尸体就从尸堆顶上滑落下来。”⁵⁸

在贝乌热茨，施坦格尔重新遇见了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他们是在安乐死行动中认识的，当时施坦格尔很讨厌维尔特。现在，维尔特是施坦格尔的上司，他在视察索比堡建设时对工作进展的方式感到不满。施坦格尔得知维尔特已经抵达这里，“他环顾还在施工的毒气室说：‘好

吧，我们现在就用这二十五个干活的犹太人试试。’”维尔特命令这些犹太人进入毒气室并毒死了他们。据施坦格尔的一个同事说：“维尔特的行为就像一个疯子，用鞭子猛抽自己的下属来驱使他们。因为门不太好使，让他大发雷霆。”⁵⁹

施坦格尔在战后声称，他对交给他的任务感到震惊，并不想完成这项任务；但当时在营地的目击者却讲述了不同的故事。“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傲慢，”集中营里的犹太幸存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兹马兹纳说，“以及对他的工作和环境表现出的明显惬意。尽管其他人在别的方面要比他恶劣得多，但没人表现得像他那样惬意。他脸上挂着一个永恒的微笑……不，我不认为那是因为紧张，而完全是因为他感到高兴。”⁶⁰在索比堡负责毒气室运行的埃里希·鲍尔也提供了一个佐证，与施坦格尔认为自己是不情愿地工作相互矛盾。“在索比堡的餐厅里，我无意中听到了弗伦泽尔、施坦格尔和瓦格纳（都是营地内的党卫军）的谈话，他们正在讨论贝乌热茨、特雷布林卡（即将建造的最后一个死亡集中营）和索比堡的被害者人数，并对索比堡在比赛中‘排在末位’而感到遗憾。”⁶¹

尽管索比堡的党卫军向贝乌热茨取了经，但他们并没有在索比堡建起一座高效的杀人中心。虽然偏远的位置对他们有利，但铁路是单轨的，限制了运输的能力。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周围的自然条件，在1942年8月至9月间，部分铁路沉入了沼泽地，必须进行维修，因此一趟火车都没有开到索比堡。

在营地投入运行初期，党卫军自己也在处理流程上制造了一个瓶颈。当一列火车到达索比堡后，党卫军先让能够独自行走的人进入集中营，再把剩下的人——老人、残疾人和伤员——集中起来坐上一辆马车。党卫军告诉他们，要把他们送到医院，这是为了安抚他们，只是一

个残酷的笑话。“医院”在进入森林二百码处，一群刽子手站在一个坑边。所有被带来的人都被立刻处决。

这一过程并不如党卫军所希望的那样顺利。把老人和病人拉上马车，再让他们去“医院”都很耗费时间，所以党卫军改进了方法。他们建造了一条窄轨铁路，从索比堡车站一直通到“医院”，这样就可以更快地将那些体弱的犹太人送到处决地。马和马车已经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现代化的技术。⁶²

仅仅需要三十名党卫军，再加上一百多名苏联战俘，就可以对索比堡集中营进行管理。许多战俘来自乌克兰，他们因此得以离开原来的战俘营，不然很可能会病死或者饿死。他们在卢布林东南的特拉维尼基训练营受训，在所有看守中他们是最为残暴的。这部分是因为德国人喜欢把最血腥的事情扔给乌克兰人来做⁶³，比如在索比堡，大多数在“医院”枪毙犹太人的都是乌克兰人。

就像在贝乌热茨一样，在集中营工作的人中，最多的就是犹太人组成的“特别劳动队”。每一个主要的灭绝营都从新来的人中进行挑选，他们被迫去干和杀人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活，例如把犹太人从车站带到营地的“车站劳动队”，还有专门清空毒气室并掩埋尸体的人，这对“特别劳动队”来说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就像在贝乌热茨一样，所有“队员”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没有按照党卫军的要求执行任务的人会被处决，新来的人会替补上去。

托伊维·布拉特在十五岁时成了一名索比堡的“特别劳动队”成员，他对营地的恐怖环境怎样改变在那里劳动的人的性格感到惊讶。他说：“人在某些环境下会发生变化。人们问我：‘你明白了什么？’我想只能肯定明白了一件事——没有人能看清自己……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坏人。有时候，当有人对我很好时，

我就会想，‘他在索比堡会变成什么样？’”⁶⁴

在入侵苏联的第一年时间，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走了很长的路——不仅是指德军在苏联国土上的行进距离，还包括党卫军和其他人在犹太人命运以及杀害他们的手段上所做的大体决策。

到1942年6月，进行大屠杀的第一批死亡工厂已经建立起来，纳粹创造了一种杀人方法，使他们得以大批量地杀人而免受心理折磨。他们现在要寻找的是大量的犹太人。但是，纳粹不能靠自己去搜捕每一个外国犹太人，他们需要愿意合作的人。关于纳粹是如何进行搜寻的故事，是整个历史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之一。

12. 搜捕和屠杀(1942)

在设法把西欧犹太人驱赶到东方的杀人工厂时，纳粹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统治每一个国家的方式都不一样：对于被占领的比利时、荷兰、挪威和丹麦来说，其管理模式各不相同；意大利是盟友；法国既是准盟友，也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不仅如此，1942年夏天，德国军队还在忙于征服苏联——希特勒认为这是一场决定历史的战争。因此，党卫军要完成其驱逐犹太人的使命，手头的资源实属寥寥，只能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获得成功。

在法国，纳粹可以利用存在已久的偏见——不仅是反犹主义，还有对外国人的恐惧和对移民的厌恶。在维希政府之前，法国当局就开设集中营拘留不受欢迎的外国人。1939年，法国人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古尔建立了一个集中营，用以关押逃避西班牙内战的人；不仅是那些站在共产党一边最终战败的人，还有其他许多民族的人都被关押在古尔恶劣的环境中。

在法国当局看来，最糟糕和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是犹太人。维希政府的犹太人问题专员泽维尔·瓦拉特说：“犹太人是一类无法同化的外国人，移民往往会形成一个国中之国。并且，他们的性格中有很强的支

配欲，他们的家族会共同在这个国家内创造出一个超级国家。”¹

维希当局不仅从1940年起实行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限制性法律，而且原则上也赞成大批驱逐来自外国的犹太人——其中许多人是从德国和奥地利的纳粹压迫下逃过来的。然而，维希政府认识到，迫于现实，赶走所有这些外国犹太人肯定是一项长期的任务。1942年，瓦拉特在一次演讲中问道：“只要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能用何种方式把他们送到哪里去呢？实际上，这应该是战胜者要做的事，只要他想维持长久的和平，就必须在欧洲找到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如果能扩大到世界范围则更好。”²

1942年，第一列满载犹太人的火车离开法国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不过，虽然维希政府不喜欢外来的犹太人，但这趟火车并不是驱赶他们的整体计划的一部分，而只是为了报复。这趟3月出发的火车运送了一千多名犹太人，整件事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41年的夏天。1941年8月，法国共产党人在巴黎枪杀了两名德国人，其中一人死亡，另一人重伤。本来，由于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的条约，法国共产党的行动是受到约束的，而苏德战争的爆发则使他们不再受这种约束了。次月，又有一名德国人被杀。作为报复，德国占领军处决了三名法国共产党人质。希特勒被激怒了，他认为这一报复远远不够。“元首认为一个德国士兵的价值远超三个法国共产党人，”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在从希特勒东普鲁士总部发出的一份电报中写道，“元首希望这种情况得到最严厉的报复……若下次再有这样的事件，每死亡一个德国人，立即处决一百人。没有这样严厉的惩罚，局面就得不到控制。”³

然而，德国驻法国占领军司令奥托·冯·施蒂普纳格尔将军认为，这种“波兰方法”在法国根本行不通。⁴当地的事件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例如，1941年10月，德国为了进行报复，在南特杀害了九十八名

人质，许多法国公民对此表示愤慨。1942年1月，施蒂普纳格尔提出辞职，他对不得不这样做感到非常难过，正如他在给凯特尔元帅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认为他想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法来防范今后对德国人的袭击。“我相信我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展开对暗杀的必要的明确报复，即进行有限的处决，但将大批犹太人和共产党员运往东方。在我看来，这种办法比大规模处决更令法国民众恐惧。法国人是不会理解大规模处决的。”⁵

施蒂普纳格尔的继任者——他的表弟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普纳格尔得到了批准，开始以大规模驱逐来进行报复。首次行动就在1942年3月，有1 112名犹太人被从康普涅驱逐到奥斯维辛。这些犹太人中没有一人和抵抗组织的暗杀有关，但这对纳粹来说并不重要。纳粹相信共产主义和犹太教之间的联系，他们只要是犹太人就足够了。

1942年3月30日，就在首批运载斯洛伐克犹太人的火车抵达集中营几天后，载着法国犹太人的火车到达了奥斯维辛。他们就像那批斯洛伐克人一样，没有进行筛选，直接进入了集中营，但实际上他们仍全数死于奥斯维辛，其中有一千多人是在五个月内死亡的。

直到1942年夏天“最终解决方案”开始实施，法国犹太人才遭到大规模驱逐。6月11日，党卫军犹太事务部的一级大队长（中校）阿道夫·艾希曼在柏林召开会议，与来自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代表讨论“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情况。艾希曼告诉他们，希姆莱已下令大批驱逐西欧的犹太人，但必须保证这些犹太人中90%是健康的，只允许有10%是“不能劳动的”⁶。会议还确定了驱逐犹太人的具体目标——法国十万人、荷兰一万五千人、比利时一万人。法国犹太人的数字显然最为野心勃勃，这对于艾希曼在巴黎的代表、二十九岁的党卫军一级中队长（上尉）特奥多尔·丹内克来说是个挑战。

丹内克明白，为了完成任务，他必须得到法国当局的合作。1942年，整个法国只有大约三千名德国警察，根本不足以实现艾希曼的目标——但法国警察有近十万名。⁷1942年7月2日，在德、法两国官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法国国家警察局长勒内·布斯凯提出了法国的立场：在德占法国，只能驱逐外来犹太人；在维希政府控制的地区，法国警察不愿意参加任何对犹太人的围捕。“对于法国方面来说，我们对逮捕本身没有任何异议，”布斯凯说，“但法国警察的介入将是令人尴尬的。”⁸德国安全警察的头子赫尔穆特·诺亨认为，希特勒会对法国的这一态度强烈不满，因此布斯凯改变了态度，答应法国警方将在德占区和维希政府辖区一并予以合作，但他们的行动仍然只针对外来犹太人，而不是法国本地的犹太人。他随后确认，贝当元帅同意把外来犹太人从法国各地驱逐出去作为“第一步”⁹。会议并没有达成什么要以牺牲外来犹太人为代价来拯救法国本地犹太人的协议——法国当局仅仅是发布了一项声明，即首先驱逐外来的犹太人。

7月4日，法国总理皮埃尔·拉瓦尔会见了丹内克，讨论即将到来的准备工作。拉瓦尔说：“从未占领区驱逐犹太家庭时，十六岁以下的儿童也可以带走。”¹⁰随后，对于占领区内的儿童命运，他也表示漠不关心。所以说，拉瓦尔是自愿抛弃了犹太儿童。纳粹并未提出这样的要求——此时他们似乎还不想要这些儿童，而法国，一个有着保护人权的自豪历史的国家，它的总理竟然主动提出让纳粹带走无辜的儿童。拉瓦尔后来辩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人道主义，但这肯定是不能成立的，尤其是拉瓦尔知道希特勒曾公开许诺，一旦发生世界大战，他将在欧洲“消灭”犹太人。拉瓦尔——就像斯洛伐克人一样——几乎可以肯定只是出于考虑眼前的利益。如果犹太父母在驱逐时可以留下他们的子女，那这些孩子将成为法国当局的一个包袱。拉瓦尔不想背这个包袱，

因此急于甩掉他们。拉瓦尔不算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分子，但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政客。

在1942年7月16日、17日两天，大约九千名法国警察参与了巴黎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行动之一，即所谓的“大突袭”。在第十街区，当时只有九岁的安妮特·穆勒还记得警察冲进她的公寓，她的母亲“乞求他们饶了她的孩子，只把她带走……我看到母亲被推搡她的警察侮辱了，那一幕就好像在眼前一样”。安妮特、她最小的弟弟米歇尔和她们的母亲被带到附近一个大厅，法国警察临时把犹太人聚集在那里。安妮特说：“我看到有人躺在桌子上，闷闷不乐，还有一些人在呕吐。”¹¹ 她的两个哥哥在混乱中逃跑了一——安妮特的母亲鼓励他们逃走，因为她对被关起来以后的结果不抱任何幻想。她的丈夫是个波兰人，当天晚上逃离了公寓，几个月前他已经得知在波兰的许多亲人都被德国人枪杀了。

总共有12 884名犹太人被法国警察从家中带走——第一天就带走了近一万人。几千名犹太人——包括安妮特、米歇尔和她们的母亲——被送往“冬季赛场”，那是一个位于塞纳河左岸的自行车竞技场，条件十分恶劣。当时只有七岁的米歇尔，还记得竞技场里弥漫着因为腹泻而产生的恶臭。

他们从竞技场出发，被送往位于巴黎南面卢瓦雷的博恩拉朗德拘留营。虽然整个经历令人恐惧，但安妮特和米歇尔尚感安慰，因为她们和母亲在一起。“她当时一直在，”安妮特说，“她很温暖，我们能感受到保护。我们觉得只要她还在，就不会有什么事。”尽管如此，安妮特还是很担心“如果回到学校以后该怎么办”，因为她们可能会“错过开学的时间”。

她们在博恩拉朗德关押了三周。她们不知道在这段时间内，纳

粹正在讨论应该如何处理那些抓来的孩子。丹内克要求艾希曼做出裁决，在7月20日的电话中，艾希曼终于裁定孩子也可以被送到东方，但必须等到交通问题解决之后。法国当局现在决定，先把孩子的父母送走，而不再等待整个家庭一同驱逐。拉瓦尔还口口声声辩称，他是出于人道的理由才把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起驱逐出境。¹²

8月初，博恩拉罗朗德的成人和孩子被隔离。“他们把我们所有人聚集在营地的中间，”安妮特回忆道，“警察非常凶狠地把女人们驱赶回去，孩子们紧紧抓住她们的衣服不放……很多人在哭泣、尖叫，真的很吵。”她依然保有对母亲的最后记忆：“她用眼神做了一个表情，我们望着她，我记得她的眼神在对我们微笑，仿佛在说她会回来的。”¹³

母亲们被送到巴黎郊区的德朗西，在一个还未造好的住宅区里搭建了一个营地。大部分被驱逐出法国的犹太人——约六万九千人——都是从德朗西前往东方的。在1942年，营地由法国当局管理，条件十分恶劣。卫生设施和食品非常缺乏，这些离开了孩子的母亲令这里充满了绝望的气氛。奥黛特·达特洛夫——巴蒂克勒是一名那年夏天被关在德朗西监狱的妇女，她回忆道：“这些女人当然深受伤害，因为她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孩子，其中有些人跳了楼。只有一个人得救，因为她摔在院子周围的铁丝网上[得到了缓冲]，但其他人都死了。”¹⁴

当她们的母亲被带走后，安妮特和她的兄弟在博恩拉罗朗德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母亲离开后，”她说，“有好几天我都不愿离开营房，因为我太伤心了，不停地哭。我一直睡在稻草上，告诉自己，母亲的离开是我的错，我对她不够友好，对所有的事情我都在自责……那是一段恐惧不断的时期。宪兵变得很凶，他们威胁我们，我们必须保持安静。”

还有一件事勾起了孩子们对母亲的心酸记忆。“所有的孩子都去看茅厕，”安妮特说，“他们喊道，‘啊，来看，快来看’，因为在茅坑的底

部，有很多亮闪闪的东西和排泄物混在一起，那是戒指。母亲们宁愿把结婚戒指扔进茅坑，也不愿上交，因为她们被要求交出所有的珠宝。”¹⁵

独自在博恩拉朗德待了两周之后，孩子们也被送到德朗西。此刻他们的母亲已经到了奥斯维辛。在德朗西，安妮特和她的弟弟睡在一栋还没建好的公寓的水泥地上，还要小心“不要从楼梯上滑下去，因为那里排泄物太多了，我们全都腹泻”。虽然她记得曾看到过有法国警察为她们的境遇“哭泣”，但大多数警察工作起来仍然“兴致勃勃”。¹⁶

奥黛特·达特洛夫—巴蒂克勒试图尽她所能照顾孩子们：“当他们到达时，他们的身体状况真的很差。孩子们身上都是虫子，他们非常非常脏，而且患有痢疾。我们试着给他们洗澡，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擦干他们。然后我们尽力给他们找食物——这些孩子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但也找不到什么东西吃。此外，我们想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但是他们中许多人不知道姓什么，所以他们只能说‘我是皮埃尔的弟弟’。我们努力要找出他们的名字；当然，大的可以，但是小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的母亲把写有名字的小木片绑在他们身上，但是许多人把木片摘下来互相玩耍……孩子们总是谈论他们的父母，当然大多谈的是母亲。他们说的是离开母亲的那一刻，我们从他们讲的每一件事上都能感觉到，他们明白自己再也见不到母亲了，我的感觉就是如此。”¹⁷

米歇尔和安妮特还算幸运。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几个星期来一直在想办法救他们。通过中间人，他贿赂了法国官员，把他们从德朗西转移到蒙马特的一个拘留中心。在这里，安全措施更为松懈，他成功地把孩子们带走，并把他们藏在天主教孤儿院里。大多数被关押在德朗西的儿童没有这样的救世主来保护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了。8月底，有七列火车离开德朗西前往奥斯维辛，如果米歇尔和安妮特的父亲

没有在7月16日至17日的第一次围捕中逃脱，他们几乎肯定也会登上其中的一列，和这些新孤儿一起抵达他们的死亡之地。

奥黛特·达特洛夫—巴蒂克勒记得，在孩子们离开德朗西之前，他们在营地忍受了最后一次折磨：“他们剪了光头，太可怕了。我记得有个小男孩，他的金发很长，他说：‘我妈妈太喜欢我的金发了，我的不能剪。’但我后来见到他，他的头发全剃光了，[看起来]非常绝望……这是真的——他的头发特别漂亮。对于那些十岁或十二岁的孩子，尤其是小女孩来说，剪头发真的是一种羞辱……”¹⁸

法国发生了抗议驱逐的活动，尤其是神职人员。8月23日，图卢兹的大主教儒勒—热罗·萨利耶说：“儿童、女人和男人，父亲和母亲，都像一群非人的牲畜那样被对待，同一家庭的成员，要彼此分开，送往未知的目的地——在我们的时代还能看到这样悲惨的一幕。”¹⁹马赛大主教等其他主要教会领袖也提出抗议。但是，教皇庇护十二世在公开场合对这些抗议没有说一句支持的话，法国神职人员的同情心付诸流水。

到1942年底，总共有四万一千五百名犹太人从法国被驱逐到波兰。拉瓦尔总理表示很高兴看到他们被赶走，1943年8月，一些美国人访问了他，他们说：“拉瓦尔没有提到任何来自德国方面的压力，而是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待在法国的外来犹太人一直是个问题，法国政府很高兴德国改变了对于他们的态度，让法国可以摆脱他们’。”²⁰

法国当局迫害和驱逐犹太人的做法与南部的邻国——意大利人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令许多人惊讶的是，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法西斯政权并没有驱逐任何意大利犹太人。直到1943年夏天，墨索里尼被解除总理的职务，以及随后德国的占领，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希特勒把墨索里尼1922年执掌意大利视为纳粹运动的一大胜利，但许多意大利法西斯分子都是犹太人，像圭多·荣格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墨索里尼内阁担任财政部长。墨索里尼最亲密的伴侣之一也是犹太人——玛格丽塔·萨尔法蒂，她做了墨索里尼将近二十五年的情妇。尽管在这段时期内，墨索里尼对犹太人的信任，以及他是不是一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仍然存在争议²¹，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他的个人观点是什么，都没有妨碍他和犹太人一起工作，甚至睡觉。

墨索里尼等法西斯主义者能够容忍犹太人也许不足为怪。19世纪下半叶，犹太人曾与意大利的伟大英雄、墨索里尼的榜样朱塞佩·加里波第并肩作战，参加了统一意大利的斗争，在加里波第获胜后，官方停止了对犹太人的歧视。犹太人在意大利可以获得很高的地位，例如1902年朱塞佩·奥托伦吉成为战争部长，1905年亚历桑德罗·福尔蒂斯成为总理。

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墨索里尼决定与希特勒德国建立持久的友谊之后，他的政权才公开倒向反犹主义。1938年，意大利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包括禁止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通婚，禁止犹太人在意大利军队服役等，但这些法令更多的是出于见风使舵，而非出于根深蒂固的反犹观念。尽管肯定有一些法西斯分子是仇视犹太人的，但大多数意大利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犹太邻居突然成了被迫害的对象。即便是在法西斯政府内部，在执行反犹法案时也有很大的灵活性。例如在7月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于特定的犹太人——主要是指支付了足够多贿金的犹太人——该委员会可以负责对其进行“雅利安化”。

1940年，意大利参战，警察开始拘押外来的犹太人，但对犹太人的迫害并未因此急剧加重。在意大利军队占领的海外领地，对犹太人的

政策基本上比较温和。例如，在克罗地亚，意大利人控制了海岸线，保护了犹太人免遭克罗地亚民兵组织“乌斯塔沙”的迫害。1942年，克罗地亚政府和纳粹沆瀣一气，准备将国内剩余的犹太人驱逐出境，但意大利不打算放弃在其占领区避难的数千名犹太人。德国要求墨索里尼命令他在克罗地亚的驻军予以合作，墨索里尼答应试试，而克罗地亚的意大利驻军则一拖再拖，不断编造理由拒绝接受德国的要求。²²

1942年，为了对付盟军在北非的登陆，德国人占领了法国在维希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同时，德军还同意意大利人可以派遣军队进入地中海沿岸前维希法国的八个省。这导致了意大利和法国行政当局之间的直接对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展示了对待犹太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意大利将军卡洛·阿瓦纳·迪·瓜尔蒂耶里告诉维希当局，意大利人将按照“人道的法律”来管理他们所属的法国地区。²³于是，意大利人挫败了维希政府迫害犹太人的计划。例如，维希政府的法律规定，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外国犹太人应该迁往内地，而意大利人则允许他们继续住下去；法国要求犹太人的证件应加盖识别标志，而意大利则拒绝加盖。法国当局对这种更为“人道”的方式感到很头疼，皮埃尔·拉瓦尔对意大利人的表现连连叫苦，甚至要求德国当局给予“适当的支持”²⁴，让法国重新掌握控制权。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意大利人在其占领区的“人道”呢？部分原因是出于意大利想要证明他们和德国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不会看德国的脸色行事。与法国不同，意大利可不是一个被迫和德国打交道的战败国，而是一个主动参战的自豪的独立国家。意大利没有像法国那样吸纳大量的外来犹太人，意大利人也没有像德国人那样受到仇恨犹太人的教育。意大利人现在可以在他们占领的领土上保护犹太人，而且对自己来说几乎没有危险，那为什么不帮一下呢？当然，这并不是说意

大利士兵是天使——一份东线意大利士兵的口头证词表明，个别士兵有时会对犹太妇女进行性侵犯。²⁵

正当意大利人在其控制区保护犹太人时，成千上万的荷兰犹太人正在前往奥斯维辛——到1942年底，大约有四万名犹太人被从荷兰送往东方。这一切之所以会出现，不仅有赖于荷兰当局的合作，也是德国人建立了全面登记制度的结果。1941年1月，所有荷兰犹太人都被告知要向当局登记，他们每个人都照办了——总共登记了近十六万人。

与法国不同的是，德国人还能够通过一个单一的伞形组织——犹太公会——来处理荷兰犹太人。犹太公会的领导人——大卫·科恩博士和亚伯拉罕·阿舍尔——后来遭到了诋毁，许多人认为他们在驱逐过程中与德国人合作是一种背叛。部分原因是，犹太公会在1942年从德国人手里拿到了一万七千五百份豁免书，这意味着公会成员及其家属可以免于被驱逐出境，尽管只是暂时的。当科恩和阿舍尔最终被驱逐出境时，他们没有被送到东部的死亡集中营，而是被送往旧德国及其保护国的集中营，他们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在1942年6月11日的柏林会议上，艾希曼原本打算先把一万五千名犹太人从荷兰驱逐出境，但到了月底，他将这一数字提高到四万人。艾希曼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可能是因为纳粹发现驱逐荷兰犹太人比他们预想的要容易得多。这和法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丹内克还在担心他是否有能力完成目标任务，他和维希政府就驱逐法国犹太人而不只是外来犹太人进行了争论。²⁶

1942年7月4日，第一批给荷兰犹太人的信件寄出，要求他们报到，开始进行大规模驱逐。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礼拜堂，教师赫梅利耶克博士记得当时的气氛：“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我的学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毕业典礼上。十五岁以上的女孩都接到命令，要求她们在凌晨一

点到中央车站报到，目的地未知。所有父母都知道他们不得不把女儿送入夜色之中，她们都是毫无抵抗能力的受害者。女孩们在令人心碎的离别之后出发了，她们希望这样做能够让父母避免受到伤害，不会像她们一样。”²⁷

犹太公会和整个犹太社区都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些女孩和其他数千名即将被送往“未知目的地”的犹太人将会遇到什么事。但在驱逐开始的几天之内，流言就开始四散。一份地下报纸《真相》8月3日给荷兰警察印发了一份恳求状，说道：“想想你们的良心和职业道德吧——不要逮捕犹太人，而只是做做执行命令的样子。请记住，你逮捕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和每一个孩子都会被杀害，而你就是凶手。”²⁸7月29日，伦敦的“橙色电台”说道：“把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波兰犹太人聚集在一起，并在毒气室里消灭他们，对德国的战争有什么帮助呢？把成千上万的荷兰犹太人拖出他们的国家，对战争又有什么帮助呢？”²⁹

“毒气室”的提法表明，虽然驱逐刚刚开始，公众对犹太人的遭遇也早已有所了解。7月9日，在伦敦，波兰流亡政府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英国新闻部长布兰登·布拉肯出席了招待会，记者们获悉，德国人正在波兰“蓄意实行他们消灭犹太人的可怕计划”³⁰。但盟军方面对德国人是否有更大的野心仍不太清楚，比如说，他们只是想杀死波兰犹太人吗？荷兰和其他来自西欧的犹太人是否真的只是被用于强迫劳动？

1942年8月，来自日内瓦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格哈特·里格纳发出了第一个关于希特勒有一个全面灭绝计划的明确警告。里格纳从中欧的德国情报机构获得情报后得出结论：“一项计划已经通过讨论，目前正在考虑中。根据该计划，在德国占领或控制的国家，共有三百五十万名至四百万名犹太人在被驱逐出境并集中到东欧之后，将被一举消灭，

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计划将在秋季采取行动，执行方式仍在讨论中，包括使用氢氰酸。我们在传递这一信息时做了必要的保留，因为我们无法核实这一信息的准确性。”³¹

当纽约世界犹太人大会的领导人收到这一消息时，他们并不“怀疑这一信息至少在大体上是准确的”，但他们担心，公布这些信息可能会“对那些被认为没有希望的受害人产生消极的影响”，为此他们征求了“最佳的建议”。³²8月中旬，里格纳的电报到达了英国政府，不久后，美国政府也收到了电报。一开始，他们对此感到怀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确定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并就纳粹的行为向全世界发表了一致声明。他们只有在获得了其他来源的资料——包括华沙隔离区的目击者陈述——之后，才承诺协调一致来谴责这一罪行。³³

1942年12月7日，英国、美国和苏联都发表声明，对纳粹残害犹太人表示愤慨。在下院，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提请注意：“许多来自欧洲的报告称，德国当局在其野蛮统治下的所有领土上禁止犹太人享有最基本的人权，但他们还不满足于此，正在实现希特勒反复提出的消灭欧洲犹太人的企图。犹太人正从所有沦陷国家被运送到东欧，身处骇人听闻的恐怖和野蛮的环境中……那些被带走的人全都杳无音信。”艾登说，盟军“最强烈地谴责这种冷血灭绝的残忍政策”，他们将“保证那些对罪行负有责任的人不会逃脱惩罚……”。³⁴

就在艾登在下院揭露纳粹计划的几个月前，格哈特·里格纳和他的同事们把屠杀犹太人的消息亲自带给了瑞士的罗马教廷大使菲利普·贝尔纳迪尼主教。“我们恳请梵蒂冈能够介入此事，”里格纳说，“至少在那些[还有可能办到的]国家保护犹太社区的子遗。”³⁵他记得梵蒂冈的答复是“吞吞吐吐的”，“让梵蒂冈干涉此事的努力失败了”。教皇庇护十二世仍然拒绝公开谴责对犹太人的灭绝，尽管他在1942年

的圣诞致辞中确实提到了那些“自身毫无过错，有时只是出于国籍或种族的原因才会慢慢恶化或死去的人”³⁶，但他还是不愿意说出“犹太人”这个词。

那些试图为教皇庇护十二世袖手旁观辩护的人常常会说，1942年夏天在荷兰发生的事件是他沉默的关键原因之一。当纳粹得知乌得勒支的约翰·德容大主教准备谴责驱逐犹太人的行径时，他们警告他，如果他这样做，他们也将驱逐皈依基督教的荷兰犹太人。面对这样的威胁，德容大主教立场坚定，并于7月20日通过全国各地的讲坛发布了他的牧师信。这封信直接提到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并包含了一封九天前发给“占领军当局”的电报，电报中说，“以下署名的荷兰各教会……已经对迫害犹太人的措施深感震惊，这些禁令使他们无法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现在又“惊恐地获悉有新的措施，要把那些男人、妇女、儿童和整个家庭都驱逐到德国及其附属地区”。这一行动“违背了荷兰人民最深厚的道德观念”，因此教会敦促德国人“不要执行这些措施”。³⁷

不出意外，“占领军当局”对于教会关于对犹太人采取人道措施的呼吁置若罔闻。不仅如此，纳粹还威胁将把皈依基督教的荷兰犹太人也驱逐出境，没有确切的数字说明到底有多少人被送往东方——可能有几百人³⁸，也可能不到九十二人。³⁹无论确切数字如何，有人认为，正是德容大主教决定在荷兰教堂宣读他的抗议信，导致许多人丧生。据说，这是教皇庇护十二世保持沉默的一个关键原因。“荷兰犹太人遭到的迫害对庇护十二世后来秉持的路线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梵蒂冈工作的大主教埃马努埃莱·克拉里齐奥说，“这是很明显的。”此外，当时担任教皇外交官的真纳罗·维罗利诺大主教说：“教皇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有时他似乎没有坚持下去，那是因为害怕让情况变得更糟。他的行为会被曲解并招致更严重的报复。”⁴⁰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必须保持沉默，否则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死亡。但重要的是，德容大主教并不需要对犹太皈依者的死亡负责，纳粹才应该负责——是纳粹选择了杀死他们，而不是德容大主教。德容大主教肯定懂得，一旦忽视了自己的是非观念，就会成为随波逐流之人。而且，即使大主教保持沉默，谁敢保证纳粹就会信守承诺，不驱逐这些皈依的犹太人？⁴¹再进一步，假设纳粹说，如果大主教不公开放弃他的信仰，他们就每天杀死一个无辜的孩子，那么如果他决定忠于自己的信仰，是否也应该受到谴责呢？

同样，与纳粹合作的公务员们有一个共同的借口，那就是他们试图从内部改善体制，如果他们被取代，情况就会更糟。例如在战后，荷兰公务员指出，他们参与执行的一些措施被打折了。但如果仔细检查证据，就会发现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纳粹德国总督的做法是故意提出过分的要求，再把这一要求降低到他本来想达到的水平，好让荷兰官员们感觉自己很有功劳。通过这个简单的伎俩，纳粹领导人让公务员和他们死心塌地的合作。⁴²

至于教皇，他不仅对驱逐犹太人保持沉默，甚至对于纳粹对波兰天主教徒犯下的暴行，也没有公开表示过愤慨。“我们都在期待着，哪怕只有一句话，”波兰国民军的维托尔德·兹罗特尼基说，“对于我们所遭遇的事情，表示承认也好，同情也好，寄予希望也好，但不能是完全的沉默。”⁴³

教皇和整个天主教会都拥有巨大的能量，尤其是在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总统约瑟夫·蒂索是一位天主教牧师，很多赫林卡近卫军成员是天主教徒。在1942年春季首次驱逐犹太人时，斯洛伐克犹太人社区的领导人请求天主教会能够出面进行抗议，但回应令他们失望了。整

个教会最要紧的任务，似乎是拯救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

有些人，如伯拉第斯拉瓦教区的牧师奥古斯丁·波兹德赫，确实对不人道的驱逐表示了抗议，他把自己对斯洛伐克政府和纳粹行径的愤恨，通过布达佩斯教廷大使转交给梵蒂冈。波兹德赫写道：“我的内心深处感到难过，那些人唯一的过错就是生而为犹太人，因此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并被驱逐到外国——一个人的最后一点自由也被剥夺了……世界不能眼睁睁看着年幼的婴儿、病重的老人还有年轻的女孩被从家里拉走，青壮年人像动物一样被驱赶：用装牲口的车厢把他们送到一个未知的地方，走向迷茫的未来。”⁴⁴但波兹德赫是个特例，斯洛伐克大部分天主教徒没有对1942年的驱逐提出过抗议。

教皇在梵蒂冈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多梅尼科·塔尔迪尼主教，认识到了教会没有采取行动反对蒂索这一问题。“每个人都知道罗马教廷无法阻止希特勒，”他在1942年3月写道，“但是，谁能理解它竟然不知道如何约束自己的一个牧师（指斯洛伐克总统约瑟夫·蒂索）？”⁴⁵至于教皇，他担心如果苏联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欧洲会对天主教会造成可怕的后果。1942年春天，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公开和蒂索对抗，蒂索毕竟是一位天主教国家的首脑，正和斯大林的神论军队作战。

在1942年8月的弥撒上，蒂索总统说，驱逐犹太“害虫”是一个基督徒应做的。他还遵循纳粹的调调，宣称犹太人不可能被改造成基督徒——“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蒂索说，“即使他在一百个主教那儿受洗也没用。”⁴⁶然而，仅仅两个月后，蒂索就中止了驱逐。不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他认为斯洛伐克已经驱逐了商定数量的犹太人，与德国的协议已经完成。⁴⁷他也有可能是对外国的抗议做出的反应，看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大部分犹太人是被送去处死的。

不管怎样，即便在战后的审判中，蒂索也从未承认，他停止驱逐行动是出于对犹太人的普世人道意识。

到10月驱逐停止时，约有五万八千名犹太人被移交给德国人，还有二万四千人留在斯洛伐克。这些剩余的犹太人也不安全，因为——如后所述——到1944年，斯洛伐克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驱逐又开始了。

在这里，我们忍不住想要假设一下历史。如果在1942年春天驱逐行动刚开始时，教皇就亲自对蒂索采取干涉行动会如何呢？作为一名天主教牧师，蒂索尤为卑弱。假如庇护十二世威胁要把他逐出教门，难道不会让他再三思一下吗？战争期间曾有过这样的例子。1943年夏天，比利时雷克斯党的首领莱昂·德格雷勒，因为穿着党卫军制服去参加弥撒而被逐出教会。蒂索的罪行无疑更重，虽然战争结束后，他受到梵蒂冈的严厉批评，但他一直到死都是一名天主教牧师。1947年4月，他在狱中因叛国罪等待处决，当时还穿着牧师的衣服。

在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也意识到，教皇有逐出教会这样强大的武器可以利用。一位名叫扬·卡尔斯基的杰出人物，他的经历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他是波兰抵抗运动的一员，1942年偷偷进入华沙隔离区，因为他想亲眼看看情况有多可怕。“我看到了可怕的事情，”他说，“我看到了恐怖的事情，尸体躺在街上。我们走在街上，我的向导不时对我说：‘记住。’我确实记住了。”卡尔斯基见到了两名犹太领导人，他们说有一个对教皇直接的请求。“[他们对我说:] ‘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你的教皇说话，我们是犹太人。但我们明白，不管怎么说，你们的教皇有能力打开和关闭天堂之门，请他们为所有迫害我们的人关闭那些门。他[教皇]不必说这事关[所有]德国人民，只是那些迫害和杀死犹太人的。他们也许会屈从于被逐出教会。也许这会有帮助，也许连希特勒也会考虑，谁知道呢？也许一些信天主教的德国人会反思并施加一些

压力。看在我们共同祖先的分上，本是同根生……你愿意去做吗？’我说，‘我会去做的，先生’。我做到了。”⁴⁸看到隔离区中恶劣的环境后，卡爾斯基设法逃离波兰，穿过沦陷的欧洲，到1942年底抵达了英国。他亲自和安东尼·艾登交谈，还试图对梵蒂冈施加影响，逼其更强烈地反对纳粹。但他觉得，“我的使命完成后，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942年夏天，纳粹扩大了对犹太人的搜寻，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比利时。在艾希曼6月11日的罪恶会议上，比利时的配额被定为一万人，第一列满载犹太人的火车于8月4日离开该国。比利时女王伊丽莎白要求德国当局将比利时本国的犹太人排除在驱逐名单之外，至少要待这一要求得到满足后才能开始行动。不过，接受这一条件对纳粹来说并不难，因为在这个国家约五万二千名犹太人，有90%不是比利时公民。⁴⁹

在比利时，驱逐的过程不像在荷兰那样简单。这部分是因为占领军和党卫军之间的冲突，也因为许多非比利时犹太人——他们是从纳粹统治下的其他地方逃过来的——在德国人宣称要把犹太人送往东方进行强迫劳动时，已经不再上当了。虽然在外国找个藏身之处是很困难的，但对于非比利时犹太人来说，比起束手就擒，挣扎求生更为可取。在比利时，纳粹还面临着艰巨的行政任务，这里和荷兰不同，没有一个高效运行和充分合作的公务员体制。尽管如此，到1942年9月中旬，最初一万人的配额也已经达到，到当年年底，纳粹向东方运去了近一万七千名犹太人。

1942年秋，德国人下令在挪威驱逐犹太人，维德孔·吉斯林和挪威警察进行了协助。⁵⁰1942年12月，吉斯林在演讲中说，通过与纳粹的合作，他的政府得以“保护自己免受犹太人的侵害”⁵¹。不仅如此，挪威当

局还从驱逐犹太人那里捞到不少油水。1942年10月底，吉斯林签署了一项法律，允许挪威人声明征用犹太人的财物和资产。

11月26日，商船“多瑙河”号离开奥斯陆前往波罗的海的斯德丁，船上载有五百三十二名犹太人。在一系列的驱逐之后，最终共有七百四十七名挪威犹太人在奥斯维辛被杀害。但是，两千名挪威犹太人中的大多数设法逃脱了，他们几乎都是越过边界逃到中立的瑞典。⁵²

纳粹知道，他们不仅要看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还要看是与盟国还是被征服的国家打交道，如此才能提出适当的要求。虽然他们自己可以决定将挪威、荷兰和比利时的犹太人驱逐出境——还需要各个地方政府的援助——但对于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这样的国家，采取断然的行动是很难的，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德国的小伙伴，而不是被征服的国家。

关于纳粹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们的盟友，最有趣的例子就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约有五万名犹太人——不到人口的1%。虽然在20世纪初期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骚乱，保加利亚政府内部也有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但这个国家的反犹主义者并不像斯洛伐克那样极端。1941年3月，当希特勒许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割让给罗马尼亚的领土还给保加利亚时，该国政府才签署了加入轴心国的协议。4月，保加利亚人随德国一同入侵希腊，他们攫取了更多的领土，色雷斯和马其顿成为“大保加利亚”的一部分。

由于和俄国长期以来的历史关系，保加利亚拒绝参加对苏联的战争，这彰显了他们的独立。但是，保加利亚政府对犹太人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1941年1月，保加利亚颁布了一项民族保护法，其中包括一系列反犹太人的措施，例如禁止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并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不过，直到1943年，第一批犹太人才从保加利亚领土

上被赶走。

在保加利亚西面的另一个巴尔干国家克罗地亚，情况则迥然不同。在这里，令人惊讶的是，连党卫军都对克罗地亚民兵组织“乌斯塔沙”所表现出来的残暴深感震惊——不过，这种残暴针对的不是犹太人，而是塞尔维亚人。1942年2月，克罗地亚安全警察和安全局的头子向希姆莱报告说，“乌斯塔沙”对“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以残暴的方式”犯下罪行。⁵³克罗地亚人杀害敌人的原始方式似乎令德国人印象深刻，一份党卫军的报告描述了“乌斯塔沙”是如何拿着“矛状的棍子”⁵⁴捅向农民的。早在1941年7月，德国驻克罗地亚大使就曾提请克罗地亚当局注意对塞尔维亚人犯下的许多“恐怖行为”，这些行为“引起了严重关切”。⁵⁵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国防军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说，他知道1942年6月某一支“乌斯塔沙”队伍犯下了“难以想象的暴行”。国防军作战局的战争日志证实，这支“乌斯塔沙”部队的行动是如此骇人听闻，以至于德国陆军野战警察不得不进行干涉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⁵⁶

然而，纳粹似乎并不阻止“乌斯塔沙”对犹太人犯下暴行。1942年，克罗地亚的四万名犹太人大多数被关押在国内的集中营里——主要是在恶名昭彰的亚瑟诺瓦克集中营。德国人现在要求克罗地亚将幸存的犹太人驱逐出境，8月13日，第一批犹太人启程前往奥斯维辛。

尽管克罗地亚民兵组织“乌斯塔沙”极端残暴，但党卫军也始终无法随心所欲地在克罗地亚实施“最终解决方案”。我们已经看到，纳粹的根本问题在于一些克罗地亚领导人与个别犹太人之间的关系。1944年4月，德国警察驻克罗地亚随员、党卫军一级大队长（中校）赫尔姆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克罗地亚领导人在婚姻方面和犹太人息息相关。”克罗地亚领导人可以宣布个别犹太人为“名誉雅利安人”，这意味着克罗

地亚境内的“犹太人问题”不可能得到完全“解决”。只要克罗地亚仍然是盟友，纳粹对此就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最多只能像党卫军中校赫尔姆建议的那样，试图“说服”克罗地亚政府“剔除那些仍占据公职的犹太人”，并“在授予名誉雅利安人时采用更严厉的标准”。⁵⁷

匈牙利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也令德国人不满意，尽管匈牙利当局已经加强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早在1941年8月，匈牙利就已经驱逐了大约一万七千名没有匈牙利公民身份的犹太人，把他们扔进东方的旋涡之中，几乎所有人都在乌克兰西部的卡梅涅茨一波多利斯克被特别行动队和党卫军杀害。匈牙利野蛮侵占了南斯拉夫的领土，并于1942年1月在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屠杀了数百名犹太人。此外，匈牙利人还强迫许多犹太人随军服役，指挥官心血来潮就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据一份报告称，某个部队里的犹太苦力在冬天被浇上冷水，冻成了“冰雕”⁵⁸。另一名匈牙利军官决定集体处决他手下的苦力，九十六人被杀，其中三十人是该军官自己动的手。据估计，有三万多名匈牙利犹太人在东线一去不复返。

尽管如此，匈牙利政府仍不愿意驱逐在其控制下的所有犹太人，总共超过七十五万人。匈牙利摄政王和国家首脑霍尔蒂上将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既要照顾德国盟友的要求，又要平息因1941年犹太人在卡梅涅茨一波多利斯克被德国人杀害而引起的不满。1942年3月，霍尔蒂起用更加务实的米克洛斯·卡莱，取代了反犹和亲纳粹的首相拉斯洛·巴尔多西。霍尔蒂决定把游戏拖下去，静观战争的变化。他明白，把大批犹太人交给纳粹并不一定符合匈牙利的利益。他肯定在想，假设西方盟军赢了，会有什么后果发生？

匈牙利虽然令纳粹失望，但并不令人十分惊讶，因为霍尔蒂上将并不隐瞒他的务实态度。更令人意外的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政府此前

曾表现出对杀害犹太人的巨大热情，1941年入侵苏联后，罗马尼亚军队与特别行动队合作，在乌克兰杀害了十六万名犹太人。罗马尼亚当局将十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从罗马尼亚东部驱逐到德涅斯特河左岸，约有九万人死于营地。⁵⁹

到1942夏，罗马尼亚人似乎打算与德国人合作，将犹太人驱逐出罗马尼亚的中心地带。1942年8月8日，由德国大使馆出版的《布加勒斯特日报》宣布，“彻底”清除罗马尼亚犹太人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⁶⁰不久，《人民观察家报》加以证实，称“明年罗马尼亚将彻底肃清犹太人”⁶¹。但好景不长，有关驱逐的会谈很快就破裂了。

安东内斯库元帅虚与委蛇，他没有说不再驱逐罗马尼亚境内的其余犹太人，但也没有承诺确切的驱逐日期，他因种种原因而犹豫不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有关犹太人命运的消息正在向世界传播，这意味着，战争结束后，任何把犹太人交给德国人的国家首脑都很难说不知情。如果德国获胜，那对罗马尼亚来说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前景似乎并不确定。尽管德军向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山脉的进攻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美国参战，许多德国的盟友开始首鼠两端，甚至连德国领导层中的一些人也开始动摇。例如，1942年9月，负责供应武器的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报告，呼吁他与西方盟军谈判，结束战争。在弗洛姆看来，德国根本无法与西方盟军现有的实力相抗衡。⁶²

罗马尼亚人和德国人之间也越来越缺乏信任。1942夏，罗马尼亚犹太事务专员拉杜·莱卡在访问柏林期间感到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罗马尼亚政府对此深感不安。与此同时，艾希曼在布加勒斯特的代表古斯塔夫·里希特报告说，一些罗马尼亚政客正在接受犹太人的贿赂。

⁶³安东内斯库还受到罗马尼亚国内舆论的压力，尤其是布加勒斯特的教

廷大使安德里亚·卡苏洛大主教。因此在1942年夏天，安东内斯库和霍尔蒂上将一样，做出了这一务实的政治决定。他并不是突然对前一年被屠杀的二十五万名犹太人感到羞愧，而只是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希特勒的表现则完全不同，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顽固，并在1942年9月30日的演说中完全释放了他的狂热。他称犹太人是“白宫里这个疯子[罗斯福]的操纵者”，恶狠狠地说，“犹太人曾经嘲笑过我在德国的预言，我不知道他们今天是否还在笑，或是笑不出来了。今天，我也可以向你保证一件事，不管在哪里，他们很快就要全都笑不出来了。”⁶⁴他的许多追随者也同样是战争狂徒，1942年10月，就在弗洛姆将军递交那份关于德国正在走向崩溃的报告后不久，德国劳工阵线（纳粹工会组织）的负责人罗伯特·莱伊在埃森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已经切断了身后的所有退路，这是有意为之的。我们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德国的犹太人问题，光这一点就是惊人的。”⁶⁵就在同一个月，戈林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宣称：“愿德国人民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这场战斗变得多么必要！我们[以前]所处的可怕环境是无法忍受的。”⁶⁶

现在，那些认为有可能在完全失败之前退出战争的人，与“切断了身后的所有退路”并将战斗到底的人之间出现了分歧。这些狂热分子将继续为了信念而屠杀犹太人，完全不计后果，战场上的挫折绝不会使他们偏离方向。事实上，许多狂热分子会感到，随着军事上的失利，他们屠杀犹太人的决心反而更加强硬，因为他们认为，对犹太人的战争是一场他们还能赢的战争。

13. 纳粹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1942)

在纳粹对犹太人的战争中，主要的战场在波兰——1942年后也是如此。不仅是因为所有主要的死亡集中营都建在波兰的土地上，波兰是穿越欧洲的绝大多数交通要道的终点，而且还因为波兰犹太人死于大屠杀的人数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大约三百万人¹，占整个“最终解决方案”屠杀犹太人总数的一半。

1942年7月19日，希姆莱在访问波兰时下令，“对整个普通政府辖区内犹太人的重新安置”应当“在1942年底前完成”。²他认为，进行“全面清理”是必要的，这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他真正希望的是到年底之前所有这些犹太人都被杀死。现在，大批波兰犹太人将被直接送往死亡集中营，绝大多数人将在抵达后几小时内被杀害。只有少数人因其工作必不可少而暂时免于被驱逐出境，或在到达死亡集中营时被选入犹太人特别劳动队，被迫协助党卫军进行屠杀。

希姆莱的命令是大屠杀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也是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1942年初，纳粹并不确切地知道他们在短期内要杀死多少犹太人。对于在万湖的海德里希来说，与犹太人的斗争仍然是一个长期消耗的过程，大批犹太人会经历劳役至死的过程。而7月希

姆莱的话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现在立刻就要大批处决犹太人。”这虽然是一个质变，但这是纳粹之前在各地逐步杀害犹太人所积累的结果。正因为过去的历史以及他们从中获得的经验，希姆莱才会有信心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屠杀。

这一决定无疑是在万湖会议的几周或数月后做出的，而不是在执行万湖会议或更早以前的决议。这一点可以从现有的两个建有固定毒气室的死亡集中营的改造上看出来。贝乌热茨和索比堡都不具备实现希姆莱现在屠杀计划的能力，到了此时，两地都进行了扩建。6月，犹太人被停止送往贝乌热茨，更大的毒气室开始建设，一次可以杀死一千人。到7月的第二周，犹太人的运输又开始了，正好赶上希姆莱的计划。同样，在索比堡，屠杀也暂停了——不过时间是在7月底。这次暂停是为了修理运输犹太人的铁路，同时也是为了扩大现有的毒气室，其杀人能力从一次六百人提高到一千二百人。最为重要的是，7月23日，也就是希姆莱公布他的决定四天后，位于特雷布林卡的一个新灭绝营投入运行，那里距离通往华沙的主要铁路线很近，华沙就在它西南六十英里外。最终死于特雷布林卡的犹太人人数，超过了除奥斯维辛外的任何一座集中营。

在此时点，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也汇聚到一起——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万湖会议之后。首先是行政管理上的重要变动。1942年最初的几个月中，波兰的总督汉斯·弗朗克面临腐败的指控，当他的权力被削弱时，希姆莱就获得了对普通政府辖区内犹太人事务的控制权，他只听从希特勒的命令。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居住在普通政府辖区内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约有一百七十万人。希姆莱可以依靠在普通政府辖区内卢布林的下属——党卫军和警察总指挥奥迪洛·格洛博尼克来实际操作灭绝计划。

其次是食品匮乏的问题。1942年，德国居民的配给受到削减，引起了不满，纳粹领导人坚持认为，在德国人民挨饿之前，其他人应当先挨饿。1942年8月6日，戈林在一次会议上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对占领区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永远收起对外国人无休止的关心，”他对一群高级官员说，“我面前有一份报告，告诉你们要上交哪些东西。你们的领地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如果你说你的人民要挨饿，我无所谓。只要别让德国人民因饥饿而崩溃，就让他们这么着吧。”³就在会议的几天前，希姆莱下令限制8月份向华沙运送的食品，任何没有按照德国要求交出农产品的农民都将被处死。⁴当然，减少占领区对粮食需求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大批杀死目前正在消耗食物的人，普通政府辖区内的犹太人正是这一类人。

另一件可以激化希特勒和希姆莱残忍决心的外部事件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遇刺。1942年5月27日早晨，在英国特别行动处计划的一次行动中，两名捷克特工在海德里希驾驶奔驰敞篷车穿行布拉格时袭击了他。海德里希八天后因伤重死去。在6月9日的葬礼上，希姆莱说：“我们有神圣的责任为他的死赎罪，继续他的工作，比以前更为无情地消灭我们人民的敌人而不表现出任何软弱。”⁵那天晚上，在党卫军高级官员的聚会上，希姆莱宣布：“一年之内……没有【犹太】人还会再移民了。现在，事情终于要解决了。”⁶屠杀普通政府辖区内犹太人的行动将被称为“莱因哈德行动”，以纪念海德里希。

希姆莱在此期间曾多次会见希特勒，其中一项令人信服的研究表明，他们于4月23日和5月3日就扩大屠杀进行了重要讨论。甚至就在希姆莱宣布要对普通政府辖区内的犹太人进行“全面清理”的前一天，他还面见了希特勒。不可思议的是，屠杀随之而来后，两人却没有对此进行任何讨论。⁷当两个月后希特勒叫嚣犹太人“再也笑不出来了”

时,他可能是在暗指7月以来波兰大规模扩大的屠杀计划。

大约在同一时间,希姆莱和希特勒也在考虑大规模屠杀数百万名非犹太人。7月16日,即希姆莱下令在年底前杀死全部普通政府辖区犹太人的三天前,他私底下说,他经历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因为他刚刚同希特勒讨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殖民统治”⁸,以及自己在这时期所起的关键作用。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东方总计划”,根据该计划,数千万名斯拉夫人将被宣告奴役和死亡。就在这个“最幸福的一天”之后的几个月里,希姆莱在种族“清洗”方面表现出了极为无情的一面。在战后没有得到应有关注的大规模“日耳曼化”运动中,希姆莱下令将波兰东南部扎莫希奇附近地区的大量波兰人驱逐出境,他在卢布林的高级指挥官奥迪洛·格洛博尼克强行驱逐了五万名波兰人。他们的想法是把这片肥沃的土地交给德国人进行殖民,但是纳粹再次高估了自己完成任务的能力。他们的种族歧视帮了倒忙,许多波兰人逃进森林,组成了反抗军。显然,纳粹在驱逐犹太人的同时还想实现这个计划是不现实的,希姆莱对该地区的殖民化也没有实现。⁹

在普通政府辖区中,圈禁在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就在波兰首都这块狭小区域内,居住的犹太人数是那年夏天艾希曼想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驱逐的犹太人总数的两倍多。因此毫不奇怪,那里的三十万名犹太人立即成为党卫军的目标。7月18日,隔离区犹太公会主席亚当·切尔尼亚科夫在日记中写道,有关驱逐的“谣言”已经四起。第二天,他记录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安抚那些焦虑的犹太人。“我试图让那些来拜访我的代表们振作起来,”他写道,“他们没看到我付出的代价,今天我吃了两次头痛药,还有一种止痛药和一种镇静剂,但是我的头还是疼得要裂开。我正在努力保持微笑。”第三天,一名党卫军军官对切尔尼亚科夫说,可以告诉犹太人,所有关

于驱逐的说法都是“胡说八道”。但那是个谎言，两天后，即7月22日，切尔尼亚科夫写道：“我们被告知，除某些例外情况外，所有犹太人，不论性别和年龄，都将被驱逐到东方。今天下午四时前，必须集中好一支六千人的队伍，以后每天（最低限度）都是如此。”¹⁰令切尔尼亚科夫尤为绝望的是孤儿院的儿童，他说他们面临着“悲惨的困境”。但他也必须得把他们交出去吗？答案显然是确定的。党卫军把孩子们看作特别的群体——他们是“无用的人”中最为“无用的”。

亚当·切尔尼亚科夫不知道，奥迪洛·格洛博尼克手下的一名军官几天前刚刚抵达，在看守隔离区的党卫军协助下计划驱逐犹太人的事宜。他们打算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让犹太公会与他们合作。软的一手很简单：犹太公会成员及其家属将免于被驱逐。硬的一手更为直接——如果他们不合作，亲属就将被处死。7月22日，切尔尼亚科夫被告知，“如果驱逐受到任何妨碍”，他的妻子将成为“第一个被枪毙的人质”。¹¹

这一切对亚当·切尔尼亚科夫来说无法接受。7月23日，他吞下一粒氰化物胶囊自杀。不过，这对党卫军的驱逐行动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任命了另一名犹太公会主席马雷克·利希滕鲍姆，还是一如既往地工作。两千多名犹太秩序警察协助组织了驱逐行动。就像犹太公会的成员一样，他们这样做至少是暂时挽救了自己的生命，挽救了他们妻儿的生命。

居住在隔离区内的人都不太清楚被驱逐的人会发生什么事，但一些消息已经传回华沙。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消息十分灵通，他甚至还听说了一个死亡集中营的名字。1942年6月就在驱逐开始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人]准备执行这一计划：‘无劳动能力者’、十岁以下的儿童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将被锁进密封的火车车厢里。这

些车厢由德国人把守，运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在那里，所有‘重新安置’的犹太人都变得无影无踪……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成功逃离贝乌热茨的死亡集中营，没有一个犹太或波兰目击者从贝乌热茨的灭绝行动中幸存下来。这一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多么谨慎，不让本国人民知道这些消息。”¹²

林格尔布卢姆激烈批评犹太警察在驱逐期间的表现，“对于把自己的同胞送上屠场这样令人厌恶的工作，他们一句抗议的话也没有”。根据他自己的观察，他认为“在很多时候，犹太警察表现出一种难以理解的野蛮……他们残忍而疯狂地殴打那些试图反抗的人”。¹³

7月23日开始对华沙犹太人采取的行动，是大屠杀过程中最为残暴的行动之一。“混乱和恐怖令人震惊。”8月1日，亚伯拉罕·勒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母亲们失去了她们的孩子，一个病弱的老妇人被抬上了公共汽车，悲剧难以言表。迪兹尔纳街17号的拉比被抓去，显然是被枪毙了。在街上走路的儿童被扣押。”¹⁴

当时十二岁的海莉娜·比伦鲍姆记得：“人每天越来越少，空荡荡的公寓则越来越多。”犹太人开始躲进公寓的夹层，“衣柜或床的后面”，但很快，“德国人和他们的乌克兰帮凶，还有犹太警察”就开始“在每一间公寓里挨家挨户地用铁棒破门……当他们把犹太人揪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了尖叫声，还有枪声。从早至晚，每天如此”。¹⁵

在行动的头十天，就有六万五千名犹太人被驱逐到特雷布林卡。一开始，党卫军并没有驱逐那些获得豁免的人，但很快，如果发现火车没有装满，他们就会带走任何能找到的人。犹太警察被告知，如果他们每人每天抓不来五个人，那么他们自己的亲人就会被送走。到9月底，绝大多数犹太人都被驱逐出了隔离区。

几乎所有来自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都被送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

这是最后一座专用的死亡集中营，也是最大、杀人最多的一座。¹⁶从1942年到1943年秋，有大约八十五万人在这里被杀——也有人估计超过九十万人。其中最为惨烈的阶段是1942年7月末至8月末，其间估计有三十一万二千五百人被杀，其中大约有二十五万人来自华沙隔离区。¹⁷党卫军的杀人记录能够如此骇人听闻，部分原因是有一条铁路支线直接通往特雷布林卡营地，这对党卫军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可以大大提高犹太人下车和进入毒气室的速度。至于营地内部的布局，则类似于贝乌热茨和索比堡，有一个到达区和一个毒气室所在的灭绝区，两个区通过一条狭窄的通道或“管道”连接。此外还有警卫和犹太人特别劳动队的住处。

1942年夏天特雷布林卡屠杀规模惊人的另一个原因不在于技术，而是个人的野心——那里的指挥官是三十一岁的埃尔姆弗里德·埃贝尔博士，他是唯一一名管理过灭绝营的医学博士。埃贝尔博士在这段历史上已经登场过，当时他是勃兰登堡安乐死中心的主任，因此在来到特雷布林卡之前，他在大规模杀人方面已经有丰富的经验。就像在勃兰登堡时一样，他似乎格外珍视这一屠杀犹太人的机会。1942年6月，他在为第一批来自华沙的犹太人做准备时写信给妻子露丝，说他的生活“非常忙碌”，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¹⁸在7月末，犹太人开始陆续抵达后不久，他写了另一封信给妻子：“我知道最近写得不多，但我无能为力，上一个‘华沙周’让我忙得不可开交。”他说，就算一天有“一百个小时”，也未必“足够”他完成工作。他在恪尽职守的同时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他声称，他也能让部下和他“共同前进”，他“为这一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¹⁹

党卫军的经验是，要想运作一个高效的死亡集中营，关键在于欺骗。所以特雷布林卡被伪装成一个临时营地，让新来的人尽快向“消毒

区”里的“淋浴间”走去。显然,这种欺骗的一个前提就是,新来的犹太人看不到有大量的尸体。除了尽快埋葬尸体外,纳粹还把枯树枝插进铁丝网中,把营地的不同区域分隔开来,以此遮掩视线。

起初,对党卫军来说,杀戮的效率似乎还不错,每天大约有五千名至七千名犹太人被杀。但到了8月中旬,特雷布林卡的杀人体系濒于崩溃。部分原因是,被送来这里的犹太人人数大增——每天到达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一万多人。这意味着党卫军及其帮手来不及在两次运输之间清空营地,但如此就无法继续伪装成一个临时营地。而如果这一任务未能如期完成,屠杀进程的其余部分将立即受到影响。党卫军不得不命令到达的火车暂缓驶入通往营地的支线,先在特雷布林卡站等候。这只会加快骗局的崩盘,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会死在车厢里,清理几车厢的尸体要比把他们送进毒气室麻烦得多,这给营地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延误。

对于纳粹来说,气味也是一个问题,营地周围飘散着有毒的气味。当时住在附近的女学生尤金妮娅·塞缪尔记得:“尸体分解的气味实在太可怕了。你不能打开窗户,也不能出去,因为臭气熏天。你无法想象会有那样的恶臭。”²⁰

奥斯卡·贝格尔是一名来到特雷布林卡的犹太人,当时营地的秩序正面临崩溃。1942年8月22日,当他从火车上下来时,看到“周围地上躺着数百具尸体”²¹。党卫军和乌克兰帮手在建筑物的屋顶上向新来的人开枪,试图震慑他们,但这只会让恐慌变得更糟,“空气中充满了尖叫声和哭泣声”。

另一位新来的人亚伯拉罕·克泽皮基“直面”了营地中“令人震惊的景象:一大堆的尸体,一具挨着一具。我估计那里有两万具尸体……他们大多在火车上窒息而死,嘴仍然张开着,好像在喘气一样”。他被

党卫军选中来清理噩梦现场。尽管营地的情况很糟糕，但无情的火车仍然不断开来：“晚上，又有一趟车来到营地。我们朝车厢跑去，我被震惊了。所有的车厢里都塞满了窒息而死的人，他们一层一层叠在一起，一直到火车的天花板。这情形太可怕了，简直难以形容。”²²

埃尔姆弗里德·埃贝尔的过度自信，以及8月份运输量的增加，都是这场恐怖事件的幕后主因。特雷布林卡党卫军成员奥古斯特·辛斯特说：“埃贝尔博士的雄心就是尽可能地达到最高的数字，超过其他所有的营地。有太多的人到达这里，卸车和毒气室的运行都失去控制了。”²³还有传言说，特雷布林卡的纪律已经崩溃，从犹太人那里偷来的一些贵重物品没有被送回德国，而是被营地的警卫私吞了——甚至埃贝尔博士在喝醉的时候，还命令一名女犹太人为他跳裸体舞。²⁴

当特雷布林卡失控的消息传到埃贝尔上司的耳朵里后，他们决定前往视察。8月底，奥迪洛·格洛博尼克与一批高级军官一起前往营地，其中包括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他是贝乌热茨的第一任指挥官和新任命的“莱因哈德行动”死亡集中营监察专员。“在特雷布林卡，一切都是混乱的。”党卫军约瑟夫·奥伯豪泽尔说。他为维尔特工作，在代表团抵达营地时目睹了一切。“埃贝尔博士将被立刻解职……格洛博尼克说，要不是埃贝尔博士是他的同乡，立马就会遭到逮捕，并被送上党卫军和警察法庭。”²⁵

维尔特让索比堡的现任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接替埃贝尔博士。由于索比堡因修复紧邻营地的铁路和扩建毒气室而暂时关闭，施坦格尔可以立即接管这里。即便如此，维尔特还是决定在营地待上几个星期，和施坦格尔一起监督清理过程。作为最残忍的看守之一，党卫军二级小队长（少校连长）库尔特·弗朗茨同样来到这里亲历了这项重大任务。这名军官被戏称为“娃娃”，因为他长着一副娃娃脸：“营地里

到处都是尸体，这些尸体被犹太人拖过营地放到内部一个区域。犹太人在[乌克兰]看守和德国人的驱赶下忙碌着……那里有巨大的混乱和可怕的喧嚣……在我巡视的时候，确定有些看守和女孩在一起并扔下了他们的枪。”²⁶库尔特·弗朗茨在贝乌热茨就专门负责和辅警打交道，他们都是从苏联战俘中专门挑选出来在死亡集中营工作的，被统称为“乌克兰人”。现在库尔特·弗朗茨准备收拾一下他们。

8月28日至9月3日间，前往特雷布林卡的运输不得不暂停，而营地已清除了数千具尸体。尸体在沟渠里焚烧，天空中弥漫的烟雾在数英里外都看得见。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主导了整个过程。党卫军三级小队长（中士）弗朗茨·祖霍梅尔说：“维尔特总是在夜里十一点和德国参谋人员进行谈话，施坦格尔都在场……维尔特的指示很详尽。”²⁷

就像在索比堡一样，维尔特和施坦格尔有时也有不睦。据祖霍梅尔说，施坦格尔对特雷布林卡的灭绝过程进行了检查后，建议放一些水桶在“管道”，也就是连接到达区和毒气室的通道，因为妇女们“在跑动或站在那里等候的时候都会大便”。施坦格尔说，他以前这么做过，事实证明是有帮助的。维尔特回答说：“我才不管你在索比堡是怎么干的，就让她们到处拉，可以事后清理干净。”²⁸

和埃贝尔博士一样，克里斯蒂安·维尔特表现出对工作同样的狂热。副官约瑟夫·奥伯豪泽尔说：“他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铁腕、无条件的服从、对元首的信仰和绝对的冷酷无情。我在安乐死行动时就认识他，当时他已经表现出了这些性格。但到了灭绝行动中，他才真正表现出得心应手。”²⁹9月3日，在维尔特“得心应手”的工作下，灭绝行动又开始了，来自华沙隔离区的运输恢复了。

9月，犹太人卡尔曼·泰格曼登上了从华沙隔离区开往特雷布林卡的火车。虽然车上的一些犹太人认为他们是被送去杀害的，但卡尔

曼仍然对纳粹抱有幻想。他说：“当我们还在隔离区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要去东面，在各种工厂工作。我认为自己年轻健康，很可能是被带去工作的。”³⁰但当他们抵达特雷布林卡后，这些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说：“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火车车厢门打开后，有人用德语开始大喊：‘出来！’许多站着还能呼吸的人出来了，但也有人在车厢里已经死去了，他们当然是出不来了。”党卫军在健康的人中进行了挑选，卡尔曼·泰格曼被选中了。9月初来到的几批人中，被挑出来干活的人比较多，为的是要确保营地的整洁，不让埃贝尔时期的混乱重演。这些和卡尔曼一起被挑中的人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清空车厢里的尸体，另一组负责整理那些被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的财物。

卡尔曼后来成为特别劳动队的一员，负责清理妇女在进入毒气室前剪发的营房。他回忆说：“当我们清理营房里的衣服时，有时候会在衣服堆下面发现婴儿。我想是母亲们把他们留在那里，也许是希望他们能得到拯救。”他和工友们把发现的婴儿带到营地一个围起来的地方，那里被称为“拉萨雷特”（德语，指军队医院），病人也去那里。但当他们来到“拉萨雷特”时，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医院，而是和索比堡一样的行刑区，病人在那里被枪杀，然后扔进一个坑里。卡尔曼说：“在它周围有一道白色的栅栏，上面有红十字会的标记，所以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去的是哪里……这样的事情很难形容。”他记得在营房里找到的婴儿要么被枪杀，然后扔进坑里，要么被直接扔到火上——如果尸体已经在焚烧。“我能有什么感觉？”卡尔曼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成了一台机器，没有想法。我只担心自己不要挨打，有时候担心能否吃饱，仅此而已。我不思考，也没有感觉。我看到了地狱，如果真有的话。”³¹⁹

特雷布林卡的新当局尽可能保证营地一尘不染。卡尔曼说：“通往毒气室的道路必须干净整洁，每回我们都要撒上干净的黄沙。”他在营

地时看到“死亡机器的运转极为高效”。

到9月的第三周结束，大部分华沙犹太人已在特雷布林卡的毒气室里死去。德国当局现在决定暂停华沙的驱逐行动，在大规模挑选之后，他们最终允许三万五千名犹太人继续在隔离区苟延残喘下去——约占驱逐前犹太人总数的10%。此外还有超过二万五千名犹太人躲在隔离区——他们常常躲在地窖、阁楼和墙壁后面。

华沙的行动暂停，使得纳粹可以腾出手来驱逐波兰其他隔离区中的犹太人。在这一阶段，最大的隔离区清理行动发生在卢布林西面的琴斯托霍瓦，那里有约三万五千名犹太人被强行送往特雷布林卡。这样的事还发生在其他大大小小的隔离区。例如，当时十九岁的塞缪尔·维伦贝格在波兰东部的奥帕托被捕，并被送往特雷布林卡。到1942年秋，关于犹太人命运的消息已经四处传播，当他乘坐的火车经过一个车站时，他听到波兰的孩子们大喊：“犹太人！你们会变成肥皂！”³²但是，就像大屠杀期间许多被运往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那些和塞缪尔·维伦贝格一起挤在火车里的人很难接受纳粹想要把他们全部杀死的事实，许多人仍然觉得这样的地方不可能真的存在。“难以置信，”塞缪尔说，“尽管我已经来到这里 [特雷布林卡]，但刚开始我还是无法相信。”

和塞缪尔·维伦贝格同行的人绝大多数，都在到达营地的几个小时内死去。他幸免于难只是因为一次偶遇。一名在营地工作的犹太劳工问他来自哪里，塞缪尔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眼熟，就回答说来自奥帕托，出生在琴斯托霍瓦，华沙也待过。“琴斯托霍瓦。”那个劳工回应道，显然他也来自那个地方。他问了塞缪尔的姓名，并含蓄地补充道：“就说你是一名砖瓦匠。”

多亏这次简短的谈话，塞缪尔·维伦贝格逃离了毒气室。党卫军把刚进入营地的犹太人排成一排，询问新来的人中是否有砖瓦匠，塞缪尔立即应声。他觉得自己可以很快地学习这一行，可以骗过党卫军，事实也正是如此。他成了犹太人特别劳动队的一员。

塞缪尔目睹了党卫军是如何高效地处理新来的犹太人。他看到，妇女剪发时“感到有了希望，因为如果要她们理发，那就意味着以后还要生活一段时间……因为营地的卫生是必须的”。让新来的犹太人脱衣服也对党卫军有好处。“一个人先是脱掉了鞋子，随后被要求‘脱光衣服！’，然后全身赤裸——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人了。”塞缪尔说，“再也无法主宰自己了。他会遮住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会感到尴尬。突然间，他会有许多在正常生活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因为他从来没有被迫在人群中、在朋友面前赤裸行走过，除了小孩子外。突然间大家都一丝不挂了！而你看，德国人利用了这一点，挥着鞭子大声喊：‘快跑！快！’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想尽快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无论是哪里。”

在特雷布林卡，塞缪尔花了大量时间整理被杀害的犹太人的财物。“这看上去像一个波斯集市，”他说，“打开手提箱，摊开床单，每张床单上放着不同的东西。裤子、衬衫、羊毛制品都要分开，所有东西都要分类。金子单独放在袋子里……我们每个人都在身旁放了一张床单，放着照片、文件和文凭。”塞缪尔和其他队员常常受到库尔特·弗朗茨的监视，他记得：“弗朗茨是[党卫军里]最坏的一个……他是个英俊的人，经常装成拿破仑的样子，需要不停地拍他的马屁。那是他最快乐的日子！他在那里玩得很开心。他是个强盗，一个真正的强盗。”³³

弗朗茨有一条大型的圣伯纳德犬，名叫巴里，他喜欢让狗压在囚犯的身上。他还喜欢亲自折磨囚犯。“他是个鞭挞的专家，一般打二十五鞭或五十鞭，”另一个犹太特别劳动队队员奥斯卡·斯特劳辛斯基写

道，“他做这件事情时非常惬意，不急不慢，举鞭击打都有自己的一招一式。”³⁴

弗朗茨是一名纳粹死忠，战前曾在布痕瓦尔德工作过。他和死亡集中营里很多警卫一样参加过T4安乐死行动，因此多年来他所处的组织和环境都在宣扬对犹太人的绝对仇恨，认为杀害那些对国家来说“无价值的生命”是合理的。几乎可以肯定，他认为自己控制、折磨和杀害的根本就不算真正的“人”。不过，这还不能全部解释他的施虐行为，因为也有其他党卫军并没有像弗朗茨那样从制造痛苦中获得快感。也就是说，决定留在死亡集中营工作的党卫军还是可以有所选择——是成为一个虐待狂式的杀人犯，或仅仅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人犯。卡尔曼·泰格曼在特雷布林卡仔细观察了党卫军和他们的乌克兰助手后，认为“每个人都有兽性，但我们过着正常的生活时，我们不会表现出来——它不会出现。但有时候，一个人会变成另一个样子，而他身上[一直]隐藏着的那一面就会释放出来”。

所有被送往索比堡、贝乌热茨和特雷布林卡的人中只有极少数能活到战后——也许不超过一百五十人，他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塞缪尔·维伦贝格说：“也许有无数种可能令结局完全不同，我说了或是做了什么并不重要——我可能一样会被烧死，化为灰烬。这完全是因为运气……也许还有一点头脑发热。”³⁵虽然运气是他幸存的原因，但并非全部。塞缪尔·维伦贝格和卡尔曼·泰格曼也都有着特别的品质，这些品质帮他们忍过了特雷布林卡的折磨。两人当时都很年轻——到达营地时都只有十几岁——而且都很坚强。这两人都是男性——被挑中进入特别劳动队的女性要少得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泰格曼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而维伦贝格对生活抱着非常积极的一面，即便进了死亡集中营后也是如此。战后，他说：

“其他人遭受的苦难更多。不像我只是那种被迫在毒气室里面工作的人。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干活，不得不尽全力把尸体拖出毒气室。”³⁶也许有点让人吃惊，他认为特雷布林卡的其他犹太工人比他更为痛苦，还从中得到了一些安慰。他和泰格曼最终都在8月份的起义中逃离了营地。

1942年，除了特雷布林卡、索比堡和贝乌热茨之外，奥迪洛·格洛博尼克主持下修建的第四座死亡集中营也投入使用。这个地方名叫马伊达内克，离格洛博尼克在卢布林的办公室只有三英里之遥。马伊达内克是一个不太寻常的营地：不是战俘营，不是集中营，不是专门的灭绝营，也不像奥斯维辛那样是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大规模组合，它是一座所有种类营地的小型混合体，甚至连纳粹也不知道该如何给营地贴标签。直到1943年初，这个地方才正式命名为“卢布林武装党卫军战俘营”，而其他德国文件则称其为“集中营”。³⁷

马伊达内克的演变在许多方面反映了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发展过程。和奥斯维辛—比克瑙一样，它最初的设想是建成一座苏联战俘营，于1941年秋季动工。到年底，大约可容纳两万名战俘的营房已经完工。从建成起，这里就是一个死亡流行的地方，在波兰1941年至1942年的寒冬，战俘们只能睡在没有供暖的地上，受到伤寒等疾病的威胁。到了1942年春，新的囚犯来到这里，马伊达内克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它已不再作为战俘营之用，而成为“最终解决方案”的一个分流站。从3月底到6月中旬，有数千名斯洛伐克犹太人被送到这里。开往索比堡的火车偶尔会在这里停留，把一部分犹太人留在马伊达内克做苦工。

毒气室建在马伊达内克的淋浴房后面，真正的淋浴房是给初次筛选后留下来的犹太人使用的，没有哪个集中营的毒气室离淋浴房如此之近。就像奥斯维辛主营地火葬场里的毒气室一样，这个位置意味着

党卫军很难保守杀人的秘密，而且和奥斯维辛一样，党卫军不得不在马伊达内克的毒气室旁轰鸣发动机，以掩盖毒气室中传来的尖叫声。³⁸

虽然关于特雷布林卡等其他集中营真正功能的流言四处传播，但马伊达内克仍然鲜为人知。在1943年春季的第二波驱逐行动中，海莉娜·比伦鲍姆和她的母亲从华沙隔离区被送到这里。当人们发现并没有前往特雷布林卡时，他们“互相拥抱和亲吻”。“如果不是去特雷布林卡，”她说，“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马伊达内克，那就说明我们要去的是劳改营而不是死亡营。所以，简直欣喜若狂！”³⁹海莉娜第一次看到马伊达内克时又感到放心不少，“这里有一个营地，有一些营房，我们会进行劳动。现在他们会带我们去洗澡，给我们不同的衣服，他们会带我们去这些营房。不管是否能够或愿意劳动，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你在那儿看到的营房里可能有床、食物和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党卫军把海莉娜和其他一些犹太人带到营地的一个淋浴区。当她走进房子时，突然焦急起来：“我妈妈没有进来，我肚子感到翻江倒海，怎么啦？她不来吗？她再也不会来这里了吗？我的妈妈！”海莉娜疯狂地四处张望，想要找到她，但一无所获。突然，她意识到她的母亲一定是被带走了，而马伊达内克就像特雷布林卡一样，也是个杀人的地方。“我一言不发，也没有哭。不需要眼泪，一切都结束了，再也没有了。没有天空，没有大地，我的手脚感觉都像被弄断了一样，所以我开始绕着淋浴房转圈，‘妈妈走了，妈妈走了，妈妈走了’。”⁴⁰

海莉娜留在了马伊达内克，不久以后，她就安慰自己说，她的母亲至少没有经历营地的生活。当她看到囚犯们被殴打时，她无法想象“高贵、谦逊、整洁”的母亲要受到这样的伤害。“还有什么比马伊达内克更糟糕的呢？”她说。⁴¹

关在马伊达内克的波兰医生斯特凡尼亚·帕扎诺沃斯卡证明了集

中营里的暴行。“首先是殴打，”她说，“有事没事都要打，点名的时候用鞭子抽打脑袋，用拳头打脸，或者在一张特殊的凳子上用一根橡皮棍或手杖打你……他们全都打我们。”她记得有一名党卫军“竟然在凌晨两点冲进医院来打我们的耳光，因为他喝醉了，想找个人来发泄，于是就轮到在整个集中营里地位最低下的人”。但一个名叫埃尔泽·埃里希的女看守可能“打破了所有的纪录，她殴打女人时眼光流露出一种残忍的热情，没有一个党卫军女看守在施虐时能比的上她的力气。她总是要打到我们流血为止。”⁴²

另一名马伊达内克的幸存者也证实了埃尔泽·埃里希的暴行。“在我们看来，她非常喜欢殴打我们，打得又快又重。”汉娜·纳基耶维奇—乔德科说，“而且会用特别侮辱性和谩骂的语言。她踢打我们时经常会用她的马鞭，我好几次看到过。”⁴³

这些证词提醒我们，不仅是男性看守在营地虐待囚犯，女性看守也参与了虐待。随着女性囚犯的到来，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都起用了一定数量的女看守。虽然这些女看守对囚犯一样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希姆莱并不将其完全视同为党卫军。在这些特殊营地的全体看守中，女性只占一小部分，例如在马伊达内克只有二十八人。整个战争期间，纳粹所有集中营的女看守人数不超过总人数的10%。⁴⁴

虽然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看守穷凶极恶，但和奥斯维辛相比规模还是略小。1943年春，马伊达内克关押的囚犯最多时也不到二万五千人。与众不同的是，在集中营的毒气室中，刽子手们可以选择用瓶装一氧化碳——就像安乐死计划中的那样——或者类似奥斯维辛的“齐克隆B”毒剂来杀人。为什么唯独马伊达内克可以同时采用两种办法，目前还不得而知。

对于在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贝乌热茨和索比堡死去的人数，

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只能估计一个大概的数字。直到2000年，在伦敦公共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被解密的德国电报，其中透露了纳粹自己估算的数字。这封电报的日期为1943年1月11日，起草者为“莱因哈德行动”的组织者之一、党卫军二级大队长（少校）赫尔曼·霍夫勒，内中详细记录了截至1942年底每个营地杀害的人数：马伊达内克24733人，索比堡101370人，贝乌热茨434508人，特雷布林卡713555人⁴⁵——总计有1274166人被杀害。⁴⁶

纳粹实施如此规模惊人的屠杀，所用的党卫军人数却很少。像特雷布林卡这样杀人数占一半以上的营地，只有二十多名党卫军进行监督，这与在苏联动用成千上万名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和其他安全部队来枪决犹太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霍夫勒名单上杀人最少的马伊达内克却驻扎了最多的党卫军看守，这是因为有很多囚犯要在这里关上一阵子。

因此，通过霍夫勒的电报可以明白地看到，只要很少的党卫军就可以在很小的区域内杀死大量的人，通过机械化的手段，新到的人下车数小时内就会死去。

在1942年初，纳粹还不太确定能否这么快就杀死那么多人，但到了年底，他们已经有了答案——可以。

14. 屠杀和胁迫(1942—1943)

所有这些屠杀都是在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中发生的,而这场战争的进程反过来又会影响纳粹的盟友愿意合作进行屠杀的程度。但是,在1942年,战争的走向仍然笼罩在迷雾之中。

虽然红军阻止了德军在1941年12月占领莫斯科,但他们的胜利却紧随着失败。5月,红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附近向德军发动了突袭,当时红军拥有很大的优势,人数与德军之比为二比一。但是,这一战役表明,如果战术存在缺陷,数量优势并不能确保胜利,红军很快就遇上了麻烦。德军先是撤退,让红军前进,然后再从侧翼进攻,包围了大批红军。红军士兵惊慌失措,许多人试图逃走,但他们已经陷入德军的重围。超过二十五万名红军官兵被打死、打伤或俘虏。

鲍里斯·维特曼是红军第6集团军的军官,也当了俘虏。他刚被俘获就目睹了德国人是如何进行一场残酷的意识形态战争的。德国人首先在俘虏中搜寻犹太人和政治委员,把他们分成两组。政委那一组被带走后,鲍里斯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但他看到了那十几个犹太人的命运:“德国人发给犹太人铲子,让他们挖一条壕沟。天开始下雨了。过了一会儿,我只能看到他们的头顶。一名党卫军打他们,让他们挖得再

快些。当壕沟够深时，他拿起一挺俄制机枪，向壕沟里打了几梭子。我能听到他们的哀叫。后来又过来几个党卫军，把他们都干掉了。他们被杀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这令我非常震惊，那时我明白了什么是纳粹主义。德国人告诉我们，犹太人和政委不能再控制我们了，他们是来解放我们的，我们很快就要回家了，但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必须和德国人战斗到底。”¹

希特勒在哈尔科夫教训了红军，现在他发动了自己的进攻，代号为“蓝色行动”，意图是让德军向苏联东南部的伏尔加河前进，然后拿下外高加索地区的油田。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最初似乎进展得还不错。但德国人面临一个问题，他们向东推进得越远，补给就越困难。然而，希特勒还决定将军队分开，一支向南推进到高加索地区，另一支向东推进到伏尔加河，这一困难就更为加剧了。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认为，希特勒的过度自信已经开始让他失去判断力。哈尔德在1942年7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对敌人能力的长期低估已经逐渐发展到一种怪诞的程度，形势正变得越来越不堪。”²哈尔德的话很有预见性。几个月后，德国军队在伏尔加河西岸一座名叫斯大林格勒的城市陷入一场艰苦的决战。

德国人无法将斯大林格勒废墟中的红军士兵清除干净。德国军官约阿希姆·施滕佩尔说：“俄国人在堑壕战和肉搏战中占优势，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装甲部队，我们习惯于驾驶坦克，用坦克把敌人打垮，然后停下来清理这一区域，再向前推进。但很久以前我们就把一切都忘记了。”³现在轮到红军来展示他们也能进行大规模包围作战了。1942年11月19日，苏联发动了“天王星行动”，要在斯大林格勒围歼德国第6集团军。这一作战获得了成功，德国第6集团军终于在1943年2月2日投降。

1942年9月30日，希特勒在对德国人民发表演讲时称：“你们大可放心，没有人能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斯大林格勒]。”⁴现在他的承诺已经毫无意义。更为糟糕的是，到1943年初，许多地方表明他们正在输掉战争，斯大林格勒仅是其中之一。1942年秋，埃尔温·隆美尔元帅的部队在阿拉曼被击败——与其说是由于英军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的才能，还不如说是因为隆美尔的士兵寡不敌众，并且缺乏足够的燃料来开动坦克。在海上，德国舰队的行动由于缺乏燃料和空中掩护而阻碍重重。最后，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在漫长的战斗后，他们于1943年夏秋先占领了西西里岛，继而登上了意大利大陆。

1943年1月，盟军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公开宣布，他们将把战争进行到德国“无条件投降”为止，并打算对目前敌对国家“犯罪、野蛮的领导人”实施“全面严惩和报复”。⁵但是，在幕后却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以法国前总理、纳粹的合作者弗朗索瓦·达尔朗上将为例，他在盟军入侵北非期间被捕，但未遭到监禁，也没有因任何罪行而受到审判。相反，完全是出于政治现实，他被盟军确定为法属北非的文官政府首脑。盟军需要尽快确保维希政府军队的合作，这是办法之一。不过，达尔朗上将仍然非常不受英国人和美国人待见，1942年平安夜，他被一名反维希的刺客所杀。

在达尔朗死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就和摩洛哥的前维希政府司令官夏尔·诺盖斯将军讨论了犹太人问题，他显示出了同样现实的一面。诺盖斯将军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说，如果战后让犹太人主宰了北非的经济，那将是“可悲的”。罗斯福试图打消他的顾虑，他说，如果在某些职业上把犹太人限制在一定比例，这将“消除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抱怨，这种抱怨是特定的，可以理解。虽然犹太人只占德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德国超过50%的律师、医生、学校教师、大学教授等都是犹太人”⁶。

撇开罗斯福声明中明显的事实错误不谈——犹太人在德国这些职业中的比例当然没有50%——他的话说明，即使是西方最大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不惜对犹太人进行毁谤。

这些秘密谈话在战争期间没有公之于众。因此，卡萨布兰卡发出的仍然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声音，要惩罚那些敌视盟国的“有罪”和“野蛮”的领导人。当然，对纳粹领导人来说，这种威胁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没有回头路可走了。1943年3月，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了一段与赫尔曼·戈林的对话，其中透露了他们的想法：“戈林充分意识到，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变得软弱，我们将面临什么，他对此没有幻想。尤其是在犹太人问题上，我们陷得太深，已经无法逃脱了。这是件好事，经验表明，一场运动、一个民族，背水一战时将会更为坚决。”⁷

对于那些与德国人合作的人来说，情况还不太明朗。他们许多人似乎并不认为自己要“背水一战”。例如在法国，警察与德国人合作的密切程度远不如前一年。警方非常抵触将法国国民逮捕并送往德国进行强迫劳动——这是德国人在1943年2月推行的一项措施。⁸

在罗马尼亚，1942年至1943年冬天的形势，坚定了安东内斯库元帅的决心，现在他断然拒绝将剩余的罗马尼亚犹太人交给纳粹。1943年4月，他会见了希特勒，并扛住了在犹太人问题上要求合作的压力。希特勒认为，任何在战场上的挫折都应该激起对犹太人更严厉的惩罚；而安东内斯库则打算为他的烂摊子国家寻找一条走出泥潭的道路。安东内斯库政府的一些成员甚至在和盟军暗通款曲，好让他们的国家从战争中脱身——希特勒对此也十分清楚。⁹不久以后，希特勒在他的另一个盟友霍尔蒂上将会面时，更为直率地指出，匈牙利在对待犹太人问题上太过拖沓了。和安东内斯库一样，霍尔蒂的同事们也在试图和盟军媾和。这并不奇怪，因为霍尔蒂比其他人更清楚斯大林格勒的失

败有多么惨重。匈牙利第2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与德军并肩作战，实际上已被歼灭。二十万名士兵中有一半被击毙，其余大部受伤或被俘，配属于该军的匈牙利犹太劳工队也遭受了骇人听闻的伤亡。这是匈牙利历史上最惨痛的败仗之一。

希特勒竭尽全力想要说服霍尔蒂继续战斗。他告诉霍尔蒂：“德国及其盟国现在都在暴风雨中的一条船上，显然谁要下船就会立刻淹死。”他还抨击霍尔蒂对犹太人的政策，说：“他完全无法理解匈牙利的亲犹态度……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们？要知道，世界大战是他们挑起的。”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霍尔蒂想知道他还能做些什么，因为他已经禁止了犹太人的营生，“总不能杀掉他们”。纳粹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回应说，犹太人应该被关进集中营，或者加以“消灭”。希特勒得意扬扬地指出，波兰的犹太人状况已经得到“彻底清理”，并向霍尔蒂解释说，犹太人“将被当作结核杆菌那样对待，它们会感染健康的身体。这并不残忍，就像为了不造成病害，自然界里兔子和鹿这样无辜的动物[在这种情形下]也不得不杀掉。为什么那些想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带给我们的畜生却可以苟活呢？”¹⁰

希特勒感到和霍尔蒂的会谈没有获得成功。戈培尔知道原因，他在1943年5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匈牙利人很清楚，光凭空言是无法赢得战争的，他们显然看出我们的弱势，正在慢慢转向。”¹¹此外，4月30日，派往匈牙利探察局势的党卫军军官埃德蒙·维森玛耶发来一份报告表明，匈牙利当局“把犹太人视为保障‘匈牙利利益’的一道护身符，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犹太人来证明自己加入轴心国作战只是迫不得已，他们通过暗中捣鬼[不交出犹太人]来对轴心国的敌人做出间接的贡献”¹²。

希特勒以一种典型的方式来回应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犹豫不决。

1943年5月，他告诉他的地方长官们，应该“尽快清算那些小国”，要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毁灭和被毁灭的世界中”。¹³这预示着如果霍尔蒂不照希特勒的话去做，德国可能会占领匈牙利。

1943年春，希特勒和另一个盟国保加利亚也有类似的问题。4月3日，希特勒在和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会晤后发表的正式公报说，他们进行了“长时间亲切的交谈”，主要内容是德国和保加利亚之间“传统友谊的精神”。¹⁴但事实是，保加利亚人像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一样，对此感到犹豫不决——尤其是在犹太人问题上。1943年2月，保加利亚政府的犹太问题专员亚历山大·贝列夫接受了艾希曼的代表特奥多尔·丹内克的要求，即保加利亚将把两万名犹太人交给德国。和法国一样，保加利亚当局也对遣送非本国的犹太人更容易接受一些。他们知道——至少也是强烈地怀疑——把这些犹太人送上的是一条死路，尤其是在前一年的12月盟军公开宣布了纳粹的灭绝计划后。尽管如此，到1943年3月底，保加利亚还是进行了合作，把大约一万一千名犹太人从其占领的色雷斯和马其顿驱逐出去，他们全数死在特雷布林卡的毒气室中。

然而，当政府打算开始驱逐本国的犹太人时，保加利亚发生了公开抗议。反犹主义本来就不是保加利亚的传统，1941年底政府实行了迫害犹太人的立法，其动机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而是为了取悦他们的德国盟友。¹⁵现在，和他们一起生活的犹太人要被驱逐出境，许多保加利亚公民和官员都很不高兴——当然，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败的消息肯定也让他们更为失落。于是保加利亚当局通过立法，将犹太人逐出首都索菲亚，发配到各省城镇，而不是将犹太人送上死路。这些犹太人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再被驱逐出境，但这一行动还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战后，一些保加利亚人试图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他们的”犹太人得

到拯救的光辉历史。然而，这绝不是一段光辉历史，尤其是对于色雷斯和马其顿的犹太人来说。

在4月和5月，希特勒不仅意识到了他的盟友对犹太人的态度，而且看到了华沙犹太人自己的反抗。4月19日，当德国军队进入隔离区，开始驱逐剩余的犹太人时，他们遭到了轻武器、手榴弹和自制炸弹的袭击。当时二十四岁的马雷克·埃德尔曼是反抗德国人的犹太人之一，他道出了他和犹太战斗组织中战友们的动机：因为知道德国人要把他们送上死路——这是从特雷布林卡的目击者那里听来的，有些人成功地逃回了华沙，告诉了他们在集中营等待着的是什么。“很难相信你会这样被白白杀死，”马雷克·埃德尔曼说，“但事实就是如此。”¹⁶ 听到特雷布林卡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后，马雷克和他的战友们决心反抗。“显然，”他说，“死亡集中营就是反抗的导火索。”德国人把家庭拆散也是一个诱因，老幼被送往特雷布林卡，健康可以劳动的犹太人则留在了隔离区，这样抵抗战士们就可以不必顾虑家庭而奋起战斗。

隔离区内的犹太抵抗战士从波兰国民军那里获取枪支，他们还从德国人那里偷枪。马雷克·埃德尔曼说：“他们还用金属管和火药制造手榴弹。”起初，进入隔离区的德国军队对抵抗的程度感到震惊，其目标几乎毫无进展。正如马雷克·埃德尔曼所说的，“最初的几天是我们的胜利”。许多抵抗战士对上阵杀敌感到兴奋，犹太青年阿哈龙·卡尔米说：“我用手枪向路过的大批德国人开火。德国人大喊：‘救命！’然后躲在墙后。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德国人逃跑，我们已经习惯于躲避德国人，他们没有料到犹太人会那样战斗。那里有血迹，我的眼睛始终盯着血迹，说道：‘德国人的血！’”¹⁷

马雷克·埃德尔曼、阿哈龙·卡尔米以及其他在隔离区袭击德国人的犹太人，此前多数都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学会射击很容易，”马

雷克·埃德尔曼说，“你不需要接受训练。这不是将军发号施令的战役，这就是游击战。德国人走在街上，你看准机会就向他开枪。要是他看不到是谁开了枪就再好不过了。你只要有战斗的意志和武器就行了。”¹⁸ 面对德军的优势火力，抵抗战士们知道他们没有最终取胜的可能。“是的，”马雷克说，“我们知道自己赢不了，但必须向德国人证明，我们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人类。在战斗中杀死敌人，你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党卫军旅队长（少将）于尔根·斯特鲁普的指挥下，德国军队进入隔离区，开始逐栋焚烧建筑物。马雷克·埃德尔曼记得，德国人想把他们赶出来，火焰吞没了隔离区，他和战友们不得不逐屋撤退，因为大火一直紧追着他们。“我们离开隔离区，那里才会有和平。但只要我们还在这里，德国人就不能说他们赢了。”马雷克·埃德尔曼和阿哈龙·卡尔米最后都成功逃出了隔离区，而得以逃到华沙非犹太区的犹太人是少数，其中的大部分是通过下水道或地道跑出来的。

到5月中旬，犹太人起义被镇压，斯特鲁普在报告中声称他的士兵逮捕了56065名犹太人——这个数字似乎有水分¹⁹——仅有约一百名德国士兵伤亡。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华沙犹太人所取得的成就很小，只是暂时推迟了对隔离区的破坏和对大多数犹太人的屠杀。但抵抗的象征意义是巨大的，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马雷克·埃德尔曼说：“当他们开始清理隔离区时，我们不得不抵抗。这谈不上起义，只是想守住隔离区。当德国人想要清理我们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抵抗，就是这么回事……你觉得我能对他们说什么？请立刻杀了我？”

就在德国人进入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前几天，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1943年3月，在奥斯维辛—比克瑙新建的一

系列杀人设施中，第一座已经投入运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党卫军原本打算把这座火葬场（兼毒气室）放在主营里，但后来改到了比克瑙。在设计阶段，这座建筑就进行了多处更改，使其兼备焚尸炉和毒气室的功能。在1942年8月，又订制了三座火葬场，其中一座与现有的相同，另外两座则有着全新的设计。这两座新火葬场的编号为四号和五号，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变化。

四号和五号火葬场在设计上的改进是很简单的，它们是奥斯维辛第一批专门设计用于屠杀的建筑，脱衣室、毒气室、焚尸炉都在同一层面上——就像是一条死亡传送带。而前两座新火葬场原先只是为了焚尸之用，并不具备杀人的功能，改建背离了原先的初衷，二号和三号焚尸炉的半地下室原先是用来堆放尸体的，现在改为脱衣室和毒气室。在改造之后，尸体还是得抬到焚尸炉所在的地面上来焚烧。

这四座建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建筑——编号为二号至五号的火葬场（一号火葬场仍在奥斯维辛主营）——代表了大屠杀演变的一个新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们是坚实坚固的建筑，从外观上看像工厂。相比之下，特雷布林卡、索比堡、贝乌热茨等“莱因哈德行动”中建造的死亡集中营都是临时据点，一旦屠杀工作完成，它们就将被拆毁。奥斯维辛新建的用红砖砌成的火葬场（兼毒气室）是党卫军在上西里西亚日益壮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位于奥斯维辛近三十个子营组成的庞大网络的中心，这些子营为一系列工业生产提供强迫劳动，包括水泥厂、军火厂以及最大的位于奥斯维辛郊外莫诺维茨的IG法本化工厂。比克瑙的火葬场实际上象征着纳粹通过劳动进行灭绝的理念。比如说，一旦莫诺维茨的犹太劳工不能按要求工作了，就会被运送到比克瑙消灭掉。这些建筑物不仅是纳粹杀害所憎恨和害怕的男人、妇女、儿童的手段；它们象征着一种只有能劳动才能活下去的体制，是一种被铭

刻在红砖上的非人道。

到1943年夏天，比克瑙的所有四座新火葬场都投入运行。负责建筑工程的党卫军官员卡尔·比绍夫写道，这些焚尸炉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处理掉4 416具尸体，也就是说奥斯维辛—比克瑙现在有能力在一年内将一百六十万人化为灰烬。²⁰应该说，这个数字是被低估的。根据目击者的证词，一次可以把不止一具尸体塞进焚尸炉，就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每天焚化的尸体就可高达八千具。²¹

杀人的流程和“莱因哈德行动”各集中营类似。新来的人被带进脱衣室，告诉他们要脱光衣服再洗澡。然后，他们进入像淋浴房一样的毒气室。待大门封闭之后，纳粹就从屋顶（二号、三号火葬场）或高墙（四号、五号毒气室）上的窗口投入“齐克隆B”晶体。等到所有人都死去后，排清剩余的毒气，犹太特别劳动队进场清理。和“莱因哈德行动”各集中营相比，只有两点不同：使用的毒气是“齐克隆B”而非一氧化碳，以及妇女的头发是在死后而不是生前被剪掉的。

就像“莱因哈德行动”各集中营一样，比克瑙的屠杀工厂只需要一小撮党卫军人员来监督整个过程。体力劳动——包括把死者从毒气室中抬走的可怕任务——都是由犹太特别劳动队完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把“齐克隆B”扔进毒气室的任务一直都是由党卫军亲自完成的。

波兰犹太人亨利克·曼德尔鲍姆是1944年在奥斯维辛新火葬场的特别劳动队队员之一。“真是不堪回首，”他说，“我真的以为自己在地狱。我记得有时候如果在家里做错了什么，父母会告诉我不要这样做，因为那样会下地狱的。但是，当我看到很多人的尸体时，那些被毒气杀死又烧掉的人……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拒绝[在那里劳动]，我就完了，对吧？我知道他们会杀了我。我当时还年轻，失去了家人，他们都被毒死了——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和

哥哥。所以我明白自己要活下去，于是就开始抗争。我一直在挣扎着活下去。”

亨利克·曼德尔鲍姆记得，尽管党卫军在把犹太人引进毒气室时努力保持一种平静的气氛，但有时候“人们会开始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那里有太多的人，有些人想退缩，但党卫军会用棍子打他们的头，鲜血直流。因此，他们不可能退缩或离开，而是被强行推入毒气室。当房间塞满的时候，门就被锁上了——门是密封的，就像冰箱的门一样”。他记得每送来一批人时，“后面就会有一辆涂着红十字的救护车”，讽刺的是，“这辆救护车里装的就是‘齐克隆B’”。一旦毒药被扔进毒气室，“毒气作用需要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杀人完毕后，再经过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我们打开了门。你可以看到这些人是怎么死的——站着。他们的头歪在左边或右边，脸朝着前面或后面。有些人呕吐或大出血，他们会大便失禁。在焚尸前，我们不得不剪掉他们的头发，拔掉金牙，再检查他们是否有贵重物品放在鼻孔或嘴里——女人会塞在阴道里”²²。

1944年春，一条直接通到比克瑙心脏地带的铁路支线建成，火车可以直接开到二号和三号火葬场毒气室附近。在此之前，运输的终点仍然是“斜坡”——奥斯维辛主营和比克瑙之间的装卸区。对于许多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来说，这是他们进入毒气室的第一步。年轻的德国犹太人贡特尔·鲁斯钦记得，当他来到“斜坡”，看到带着孩子的妇女被挑选出来时，“我傻乎乎地想，她们是要去一个家庭营地吧”。斜坡上的甄选是由党卫军医生进行的，于是就有了奥斯维辛是一个受科学原则约束的机构这样的说法——即被杀人并非出于随意报复，而是按照医学的标准。显然，这是一个谎言，即便从医学来说，纳粹也没有进行任何应有的检查，仅仅是看一眼而已。党卫军还欺骗新来的人，问他们是愿意坐车去比克瑙还是步行前往，有时候，年轻人也会选择坐

车,但这些坐车的人都直接被送进了毒气室²³。党卫军认为他们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所以不配活着。

贡特尔·鲁斯钦和他的父亲,以及其他被选中强迫劳动的人一起被带到莫诺维茨营地,就在IG法本化工厂旁边。几天后,他的父亲在事故中受伤。贡特尔得知父亲要被送到“医院”接受“X光检查”。后来一个波兰犹太人告诉他,他的父亲不会得到医治,而是直接被送进毒气室。刹那间,贡特尔感到自己宁可被选中去比克瑙,这样就能来到父亲身边,也许出于某种奇迹他还活着。“这就是一个非常亲近父亲的男孩的感受。”他说。但是波兰犹太人劝说贡特尔,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他应该继续在莫诺维茨工作下去。于是,贡特尔决定留在原地,发誓要努力生存下去。“我们五人一排走去工作,”他说,“我总是试图站在中间,以免被党卫军打到,这是有用的,我总是尽量不要被士兵看见。我不是一个说一定要做些什么的人,比如反抗或别的什么,我只是想活下去,试着能帮助别人。”

在前往奥斯维辛的途中,贡特尔的火车停在德国东部的一个车站。车上的犹太人大声喊道:“请给我们一些水吧!”但站在外面的人说:“该死的犹太人!他们还没杀了你吗?”贡特尔对车站的情形感到“沮丧和不安”,但仍然不相信他的德国同胞会杀死他。他说:“我们知道不会有头等舱坐,但没想到大多数人都会进毒气室,对此我们一无所知。”²⁴

党卫军尽可能地让比克瑙的新火葬场远离奥斯维辛的其他建筑,它们都被栅栏围了起来,犹太人特别劳动队就住在那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干着整个集中营里最糟糕的活,却享受着比大多数囚犯都要好的生活条件。1944年在比克瑙特别劳动队的队员达里奥·加拜说:“我们住得不错,有床。吃得也很好,一般不用喝集中营里的汤。”²⁵党卫军一般允许特别劳动队队员把死者留在更衣室里的食物拿走,因

此他们在火葬场的宿舍时常给人以物资丰富的感觉。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罗马尼亚犹太人米克洛什·尼兹利博士描述了与劳动队员共进的一顿难忘的晚餐：“等着我们的是一张铺有厚重绸缎的桌子……上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这些都是被驱逐的人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蜜饯、培根、果冻、腊肠、蛋糕和巧克力。”²⁶

一些劳动队员拿走了死者的贵重物品，特别是珠宝，这些珠宝要么藏在衣服里，要么藏在体内。然后，他们设法将这些贵重物品换成他们想要的其他物品。他们办得到，因为尽管火葬场与世隔绝，劳动队员与营地其他囚犯之间仍有可能取得联系。奥托·普雷斯布格尔1942年从斯洛伐克被送到这里，他回忆起自己如何能够找到机会和劳动队队员接上头，因为他负责驾驶一辆马车在比克瑙各地运送货物，总是热衷于“做生意”。“劳动队队员想要酒和香烟，而且有足够的黄金来支付，所以火葬场的‘生意’是最好的。我喜欢把货物送到火葬场，你总是可以在那里买到东西……有一次我来到火葬场，问他们有没有东西要卖，有人给了我一只宝石的蜘蛛。当时，非常富有的犹太珠宝商也被送来这里。我问他们想换什么，他们说想换一百支香烟。我说如果这枚宝石蜘蛛值那么多我就带来，我们相互信任。这枚宝石蜘蛛很漂亮，中间是一块大的宝石，腿上都覆盖着宝石。我把宝石蜘蛛带到了波兰平民那里【他们是建筑工人，住在营地外面，但白天到营地里来干活】交给他们……我们每个人都赚了一笔。”

这种交易是被严禁的，奥托·普雷斯布格尔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这件事。他说：“火葬场门口总是有一名党卫军士兵，我过来的时候常常要编造虚假的理由。大多数时候，我都说是奉命送沙子过来，当然，我是来做‘生意’的。所以他们让我进去了，沙子无关紧要，我总是把它倒掉，问题是怎么把货物藏起来。他们【参与交易的其他囚犯】给我

[的小车] 做了一个小木箱，就踩在我脚下……有一次我给火葬场送了一千支香烟，当我把它们从小木箱里拿出来时，有人打了我的背和头。那是个老党卫军，他过去总是骑着自行车到处跑，盯着囚犯们是否做‘生意’……他问我从哪里弄到的香烟，并训斥我做‘生意’。但我撒了个谎，我说我只是饿了，偷了一个包，原以为会在里面找到三明治，结果找到了香烟。他说那是个谎话……他只是个下士，但我叫他长官，这显然很有用。他打了我一拳，我假装比真的更疼。最后，他拿走了香烟，让我走了。如果他上报了这件事，我就会在当天被处决。”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别无选择”，他只能在营地“做‘生意’”，因为他“想活下去”。²⁷

特别劳动队不仅和集中营其他地方的囚犯建立了关系，还和在火葬场监督他们干活的党卫军打起了交道。在索比堡的党卫军已经感到，过段时间就处决所有的劳动队员，再换一批新人，劳动的效果往往不佳。在奥斯维辛也是如此，劳动队员一般都能活上较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和党卫军有较为密切的工作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亲密起来，党卫军对待他们比其他囚犯要客气得多。米克洛什·尼兹利博士甚至还看到过他们一起踢足球——劳动队员一队，党卫军一队。²⁸ 达里奥·加拜记得有个荷兰党卫军，是个“非常好的人”²⁹。另一个劳动队员莫里斯·维尼齐亚也说这个荷兰人“是火葬场里最好的看守，有时他请我们抽烟，有时我们请他抽烟，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对我们非常友好”。但莫里斯说，就算是这样一个“好人”也“非常乐意去杀人，他是看守我们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³⁰

有些在火葬场工作的党卫军则利用这个机会放纵他们的虐待欲望。战后发现了一名劳动队员在当时写下的记录，描述了一名党卫军喜欢在人们裸身走向毒气室时触摸年轻女性的敏感部位。³¹

这些虐待狂中最厉害的一个就是奥托·莫尔，他是火葬场的运行监督。达里奥·加拜记得，他喜欢“向年轻女孩的乳房开枪”来处决她们。1944年，大批匈牙利犹太人来到这里，火葬场已经无法应付，尸体只能在露天的巨坑里焚烧——莫尔有时直接把孩子扔进火中，任其活活烧死。³²阿尔特·芬西尔贝尔见到过莫尔的另一次虐杀。他命令一个裸体女人跳舞并站在尸堆上唱歌，而他自己开始射杀囚犯，将他们的尸体扔进火中。等到处决完囚犯之后，他把那个女人也一同击毙。³³直到战争结束很久之后，达里奥·加拜一听到摩托车发动机，心脏就会“以每分钟二百下的速度狂跳”——因为莫尔常常骑摩托车来火葬场。他说：“当你看到这个家伙时，就只会有麻烦——再没有别的，你根本不想靠近他。1951年，我去洛杉矶城市学院学习英语，老师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些有关集中营的事。我一下就写了两张纸，都是关于莫尔的，到现在我还留着。”³⁴

许多特别劳动队队员都对自己的工作深感不安。不仅是因为它很可怕，更是他们明白自己是在协助党卫军杀死同胞。莫里斯·维尼齐亚说：“我们成了动物，我们觉得应该自杀，而不是为德国人工作，但就算自杀也没那么容易。”达里奥·加拜发现：“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困惑，所以你的良心才能深藏于内而保持到今天。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做那样的事？”达里奥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你总是很想活到第二天”，对活下去的渴望是如此“强烈”。³⁵

一名劳动队员在战争期间写下了一个故事，描述了立陶宛的孩子们是怎样谴责他们的。一个女孩对试图脱下她弟弟衣服的劳动队员大喊大叫，把他们称为“犹太杀人犯”。她说自己是弟弟的“好妈妈”，弟弟会“死在我怀里，和我一起死去”。另一个孩子问劳动队员，为什么这些犹太同胞要把孩子们带去杀死？孩子问：“难道只是为了让自己活

下去吗？”他们与“杀人犯”为伍的日子真的值得用“那么多其他犹太人的性命”来交换吗？³⁶

莫里斯·维尼齐亚说：“我们已经自由了，为什么还要去记住那些恐怖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感觉——现在仍是如此。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上帝为什么让我活着？为什么？就为了去记住那些事吗？就算到了现在，每当我上床入睡前，一切还都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些日日夜夜。”³⁷

比克瑙这些专门的火葬场，是到大屠杀已经接近尾声时才开始投入运行的。1941年，有一百一十万人被屠杀，1942年，有二百七十万人被屠杀。³⁸绝大多数人不是死于东线特别行动队的捕杀，就是死于波兰境内的“莱因哈德行动”集中营。1942年，死于奥斯维辛的有二十万人，只占整个屠杀的一小部分。1943年，屠杀的总人数下降到五十万人，其中有一半是在奥斯维辛死去的。因此，奥斯维辛的这些新装备远未发挥其设计能力。1943年总数字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纳粹在战场上渐露颓势后，在寻找和运输犹太人方面也遇到了困难。

1943年间，纳粹运往奥斯维辛的不仅是犹太人，还包括其他他们认为有威胁的人，例如辛提—罗姆人——纳粹称之为“吉卜赛人”。1943年2月，第一列装有数百名辛提—罗姆人的火车抵达奥斯维辛，在比克瑙建起了一个吉卜赛人营地，这个营地人数最多时有一万五千人。不同于犹太人的是，辛提—罗姆人在抵达这里后并没有受到甄别，家人还是可以住在一起，这很可能是因为纳粹还没有最终拍板决定他们的命运。不过，能住在一起并不意味着受到优待——他们仍然遭受虐待。赫尔曼·霍伦莱纳是辛提人，当他被送到奥斯维辛时还是一个孩子。他记得孩子们都很饿，“所以我们像兔子一样把草拔出来吃掉，要

是被党卫军捉住了就会挨打。这也很糟糕，但当时比克瑙的一切都很糟糕……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每时每刻我们都担心他们会把我的父母亲打死，或者把我们毒死；我们明白这是迟早的事”³⁹。

弗朗茨·罗森巴赫也来自辛提家族，十五岁那年，他和母亲一起被送到奥斯维辛—比克瑙。他记得刚到营地时就吃了一惊，他和母亲必须一起脱光衣服。“我不太清楚你是否了解我们的习俗，”他说，“母亲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脱衣服，父亲也一样，这是出于一种羞耻感和互相尊重。但此时我们不得不那样做。我脱了衣服，叫道：‘妈妈，你在哪儿？’她站在我后面，躲着我。当她的辫子被剪断时，我想去抓住它，于是被橡皮棍或管子之类的东西从背后打了几下。你知道吗，这种情形完全无法想象。党卫军拿着棍子走进来，敲打男人的下体……请原谅我不能说那些词语……他们说的是‘吉卜赛人的家伙’之类……贬义和歧视性的名词。”⁴⁰ 弗朗茨·罗森巴赫跟着母亲住在吉卜赛营地，他对辛提—罗姆人的生存条件感到“非常吃惊”。“气氛很糟糕，营房里许多人和小孩都生病了，所有的人都混住在一起，孩子们在尖叫：‘妈妈，我饿了，妈妈，给我点吃的，我们有什么能喝的吗？’他们不能喝水，因为很可能会染上伤寒。到处都是‘妈妈，给我……’的哀求，但母亲什么也给不了，她们什么也没有。我们被拳打脚踢和侮辱，但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你知道，这些党卫军，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都被灌输过辛提—罗姆人不算人类，我们应当被消灭，任何人都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辛提人不过是他们的猎物，你明白吗？”

吉卜赛妇女经常会遭到性虐待。赫尔曼·霍伦莱纳回忆起“卡波”们晚上是如何进入营地来挑选“漂亮的吉卜赛人”⁴¹带出去强奸。弗朗茨·罗森巴赫记得党卫军也干同样的坏事。“我亲眼看到过两次，”他说，“晚上，年轻的党卫军会拿着电筒走进来，走到女人旁边。女人们

大多睡着了，他们要摘下她们的头巾才能看清她们的面容。有时他们挑走年轻的女人，把她们带到营房后面……你没听到枪响，什么也没听到。第二天早上她们就死在那里，她们是被杀害的。”⁴²据特别劳动队队员阿尔特·芬西尔贝尔称，也有吉卜赛妇女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吉卜赛营地外“有能力进行贿赂”的囚犯会给营房的看守送香烟，“在党卫军的允许下进入营地，和吉卜赛女人发生关系。她们饿着肚子，打算以此来换些香烟和别的东西。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对此也只能逆来顺受，因为他们也在挨饿……”。⁴³

虽然有约两万三千名辛提—罗姆人被送往奥斯维辛，但纳粹对他们的态度仍然是不明确的。例如，纳粹从未像对待犹太人那样对他们的盟友施加压力，要求其把辛提—罗姆人也送进集中营。不过，辛提—罗姆人并没有因此幸免于难。在罗马尼亚，为数众多的辛提—罗姆人虽说没有遭到系统性的屠杀，但仍有数千人被驱逐到德涅斯特河东岸。与此同时，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通过了针对“吉卜赛人”的歧视性立法，将他们监禁在难民营中，并最终杀害了约两万六千名辛提—罗姆人。⁴⁴毫无疑问，有大量辛提—罗姆人在战争中死亡——确切数字尚不清楚，但肯定超过二十万人。

纳粹对辛提—罗姆人的政策之所以含混不清，部分是因为希姆莱本人没有给下属明确的指示。一方面，东线的特别行动队经常把辛提—罗姆人和犹太人一起杀害，数以千计的辛提—罗姆人被从旧德国驱逐到波兰的隔离区。但另一方面，1942年10月13日，希姆莱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纯种”吉卜赛人可以在指定的区域内，跟随“吉卜赛头人”游徙。⁴⁵这项法令源自希姆莱的吉卜赛“专家”罗伯特·里特尔博士的研究，他认为德国的“纯种吉卜赛人”并不构成威胁，但还有许多和其他种族“混血”的辛提—罗姆人则是潜在的危险。这不仅是一种

糟糕的科学，而且导致了这项几乎毫无可操作性的歧视性法令出台。

1943年1月29日，希姆莱颁布了新的法令，辛提—罗姆人因此被遣送到奥斯维辛，但仍有许多具体的例外，比如那些被认为是“纯种”的吉卜赛人，以及和德国人结婚并得到警察担保的吉卜赛人，等等。他们有可能遭到绝育，但至少理论上不会再被送到奥斯维辛等集中营。不过，在具体执行驱逐的过程中，这些区别很多都被无视了。⁴⁶

正当辛提—罗姆人在奥斯维辛遭受苦难时，希特勒正在品尝前线失利的苦果——这些消息几乎是灾难性的。1943年初，德国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已经很糟糕了，但随后一系列的失败犹如雪上加霜。5月中旬，德军在北非战败，根据戈培尔的说法，希特勒担心在突尼斯的失败可能会“达到斯大林格勒的程度”⁴⁷。就在当月，邓尼茨元帅下令U型潜艇停止在北大西洋的活动，盟军的反潜措施已使U型潜艇无法继续作战了。

这些打击虽然沉重，却丝毫没有改变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愿望。1943年5月13日，他对戈培尔说，因为犹太人是“寄生虫”，所以“除了消灭犹太人，现代人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做”。他补充说：“世上的犹太人以为他们正接近世界性胜利的边缘，这个胜利绝不会到来……相反，第一批认清犹太人面目并与之斗争的民族将获得世界的支配地位。”⁴⁸

希特勒对犹太人问题的狂热并未减弱，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反而加强了——1943年夏秋的事件将会以最令人不安的方式来证明这一点。

15. 压迫与反抗(1943)

虽然有些国家此时已决计退出战争,但生活在其中的很多犹太人仍遭到屠杀,这也成为那段历史中众多悲剧方面之一。想摆脱这场战争并不容易,希特勒对于想和他决裂的伙伴,施加的报复是毁灭性的。

1943年夏天,意大利人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跟着德国人只能一条道走到黑。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7月19日,罗马遭到轰炸。意大利外交官、法西斯党员马里奥·蒙德洛说:“所有人都知道战争失败了。当然,所有人都认为意大利必须退出[战争],而不是和墨索里尼待在一起……有时,我们比德国人更为现实。当然,还有更为现实的,比如我们并不忠于现在的领袖。我不认为这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我们的民族性就是如此。”¹

1943年7月24日,在法西斯党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墨索里尼受到同僚的批评,他的政策受到攻击。第二天,国王接见了,告知这位领袖不再需要他担任首相,他离开房间后即被逮捕。

巴多格利奥元帅接替墨索里尼担任首相,并试图通过谈判找到一条摆脱战争的道路。1943年9月3日,也就是盟军从西西里登上意大利大陆的当天,意大利新政府同意停战。9月8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公布

了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意大利退出轴心国，对于居住在这个国家的犹太人来说成了灭顶之灾。从墨索里尼下台到意大利投降拖了太久，让德国有时间做好准备。意大利一退出战争，德军就占领了意大利的基地和设施。9月10日，德军控制了罗马，当晚希特勒录制了讲话并进行广播。他谴责了意大利新政府，称德国决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投降。“我们都知道，”他说，“在这场无情的斗争中，失败者将听凭敌人的意愿被消灭，只有胜利者才有办法生存下去。”²

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对于德国的其他盟友来说——一种解释是，意大利不想战斗到底，是因为他们不是大规模灭绝的参与者。尽管墨索里尼政权曾在意大利境内迫害过犹太人，但他们并没有把犹太人集体送往纳粹死亡集中营。不仅如此，直到投降的那一刻，意大利人还一直在保护境外占领区的犹太人不被驱逐。例如1943年春季，在保加利亚将色雷斯和马其顿的犹太人驱逐出境时，意大利驻德占萨洛尼卡的领事把一批希腊犹太人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雅典，那里当时是意大利的占领区。³甚至还有一些意大利士兵光顾德国在萨洛尼卡关押犹太人的营地，称其中一些妇女是他们的“妻子”，因此不能被驱逐出境。⁴

意大利的投降意味着这些保护都不复存在了。生活在意大利控制地区的犹太人的境况突然变得非常糟糕。例如，德国人一进入法国南部的尼斯——当时这里是意大利控制区——就开始搜捕犹太人，其残暴令人发指。自从意大利人取代维希政府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这里避难，在过去的十个月中，他们一直受到保护，现在德国人开始报复了。进入意大利本土后，他们也同样冷酷无情。在意大利北部马焦雷湖周围，党卫军开始寻找犹太人，在该湖南端的梅纳，他们在一家旅馆里遇到了一些犹太人。他们杀了其中的十六人，并把尸体扔进了湖里。⁵

不到一个月后，1943年10月16日，德国军队开始对罗马犹太人采取行动。人们可能认为德国人不太敢这样做，因为梵蒂冈就在附近。虽然教皇庇护十二世尚未公开谴责对犹太人的灭绝，但他真的就会对此完全无视吗？德国驻罗马教廷大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认为这不太可能，驱逐罗马犹太人一定会招致教皇的责难，从而对德国不利。⁶但魏茨泽克错了，教皇不仅没有进行任何警告，在事件发生后也没有进行任何公开的谴责。

10月16日清晨，二十二岁的罗马犹太人塞蒂米亚·斯皮齐希诺感到有些不对：“那天晚上与之前不同，人们可以感到气氛有些异样，一种沉闷的安静，我无法形容。凌晨四点，我们开始听到脚步声，沉重的脚步声，那是士兵行军的脚步声。于是我们走到窗户前看看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德国人闯进了房子，带走了犹太人。当我们看到德国人也进了我们的房屋时，都吓坏了。”⁷塞蒂米亚和她的家人被带到了梵蒂冈附近的一所监狱，她描述那里的情况“十分可怕”，然后她们从那里被送到奥斯维辛。她是在德国占领期间从罗马被驱逐出境的一千八百名犹太人之一。“我是在战争结束后从奥斯维辛回来的，”她说，“我在那里失去了家人。我的母亲、两个姐姐、我的小侄女，还有一个弟弟。如果教皇发出警告，许多犹太人就会逃走，他们会做出反应的。但是，教皇保持了沉默，正中德国人下怀。他离我们非常近，我们就在他眼皮底下，但他什么忙也没有帮。他是个反犹太人的教皇，不愿意冒一点点风险。”

塞蒂米亚·斯皮齐希诺鉴于自身的遭遇，认为教皇也是反犹的，这可以理解，但未必正确，因为教皇显然没有阻止牧师和修女藏匿犹太人。郇山修女会的路易莎·吉雷利修女说：“教皇下令修道院可以开门，它打破了封闭的惯例——为任何逃亡者敞开了大门。”⁸恩里切

塔·迪·韦罗利是被修女们藏起来的犹太人之一，她永远不会忘记她们是如何拯救自己生命的：“我们在这里躲藏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修女们非常好，这些美丽的修女代表了我生命中的九个月。她们很重要，我想表达的不仅仅是谢意。”⁹四千多名犹太人受到天主教会的保护，并被藏在修道院和其他各种教堂建筑中，有几百人甚至躲进了梵蒂冈内的避难所。¹⁰

不过，即便教皇已经得知纳粹打算灭绝犹太人，他也不会直言不讳地谴责这一罪行，这很可能是因为害怕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教皇担心一旦信仰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获胜将对教会不利；其次，他担心如果谴责德国人，他们就会闯进教堂，搜捕躲在那里的犹太人；最后，他担心德国会轰炸梵蒂冈。¹¹所以，他闭上了嘴。在他看来，这无疑是在为天主教会这样一个机构的利益考虑。但是，就像我们在荷兰犹太人的事例中看到的那样，很难想象如果教皇采取强硬路线会发生什么事。也许德国人会收拾教会，也许——鉴于希特勒已经表现出不愿意得罪德国教会——他们什么也不会做。而我们知道，一旦教皇发话，就会给予全世界道义上的指引。

在意大利驱逐犹太人的不仅仅是德国人，也有意大利人，特别是法西斯团体的成员，如黑衫旅和其他依附于所谓“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军事组织——意大利北部地区仍然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统治之下，他被德国伞兵从监禁中救了出来。

总共约有七千名犹太人被驱逐出意大利并遭到杀害¹²，约有80%的意大利犹太人在战争中幸免于难——他们大多穿过边境躲到了中立的瑞士。起初，在德国刚刚占领意大利时，瑞士并不接收意大利犹太人前来避难，除非他们是孩子、老人或者和瑞士人结了婚。这些限制在1943年12月被放宽，直到1944年7月才被更为宽松的措施所取代。在整个

战争期间，前往瑞士寻求避难的意大利犹太人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瑞士个别边防士兵的同情。¹³

对比荷兰高达75%的犹太人死亡，意大利只有不到20%的比例似乎很低，但这仍然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因为意大利与荷兰不同，意大利犹太人遭到全面迫害的时间较晚。而且，随着盟军的推进，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都消除了威胁。例如，1944年6月4日，也就是意大利投降后不到九个月，罗马就落入了盟军之手，德国人甄别、抓捕和驱逐犹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意大利的大屠杀历史与距他们北面七百英里之遥的另一个沦陷国相比，显得尤为阴冷。丹麦生活着大约七千五百名犹太人，1943年秋天，德国人打算对他们采取行动，大约就和意大利同时。在夏天，丹麦爆发了罢工和其他抗议活动，纳粹原本对丹麦相对较为“轻松”的占领随之结束，丹麦政府于8月辞职。纳粹在丹麦的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实行了紧急状态，上级要求他对犹太人采取行动，其计划是在1943年10月1日晚拘留丹麦犹太人，然后将他们驱逐出境。但就在行动的几天前，维尔纳·贝斯特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他通过一名中间人德国海军武官格奥尔格·杜克维茨，把将要发生的事透露给了丹麦犹太人。贝斯特向杜克维茨简要介绍了一下计划中的驱逐行动，他知道杜克维茨同情丹麦人，会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丹麦的上流阶层，他们转而又会警告犹太人。

丹麦警察努德·戴比说：“我在警局听到了[实施驱逐的消息]，当然，我们和记者以及政客是同时听到它的。这令我们所有人都很吃惊，我们从没想到过德国人会在两年多后逮捕丹麦的犹太人。”¹⁴努德·戴比和他的同事们一样“并不赞同这种歧视”，他从一些“地下媒体”了

解到犹太人被驱逐后的命运，感到自己必须帮助他们。

直到德国人决定将犹太人驱逐出境的那一刻，“丹麦犹太人的处境还是相当幸福的”。1943年时只有十四岁的本特·梅尔基奥尔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常犹太化，我们很好地融入了丹麦社会。几个世纪以来，跨民族通婚是很常见的，很多非犹太人都有一个犹太曾祖父或曾祖母。所以我要说的是，这里对犹太人很友好，我们不是什么威胁——不论是对教会还是国家。相反，许多犹太人在丹麦的公共生活、艺术、科学甚至政治领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¹⁵

本特·梅尔基奥尔记得，如果你感到有任何危险，可以“请求街上任何一名警察的帮助，而不必担心让德国人知道”。这种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丹麦人——不论宗教信仰如何——能举国一致对抗德国人。

在得到德国人即将行动的消息后，犹太领袖在犹太教堂和所有犹太社区发出警告。许多居住在哥本哈根的犹太人离开了城市，躲到了农村的房子里，或者搬到了他们的非犹太邻居那里。

丹麦的非犹太人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来提醒犹太人。十七岁的罗伯特·彼得森说：“我在邻近的街道上挨家挨户地走着。每当我看到一个写着犹太名字的家庭门牌时，我就按门铃要和他们说话。有时他们不相信我，但我成功说服他们收拾行李，和我一起去比斯珀比约医院，那里已经变成了犹太难民的聚集地……那里有医生和护士照顾他们。然后我回到我的社区，寻找更多的犹太人。”¹⁶

最常见的逃生路线是横渡狭窄的海峡去往中立的瑞典。像努德·戴比这样的志愿者，护送了几小批犹太人穿过哥本哈根到达渔港，他说：“这样的事总是在晚上做，我们更喜欢坏天气，不想要一个人人都能看见我们的夜晚。”一到渔港，“我们就躲在德国人通常用来做渔网和工具的小棚子里”，直到一个渔夫叫我们上船。“我一直都很害怕，”他

说，“我不得不更换许多地方来休整我发疼的身体，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愿意给我提供食宿的丹麦人，他们都不要钱，只是在暗中帮助我。”¹⁷

丹麦的教堂也在努力保护犹太人。“无论犹太人是因种族或宗教原因受到迫害，”哥本哈根主教在10月3日的声明中明确说道，“抗议这种迫害是基督教会的职责……不管宗教信仰有何分歧，我们都要争取犹太兄弟姐妹的权利，让我们坚持比生命更崇高的自由。”¹⁸

由于这种抵制，10月1日至2日的行动基本上以失败告终——德国人打电话时，大多数犹太人都不在家。在大约七千五百名丹麦犹太人中，只有不到五百人被驱逐出境。而且这些人并未被送往东方的死亡集中营，而是被送往捷克境内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大多数人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丹麦在大屠杀期间的历史是独一无二的，这是纳粹统治下唯一一个绝大部分——高达95%——犹太人被其同胞拯救的国家。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这一情况发生在丹麦而不是其他国家，是多种因素在这一时刻共同发挥了作用。首先是因为丹麦的历史文化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对抗强邻德国。而且，丹麦人对个人人权的重要性也有深刻的认识。鲁迪·比尔也是1943年秋天被丹麦同胞拯救的一名犹太少年，他说：“这是一个我称之为丹麦式的公平与正义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想保护彼此，不会轻言放弃。”¹⁹一个邻近的中立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瑞典离得很近，并且立即提供了避难的场所，尤其是1943年10月2日，瑞典人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他们欢迎任何渡海而来的丹麦犹太人。

另一个因素是一种同胞的观念。尽管当时丹麦大约有一千名犹太人是外国人，但是，正如努德·戴比所说的，这些犹太人都是丹麦人。因此，仍然有人认为，与其说丹麦人是在拯救犹太人，还不如说是在拯

救丹麦的同胞，只不过他们正好都是犹太人罢了。如果20世纪30年代丹麦没有对外国犹太人入境进行如此严格的限制，而是允许更多的犹太人前来避难，那么到了1943年的秋天，情况就可能会有所不同。当然，这是我们无法确定的。

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德国人的态度。这次救援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德国驻该国的主要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发出了警告，他知道这个警告会传到犹太人社区。此外，德国海军对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海道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封锁，对犹太人的逃亡大开方便之门。鲁迪·比尔说：“我一直认为，如果德国人想要阻止这一行动，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做到。因为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整个水域并不算很宽，也没有那么长，如果用上四五艘鱼雷艇，整个行动就会完蛋。”²⁰这并不是说德国人完全无视犹太人的逃亡。在丹麦本土，一些德国安全人员确实试图抓捕犹太人——这似乎只取决于德国各个单位的重视程度。

不过，在丹麦的德国高官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想让犹太人逃走。然而，在此之前，贝斯特并不是犹太人的朋友，他是一个忠诚的纳粹，曾与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密切合作，协助制定和执行纳粹在法国的种族政策。没有证据表明他突然对犹太人产生了同情，他的行为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出于人性。他的真实想法可以从1943年10月5日他为柏林当局撰写的一份文件中找到线索：“鉴于针对丹麦犹太人行动的目标是该国的去犹太化，而非是为了屠杀，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一行动已经达到了目标。”²¹贝斯特实际上认为，既然他的工作是把犹太人赶出丹麦，那么他已经成功了。只不过他没有把犹太人送到死亡集中营，而是让他们逃到了瑞典。他也许还认为，丹麦的政治形势一直不同于其他纳粹占领的国家，纳粹在很大程度上允许丹麦人自治，为的是确保丹麦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帝国供应粮食，强行驱逐犹太人将会引

起很大的抵触情绪。贝斯特一定感到，用微妙的方法来达到所期望的“目标”是最好的。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贝斯特的行为还有另一个原因——不过他绝不会告诉他的纳粹同志。他是一名专业出身的律师，二十多岁时就被任命为法官。因此，到1943年的秋天，他已经预感到纳粹的失败，因此他需要改善自己在盟军眼中的形象，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一策略是有效的，他与海德里希过从甚密，而且罪行累累，但在战争结束后他只是被短暂监禁，随后成为一家大型德国工业集团的高管。

因此，认为英勇抵抗是决定犹太人在某个国家生存比率的最重要因素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另一个因素——纳粹每次想要搜捕多少犹太人。希腊犹太人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在希腊涌现了很多抵抗的事例，但七万名犹太人中的大约80%在战争中死亡。²²与丹麦不同，德国人是铁了心要驱逐希腊犹太人的。

德军于1943年9月份开进意大利占领的希腊地区，并立即开始准备大规模驱逐。希腊的非犹太人很快举行了抗议活动。雅典的希腊东正教大主教达马斯基诺斯不仅向德国人提出交涉，还呼吁他的神职人员藏匿犹太人，雅典大学的学者也进行了抗议。德国人的回应是查封了学校，逮捕了数百名神职人员。

反犹主义在希腊并非没有市场，犹太社区也很少有非犹太的朋友可以指望，但希腊的总体情况是同情和支持犹太人的。正如一位研究希腊的大屠杀历史的学者总结的那样，“广大希腊人民热情收留寻求援助的犹太人”²³。

最著名的抵抗行动是在扎金索斯岛。当德国人要求该岛提供岛上所有犹太人的名单时，当地的长官和主教递交了一张只写有两个名字的纸——他们自己的名字。同时，犹太人被藏在非犹太岛民的风子里，

二百七十五名犹太人全部得以幸存。我们不知道德国人为什么不去扎金索斯岛搜查犹太人，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岛上的犹太人很少，不值得为此兴师动众。但是，再次要强调的是，关键只是在于德国人决定不去那里搜捕了。扎金索斯岛事件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有犹太人幸存了下来。但在希腊，尽管也有类似的英雄行为，犹太人被抓获和驱逐出境的情形还是更多。

萨洛尼卡是希腊犹太人损失比率最高的地方。从1941年春季开始，德国人就控制了这里，大约95%的萨洛尼卡犹太人——多达四万八千五百名男女老幼死于战争之中。犹太人密集居住在这里，以及德国人在开展驱逐行动前已经驻扎了两年，都可以解释为何这里的死亡率如此之高。此外，与希腊许多地方不同的是，萨洛尼卡的犹太人很大程度上并未被当地居民同化。在战争之前，就有一个规模较小但声势浩大的团体在攻击犹太人——许多犹太人都很有钱——而德国人得以在紧张局势下继续煽风点火。²⁴

大量希腊犹太人被送往奥斯维辛——总共约五万五千人。大部分人被迅速屠杀，剩下的人存活率也是低得可怜。希腊犹太人很难习惯波兰的恶劣气候，他们也很少有人会说德语，而营地里所有的命令都是用德语说的。

希腊和丹麦犹太人的命运再次说明，德国人在不同的国家实行“最终解决方案”的手段是多么不同。他们在每个地方决定要搜捕和遣送多少犹太人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决定犹太人死亡数字的关键因素——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驱逐犹太人是否困难，是否会引起政治后果，特定犹太人“种族”的危险程度，以及他们的居住地离前线的远近，等等。

与希腊犹太人不同，丹麦犹太人大部分幸免于难，主要是因为德国

人出于各种原因，选择了放弃残酷的追捕。必须指出的是，这无损于那些丹麦犹太人救助者的英勇，这些抵抗者的英雄主义将长存。我们也应该记住帮助犹太人的希腊人——虽然有那么多希腊犹太人死于纳粹之手。

就在丹麦犹太人即将渡过大海前往瑞典之时，波兰最大死亡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正在策划一起逃亡，1943年，特雷布林卡的党卫军将要第一次遇到囚犯们的武装抵抗。在此前的几个月里，党卫军们似乎认为一切都很顺利。埃尔姆弗里德·埃贝尔的混乱管理已被一种新的秩序和伪装取代——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安抚新来的犹太人。“他们把站台建造成一种乡村火车站的样子，”特雷布林卡特别劳动队队员卡尔曼·泰格曼说，那里竖着“一等座、二等座、三等座”和“候车室”的牌子，还在一扇门上挂了一块写着“站长室”的牌子。²⁵ 另一名囚犯奥斯卡·斯特劳辛斯基也亲眼见证了营地的改装：“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挂上了一个直径七十厘米的假钟，可以想象，所有这些装饰都会使新来的人迷惑，觉得他们只不过是到了一个过境站。”²⁶ 塞缪尔·维伦贝格也是集中营的一名囚犯，他对党卫军的诡计深感震惊。正如他所见到的那样，犹太人现在“就像平时那样来到月台上，似乎是来到了一个疗养胜地。然而，就在这一小块地面上，发生了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谋杀案”²⁷。除了车站区的改建外，营地的其他设施也进行了扩建。卡尔曼·泰格曼说：“那里还有一些作坊，有裁缝为党卫军缝制新衣服，有一家五金店、一家木匠铺和一家电器工厂。”²⁸

不过，尽管笼罩着一片祥和，在这里劳动的犹太人都很清楚，用奥斯卡·斯特劳辛斯基的话来说，德国人的真实想法是“永远不会让我们活着离开这里”²⁹。由于担心未来，一群劳动队员开始策划逃亡。党卫军及其乌克兰帮凶的骄傲自大让他们放松了警惕，他们已经习惯了犹太人

俯首帖耳。此外，如前所述，党卫军觉得定期杀掉所有劳动队员再找人替换是不切实际的——训练新来的人并教会他们使用营地的设施很浪费时间。让劳动队员活得更久可以让党卫军更为轻松，但反抗的风险也随之增大——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全措施会变得更加松懈。

尽管党卫军看守麻痹大意，但特别劳动队内部所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如果党卫军对反抗计划有一点点嗅觉，他们就会折磨那些可疑的人，拷问阴谋的细节。这就是为什么反抗的组织者之一朱利安·乔拉兹耶基博士在1943年4月被抓时服了毒药，当时他带着一大笔钱，希望贿赂一名卫兵。他不愿背叛同志，选择了自杀。

到了1943年的夏天，特雷布林卡劳动队员们越来越紧张。他们担心该营地不久将会关闭，自己也将不可避免地一同被杀害。最后，8月2日，他们决定采取行动。特雷布林卡的囚犯扬克尔·维尔尼克写道：“我们受够了悲惨的生活，必须报复折磨我们的人，然后逃跑……那些长长的队伍，那些可怕的死亡车厢，都还历历在目，他们都在大声呼喊着重仇。我们知道这片土地下面隐藏着什么，我们是唯一活着能讲述这一切的人。我们默默地告别犹太同胞们的骨灰，发誓会有复仇者从他们的血泊中站起来。”³⁰

他们设法从营地的军械库偷到了武器，8月2日下午，他们袭击了党卫军和其他看守。其他囚犯同时向木制建筑物浇上汽油，纵火焚烧，有数百人冲向铁丝网。那天从特雷布林卡逃出来的塞缪尔·维伦贝格说：“我们中的一些人被机枪打倒了，然后我从那些尸体上跳了过去。”特雷布林卡的围墙没有电网，塞缪尔和其他囚犯把毯子盖在铁丝网上，冒着卫兵的开火冲向附近的森林。塞缪尔记得他跑的时候像个疯子一样尖叫：“这该死的地方被烧掉了！”³¹

大约有三百名囚犯逃走了，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越过铁丝网只

是从死亡集中营逃出来的人必须面对的第一个危险挑战而已。令人奇怪的是，党卫军并没有从特雷布林卡的起义中吸取教训，三个月后，在索比堡也发生了类似的暴动。就和特雷布林卡一样，索比堡死亡集中营的特别劳动队队员也明白，一旦他们对德国人失去价值了就会被杀死，生存只取决于杀人工厂是否继续运转。他们身上这种悲惨的矛盾性——他们的生命因别人的死亡而延长——并没有改变。索比堡劳动队员托伊维·布拉特写道：“有一段时间，运输暂停了下来。食物变得稀缺，我们很饿，因为以前我们是从新来的人行李中翻找食品补充自己的。忽然，纳粹命令我们准备迎接第二天将要抵达的火车，此刻，在波兰某条遥远的铁轨上，这趟死亡列车正向索比堡轰鸣而来。卡罗莱克 [另一个队员] 转向我说：‘明天就能吃个饱了。’我想，我们还算是人吗？”³²

从3月到7月，将近三万五千名荷兰犹太人被遣送到索比堡，给集中营带来了可观的财富，他们直接从荷兰带来了珠宝和食物。有如此之多的西欧犹太人来到死亡集中营是不寻常的，有可能是因为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刚刚从希腊被送到奥斯维辛，因而纳粹决定把荷兰犹太人送到尚有余力的索比堡。不管其动机如何，这一决定是造成荷兰犹太人死亡人数如此之高的一个原因。在奥斯维辛，新来的人有一部分会被送去强迫劳动，而在索比堡，超过99%的人会在几小时内死亡。在送往索比堡的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中，只有二十多人幸存。在历史学家们研究荷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死亡率很高的问题时，往往关注的是荷兰国内的因素——比如公务员的合作态度——但是不能忘记，德国人把荷兰犹太人运往索比堡也是一个因素，尽管影响有限。³³

当荷兰犹太人进入集中营时，许多人相信纳粹的谎言，认为他们是到了一个卫生站。负责迎接荷兰犹太人的劳动队员托伊维·布拉特说：“这个陷阱太完美了。我敢肯定当他们站在毒气室里，发现出来的

是气而不是水时，还会认为这可能是某种故障……当工作完成时，当他们都已被带出毒气室烧掉时，我记得当时在想，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星空真的很安静……[一次就]死了三千人，就和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星空依然如故。”³⁴

1943年9月，索比堡迎来了一批苏联战俘，他们被送到这里是因为全都是犹太人，他们成为大规模逃亡的催化剂。约有八十名战俘被挑选出来成为建筑工人，他们很快就明白了索比堡的真正性质。正如他们中的一人阿卡迪·瓦杰斯帕皮尔所说：“我们知道德国人不会让任何人活着离开，尤其是在那个营地。”³⁵ 在一位名叫亚历山大·佩切尔斯基的红军军官领导下，他们构思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们的想法是邀请党卫军分别到营地的鞋匠铺和裁缝店去试装。囚犯们认为——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德国人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来一趟，他们会准时过来。一旦他们坐下来，等着试衣服，就会被躲在屋子后面的囚犯杀死。

1943年10月14日，他们的计划付诸实行。下午三点半，阿卡迪·瓦杰斯帕皮尔和一个名叫耶胡达·勒纳的狱友躲在鞋匠铺的窗帘后。“他就在我面前坐了下来，所以我走出来猛击他。我不知道应该用斧头的平边来砸，我用的是刃边。我们把他干掉了，在他身上盖了一块布。然后又有一个德国人进来了，他走到尸体跟前，用腿踢踢，说：‘这是什么？怎么乱七八糟的？’当他明白过来的时候，我也用斧头砍了他。然后，我们捡起手枪跑掉了。我浑身发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平静下来。我感到恶心，身上溅满了血。”³⁶

当阿卡迪·瓦杰斯帕皮尔和耶胡达·勒纳在鞋匠铺干掉两个德国人时，他们的同志在裁缝店里干掉了另外三个党卫军。到了傍晚时分，大部分党卫军都被干掉了，但指挥官卡尔·弗伦泽尔还活着。阿卡迪说：“我找到了萨沙[即起义领导人亚历山大·佩切尔斯基]，告诉他我

们杀死了两个德国人。他说我们应当去弗伦泽尔的房间解决他……我说我不行，我的手在发抖，浑身都在发抖，我说我做不到……他明白了，没有勉强我，所以我没有再杀人了。”³⁷

到傍晚六点前，囚犯们朝大门冲去。岗哨向他们开枪射击，弗伦泽尔还拿了一挺机枪对着他们扫射。许多囚犯径直奔向铁丝网，当托伊维·布拉特到那儿时，铁丝网倒在了他身上。“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下完了！’人们踩在我身上，铁丝刺进了我的外套里。但最后我灵机一动，把皮衣脱在了铁丝网上，顺势滑了出来。我开始狂奔，摔倒了两三次，每次都以为自己被击中了。但我站起来的时候发现什么事也没有，最后我冲进了森林。”³⁸

就像在特雷布林卡一样，从索比堡逃出来的大多数人没能在战争中活下来。在越过营地铁丝网的三百人中，可能只有六十人活到了战后。他们还得在自己的祖国再挣扎两年——他们通晓语言，熟悉风土，然而还是有那么多人死去了。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托伊维·布拉特的经历可以概括许多逃亡者面临的困难。例如，他很清楚，到达森林并不意味着“安全”，因为那里“一点儿也不安全”³⁹。德国人正在追他，当地农民也会抓住他换取赏金，说不定还会遇到武装“土匪”——以前逃进森林的波兰人，现在也靠抢劫为生。

托伊维很想和领导这次起义的萨沙待在一起，他感觉有萨沙的保护要安全得多。但在逃出来后的第二天，萨沙宣布他和八名部下将要离队。托伊维回忆道：“现在我们必须搞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所以我们中有一些人要去侦察附近地区，也许还要买点东西。他命令我们给他一些钱……他承诺会回来，然后就走了，一去不复返。”⁴⁰令托伊维深感崩溃。战后，他和萨沙说起当时的事情，他说，“不管在我还是其他幸存者的眼中”，萨沙都是一个英雄，但是他“做了一些我认为你不该做的事”，因为

“你带走了八个人、九条枪，几乎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于是他告诉我，‘听着，我是个军人，我的首要任务是回到部队’。他说这些话时带着一丝羞愧，但他还是说，‘我是一名士兵，一名士兵应该回去’。”

萨沙率领他的武装小队向东走，设法与苏联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只有那些团结在一起的人才能生存下来，”萨沙的小队成员之一阿卡迪·瓦杰斯帕皮尔说，“唯一能令我们生存下来的是，我们九个人团结在了一起。我们有许多英勇善战的人，但都不像萨沙那样受人尊敬。”⁴¹

但是，萨沙为了拯救他的同志，把其余四十多名逃亡者置于尴尬的境地。他们你争我吵，缺乏领导，一些强者想抛弃弱者。最后，托伊维和另外两人脱离了大队，前往他的家乡伊兹比察。随着冬天的临近，他们急切地想找个栖身之处。当他们最终来到伊兹比察时，托伊维走近一个村民，他知道她很尊敬他的父亲，恳求她把他們藏起来。但她拒绝了，因为害怕德国人的报复。她说她的丈夫已经被带到奥斯维辛，她不想再失去儿子。托伊维写道：“从她脸上的恐惧中，我明白我们代表了一场致命的瘟疫，20世纪的黑死病。”⁴²

他们继续往前走，遇到了一个农夫。农夫愿意把他们藏匿在谷仓后的一口窖里，得到的报酬是他们从集中营里带出来的金子和珠宝。但农夫真正感兴趣的不过是能从他们身上搜刮到什么，过了几个月后，他又向他们“借”了许多衣服，之后他就叫来一些人准备杀死这些逃亡者。托伊维在逃跑时被子弹擦伤了下巴，他装死才得以脱身。从农场逃出来后，托伊维躲在伊兹比察一座废弃的砖厂里，靠熟人给他带吃的为生。但是，他在这里的危险几乎和在那个凶恶的农夫手中一样大，来自森林的武装民兵不时会来搜查这里——有的是游击队，有的就是土匪。他们都令托伊维感到害怕。即便是游击队，许多也都是反犹的。有一支游击队里有托伊维儿时的一位朋友，但他拒绝让托伊维加入，仅

仅因为他是犹太人。

饥饿的托伊维去找他以前的老师，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她回答说，她很害怕，因为德国人最近抓到了一个犹太人，然后折磨他，让他说出帮助过他的人的名字。托伊维转身准备离去，但女教师还是可怜他，给了他一条面包。最后，在伊兹比察郊外，托伊维遇到了一位打小就认识他的农民。农民同意托伊维可以和他住在一起，只要他假装自己是个非犹太的波兰人并且照料奶牛就可以。

托伊维一直受到这位农民的保护，直到红军解放波兰。“我应当高兴地欢呼雀跃，”他谈到自己熬过战争时的感受，“可为什么我感到的是悲哀，如此巨大的悲哀，我的灵魂是这样空虚？之前被生存本能所压抑的情感一起释放出来，让我深受打击。我的亲人都离去了，我的世界也消失了。我感到空虚、悲伤和孤独。”⁴³

回顾往事，托伊维认为反犹主义有三个“基本要素”，战争期间都存在于波兰：“首先在波兰有非常强烈的宗教偏见；其次是经济和社会困难——这个国家存在一些问题——当然，矛头就很容易指向犹太人；第三个就是嫉妒，大部分犹太人都过得不错。”⁴⁴托伊维承认，尽管反犹主义普遍存在，但因一些波兰天主教徒的仁慈，他才得以幸存下来。

托伊维·布拉特的故事说明了波兰犹太人面临的巨大困难，即使他们设法摆脱了德国人的控制，犹太社区的毁灭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安全的藏身之地——没有其他犹太人可以依靠了。此外，1941年10月5日德国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在集中营和隔离区外被发现的犹太人可以不经批准即行处死，任何帮助他们的波兰人也同罪。所以，一旦被抓到，给犹太人一块面包皮就意味着死亡。犹太人也经常遇到非犹太波兰人的敲诈，犹太人往往要花大量的钱财去寻找一个避难所。因此，没有钱的犹太人很容易受到伤害，寻求藏身之处的犹太女性尤其容易遭

受性剥削。波兰人告发犹太人也有很高的赏格，例如在普通政府辖区的某些地方，告发犹太人的波兰人至多可以得到告发对象财产的三分之一作为报酬。⁴⁵

1943年4月，伊斯雷尔·塞姆利奇从特雷布林卡附近的一个劳动营逃了出来，和托伊维一样，他发现在纳粹占领的波兰很难生存。他设法来到了华沙，很快他就明白，即使犹太人能翻越隔离区的铁丝网，“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找不到栖身之所，加上饥饿和对自己处境的绝望，他们宁愿向警方自首”⁴⁶。

但这并非历史的全部，伊斯雷尔也和托伊维·布拉特一样，把自己的幸存归功于非犹太波兰人的同情。一对姓科博斯的波兰夫妇把他安置在华沙家中的阁楼上，甚至在他的钱用完后还让他继续居住。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是因为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伊斯雷尔·塞姆利奇写道，他曾对此感到很“困惑”，因为“他们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情，让我住了那么长时间，对于像他们那样的穷人来说，这是很沉重的负担”。⁴⁷

有许多非犹太波兰人帮助了犹太人，他们使用的方法往往很巧妙。例如，尤金·拉佐夫斯基博士设法让德国人相信在罗兹瓦多（今斯塔洛瓦沃拉）附近暴发了伤寒，他用一种类伤寒的无害药剂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大批人群进行注射，从而使德国人在进行血液检测时相信整个地区都受到了感染。结果，德国人离这里远远的，成千上万名犹太人和波兰人没有遭到驱逐。⁴⁸

在华沙，约有两万八千名犹太人无视德国人的禁令生活在隔离区之外，大多数人都被非犹太波兰人藏匿，约有一万一千五百人幸存到战后。根据一项可信的估计，华沙非犹太人口中的7%—9%向犹太人伸出了援手，即七万人到九万人。⁴⁹这项统计证明，关于波兰人在帮助犹太人方面无所事事的成见是错误的。事实上，正如一位学者总结的那样，

华沙犹太逃亡者的生存率“不亚于荷兰这样的西欧国家”⁵⁰。

对于波兰境内的抵抗组织，尤其是波兰国民军，也应该有类似的评价。虽然国民军中无疑有许多部队是反犹的，但也有一些部队接纳犹太人加入。例如，从特雷布林卡逃出来的塞缪尔·维伦贝格参加了国民军，然后参加了1944年夏天的华沙起义。他记得，他冒着风险向非犹太波兰人透露自己是犹太人，但他想“以我之名而死”。他说，虽然“国民军中有一些人找我麻烦”，但在他所属的部队都是“好人”，即使他们“知道我是犹太人”，也没有什么问题。⁵¹

波兰国民军有时也会帮助犹太抵抗战士。例如，他们曾向华沙犹太人提供了一些武器供其在起义时使用，不过有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本可以提供更多的援助。事实诚如一位学者所说：“国民军是由许多各不统属的部队拼凑而成的伞形组织，总数有三十万人之多，来自不同地区，从社会主义者到民族主义者都有，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和行径大相径庭。”⁵²正如塞缪尔·维伦贝格所亲身经历的那样，这是一段多面的历史。

1943年间，纳粹领导人无可奈何地看着德国民众的士气逐渐低落。7月底，英国皇家空军用燃烧弹对汉堡进行的轰炸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四万名德国人死亡——比英国在整个“闪电战”中的损失还要多。纳粹的装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在战后说：“汉堡的损失是惨重的，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所遭受的袭击，尤其是那些被烧毁的房屋，居民普遍深感沮丧。”⁵³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必须坚定纳粹领导人的立场。正如他在9月10日的讲话中所说：“党必须在所有方面树立榜样。”⁵⁴他的讲话背后有一个明显的隐忧——一些纳粹分子可能会效法意大利人退出战争。

希姆莱知道一种对付失败主义的方法，那就是扩大灭绝犹太人的知晓范围。到目前为止，这一罪行是在保密中进行的，现在将在百余名纳粹高层出席的会议上对此进行讨论。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其背后的想法是明确的。一旦更多的纳粹意识到以他们的名义犯下如此严重的暴行，除了“背水一战”死不投降之外，还能有什么选择呢？意大利的精英阶层——国王和法西斯高层——能够从没有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战争中脱身，但大部分纳粹高层无法做出这样的选择。

1943年10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波兰的波森发表了两次演讲——一次是对大约九十名党卫军高级军官的演讲，一次是对包括党务专员和地方长官在内的纳粹党内高官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希姆莱坦言了对犹太人的灭绝，使每一个倾听者都成了共谋犯。例如，他在6月对纳粹党内高官的那场演讲中说：“我不相信消灭那些[犹太]人——不管是杀死他们还是任其被杀——然后再让他们的孩子长大来向我们的儿孙复仇是正确的。要让这些人从地球上消失，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对于必须执行这项任务的组织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艰难的事情。”⁵⁵希姆莱对此当然再清楚不过。

希姆莱在告诉纳粹高官们集体罪行的真实情况的同时，也想结束“莱因哈德行动”集中营的灭绝行动。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的起义，以及犹太人在隔离区的反抗——除了4月份在华沙的以外，还有8月在比亚韦斯托克的——让他更愿意把大部分杀戮集中到较为安全的奥斯维辛。⁵⁶他也受到官僚政治斗争的影响，不愿看到有除党卫军以外的德国机构把犹太人用于强迫劳动。⁵⁷因此，在1943年10月，他要求普通政府辖区的党卫军和警察头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清理仍在卢布林地区运转的大型集中营。⁵⁸

1943年11月，希姆莱关于在卢布林郊区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屠杀剩

余犹太人的命令被执行，相关的一系列行动被称为“收获节屠杀”。当时在马伊达内克的波兰政治犯亨利克·尼西奥目睹了屠杀前的准备工作。“1943年10月底，在第五区的火葬场附近，德国人命令犹太人挖掘曲曲折折的壕沟。”⁵⁹他记得，德国人向犹太人保证，这些壕沟并不是什么险恶的东西——只不过是防御工事而已，因为战事越来越近了。11月3日，德国人命令营地内的所有犹太人“向前走”，他们被带到壕沟边上。过了一会儿，党卫军开始用机枪向他们射击，而扩音器里则放着音乐。

来自周围营地的犹太人也被带到马伊达内克杀害。他们被命令分成几个小组执行枪决，后一组被杀的成员被命令躺到刚刚死去的人的尸体上，然后被枪杀。并不是每个人都立刻死去，还有犹太人在面临死亡时发出尖叫声，为了掩盖他们的尖叫声，两辆广播车被用来播放流行音乐。⁶⁰11月3日，大约一万八千人在马伊达内克被杀——这是死亡集中营里单日被害人数最多的一天。这再次告诉我们，毒气室在集体屠杀中并不是必需的。

整个“收获节屠杀”还包括附近特拉维尼基和波尼亚托瓦两个集中营的行动。一些犹太人在德国人要杀害他们时进行了反抗。他们设法抢了一些武器，并向对手开火，但德国人放火烧了他们藏身的营房，把他们全都活活烧死了。他们的勇敢抵抗只是让希姆莱坚定了这些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应该被消灭的判断。在“收获节屠杀”中，共有约四万三千名犹太人死亡。

大约与此同时，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这两个死亡集中营停止了运转。它们都被拆除并销毁了一切痕迹。这些营地，以及“莱因哈德行动”所建立的第一座集中营——贝乌热茨，一直被纳粹视为临时性的场所。到目前为止，普通政府辖区中几乎没有犹太人了，而来自西欧的犹

太人还远未达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戮能力，因此前述那些集中营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1942年12月，贝乌热茨集中营停止了大规模杀戮，到1943年夏天被完全拆除。至于特雷布林卡，在暴动发生的两周后，最后一列火车抵达这里，随后在秋季被拆除。索比堡是最后一个被拆除的“莱因哈德行动”死亡集中营。由于在起义后次日，没有逃脱的囚犯都被杀害了，于是派了另一支特别劳动队来拆卸营地。他们在完成任务后也被杀掉了。

到1943年12月，所有这些营地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农场和田地。格洛博尼克对希姆莱说：“为了便于监视，每个营地都建立了一个小农场，配备一名看守。为了维持农场，必须定期向他支付津贴。”⁶¹纳粹的麻烦还没有结束，许多当地居民都知道发生过什么。许多人认为被杀死的犹太人留下的珠宝、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还埋在泥土和灰烬中，因此，这名“农夫”的一项工作就是阻止当地人的搜掘。

“莱因哈德行动”正式结束。1943年11月30日，希姆莱写信给格洛博尼克，感谢他“通过执行‘莱因哈德行动’为德国人民做出了伟大而非凡的贡献”⁶²。1942年至1943年间，总共有一百七十万人在这一行动中被杀害，其中大多数人死于贝乌热茨、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三个营地之一。

象征大屠杀的图景主要是奥斯维辛，奥斯维辛集中营在罪行纪念中几乎无处不占据中心地位。在英国，大屠杀纪念日正是奥斯维辛解放纪念日。诚然，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成为最为残暴的死亡集中营。但有一种危险存在，那就是这三个“莱因哈德行动”集中营——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忽视。这正中纳粹的下怀，他们不想让任何人记住这些地方。但这些营地在许多方面代表了罪行的独特性：只需要少数几个德国人就可以杀害一百七十万人，其

中每一个个体的死亡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仅仅是因为他的祖父母的出身。一旦他们的生命被抹去，杀害他们的地方也被抹去。人们在纪念大屠杀时看不到贝乌热茨、特雷布林卡或索比堡的影像，因为营地没有留下可供展示的图像。在一定程度上，这说明罪行被漠视了，这些受害者归于虚无，他们死去的地方也随之消逝。

至于罪魁祸首，他们很快就离开了犯罪现场。1943年9月，格洛博尼克前往直意大利北部担任党卫军和警察领袖，他带去了很多同事，包括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和弗朗茨·施坦格尔。他们很快就在了里雅斯特展现了独特的才能，这个地区现在被德国吞并了。在城市南部一家名为“圣安息日米厂”的工厂，他们协助修建了地中海地区最为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和监狱之一。在这里被杀的大多不是犹太人，而是游击队员。至少有三千人在“圣安息日米厂”被杀害——大多数人被活活打死，或在大楼的院子里被行刑队枪决。就像在马伊达内克一样，纳粹大声播放音乐，企图掩盖杀戮的噪声。从1944年4月起，遇害者的尸体在厂区内一座专门建造的焚尸炉里被烧掉，这座焚尸炉是由埃尔温·兰伯特建造的，他之前曾为T4计划、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建造过焚尸炉。尸体被焚烧后，骨灰直接倒进附近的港口里。⁶³

特雷布林卡的前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认为他知道为何把他和另外一名参加“莱因哈德行动”的军官派到这个危险地区来——这里被划定为“剿匪区”。他在战后说：“我很清楚，我们都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他们在想办法给我们也来个‘火葬’。所以我们被分配了最危险的工作，在那个地方和游击队作战随时都会遭遇不测。”⁶⁴1944年5月，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即被游击队击毙，但施坦格尔和格洛博尼克都活到了战争结束。格洛博尼克只多活了几天，1945年5月31日，英国人将他逮捕，他随后自杀身亡。至于弗朗茨·施坦格尔，他逃到南美洲，

最终于1967年被捕，在联邦德国被判处终身监禁。

“莱因哈德行动”集中营的时代结束了，但奥斯维辛最臭名昭著的时期——这一时期将使这个地方变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场——才刚刚开始。

16. 奥斯维辛（1943—1944）

直到现在，奥斯维辛才成为大屠杀的中心。但是要记住，即便新的一体化毒气室在比克瑙已经投入运转，营地的杀人能力大大增强，奥斯维辛仍然在纳粹国家内继续承担多种功能——而不仅仅是灭绝。

集中营的真实情况如此可怕，其最令人吃惊的功能是，居然可以为纳粹提供宣传。在1943年初，有五千名犹太人从布拉格西北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来到奥斯维辛—比克瑙。¹他们与其他犹太囚犯不同，可以住在比克瑙的“家庭营地”中。男人和女人还是分开居住的，但儿童没有被直接送进毒气室，而是可以和父母之一生活在一起。纳粹要求他们给仍留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亲属写明信片，目的是蒙骗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视察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使其相信比克瑙仅仅是一个劳动营。几个月后，一旦纳粹认为“家庭营地”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几乎所有人都被送进毒气室杀害。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另一个功能是逐渐开展的医学试验，这也是它和“莱因哈德行动”集中营的不同点。奥斯维辛最为臭名昭著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博士是在1943年春季来到这里的，当他对双胞胎和侏儒的“研究”连同集中营其他罪行一起被揭露出来时，全世界都为之震

惊。他在工作中得到了一些囚犯的协助，威廉·布拉塞是其中之一，1940年时他二十一岁，作为波兰政治犯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到了1943年，他成了集中营里服刑时间最长的囚犯之一。他接受过摄影师的训练，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德国医生正是想利用他的这一技能。他说：“我和门格勒博士谈过，他对我说，他会让女人去我那儿，犹太女人，双胞胎、三胞胎以及各种各样的人。他想要我拍摄她们的正面、侧面和背面的全身裸体照……这些女人感到非常羞愧和害怕，孩子们都被吓坏了，她们甚至都不敢互相交谈。她们看上去都是年轻的女性，正在长身体的女孩子——还没有被折磨到筋疲力尽。门格勒会把她们从运来的人群中挑走……我感到可耻，这是痛苦的、不愉快的……”威廉·布拉塞拍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照片：“他【门格勒】和我说，要从吉卜赛人营地送来一个水痘病人，我已经忘记了这种疾病的另一个学名了【坏疽性口炎，吉卜赛人营地的流行病】……他们送来了一个年轻的吉卜赛人，他的脸上有水痘，你可以看到整个下颚骨露了出来。他【门格勒】告诉我，必须从侧面拍摄，这样才能看到骨头……这些东西经常浮现在我眼前。战后我经常做噩梦，要么是有人从门格勒博士那里来，要么是他们在找我，把我拉去枪毙。”²

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医疗道德的堕落，门格勒博士的所作所为无疑在公众记忆中占据中心地位，对此不难解释，门格勒到奥斯维辛时三十二岁，相貌英俊，是一名得到过勋章的退伍老兵。毫无疑问，他很勇敢——曾因从燃烧的坦克中救出两名士兵而获得铁十字勋章——而且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幸存者经常会对他的制服和漂亮的靴子进行评论，他和那个淌着汗、红着脸的党卫军屠夫形象完全相反。

门格勒是个铁杆纳粹。1937年他就加入了纳粹党，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就表现出了对民族社会主义完全的忠诚。他也是一个狂

热的种族主义者，相信自己是优秀种族的一员。但他来到奥斯维辛之前并没有表现出肆意施虐的一面——正是在集中营里他展示出了这一面。他似乎很喜欢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无论是在“斜坡”上，还是在医院的营房里，他都有决定哪些囚犯去死的权力。

对门格勒来说，奥斯维辛就是一个大型的医疗游乐场。他可以按自己的想象设计出任何医学试验，以进行所谓“种族”研究。他特别感兴趣的是遗传学，以及基因是如何在家庭内部传递的——因此他特别热衷于在双胞胎身上进行试验。薇拉·亚历山大是一名“卡波”，负责照看门格勒挑选的双胞胎，她记得他们经常痛苦地叫喊着从门格勒那里回来。在和门格勒近距离接触后，她说她根本无法“理解他的残忍”³。门格勒博士在研究双胞胎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一旦在双胞胎之一身上完成了试验，两人都可以杀掉，他们的尸体将被解剖以进行比较。正如协助门格勒的囚犯米克洛什·尼兹利博士所说：“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到哪里可以找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死去的孪生子？”但在奥斯维辛“这样的双胞胎有几百对，进行这样的解剖也很方便”。⁴

门格勒并不是唯一在奥斯维辛进行医学试验的纳粹医生。例如，卡尔·克劳贝格教授和霍斯特·舒曼博士都在一栋配备特别设施的医疗大楼里进行绝育研究。为门格勒拍摄照片的威廉·布拉塞也拍摄了接受这些绝育试验的妇女在麻醉下的照片。这些妇女被放在一张特殊的妇科椅上，医生们“会扩展阴道，用钳子把子宫拉出来，我再拍照。不是拍整个人，只是拍生殖器和子宫。有几次我用的是彩色胶卷，在这边的暗室里没法冲印，我们没有冲印彩色胶片的暗室，得把它送到柏林……看到这些景象让我感到糟糕透了。我听说许多接受试验的妇女后来都用注射的方法杀死了”⁵。

卡尔·克劳贝格曾在哥尼斯堡大学担任妇科教授，和门格勒一样，

他也是一名坚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希姆莱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亲自批准他将奥斯维辛用作人类研究实验室。正如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党卫军对绝育相当感兴趣。克劳贝格在试验中向妇女注射了各种药物以阻止受孕。协助克劳贝格的斯洛伐克犹太人西尔维娅·维塞拉说：“这些妇女遭受了可怕的痛苦，发着高烧。我负责测量她们的体温，操作X光机等。”⁶

克劳贝格用的是注射方法，而他的同行舒曼博士则用给受试者大量辐射的方法。西尔维娅·维塞拉回忆说：“在她们身上进行了X射线强度对小肠影响的试验，那真是不堪入目。那些女人一直在呕吐，实在太可怕了。”⁷西尔维娅承认，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期间，她对痛苦变得麻木了：“如果你被打得很厉害，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你明白那种感觉吗？不，你不明白，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但是，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一旦你被狠狠地打过，不久以后你就不会再有感觉了，因为你已经麻木了。唯一可以拯救自己的办法……就是成为一个麻木的人。”⁸她自己也被迫接受了克劳贝格的一次医学试验：“我病了，他们在我身上做了一些试验……战争结束后我结婚了，不幸的是，尽管做过这些试验，我还是怀孕了，不得不进行一次非常令人讨厌的堕胎。医生对我说：‘够了！再也别怀孕了。’”⁹

对囚犯进行医学试验并不仅限于奥斯维辛，其他集中营的医生也参加了进来。战争开始后不久，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医生就让囚犯暴露在芥子气中，以测试其毒性。而一些最为臭名昭著的试验是在达豪集中营的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的主持下进行的，1942年，有的囚犯被关在密封的房间里，纳粹对他们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气压进行了测试。还有囚犯被扔进冰水中，以评估被击落的机组人员在冰冷的海水中能存活多久。

这些研究对于德国空军当然有价值，但空军里并非所有人都欣赏这种以性命换来的研究。1942年10月，当拉舍尔博士向航空部的高级官员介绍他的成果时，他感到在听众中隐约有些不安。就在会议之前，希姆莱在给拉舍尔博士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认为，那些宁愿德国士兵被冻死也反对人体试验的人都是大大的叛徒，我无法克制向有关当局报告这些先生的名字。”¹⁰甚至有证据表明，希姆莱要求希特勒批准这项研究。希特勒认为：“就国家的福祉而言，原则上必须接受人体试验。”¹¹

纳粹人体试验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之一，是拉舍尔博士为了让一名暴露在严寒中失去知觉的囚犯复苏，将他放在两名裸体的女性囚犯之间。提出这个想法的人是希姆莱，他认为“一名渔妇会把冻得半死的丈夫抱上床，用这种办法使他苏醒”¹²。

在达豪和萨克森豪森，许多接受医学试验折磨的囚犯都是非犹太人，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到1943年初，德国战前建造的集中营里只有不到四百名犹太人。¹³即便在奥斯维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门格勒博士可以挑选辛提—罗姆人，就像他挑选犹太人一样容易。对于门格勒这样的人来说，纳粹的意识形态可以为从灭绝犹太人到致命医学试验的一切屠杀行为辩护，这些行为都是某个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专业医疗人员是种族国家内生死的仲裁者。

奥斯维辛集中营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涵盖了许多不同的职能和目标，它们之间的界限有时是模糊不清的。那些波兰政治犯的命运正是如此，例如，塔德乌什·斯姆林茨基的个人经历说明了，在比克瑙的毒气室里，非犹太人的痛苦是如何与犹太人的痛苦联系在一起的。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时，塔德乌什十五岁。他和家人住在离奥斯维辛只有几英里远的扎托尔。德国人不让波兰人接受进一步的

教育，他被迫离开学校。1940年9月，他十六岁的时候，被送到德国去强迫劳动，但是到11月，他逃跑了，逃到了克拉科夫一位姑妈那里。五个月后，他心想德国人已经忘记了他，于是回到了扎托尔的家，然后开始主动反击德国人。他帮助人们偷渡德占上西里西亚和普通政府辖区之间的边界，还印制谴责德国人的传单。1943年12月，他想出一个计划来帮助关在附近营地的波兰人，第一步是把几张面包配给券交给一位朋友。“他正打算买些面包，”塔德乌什说，“趁党卫军不在的时候把面包送给囚犯。我把这些配给券给了他。不幸的是，他好喝酒，并在奥斯维辛火车站卷入了一场争吵。他被捕后在他身上搜出了这些配给券。他后来告诉我，当时他遭到殴打，别无选择，只能交代说我已经逃离德国，曾经散发传单并对逃犯提供帮助。”¹⁴

塔德乌什被逮捕并送到梅斯沃维采监狱——那是一个“殴打和逼供”囚犯的地方。在那里，他签下了德国人摆在他面前的供词，因为“否认毫无意义”。梅斯沃维采监狱要对犯人进行评估，以决定下一步送往何处。塔德乌什最害怕去的是奥斯维辛，因为他知道在主营地第11号楼有一个可怕的“警察法庭”。1944年的春天，他得知了自己的命运。他和其他五十多名囚犯被装上卡车，在骑摩托车的警察押送下离开监狱。“车队左转后，”他说，“我们知道要去的是奥斯维辛。大家都静静地坐着，想着自己的命运和家人，因为我们明白这是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他们抵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从刻着“劳动使你自由”的大门下走过，右拐后经过囚犯们居住的红砖建筑，直到第10号楼和第11号楼之间的围墙院落。在这里，来自第11号楼的一百多名囚犯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塔德乌什说，不久以后，“一名盖世太保指挥官，来自卡托维兹的法律博士，带着两个警官来到这里，司法审判开始了。每个人都被叫去

单独报告。我们得爬几个楼梯才能从院子走进楼里，然后在走廊里等着。轮到我时，我走进房间，被要求报告我的个人情况。他们宣读了所有对我的指控”。然后，他被告知归入三组囚犯中的一组。没有什么“审判”，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法庭”只是宣布每个囚犯应该归入哪一组。“他们[法庭的成员]要吃午饭和晚饭，所以这一切将会持续到晚上。”一旦所有囚犯的甄别结束，这三组中的第一组将立即被送往比克瑙毒死。其中有一名教师，和塔德乌什在梅斯沃维采同住一个牢房。塔德乌什说：“在他们走之前，他对我说，如果你能活下去，告诉波兰我们是怎么死的。”¹⁵第二组囚犯两天后也被送进毒气室。只有塔德乌什所在的第三组的少数囚犯获准住进营地。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历史上，毒死波兰政治犯并不罕见。例如，1944年2月29日，从梅斯沃维采送到第11号楼的一百六十三名波兰人和其他四十一名囚犯在第四火葬场一同被毒死。其中一位年轻的波兰女性，一到火葬场就对党卫军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即将死在毒气室里，这里早就不是秘密了，德国人总有一天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当他们进入毒气室时，波兰人唱起了《波兰没有灭亡》和《到街垒去》¹⁶。这提醒我们，这些人同样勇敢地面对死亡，而不仅仅是犹太人。

塔德乌什·斯姆林茨基对于自己在第11号楼的“审判”后没有立即被杀感到“惊讶”。他一旦进入了主营，好运就来了。有两名身份较高的囚犯都和他建立了特殊的私人关系。第一个是一名“卡波”。“那个人很明显在梅斯沃维采就知道我，那时我在各个楼间抱着罐子送食物。那人告诉我他会照顾我的安全，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让我在心理上更坚强。”

次日，塔德乌什遇到了第二个愿意帮助他的人。“他作了自我介绍，说我的父亲在当市长时曾和他一起工作过。他把当天的面包配给

了我，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他告诉我，‘别被他们杀了。在行进或集合时，记住不要站在队伍的四周，他们经常攻击站在那些位置的人，所以要坚持站在队伍的中间’。他离开之前再三叮嘱我‘别被他们杀了’，后来自己却没能幸免于难。从一开始我在心态上就十分积极，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塔德乌什很快明白，争取到在营地“内部”劳动是很重要的。在外面挖沟或修路的劳动队不得不在严寒或大雨中受苦，很少有人能坚持下去。塔德乌什被分配到一座大楼的建筑队里，主要在主营范围内劳动，因此避免了这一命运。

塔德乌什非常清楚奥斯维辛的功能之一是屠杀犹太人。有一次，半夜里他听到在大楼外面“一阵骚动”，于是他目睹了一场大规模屠杀，心灵受到了震撼。“我非常小心地透过窗户偷看，以免被人发现和处决。那些男人——都是年轻人和中年人——全都赤身裸体。他们被带到主营来，而家人都已经被毒死。他们被命令分成五人一组，但他们惊慌失措，每个人都想和兄弟、父亲或朋友在一起。带着狗的党卫军和‘卡波’们殴打他们，灯光照射着一群人的身体，这真是一幅可怕的情形。”他想象“如果我的父母被毒死了，而我还活着，这是什么感觉。这一定是一场可怕的经历——面对命运时的无助感，一个人无法做任何事来拯救自己所爱的人”。

他想不明白，党卫军怎样能一面在他面前干出这样骇人听闻的暴行，一面还自认是文明人。在比克瑙，他听到“营地的管弦乐队演奏着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作曲家的名作，党卫军则坐在火葬场里，孩子、母亲、女人、男人都在化为灰烬，而他们只是坐在那里无动于衷。现在，我觉得他们很高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准备参加一场文娱活动，他们没有感到任何难过。比克瑙的风把死亡集中营上空的烟尘吹了过来，但他们只是坐着聆听莫扎特和其他人的作品。人类竟然可以干出

这样的事来……”这样的经历强化了他小时候形成的世界观。“作为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我曾经读过很多书，也听收音机，我坚信地球是被犯罪所包围的，人类有太多的邪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生活是毫无意义的。”¹⁷

但是，对于奥斯维辛的党卫军奥斯卡·格罗宁来说，营地里发生的事情至少还有些意义。1943年，他二十二岁，在集中营的经济部门工作，清点了从抵达的犹太人中剥夺来的财物。作为一名坚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他吸收了纳粹主义的要义：“我们对自己的世界观深信不疑，那就是，犹太人对我们有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一观念的表达就是奥斯维辛——犹太人使我们陷于苦难，这必须加以防止，绝不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要杀死德国国内的敌人——如果有必要就杀光他们。前线和后方的战斗是没有区别的——我们消灭的仅仅是敌人。”¹⁸

然而，信仰这些理论是一回事，而实际面对大屠杀则是另一回事。通常，奥斯卡·格罗宁不会感到恐惧，因为他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但是当看到屠杀的血腥场面时，他同样感到震惊。有一次，他看到在比克瑙露天焚烧的尸体：“火苗在向上蹿，‘卡波’告诉了我后面的焚烧的细节，非常恶心和可怕：当尸体开始燃烧时，会从肺部或其他地方产生气体，这些尸体似乎会跳起来，男性生殖器会突然勃起，他觉得这很好笑。”¹⁹但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格罗宁在营地的生活是舒适的——和他担任的其他岗位相比几乎是奢侈的。在奥斯维辛服役的三千名党卫军中，大多数人和他一样，自己的双手从来不用沾染鲜血，只有少数党卫军在火葬场里工作。对他来说，与杀戮保持“距离”是“关键的事情”，这使他能够以一种相对惬意的方式继续工作。²⁰他在业余时间喜欢参加体育活动，例如代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田径队参加跳高比赛。

因此，在许多方面，奥斯维辛对于党卫军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岗位。不仅没有战死的危险，而且吃喝都很好——大部分都是从到达的犹太人那里弄来的，还有机会发财。1943年，一名负责调查营地腐败的党卫军官员说：“党卫军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已经逾越了士兵应有的准则。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士气低落和残忍的寄生虫。检查他们的储物柜，可以发现大量的黄金、珍珠、戒指和各种货币。”²¹

但是，激励党卫军在奥斯维辛工作的不仅仅是发财的机会。正如奥斯卡·格罗宁所说的，他们被告知自己的工作对帝国的安全非常重要，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幕后主使，必须在这场战争中坚持战斗以阻止红军摧毁德国。因此，格罗宁和他的同事们始终致力于不分老幼大规模屠杀平民。

1944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就任总理十一周年纪念日发表了一次演讲，格罗宁应该会理解希特勒在这次演讲中所表达的观念背后的理由。希特勒选择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发表演说，再通过电台广播。柏林运动场上群众欢呼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什么好消息值得庆祝，所以在群众面前希特勒宁愿躲起来。在演讲中，他似乎仍然对英格兰——他一直这样称呼英国——站在苏联而不是德国一边感到困惑。“德国的胜利意味着欧洲的保存，”他宣称，“苏联的胜利则意味着它的毁灭。”根据希特勒的说法，问题在于，“伦敦的战犯”现在发现，他们无法“从作茧自缚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的“退路”已经被“犹太操纵者”切断了。希特勒说，他们在对付犹太人方面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所有国家一旦像英格兰那样献身于犹太人，就会死于这场瘟疫。除非它在最后一刻团结起来，强行将这些病菌从自己体内清除出去。认为有可能和他们和平共处，甚至指望把自己的利益和那个腐烂民族的发

醇物相调和,就和幻想人体可以接纳鼠疫杆菌无异”。²²

希特勒的世界观,正如他在这次讲话中所表明的那样,仍然是扭曲和残忍的。德国的不幸应归咎于犹太人,就像他们在1914年至1918年间破坏了战争一样,他们现在也在破坏战争。希特勒对此当然全都知道,唯一令他费解的是,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意识到他们被犹太人欺骗了。

当时究竟有多少德国人相信希特勒的这番鬼话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败以后,人们对希特勒政权的支持度正在下降。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一事实——连纳粹自己的报告都这样说。一份典型的报告称,公众现在“敢于公开批评元首本人,并用卑鄙刻薄的方式攻击他”²³。流行的许多笑话之一是,希特勒现在正在写一本《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续篇,名字叫《我的失误》(*Mein Fehler*)²⁴。当然,如果让盖世太保抓到了,惩罚将是严厉的。

然而,无论人们是否相信希特勒的言论,甚至可以说,无论人们是否相信德国会战败投降,来自东方“布尔什维克”们的威胁却是真实存在的。意大利人可以在战争中转变立场,接受盟军相对温和的占领。而德国人明白,他们在东线打的是一场“毁灭性战争”,红军正在步步进逼。如此看来,希特勒关于德国战败就面临“毁灭”的警告并非夸大其词,而更像是对未来的准确预测。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人似乎觉得除了继续战斗下去别无选择。正如希特勒的党卫军副官弗里茨·达尔格斯所说的,一个人没法“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下来”²⁵。

1944年5月26日,希特勒在私下和将军们谈话时强调了利用战争间隙同犹太人斗争的重要性。“通过清除犹太人,”他说,“我把任何革命的可能消弭于无形。当然,你可以对我说:‘好吧,你解决这事的

时候就不能更简单些——或者无法更简单，因为其他的事更复杂——但更有人情味一些？’先生们，将军们，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生死攸关的斗争。”²⁶

因此，对犹太人的战争仍在继续，并且愈演愈烈。意大利的投降，再加上对整个法国的占领，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国安全部队的变动，使得德国人在一些占领区驱逐犹太人的能力得到了加强。1943年12月，约瑟夫·达尔南被任命为法国警察总监，标志着德国人打算对法国犹太人迅速下手。²⁷达尔南是法国亲德的民兵组织“米利斯”的头目，他之前就加入了党卫军，获二级大队长（少校）军衔。这意味着到1943年底，一名党卫军分子控制了法国的警察部队。遭到驱逐的法国犹太人的数量激增——从1944年1月20日至8月17日，有近一万五千名犹太人被送进奥斯维辛。²⁸所有之前法国警察用来保护犹太人的借口都被扔到一边了。

1944年初，艾达·格林斯潘是一名十来岁的犹太人，她躲在法国西南部的勒热纳村。当法国警察来抓她时，她感到震惊。“我不明白，”她说，“我还以为他们是德国警察，我不知道来抓人的正是法国警察。所以当它们来时，我说：‘法国警察怎么能逮捕像我这样出生在这里的法国女孩？’我蔑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忍住了眼泪，我不想哭，我保持坚定。”²⁹

当她来到奥斯维辛以后，同样的意志力使她挺了过来。“你必须适应那种生活方式。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必须适应睡在那样的条件下，必须努力工作，必须适应不停地被人呼来喝去，穿得也很差。如果你精神能适应，身体就能跟上，如果你精神适应不了，身体也就跟不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比三十五岁或四十岁的人过得好很多的原因。四十岁在这里已经是最大的了。在我们这些年轻人身上，生存的

意志更强烈。”

她来这里不久，其他囚犯就告诉她“这里有毒气室”，但看上去周围不可能有这样的地方。“没有人信他们，”艾达说，“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信他们，这完全不可能。我们说他们不是在开玩笑就是疯了。”只有在她闻到了来自比克瑙火葬场的有毒气味后，她才“终于”相信了这样的说法：“也许他们关于气味的说法是对的，那里真的是在烧人。”

艾达说，当她在集中营里生活时，从来没有过“为什么是我？”的感觉。她始终很清楚谁是有罪的，应当为她的被捕和最后的痛苦负责。直到今天，作为一名骄傲的法国女性，她从未忘记过她的同胞们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³⁰。

尽管来自欧洲沦陷各地的犹太人正在比克瑙的毒气室中死去，今天我们称之为大屠杀的整个体系也早已建立，但总体情况仍然是十分复杂的。比如说，虽然波兰的大多数隔离区都已经被清空，但仍有一个例外，比如罗兹隔离区，那里仍有大量的犹太人幸存。这再次说明，大屠杀的实施方式在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1944年初，仍有超过七万五千名犹太人居住在罗兹隔离区，因为瓦尔特高的地方长官阿尔图尔·格赖泽尔说服希姆莱，犹太人的劳动成果证明了应该把他们留在那儿。

犹太隔离区的领导人莫迪凯·哈伊姆·罗姆科夫斯基想尽办法来取悦德国人。他所做的最为声名狼藉的一件事就是，在1942年9月把数千名最为病弱的犹太人交给了德国人。9月4日，他在隔离区发表讲话：“我从未想过，我会被迫亲手把牺牲品送上祭坛，在我的晚年，还必须伸出手去乞求：兄弟姐妹，把他们交给我吧！父亲母亲们，把你们的孩子交给我吧！”³¹罗姆科夫斯基之所以说这些话，是因为纳粹告诉他，

他们想减少隔离区里“无用的食客”，而且，由于孩子不能工作，在纳粹的眼里，他们也是“无用的”。当听到孩子们要从父母身边被带走并被遣送出隔离区时，听众们的反应是“可怕的哀号”。罗姆科夫斯基所说的还不仅仅是孩子，病人也要离开。他说：“隔离区里有许多病人只能再活几周，甚至几天。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邪恶，但我必须说：‘把病人交给我。在他们原来所处的地方，我们可以拯救健康的人。’”³²罗姆科夫斯基恳求隔离区的居民能够“冷静地思考”，设身处地为他考虑，然后，“你就会明白，我别无选择”。³³

许多听他讲话的人对此完全不以为然。“我听到那个演讲时十七岁，”露西尔·艾肯格林说，“我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向父母索要孩子，到现在还是无法理解。人们都在喊：‘你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怎么做得到？’”³⁴雅各布·泽贝斯坦是另一个听到过演讲的犹太人，他也对此深感愤怒：“罗姆科夫斯基是个懦夫，在送走孩子之前他应当自杀。”³⁵

当犹太警察来抓孩子和病人时，可想而知，这些场景是多么撕心裂肺。约瑟夫·泽尔科维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孩子用两只小胳膊抱住母亲的脖子，这无济于事；父亲躺在门槛前，像垂死的牛一样嚎叫，‘除非跨过我的尸体，你才能带走孩子’，这无济于事；老人把瘦骨嶙峋的胳膊紧贴在冰冷的墙壁和床上说，‘让我静静地死在这里’，这无济于事；老妇人俯伏在他们的脚下，恳求道，‘我的孙子都已经和你们一样大了’，这无济于事；病人把发烧的脸颊埋在被汗水浸湿的枕头里，流下了最后的眼泪，这也无济于事。完全没有用，警察必须完成他们的任务。”³⁶

在犹太警察的协助下，德国安全部队的表现极为残暴。一位母亲拒绝交出她四岁的女儿，纳粹给了她三分钟时间重新决定，但她仍然拒

绝执行命令，结果她和她的女儿都被枪毙了。³⁷

埃斯特拉·弗伦基尔是一位在隔离区当局工作的年轻女性。她记得，当孩子们被从父母手中抢走时，他们的尖叫声“响彻天空”。她自己在隔离区中还算幸运。虽然她没有孩子，但她得到了十份释放表格，这些表格将拯救十个孩子或病人的生命——她可以选择把它们交给谁。就和参加这一行动的犹太警察一样，隔离区工作人员也可以拯救他们自己的亲人。她说：“我也有个很亲密的家庭，我有一个叔叔，我必须得救他，他有个孩子。我对自己的家人肯定要更亲密，我得把他们都照顾好，这些表格我首先必须考虑自己的亲人……这些悲惨的事让人哭泣，但当到处都在哭泣时，人们只能优先考虑自己的处境。”³⁸

只有少数犹太人能够拯救自己的家庭——而这些受益者往往就是负责带走他人子女的人——这一事实引起了普遍不满。当时犹太人记录编辑的《罗兹隔离区年鉴》写道：“以这种方式被免于驱逐出境的人，他们没有为社会做出任何贡献，甚至没有在这里从事任何有特别价值的工作，我们再说一遍，他们靠的仅仅是关系。”³⁹

雅各布·泽贝斯坦发现，他的母亲即将被驱逐出隔离区内的一家医院。他急急忙忙地跑到医院，发现两名犹太警察站在门口。幸运的是，其中有一位犹太警察叫罗密克，是他的朋友。他们一起进了医院，雅各布开始喊：“妈妈，妈妈！”医院人满为患，很难找到她。但最后，他听到从锁着的门后传来母亲的叫声：“这里！”雅各布打开门，里面拥出一大群人。“我抓住母亲奔向二楼，因为犹太警察开始跑过去把所有人都赶回房间。”他想通过罗密克用手表贿赂一名把守医院大门的德国警察，但遭到了拒绝。于是，“唯一的出路”只剩下窗户，母亲紧紧抱着雅各布，他从铸铁水管上爬了下来，把母亲带回了家。然后，雅各布说，他们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盛大庆祝”⁴⁰。

虽然隔离区里的人不能肯定孩子和病人要被送去杀死，但他们知道某种可怕的命运在等待那些人。毕竟，他们觉得纳粹没有理由要照顾孩子和病人。为此，留在隔离区中的人——特别是孩子的父母——因他们所爱的人被迫独自承受痛苦而深受折磨。

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集中营的消息传到了隔离区。1944年初，雅各布·泽贝斯坦已经得知了奥斯维辛的一切。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遇到了一个波兰木匠对他说：“我曾去过奥斯维辛。”雅各布“并未在意，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奥斯维辛，径直走了过去。在回来的路上，他拦住我说：‘你知道奥斯维辛吗？’我说：‘奥斯维辛在哪里？’他说：‘离克拉科夫不远。你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吗？他们在毒死犹太人。’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曾在那里待过，我在那里当木匠。’当然，对我来说，这种震惊是前所未有的。”雅各布急忙求见罗姆科夫斯基，把这一情况向他报告。罗姆科夫斯基扇了雅各布一巴掌，“对我大叫道：‘我要把你从隔离区送出去，如果你对任何人说了一个字，我就把你从隔离区送出去。’”⁴¹

1942年9月驱逐事件之后，隔离区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但纳粹的一场权力斗争却在这里悄然涌动。阿尔图尔·格赖泽尔想把犹太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目的是出于个人的贪婪，因为隔离区是他的财源。甚至连隔离区里的工作人员，比如埃斯特拉·弗伦基尔，都知道直接掌管隔离区的纳粹官员汉斯·比伯在向格赖泽尔行贿。“比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埃斯特拉说，“他只要给上峰送礼，就可以继续让隔离区存在下去，他也可以继续在这里作威作福。”⁴²

1943年，希姆莱想把这个隔离区变成集中营，以此来达到控制它的目的。但他不仅遭到了格赖泽尔的反反对，还遭到了德国国防军的反对。

国防军认为，隔离区是一个有用的劳动力来源。格赖泽尔的部下一度提出要求希姆莱为移交隔离区支付一笔巨额费用，但遭到对方拒绝。⁴³ 谈判一直拖到1944年5月，希姆莱终于失去了耐心，下令关闭隔离区。很快，外部因素就使得关闭隔离区不可避免，次月，苏联红军取得了重大进展，兵锋直指罗兹。6月23日，犹太人被分为十批送往四十英里外的海乌姆诺，第一批约七千人——那里的毒气车专门用来屠杀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

1942年，在“莱因哈德行动”死亡集中营建立之后，从罗兹和波兰其他的地方抓来的犹太人不再送往海乌姆诺，这里的固定设施都被拆除了。为了抹掉犯罪痕迹，当时村内用来停放毒气车的大宅子也一起被炸掉了。现在，屠杀又要重新开始，党卫军指挥官汉斯·博斯曼不得不重新考虑整个屠杀过程。他们决定不把毒气车停放在村子里，而是转移到先前埋尸体的森林里。他们建造了营房，将其伪装成一个更大营地的一部分，附近还建有一座焚尸炉。1944年6月，第一批来自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抵达这里，他们被带到村里的教堂过夜。第二天，他们被分批转移到森林中的营房——每批的人数是根据森林里的毒气车数量决定的。犹太人在营房外集合时，纳粹告诉他们将去往德国的某座城市劳动。这一次的欺骗要比以前更为小心，这座城市的名字要和犹太人离开罗兹隔离区时被告知的目的地一致。然后，党卫军说，犹太人必须在消毒室接受医学检查和消毒，所以必须脱掉衣服。进入营房后，一名身穿白衣的党卫军假扮成医生检查后，犹太人被引到一个他们以为是消毒室的地方，实际上那里是毒气车的后车厢。“门被关闭，锁住并闩上。”海乌姆诺的犹太特别劳动队队员西蒙·斯雷布雷尼克说，“引擎启动了。废气通过一根特殊的排气管进入货车车厢，毒死了车里的人……车里不停地传来尖叫声和敲门声……当尖叫声停止后，货车开

动了，尸体被送进焚尸炉。”⁴⁴

少数犹太人没有立即被杀，纳粹要他们写明信片给隔离区，假装他们已经在德国。写完之后，他们也被杀死。这个险恶的伎俩似乎奏效了，“收到了三十一张明信片，”《罗兹隔离区年鉴》1944年7月25日那一条写道，“所有明信片盖的都是1944年7月19日的邮戳，幸运的是，从明信片上可以看到人们过得还好，重要的是家人一直都在一起……隔离区很高兴，希望从其他所有重新安置的工人那里也能收到这样的消息。”⁴⁵

在纳粹看来，毒气车作为一种杀人工具有许多优点，主要是它们可以迅速部署，但它们也有弱点——最明显的是，它们无法进行大规模屠杀。1942年春天的情况就是如此，毒气车在杀人数量上比不过贝乌热茨、索比堡等固定毒气室，现在依然无法和奥斯维辛相比。党卫军意识到，要杀死罗兹隔离区剩下的犹太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计划改变了。向海乌姆诺的驱逐在7月15日停止了，当8月驱逐行动重新开始时，罗兹隔离区犹太人的目的地已经不是海乌姆诺，而是奥斯维辛—比克瑙。⁴⁶

那年夏天，来自罗兹隔离区的七万多名犹太人来到奥斯维辛，其中包括马克斯·爱泼斯坦和他的母亲。⁴⁷“隔离区并不好，”马克斯说，“我不想为那里辩护，但至少那里还是家园，还有家庭……虽然可怜，但总还有些乐趣。”⁴⁸仅仅过了“二十分钟”，马克斯就意识到奥斯维辛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他说：“这种气味就像烧焦胶片或头发一样，你知道，就是那种有机物的气味。所以，很明显【党卫军在杀人】。”由于马克斯这批人中有专门修理通信设备的熟练工人，他们在抵达时没有进行挑选，而是直接进入了营地。

马克斯回忆道：“我和妈妈坐在一起，他们给我们拿了水。现在隔

离区伤寒流行，所以我们从来不喝生水。我对母亲说：‘我想这不是开水。’她歇斯底里般大笑起来，我想她是觉得有我这么个傻孩子，还在担心是不是开水。坐在周围的人都以为她是听说了火葬场的事，因而发疯了。”⁴⁹ 马克斯的母亲被送到了比克瑙妇女隔离营。当他看到母亲离开时，感到“心烦意乱”，但他并没有“开始尖叫”。他意识到，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否则我活不过两分钟”。随后，他隔着铁丝网对母亲喊道：“你为什么哭，为什么哭？反正我们都要死了，那又有什么用呢？”

马克斯和他的母亲很不寻常，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罗兹隔离区被送往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大多死在那里——包括莫迪凯·哈伊姆·罗姆科夫斯基，到头来，他所有的妥协合作，所有的阴谋诡计，都没能把他从毒气室里救出来。可是，除了屈服于德国的要求外，他还有别的现实选择吗？华沙的同僚亚当·切尔尼亚科夫在犹太人被逐出隔离区时自杀了，但这对于他的犹太同胞毫无帮助。

罗姆科夫斯基是否应当因热衷于与德国人合作而受到批评，这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犹太同胞的个人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尤其是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侵犯年轻的妇女。战前，当他经营一所孤儿院时，就曾有过此类传言。一旦他在隔离区拥有权力后，他就可以无所顾忌地侵犯女性。⁵⁰ 露西尔·艾肯格林清楚地记得在她十几岁的时候遭到罗姆科夫斯基的“猥亵”。她觉得如果不让他为所欲为，“她的生命就会危在旦夕”，因为他有权将她驱逐出境，他利用了她的脆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⁵¹ 其他犹太人也能证明罗姆科夫斯基是一个性侵犯者。⁵² 他对自己庇护下的犹太人进行虐待，这是一种可怕的罪行，如果他活着，就应当被追究责任。

1944年夏天，当来自罗兹的犹太人抵达奥斯维辛—比克瑙时，集中营关押了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包括意大利、比利时、波兰、德国、

荷兰、法国、斯洛伐克和希腊，甚至还有来自海峡群岛的犹太人。但是，在1944年间，一个从特定地方驱逐过来的难民在集中营里占了大多数——这个地方就是匈牙利。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数十万名匈牙利犹太人在比克瑙被杀害，这段历史成为大屠杀无与伦比的梦魇。

17. 匈牙利的灾难(1944)

1944年2月末,希特勒离开了东普鲁士幽深森林里的司令部,前往巴伐利亚南部山区贝格霍夫的家中。他的这一变动体现了此刻德国的战争形势——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在空袭下已经不再安全,需要进行强化。在这项工作进行时,他回到了家,自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十分喜爱这里的景色。

当希特勒站在贝格霍夫山庄的阳台上时,他可以远眺温特斯山。传说中,勇武过人的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仍然在这里沉睡。然而现在,希特勒征服一切的梦想已经变得十分渺茫。国防军正在败退,乌克兰的铁矿被放弃了,从罗马尼亚进口石油也遭到了威胁。1944年2月底,美国人对德国工业基地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轰炸。这些后来被称为“大礼拜”的空袭不仅摧毁了重要的工厂,还证明了德国的防空体系完全无法抵抗盟军的进攻。

不过,希特勒至少还剩下自信心。3月初,戈培尔前往贝格霍夫,尽管有这些挫折,他发现他的元首“轻快而放松”——可以说是很乐观。希特勒说,东部的战线缩短了,这对德国有利;另外,他“绝对确信”,未来盟军在法国的登陆将被击退,之后德国士兵可以从西线转移到东线

开展新的攻势。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元首的这些预言是正确的。最近，我们经常感到失望，以至于内心充满怀疑。”¹

和以前一样，希特勒愤怒的矛头直指犹太人。在与戈培尔会面的前一周，他在慕尼黑皇家啤酒馆的大厅对纳粹领导人发表演讲，庆祝纳粹党成立二十四周年。他承诺，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也将像德国犹太人那样被“粉碎”，周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²现在，回到贝格霍夫，他又一次向戈培尔提起了来自麻烦盟友的问题——首先是芬兰。希特勒一直认为芬兰很不可靠，随时想和意大利一样退出战争。他和戈培尔都很清楚，芬兰比起意大利来更不愿意在驱逐其国内犹太人上进行合作。德国政府没有向芬兰施加特别的压力，因为他们已经清楚芬兰不同意德国有关全面“解决”芬兰“犹太人问题”的要求。虽然芬兰已经将几千名苏联战俘移交给德国人，其中一部分犹太人，还有八名非芬兰的犹太难民，但芬兰其余的犹太人——不到两千人——仍安全地生活着。此外，芬兰没有制定任何反犹太主义的法令，犹太人甚至在芬兰军队中服役，对苏联作战。在纳粹看来这是一种荒唐的逻辑：犹太人和德国人并肩作战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而纳粹认为正是犹太人在支持这一主义。³

希特勒明白，和犹太人问题一样，他对于芬兰退出战争也无能为力。⁴用军事手段去强迫芬兰当然是不值得的，但是，正如他对戈培尔所说的，不是每一个倔强的小伙伴都一样，匈牙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匈牙利不像芬兰，那里有大量的犹太人，还拥有对德国人来说有价值的原材料、食物储备和其他物资。因此，当匈牙利人企图和芬兰一样退出战争时，希特勒决定和匈牙利领导人霍尔蒂上将来一手硬的，占领这个国家，夺取德国人需要的一切，并一劳永逸地解决匈牙利犹太人。

1944年3月18日，希特勒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克莱斯海姆城堡会见

了霍尔蒂。霍尔蒂本来以为希特勒准备和他商讨从东线撤回匈牙利军队的事宜，但他错了，希特勒完全意不在此。他们一见面，希特勒就开始长篇大论。他说，他知道匈牙利一直想背叛与德国的同盟，并声称匈牙利最好是为战争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不是减少。正如希特勒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匈牙利政府的问题在于拒绝处理国内的犹太人问题，在当前敌人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德国不能容忍这种威胁存在于卧榻之旁。因此，希特勒说，他将立即下令占领匈牙利，要求霍尔蒂对此表示同意。霍尔蒂拒绝了，并开始与希特勒争吵。霍尔蒂称，他宁可辞职也不签字。希特勒威胁他，说这样就不能保证他的家人的安全。霍尔蒂愤怒地离开了房间。

德国人用各种手段阻止霍尔蒂离开——一会儿假装电话线中断，一会假装城堡遭到空袭——最终，霍尔蒂被说服同意德军进入匈牙利，并驱逐十万名犹太人。第二天，3月19日，德国军队占领了匈牙利，两天后，阿道夫·艾希曼被派往布达佩斯，准备实施对犹太人的毁灭行动。

虽然希特勒认为肯定是犹太人削弱了匈牙利的战斗意志，但纳粹占领匈牙利并非完全是为此报复犹太人。纳粹从匈牙利获得了大量的实际利益，不仅是原材料和军事上的好处——苏联红军已经越来越接近匈牙利边境——而且还有匈牙利犹太人的财富。不仅可以抢劫他们的财富，身体健康的人还可以用来强迫劳动。匈牙利有大量的犹太人，这对纳粹来说似乎很有吸引力。

对于匈牙利犹太人来说，德国的突然占领虽然令人不安，但还不至于意味着灭顶之灾。“我能看到父母脸上的恐惧，”居住在匈牙利南部的少年伊斯雷尔·阿贝莱斯说，“我可以看出来整个气氛都变了，也许会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虽然我们希望这只是一次军事调遣，犹太人不会受到影响。”他在报纸上看到，“为了把战争继续下去，德国人必

须占领匈牙利。我们以为这不会影响犹太人。这就是希望，充满希望的一面。我想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和绝望的两面总是在头脑中交替闪现。”⁵

尽管德国占领了匈牙利，但艾希曼知道，如果没有匈牙利当局的支持，就不可能将犹太人驱逐出境。艾希曼研究了在丹麦发生的情况，懂得缺乏当地人的帮助会带来巨大的困难，因此必须寻求匈牙利行政当局和警察的帮助。德国人如愿以偿，匈牙利前驻柏林大使斯托杰伊·德迈在得到德国人首肯后被任命为新总理，并且负责处理犹太人“问题”的两位国务秘书都是反犹主义者。其中之一的恩德雷·拉兹洛对纳粹极为热心，他和德国人密切合作，对犹太人实施了一系列的限制性措施，比如禁止他们拥有汽车和电话，强迫他们列出所有的贵重物品。同样热衷于协助纳粹的还有匈牙利宪兵司令费伦奇·拉兹洛⁶，艾希曼很快就和他打得火热。

艾希曼非常熟悉匈牙利近年来的反犹主义背景。匈牙利的反犹主义者和德国、奥地利的一样，也指责犹太人盘踞在媒体和关键职业中，指责他们和可恶的共产主义之间有关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匈牙利曾有过一个短暂的共产主义政府，犹太人出身的库恩·贝拉是它的领袖。

尽管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有许多反犹分子愿意配合，艾希曼还是明白眼前任务的巨大困难。纳粹认为失败的风险很大，犹太人会不会知道他们都将送往奥斯维辛，在那里大部分人——尤其是病弱的人——都将被杀害？他们会不会竭力躲藏甚至反抗？艾希曼知道华沙隔离区的先例——如果布达佩斯也发生类似事件，那该怎么办？

这是艾希曼第一次执掌现场行动，之前他都是在柏林的办公桌上发号施令，他决心避免重蹈丹麦和华沙的覆辙。为此，他不仅确保恭顺

的反犹主义者在匈牙利新政府中牢牢握有政权，还采取了行动安抚那些为自己命运焦虑不安的犹太人。首先，纳粹要求犹太领袖们成立一个公会。3月31日，艾希曼在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办公室会见了新公会的四名成员，告诉他们，虽然将对犹太人采取措施——例如，佩戴黄色“大卫星”——但只要他们表现良好，就不必担心会发生什么。他说：“犹太人必须明白，除了纪律和秩序之外，对他们没有其他任何要求。如果犹太人遵守纪律和秩序，那么不仅不用害怕，还将得到保护，在薪酬和待遇上享受和其他劳动者同样的条件。”⁷

艾希曼的话似乎很好地抚慰了犹太公会。也许针对犹太人的限制性措施说明德国人并不想杀死他们，而是想寻求长期的和平共处。简言之，如果只想杀死犹太人，为什么还要让他们佩戴黄色“大卫星”标记呢？这当然是阿贝莱斯这样的犹太家庭所希望的解释。“几天后，他们就出台了限制措施。”他说，“我们想，好吧，这还算可以忍受。因为我们知道战事对德国人来说并不妙，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听着——我们从小就在犹太人的历史中接受了深刻的教育，知道在很多地方，犹太人因自己的出身而世代受苦。我的意思是，最初的反犹主义起源于犹太人不认可耶稣是救世主，这种对犹太人的敌意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因此，我们对自己受到歧视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这只是一个多大程度的问题。”⁸

艾希曼继续从纳粹在其他地方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不打算展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而是化整为零。他准备先从匈牙利东部的犹太人开始，那里远离布达佩斯。这样做有两个好处：首先，可以用军事上的借口来对付最接近前线的犹太人；其次，避免在布达佩斯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这样的艰巨任务，因为犹太人在城市比在农村更容易藏匿。

到4月底，匈牙利东部的犹太人——包括许多被匈牙利侵占土地

上的犹太人——都被强迫搬进了隔离区。近二十万人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被关进隔离区或临时搭建的营地内，如果没有匈牙利宪兵的协助，这样高效的行动是无法想象的。

根据当初纳粹和匈牙利人达成的协议，德国将遣送十万名犹太人，但隔离行动一旦开始，匈牙利人自己就开始想方设法让所有犹太人都离开。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被选中进行强迫劳动的人走了之后，该如何应付那些剩下的人？就像在两年前的斯洛伐克一样，匈牙利当局希望德国人最好能把所有犹太人都带走，连同老人和孩子。

大部分在隔离区等待的匈牙利犹太人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尽管他们也曾听到一些风声。艾丽斯·洛克·卡哈纳一家生活在匈牙利西部，她记得有一个非犹太人对她说：“你知道吗？我们用你们来做肥皂。”“我说：‘是吗？那么在你用香皂清洗的时候，请记住那是我。’”后来，她“哭了”，觉得“他竟敢对我说出那样卑鄙可怕的话，简直太无耻了”。⁹但这种语言上的攻击还不足以说明他们将要被杀害。许多像伊斯雷尔·阿贝莱斯那样的犹太家庭仍然认为他们最有可能要进行“强迫”劳动。“这是最好的愿望，”他说，“家人们还会在一起，我们只需要再坚持几个月，战争就结束了。我是说，我们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被赶走的。”¹⁰

乍一看，匈牙利犹太人似乎不应该对自己落入德军手中会面临怎样的命运缺乏认识。1943年，作为苦力的几千名匈牙利犹太人从乌克兰屠杀的心脏地带回到家乡，他们肯定很清楚那里的情况。事实上，一位匈牙利作家证实，到1943年，“我们已经从东线回来的匈牙利士兵和犹太苦力那里听到了很多有关屠杀的消息”¹¹。

然而，不光是因为偏远农村的犹太人在认识程度上与布达佩斯的城市犹太居民存在差异，还因为许多人的脑海中仍然充斥着迷茫和幻

想，总是想办法去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合理化。例如，德国人在东线屠杀犹太人，也许这种政策只适用于苏联犹太人？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战事对德国不利，德国人屠杀犹太人就更没有道理，他们不是比现在更需要工人了吗？艾希曼当然乐于听到这些想法，所以他承诺遵守“纪律和秩序”的犹太人将得到安全保证。

犹太人确切知道的是，匈牙利宪兵和其他许多匈牙利人都在他们身上搜刮财富。伊斯雷尔·阿贝莱斯眼睁睁地看着宪兵搜查犹太人，拿走他们的“金钱和珠宝”。艾丽斯·洛克·卡哈纳的家人不仅失去了她们的房子，还失去了全部的生意——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名叫克吕格尔的非犹太人。“我非常窘迫，”她说，“我想到了‘走出埃及’的场景，克吕格尔先生看着我们走过，脸上没有同情，只有喜悦——他成了我们工厂的老板，我们房子的主人。”¹²甚至有报道说，在匈牙利其他地方，宪兵对犹太人施加酷刑，逼迫他们说出藏钱的地方。¹³

艾希曼驱逐匈牙利犹太人的核心问题在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角色。这个地方并不像“莱因哈德行动”集中营那样是纳粹“犹太人问题”的粗糙“解决方案”。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建筑群，为纳粹如何对付犹太人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多方面的答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地方的建筑给人以永久存在的印象，1943年又在比克瑙开设了四座新的火葬场，杀戮过程变得更为有效了。最近又出现了一些“改进”，一条通往比克瑙的铁路支线刚刚建成，新到的人可以直接从红砖岗楼的拱门下进入比克瑙营地。之前，下车的“斜坡”紧靠着奥斯维辛和比克瑙中间的铁路干线。随着比克瑙新的铁路支线建成，步行到火葬场和毒气室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奥斯维辛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花了四年时间，但比克瑙营地成为奥斯维辛乃至整个大屠杀的象征只是在这短短几个月之中——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党卫军拍摄的关于匈

匈牙利犹太人抵达比尔克瑙的照片在战争中流传了下来。

然而，比屠杀程序更重要的改变是奥斯维辛已经形成了一种概念，它不仅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工厂——人们到达那里几小时之内就化为灰烬——还是一台极为高效的人类分拣机。首先，匈牙利犹太人一到这里就要接受筛选，老人、儿童和其他看上去不健康的人将被直接送进毒气室；剩下的人通常要在“隔离区”关上几个星期，然后被分配到奥斯维辛或更远地方（通常是德国工业中心附近）的劳动营。那些在奥斯维辛附近营地劳动的人一旦被认为不再有用，就会被送回比克瑙杀害。

最终，希姆莱按照他的元首的意愿创造了一个实体机构，似乎解决了自灭绝进程开始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政策问题——如何把压榨犹太人的劳动力与消灭犹太人的意识形态愿望调和起来？在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上，海德里希曾说过要让犹太人在东方修路，从而让他们死去，但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细节却从来没有思考过。相反，那些想要使用他们的人和想要屠杀他们的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执。奥斯维辛不仅调和了这两个很难调和的目标——只要工人有稳定的替代来源——而且很安全地加以实现了。奥斯维辛没有发生起义的风险——比克瑙和主营的铁丝网外是广阔的安全地带，也就是所谓的“生产区”。在比克瑙内部，营地的各个部分都相互隔离。像素比堡和特雷布林卡那样大规模的逃亡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奥斯维辛以及为各种工业服务的子营网络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一旦囚犯进入这个世界，他们就要在那里生活、劳动，直至死亡——每一个阶段都在党卫军的控制之下。奥斯维辛已经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统治的实际体现，正是这一点让它成为大屠杀最具意义的象征。

1944年7月，伊斯雷尔·阿贝莱斯亲身体会了奥斯维辛给匈牙利犹太人带来的冲击。他和家人从匈牙利西部坐了几天的火车抵达奥斯

维辛，火车沿着新建的支线，从警卫楼的拱门之下直接驶入了营地。车门打开后，每个人都被命令下车。他说：“我们被要求空手下车，把行李留在车上——行李将在稍后分发。”他记得虽然“一切都进行得很快”，但整个过程井井有条。“出来接待我们的囚犯带来了水，”他说，“所以口渴的人都可以喝水。”他认为这是为了让新来的人不至于感到“恐慌”，“我们问他们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说这里是个劳动营”。¹⁴

“斜坡”上的特别劳动队队员帮着把犹太人分成两组，“他们说孩子和母亲应当排成一组”，男人则排成另一组。“我看到十一岁的小弟弟和我的母亲一起过去了，他还是个孩子，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我和父亲、哥哥一起，站在一个长相英俊的德国军官面前，哥哥当时十六岁，德国军官看着我，用德语对我说：‘你多大了？’我回答说：‘我十四岁了。’”伊斯雷尔又补充说，他几天前刚过了生日。“那个军官笑了笑，用德语说：‘生日，很好，你和你的哥哥去那边。’我父亲想跟着我们，军官对他说：‘不，你走这边。’只是用一根小小的警棍客气地指了指。”

伊斯雷尔·阿贝莱斯记得，党卫军希望“所有人”都“放下心来”，这样他们就不会制造“任何麻烦”。他说：“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保持速度，就像在工厂的传送带上一样，整个传送系统不应该出任何故障。”当他看到这一切时，“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要在这里劳动——和其他人一样。我看到了那些犹太囚犯，[心想]我们会成为和他们一样的囚犯，被派去附近的某个地方劳动”。至于他的母亲、父亲和弟弟被选去另一组，他“认为他们也会没事的，只是去了不同的营地”。毕竟，在“斜坡”上遇见的犹太囚犯就是这么告诉他的，“他们要去另一个不同的营地”。

伊斯雷尔在比克瑙待了大约三个星期后，一件偶然的事情使他肯定，他的母亲、父亲和弟弟都被杀害了。在8月2日的晚上，他听到了

“尖叫声、哭泣声……还有狗叫声”，这些声音来自吉卜赛人营地的方向，靠近他自己的监狱营房。“到第二天早上，营地里连一个吉卜赛人都没有了”，一夜之间，整个吉卜赛人营地被清空——约有两千八百名辛提—罗姆人被杀。“然后我开始意识到，”伊斯雷尔说，“他们这样对待吉卜赛人，也会同样地对待我们——也许已经那样做过了。渐渐地，我们想到，是的，那些不能劳动的人，都进了毒气室。”

1944年的整个夏天，伊斯雷尔都住在比克瑙的一个区里，他称之为“劳工池”。纳粹定期到这里来挑人，送到奥斯维辛或纳粹帝国的其他地方劳动。伊斯雷尔知道比克瑙有毒气室，他渴望“逃离奥斯维辛”。每次党卫军来挑选工人，他总是很积极地要去。但他没有被选中，他太小了——看上去都不到十四岁——更年长和强壮的人总是排在他前面。

伊斯雷尔变得越来越焦虑。他一直没有被选中，而且越来越虚弱。“每天都有配给食物——但根本不够，完全是在忍饥挨饿。除了对死亡的恐惧之外，饥饿的感觉压倒了一切。饥饿感是如此强烈，掩盖了任何其他的感觉，任何人类的感觉……你就像变成了一条正在觅食的狗。”¹⁵

在比克瑙待了三个月后，他遇到了一件新的可怕的事情。就在他的小屋外，德国人安装了一根测量杆。那些达到身高要求的人将被送到一个组，低于这个身高的人被送到另一个组。伊斯雷尔“达不到”要求，所以他被分到没有达标的那一组中。这些人主要是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孩子，他们最初在“斜坡”上的筛选中尚能幸存，就像伊斯雷尔所说，“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总有人处在筛选的边缘”。

伊斯雷尔和其他人“被告知要去儿童的营地，在那里他们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不相信”。这一组中的其他人也不相信，但是，“我想他

们当时已经完全绝望了，他们只是说，反抗是没用的，我们放弃了，诸如此类。有的人走到电网前自杀了，他们只是不想那样活下去……他们放弃了，活着没有意义。我想说的是，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形，一个在家庭中好好活着的人，突然被扔进了十八层地狱……亲人被送进了毒气室。这不是逐渐改变的，而是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令他们无法承受。根据我的经历，人们对此并没有歇斯底里，而是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宿命。没有什么叫喊声，也许在晚上，他们被送进毒气室时，我听到过一两声叫喊。恰恰相反，有什么可喊叫的？向谁喊叫？你只能接受你的命运。难道一个被关在牢房里的人会整夜地喊叫？我不这么认为”。

为了活下去，他趁着挑选过程中的混乱，径直“跑到了正确的那一边”，躲在那群已通过测量的人当中。但好景不长，在不久之后的一次筛选中，他没能成功。但最后他却得救了，因为他开始“哭泣”，向党卫军恳求说：“我适合工作，我可以工作。”一个“卡波”打了他一巴掌，让他闭嘴，但党卫军对“卡波”说：“哦，别管他，让他待着。”结果，“他把别人而不是我带走了。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能幸免……但这的确发生了。所以我有一种感觉，上帝注定要我活下来。那时我就有种强烈的感觉，不管怎样我都会想办法活下来的。在通过筛选之后，我总是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的意思是，我在这里要碰到一连串的好运气”。

不过，伊斯雷尔并不能完全相信是“上帝要他活下来”，他也得照顾好自己。“我和我哥哥在一起，”他说，“他比我大两岁，更会照顾别人……我做不到，我有点自私。举个例子，我记得有一天早上，一个男孩哭着说，他的食物在夜里被偷了，他太饿了。我记得哥哥给了这个男孩一块面包……我对他说，你为什么把面包给别人，你不需要这样做。哥哥说，‘他比我更需要面包’。这是我一直钦佩他的地方。”

靠着机智和运气，伊斯雷尔·阿贝莱斯活到了集中营被解放。但

是，尽管离开了纳粹的控制，他仍然被这段经历所折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几乎每天我都会因为某些原因失眠，我总是能看到那些[被选中而死去的]孩子的脸，想着他们在毒气室里，‘齐克隆B’被投了进来，他们再也不能呼吸了，在最后一刻，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当他们意识到自己会窒息时，心里在想什么？”

奥斯维辛的残酷现实让很多人放弃了他们的信仰。露丝·马蒂亚斯是另一名1944年被遣送到奥斯维辛的匈牙利犹太人，她说：“我被驱逐出境后立刻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我父亲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人，可他却冤枉了，还有那么多无辜的孩子也是。我亲眼看见，他们抓住了孩子们的脚，把他们往墙上撞，他们的头撞裂了……现在我相信宿命论了。”在奥斯维辛，她看到了传统的家庭纽带是如何濒临崩溃的。“我看见一个女孩打她妈妈，母亲什么也不吃，把全部的配给都给了女儿，而且只要母亲自己吃了一勺东西，女儿就会打她……母亲还护着她的女儿，对我们的干涉感到愤怒：‘别插嘴，我不饿。’”¹⁶

匈牙利犹太人发现，纳粹不仅让他们在奥斯维辛附近的工厂劳动，还把他们送到战前德国的领土上劳动。多年来，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将犹太人驱逐出这些地方。这再次表明，纳粹在实施“最终解决方案”时并没有绝对地遵循意识形态，这一政策的变通是出于现实，为的是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当然，和在奥斯维辛附近工矿劳动的犹太人不同，在德国劳动的犹太人是不会受比克瑙的毒气室威胁的。虽然他们中许多人仍会死于饥饿、疾病和殴打，但他们至少远离了奥斯维辛的生命轨迹。

正当匈牙利犹太人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受苦受难时，塔德乌什·斯姆林茨基正在一英里半外的奥斯维辛主营里挣扎求生。几周前

和他一起来这里的波兰人大部分都已经被毒死了，1944年7月初，他觉得现在轮到他了。午夜时分，党卫军命令他加入一队有数百名囚犯的行列，前往比克瑙。他说：“没人告诉我们要去干什么，行进时周围都是党卫军。我的一个朋友提议，如果他们送我们去毒气室，我们就袭击他们，被子弹打死总比在毒气室里闷死来得痛快。”¹⁷

但塔德乌什和其他人并没有去毒气室。他们在比克瑙的“斜坡”上被装进了一列火车，开到很远的地方，越过边境进入奥地利，抵达了一个几乎和奥斯维辛一样臭名昭著的地方——毛特豪森集中营，靠近奥地利的林茨，这是在整个德国最为恶劣的集中营之一。毛特豪森集中营于1938年夏天投入使用，从一开始就遵循和传统的达豪集中营完全不同的模式。第一个不同点就是，毛特豪森集中营的选址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营地旁边是一个巨大的花岗岩采石场，囚犯们被迫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劳动，沿着“死亡台阶”从采石场的底部向上拖石头。

战前，很少有犹太人被送到毛特豪森，那里的囚犯主要是纳粹声称的“不可救药的”罪犯或“反社会者”。但这种政策在1941年发生了变化，当时为了报复荷兰的抵抗行动，有数百名荷兰犹太人被遣送到这里，这批人大部分在几个星期内就死了。这段经历是如此可怕，以至于后来荷兰的纳粹以此威胁犹太人——如果他们不愿意去东方，那么就上这儿来。对于荷兰犹太人来说，来到这个奥地利集中营比去往未知世界更为恐怖。甚至纳粹自己也承认毛特豪森极为残酷。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将集中营分门别类时，毛特豪森被列入最严厉的一组。因此，尽管比克瑙的许多囚犯渴望被选中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仅仅如此并不代表他们的生存前景一定会有所改善。

毛特豪森在德国一系列大企业的利益链中位于核心位置——有些

企业是党卫军拥有的，有些则是私营企业。这座花岗岩采石场是由德国地球和石材公司 (DEST) 经营的——这家公司的投资者是党卫军。毛特豪森同时也为外部许多制造业公司提供劳动力，从军备制造到药品生产，因此而建立了数十个子集中营为这些公司服务，其规模和种类的复杂程度可与奥斯维辛匹敌。毛特豪森在另一个地方也和奥斯维辛类似——也拥有一个毒气室。毛特豪森的毒气室于1942年春天投入使用，大约和比克瑙的“小红屋”同时。这里的毒气室虽然比较小，但使用的毒药也是“齐克隆B”。尽管有毒气室，但毛特豪森从来没有把“最终解决方案”作为自己的主业，即便在其他地方的屠杀罪行达到高潮时也是如此。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运行期间，共有约二十万人被送到这里，其中波兰人最多，约有四万人。所有被送来的人当中，约有半数死亡，其中包括约一万四千名犹太人。¹⁸

“他们把我们带到了毛特豪森，”塔德乌什·斯姆林茨基回忆道，“毛特豪森的党卫军包围了我们的火车，同时，月台上负责押送的奥斯维辛党卫军拼命用脚踹、用枪托打我们，把我们赶下火车，好早点摆脱我们。我站在车厢的后面，看得清清楚楚，于是我加快了速度，离他们远远地跃出了火车，以免被他们打伤。我躲了过去。新的党卫军押送我们去往毛特豪森。此时正值破晓，住宅的窗户都关上了，但你可以看到窗帘被轻轻拉开一角，奥地利人紧张地注视着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抵达了集中营，它坐落在一座风景优美的小山上，可以远眺阿尔卑斯山脉——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而人们却在此遭遇悲惨的命运。”¹⁹

进入营地后，塔德乌什和其他人被要求脱光衣服，剃光头。“党卫军吃完早饭回来了，”他说，“他们开始检查排成队伍的囚犯。我们光着身子，他们沿着我们的行列走来走去，打我们的脸，打我们的肚子，踩我们的脚，我等着轮到挨打。我眼角的余光看到一个年轻的有着蓝眼珠

和金发的党卫军男子，可能也就二十岁出头。他向我这里迈了一步，我一直直视着他的眼睛，他也直视了我几秒钟，但他并没有打我，而是朝下一个囚犯走去，打了他。后来我的朋友问怎么可能他不打我，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男孩在想什么。”²⁰

塔德乌什发现毛特豪森的营地条件甚至比奥斯维辛主营地的还要糟糕，不仅没有足够的床睡觉，“房屋空间也很狭小，有大约六十人在夜里不得不站着。如果有人去上厕所，那么可以躺一会，等他回来又不得不站起来”。第二天早晨，纳粹命令他们在广场集合点名。“那天天气非常炎热，囚犯们将被迫站几个小时，那些中暑倒下的人都要被清理掉。我站在第一排，那些排队太慢的人都得挨揍，殴打越来越激烈，以至于排好队的人也挨了揍。我后脑勺突然受到一记重击，倒了下去。幸运的是，打得还不算太重，没有什么事。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奥斯维辛的]波兰囚犯对我说的话，让我不要站在队伍显眼的地方，不要让他们杀了我。”²¹

塔德乌什被分配到一支前往林茨的劳工队伍中，在毛特豪森西面十几英里的地方。他们要在那里兴建一座新的营地——这是该地区整个劳动营网络的一部分。虽然这里已经有了一两座木屋和铁丝网，但囚犯们不得不自己建造其他所有的东西。这项工作让人精疲力竭，塔德乌什以为他活不了多久。但后来，他听说要挑选几个人去厨房干轻松一些的活，“我们跑到厨房门口，厨师长和一名党卫军分队长站在那里，从大约六十个人里挑十个人。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已经挑了九个人，所以我只有一次机会。他们用德语问我的年龄、身体状况和职业，我用德语回答说我是—名面包师，被捕前在面包房工作。他们低声商量了一下，让我成了那第十个人。对我来说，那是战争中最快乐的时刻”。

由于进了厨房，他摆脱了营地里最糟糕的生活——主要是饥饿。

“[营地其他地方的]情况很糟糕，”他说，“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囚犯们因饥饿而晕倒，并走向死亡。有一次，我看到囚犯们拿着一碗汤，这碗汤看上去就像泥坑里的水……当他们走路的时候，汤溅到地上，和被踩过的雪混在一起……人们会去雪里舔汤水。这情景真是可怕。”

这些囚犯不仅受到纳粹的虐待，还处于盟军轰炸的危险之中。塔德乌什来到林茨的营地不久，美军轰炸机就把附近的军工厂当成了目标。炸弹突然在营地里爆炸，“我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他说，“那些跑在我前面的人就这样消失了——他们被炸得四分五裂。我看到铁丝网上有个洞，有六个囚犯跑到那边去了，我不顾擅自离开营地可能会被处死的危险，跟上了他们。”塔德乌什等人从营地跑出了一英里，在路堤旁的草丛里休息。“过了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我们突然听到德语的喊声：‘举起手来！’我们举手站了起来。原来国防军士兵躲在树后面，用枪瞄着我们。他们隶属于高炮部队，因为击落了几架美机，他们把我们当成了跳伞的人。他们高喊着：‘美国降落伞！’就在那一刻，我下意识地高声回喊我们不是美国人，是遭到轰炸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林茨3号营地的囚犯……我们正在等党卫军把我们带回去。后来发现这救了我们一命。”其他从营地逃跑的囚犯被处决，但塔德乌什当时的迅速回应使这些囚犯得以幸免。他记得轰炸后的第二天，“有两个和我一起出逃的苏联人前来感谢我救了他们”。

轰炸还使塔德乌什·斯姆林茨基发生了一些转变。当他看到同为囚犯的医生在照顾伤员时，他突然认识到，“我觉得只有善待别人才能重拾生活的感觉。我决定，如果能活下来，就去当一名医生。我的想法来自那些在集中营里帮助别人的医生”²²。战后，塔德乌什确实在他的祖国成了一名医生。但由于他拒绝加入波兰共产党，他的职业生涯受到挫折，他被剥夺了从事医学研究的机会。“我完全不接受共产主义现

存的形式，”他说，“这根本不是为穷人、工人阶级和农民服务的，而是为了那些所谓领导人的利益。”他忠于自己在当纳粹囚犯时形成的人生哲学：“生活只有在做好事时才有意义。我说得对吗？我没有强烈的欲望去参加公共生活，对经济上的刺激也不感兴趣，诸如把我的车去和别人的车比较之类。我不需要被任何人铭记。”²³

1944年春夏，因为匈牙利犹太人的到来，奥斯维辛集中营进入了杀戮最为惨烈的时期。1944年5月到7月间，从匈牙利运来约四十三万名犹太人²⁴，大部分人抵达后即遭杀害，约占每批运输人数的70%—90%。为了应付这一巨大的数量，在第四号、第五号火葬场附近挖了巨大的火化坑，离比克瑙原先的简易屠场“小红屋”和“小白屋”不远。

随着大量的犹太人来到比克瑙，个别党卫军也开始肆意放纵自己的虐待欲。莫里斯·维尼齐亚是在火葬场干活的犹太特别劳动队队员之一，他记得两个年轻的犹太姐妹和她们的朋友问一个党卫军，是否可以一起死去？党卫军“非常乐意”满足她们的要求，他试着用一发子弹打死她们三个人。他把她们排成一线，扣动了扳机。三个女孩倒下了，似乎都死了。莫里斯说：“我们马上抬起她们，扔进【露天火化坑】烈焰之中，然后我们听到了【从坑里传来的】尖叫声。”其中一个女孩当时只是摔倒了，没有死去，所以现在她是被活活烧死的。“那个德国军官还是很高兴，因为他至少用一枪打死了其中的两个人。这些野兽……是正常人的大脑所无法理解和相信的。确实难以置信，但这是我们亲眼所见。”²⁵

并不是所有的匈牙利犹太人都被送去了奥斯维辛。在布达佩斯，艾希曼和党卫军的其他成员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勒索犹太人的财富。库尔特·比彻是匈牙利党卫军经济部门的负责人，他花了许多时间从

犹太人那里攫取大量金钱、珠宝和贵重物品，让他们免于死。例如，他允许匈牙利最著名和富有的犹太家族——魏斯家族移居中立国家，条件是将大型企业“魏斯钢铁和金属工厂”移交给纳粹。

艾希曼也直接参与了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勒索，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关于“最终解决方案”最不寻常的一个建议。1944年4月25日，艾希曼会见了布达佩斯一位名叫乔尔·布兰德的犹太领导人，并告诉他，只要支付足够的赎金，纳粹就准备释放“一百万”名犹太人。艾希曼说：“我们对货物感兴趣，而不是钱。你得出国直接与你的国际代理人接洽，与盟军接洽，然后把具体的报价单拿回来。”²⁶艾希曼可能一开始就清楚，这样的想法不可能获得成功，为什么盟军要把战争物资交给纳粹来换取犹太人的生命呢？这样做将会拖延战争的进程。特别是纳粹还说，盟军用于换取犹太人生命的任何物资都不会被用于西线——这显然是想分裂同盟国。但是，即便机会渺茫，艾希曼依然认为可以从中获益。他认为，可以通过这一提议向希姆莱证明，在当下德国战争机器急需一切原材料时，他也可以像他的党卫军同事比彻那样富于灵活性。

1944年5月17日，布兰德与一个名叫班迪·格罗茨的神秘人物一起离开匈牙利，前往伊斯坦布尔与盟军取得联系，并带去了一份协议，如果盟军向德国人提供一万辆卡车，一百万名犹太人将得到“拯救”。刚到伊斯坦布尔，布兰德就会见了巴勒斯坦犹太领导层在土耳其的代表。随后，5月26日，英国巴勒斯坦问题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获悉了这一交换建议。美国人很快也了解到了纳粹的这一计划，英国和美国对这一提议的反应开始出现分歧。尽管他们在原则上都拒绝这一提议，但对于是否就此开启谈判，英、美有不同的看法。在美国，罗斯福于1944年1月成立了战争难民委员会，以帮助那些被纳粹迫害的人，他们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5月30日，在英国战时内阁的一次

会议上，他们认为，在背后支持战争难民委员会的亨利·摩根索曾许下“拯救”犹太人的诺言，这可能会让德国“把更多的犹太人扔给我们”。²⁷正如英国人所知，摩根索自己是犹太人，这种想法再加上其他因素，比如英国当局在巴勒斯坦遇到的麻烦，以及战时运送大批犹太人的困难，都让英国人对这一提议持谨慎态度。

在1943年4月举行的百慕大会议上，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讨论过拯救犹太人的问题。这场由二流政治家和顾问参加的会议与1938年的埃维昂会议类似，都不情愿为大多数犹太人提供安全庇护。就和埃维昂会议一样，百慕大会议的主题甚至都不是犹太人，而是“难民”；英国人也不承诺会大规模批准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只有少数记者被允许进入会场进行报道，会议达成的“意见”也是“保密”的——表面上是因为它还需要经过各自的政府讨论，也有人怀疑那完全只是一纸空文。正是在这些对犹太人大屠杀毫无效果的空谈之后，罗斯福才成立了战争难民委员会。

到1944年7月初，英、美之间对布兰德使命的意见分歧已经日趋明朗。美国人认为，应该为“面临死亡危险的犹太人以及类似的人”提供庇护，而英国人则反驳说，这一提议只应针对某些类别的犹太人——例如儿童和宗教领袖。²⁸不过，这一讨论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为7月7日，美国人已经决定将布兰德的情况通知苏联。

不难想象为什么美国人认为把艾希曼的提议告诉苏联很重要，因为现在是西方盟国与苏联关系中一个特别敏感的时刻。“D日”作战刚在西线发动，东线的红军也开始了“巴格拉基昂行动”，这是对德国陆军中央集团军的大规模突击，其规模令“D日”相形见绌。还有许多与苏军推进有关的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涉及他们即将解放的东欧国家的未来。美国人认为，现在不是向苏联人隐瞒纳粹破坏同盟稳定的提

议的时候。毫无意外，苏联人断然拒绝了布兰德的交易。

但在布兰德此行中，还有一个耸人听闻的秘密。英国人在开罗审问了陪同布兰德的情报人员班迪·格罗茨，由此了解到纳粹的这一想法。格罗茨说，布达佩斯的党卫军领导人嘱咐他利用这次任务，“安排两到三名德国安全部门高官和两三名同等级别的美国军官在任一中立国会面，实在不行英国军官也可以，目的是在帝国安全部和西方盟国之间单独媾和”²⁹。乔尔·布兰德开始明白，这一使命的真正目的是与西方国家就战争的出路展开谈判。1961年，布兰德在对艾希曼的审判中说：“我的感觉是，希姆莱是在把犹太人当作贿赂，目的只是为了拿出一张名片，用来换取更大的东西。[艾希曼]明确告诉过我，这笔交易是希姆莱的意思。”³⁰

希姆莱知道“犹太人换卡车”的交易，这一点得到了库尔特·比彻战后证词和当时文件的证实。³¹事实上如果没有他的知晓和批准，这项使命是无法推进的。1942年12月，希特勒曾同意希姆莱勒索犹太人以换取硬通货——只要能给纳粹带来滚滚财源就好，因此希姆莱可能认为采取这一行动问题不大。³²但是，他不可能从希特勒那里得到让他和西方盟国单独谈判的授权，即便只是为了离间西方盟国和苏联也不行。就算希特勒支持散布虚假情报——例如他曾在西班牙泄露苏联希望单独谈和的虚假情报³³——他也不大可能真的想进行谈判，一旦会谈的消息公之于众，对德国士气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至于希姆莱，他很可能想利用这一点来寻求战争的出路。在此背景下，有一个关于“希姆莱电报”的有趣谜团：1944年8月31日，英国收到一份直接发给丘吉尔的电报，丘吉尔显然不希望这份电报存世。他在档案里写了一张便条：“希姆莱电报，由我保存和销毁。”³⁴这是“希姆莱电报”的唯一记录，也是数千份被丘吉尔销毁的德国文件之一。电报里

究竟说了什么？——和平谈判的建议？看来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了。

几个月后，1944年12月，党卫军情报官员特奥多尔·翁德雷从他的上司、负责外国情报的瓦尔特·舍伦贝格那里惊悉，希姆莱正在谋求一条战争的退路。“1944年12月中旬或下旬的某天，舍伦贝格告诉我，希姆莱正打算单独媾和。”翁德雷说，“舍伦贝格信任我，所以还告诉我，希姆莱视他为心腹，因为他是德国最高级别的情报官员，能够从国外的各种渠道感知到和平的触角，这就是希姆莱信赖他的理由。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希姆莱是和谈最合适的人选。舍伦贝格将军微笑着说：‘很吃惊是吧？尽管我知道他是最不合适的人选，但我还是支持这件事。’所以说，舍伦贝格对此很清楚，但就当时而言，这是救命稻草。”³⁵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到1945年春，希姆莱寻找了各种办法和西方打交道，正如希特勒所认为的那样，他“背叛”了德国。因此，在1944年夏天，不难想象是他在背后支持班迪·格罗茨的建议。也许他只是想通过单独谈判在盟国之间制造分裂；也许他是在认真地寻找一条结束战争的道路，希望推进和谈；也许同样有可能的是，他还没有在两种选择之间做出决定，而是在等待事态的进展。正如舍伦贝格和翁德雷所言，1943年10月希姆莱还在波森的演讲中夸赞自己“消灭”犹太人的功劳，他竟然会认为只不过一年盟军就会和他和谈，这是很奇怪的。不过，希姆莱自欺欺人的能力是很强大的。

1944年五六月间，艾希曼在布达佩斯等待着布兰德的消息。在此期间，他和布兰德妻子汉希，以及一个名叫鲁道夫·卡斯特纳的勇敢的匈牙利犹太人经常会面。他们试图说服艾希曼向盟军展现出释放犹太人的诚意，具体来说就是送一批犹太人去瑞士。在艾希曼看来，这并非一个不能接受的想法，这既能向盟军展现出诚意，又可以向匈牙利犹太人勒索更多的钱，火车上的每一点空间都可以被纳粹用来卖钱。看

到艾希曼对此表现出兴趣，卡斯特纳担负起了实现这一想法的任务。“卡斯特纳列车”逐渐在犹太人中成为被批评的焦点，这导致了战后他在以色列被暗杀。

卡斯特纳遭到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火车上有他的许多亲戚——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兄弟——以及大批来自他家乡克鲁日的犹太人，在总共1 684名乘客中，有388人来自这座特兰西瓦尼亚的小城镇。当时年仅二十九岁的伊娃·斯皮特和她的丈夫、儿子一道成为“卡斯特纳列车”的乘客，那是因为她的父亲和卡斯特纳一样，都是可以决定谁能上车的人。她说：“每个人都想自保，为了能活下去可以不择手段，甚至犯罪也在所不惜。你自己的生命是排在第一位的，你最亲密的人就是自己，不管别人会说什么。”³⁶

斯皮特和她的家人清楚地知道匈牙利犹太人被驱逐出境后的遭遇。她相信德国人想要“杀死所有居住在欧洲的一千一百万名犹太人，包括俄罗斯犹太人”，她甚至还知道德国人把毒气室伪装成淋浴间。就在她离开布达佩斯之前，发现还有很多人也已经明白了这一切。“有一次来了一个职业妇女，她看到了我儿子。我们都佩戴着黄色“大卫星”，她说：‘把你的儿子给我吧，我会照顾他的，他会长大，别带着他和你们一起死。’当然，我不会把儿子交给她，不过，我一想到这位素昧平生的职业女性想把这个漂亮的小孩带大，而且还是个犹太小孩，我就不会对匈牙利人感到愤怒了。”³⁷

6月30日，当伊娃·斯皮特乘坐“卡斯特纳列车”离开布达佩斯时，她不相信德国人会信守诺言。当火车停靠奥地利的林茨时，她越来越担心发生在其他犹太人身上的事情会落到自己头上。在这里，犹太人被告知下车接受体格检查，并且必须得洗澡。她记得：“我当时赤身裸体站在医生面前，在他看来，我仍然显得非常自豪，我认为他应该看

看一个骄傲的犹太女人会怎样死去。”一进淋浴间，水龙头里出来的是“温暖的水……在我们已经准备好死亡之后，这令人深感欣慰”³⁸。事实证明，这是纳粹唯一一次在洗澡上没有撒谎。

但至少在一个地方，艾希曼撒了谎，因为火车并没有直接开往瑞士，而是来到了位于德国北部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该集中营的一个区域被预留给所谓的“交换犹太人”——那些纳粹想勒索一票的犹太人——这些人比其他犹太人享有更好的待遇。例如，1943年什穆埃尔·于佩尔与母亲一起被送进了交换区。他记得有足够的食物活下去，他在营地还学会了下棋。³⁹“卡斯特纳列车”上的犹太人也得到了类似的优待，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绝大多数人最终安全抵达了瑞士。

战后，卡斯特纳受到批评，不仅因为他把火车上的位子留给了亲朋好友，还因为他没有警告其他犹太人纳粹要把他们送到奥斯维辛，导致许多匈牙利犹太人的死亡。第一项指控是成立的，但第二项则有些牵强。的确，卡斯特纳在去家乡克鲁日时并未告诉大家纳粹的真正计划，但即便他这么做了，是否就会起到作用，这是值得怀疑的。匈牙利国内的犹太青年运动，如哈特扎尔·哈什默、哈特扎尔·马卡比和阿基瓦·贝尼等，共同向各地的犹太人发出警告，提醒他们面临的危险，但全都收效甚微。⁴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犹太人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几乎没有山地或者密林可供躲藏，当地有许多非犹太人都是反犹的——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愿意相信那些传言是真的。“人们不愿意相信他们听到的东西，”斯皮特说，“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最糟糕的东西——从来不愿意，他们总是愿意相信更好的东西……希望是人类出生时所获得的最好品格。”⁴¹

卡斯特纳知道在奥斯维辛的大规模屠杀，因为他读过鲁道夫·沃尔巴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合写的一份报告。这两人曾在那里当过囚犯，

1944年4月，他们设法逃离营地，返回了他们的家乡斯洛伐克。在那里，他们写下了奥斯维辛—比克瑙发生的事情。在此之前，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比克瑙的真正功能。由于比克瑙部分是一个劳动营，而且位于整个劳动营体系的核心位置，许多外国观察员都不了解它的主要目的。日内瓦犹太人机构的理查德·利希海姆在看到《沃尔巴—韦茨勒报告》前，一直以为德国人把犹太人赶到奥斯维辛是为了“在上西里西亚剥削更多的犹太劳工”⁴²。《沃尔巴—韦茨勒报告》无疑完全揭开了奥斯维辛的面纱，它准确地描述了1943年在比克瑙新建毒气室的运行情况和屠杀犹太人的方式。这份报告之所以翔实可信，是因为在火葬场工作的犹太特别劳动队队员菲利普·缪勒把那里的情况都告诉了这两位斯洛伐克人。战后，缪勒写道：“我把火葬场和毒气室的平面图以及值班的党卫军官兵名单交给了阿尔弗雷德。此外，我还把一段时期以来所记的第四号、第五号火葬场几乎每一批次屠杀的情况都交给了他们。我向他们详细描述了灭绝的过程，以便他们能够向外界报告……”⁴³

1944年5月，《沃尔巴—韦茨勒报告》在布达佩斯流传开来。6月底，这份报告已经传到了伦敦，7月份，华盛顿也得到了报告。许许多多的人——从罗斯福到瑞典国王——向霍尔蒂上将提出了抗议。就连教皇也在6月25日写信给霍尔蒂，呼吁他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⁴⁴在布达佩斯的教廷外交官真纳罗·维罗利诺大主教记得，在《沃尔巴—韦茨勒报告》出现之前，“我们已经渐渐明白，‘强制出国劳动’意味着驱逐出境，而驱逐出境意味着毁灭。于是我们提出了抗议，教廷大使本人带头，其他外交官员跟随”⁴⁵。布达佩斯的教廷大使向犹太人发放了一万五千多张安全通行证。匈牙利犹太人费伦克·维纳说：“它救了我一命。当时他们处决了其他所有人，而我就是下一个。我把信件拿出来给一个德国军官看，他告诉我可以离开这里。”⁴⁶瑞士世界犹太人大

会的战时代表格哈特·里格纳始终认为，梵蒂冈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干预是“大屠杀历史上梵蒂冈做出的唯一一次正确的集体决定”⁴⁷。

霍尔蒂上将现在必须做出决定：是不顾德国人的威胁，停止向奥斯维辛输送犹太人，还是不顾抗议的声音，任由德国人为所欲为？戈培尔等纳粹领导人向来认为，控制霍尔蒂是十拿九稳的——他们成功地迫使霍尔蒂在3月份“邀请”德国军队进入匈牙利，并共同驱逐犹太人，他们相信霍尔蒂很乐意能有机会把犹太人赶出他的国家。戈培尔在4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不管怎样，他现在不再妨碍对匈牙利公共生活的清理；相反，他对犹太人深感愤怒，不反对我们把他们当作人质，他甚至自己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无论如何，匈牙利人在犹太人问题上都不会脱轨。匈牙利的政治是从反犹开始的，因此他们无法让自己停下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反犹政治在推动着自身前进。”⁴⁸这是一篇很有启示性的日记，戈培尔毫不含糊地表示，他相信纳粹能够通过犹太人问题来裹挟他们的盟友。如果设法让盟友的手沾上鲜血，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死心塌地追随第三帝国。

但是，霍尔蒂并没有如他们所愿。尽管他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最后还是改变了立场。7月6日，他通知德国人，驱逐行动即将终止。三天以后，前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停开。霍尔蒂面临的压力太大了，他只有在屠杀犹太人仍然是个谣言时——不论这谣言有多可信、流传多广——批准驱逐他们出境，一旦存在确凿的证据表明犹太人将被杀害，他就不能再继续熟视无睹。他不仅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而且在7月2日，美军的炸弹直接落到了布达佩斯。盟军正在法国作战，红军也正向东欧挺进，德国输掉战争的现实无法逃避，总有一天，同盟国会清算德国这些共犯的罪责。现在停止驱逐行动，霍尔蒂认为还有机会洗白自己。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匈牙利以前对犹太人犯下累累暴行，但霍

尔蒂在战争结束时却得以脱身，没有受到惩罚。他退休后居住在里斯本附近的海滨小镇，1957年辞世，享年八十八岁。

德国人已经将四十三万名犹太人从匈牙利驱逐到奥斯维辛，接下来他们准备暂停一下，毕竟在那个夏天，纳粹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他们不仅要应对前线的绝望局面，还要处理来自国家最高层的危机。7月20日，心怀不满的国防军军官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引爆了一枚炸弹，企图炸死希特勒。但希特勒只受了轻伤，现在，搜捕肇事者已成了德国安全部门的当务之急。

在生命受到威胁后，总是心怀愤怒的希特勒变得更为愤怒。德国陆军新任总参谋长海因茨·古德里安说：“他[希特勒]对人普遍的不信任，特别是对总参谋部幕僚和将领们的深切怀疑，现在发展成了深仇大恨……之前应付他已经够困难的了，现在成了一种不断恶化的折磨。他经常完全失去自控，语言变得越来越粗暴。”⁴⁹

一个月后，德国在外交方面又出现了另一场灾难，罗马尼亚人想退出战争。8月5日，希特勒会见了罗马尼亚领导人安东内斯库元帅，发挥他所有的修辞技巧，试图说服安东内斯库继续战斗，但仅靠言语改变不了前线罗马尼亚士兵的悲惨遭遇。8月20日，大部分罗马尼亚军队在红军发起的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中被击溃。8月23日，安东内斯库被免职，罗马尼亚人掉转枪口向德国宣战。

但依希特勒的性格，他绝不会改弦更张。他决心把战争进行下去，直到红军士兵出现在柏林的大街上，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最后一段骇人听闻毁灭期的来临。

18. 屠杀的终结(1944—1945)

在希特勒决意顽抗到底之后，同盟国自己却面临着政治上的分歧——特别是在掌握了纳粹的奥斯维辛暴行之后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他们都认同的一点是这场恐怖的严重性。1944年7月11日，丘吉尔写道：“毫无疑问，这可能是整个世界历史上最严重和最可怕的罪行，这是由所谓的文明人借助科学机械，以伟大国家和先进民族的名义来完成的……应当公开发表宣言，每个与之有关的人都将被追捕和处死。”¹当然，愤怒和威胁的言论并不能直接帮助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死去的犹太人。

一些犹太团体提出了一个实际方案——轰炸营地。6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犹太人大会呼吁美国摧毁毒气室。丘吉尔听到了这个呼吁，于7月7日写信给安东尼·艾登：“如果你需要空军的任何帮助，必要时可以找我。”²但轰炸集中营的想法最终被拒绝了，英国航空部出于现实因素考虑，对这一想法并不热心。其中一个难题是，既要摧毁比克瑙的毒气室，又不能误炸到里面的囚犯，这非常困难。英国人建议美国人来接手这一难题，因为昼间轰炸归美国负责。美国的代表、助理战争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对此不屑一顾，他对这个计划是否可行表示怀疑，

并认为这将妨碍其他更重要的轰炸任务。³

不过，即便克服了重重困难炸掉了奥斯维辛的毒气室，也很难说屠杀就会停止。前年在马伊达内克发生的“收获节屠杀”表明，德国人不需要毒气室也能杀死大量的犹太人——用机枪就可以做到。

尽管如此，许多参与决策轰炸奥斯维辛的人对此的轻蔑态度——麦克洛伊的一名部下在内部备忘录中写道，麦克洛伊甚至想要“扼杀”这种想法⁴——却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1944年7月10日，犹太人执行机构主席、后来成为现代以色列创始人之一的戴维·本·古里安在一次演讲中向盟军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犹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英国、美国、苏联的老弱妇孺每天都遭受酷刑、被烧死、在毒气室里窒息——你们还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吗？”⁵

本·古里安问题的答案几乎可以肯定，那就是不会。如果英国战俘在奥斯维辛被毒死，盟军肯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这一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如前所述，在1942年底盟军还谴责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但在1943年的百慕大会议上，他们依旧不愿承诺让大量犹太人进入他们的国家。1943年3月，百慕大会议前的一个月，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说：“关于让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一个国家，这件事必须慎重对待，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也会提出像在德国和波兰一样的要求。希特勒可能很乐意看到我们接受这样的请求，而世界上根本没有足够的船和其他交通工具来运送他们。”⁶用艾登的话来改述一下本·古里安的问题，如果德国人杀害的是英国或美国战俘，这种无所作为的借口是否还能被人接受呢？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有数十万名德国战俘被横渡大西洋送往北美的时候，英国和美国真的会因为找不到船把本国士兵运过英吉利海峡而看着他们被屠杀吗？答案是否定的，艾登的借口根本不足信。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囚犯琳达·布莱德认为：“上帝忘记了我们，战争中的人们忘记了我们，他们知道【奥斯维辛】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们对此毫不在乎。我们希望他们把炸弹扔到营地，至少我们还可以逃跑。有几百架飞机飞了过去【轰炸波兰的其他目标】，我们翘首以待，但没有炸弹落下来，对此我们无法理解。”⁷

盟军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想法始终很简单——阻止屠杀的唯一可靠方法就是击败纳粹。1944年夏天，红军占领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这一想法似乎取得了一些效果。马伊达内克向全世界揭发了纳粹的暴行，许多屠杀用的设备没有被撤退的德国人销毁，焚尸炉和毒气室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纳粹的屠杀行为。苏联战地记者康斯坦丁·西莫诺夫在考察了营地后写道：“我要讲述的内容太残酷、太可怕了，令人难以想象。”他描述了毒气室是如何运作的：“受过特殊训练的操作人员戴着防毒面具，把‘齐克隆B’从圆罐头盒里倒进了房间。”他还对死者留下的大量鞋子感到震惊：“它们从小屋的门窗里溢了出来，有个地方甚至压倒了一面墙，成堆的鞋子从缺口塌了下来……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一幕更让人毛骨悚然的了。”⁸

在奥斯维辛，7月初，来自匈牙利的运输已经停止，大部分来自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也在几周之后被杀完，屠杀的高峰期结束了。因此，党卫军决定大批缩减犹太特别劳动队的人数，在处理匈牙利犹太人时，其人数曾高达九百人。党卫军准备把不再需要的人杀掉。比克瑙的劳动队员达里奥·加拜说：“我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结束。”纳粹鉴于马伊达内克的曝光，不想让任何特别劳动队队员活到战后，他们对屠杀的细节知道得太多了。因此，在9月底，党卫军三级小队长（军士长）布施要求第四号火葬场的劳动队员站出二百名“志愿者”，他声称是要去另一个新营地劳动。但劳动队员们知道运输

量一直在减少，很清楚这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奥斯维辛的特别劳动队队员菲利普·缪勒说：“布施真的那么天真地认为我们中有人愿意去挖坑埋自己吗？”⁹结果并不令人意外，没人愿意站出来。于是，布施军士长只能自己挑了二百人出来。当然，并不存在什么“新营地”，挑走的人都被杀害了。当晚，党卫军自己悄悄地在焚尸炉焚烧那些劳动队员的尸体，这是前所未有的。纳粹谎称是在焚烧死于盟军空袭的遇难者尸体，但活着的劳动队员并没有上当受骗。他们在焚尸炉内发现了几具尸体，虽然被烧焦了，但仍然可以辨认出是自己的同伴，他们的猜疑得到了证实。因此，当党卫军又一次要求“卡波”从特别劳动队队员中选出三百人转移到“橡胶工厂”时，劳动队员们决定发动一次起义。¹⁰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警卫措施比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等其他死亡集中营要严密得多。火葬场和毒气室位于铁丝网隔离的分区内，分区外面是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复杂的建筑群，而集中营外面又是被工厂包围的安全地带。此前最为著名的起义是1942年6月10日在比克瑙一座监狱工厂内爆发的波兰人起义，有五十多名囚犯企图越狱，但最后确定活下来的只有一个人。

虽然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在1944年10月7日，四号火葬场的特别劳动队队员还是向党卫军发起了进攻。他们用斧头和锤子与荷枪实弹的党卫军战斗，并纵火焚烧火葬场。二号火葬场的劳动队员在听到四号火葬场传来的嘈杂声后，也开始袭击党卫军看守，杀死了其中两人——甚至还把一人扔进了燃烧的焚尸炉。党卫军的增援部队抵达后，开始追捕越过营地边界的人。当他们发现一些劳动队员躲在谷仓里时，就放火烧了谷仓，当天参加暴动的二百五十余名劳动队员无人幸免，党卫军确认了他们的死亡。但党卫军的报复没有停止，为了恐吓其余的人，他们又处决了二百人。¹¹劳动队员亨利克·曼德尔鲍姆记

得，纳粹“叫我们脸朝下卧倒在地，双手放在背后，然后三人中处决一人。我的几个朋友死了，其余的人不得不回去工作。实话说，我们从来都不抱多大希望”¹²。尽管经历了这场磨难，目睹了许多朋友的死亡，但亨利克·曼德尔鲍姆仍然觉得那些反抗的人“做了一件好事”，因为“你必须记住，我们早就应该死了。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平静地交谈，可以假设，可以提问，可以多说，可以少说，但在那时是完全不同的。人类是有罪的……”¹³

战后，有时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还会遭到嘲弄，说他们没有勇气起来反抗。海莉娜·比伦鲍姆记得，当1947年她来到以色列时，农庄里的其他人对她说：“你就像一只羊那样跟着走，没有进行自卫，为什么不进行自卫呢？到底是怎么了？你应当受到责备，因为你什么都没做。别跟我们说这些，这是一种耻辱，别告诉年轻人，你会毁掉他们的斗志。”¹⁴她听了以后感到心烦意乱。

1944年10月劳动队员们的起义证明了这种指控是不公正的，他们并没有像“羊”那样被屠杀。他们奋起反抗，失去了生命，因为起义在奥斯维辛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持续运行了四年半，在送到那里的一百多万人中，约有八百人企图逃跑，但他们中只有不到一百五十人设法逃离了那里，而且在逃离者中还有很多人后来死于战争。¹⁵因此，与其是说囚犯缺乏勇气，不如说是他们没有机会。

1944年10月，就在劳动队员们举行起义之时，德国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很多盟友。9月8日，红军攻入保加利亚，几小时后，保加利亚步意大利、罗马尼亚的后尘，掉转枪口向德国宣战。不到两周后，芬兰也退出了战争。¹⁶希特勒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德国已经必败无疑，甚至连纳粹党内的精英人物也开始首鼠两端，不光是希姆莱，还有戈培尔。当戈

培尔通过日本的消息渠道听说斯大林可能愿意考虑单独和谈时，他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支持这一想法。1944年9月20日，他写道：“我们即将获得的胜利虽然不像1941年所梦想的那样大，但在德国历史上仍然是空前的，德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做出的牺牲是完全值得的。”¹⁷但希特勒根本懒得去考虑他的建议，从来都没有和他讨论过。对希特勒来说，德国要么胜利，要么毁灭。在戈培尔这样的拥趸眼中，拒绝妥协曾是希特勒最大的优点——但现在变成了最大的缺点。

既然希特勒冥顽不化，犹太人的苦难就得继续下去。例如，1944年9月至12月间，斯洛伐克的德国安全部队在镇压了抵抗运动后驱逐了一万二千多名犹太人。在匈牙利，霍尔蒂上将想把国家从战争泥潭里拖出来，但希特勒下决心加以制止，这导致了匈牙利犹太人的又一场灾难。7月初，匈牙利停止了向奥斯维辛运送犹太人，霍尔蒂再次和盟军达成了秘密协议。10月初，匈牙利代表团甚至在莫斯科和苏联签署了协议。10月15日，德国人做出了反应，曾经营救墨索里尼的党卫军军官奥托·斯科尔兹内在布达佩斯抓住了霍尔蒂的儿子米克洛什，把他用地毯裹起来带到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德国人逼迫霍尔蒂将权力移交给匈牙利的法西斯政党——箭十字党的领袖费伦茨·萨拉西。霍尔蒂想要救他的儿子，只能再次向德国妥协，然后作为希特勒的“客人”在巴伐利亚的一座城堡里度过了余下的战争时光。

霍尔蒂被赶走后，匈牙利又落入了法西斯之手，犹太人再次倒了霉。10月18日，艾希曼开始和萨拉西讨论驱逐犹太人的问题——这次不是把犹太人驱逐到奥斯维辛，而是将他们赶到德国去强迫劳动。艾希曼的麻烦在于缺少交通工具来把那么多的犹太人送往西方，但他的解决办法就是让犹太人步行，走上一百多英里。到11月底，有两万七千人已经动身，后面还有四万人等待出发，可以想象，一路上的情况是多

么恶劣，以至于一群路过队伍的党卫军军官也看不下去，向党卫军高级军官、匈牙利警察总监奥托·温克尔曼提出了异议。很难令人相信的是，曾任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现在担任党卫军行政职务的鲁道夫·胡斯也是反对者之一。这倒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得人道起来，而是他认为这些犹太人即便到了德国，也已经干不了活了。¹⁸ 另一名党卫军军官库尔特·比彻年初参加了有关匈牙利犹太人的谈判，他也向希姆莱抱怨艾希曼的行动。结果，1944年11月，希姆莱在“黑森林”里的私人火车上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他要求艾希曼停止驱逐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并补充道：“如果之前你一直是犹太人的消灭者，那么从今往后，我命令你，要成为犹太人的养育者。”¹⁹

希姆莱的言论看似古怪，但和胡斯一样，并不是因为其意识的转变，而纯粹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不仅是想把犹太人当作劳工以及和盟军谈判的筹码，还出于军事上的现实考虑。当希姆莱和艾希曼谈话时，红军正在一步步深入匈牙利。因此，驱逐匈牙利犹太人的想法很快就无法再实现了。

12月底，红军已经包围了布达佩斯。希特勒宣布这座城市为“堡垒之地”，号召士兵们战斗到底。战斗持续到了1945年2月13日，约四万名平民死亡。苏军攻占布达佩斯后，那里的妇女遭了殃，数千人被强奸——也有估计多达五万人。巴纳·安德拉索夫斯基是一名医科学学生，他目睹了布达佩斯郊外一个村庄所遭受的蹂躏。“很难想象在20世纪还会发生这种事，也很难接受纳粹宣传的东西竟然是事实。但我们看到这确实发生了，我们还听说了其他很多类似的可怕事情。”²⁰

这样的证词在大屠杀的历史中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再次提醒我们，对犹太人的灭绝是在极为可怕、野蛮的战争背景下发生的，当然这绝非在为纳粹的罪行寻找借口。值得注意的是，红军在布达佩斯的暴行并

未在布加勒斯特或索菲亚发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希特勒给匈牙利人民带来了痛苦。红军在匈牙利的暴行首先是因为希特勒不准匈牙利在红军逼近时倒戈，但他的顽固是徒劳的。到12月底，正当布达佩斯被包围时，苏联扶植的匈牙利新政府向德国宣战。

面对盟军的进攻，希特勒继续发表对犹太人的仇恨言论。他1944年9月25日的一份命令中提到了“我们对国际犹太敌人进行彻底毁灭的意愿”²¹；11月12日，他在慕尼黑发表声明，谈到了“对犹太人进行迫害和毁灭的意愿”²²。慕尼黑的讲话实际上是由希姆莱发表的，因为希特勒不愿在时局不如意的时候面对听众，但这一观念无疑是希特勒的。德国领导人又一次对西方民主国家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势力结成联盟感到“难以理解的荒谬”，并声称“犹太人总是喜欢躲在某个愚蠢和软弱的男人背后，他不仅缺乏品格，而且先天不足。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一看似荒谬的事情就可以解释了。他说，事实是，“犹太人既是民主国家的操纵者，也是布尔什维克野兽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希特勒仍然沉浸在他一贯的幻想之中，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就提出过同样的论调，即犹太人既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支持资本主义的无度。

希特勒在1945年向德国士兵发表新年献词，他以极为扭曲的逻辑宣称，德国正在进行“一场事关生存或毁灭的无情斗争”，因为“针对我们的犹太国际阴谋的目的是消灭我们的人民”。当然，事实的真相是，因为希特勒推行种族主义侵略战争而使德国处于危险之中，而不是什么“东方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其灭绝倾向中反映了西方犹太人的资本主义目标”²³。

当希特勒向德国士兵打气时，他们的布尔什维克敌人已经离奥斯维辛不远了，那里仍关着大约六万七千名囚犯。1月12日，苏军发动了

新一轮进攻，乌克兰第一、第四方面军逼近克拉科夫，就在奥斯维辛东面不到三十英里。在奥斯维辛，党卫军开始执行命令，不使囚犯落入敌手。他们把大部分剩下的囚犯——约五万八千人——押出营地，走进了波兰冬季的冰天雪地中。留下的囚犯有九千人，他们已经病得很重，无法行军。他们本该在红军到来之前由党卫军二级大队长（少校）弗朗茨·克萨韦尔·克劳斯负责加以处决的，党卫军的确在比克瑙处决了约三百人，在四个子营中也处决了数百人，但奥斯维辛的大部分病人都活了下来。这不是因为党卫军突然对杀人感到愧疚，而是他们的军纪随着红军的逼近而趋于瓦解。党卫军不愿把时间花在屠杀囚犯上，而是争先恐后地逃离这里以求活命。囚犯们回忆说，在“疏散”期间，“喝醉的党卫军”出现了“混乱”和“恐慌”。²⁴

在混乱之中，一些特别劳动队队员也得以逃生。十八岁的劳动队员莫里斯·凯塞尔曼记得，数千名囚犯在四处游荡，准备加入离开营地的队伍。“负责管理”他那一栋楼的“法国犹太人”过来说，因为要“清理”营地，好像附近的党卫军都离开了。“所以我们都出去了，”莫里斯说，“我们【和其他囚犯】混在一起，然后走了出去。”

莫里斯·凯塞尔曼在当劳动队员的时候，“吃一切能吃的东西”来“增强自己的体质”，他还学会了站在一个看上去虚弱一些的人边上，这样可以让自己免于被淘汰。“不是他走，就是我走。”他说，“我感到难过吗？当然我觉得很抱歉，但我帮不了他。在那一刻，我只能为自己考虑，没有能力帮助任何人。”²⁵加入劳动队之后，尽管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害怕，但他觉得自己年轻并且“想得不多”，这样活下去的概率会更大。他记得，撞电网自杀的主要是“年长者、知识分子”，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反而较为适应。因为劳动队员可以拿到死去犹太人的衣服，因此在1945年1月，“当我走出营地时，我穿得很好。我有一顶俄

式毛皮帽子，一件厚厚的外套，还有一双好鞋。唯一记不起来为什么这样做的，是我的口袋里装满了糖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他人拿的都是肉。糖和雪[混在一起]，我就是靠这个活了下来”²⁶。

离开了集中营的行军队伍境遇凄惨，常常面临生命的威胁。另一个成功混入逃亡大军的劳动队员达里奥·加拜记得：“德国人把走不动的人都处决了。”²⁷曾在集中营待了两年的斯洛伐克犹太人西尔维娅·维塞拉证实：“那些走不动的犹太人都被枪毙了。男人和女人混杂在一起，道路上满是尸骸……”²⁸

犹太人不光是因为跟不上队伍而被枪毙，他们停下来小便或弯腰系鞋带也可能被枪毙。晚上，谷仓和房屋通常睡不下那么多人，很多人只能睡在露天。²⁹据捷克犹太人伊比·曼回忆，在路上走了几天之后，“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世界末日了，非常艰苦……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不觉得饿，但感到非常渴。我们渴得厉害，有的人就此倒下去了。他们要么倒在那里死掉，要么被枪毙了”³⁰。

大部分囚犯被押往两个目的地之一——奥斯维辛西北三十英里外的格利维采，或是西面差不多同样远的沃济斯瓦夫。在那里，他们被推上敞篷火车，开始了下一阶段的折磨。希腊犹太人莫里斯·维尼齐亚记得，火车上的情况“糟透了”，“大雪落在我们身上”，“火车被塞得满满的”。结果，在转移到远离前线的营地路上，“很多人都死了”。³¹

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出发后几天，在西普鲁士的施图特霍夫集中营以及附近的附属营地，大约一万一千名囚犯也被迫开始冒雪转移。一部分人前往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另一部分人则前往西方。³²一路上，卫兵枪杀了大约两千名囚犯。队伍中的舍卡纳·拉比诺维奇回忆说：“在路的两旁，我们看到前面队伍留下来的尸体。你可以分辨出，有的尸体是因饥饿而死，有的是被枪毙的，鲜血染红了雪地。”³³1月

31日，在普鲁士东端的桑比亚半岛上的巴立明肯镇的海滩，有上千名囚犯遭到机枪扫射，之前，纳粹想把他们困进一座琥珀矿中，用炸药将他们炸死，但没有成功。³⁴ 据信只有二百人在屠杀中幸存下来。

半年前，在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司令官接到党卫军经济和行政部门命令，要求确保到1944年底所有囚犯不留下一个活口。因此从1944年初秋起，营地内开始搭建临时毒气室。最早是用一间除虱室改造的，后来将一节靠近火葬场的火车车厢作为毒气室。他们欺骗囚犯说是要上火车，为了表演得更像，一名党卫军士兵还穿上了铁路制服，“连信号哨都有”，催促犹太人赶快登上这列开往但泽的火车。³⁵ 这些临时毒气室处理能力有限，到了年底，营地里仍然还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施图特霍夫的屠杀说明，尽管希姆莱曾说过要“养育”犹太人，但在红军越来越近时，纳粹国家仍然还有人想屠杀他们。虽然各地的情况都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混乱，但消灭犹太人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虽然希姆莱明白，为了和盟军讨价还价，需要把一些犹太人作为“人质”留下来，但中心目标并没有改变。

“死亡行军”给犹太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根据一项已经是低估的统计，在1945年1月至2月间，上路的十一万三千名集中营囚犯中有三分之一死去。³⁶ 在波兰境内，有居民在囚犯们蹒跚前行时向他们提供过帮助。³⁷ 但在德国境内，虽然也有个别人表现出善意，但人们的总体态度并不那么宽容——从一位德国旁观者的议论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肯定是犯下了什么罪孽，才遭到如此残酷的对待。”³⁸

囚犯们抵达目的地后，痛苦也并没有结束。大部分人被送到德国境内的营地，包括布痕瓦尔德、多拉—米特堡和毛特豪森。有两万名从奥斯维辛来的囚犯最终被关押在汉诺威西北方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个地方在1943年曾被用来关押“交换犹太人”，但现在条件已经

大不如前，主要是因为过度拥挤，囚犯从1944年底的一万五千人增至1945年的六万人。从奥斯维辛来到这里的艾丽斯·洛克·卡哈纳说：“贝尔根—贝尔森的情况是无以言表的，可以听到囚犯们日夜高喊着：‘妈妈！水！水！妈妈！’”负责艾丽斯那群人的“卡波”发疯般鞭打她们，因为“她想让垂死的人们安静下来”。晚上，“卡波”对囚犯拳打脚踢，有一次，她一脚踩在艾丽斯的头上，艾丽斯知道，“如果我动了，她[‘卡波’]会把我打死的”³⁹。

一名被关在贝尔根—贝尔森的波兰天主教妇女记得匈牙利犹太人到来的情形。“在1944年12月、1945年1月和2月，有大批妇女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站了几个小时。”她在战后做证说：“这张可怕的照片还不足以描述那些可怜的匈牙利犹太妇女的处境，尤其是那些在饥寒交迫中像苍蝇一样死去的老妇人。一支由乌克兰囚犯组成的特别劳动队负责抬走倒在房子边上的尸体并运走火化。每个夜晚，房子里都有妇女死去；每个白天，都有妇女在点名时死亡。她们在路上已经走了几天甚至几周，早已精疲力竭，一栋房子里要挤上一千到一千二百人，四个人睡一张床。”⁴⁰ 另一名囚犯回忆说，那里没有水，“肠道疾病猖獗；腹泻和伤寒夺走人的生命”⁴¹。

当第三帝国濒临崩溃时，其他集中营的情况也同样可怕。毛特豪森集中营和附近的附属营地变成了一片广阔的死亡地带——仅在1945年4月就有一万一千人死亡。在柏林北面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自1944年以来情况就在不断恶化，1945年初，一间临时毒气室被搭建起来，杀害了数千名囚犯。⁴² 1944年夏，曾在罗兹隔离区居住的埃斯特拉·弗伦基尔被送到拉文斯布吕克。她记得集中营“完全是地狱”：“隔离区本身还算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一场为了争夺食物和免于被驱逐出境的战争。但那儿[拉文斯布吕克]则是一个暗无天日

的地狱。”⁴³

正当死亡行军开始的时候，希姆莱正在亲自就犹太人的赎金问题进行谈判。1945年，他在“黑森林”里会见了瑞士政治家尚—马利·姆希，讨论了用钱换取释放一些犹太人的问题。2月初，一列载有约一千二百名犹太人的运输车离开布拉格东北的特莱西恩施塔特营地前往瑞士。其中的一名犹太人丽塔·雷说：“我们在火车上时，党卫军来告诉我们要梳妆打扮好，这样我们在到达时就会看起来很精神。他们想让我们给瑞士人留下好印象，而不像集中营里劳累过度的犯人。”⁴⁴当希姆莱的“人道主义”姿态在瑞士报纸上公布时，希特勒感到非常愤怒。⁴⁵尽管在1942年12月希特勒同意希姆莱可以从犹太人那里捞好处，但这个有点儿走得太远了。在德国人民饱受轰炸之苦时，犹太人却被送往安全地带，可以肯定，他是在担心这会引发绝望情绪的蔓延。希特勒命令希姆莱立即停止这一做法，再次表明了他想顽抗到底的决心。在此期间经常接触希特勒的陆军总参谋长副官贝恩德·弗赖赫尔·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认为：“外交解决途径已不复存在，对于希特勒来说，只存在军事解决方案。政治解决方案是不能讨论的，一旦有人提起，希特勒就会斥之为失败主义。”⁴⁶

希姆莱和希特勒的关系现在很紧张。希特勒已经对希姆莱在军事上的无能感到愤怒，之前他不满足于传统职业军官的表现，任命希姆莱担任一系列包括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在内的指挥岗位。虽然他在思想上有热情，但在军事上只是业余的，士兵们并没有因此而交好运，希姆莱的上任没能阻止红军前进的脚步。1945年3月15日，根据戈培尔的记录，希特勒称希姆莱对“波美拉尼亚及其大部分人口落入苏联手中”负有“历史罪责”。⁴⁷第二天，希特勒对戈培尔说，他对希姆莱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批评”⁴⁸。随后，戈培尔也挖苦希姆莱：“不幸的是，他想追

求军事上的荣誉，但完全失败了。他一无所获，只是败坏了自己的政治声誉。”⁴⁹

然而到此关头，希姆莱似乎已经不太关心他在纳粹精英中的“政治声誉”，而是对胜利者如何看待他更感兴趣。他不顾希特勒的命令，决定加强与西方的联系。1945年二三月间，他会见了瑞典红十字会的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商讨了将集中营里关押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送往瑞典的事宜。希姆莱的私人按摩理疗师菲利克斯·克斯滕也劝说希姆莱不仅释放斯堪的纳维亚人——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还要释放来自其他国家的大批犹太人。3月中旬，希姆莱给克斯滕写了一封奇怪的信，他在信中透露了将如何向犹太人代表解释他以前的行为。他称自己一直允许犹太人安全地迁移到西方，“但战争及其释放的非理性”打断了这一政策。他现在希望搁置“所有的纷争”，这样，“智慧和理性”和“伸出援手的愿望”就会浮现出来。⁵⁰

今天我们会觉得希姆莱这些话都是骗人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有可能真的认为他写的都是实话，这些话反映了纳粹领导人扭曲、偏执的个人世界。希姆莱肯定认为，如果没有发生战争，1938年艾希曼在维也纳实行的措施——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就可以把所有犹太人从德国驱逐出去。当时，纳粹认为这个政策行不通，只是因为世界上其他地方不愿意收留犹太人。站在纳粹的立场上，问题不是出在德国政府要驱逐犹太人，而在于1938年参加埃维昂会议的各国没有一个愿意接纳犹太人。因此，希姆莱才会认为纳粹是真正的受害者。不仅如此，按照纳粹的说法，发动战争也不是他们的错。这是因为德国要求归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窃取的领土，但遭到了拒绝。至于死亡集中营的建造，只是因为无理的英国人在1940年夏天拒绝和谈，让他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同样，德国是被迫和布尔什维克进行防御战争的，如

果德国不干涉，布尔什维克就会入侵并统治欧洲。布尔什维克现在正向大西洋的方向挺进，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分析是正确的。

当然，向东方发动攫取领土的战争是希特勒多年以来的夙愿，这些想法都是痴人说梦，但希姆莱的话还是符合纳粹的逻辑的。尽管他给克斯滕的信充满了谎言，读来令人愤慨，但对于理解他如何严肃地认为大屠杀并非他的错，仍然是有价值的。

希姆莱在犹太人命运的问题上自欺欺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广大的普通德国民众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呢？关于“最终解决方案”，他们知晓多少？又有多少人愿意帮助犹太人呢？有些德国人反对纳粹对待犹太人的方式，这是不可否认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慕尼黑的“白玫瑰”小组，发起人是汉斯·肖尔和肖菲·肖尔兄妹，他们在1942年至1943年间散发了许多传单抗议希特勒的统治。“白玫瑰”小组在谴责纳粹对待犹太人的行为时，抗议传单的措辞很有启示意义。他们重点谴责在波兰的“三百万名犹太人”“以最野蛮的方式”被屠杀的事件，认为这是“危害人类尊严的可怕罪行，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罪行都不能与之匹敌”。然而，他们觉得有必要加上这样一段话：“犹太人也是人——不论你怎么看待犹太人问题，这是不能否认的——这些罪行都是针对人类的。也许有人会说，犹太人是咎由自取，这些话本身就是极为无耻的。”⁵¹“白玫瑰”小组认为非常有必要和那些认为“犹太人是咎由自取”的人进行辩论，他们显然认为，因为受害者是犹太人，因此不能指望他们的所有非犹太德国同胞会自动谴责这一罪行。

不能忘记的是，在战争中有许多勇敢的德国人保护了犹太人。例如在柏林，居住在夏洛滕堡一所房子里的看门人奥托·乔格敏把犹太人藏在他房子的地下室里，设法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药品。大约有

五百五十名德国人在战后被以色列授予“国际义人”的荣誉称号，奥托·乔格敏是其中之一。⁵²

在柏林，总共约有一千七百名犹太人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估计有两到三万名非犹太德国人帮助过他们。⁵³这一数量比同期的华沙要少得多，如前所述，大约有二万八千名犹太人被藏匿在华沙，其中约有一万一千五百人幸存到战后，多达九万名非犹太波兰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们。

华沙犹太人幸存者的数字几乎是柏林的七倍。尽管在战争开始时，柏林的犹太居民人数（八万人）少于华沙（三十五万人），但柏林的面积是华沙的三倍。对于幸存人数的差异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最有说服力的是，大部分德国人不愿意为犹太人冒险。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在1939年或更早以前，大部分人，也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犹太人对于德国社会是有害的，如果那些仍然留在德国的人能走（或者被赶走）就更好了。”⁵⁴当然，这并不是说德国大众希望看到犹太人被屠杀。

普通德国民众对大屠杀的了解程度各不相同，虽然关于杀人工厂的消息是罕见的，但大家都觉得，去往东方的犹太人肯定是遇上了什么坏事。毕竟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希特勒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叫嚣要实现在“世界大战”中消灭犹太人的“预言”。大部分非犹太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命运并不担心，他们担心的是一旦战局不遂人愿，自身的命运将会如何。1942年12月，德国安全部门在一份关于法兰克尼亚地区的报告中写道：“在那些附属于教会的人们和农村人口中，最强烈的不安情绪来自俄国有关枪毙和灭绝犹太人的消息。消息常常给这些人带来极大的焦虑和担心。农民们的普遍思维是，我们不一定能赢得战争，如果犹太人再来德国，他们会对我们进行可怕的报复。”⁵⁵

查尔斯·布勒克尔·科尔萨特是一名居住在波兰瓦尔特高地区的日耳曼人，他曾亲耳听到过这种担心。他的舅舅已经知道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内幕，警告说：“一旦全世界得知了那里发生过的事情，就会有我们好看的。”布勒克尔·科尔萨特问他的母亲：“妈妈，威利舅舅的话是什么意思？”母亲回答：“嗯，这很难解释，你没有必要知道。”他回忆道：“我们[曾]认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一座严厉的监狱或类似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得到的食物很少，待遇也很差，也许整天被辱骂——不过不是殴打——还得为了微薄的食物努力干活。这就是我们的想象，觉得他们只是在大牢里受罚，我们的想象力还猜不到幕后隐藏的事情。”⁵⁶

战争结束前，曼弗雷德·冯·施罗德发现了奥斯维辛的可怕现实，他感到很害怕：“天哪，当我们输掉战争后，德国人会有怎样的报应？”以前在和苏联红军作战时，他感到“在战争中人命是不值钱的，如果你听到附近有俄国囚犯、游击队员或犹太人被枪决时——同一天还有五个你的战友死去——你会觉得那又怎样？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死去……所以你想的是‘怎样让自己活下去’，而对其他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了，你懂的”⁵⁷。

希姆莱当然担心自己在德国战败以后的命运。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他让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945年4月15日原封不动地落入盟军手中。但他的算盘完全成了一场灾难，当英国人进入集中营时，他们看到幸存的囚犯生活在极为可怕的条件。“我认为他们[英国士兵]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以前住在罗兹隔离区，后来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雅各布·泽贝斯坦说，“因为那里正在流行斑疹伤寒、痢疾和霍乱等。”⁵⁸不久，英军的推土机就开始为成千上万的死者挖掘坟墓。

4月21日，希姆莱向世界犹太人大会的瑞典官员诺伯特·马瑟提出抗议，称他没有因为把集中营移交给盟军而得到感谢。⁵⁹他还重复了3月中旬给克斯滕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些自私的谎言和借口：犹太人是德国的外来异己分子，必须被驱逐；犹太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有联系；他希望犹太人能和平移民，但其他国家没有合作；来自东方的犹太人携带斑疹伤寒，德国人建立火葬场是为了处理死去的病人；德国人和犹太人一起遭受了战争的苦难；集中营实际上是一类进行再教育的营地；等等。

在和马瑟的会面结束后，希姆莱仍然在徒劳地试图挽回自己的名誉。两天后，4月23日，他告诉瑞典外交官贝纳多特伯爵， he可以和盟国接洽，告诉他们德国会在西线向英国和美国无条件投降，但不会向苏联投降。当时，希姆莱认为希特勒可能已经自杀了，但希特勒仍然躲在帝国总理府花园地下的防御工事里。当他得知希姆莱在4月27日的广播中提出投降的消息时，感到极为愤怒。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回忆道：“这条新闻就像一枚炸弹落到地堡中，给了希特勒很大的打击。”⁶⁰希特勒说，希姆莱向西方盟军投降的企图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背叛”⁶¹。他认为“忠诚的海因里希”最终还是背叛了他，现在他准备自杀。

1945年4月30日下午，希特勒自杀了。他在留下的“政治遗嘱”中说道，他并不想在1939年发动战争，这场战争是由“那些本身是犹太人或为犹太人工作的国际政治家”引起的。他还暗示自己对犹太人的灭绝负有责任——对此还感到很骄傲。他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发动战争的“真正有罪的一方”将被“追究责任”。根据他的说法，这一方就是“犹太人”。“并且，”他说，“我要把事实告诉所有人，这一次，有数百万名成年男子死去，几十万名城市中的妇女和儿童被炸死或烧死，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没有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哪怕是用更为人道的方

式。”“政治遗嘱”的第二部分，也是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是，我要求国家的领导者及其追随者严格遵守种族法，无情地抵制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⁶²

希特勒对于他给世界带来的破坏毫无愧疚，他感到愤怒的是，西方——尤其是英国——没有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而站到他这一边来。对犹太人的仇恨仍然占据他内心的中心位置。虽然德国濒临崩溃，他也快要完蛋，但他仍然对自己杀死了六百万名犹太人而感到欣慰。

* * *

通过历史上的这一时刻，也可以重新审视纳粹领导人在制造和策划大屠杀上所起到的作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希特勒并没有简单地为一想法起草规划，然后命令他的部下去完成。他犯下罪行的方式要复杂得多，这反映了他是如何统治这个纳粹国家的。他无疑是一位克里斯玛型领导人，但他并没有以此“催眠”德国人民去服从命令。相反，他在努力让民众相信他是正确的。他曾说：“我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努力说服他人。”⁶³

希特勒在大屠杀背景下所起的主要作用是设定了一个愿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进入政界开始，这一愿景都是一贯的。他满怀激情地憎恨犹太人，这种情绪几乎压倒了一切。犹太人应该为德国的不幸负责，应该被削弱直到无害——不管用什么方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常常发生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希特勒认为在某个特定时间在政治上的需要。因此，大屠杀的历史上有许多的路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入侵苏联；希特勒决定在1941年秋天把德国及其保护国的犹太人送往东方；几个月后，他对美国宣战做出的反

应；1942年屠杀普通政府辖区犹太人的命令。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暴行，不是由某个重要决定造成的，而是由一系列逐渐升级的决定累积而成了我们称之为“大屠杀”的灾难。

纳粹国家的结构也在大屠杀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体现。不同的集中营使用了不同的毒剂——奥斯维辛的“齐克隆B”，特雷布林卡的引擎废气，以及海乌姆诺的毒气车，这表明了纳粹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下属自行其是，只要能更好地实现整体目标就可以。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面对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在战争期间，虽然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分子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使得与犹太人的对抗成为战争的必然结果，但他的注意力仍然主要集中在战场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大屠杀在实施时常常面临资源不足，因而显得杂乱无章。

这里并没有为希特勒开脱，毫无疑问他是罪魁祸首。正如世界上著名的希特勒研究专家所说：“没有希特勒，就没有大屠杀。”⁶⁴如果没有希特勒，这种罪行就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在关键时刻，他显然进行了干预，使这一进程更加极端。⁶⁵研究这一历史的人无一不认为，对于大屠杀希特勒应负主要责任，但是由于纳粹政权的运转方式，还有其他许多人也难逃罪责。

第三帝国在其缔造者消逝后不久就崩溃了。5月7日凌晨，在法国的兰斯，德国国防军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和英美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次日，在柏林，凯特尔元帅代表德国向苏联投降。至于希姆莱，他已经下令达豪和福洛森堡集中营不得将任何活口留给盟军。结果，就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几个钟头里，还组织了新的“死亡行军”，导致数千人丧生。据估计，1945年初在集中营里活着的七十一万四千名囚

犯中，有二十四万人至三十六万人在德国投降前夜死亡。⁶⁶希姆莱在德国投降后仅活了几天。5月23日，看管他的英国士兵发现这个自称海因里希·希辛格军士的人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前党卫军领袖和最为臭名昭著的战犯之一，于是希姆莱咬破毒胶囊而亡。

对于那些在集中营获得解放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所感到的并不仅仅是快乐。吉塞尔·西科维奇还记得她和同伴们得知战争结束时的情形：“我们听到了哨声——你知道他们使用像警察那样的哨子，那代表要点名了。我们跑了出来，那是阳光明媚的一天。这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女孩们站在场地的一边紧张地排起队来，因为我们不能磨蹭。突然，我听到扩音器里传来一个党卫军的声音：‘今天战争已经结束，你们自由了，可以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做你们想做的事。但我们被要求留在这里，守着你们直到俄国军队到来……’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感到很痛苦……因为在他说我们‘自由了’那一刻，特别是他说‘可以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我想]我能去哪里？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我是否应该回到他们带走我的地方？……我父母的一切都被留在那栋无人看管的房子里……犹太人的东西早就被拿光了。所以我愿意回去吗？谁想回到一个自己遭受厄运但人人袖手旁观的地方？谁想去那里呢？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

“你知道，我一直在阅读有关在大屠杀发生前世界各国拒绝犹太人入境的史料。没有人愿意接收犹太人，没有。那时还没有以色列，英国、美国，还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开放地区，全都不接收犹太人。所以，我应该为获得自由而高兴吗？当时我十八岁了，我是什么？什么都不是……这确实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意识到自己获得自由的前一分钟，我还在拼命寻找能吃点什么，对任何别的事情都毫无兴趣。七十年过去了，我无法忘记它，无法忘记那个罪恶之地。”⁶⁷

后 记

最后,我想再说几句,关于为什么我要给这部书加上“一部新的历史”这样一个副标题,以及写作本书时所遇到的一些挑战。只要刚刚读过本书的人都会明白,这并不是一段简单直白的历史。也许有点儿令人惊讶,“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并不能对其加以简明的概括,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燔祭”或“牺牲”,直到最近才和灭绝犹太人联系在一起。

现在,这个词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并没有普遍的共识。它是仅限于指屠杀犹太人,还是指所有种族灭绝的行为?例如,成吉思汗对待波斯人的方式也可以称为“大屠杀”吗?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大屠杀”仅限于指屠杀犹太人,就可能会让我们不能理解纳粹暴行的广泛性。我们不应脱离纳粹迫害和屠杀大量其他人种来孤立看待对犹太人的屠杀——例如“安乐死”行动中的残疾人、被蓄意饿死的数百万名斯拉夫人等。不仅如此,正如我们所知,“大屠杀”实行之时,另一项大规模屠杀计划——“东方总计划”正在讨论之中,其结果会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纳粹终止了这一计划,只是因为他们的被打败了而已。

然而,并不是说其他这些行为可以和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愿望等量

齐观——对犹太人的仇恨始终在纳粹思想中占据核心位置。基于这样的背景，我把“大屠杀”一词理解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并在实践中最终变为要将他们灭绝。同时我也承认，必须把这一罪行放在更为广阔的图景下来加以理解。

你可能会问：如果我对这个词有异议，为什么我还要把这本书命名为“大屠杀”？这仅仅是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换成别的名称对阅读并无裨益。而且，我认为这个词用在这里是恰当的，因为它反映出灭绝犹太人是人类历史上一宗极为特别的可怕罪行。

我知道最后这句话一定会引起争论。我自己曾参加过许多这样的讨论，讨论大屠杀是否存在某些“特别之处”，抑或不过是人类历史上许多可怕的暴行之一。不过，最终我接受了已故的戴维·塞萨拉尼教授的观点。几年前，他在与我交谈时雄辩地指出了大屠杀的特殊性：“我认为，由一位领导人决定，在一个可能的时间框架内从肉体上完全消灭一个宗教民族，并设计和制造了相关装置来加以实现，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¹

在进行有关大屠杀的写作时，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亲历者证词的作用。我曾见过数百位亲历者，从中获益良多，我相信，他们的证言蕴藏着巨大的价值——也许对此你并不感到惊讶。实际上，关于见到他们并就他们的过往提问的益处，有一种可算得上是存在主义的观点。当你和他们交谈时，历史仍然存在。

出现在这本书里的证词，大部分从未公开发表过——这是我认为应该加上“新的”历史一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要说的是，在我最近的作品《来自奥斯维辛的感动》中所做的采访——与海莉娜·比伦鲍姆、吉塞尔·西科维奇、马克斯·爱泼斯坦、艾达·格林斯潘、赫尔曼·霍伦莱纳、塔德乌什·斯姆林茨基、弗雷达·温曼——从来没有以

书面形式出版过。

我很荣幸能成为以这种方式接触到那段历史的最后一代人之一。事实上，我在两个方面都很幸运，一是在二十五年前，我和我的电视片制作团队刚开始接触前纳粹党员，他们大多刚刚从职业生涯退休，因此可以不必顾虑工作而畅所欲言，同时也没有老到暮气沉沉。二是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我们可以前往东欧和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见到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自由谈论过战争经历的人。所以，我们是第一批接触到这些重要的原始资料的人。

然而，我始终认为，以一定的质疑态度来看待每一种史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有自信，在研究和拍摄这些亲历者时，我们采取了最严格的保障措施。我曾在别的地方写过我们是如何完成这项困难任务的²，例如，我们会尽可能地把每一位亲历者的讲述和当时的文件相互印证。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如果最后我们对某个被访者证词的真实性有任何的疑虑，那么我们就只能放弃这些采访记录。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即使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人们仍然能够非常清楚地回忆起生活中的关键事件。我想大家都会认同这一点。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母亲在近四十年前去世了，虽然我想不起来几个月前的某天午餐我吃了什么，但我能非常详细地记起我母亲是怎样去世的。有的事无关紧要，有的事却改变了生活。³

当然，在采访大屠杀幸存者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些特殊因素。最关键的是，始终要记住，奥斯维辛、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等营地的幸存者并不代表那里大多数人的经历，大多数人的经历就是被屠杀，而我们却无法与他们交谈。

我还认为，只有进行过实地考察后才能着手写作大屠杀的历史，这很重要——也是我希望本书能提供一些不同视角的地方。我感到自己

从遗址考察中受益匪浅,例如,我永远难忘,多年前我的朋友、在奥斯维辛博物馆工作的天才历史学家米雷克·奥伯斯塔奇克,带我参观奥斯维辛主营地和比克瑙的每一个地点,在那里,纳粹用“齐克隆B实施屠杀”。我和他按照纳粹进行屠杀的年代顺序访问了那些遗址:从主营地第11号楼的地下室,到党卫军行政办公室旁边的火葬场;从奥斯维辛—比克瑙偏僻角落里的“小红屋”“小白屋”,到1943年在比克瑙兴建起来的巨大火葬场的遗迹。亲身体会这些地理位置上的变换,有助于我理解纳粹对于集中营设想的变化——我希望在书中已经讲清了这一点。

我发现访问和这段历史有关的其他上百个地方也同样很有意义:站在索比堡集中营的遗址上,风吹过林间,唯觉孤独萧瑟;柏林郊外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用于点名的半圆形广场是如此空旷;我还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希特勒的“狼穴”出发,来到乌克兰、白俄罗斯那遍布屠场的原野。

当然,有时也可以将实地考察和见证者的经历结合到一起,这给我的工作留下了一些最难忘的时刻。记得有一次我在白俄罗斯拍摄一个男人,他曾被迫和其他村民一起走在纳粹认为有地雷的道路上,德国士兵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他们,等待地雷被这些人肉探测器引爆。幸运的是,他活着走到了下一个村庄。我们在发生这件事的地点进行了拍摄,他和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非常感人。他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极为可怕的困境,如果他觉得前面可能是地雷,那么是踩上去自杀,还是绕着走过去,让后面的德国人倒霉?如果有一名德国兵被炸死,其他人就会立刻处决所有的村民。要么死于地雷,要么死于子弹,这就是他认为自己必须在白俄罗斯那条偏僻小路上做出的选择。万幸的是,这次他没有遇上地雷。

我必须补充说，我不希望这本书仅仅依靠口头证词来支撑，这就是为什么其中还引用了当时的许多演讲、日记和文件。战后在这一领域进行过大量优秀的学术研究，我的目的就是把所有这些资料加以汇编，从中审视大屠杀决策的发展过程。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我读过许多令人震惊的大屠杀回忆录，以及对于这一罪行极富洞察力的学术著作，但没有看到过一部把第一手采访证言的情感力量和对纳粹国家阴谋的剖析按照我所设想的方式结合起来的综合性著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希望这本书是一部“新的”历史。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我在和世界上许多著名历史学家的谈话中感到了学术视野的变化。在我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意见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目的主义者，他们认为希特勒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大屠杀发生好几年之前他就以屠杀犹太人为目的了；另一派是机制主义者，他们认为理解事件的最好方式是研究希特勒与众多外部势力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赞同前一派的严肃历史学家越来越少。在后一派学者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何时可以定为大屠杀的开端。我听到过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最终的决定是在1941年7月做出的，也有人认为是在10月或12月，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在1942年夏天。近年来，学术界已经不再追求界定某个单一的时间点，而是力图界定纳粹反犹政策加剧的一系列阶段。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目的主义者的论调，也并不赞同去寻找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我很早以前接触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些人因为这场罪行太过可怕，就认为这一定是在某个非常时刻精心策划的。但在我看来，这是个错误的跳跃。正如本书所希望展示的那样，大屠杀的历史是一个逐渐发展、充满曲折的过程，直到在纳粹的杀人工厂中定

格为最终的形式。

最后，尽管你刚刚读过的这本书的内容令人痛苦，但我认为了解这一罪行为什么发生以及如何发生仍然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段历史也许比其他历史更能告诉我们人类可以做些什么。

注 释

1. 仇恨的起源

1. BayHStA, Abt. IV, R W GrKdo, Bd 50/08. 英文版见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1: *The Rise to Power 1919–1934*,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1, pp.12–14。
2. Brigitte Hamann, *Hitlers Wien. Lehrjahre eines Diktators*, Piper, 1996.
3. Thomas Weber, *Hitler's First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77.
4. John 7: 1.
5. 出处同上, 8: 59。
6. 出处同上, 8: 44。
7. Michael R. Marrus and Robert O. Paxton, *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7. 作者指出:“从1959年到1963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从礼拜仪式中删除了这些话,以及其他攻击犹太人的段落。”
8. Martin Luther, *On the Jews and Their Lies*, 1543, in *Luther's Works*, vol.47, Fortress Press, 1971, pp.268–293.
9. Christian Wilhelm von Dohm, *Über die bürgerliche Verbesserung der Juden*, 1781, 英文版见 Paul Mendes-Flohr and Jehuda Reinharz eds., *The Jews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0。
10. George L. Mosse,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Howard Fertig, 1998, p.149.
11. Wilhelm Heinrich Riehl, *Land und Leute*, 1854, vol.1 of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as a Basis for a German Social Politics*, 英文版见 Michelle Facos, *An Introduc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Art*, Routledge, 2011, p.271。
12. Susanne Karstedt, “Strangers, Mobilis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Weak Ties:

- Railway Traffic and Viol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South-West Germany”, Barry S. Godfrey, Clive Emsley and Graeme Dunstall eds., *Comparative Histories of Crime*, Willan Publishing, 2003, pp.89—109, 此处见 p.93。
13. David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1933–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05.
 14. 出处同上, p.107。
 15. Laurence Rees, *The Dark Charisma of Adolf Hitler*, Ebury Press, 2012, p.44.
 1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7. Alyssa A. Lonner, *Mediating the Past: Gustav Freytag, Progress, and German Historical Identity, 1848–1871*, Peter Lang, 2005, 作者称《借方和贷方》是 [19] 世纪畅销程度数一数二的作品, p.37。
 18. 引自 Alex Bein, *The Jewish Question: Biography of a World Problem*,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0, p.617。
 19. Heinrich Class 以 Daniel Frymann 的笔名所著, *Wenn ich der Kaiser wär’: Politische Wahrheiten und Notwendigkeiten* (If I Were Kaiser: Political Truths and Necessities), 第四版, Dieterich, 1913。见 Harry Pross ed., *Die Zerstörung der deutschen Politik: Dokumente 1871–1933*, Richard S. Levy 译, Fischer, 1959。
 20. Arthur de Gobineau,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1855, 英文版见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 William Heinemann, 1915。
 21. Algernon Freeman-Mitford, 1st Baron Redesdale, Introduction, 见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1, Elibron Classics, 2005, F. Bruckman 首版, Munich, 1911, pp.v—vi。
 22. 出处同上, p.350。
 23.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Penguin, 2001, p.660 n. 116.
 24. Mosse, *German Ideology*, p.104.
 25. BAArch NS 33/89, p.41, The Reichsführer SS (SS-H A/ZK./Az. B 17a), Berlin, 11 April 1938, regarding selection of candidates as SS leaders, mailing list V. 亦见 Tom Segev, *Soldiers of Evil: The Commandants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Diamond Books, 2000, p.97。
 26. Francis Galton, *Hereditary Genius*, Macmillan, 1869, Introduction, p.1.
 27.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The Efficiency of Our Ra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Weak), 引自 Peter Watson, *The German Genius*, Simon & Schuster, 2011, p.434。
 28. 统计数字来自芝加哥大学 Richard Levy 教授, 见其 1996 年 5 月 15 日对 Daniel Goldhagen 的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的评论, <http://www.vho.org/aaargh/engl/crazygoldie/reviews96.html>。
 29. Robert Weinberg, “The Pogrom of 1905 in Odessa: A Case Study”, John D. Klier and Shlomo Lambroza eds., *Pogroms: Anti-Jewish Violence in Modern Russian Histor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48—89.
30. Joshua Sobol, *Weiningers Nacht*, Europa-Verlag, 1988, pp.145—146.
 31. BAArch R 8034 III/295, Reichslandbund Pressearchiv, Lup-Lz, p.11a, R. Tag Z. Nr. 121, 13 March 1910, Lueger speech, 11 January 1894, state parliament of Lower Austria.
 32. 参见 Hamann, *Hitlers Wien*。
 33. Kershaw, *Hitler: Hubris*, p.67.
 34. 出处同上, p.96。
 35. 引自 Jay Winter, *Remembering War: The Great War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84。
 36. 出处同上, p.86。
 37. 1916年8月4日拉特瑙的信件, 引自 Antony Loewenstein, *My Israel Question*,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30。
 38. Nigel Jones, *The Birth of the Nazis: How the Freikorps Blazed a Trail for Hitler*, Constable & Robinson, 2004, pp.194—195.
 39. Rees, *Charisma*, p.22. 此处的引文也包括 Fridolin von Spaun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 纳粹党的诞生(1919—1923)

1. Robert Waite, *Vanguard of Nazism*, W. W. Norton, 1969, p.206.
2. Rudolf von Sebottendorff, *Bevor Hitler kam. Urkundliches aus der Frühz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wegung*, Deukula-Verlag Grassinger, 1933, pp.41—43.
3. 出处同上, pp.57—60。
4. Joseph Howard Tyson, *Hitler's Mentor: Dietrich Eckart, his Life, Times, & Milieu*, iUniverse, 2008, p.50.
5. 出处同上, p.15。
6. *Auf gut deutsch. Wochenschrift für Ordnung u. Recht*, ed. Dietrich Eckart, vol.1, 1919, no.2, p.18.
7. 出处同上, vol.2, 1920, no. 30/34, p.392。
8. Balthasar Brandmayer, *Meldegänger Hitler 1914—1918*, Walter, 1933, pp.71—72. 英文版见 Laurence Rees, *The Dark Charisma of Adolf Hitler*, Ebury Press, 2012, p.13。
9. Joachim C. Fest, *Hitler*,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p.133.
10. Margarate Plewnia, *Auf dem Weg zu Hitler*, Schönmey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70, p.67. 转引自 Albert Zoller, *Hitler privat-Erlebnisbericht seiner Geheimsekretärin*, Droste, 1949, p.118. 英文版见 Rees, *Charisma*, p.47。
11.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Phoenix Press, 2000, p.217, 1942年1月16—17日夜。
12. 出处同上。

13. Tyson, *Hitler's Mentor*. 亦见 Eberhard Jäckel a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0, p.117。Otto Dietrich, *12 Jahre mit Hitler*, Isar Verlag, 1955, p.178. BArch NS 26/514, Letter of Gottfried Grandel to the main archive of the NSDAP, Freiburg i. B., 1941年10月22日。
14. Ernst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der NSDAP 1919–1933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Rauch, 1968, p.60. 英文版见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1: *The Rise to Power 1919–1934*,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83, p.14。
15. Eberhard Jäckel and Axel Kuhn eds.,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0, p.366, 希特勒在罗森海姆纳粹集会上的演讲, 1921年4月21日。
16. N. H. Baynes ed.,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Early Speeches, 1922–1924, and Other Selections*, Howard Fertig, 2006, p.17, 1921年4月12日的演讲。
17. 出处同上, p.42, 1922年9月18日的演讲。
18. 出处同上, p.13, 1922年4月12日的演讲。
19. 出处同上, p.30, 1922年7月28日的演讲。
20. 出处同上, p.17, 1922年4月12日的演讲。
21. 出处同上, p.21, 1922年7月28日的演讲。
22. A. Hitler, “Rathenau und Sancho Pansa”,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921年3月13日, p.2。
23.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4. Rees, *Charisma*, pp.30–31。
2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7. Sönke Neitzel, *Tapping Hitler's Generals: Transcripts of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2–1945*, Frontline Books, 2013, p.67, Ludwig Crüwell 将军的话。
28. Baynes ed.,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pp.15–16, 1922年4月12日的演讲。
29. 出处同上, p.42, 1922年9月18日的演讲。
30. Peter Longerich, *Holocaust: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3。
31. “An die Brüder der USP., MSP., KPD.”, *Deutscher Sozialist*, Folge 1, 1920年6月4日。载于 Julius Streicher, *Ruf zur Tat. Aufsätze aus den Kampffahren 1920–1922*, Verlag Der Stürmer, 1937, pp.11–13。亦见 Randall L. Bytwerk, *Julius Streicher*, Cooper Square Press, 2001, p.10。
32. Bytwerk, *Streicher*, p.2。
33. StAN, Polizeipräsidium Nürnberg-Fürth 541, doc. 187, 对施特赖歇尔判决的副件, 施韦因富特法院陪审法庭, 攻讦宗教罪, 1922年9月5日。
34. 出处同上, doc.103, 1922年12月21日纳粹在纽伦堡文化协会举行的会议的报告。
35. 出处同上, 1922年5月16日基青根市议会给纽伦堡菲尔特州警察部的报告, “评论了1922年5月7日在基青根德国劳动社团 (Deutsche Werkgemeinschaft) 的会

议上来自纽伦堡的小学教师J.施特赖歇尔的演讲”。

36. *Hitler's Table Talk*, p.154, 1941年12月28日—29日夜。
37. Nuremberg Trial Proceedings, vol.12, p.308, 115th day, Friday 26 April 1946. 亦见 Bytwerk, *Streicher*, p.15。
38. 出处同上, 亦见 Rees, *Charisma*, p.49。
39. Deuerlein ed., *Aufstieg*, p.146. 英文版见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vol.1, pp.25—26。
40. Peter Viereck, “Stefan George’s Cosmic Circle”, *Decision*, October 1941, p.49.
41. Rees, *Charisma*, p.76.
42. Werner Jochmann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Dokumente*,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pp.88—89; 1922年1月7日希特勒备忘录。英文版见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vol.1, p.23。
43. Baynes ed.,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p.40, 1922年7月28日希特勒的演讲。
44. BArch N 1126/8, Leseliste No.107.
45. BArch N 1126 141 K, 1922年1月12日希姆莱日记。原件在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46. 出处同上, 1922年6月24日。
47. 出处同上, 1921年11月22日。
48. 出处同上, 1922年5月27日。
49. 出处同上, 1922年6月7日。
50. 例如, 在1924年12月的大选中, 最大的政党是社会民主党, 得票率为26%。还有如得票率为10.1%的德国人民党、9%的共产党和6.3%的德国民主党, 也都反对纳粹党的反犹政策。
51. Rees, *Charisma*, p.37.
52. Albrecht Tyrell ed., *Führer befiehlt ... Selbstzeugnisse aus der 'Kampfzeit' der NSDAP. Dokumentation und Analyse*, Droste, 1969, pp.281—283. 英文版见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vol.1, pp.34—35。

3. 从革命到投票箱(1923—1933)

1. 恩斯特·汉弗斯塔恩格尔的话, 引自 Jan Friedmann, *Der Spiegel*, 23 June 2010;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adolf-hitler-s-time-in-jail-flowers-for-the-fuehrer-in-landsberg-prison-a-702159.html>。
2.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Houghton Mifflin, 1971, pp.118—119.
3. 出处同上, pp.180—181。
4. 出处同上, p.57。
5. 出处同上。
6. 出处同上, p.63。

7. 出处同上, p.59。
8. 出处同上, p.65。
9. 出处同上, pp.62—63。
10. 出处同上, p.206。
11. 出处同上, p.305。
12. Aldous Huxley, “Notes on Propaganda”, *Harper’s Monthly Magazine*, December 1936.
13. Hitler, *Mein Kampf*, p.679.
14.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Phoenix Press, 2000, 1941年10月25日, p.87。
15. Hitler, *Mein Kampf*, p.65.
16. 首版见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922年4月22日。亦见 Laurence Rees, *The Dark Charisma of Adolf Hitler*, Ebury Press, 2012, p.29。
17. 和鲁登道夫将军的谈话。Wilhelm Breucker (Ludendorff’s adjutant), *Die Tragik Ludendorffs, Rauschenbusch*, 1953, p.107; 英文版见 J. R. C. Wright, *‘Above Parties’: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 the German Protestant Church Leadership 1918–193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78; 亦见 Rees, *Charisma*, p.135。
18.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Phoenix Press, 1995, p.150. 亦见 Rees, *Charisma*, pp.135—136。
19.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Aufzeichnungen 1923–1941*, vol.9, K. G. Saur, 1998, pp.233—235, 1941年4月8日。亦见 Rees, *Charisma*, p.138。
20. Max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vol.2, 1935—1938, Bolchazy-Carducci, 1937年11月23日希特勒的演讲, p.980。
21. Hitler, *Mein Kampf*, p.232.
22. 出处同上, p.316。
23. 出处同上, p.255。
24. 出处同上, p.654。
25. Konrad Heiden, Introduction, 出处同上, p.xv。
26. Roger Moorhouse, *His Struggle: Hitler in Landsberg Prison, 1924*, Endeavor Press, 2015. Kindle 版, 位于 556—600。
27. Otto Leybold, Governor of Landsberg Prison, “Report on Adolf Hitler”, September 1924, 见 <http://alphahistory.com/nazigermany/Hitlers-prison-report-1924/>。
28. Moorhouse, *His Struggle*, Kindle 版, 位于 625—631。
29. Kurt Lüdecke, *I Knew Hitler*, Jarrolds, 1938, pp.217—218. 亦见 Rees, *Charisma*, p.66。
30. Report, *Der Nationalsozialist (TLeipzig)*, vol.1, no. 29, 1924年8月17日, 引自 Eberhard Jäckel a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0, p.242.
31. Dennis Mack Smith, *Mussolini: A Biography*, Vintage, 1983, p.172. 亦见 Rees, *Charisma*, p.64。
32.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3.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4.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vol.1/1, K. G. Saur, 2004, pp.116—117, 1924年3月31日。
35. 出处同上, 1925年6月8日。
36. 出处同上, 1923年11月14日。
37. 出处同上, 1924年4月10日。
38. 出处同上, 1924年6月10日。
39. Laurence Rees,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 1997, p.33.
40.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vol.1/1, p.108, 1924年3月17日。
41. 出处同上, pp.108—109, 1924年3月20日。
42. 出处同上, p.201, 1924年8月19日。
43. 出处同上, p.253, 1924年12月23日。
44. 出处同上, pp.326—327, 1925年7月14日。
45. 出处同上, Teil II: *Diktate 1941—1945*, vol.2, K. G. Saur, 1996, pp.498—499, 1941年12月13日。
46. 出处同上, Ibid., Teil I, vol.1/1, p.108, 1924年3月17日; pp.326—327, 1925年7月14日。
47. Peter Longerich, *Goebbels*, Vintage, 2015, pp.62—63.
48.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vol.1/2, K. G. Saur, 2004, pp.55—56, 1926年2月15日。
49. 出处同上, p.73, 1926年4月13日。
50. Gerhard L. Weinberg ed., *Hitler's Second Book: The Unpublished Sequel to Mein Kampf*, Enigma Books, 2006, p.234, Kindle版, 位于3978。
51. 出处同上, p.234, 位于3986。
52. 出处同上, p.129, 位于2367。
53. *Völkischer Beobachter*, no. 35, 1927年2月12日, 引自 Detlef Mühlberger, *Hitler's Voice*, vol.1: *Organis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zi Party*, Peter Lang, 2004, p.240。
54.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vol.395, docs. 13717—13718, 1928年3月24日。亦见 Peter Longerich, *Holocaust: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5。
5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6. Albrecht Tyrell ed., *Führer befiehlt . . . Selbstzeugnisse aus der 'Kampfzeit' der NSDAP*, Gondrom, 1991, pp.235—236. 英文版见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1: *The Rise to Power 1919—1934*,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83, p.55。
57. Uriel Tal, *'Political Faith' of Nazism Prior to the Holocaust*, Tel Aviv University, 1978, p.28. Rees, *Charisma*, pp.81—82.
58. Max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vol.1: 1932—1934, Bolchazy-Carducci, 1990, p.112, 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的演讲。

5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1. Rees, *Nazis*, p.74.
62.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3. Rees, *Nazis*, p.46.
64. David Redles, “Nazi End Times: The Third Reich as Millennial Reich”, 载于 Karolyn Kinane and Michael A. Ryan eds., *End of Days: Essays on the Apocalypse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ity*, McFarland, 2009, pp.173—196, 此处见 p.182。
65. Der Angriff, 1929年9月9日, 引自 Longerich, *Goebbels*, pp.91—92。
66. Nds. HStAH, Hann. Des. 310 I A, Nr. 35. 英文版见 Noakes and Pridham ed., *Nazism*, vol.1, p.76。
67. 汉诺威长官提交给德国内政部长的有关1934年12月、1935年1月的报告, 1935年2月4日, 载于 Klaus Mlynek ed., *Gestapo Hannover meldet ... Polizei- und Regierungsberichte für das mittlere und südliche Niedersachsen zwischen 1933 und 1937*, Verlag August Lax, 1986, p.315。原始材料见 Nds. HStAH, Hann. 180 Hannover Nr. 799, ff. 191—203。
68. Laurence Rees, *Selling Politics*, BBC Books, 1992, p.24.
6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70. Lion Feuchtwanger, “Wie kämpfen wir gegen ein Drittes Reich?” (我们如何同第三帝国做斗争), *Welt am Abend*, 1931年1月21日。英文版见 Anton Kaes, Martin Jay and Edward Dimendberg eds.,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167。
71. Heinrich Mann, “Die deutsche Entscheidung” (德国的决定), *Das Tagebuch*, vol.12, no. 51, 1931年12月19日, 英文版见 Kaes, Jay and Dimendberg,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pp.164—166。
72.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以及 Rees, *Nazis*, 1997, p.171。
73. 施特拉塞尔的演讲, 柏林体育宫, 1931年10月23日, *CV-Zeitung. Blätter für Deutschtum und Judentum*。Organ des Central-Vereins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 e. V., Berlin, 1931年12月11日, vol.X, no. 50, p.572。
74. Otto Meissner, *Aufzeichnung über die Besprechung des Herrn Reichspräsidenten mit Adolf Hitler am 13. August 1932 nachmittags 4.15*, 引自 Walther Hubatsch, *Hindenburg und der Staat. Aus den Papier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und Reichspräsidenten von 1878 bis 1934*, Musterschmidt, 1966, p.338。英文版见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vol.1, p.104。
75.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Kommentiert von einem deutschen Zeitgenossen*, vol.1: *Triumph*, R. Löwit, 1973, p.158, 迈斯纳给希特勒的信, 1932年11月24日。
76. Konrad Heiden, *Adolf Hitler. Das Zeitalter der Verantwortungslosigkeit. Eine Biographie*, Europa-Verlag, 1936, p.278.
77. 犹太电讯社的报道, 1934年8月3日。

78. 《标准晚报》的采访,1933年5月16日。亦见犹太电讯社当日的报道。
79. *Völkischer Beobachter*, Norddeutsche Ausgabe, vol.46, no. 6, 6 January 1933, p.1. 亦见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vol.1, p.175。

4. 巩固权力(1933—1934)

1.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Aufzeichnungen 1923—1941, vol.2/3, K. G. Saur, 2006, p.119, 1933年1月30日。
2. Laurence Rees, *Their Darkest Hour*, Ebury Press, 2007, pp.206—207, 也有一些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 摘自 Luise Solmitz 夫人的日记, 1932年1月4日至1933年3月5日, 见 Werner Joch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pp.400—432, 此处见 pp.422—423。
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8. Rees, *Darkest Hour*, p.136. 也包括未发表的证词。
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0. Max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vol.1: 1932—1934, Bolchazy-Carducci, 1990, pp.246—247, 希特勒1933年2月10日的演讲。
11. 出处同上, p.253, 希特勒1933年2月15日的演讲。
12.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vol.2/3, p.137, 1933年2月28日。
13.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4. Domarus, *Hitler* (英文版), vol.1, pp.298—302。
15. *Völkischer Beobachter*, no. 89, 1933年3月30日, 引自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Kommentiert von einem deutschen Zeitgenossen*, vol.1: *Triumph*, R. Löwit, 1973, pp.251—252。
16. Laurence Rees,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 1997, p.105.
17. Leni Yahil, *The Holocaust: The Fate of European Jewry, 1932—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95—97.
18. Jürgen Matthäus and Mark Roseman eds., *Jewish Responses to Persecution*, vol.1: 1933—1938, AltaMira Press/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010, CV 媒体发布于1933年3月24日, 载于 *CV-Zeitung*, 1933年3月30日, 文件1—5, p.15。
19. Rees, *Nazis*, pp.71—72, 以及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0. 出处同上, pp.72—73, 以及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2.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3. 美国大屠杀博物馆数字, <http://www.ushmm.org/>。
24. Yahil, *Holocaust*, p.92.
2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7. 1933年德国统计局的数字, 引自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2: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1933–1939*,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522。
28. StAN, LG Ansbach, Strafprozessakten, Große Strafkammer 50/34, Bär, vol.II, p.185, 库尔特·阿道夫·巴尔的证词, 1934年4月14日。
29. 出处同上, p.63, 玛丽·布尔赖因的证词, 1934年4月4日。
30. BayHStA, StK 6410, pp.100—101, 103—104, 105, 113, 127, 128, 146, 147, 1934年7月14日库尔特·巴尔及其同伙危害公共安全的裁决。
31. BayHStA, MIInn 73708, p.48, 安斯巴赫地区法院高级检察官对1934年3月25日贡岑豪森事件的报告。
32. 出处同上, pp.15—16, “中法兰克尼亚政府冲锋队最高领导人”副手的信, 1934年3月27日的信件。
33. BayHStA, StK 6410, p.160, 德国内政部长给巴伐利亚自由州总理的信, 1934年7月25日。
34. 出处同上, p.73, 起诉书, 1934年8月11日, 库尔特·巴尔和其他两人谋杀及谋杀未遂。
35. BayHStA, MJu 23436 Office of U.S. Chief of Counsel, APO 124 A, U.S. Army, Memo to: Commanding Officer, Company B, Third Military Government Regiment, APO 170, U.S. Army, subject: Murder of German Jewish Subject. 来自对 Dr Benno Franz Theodor Martin 的审讯, 1945年10月19日。
36. Barbara Distel and Ruth Jakusch eds., *Concentration Camp, Dachau 1933–1945*,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Dachau, 16th edn, 1978, p.40.
37. E. F. M. Durbin and John Bowlby, *Personal Aggressiveness and War*, Routledge, 2007, p.134.
38. Matthäus and Roseman eds., *Jewish Responses to Persecution*, vol.1, Kurt Rosenberg, 1933年8月20日和31日日记, 文件 2-2 LBINY AR 25279, pp.37—38。
39. Nikolaus Wachsmann, *KL: 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Little, Brown, 2015, p.30.
40. *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 1933年3月13日, 引自 Peter Longerich, *Himm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50。
41. 参见前文。
42. Distel and Jakusch eds., *Dachau*, p.48, Johann Deller 的释放文件, 1934年10月12日。
43. 戈林的证词, 1946年3月18日纽伦堡审讯第84日, <http://law2.umkc.edu/faculty/projects/ftrials/nuremberg/Goering1.html>。

44. Rudolf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Phoenix Press, 2001, p.71.
45. Tom Segev, *Soldiers of Evil: The Commandants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Diamond Books, 2000, p.28.
46. Christopher Dillon, *Dachau and the SS: A Schooling in Viol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7.
4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以及 Rees, *Nazis*, p.51。
48. *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 1933年3月13日, 引自 Longerich, *Himmler*, p.150。
49. Max Abraham, *Juda verrecke. Ein Rabbiner im Konzentrationslager* (*Death to Juda: A Rabbi in a Concentration Camp*), 重印于 Irene A. Diekmann and Klaus Wettig eds., *Konzentrationslager Oranienburg. Augenzeugenberichte aus dem Jahre 1933*, Verlag für Berlin-Brandenburg, 2003, pp.117—167, 此处见 p.128。
50. Max Abraham, *Juda verrecke. Ein Rabbiner im Konzentrationslager*, Druckund Verlagsanstalt Teplitz-Schönau, 1934, p.154.
51. Landesamt für Bürger- und Ordnungsangelegenheiten Berlin, Reg. No. 50909, Entschädigungsakte Max Abraham.
52. *Manchester Guardian*, 1934年1月1日,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jan/01/dachau-nazi-germany-second-world-war>.
53. Hans Beimler, *Im Möderlager Dachau*, https://www.hs-augsburg.de/~harsch/germanica/Chronologie/20Jh/Beimler/bei_da00.html.
54. *Amper-Bote*, 1933年9月7日, 载于 Dillon, *Dachau*, p.228。
5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他扩展的这一观念见 Rees, *Nazis* (1997年版), p.53。
5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0. Dillon, *Dachau*, p.44.
61. Franciszek Piper, *Auschwitz 1940–1945: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 vol.3: Mass Murder,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2000, p.71.
62. 出处同上。
63. Dillon, *Dachau*, p.52.
64. 出处同上。
65.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 2005, p.25。亦见 Danuta Czech, “The Auschwitz Prisoner Administration”, 载于 Yisreal Gutman and Michael Berenbaum eds., *The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64。
66.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p.78.
67. 出处同上, pp.65—66。
68. *Als sozialdemokratischer Arbeiter im Konzentrationslager Papenburg*, Verlagsgenossenschaft

ausländischer Arbeiter in der UdSSR, 1935, p.20 (见注释 70)。

69. Wolfgang Langhoff, *Die Moorsoldaten. 13 Monate Konzentrationslager*, AufbauVerlag, 1947, pp.251—252.
70. *Als sozialdemokratischer Arbeiter im Konzentrationslager Papenburg*, 作者是一位博尔格穆尔集中营的前犯人, 他隐去了姓名以保护他的家人。该书的序言经过确认为另一名狱友威利·布雷德尔所写。
71. *Als sozialdemokratischer Arbeiter*, p.35.
72. Rudolf Diels, *Lucifer ante Porta . . . es spricht der erste Chef der Gestapo. . .*,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50, pp.260—262.
73. Langhoff, *Moorsoldaten*, pp.251—252.
74. *Als sozialdemokratischer Arbeiter*, p.51.
75. Langhoff, *Moorsoldaten*, pp.251—252.
76. 马克斯·汉佩尔的报告, 引自 Hans-Peter Klausch, *Tätergeschichten. Die SS-Kommandanten der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m Emsland*, Edition Temmen, 2005, p.231。
77. 英文版见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1: *The Rise to Power 1919—1934*,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1, p.175。
78. Dillon, *Dachau*, p.88.
79. Wachsmann, *KL*, p.83.

5. 《纽伦堡法》(1934—1935)

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 Nikolaus Wachsmann, *KL: 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Little, Brown, 2015, p.90.
3. Yehuda Bauer, *Jews for Sale? Nazi-Jewish Negotiations, 1933—1945*,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9.
4. Aaron Berman, *Nazism, the Jews, and American Zionism, 1933—1948*,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9.
5.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Houghton Mifflin, 1971, p.325; 亦见 Jeffrey Herf, *The Jewish Enemy: Nazi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Two and the Holocaust*, Belknap Press, 2006, p.75。
6. 参见前文。
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8. Laurence Rees,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 1997, p.75, 以及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9. Herbert Michaelis et al. eds.,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genwart*, vol. IX, Wendler, 1964, p.397. 英文版见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2: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1933–1939,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530。

10.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vol.2, pp.531—532.
11. Max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vol.2: 1935—1938, Bolchazy-Carducci, 1992, p.706, 1935年9月15日演讲。
12. *Jewish Post*, Indiana, 1935年9月13日, <https://newspapers.library.in.gov/cgi-bin/indiana?a=d&d=JPOST19350913-01.1.1>。
13. Domarus, *Hitler* (英文版), vol.2, p.707, 1935年9月15日戈林的演讲。
14. Hans Mommse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nthinkable: ‘The Final Solution of the Jewish Question’ in the Third Reich”, 载于 Michael R. Marrus ed., *The Nazi Holocaust*, vol.3: *The ‘Final Solu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ss Murder*, Meckler, 1989, pp.224—253, 此处见 p.223。
15. 这一解释由作者而非莫姆森提出。
16. Reinhard-M. Strecker, *Dr. Hans Globke. Aktenauszüge, Dokumente*, Rütten & Loening, 1961, p.115, 转引自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vol.2, p.541。
17. 《德国公民法补充条例》，1935年11月14日。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vol.2, pp.538—539。
18. 引自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Kommentiert von einem deutschen Zeitgenossen*, vol.1: *Triumph*, R. Löwit, 1973, p.538, 希特勒在国会的演讲, 1935年9月15日。亦见 Domarus, *Hitler* (英文版), vol.2, p.707。
19.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935年9月16日。
2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1. 露西尔·艾肯格林父母说的话。
22. Laurence Rees, *Their Darkest Hour*, Ebury Press, 2007, pp.191—192, 以及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3. Adam Tooz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Penguin, 2007, p.65。
24.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Penguin, 2001, p.558。

6. 教育和帝国的形成(1935—1938)

1. 本文中的“völkische”有很多不同的英文翻译,比如 people’s、racist、ethnic、folkish 等都是在尝试表达此处的词意,ethnic 可能是最接近原文意思的。
2.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Houghton Mifflin, 1971, p.404。
3. *Deutschland-Berichte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opade) 1934–1940. Zweiter Jahrgang, 1935*, Verlag Petra Nettelbeck/Zweitausendeins, 1980, p.1043。
4. Mart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n der NS-Zeit*, Oldenbourg, 1977, vol.1, pp.466—467。亦见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2: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1933–1939*,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83, p.546。

5. Max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vol.2: 1935-1938, Bolchazy-Carducci, 1992, pp.700—701, 希特勒 1935 年 9 月 14 日的演讲。
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8. Laurence Rees, *Their Darkest Hour*, Ebury Press, 2007, p.193, 以及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0. Gregory Wegner, *Anti-Semitism and Schooling under the Third Reich*, Routledge, 2002, Kindle 版, 位于 4325—4331。
11. Ernst Hiemer, *Der Giftpilz*, Stürmerv Verlag, 1938.
12. Fritz Fink, *The Jewish Question in Education*, 1937, <http://research.calvin.edu/german-propaganda-archive/fink.htm>. 亦见 Wegner, *Anti-Semitism*, location 1618—1643。
13.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勃姆—泰特尔巴赫认为, 柏林的律师大多数是犹太人, 这是不对的——德国的犹太律师从未成为大多数。
14. David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22. 亦见 Helga Grebing,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rsprung und Wesen*, Isar Verlag, 1959, p.65。
15. *Völkischer Beobachter*, Bayernausgabe, 1929 年 8 月 7 日, p.1。
1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7. Welch, *Propaganda*, p.123.
18. Michael Burleigh,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Pan, 2001, p.381.
19. Henry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From Euthanasia to the Final Solu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p.62.
20. 数据来源于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http://www.ushmm.org/learn/students/learning-materials-and-resources/mentally-and-physically-handicapped-victims-of-the-nazi-era/forced-sterilization>。
21. Robert Jay Lifton, *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Basic Books, 2000, p.29.
22. Claudia Koonz, *The Nazi Con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5. 亦见 Boaz Neuman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German People’s Body (*Volkskörper*) and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ish Body”, *New German Critique*, vol.36, no. 1, 2009, pp.149—181。
23. Ian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8.
24. Rees, *Darkest Hour*, p.192.
25. Laurence Rees,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 1997, p.74.
2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7. *Daily Express*, 1936 年 9 月 17 日。
28. 劳合·乔治在他的文章中断言, “以德国人的性格, 他们在迫害别人时并不比英国人更高兴”, 并希望未来“戈培尔夸夸其谈的演讲不会引起另一场反犹示威”。

29. 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Little, Brown, 2014, p.33.
3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2. *Sunday Express*, 1938年6月19日, 转引自Edie Friedman, “Britain as Refuge: The Real Story”, 2008年10月23日, <https://www.thejhc.com/britain-as-refuge-the-real-story-1.5676>。
33. Segev, *One Palestine*, pp.37—39.
34. Domarus, *Hitler* (英文版), vol.2, p.938, 1937年9月13日希特勒的演讲。
35. Hildegard von Kotze and Helmut Krausnick eds., *Es spricht der Führer. 7 exemplarische Hitler-Reden*, Mohn, 1966, pp.123—177, Rede Hitlers vor Kreisleitern auf der Ordensburg Vogelsang, 1937年4月29日。
36.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Aufzeichnungen 1923–1941*, vol.4, K. G. Saur, 2000, pp.429—430, 1937年11月30日。
37.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Series C, vol.V, no. 490.
38. 纽伦堡审判文件46-EC。
39.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vol.3/2, K. G. Saur, 2001, pp.251—252, 1936年11月5日。
40.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3: *Foreign Policy, War and Racial Extermination*,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72—79.
41. Joachim Fest, *Hitler*,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p.42.
42. Richard S. Geehr, *Karl Lueger: Mayor of Fin de Siècle Vienna*,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81.
43. 出处同上, p.200。
44. Kurt von Schuschnigg, *Austrian Requiem*, Victor Gollancz, 1947, pp.21, 23.
4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以及 Rees, *Nazis*, p.107。
46.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Kommentiert von einem deutschen Zeitgenossen*, vol.1: *Triumph*, R. Löwit, 1973, p.803, 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的演讲。
47. *Völkischer Beobachter*, Norddeutsche Ausgabe, 1938年2月26日, p.2。
4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2. Rees, *Nazis*, p.114.
53. 出处同上, p.112。
54. 出处同上, p.114。
55. William L. Shirer, *Berlin Diary: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1934–1941*, Johns

-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10—111.
56. Nikolaus Wachsmann, *KL: 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Little, Brown, 2015, p.140.
 57. 出处同上, p.177。
 58. 出处同上。
 59. Jürgen Matthäus and Mark Roseman eds., *Jewish Responses to Persecution*, vol.1: 1933—1938, AltaMira Press/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010, 1938年6月发给巴黎犹太电报局的关于奥地利犹太人受迫害情况的报告, 文件10—17, pp.283—284。
 60. Shirer, *Berlin Diary*, p.109, 1938年3月19日。
 61.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vol.5, K. G. Saur, 2000, p.225, 1938年3月23日。
 62. David Cesarani, *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Vintage, 2005, p.61.
 63. 出处同上, p.65。
 64. 出处同上, p.67。
 65. Peter Longerich, *Holocaust: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06.

7. 激进化(1938—1939)

1.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Kommentiert von einem deutschen Zeitgenossen*, vol.1: *Triumph*, R. Löwit, 1973, pp.845—846, 1938年4月6日希特勒的演讲。
2. 出处同上, p.845, 1938年4月4日希特勒在克拉根福音乐厅的演讲。
3. 出处同上, p.844, 1938年4月3日希特勒在格拉茨的演讲。
4. 参见前文。
5.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Phoenix Press, 2002, pp.142—145, 此处见p.144, 1941年12月13日。
6. 出处同上, p.145。
7.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vol.1, p.606, 希特勒1936年3月14日的演讲。
8. 出处同上, p.848, 希特勒1938年4月9日的演讲。
9. Peter Longerich, *Holocaust: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92.
10. Nikolaus Wachsmann, *KL: 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Little, Brown, 2015, p.177.
11. Y. Arad, Y. Gutman and A. Margalioth eds., *Documents on the Holocaust: Selected Sources 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s of Germany and Austria, Poland and the Soviet Union*, Bison Books, 1999, pp.98—99.

12. Beate Meyer, Hermann Simon and Chana Schütz eds., *Jews in Nazi Berlin: From Kristallnacht to Liber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25.
13. 为了尊重历史和顾及今日不同的敏感程度,本书中在讨论纳粹政策时用“吉卜赛人”,在涉及更为宽泛的情况时用“辛提—罗姆人”。
14. Guenter Lewy,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Gyps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3.
15. Aristotle Kallis, *Genocide and Fascism: The Eliminationist Drive in Fascist Europe*, Routledge, 2009, p.55,艾伯特·克兰齐乌斯在16世纪初期的话。
16. 出处同上。
17. Cesare Lombroso, *Die Ursachen und Bekämpfung des Verbrechens*, Bermühler, 1902.
18. Lewy, *Nazi Persecution*, p.7.
1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1. Lewy, *Nazi Persecution*, p.42.
22. Michael Burleigh and Wolfgang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20—121. 亦见 Lewy, *Nazi Persecution*, pp.135—138.
23.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纪念馆永久陈列。
24. Christian Goeschel and Nikolaus Wachsmann eds.,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1933—1939: A Documentary Histor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2, pp.204—205.
25. 奥地利圣约翰警察局的报告,1939年1月12日,引自 Lewy, *Nazi Persecution*, pp.61—62.
26. M. James Penton, *Jehovah's Witnesses and the Third Reich*,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pp.275—284.
27.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 2005, p.210, 以及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8. Michel Reynaud and Sylvie Graffard, *The Jehovah's Witnesses and the Nazis: Persecution, Deportation, and Murder, 1933—1945*, Cooper Square Press, 2001, p.21.
29. Wachsmann, *KL*, p.126.
30. Reynaud and Graffard, *Jehovah's Witnesses*, pp.89—90.
31. Rudolf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Phoenix Press, 2001, pp.88—89.
32. 出处同上, p.89。
33. 出处同上, p.91。
34. Reynaud and Graffard, *Jehovah's Witnesses*, p.31.
3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6. Bradley F. Smith and Agnes F. Peterson eds., *Heinrich Himmler. Geheimreden 1933 bis 1945 und andere Ansprachen*, Propyläen Verlag, 1974, pp.93—94, 96—97, 1937年2月18日对党卫军队长的讲话。

37. *Völkischer Beobachter*, Bayernausgabe, 1930年8月2日 (182. Ausgabe, 43. Jg.), p.1。
38. 沃尔夫冈—托伊贝特和埃米尔·克莱因的证言, 引自 Laurence Rees, *The Dark Charisma of Adolf Hitler*, Ebury Press, 2012, pp.127—128。
39.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934年7月1日, 亦见 Rees, *Charisma*, p.127。
40. Wachsmann, *KL*, pp.127—128。
41. 见 <http://www.ushmm.org/learn/students/learning-materials-and-resources/homosexuals-victims-of-the-nazi-era/persecution-of-homosexuals>。博物馆估计有五千到一万五千名同性恋者被送往集中营。
42. Wachsmann, *KL*, p.134。
43.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vol.1, p.870, 1938年5月30日希特勒的命令。
44. Adam Tooz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Penguin, 2007, p.255。
45. PRO FO 371/22530, 1938年3月13日, 引自 Fiona Horne, “Explaining British Refugee Policy, March 1938–July 1940”, 毕业论文,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New Zealand, 2008, p.5。
46. 乔治·戴维斯爵士, 来自约维尔的保守党议员, 1938年3月22日在下院的演讲, PRO FO 372/3282。
47. Martin Gilbert, *Exile and Return*, Lippincott, 1978, p.203. 1938年7月20日在难民问题内阁委员会上的发言。
48. David Clay Large, *And the World Closed its Doors*, Basic Books, 2004, p.72。
49. G. S. 梅瑟史密斯从柏林给副国务卿威廉·菲利普斯的信, 华盛顿, 1933年6月26日, 特拉华大学图书馆乔治·S. 梅瑟史密斯的藏件, <http://udspace.udel.edu/handle/19716/6176>。
50. Joseph S. Nye Jr.,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8。
51. Clay Large, *And the World Closed its Doors*, p.70。
52. *Diaries of 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 1938年3月29日, <http://www.Bac-lac.gc.ca/eng/discover/politics-government/prime-ministers/william-lyon-mackenzie-king/Pages/item.aspx?IdNumber=18924&>。
53. 出处同上, 1937年6月29日。在德奥合并后, 金确实在日记中写过他不能“容忍”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 但认为世界仍然会看到希特勒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神秘人物”, 见1938年3月27日的日记。“水晶之夜”后, 他写道曾“同情”“陷入困境的犹太人”, 见麦肯齐·金1938年11月23日的日记。
54. 出处同上, 1937年6月30日。
55. Jürgen Matthäus and Mark Roseman eds., *Jewish Responses to Persecution*, vol.1: 1933–1938, AltaMira Press/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010, WJC Memorandum, July 1938, USHMMA RG 11.001 M.36, reel 106 (SAM 1190-1-257), 文件11—3,

pp.314—318。

56. Deborah Dwork and Robert Jan van Pelt, *Flight from the Reich: Refugee Jews 1933–1946*, W. W. Norton, 2009, p.99, Roger Makins, 1938年3月25日备忘录, PRO FO 371/2231。
57. Emanuel Melzer, *No Way Out: The Politics of Polish Jewry, 1935–1939*, Hebrew Union College Press, 1965, p.90.
58. David Cymet, *History vs. Apologetics: The Holocaust,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Lexington Books, 2010, p.125.
59. Golda Meir, *My Life*,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5, p.127.
60. Francis R. Nicosia,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Transaction, 2013, p.125.
61. 1939年5月23日丘吉尔在下院辩论时的演讲, Hansard, vol.347, col. 2178。见 Daniel Todman, *Britain's War: Into Battle 1937–1941*, Allen Lane, 2016, pp.162—166。
62. Cabinet Committee Minutes, PRO CAB 24/285, 1939年4月20日。亦见给丘吉尔信中的报告,称驻布加勒斯特的英国大臣是个“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者”,不管那里对犹太人的“迫害”。引自 Gilbert, *Exile and Return*, p.226。
63. Irving Abella and Harold Troper, *None Is Too Many: Canada and the Jews of Europe, 1933–1938*, L. & O. Denny's, 1982, p.35.
64. 出处同上, p.9, 1938年9月13日布莱尔的信。
65. William L. Shirer, *Berlin Diary: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1934–1941*,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20, 1938年7月7日。
66.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938年7月13日, 以及 Rees, *Charisma*, p.189。
67. Max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vol.2: 1935–1938, Bolchazy-Carducci, 1992, p.1153, 1938年9月12日希特勒的演讲。
68. Joshua D. Zimmerman, *The Polish Underground and the Jews, 1939–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0.
69. Leonidas E. Hill ed., *Die Weizsäcker Papiere 1933–1950*, Propyläen Verlag, 1974, p.142.
70. Longerich, *Holocaust*, pp.106—107.
71. Domarus, *Hitler*, vol.2 (英文版), p.1223, 1938年10月9日希特勒的演讲。
72. Matthäus and Roseman eds., *Jewish Responses to Persecution*, vol.1, 约瑟夫·布罗尼亚托夫斯基的信, 琴斯托霍瓦(波兰), 日期不明(很有可能在1938年11月初), 文件 12—2, pp.345—347。
73.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Penguin, 1997, p.228.
74.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Aufzeichnungen 1923–1941*, vol.6, K. G. Saur, 1998, p.180, 1938年11月10日。
7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亦见 Laurence Rees,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 1997, pp.75—76, 以及 Rees, *Charisma*, pp.191—192。
7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77. Ruth Levitt ed., *Pogrom: November 1938. Testimonies from 'Kristallnacht'*, Souvenir Press/

- The Wiener Library for the Study of the Holocaust and Genocide, 2015, p.33, 报告 B12。
78. Gendarmerie-Station Muggendorf Monthly Report, 1938年11月16日, 载于 Walter H. Pehle ed., *November 1938: From Reichskristallnacht to Genocide*, St Martin's Press, 1991, p.39。引自“Reactions to Kristallnacht” at 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
79. Levitt ed., *Pogrom*, pp.86—87, 报告 B66。
8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81. Levitt ed., *Pogrom*, pp.28—29, B8 报告。
82. “Juden, was nun?” , *Das Schwarze Korps. Zeitung der Schutzstaffeln der NSDAP, Organ der Reichsführung SS*, Berlin, 1938年11月24日, 第47期, 第4卷, 第1版。
83. “Dieses Pack ist schlimmer!” , *Das Schwarze Korps. Zeitung der Schutzstaffeln der NSDAP, Organ der Reichsführung SS*, Berlin, 1938年11月7日, 第46期, 第4卷, 第1版。
84. “Damit wir uns recht verstehen ...” , *Das Schwarze Korps. Zeitung der Schutzstaffeln der NSDAP, Organ der Reichsführung SS*, Berlin, 1938年12月1日, 第48期, 第4卷, 第2版。
85. “Das genügt fürs erste!” , *Das Schwarze Korps. Zeitung der Schutzstaffeln der NSDAP, Organ der Reichsführung SS*, Berlin, 1938年11月24日, 第47期, 第4卷, 第14版。
86. “Juden, was nun?” , *Das Schwarze Korps*, 1938年11月24日。
87. David Cesarani, *Final Solution: The Fate of the Jews 1933–1949*, Macmillan, 2016, p.214。
8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89. PRO CAB 27/624 32, 1938年11月14日, 引自 Rees, *Charisma*, p.221。
9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91. 英译稿的来源: 陆军元帅戈林主持下在德国空军部举行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会议速记记录, 1938年11月12日, 载于 United States Chief Counse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Axis Criminality,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vol.IV,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文件号 1816-PS, pp.425—457。
92. Longerich, *Holocaust*, p.115。
93. Max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vol.3: 1939–1940, Bolchazy-Carducci, 1997, pp.1447—1449,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的演讲。
94. 希特勒和匈牙利外交部长萨基伯爵的谈话, 1939年1月16日, 5—6 p.m.,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Serie D, vol.V: *Polen, Südosteuropa, Lateinamerika, Klein- und Mittelstaaten, Juni 1937–März 1939*,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3, p.305。
95.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查瓦尔科夫斯基和希特勒的会见备忘录, 1939年1月22日, 5—6 p.m.,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Serie D, vol.IV: *Die Nachwirkungen von München, Oktober 1938–März 1939*,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1, pp.170—171。
96. James Mace Ward, *Priest, Politician, Collaborator: Jozef Tiso and the Making of Fascist Slovak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77。
97. 出处同上, p.185。

9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9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00. David Dilks ed.,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OM, 1938–1945*, Cassell, 1971, p.161, 1939年3月20日。
101.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1939年4月15日, 记者招待会, www.presidency.ucsb.edu。
102. Domarus, *Hitler*, vol.3 (英文版), pp.1585—1592。
103.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Series D, vol.VII, pp.200—204, 1939年8月22日的会议。亦见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3: *Foreign Policy, War and Racial Extermination*,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739—743。

8. 种族战争的开始(1939—1940)

1. Laurence Rees, *World War II: Behind Closed Doors*, BBC Books, 2008, p.32.
2. Jürgen Matthäus, Jochen Böhler and Klaus-Michael Mallmann eds., *War, Pacification, and Mass Murder, 1939: The Einsatzgruppen in Poland*, Documenting Life and Destruction: Holocaust Sources in Context,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p.44, 文件5: 党卫军中队长埃里希·埃勒斯的日记, 特别行动队第二大队, 1939年9月1日至5日。
3. 出处同上, p.54, 文件12: 赫尔穆特·比绍夫的报告, 特别行动队第四大队第一小队队长, 在比得哥什驻扎期间, 1939年9月7日至8日, 未注明日期(1939年末), IPNW, NTN 196/180。
4. Laurence Rees,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 1997, pp.127—128.
5. 出处同上, p.130。
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7. Tomasz Szarota, “Poland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39–1945”, 载于 Bernd Wegner ed., *From Peace to War: Germany, Soviet Russia, and the World, 1939–1941*, Berghahn Books, 1997, pp.47—61, 此处见 p.54。
8. Laurence Rees, *The Dark Charisma of Adolf Hitler*, Ebury Press, 2012, p.251.
9. Matthäus, Böhler and Mallmann eds., *War, Pacification, and Mass Murder*, p.29.
10. Alexander B.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Blitzkrieg, Ideology, and Atrocity*,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3, p.16.
11. 出处同上, pp.66—67, 129。
12. 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Heinemann, 2004, pp.36—37. David Cesarani, *Final Solution: The Fate of the Jews 1933–1949*, Macmillan, 2016, p.257.
13.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4. Peter Longerich, *Holocaust: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51—152.
15. Christopher Browning, *Nazi Policy, Jewish Workers, German Kill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 Press, 2000, p.8, 汉斯·弗朗克的讲话, 1939年11月25日。
16. 出处同上, p.6。
 1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8. Rees, *Nazis*, p.139.
 19. Browning, *Origins*, p.57.
 20. Rees, *Charisma*, p.294, 戈培尔1940年1月24日的日记。
 21. 弗里茨·阿爾特的证言, 首次发表在这里。阿爾特的证言亦见 Rees, *Nazis*, pp.151—152, 以及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 2005, p.34。
 22. Rees, *Nazis*, p.136.
 23.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4. Browning, *Origins*, p.93.
 25. 希姆莱的备忘录, 1940年5月15日, “Some Thoughts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Alien Population in the East”,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3: *Foreign Policy, War and Racial Extermination*,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934。
 26. 参见前文。
 27. Tatiana Berenstein et al. eds., *Faschismus-Getto-Massenmord. Dokumentation über Ausrottung und Widerstand der Juden in Polen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Röderberg-Verlag, 1960, pp.78—81, 此处见 p.81。卡利什区长官的通知, 1939年12月10日。亦印于 *Dokumenty i materialy z czasów Okupacji Niemieckiej w Polsce*, vol.3: *Getto Łódzkie*, Towarzystwo Przyjaciół Centralnej Żydowskiej Komisji Historycznej, 1946, pp.26—31。
 28. Alan Adelson and Robert Lapidés ed., *Łódź Ghetto: Inside a Community under Siege*, Viking, 1989, p.11, 戴维·希耶拉克维亚克的日记。
 2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0. Rees, *Nazis*, p.153.
 31. Isaiah Trunk, *Łódź Ghetto: A Hist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xxxiv。
 32. 出处同上, p.21。
 33. Yehuda Leib Gerst, *From the Straits* (Hebrew), Jerusalem: Safra Fund, 1949, p.26, 转引自 Michal Unger, *Reassessment of the Image of Mordechai Chaim Rumkowski*, Yad Vashem, 2004, p.8。
 34. Raul Hilberg, Stanislaw Staron and Josef Kermisz eds., *The Warsaw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 Elephant, 1999, pp.236—237, 1941年5月17日。
 35. Rees, *Nazis*, p.154. 埃贡·乔尔克的证言。
 3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7. Longerich, *Holocaust*, p.136.
 38. 参见前文。
 3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亦见 Rees, *Nazis*, p.83。
 40. Browning, *Origins*, p.186.

41. Robert Jay Lifton, *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Basic Books, 1986, p.280. 巴拉克是一个失败的医科学生。
42. Henry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From Euthanasia to the Final Solu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p.75.
43. 出处同上, p.81。
44. C. F. Rüter et al. eds., *Justiz und NS-Verbrechen. Sammlung deutscher Strafurteile weg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Tötungsverbrechen 1945–1966*, vol.XXVI,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K. G. Saur, 2001, pp.555—583, 此处见pp.558—559。亦见 Ernst Klee, *Euthanasie im NS-Staat. Die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S. Fischer Verlag, 1983, pp.84—85。
45. Klee, *Euthanasie*, p.118.
46. Karsten Linne ed., *Der Nürnberger Ärzteprozess 1946/47. Wortprotokolle, Anklage- und Verteidigungsmaterial, Quellen zum Umfeld*, Mikrofiche-Edition/K. G. Saur, 1999, ff. 2687—2688, 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证词副本, 纽伦堡医疗案例, 1947年2月7日。还应注意, 以一氧化碳为毒剂的初步试验是1939年11月在瓦尔特高进行的, Browning, *Origins*, p.188。
47. Lifton, *Nazi Doctors*, p.72.
48. 例如可参见之前约瑟夫·帕钦斯基的证词。
49. Lifton, *Nazi Doctors*, p.72.
50. 源自索嫩斯泰因博物馆的数据。
51. Michael Grabher, *Irmfried Eberl. 'Euthanasie' Arzt und Kommandant von Treblinka*, Peter Lang, 2006, p.35. 原件见在法兰克福对阿奎林·乌尔里希的审讯, 1962年10月10日, HHStAW 631a, no. 1726。
52. Ute Hofmann and Dietmar Schulze, '*... wird heute in eine andere Anstalt verleg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Zwangssterilisation und 'Euthanasie' in der Landes-Heil- und Pflegeanstalt Bernburg—eine Dokumentation*, Regierungspräsidium Dessau, 1997, p.111。
53. Grabher, *Eberl*, p.105. 原件见在法兰克福对海因里希·邦克的审讯, 1962年4月17日, HHStAW 631a, no. 1666。
54. Hans-Walter Schmuhl, "Brain Research and the Murder of the Sick: The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1937—1945", 载于 Susanne Heim, Carola Sachse and Mark Walker eds., *The Kaiser Wilhelm Society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99—119, 此处见 p.113。
55. 引自 <http://chgs.umn.edu/histories/documentary/hadamard/ignorance.html>, 明尼苏达大学大屠杀研究中心。
56. Ernst Klee ed., *Dokumente zur 'Euthanasie'*, S. Fischer Verlag, 1985, p.125.
57. Gitta Sereny, *Into That Darkness: From Mercy Killing to Mass Murder*, Pimlico, 1995, p.54.
58. Longerich, *Holocaust*, p.138.
59. Browning, *Origins*, pp.188—189.
60. 出处同上, pp.191—192;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本多夫—塞恩的一个犹太医院幸

免于难——这些病人在“最终解决方案”实施时死亡。

61. Nikolaus Wachsmann, *KL: 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Little, Brown, 2015, pp.231—232.
62. <http://www.buchenwald.de/en/457/>.
63. Wachsmann, *KL*, pp.221—225.
64.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9.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vol.3, pp.932—934.
70. Yitzhak Arad, Yisrael Gutman and Abraham Margalioth eds., *Documents on the Holocaus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9, pp.216—218, 拉德马赫备忘录, 1940年7月3日。
71. 出处同上, p.218, 汉斯·弗朗克的讲话, 1940年7月12日。
72. Kurt Pätzold, *Verfolgung, Vertreibung, Vernichtung. Dokumente des faschistischen Antisemitismus*, Reclam, 1991, pp.269—270.
73. Arad et al. eds., *Documents*, pp.216—218, 拉德马赫备忘录, 1940年7月3日。
74. Longerich, *Holocaust*, pp.162—164.
75. Charles Burdick and Hans-Adolf Jacobsen eds., *The Halder War Diary, 1939—1942*, Greenhill Books, 1988, p.76, 1939年11月3日。
76. Georg Mayer ed., *Generalfeldmarschall Wilhelm Ritter von Leeb. Tagebuchaufzeichnungen und Lagebeurteilungen aus zwei Weltkriegen*,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6, pp.187—188, 1939年10月9日。
77. David Jablonsky, *Churchill and Hitler: Essays on the Political-Military Direction of Total War*, Frank Cass, 1994, p.155; 亦见 Alexander Pollak, *Die Wehrmachtslegende in Österreich. Das Bild der Wehrmacht im Spiegel der österreichischen Presse nach 1945*, Böhlau, 2002, p.62。
78.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Series D, vol.VII, pp.200—204, 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向军官们的讲话, 1939年8月22日。亦见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vol.3, pp.739—743。
79.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Kommentiert von einem deutschen Zeitgenossen*, vol.2: *Untergang*, R. Löwit, 1973, pp.1422, 1425—1426, 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的演讲。
80. 出处同上, pp.1553, 1558, 1940年7月19日希特勒的演讲。
81. Burdick and Jacobsen eds., *Halder War Diary*, pp.241—246, 1940年7月31日。

9. 西欧的迫害(1940—1941)

1. 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认为总数有四千五百人 (www.ushmm.org) ——三千五百

- 名当地居民和一千名难民。该纪念馆认为数字要低一些，约三千五百人 (www.yadvashem.org)。Yehuda Bauer, *American Jewry and the Holocaust: The 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 1939-1945*,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53, 认为1939年有三千五百人, 1940年有两千人。
2. 古斯塔夫·西蒙是卢森堡的行政长官, 也是相邻的摩泽尔州州长。
 3. Bauer, *American Jewry*, pp.53—55.
 4. Emmanuel Debruyne, “The Belgian Government-in-Exile Facing the Persecution and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s”, 载于 Jan Láníček and James Jordan (eds.), *Governments in Exile and the Jew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Vallentine Mitchell, 2013, pp.197—212, 此处见 p.201。
 5. Laurence Rees, *Their Darkest Hour*, Ebury Press, 2007, p.165.
 6. Lieven Saerens, “Antwerp’s Attitude toward the Jews from 1918 to 1940”, 载于 Dan Michman ed., *Belgium and the Holocaust*, Yad Vashem, 1998, pp.159—194, 此处见 pp.192—193。
 7. Laurence Rees, *Selling Politics*, BBC Books, 1992, pp.18—25.
 8. 出处同上, p.24。
 9.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Phoenix Press, 2002, p.99, 1941年10月30日。
 10. Rees, *Selling Politics*, p.24, 戈培尔1941年7月5日的日记。
 1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2.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 2005, p.217, 但有二十名犹太难民仍被移交给了纳粹。2005年, 丹麦首相为此致歉。
 13. Hans Fredrik Dahl, *Quisling: A Study in Treache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22.
 14. 参见后文。
 15. Jeroen Dewulf, *Spirit of Resistance: Dutch Clandestine Literature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 Camden House, 2010, p.48.
 16. Bob Moore, *Victims and Survivors: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the Netherlands 1940-1945*, Arnold, 1997, p.195, “橙色电台”1943年10月2日的广播。
 17. Jacob Presser, *Ashes in the Wind: The Destruction of Dutch Jewry*, Souvenir Press, 2010, p.25.
 18. 十四万是纳粹当局打算驱逐的犹太人估计人数。见 www.rijksmuseum.nl/en/rijksstudio/timelinedutch-history/holocaust。
 19. Presser, *Ashes in the Wind*, pp.27—28.
 20. Willem Ridder, *Countdown to Freedom*, Author House, 2007, p.252.
 21. 海蒂·科恩—科斯特的证词, 当时为莱顿大学的学生, <http://www.news.leiden.edu/news-2015/hetty-cohen-koster-was-present-at-cleveringas-speech.html>。
 22. Ernest R. May, *Strange Victory: Hitler’s Conquest of France*, I. B. Tauris, 2000, p.283, 甘末林对爱德华·雷奎因将军说的话。

23. 出处同上, p.386。
24. 引自 David Carroll, “What It Meant to Be ‘a Jew’ in Vichy France: Xavier Vallat, State Anti-Semitism, and the Question of Assimilation”, *SubStance*, vol.27, no. 3, 1998, pp.36—54。亦见 Olivier Wieviorka, *Orphans of the Republic: The Nation’s Legislators in Vichy Fr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95。
25. Ralph W. Schoolcraft III, “Darquier de Pellepoix”, 载于 Richard S. Levy ed., *Antisemitism: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of Prejudice and Persecution*, vol.1, ABC Clio, 2005, pp.161—162, 此处见 p.162。
26. Yves Beigbeder, *Judging War Crimes and Torture: French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s and Commissions, 1940–2005*, Martinus Nijhoff, 2006, pp.143—147。
27. Michael R. Marrus and Robert O. Paxton, *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
28. 见 *Guardian*, 2010年10月3日,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oct/03/marshal-petain-nazi-zealous-anti-semitism>。
29. Renée Poznanski, “The Jews of France and the Statutes on Jews, 1940–1941”, www.yadvashem.org/yv/en/education/courses/life_ghettos/pdfs/reading5.pdf。
30. Vicki Caron, “The Path to Vichy: Antisemitism in France in the 1930s”,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Center for Advanced Holocaust Studies, J. B. and Maurice C. Shapiro Annual Lecture, 2005年4月20日, pp.1—2。
31. Susan Zuccotti, *The Holocaust, the French and the Jews*, Bison Books, 1999, p.3。
32. Jérôme Carcopino, *Souvenirs de sept ans*, Flammarion, 1953, p.359; 亦见 Marrus and Paxton, *Vichy*, p.85。
33. Bella Gutterman and Naomi Morgenstern, *The Gurs Haggadah: Passover in Perdition*, Devora Publishing and Yad Vashem, 2003, p.17。
34. 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Heinemann, 2004, pp.89—93。
35. 出处同上, p.92。
36. 出处同上, p.90。
37.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3: *Foreign Policy, War and Racial Extermination*,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年版, p.471。
38. Laurence Rees,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 1997, pp.141—142。
39. Sybille Steinbacher, “In the Shadow of Auschwitz: The Murder of the Jews of East Upper Silesia”, 载于 Ulrich Herbert ed., *National Socialist Extermination Policies: Contemporary German Perspectives and Controversies*, Berghahn Books, 2000, pp.276—305, 此处见 p.284。
40. David Cesarani, *Final Solution: The Fate of the Jews 1933–1949*, Macmillan, 2016, p.274。
41. Laurence Rees, *World War II: Behind Closed Doors*, BBC Books, 2008, p.80。
42. David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and Germany’s Defeat in the E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73。

43. Isaiah Trunk, *Łódź Ghetto: A Hist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09.
44. Christopher Browning, *Path to Genocide: Essays on Launching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3.
4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6. Browning, *Genocide*, p.36, 帕尔芬格 1940 年 11 月 7 日的报告。
4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8. Trunk, *Łódź Ghetto*, p.83, 文件 no. 55 YI-1212, 1940 年 4 月 5 日, 罗姆科夫斯基给罗兹市市长的信。
49. 出处同上, p.111。
50. Michal Unger, *Reassessment of the Image of Mordechai Chaim Rumkowski*, Yad Vashem, 2004, p.37 n. 82.
51. Jacob Sloan ed., *Notes from the Warsaw Ghetto, from the Journal of Emmanuel Ringelblum*, iBooks, 2006, p.19, 1940 年 2 月 12 日。
52. 出处同上, p.17, 1940 年 2 月 7 日。
53. Raul Hilberg, Stanislaw Staron and Josef Kermisz eds., *The Warsaw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 Elephant, 1999, p.100, 1939 年 12 月 16 日、17 日。
54. 出处同上, p.112, 1940 年 1 月 28 日。
55. 出处同上, p.104, 1939 年 12 月 31 日和 1940 年 1 月 2 日。
56. Cesarani, *Final Solution*, p.339.
57. Sloan ed., *Journal of Emmanuel Ringelblum*, p.120, 1941 年 1 月。
5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9. Browning, *Genocide*, p.38.
60. Hilberg et al. ed., *Warsaw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 p.239, 1941 年 5 月 21 日。
61. 出处同上, p.247, 1941 年 6 月 9 日。
62. 纽伦堡审判文件, vol.31, 1941 年 5 月 2 日会议纪要, 文件 2718-PS, p.84。Rees, *Auschwitz*, p.53。
63. 纽伦堡审判文件, vol.36, *Political-Economic Guidelines*, pp.135—137。
64. Goetz Aly and Susanne Heim, *Architects of Annihilati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2, pp.63—64.
65. 出处同上, p.237; Rees, *Auschwitz*, p.54。
66. 按照 2016 年的人口水平。
67. *Hitler's Table Talk*, p.33, 1941 年 9 月 17 日。
68. 出处同上, p.38, 1941 年 9 月 23 日。
69. Charles Burdick and Hans-Adolf Jacobsen eds., *The Halder War Diary, 1939-1942*, Greenhill Books, 1988, p.346, 1941 年 3 月 30 日。
70. 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Allen Lane, 2000, p.359.
71.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vol.3 (2006 年版), pp.478—479。
72. 出处同上, p.479。

73. Vivien Spitz, *Doctors from Hell: The Horrific Account of Nazi Experiments on Humans*, First Sentient Publications, 2005, pp.190—194.
74. 出处同上, p.195。
75. Robert Jay Lifton, *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Basic Books, 1986, p.279.
76. Paul Eggert, pp.98—99.
77.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Aufzeichnungen 1923–1941*, vol.9, K. G. Saur, 1998, p.210, 1941年3月29日的日记。
78. 这个有二万五千五百名犹太人的“新”克罗地亚也包括有一万四千名犹太人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共有约八万名犹太人, 在希腊有七万二千名犹太人。
79. Esther Gitman, *When Courage Prevailed: The Rescue and Survival of Jews in the Independent State of Croatia, 1941–1945*, Paragon House, 2011, pp.12—13.
80. 出处同上, p.17。

10. 毁灭性战争(1941)

1. Laurence Rees,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 1997, p.175. 信件全文见美国国务院, 版号 No. 3023,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pp.349—353。
2. Elke Fröhlich, “Joseph Goebbels und sein Tagebuch”,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ol.35, no. 4 (1987), 戈培尔1941年6月16日的日记。
3. Adam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Penguin, 2007, pp.452—460.
4. 参见前文。
5.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 2005, p.56, 海德里希1941年7月2日的命令。
6. Peter Longerich, *Holocaust: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86.
7. Robert van Voren, *Undigested Past: The Holocaust in Lithuania*, Rodopi, 2011, p.27. 被驱逐到苏联的人中有约13.5%是犹太人——与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比, 这一比例实在是太高了。
8. Laurence Rees, *Their Darkest Hour*, Ebury Press, 2007, pp.11—12.
9. David Cesarani, *Final Solution: The Fate of the Jews 1933–1949*, Macmillan, 2016, p.362.
10. Michael MacQueen, “Lithuanian Collaboration in the ‘Final Solution’: Motivations and Case Studies”, 载于 *Lithuania and the Jews: The Holocaust Chapter, Symposium Presentations*, Center for Advanced Holocaust Studies,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004。

11. 证言摘自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第5集: *Road to Treblinka*, Laurence Rees 编剧并制作, 1997年10月BBC2首次播出。
12. Aleks Faitelson, *Th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Jewish Resistance in Lithuania*, Gefen Books, 2006, p.26.
13. 证言摘自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第5集: *Road to Treblinka*, Laurence Rees 编剧并制作, 1997年10月BBC2首次播出。
14. Rees, *Nazis*, pp.179—182.
15. Ernst Klee, Willi Dressen and Volker Riess, *The Good Old Days*, Konecky & Konecky, 1991, p.31.
16. 出处同上, pp.24—27。
17. Peter Longerich, *The Unwritten Order*, Tempus, 2005, p.113.
18. Jean Ancel, *The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in Romania*, Yad Vashem, 2011, p.215. 希特勒和安东内斯库在慕尼黑的会谈议定书, 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 vol.12, doc. 614, p.1006。
19. Ancel, *Romania*, pp.445—446.
20. Radu Ioanid, *The Holocaust in Romania: The Destruction of Jews and Gypsies under the Antonescu Regime, 1940—1944*, Ivan R. Dee, 2008, p.74; Kindle版, 位于1738—1745。
21. Ancel, *Romania*, p.453.
22. 出处同上, p.455, 安塞尔认为有八千人, 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认为“至少四千人”。数据来源: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http://www.ushmm.org/information/museum-programs-and-calendar/first-person-program/first-person-podcast/haim-solomon-hiding-during-the-pogrom-in-iasi>。
23. Ioanid, *Holocaust in Romania*, p.81; Kindle版, 位于1884—1890。
24. Ancel, *Romania*, pp.230—232.
2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7. 埃米利奥·比格的证词, Sachsenhausen Museum, 以及 Nikolaus Wachsmann, *KL: 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Little, Brown, 2015, pp.262—265。
28. 无名狱友的证言, 1954年发现, Sachsenhausen Museum。
2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0. Peter Löffler ed., *Bischof 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 Akten, Briefe und Predigten 1933—1946*, vol.2: 1939—1946, Matthias-Grünwald-Verlag, 1988, pp.876—878。原件收于明斯特教区档案, Fremde Provenienzen, A8, 1941年8月3日, 星期天, 明斯特主教在 St. Lambertikirche 的布道记录。
31. 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Allen Lane, 2000, pp.424—425.
32.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3. Kershaw, *Hitler: Nemesis*, p.426.
34. Cesarani, *Final Solution*, p.284. Richard Evans, *The Third Reich at War*, Allen Lane,

2008, pp.93—101.

35.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Phoenix Press, 2000, p.5, 1941年7月5日—6日夜。
36. 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Heinemann, 2004, pp.309—310.
37. 出处同上, p.240。
38. Götz Aly, *Final Solution': Nazi Population Policy and the Murder of the European Jews*, Arnold, 1999, p.214.
3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亦见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 2005, pp.64—65。
40. Yitzhak Arad, *The Holocaust in the Soviet Un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9, p.165.
4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2. Laurence Rees, *War of the Century*, BBC Books, 1999, pp.93—94.
43. 在20世纪, 利沃夫有许多不同的名字, 例如德国人称它为伦贝格 (Lemberg), 乌克兰人称它为利维夫 (Lviv), 俄国人称它为勒沃夫 (Lvov), 我们这里用的是波兰语名称 (Lwów), 因为战争开始时, 这座城市用的是波兰语名称。1941年大屠杀的死者数字是由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提供的。
44. Peter 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526.
4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亦见 Rees, *Auschwitz*, pp.63—66。
46. Rees, *Darkest Hour*, p.13.
47. Alfonsas Eidintas, *Žydai, Lietuviai ir Holokaustas*, 引自 MacQueen, “Lithuanian Collaboration in the ‘Final Solution’ : Motivations and Case Studies”。
48. Rees, *Auschwitz*, p.63.
49. Rees, *Nazis*, p.190.
50. Avraham Tory, *Surviving the Holocaust: The Kovno Ghetto Di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4, 1941年8月4日。
51. Ernst Klee, Willi Dressen and Volker Riess, ‘*The Good Old Days*’, Konecky & Konecky, 1991, p.179.
52. Anatoly Podolsky, “The Tragic Fate of Ukrainian Jewish Women under Nazi Occupation, 1941—1944”, 载于 Sonja M. Hedgepeth and Rochelle G. Saidel ed.,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Jewish Women during the Holocaust*,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and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10, pp.94—107, 此处见 p.99。
53. Rees, *Nazis*, p.213, 以及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4.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5. Leonid D. Grenkevich, *The Soviet Partisan Movement, 1941–1944: A Critical Historiographical Analysis*, Frank Cass, 1999, p.75.
56. Manus I. Midlarsky, *The Killing Trap: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47.
57. Rees, *Darkest Hour*, p.68, 以及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8. Kershaw, *Hitler: Nemesis*, p.467.
59. Peter Witte et al. ed., *Der Dienstkalender Heinrich Himmlers 1941/42*, Hans Christians Verlag, 1999, p.195.
6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1. Rees, *Auschwitz*, p.68, 以及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2. 出处同上。
63. “Leben eines SS-Generals. Aus den Nürnberger Geständnissen des Generals der Waffen-SS 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 *Aufbau*, vol.XII, no. 34, 1946年8月23日, p.2。
64. 前党卫军将领 Karl Wolff, *The World at War*, Thames Television, 1974年3月27日, 引自 Martin Gilbert, *The Holocaust: The Jewish Tragedy*, Collins, 1986, p.191。
6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6. Michael Burleigh,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Pan, 2001, p.614.
67. Browning, *Origins*, p.283; 以及 Longerich, *Himmler*, p.534。五周之后, 该院的一百二十名精神病人都被毒死了。
68. 威廉·加斯基的证言, Vilsbiburg, 1960年4月5日, BArch 202, AR-Z 152/159; Rees, *Auschwitz*, p.69。
69. 此前未出版的证言, 以及 Rees, *Auschwitz*, p.71。
70. Tooze, *Wages of Destruction*, pp.482—483.
71. 出处同上, p.483。
72.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73.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74.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75. Longerich, *Holocaust*, p.315.
76.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3: *Foreign Policy, War and Racial Extermination*,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p.481.
77. Peter Klein ed., *Die Einsatzgruppen in der besetzten Sowjetunion 1941/42. Die Tätigkeits- und Lageberichte der Sicherheitspolizei und des SD*, Hentrich, 1997, p.342.
78.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I: *Diktate 1941—1945*, vol.1, K. G. Saur, 1996, p.269, 1941年8月19日。
79. Browning, *Origins*, pp.281—282.
80. *Der Prozess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h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Militärgerichtshof, Nürnberg, 14. November 1945—1. Oktober 1946*, vol.XXXII, Nuremberg, 1948, 文件 3663-PS, p.436。
81. 出处同上, 文件 3666-PS, p.437。
82. *Hitler's Table Talk*, pp.56—57, 1941年10月13日—14日夜。
83. Rees, *Auschwitz*, p.67.
84.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85. Rees, *Nazis*, p.222.
86. *Hitler's Table Talk*, pp.31—35, 1941年9月17日—18日夜。

87. Max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vol.4: 1941-1945, Bolchazy-Carducci, 2004, p.2491, 希特勒的演讲, Berlin Sportpalast, 1941年10月3日。
88. Ioanid, *Holocaust in Romania*, p.120; Kindle版, 位于2726—2734。
89. Ansel, *Romania*, p.243.
90. *Hitler's Table Talk*, p.67, 1941年10月17日。
91.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vol.3, pp.519—520.
92. Rees, *Auschwitz*, p.76.
93. Alan Adelson and Robert Lapidus eds., *Łódź Ghetto: Inside a Community under Siege*, Viking, 1989, p.175, 什洛莫·弗兰克的日记, 1941年10月19日和23日。
94. 出处同上, p.171, 戴维·希耶拉克维亚克的日记, 1941年10月17日。
95. 出处同上, pp.178—181, 奥斯卡·罗森菲尔德的记录本。
96. Rees, *Auschwitz*, p.85.
97. Isaiah Trunk, *Łódź Ghetto: A Hist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17.
98. Helmut Heiber, “Aus den Akten des Gauleiters Kube”,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ol.4, no. 1 (1956), p.75。
99. Kershaw, *Hitler: Nemesis*, p.486.
100. Aly, *Final Solution*, p.214.
101. 瓦尔特·博迈斯特的供述, 24/01/1961, p.3, BArch ZStL 203 AR-Z 69/59, vol.4 (ZStL是位于路德维希堡的负责纳粹战争罪行调查的司法中心机构)。
102. Browning, *Origins*, p.367.
103. Longerich, *Holocaust*, p.282.
104. 在白俄罗斯建立了两个较小的营地, 位于马利特罗斯特涅茨和布朗纳戈拉, 用以屠杀犹太人。马利特罗斯特涅茨集中营于1942年5月投入使用, 主要职能是屠杀明斯克的犹太人。不久以后, 白俄罗斯西部的布朗纳戈拉集中营投入使用, 用以杀害周边地区的犹太人。虽然在这些营地中死亡的确切人数尚不清楚, 但二者的规模都不及“莱因哈德行动”的集中营。
105. *Hitler's Table Talk*, p.87, 1941年10月25日。
106. Browning, *Origins*, p.362.
107. 1961年11月8日的证词, BArch ZStL 203 AR-Z 69/59, vol.3, pp.5—6; Rees, *Auschwitz*, p.92。
108. Dr Goebbels, “Die Juden sind schuld!”, *Das Reich*, no. 46, 1941年11月6日, pp.1—2。
109. 关于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教授本人的细节分析, 见他的 *Origins*, pp.358—373。
110. *Hitler's Table Talk*, pp.57—58, 1941年10月13日—14日夜。
111. Patrick Montague, *Chełmno and the Holocaust*, I. B. Tauris, 2012, p.34.
112. 参见前文。
113. Michael Thad Allen, “The Devil in the Details: The Gas Chambers of Birkenau, October 1941”,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16, no. 2, Autumn 2002, pp.189—216. Rees, *Auschwitz*, pp.82—83.

11. 通往万湖之路(1941—1942)

1. 根据莫斯科苏维埃主席 V. S. 普罗宁的记录, *Voennoistoricheski Zhurnal*, vol.10 (1991), pp.335—341。
2.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Kommentiert von einem deutschen Zeitgenossen*, vol.2: *Untergang*, R. Löwit, 1973, pp.1773, 1779, 1941年11月8日的演讲。
3. Laurence Rees, *World War II: Behind Closed Doors*, BBC Books, 2008, p.114.
4.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vol.2, pp.1773—1774.
5. 出处同上, pp.1804, 1808, 希特勒对国会的演讲, 1941年12月11日。
6.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I: *Diktate 1941—1945*, vol.2, K. G. Saur, 1996, pp.498—499, 1941年12月13日。
7. Werner Präg and Wolfgang Jacobmeyer eds., *Das Diensttagebuch des deutschen Generalgouverneurs in Polen 1939—1945*,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5, pp.452—459, 此处见 p.457。
8. Patrick Montague, *Chełmno and the Holocaust*, I. B. Tauris, 2012, p.22.
9. 出处同上, p.43。
10. 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Heinemann, 2004, p.417.
11. 出处同上, p.372。
12. Montague, *Chełmno*, p.64.
13. Browning, *Origins*, p.418.
14. Eugen Kogon et al.,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ssentötungen durch Giftgas*, S. Fischer Verlag, 1983, pp.122—123. 亦见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3: *Foreign Policy, War and Racial Extermination*,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年版, p.1140。
15.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 2005, p.91.
16. Montague, *Chełmno*, p.59.
17. 出处同上。
18. 出处同上, pp.65—66。
19. Isaiah Trunk, *Łódź Ghetto: A Hist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70, 1941年12月20日罗姆科夫斯基的讲话, 文件 no.122: Y I-1221。
20. Rees, *Auschwitz*, p.91.
21. Noakes and Pridham, *Nazism*, vol.3, pp.1127—1134.
22. David Cesarani, *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Vintage, 2005, p.114.
23. Browning, *Origins*, p.406.
24. Cesarani, *Eichmann*, p.114.
25. Sister Margherita Marchione,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Defending Pope Pius XII*, Paulist Press, 2002, p.71.

26. Laurence Rees, *War of the Century*, BBC Books, 1999, pp.78—80.
27. Michael Burleigh,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Pan, 2001, p.571, 引自 Jost Dülffler, *Deutsche Geschichte 1933–1945*, Kohlhammer, 1992, p.125。
28.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vol.2, pp.1828—1829, 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的演讲, 1942年1月30日。
29. Rees, *Auschwitz*, p.97.
3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1. 引自 Ernst Klee, Willi Dressen and Volker Riess, *'The Good Old Days'*, Konecky & Konecky, 1991, p.255。
32. Browning, *Origins*, p.420.
33. Rudolf Reder, *Belzec*, Auschwitz Museum, 1999, p.115.
34. 出处同上, pp.118—120。
35. 出处同上, pp.124—125。
36. 出处同上, p.130。
37. 出处同上, pp.132—133。
38.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I, vol.3, K. G. Saur, 1994, pp.557—563, 1942年3月27日。
39. Peter Longerich, *Holocaust: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95.
40. Yehuda Bauer, *Jews for Sale? Nazi-Jewish Negotiations, 1933–1945*,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66.
41. 见维斯利尼战后在斯洛伐克的证言, 1946年5月6日—7日 (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0/48) 和1946年8月12日 (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3/48), 再加上科索的证言, 1947年4月11日 (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3/48)。
42.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vol.2, pp.1828—1829, 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的演讲, 1942年1月30日。
43.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4. Rees, *Auschwitz*, p.108.
4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亦见 Rees, *Auschwitz*, p.108。
4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9. Rees, *Auschwitz*, p.110.
5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1. Rees, *Auschwitz*, p.114.
52.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3. Nikolaus Wachsmann, *KL: 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Little, Brown,

2015, p.299.

54.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5. Rees, *Auschwitz*, p.114.

56. Höss, *Commandant*, pp.149—150.

57. Rees, *Auschwitz*, p.207.

58. Gitta Sereny, *Into That Darkness: From Mercy Killing to Mass Murder*, Pimlico, 1995, pp.111—112.

59. 出处同上, pp.113—114。

60. 出处同上, p.131。

61. Klee et al., *'The Good Old Days'*, p.232.

62. Jules Schelvis, *Sobibor: A History of a Nazi Death Camp*, Berg, 2007; 参见第3、4、5章, 尤其是 pp.63—66。

63. 尽管一些苏联战俘并不来自乌克兰, 但他们在集中营中被统称为“乌克兰人”, 这里采用了这种称谓。

64. Rees, *Auschwitz*, pp.210—211.

12. 搜捕和屠杀(1942)

1. Michael R. Marrus and Robert O. Paxton, *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88. 瓦拉特是在战后的审判中说出这番话的, 和他1942年发表的一次演讲“几乎完全相同”。

2. 出处同上, p.90。

3. Ulrich Herbert, “The German Military Command in Paris and the Deportation of the French Jews”, 载于 Ulrich Herbert ed., *National Socialist Extermination Policies: Contemporary German Perspectives and Controversies*, Berghahn Books, 2000, pp.128—162, 此处见 p.139。

4. 出处同上, p.140。

5. 出处同上, p.143。

6. David Cesarani, *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Vintage, 2005, pp.139—140.

7. Marrus and Paxton, *Vichy*, p.243.

8. Serge Klarsfeld, *French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4.

9. Marrus and Paxton, *Vichy*, pp.233—234.

10. Susan Zuccotti, *The Holocaust, the French and the Jews*, Bison Books, 1993, p.99. 丹内克的话是拉瓦尔引文的来源; 六天后, 拉瓦尔在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也与丹内克先前的声明相符。

1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亦见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 2005, pp.126—131。

12. Klarsfeld, *French Children*, p.45; Marrus and Paxton, *Vichy*, p.263.

13. Rees, *Auschwitz*, p.130.
14.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7. Rees, *Auschwitz*, p.132, 以及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9. Michael Phayer,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Holocaust, 1930–1965*,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92—93.
20. Marrus and Paxton, *Vichy*, p.261.
21. Margherita Grassini Sarfatti, *My Fault: Mussolini as I Knew Him*, Brian R. Sullivan ed., Enigma Books, 2014, p.84.
22. Susan Zuccotti, *The Italians and the Holocaust: Persecution, Rescue and Survival*,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6, p.77; Michele Sarfatti, *The Jews in Mussolini's Italy: From Equality to Persecu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6, pp.159—160.
23. Marrus and Paxton, *Vichy*, p.317.
24. 出处同上。
25. Nuto Revelli ed., *Mussolini's Death March: Eyewitness Accounts of Italian Soldiers on the Eastern Front*,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2013, 尤其是在华沙的巴尔托洛梅奥·弗鲁特罗的证词, pp.219—220。
26. Bob Moore, *Victims and Survivors: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the Netherlands 1940–1945*, Arnold, 1997, p.91.
27. Jacob Presser, *Ashes in the Wind: The Destruction of Dutch Jewry*, Souvenir Press, 2010, p.142, 以及 Moore, *Victims and Survivors*, p.93。
28. Presser, *Ashes*, p.147.
29. 出处同上。
30. Martin Gilbert, *Auschwitz and the Allies*, Pimlico, 2001, pp.46—47。
31. Michael Fleming, *Auschwitz, the Allies and Censorship of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06.
32. 出处同上, p.107, 世界犹太人大会上莫里斯·佩尔茨威格的记录, 1942年9月底。
33. 扬·卡尔斯基的证词, pp.288—289。
34. Fleming, *Auschwitz*, p.116, Anthony Eden, 1942年12月7日于下院。
35. 格哈特·里格纳的证词, 载于 *Reputations: Pope Pius XII: The Pope, the Jews and the Nazis*, 制片人 Jonathan Lewisz, 执行制片人 Laurence Rees, BBC2 于 1995 年播出。
36. 译自 *Reputations: Pope Pius XII*, 亦见 <http://catholictradition.org/Encyclicals/1942.htm>。
37. 信件的译文来自 <http://rorate-caeli.blogspot.com/2012/07/70th-anniversary-of-pastoral-letter-of.html>。
38. <http://www.patheos.com/blogs/labmind/2011/01/archbishop-de-jong-the-cost-of->

speaking-up.html?repeat=w3tc.

39. *Reputations: Pope Pius XII* 中的研究。
40. *Reputations: Pope Pius XII* 中的证词, BBC2 于 1995 年播出。
41. 见 Phayer, *Catholic Church*, p.94。费耶认为, 德容的抗议导致受洗的犹太人被驱逐出境的说法是“虚伪的”, “大主教的抗议只是纳粹用来逮捕这些犹太皈依者的借口”。
42. Moore, *Victims and Survivors*, p.79, 引自雅各布·普雷瑟博士的著作。
43. *Reputations: Pope Pius XII* 一片中维托尔德·兹罗特尼基的证词, BBC2 于 1995 年播出。
44. Livia Rothkirchen, “The Churches and the Deportation and Persecution of Jews in Slovakia”, 载于 Carol Rittner, Stephen D. Smith and Irena Steinfeldt eds., *The Holocaust and the Christian World*, Yad Vashem, 2000, pp.104—107。
45. James Mace Ward, *Priest, Politician, Collaborator: Jozef Tiso and the Making of Fascist Slovak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32.
46. Rothkirchen, “Persecution of Jews in Slovakia”。
47. Mace Ward, *Jozef Tiso*, pp.234—236.
48. *Reputations: Pope Pius XII* 一片中扬·卡尔斯基的证词, BBC2 于 1995 年播出。
49. 彼得·朗格里希在 *Holocaust: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62 中给出了在 1940 年末比利时有五万二千名犹太人的数字。
50. 出处同上, p.372。
51. Hans Fredrik Dahl, *Quisling: A Study in Treache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87.
52. 上面的数字引自 Norwegian Royal Commission (NOU 1977: 22)。
53. Ladislaus Hory and Martin Broszat, *Der kroatische Ustascha-Staat 1941—1945*,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4, pp.120—121.
54. 出处同上, pp.101—102, 源自纽伦堡文件, NOKW-1071。
55. 出处同上, p.99。
56. *Der Prozess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h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Militärgerichtshof, Nürnberg, 14. November 1945—1. Oktober 1946*, vol.XV, p.327.
57.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Serie E: 1941—1945, vol.VII, 1943 年 10 月 1 日至 1944 年 4 月 30 日, doc. no. 352, pp.658—660。
58. Randolph L. Braham, *The Hungarian Labor Service System 1939—1945*,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1977, p.28. 亦见 Robert Rozett, *Conscripted Slaves: Hungarian Jewish Forced Labourers on the Eastern Front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Yad Vashem, 2013, pp.158—163。
59. Cesarani, *Eichmann*, p.151.
60. I. C. Butnaru, *The Silent Holocaust: Romania and its Jews*, Greenwood Press, 1992, p.138.

61. 出处同上, p.139。
62. Bernhard R. Kroener, Rolf-Dieter Müller and Hans Umbreit,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German Sphere of Power: Wartime Administration, Economy, and Manpower Resources 1942–1944/5*, vol.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855。亦见 Adam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Penguin, 2007, p.587。
63. Cesarani, *Eichmann*, p.152.
64. Max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vol.4: 1941–1945, Bolchazy-Carducci, 2004, pp.2679—2680, 1942年9月30日希特勒的演讲。
65. Lothar Gall ed., *Krupp im 20. Jahrhundert. Die Geschichte des Unternehmens vom Ersten Weltkrieg bis zur Gründung der Stiftung*, Siedler, 2002. Werner Abelshäuser, *Rüstungsschmiede der Nation? Der Kruppkonzer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Nachkriegszeit 1933 bis 1951*, pp.267—472, 此处见 pp.412。原始文件见 FAH, 5C48。
66. Domarus, *Hitler* (英文版), vol.4, p.2687, 1942年10月4日戈林在柏林的演讲。

13. 纳粹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1942)

1. 在白俄罗斯也有犹太人被杀害的集中营, 例如马利特罗斯特涅茨和布朗纳戈拉集中营, 但那里都没有固定的毒气室。
2. Tatiana Berenstein et al. eds., *Faschismus-Getto-Massenmord. Dokumentation über Ausrottung und Widerstand der Juden in Polen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Röderberg-Verlag, 1960, p.303. 英文版见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3: *Foreign Policy, War and Racial Extermination*,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159—1160。
3. Léon Poliakov and Joseph Wulf,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iener*, Ullstein, 1983, pp.471 及以下。亦见文件 170-USSR, 收于 *Der Prozess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h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Militärgerichtshof, Nürnberg, 14. November 1945–1. Oktober 1946*, vol. XXIX, 1949, pp.385 及以下, 1942年8月6日帝国元帅戈林与帝国占领区行政和军事长官关于粮食形势的速记报告。
4. Adam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Penguin, 2007, p.545。
5. Peter 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570. 亦见 pp.561—568, 他对希姆莱7月19日讲话原因的分析。
6. 出处同上。
7. 出处同上, pp.564, 572。
8. Felix Kersten, *The Kersten Memoirs, 1940–1945*, Hutchinson, 1956, pp.132—134, 1942年7月16日。必须要谨慎看待这些回忆的内容, 并不总是可靠的。当然, 这一部分是可信的, 亚当·图泽在 *Wages of Destruction*, p.526 也进行了引用。
9. Joseph Poprzeczny, *Odilo Globocnik: Hitler's Man in the East*, McFarland, 2004,

- pp.320—321. 亦见 Longerich, *Himmler*, pp.583—584。
10. Raul Hilberg, Stanislaw Staron and Josef Kermisz eds., *The Warsaw Diary of Adam Czerniaków*, Elephant, 1999, pp.381—385.
 11. 出处同上, pp.381—385。
 12. Jacob Sloan ed., *Notes from the Warsaw Ghetto, from the Journal of Emmanuel Ringelblum*, iBooks, 2006, p.292, 1942年6月。
 13. 出处同上, pp.330—331 (无确切日期)。
 14. Abraham Lewin, *A Cup of Tears: A Diary of the Warsaw Ghetto*, Fontana, 1990, p.145, 1942年8月1日。
 1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6. 奥斯维辛是唯一一个杀害犹太人更多的地方, 但与特雷布林卡不同, 奥斯维辛并不是一个专门的死亡集中营。
 17.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 2005, p.162.
 18. Michael Grabher, *Irmfried Eberl. 'Euthanasie' Arzt und Kommandant von Treblinka*, Peter Lang, 2006, pp.70—71, Irmfried Eberl 给 Ruth 的信, 1942年6月20日, HHStAW 631a, no. 1631。
 19. 出处同上, p.73。埃尔姆弗里德·埃贝尔给露丝的信, 1942年7月30日, HHStAW 631a, no. 1631。亦引自 Ute Hofmann and Dietmar Schulze, '... wird heute in eine andere Anstalt verleg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Zwangssterilisation und 'Euthanasie' in der Landes-Heil-und Pflegeanstalt Bernburg-eine Dokumentation*, Regierungspräsidium Dessau, 1997, pp.67—68。
 20. Rees, *Auschwitz*, p.162.
 21. Yitzhak Arad, *Belzec, Sobibor, Treblinka: The Operation Reinhard Death Camp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4.
 22. 出处同上, p.85。
 23. 出处同上, p.87。
 24. Gitta Sereny, *Into That Darkness: From Mercy Killing to Mass Murder*, Pimlico, 1995, pp.160—161.
 25. Rees, *Auschwitz*, p.163.
 26. Ernst Klee, Willi Dressen and Volker Riess, *The Good Old Days*, Konecky & Konecky, 1991, p.244.
 27. Arad, *Belzec, Sobibor, Treblinka*, p.96.
 28. Sereny, *Darkness*, p.161.
 29. Volker Rieß, "Christian Wirth-der Inspekteur der Vernichtungslager", 载于 Klaus-Michael Mallmann and Gerhard Paul eds., *Karrieren der Gewal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Täterbiographien*,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4, pp.239—251, 此处见 p.247。原始材料源自 BArch 208 AR-Z 252/59, vol.9, pp.1689 及以下, 约瑟夫·奥伯豪泽尔的证言, 1962年12月13日。
 3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2. Laurence Rees,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 1997, p.165.
33.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4. Arad, Belzec, Sobibor, Treblinka, p.190.
35. Laurence Rees, *Their Darkest Hour*, Ebury Press, 2007, p.94.
36. 与作者的交谈；出处同上，p.94。
37. Tomasz Kranz, *Extermination of Jews at Majdanek Concentration Camp*, State Museum, Majdanek, 2010, p.13.
38. 出处同上，p.59。
3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0. *Touched by Auschwitz*, Laurence Rees 撰稿兼制片，BBC2 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播出。
4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2. 马伊达内克国家博物馆陈列上的证词。
43. Elissa Mailänder, *Female SS Guards and Workaday Violence: The Majdanek Concentration Camp, 1942–1944*,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42.
44. 出处同上，pp.xi—xiii。
45. 特雷布林卡的数字在电报中是 71355，但显然这是一个错误，因为电报所载的总数为 1274166，在特雷布林卡遇害的人数应是 713555——其他证据也证实了这一数字是可信的。
46. PRO HW 16/10.

14. 屠杀和胁从 (1942—1943)

1. Laurence Rees, *War of the Century*, BBC Books, 1999, p.128.
2. Charles Burdick and Hans-Adolf Jacobsen eds., *The Halder War Diary, 1939–1942*, Greenhill Books, 1988, p.646, 1942 年 7 月 23 日。
3. Rees, *War of the Century*, p.159.
4.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Kommentiert von einem deutschen Zeitgenossen*, vol.2: *Untergang*, R. Löwit, 1973, p.1916, 1942 年 9 月 30 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的演讲。
5. 罗斯福 1943 年 2 月 12 日讲话，<http://avalon.law.yale.edu/wwii/casablan.asp>。
6. Theodore S. Hamerow, *Why We Watched: Europe,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 W. W. Norton, 2008, p.349. 罗斯福与诺盖斯以及罗斯福与吉罗在总统别墅的谈话，中午和下午四点二十分，1943 年 1 月 17 日，Roosevelt Papers, McCrea Notes，载于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1941–1942 and Casablanca 194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68, pp.608—611。
7.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I: *Diktate 1941–1945*, vol.7, K. G. Saur, 1993, p.454, 1943 年 3 月 2 日。

8. Michael R. Marrus and Robert O. Paxton, *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21—326.
9. 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Allen Lane, 2000, p.582.
10. Andreas Hillgruber ed., *Staatsmä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Zweiter Teil. Vertrauliche Aufzeichnungen über Unterredungen mit Vertretern des Auslandes 1942–1944*, Bernard & Graefe, 1970, pp.234—263, 此处见 pp.238, 240, 245, 256—257, 1943年4月16日、17日会议。
11.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I, vol.8, K. G. Saur, 1993, p.225, 1943年5月7日。
12. Record by SS-Oberführer Veessenmayer, 载于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Serie E: 1941–1945, vol.VI, pp.78—80, 此处见 p.79。
13.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I, vol.8, pp.236, 238, 1943年5月8日。
14.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vol.2, p.2003, 关于希特勒和鲍里斯国王会晤的公报, 1943年4月3日。
15. 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Heinemann, 2004, p.212. 亦见 Peter 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663—664。
1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7.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 2005, p.176.
1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9. 这是一个可疑的确切数字, 应该谨慎对待 (有更多也有更少的估计, 都加大了这个数字的不确定性)。
20. Nikolaus Wachsmann, *KL: 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Little, Brown, 2015, p.316.
21. Jadwiga Bezwinska and Danuta Czech eds., *Amidst a Nightmare of Crime*, Howard Fertig, 1992, p.47, 阿尔特·艾西尔贝尔 (也作斯坦尼斯拉夫·扬科夫斯基) 的法庭证词。
22.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3. Bezwinska and Czech eds., *Amidst a Nightmare*, p.52.
24.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6. Dr Miklós Nyiszli, *Auschwitz: A Doctor's Eyewitness Account*, Penguin, 2012, p.24.
2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8. Nyiszli, *Auschwitz*, p.42.
2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1. Bezwinska and Czech eds., *Amidst a Nightmare*, p.119.
32. 出处同上, p.56, 阿尔特·艾西尔贝尔的法庭证词。

33. 出处同上。
34.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5. Rees, *Auschwitz*, pp.236—237.
36. Bezwinska and Czech eds., *Amidst a Nightmare*, p.119.
3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8. Robert Jan van Pelt, *The Case for Auschwitz: Evidence from the Irving Tria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80.
39. *Touched by Auschwitz*, BBC2 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播出, 以及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2.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3. Bezwinska and Czech eds., *Amidst a Nightmare*, p.59.
44. Kurt Jonassohn and Karin Solveig Björnson, *Genocide and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ransaction, 1999, p.283.
45. Wim Willems, *In Search of the True Gypsy: From Enlightenment to Final Solution*, Routledge, 2013, p.251.
46. Donald Kenrick and Grattan Puxon, *Gypsies under the Swastika*,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Press, 2009, pp.38—39.
47. Kershaw, *Hitler: Nemesis*, p.584.
48.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I, vol.8, p.288, 1943 年 5 月 13 日。

15. 压迫与反抗(1943)

1. 证词来自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Episode 6: *Fighting to the End*, Laurence Rees 撰稿兼制片, 1997 年 10 月 BBC2 首次播出。
2. Max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vol.4: 1941—1945, Bolchazy-Carducci, 2004, p.2818, 1943 年 9 月 10 日希特勒的演讲。
3. Martin Gilbert, *The Righteous: The Unsung Heroes of the Holocaust*, Black Swan, 2003, p.439.
4. Susan Zuccotti, *The Italians and the Holocaust: Persecution, Rescue and Survival*,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6, p.81.
5. Renzo De Felice, “Hunting Down the Jews”, 载于 Stanislao G. Pugliese ed., *Fascism, Anti-Fascism, and the Resistance in Italy: 1919 to the Present*, Rowan & Littlefield, 2004, pp.200—206, 此处见 p.202。
6. José M. Sánchez, *Pius XII and the Holocaust: Understanding the Controversy*,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2, p.143.
7. 证词来自 *Reputations: Pope Pius XII: The Pope, the Jews and the Nazis*, 制片人 Jonathan

Lewis, 执行制片人 Laurence Rees, BBC2 于 1995 年播出。

8. 出处同上。
9. 出处同上。
10. Zuccotti, *Italians and the Holocaust*, p.133.
11. Michael Phayer,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Holocaust, 1930–1965*,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40—245.
12. 数字来自 Zuccotti, *Italians and the Holocaust*, p.xxv。
13. Zuccotti, *Italians and the Holocaust*, pp.235—236.
14.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6. Emmy E. Werner, *A Conspiracy of Decency: The Rescue of the Danish Jews during World War II*, Westview Press, 2002, p.49.
1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8. Michael Mogensen, “October 1943—The Rescue of the Danish Jews”, 载于 Mette Bastholm Jensen and Steven L. B. Jensen eds., *Denmark and the Holocaust, Department for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003, pp.33—61, 此处见 p.45。
1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0.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 2005, pp.221—222.
21. Mogensen, “Rescue”, p.33。亦见 Leni Yahil, *The Rescue of Danish Jewry: Test of a Democracy*,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9。
22.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给出的数字为, 当时希腊有七万二千名犹太人, 其中六万人被害: <https://www.ushmm.org/wlc/en/article.php?ModuleId=10005778>。Steven B. Bowman, *The Agony of Greek Jews, 1940–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77, 称有 90% 的希腊犹太人被害。
23. Bowman, *Agony of Greek Jews*, p.177.
24. David Cesarani, *Final Solution: The Fate of the Jews 1933–1949*, Macmillan, 2016, p.600. 亦见马克·马佐韦尔关于犹太人被驱逐出萨洛尼卡的描述, *Inside Hitler’s Gree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38—246。
2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6. Israel Cymlich and Oskar Strawczynski, *Escaping Hell in Treblinka*, Yad Vashem, 2007, p.167.
27. Laurence Rees,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 1997, p.170.
2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9. Cymlich and Strawczynski, *Escaping Hell in Treblinka*, p.178.
30. Yankel Wiernik, *A Year in Treblinka*, General Jewish Workers’ Union of Poland, 1945, Chapter 13, www.zchor.org/treblink/wiernik.htm.
3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2. Thomas Toivi Blatt, *From the Ashes of Sobibor*,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29.
33. Cesarani, *Final Solution*, pp.676—677. 这种影响不应被夸大, 也很少有荷兰犹太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幸存下来。
34. Rees, *Auschwitz*, p.210.
3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6. Rees, *Auschwitz*, p.214.
3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8. Rees, *Auschwitz*, pp.214—215.
3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2. Blatt, *Ashes of Sobibor*, p.167.
43. 出处同上, p.222。
44.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5. Tatiana Berenstein et al. ed., *Faschismus-Getto-Massenmord. Dokumentation über Ausrottung und Widerstand der Juden in Polen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s*, Röderberg-Verlag, 1960, p.352, 1943年3月13日, 华沙地区党卫军和警察长官通告。
46. Cymlich and Strawczynski, *Escaping Hell in Treblinka*, p.58.
47. 出处同上, p.61。
48. Naomi Baumslag, *Murderous Medicine: Nazi Doctors, Human Experimentation, and Typhus*, Praeger, 2005, p.117.
49. 统计数字来自 Gunnar S. Paulsson, *Secret City: The Hidden Jews of Warsaw, 1940—1945*,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9, 231。
50. 出处同上, p.231。
5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2. Joshua D. Zimmerman, *The Polish Underground and the Jews, 1939—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9—10.
53. Gian P. Gentile, *How Effective Is Strategic Bombing? Lessons Learned from World War II to Kosovo*,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59—60.
54. Domarus, *Hitler* (英文版), vol.4, p.2819, 1943年9月10日希特勒的演讲。
55. BAArch NS 19/4010. 亦见 Bradley F. Smith and Agnes F. Peterson eds., *Heinrich Himmler. Geheimreden 1933 bis 1945 und andere Ansprachen*, Propyläen Verlag, 1974, pp.162—183, 此处见 pp.169—170。
56. Rees, *Auschwitz*, pp.215—216. 亦见 Yitzhak Arad, *Belzec, Sobibor, Treblinka: The Operation Reinhard Death Camp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66。
57. Tomasz Kranz, *The Extermination of Jews at Majdanek Concentration Camp*, Majdanek, 2010, p.64.

58. Peter Longerich, *Holocaust: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82.
59. 亨利克·尼西奥的证词, 马伊达内克国家博物馆常规展览。
60. Kranz, *Majdanek*, p.66.
61. *Der Prozess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h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Militärgerichtshof, Nürnberg, 14. November 1945–1. Oktober 1946*, vol.XXXIV, 1949, doc. 4024-PS, pp.58—92, 此处见p.72。
62. 出处同上, pp.69—70, 希姆莱的信件, 1943年11月30日。
63. Zuccotti, *Italians and the Holocaust*, pp.185—186.
64. Gitta Sereny, *Into That Darkness: From Mercy Killing to Mass Murder*, Pimlico, 1995年版, p.261。

16. 奥斯维辛(1943—1944)

1. 1943年12月和1944年3月, 又有两批犹太人被送进了“家庭营地”, 前后总共关押过一万七千五百名囚犯。
2.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 Dr Miklós Nyiszli, *Auschwitz: A Doctor's Eyewitness Account*, Penguin, 2012, p.35.
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7.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 2005, p.187.
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9. Rees, *Auschwitz*, p.187.
10. Wolfgang U. Eckart and Hana Vondra, “Disregard for Human Life: Hypothermia Experiments in the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载于 Wolfgang U. Eckart ed., *Man, Medicine, and the State: The Human Body as an Object of Government Sponsored Medical Research in the 20th Century*,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6, pp.157—166, 此处见p.163。
11. 出处同上。
12. Maura Phillips Mackowski, *Testing the Limits: Aviation Medicine and the Origins of Manned Space Flight*,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p.94.
13. Nikolaus Wachsmann, *KL: 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Little, Brown, 2015, p.334.
14.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6. Danuta Czech, *Auschwitz Chronicle 1939–1945: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Auschwitz Memorial and the German Federal Archives*, I. B. Tauris, 1990, p.591.
1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8. Rees, *Auschwitz*, p.143.
19. 出处同上, p.167。
2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1. Hermann Langbein, *Der Auschwitz-Prozess. Eine Dokumentation*, Neue Kritik, 1995. 见康拉德·摩根1962年3月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庭上的证词, 出处同上, pp.143—145。
22.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vol.2: *Untergang*, R. Löwit, 1973, p.2083, 1944年1月30日希特勒的演讲。
23. Ian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93.
24. 出处同上, pp.210—211。
25. Laurence Rees, *The Dark Charisma of Adolf Hitler*, Ebury Press, 2012, p.381.
26. Hans-Heinrich Wilhelm, “Hitlers Ansprache vor Generalen und Offizieren am 26. Mai 1944”,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vol.20, no. 2 (1976), pp.141—161, 此处见 p.156, 希特勒对官员和将军的讲话, 1944年5月26日。英文版见 Peter Longerich, *The Unwritten Order*, Tempus, 2005, p.212。
27. Clive Emsley, Eric Johnson and Pieter Spierenburg eds., *Social Control in Europe*, vol.2,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12.
28. David Cesarani, *Final Solution: The Fate of the Jews 1933–1949*, Macmillan, 2016, p.727.
2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1. Alan Adelson and Robert Lapidés eds., *Łódź Ghetto: Inside a Community under Siege*, Penguin, 1991, p.328.
32. 出处同上, p.329。
33. 出处同上, p.331。
34. Rees, *Auschwitz*, p.102.
3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6. Isaiah Trunk, *Łódź Ghetto: A Hist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81, 约瑟夫·泽尔科维茨对9月行动的描述, “In Those Nightmarish Days”, no. 102: YI-54。
37. Trunk, *Łódź Ghetto*, p.246.
38. Laurence Rees, *Their Darkest Hour*, Ebury Press, 2007, pp.109—110.
39. Lucjan Dobroszycki ed., *The Chronicle of the Łódź Ghetto 1941–1944*,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52, 1942年9月14日。
4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2. 证词见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Episode 4: *The Wild East*, Laurence Rees 撰稿兼制片, BBC2于1997年10月首次播出。
43. Trunk, *Łódź Ghetto*, p.250.

44. Patrick Montague, *Chełmno and the Holocaust*, I. B. Tauris, 2012, p.162.
45. Dobroszycki ed., *Chronicle of Łódź Ghetto*, p.534, 1944年7月25日。
46. 还要注意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从被送往海乌姆诺到被送往奥斯维辛的转变时间。这是因为到8月初，奥斯维辛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已经结束，比克瑙的毒气室现在有足够的力量来杀害罗兹的犹太人。
47. 马克斯的父亲在隔离区已经去世，参见前文。
4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0. Michal Unger, *Reassessment of the Image of Mordechai Chaim Rumkowski*, Yad Vashem, 2004, p.13.
51. Rees, *Auschwitz*, pp.104—105.
52. 出处同上。

17. 匈牙利的灾难(1944)

1.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I: *Diktate 1941—1945*, vol.11, K. G. Saur, 1994, pp.396, 399—400, 1944年3月4日。
2. 出处同上, p.348, 1944年2月25日。
3. Simo Muir and Hana Worthen eds., *Finland's Holocaust: Silences of Histo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亦见 Elina Suominen, *Kuoleman laiva s/s Hobenhörn* (《死亡之船霍亨霍恩》), WSOY, 1979, 以及 *Luovutetut: Suomen ihmislouvatukset Gestapolle* (《被引渡的人：从芬兰到盖世太保》), WSOY, 2003, 后一部是其用 Elina Sana 的婚后名字撰写的。
4. 芬兰于1944年9月19日与苏联和英国签署了停战协议。
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 Randolph L. Braham,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10.
7. David Cesarani, *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Vintage, 2005, p.167.
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1. Yehuda Bauer, *Jews for Sale? Nazi-Jewish Negotiations, 1933—1945*,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50—151.
12.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 2005, p.230.
13. Gerald Jacobs, *Sacred Games*, Hamish Hamilton, 1995, pp.63—67.
14.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6. Ilana Rosen, *Sisters in Sorrow: Life Histories of Female Holocaust Survivors from Hungar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92—193.

1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8.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figures, <https://www.ushmm.org/wlc/en/article.php?ModuleId=10007728>.
1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2. 证词来自 *Touched by Auschwitz*, Laurence Rees 撰稿兼制片, BBC2 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播出。
23.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4. Franciszek Piper, *Auschwitz: How Many Perished?* Frap Books, 1996, p.53, 该书称有四十三万八千名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往奥斯维辛(从战时的匈牙利国境),但是奥斯维辛博物馆的米雷克·奥伯斯塔奇克告诉我,现在这个数字修改为四十三万。
25. Rees, *Auschwitz*, p.235.
26. 1944 年 6 月 16 日至 30 日,关于乔尔·布兰德审讯的 SIME 第 1 号报告。档案 no. SIME/P 7769, PRO FO 371/42811。亦见 Rees, *Auschwitz*, p.227。
27. Bauer, *Jews for Sale?* p.178.
28. 出处同上, p.186。
29. 出处同上, p.166。
30. 出处同上。
31. 出处同上, p.167。
32. *Himmler, Hitler and the End of the Reich*, 制片人 Detlef Siebert, 执行制片人 Laurence Rees, BBC2 于 2001 年播出。
33. Peter 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720.
34. 希姆莱研究团队发现的文件, *Hitler and the End of the Reich*, PRO HW 1/3196。
35. 证词见 *Himmler, Hitler and the End of the Reich*, BBC2 于 2001 年播出。
3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8. Rees, *Auschwitz*, pp.243—244.
39. 证词见 *Himmler, Hitler and the End of the Reich*, BBC2 于 2001 年播出。
40. Bauer, *Jews for Sale?*, pp.158—159.
4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42. Robert Jan van Pelt, *The Case for Auschwitz: Evidence from the Irving Tria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45—146.
43. Filip Müller, *Eyewitness Auschwitz: Three Years in the Gas Chambers*, Ivan R. Dee, 1999, p.121. 部分引自 van Pelt, *Case for Auschwitz*, p.149。
44. 我们不能确定教皇在给霍尔蒂写信之前是否读过《沃尔巴—韦茨勒报告》,但他很可能知道此事,因为 1944 年 6 月 20 日,沃尔巴在伯拉第斯拉瓦会见了教皇

的一位代表。

45. 证词见 *Reputations: Pope Pius XII: The Pope, the Jews and the Nazis*, 制片人 Jonathan Lewis, 执行制片人 Laurence Rees, BBC2 于 1995 年播出。
46. 出处同上。
47. 出处同上。
48. Peter Longerich, *Holocaust: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407—408, 戈培尔 1944 年 4 月 27 日的日记。
49. 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 Penguin, 2009, p.342.

18. 屠杀的终结(1944—1945)

1. PRO FO 371/42809, <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education/worldwar2/theatres-of-war/eastern-europe/investigation/camps/sources/docs/5/transcript.htm>.
2. Michael J. Neufeld and Michael Berenbaum eds., *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St Martin's Press, 2000, Martin Gilbert, *The Contemporary Case for the Feasibility of Bombing Auschwitz*, p.70. 亦见马丁·吉尔伯特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讲座, 1993 年 11 月 8 日, <http://www.winstonchurchill.org>.
3.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 2005, pp.248—252.
4. Neufeld and Berenbaum eds., *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p.68. Rees, *Auschwitz*, p.248.
5. Yehuda Bauer, *Jews for Sale? Nazi-Jewish Negotiations, 1933—1945*,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95.
6. Martin Gilbert, *Auschwitz and the Allies*, Pimlico, 2001, p.127.
7. 见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Episode 5, Laurence Rees 撰稿兼制片, BBC2 于 2005 年 2 月播出。
8. Robert Jan van Pelt, *The Case for Auschwitz: Evidence from the Irving Tria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55—156. 1944 年 8 月 29 日, 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公布了西莫诺夫关于马伊达内克的第一份报告。
9. Filip Müller, *Eyewitness Auschwitz: Three Years in the Gas Chambers*, Ivan R. Dee, 1999, p.153.
10. Henryk Świeboccki, *Auschwitz, 1940—1945: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 vol.4: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Auschwitz Birkenau State Museum, 2000, pp.244—249, 以及 Franciszek Piper, *Auschwitz, 1940—1945: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 vol.3: *Mass Murder*, Auschwitz Birkenau State Museum, 2000, pp.186—187.
11. 出处同上。
12.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Episode 5, BBC2 于 2005 年 2 月播出。
13.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4. *Touched by Auschwitz*, BBC2 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播出。

15. Swiebocki, *Auschwitz*, vol.4, pp.232—233.
16. 意大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纳粹德国的盟友,但芬兰认为与纳粹之间关系只是“共同作战者”,而不是正式的盟友。
17. 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Allen Lane, 2000, pp.728—731.
18. David Cesarani, *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Vintage, 2005, pp.189—192.
19. 见库尔特·比彻的证词,1947年7月10日,引自 *Eichmann Interrogations: Trial of Adolf Eichmann*, Jerusalem, vol.VIII, pp.2895—2896。在线内容见 http://www.nizkor.org/hweb/people/e/eichmann-adolf/transcripts/Testimony-Abroad/Kurt_Becher-04.html,第42号注释。
20. Laurence Rees, *World War II: Behind Closed Doors*, BBC Books, 2008, p.326.
21.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vol.2: *Untergang*, R. Löwit, 1973, p.2152, 希特勒的公告,1944年9月25日。
22. Max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vol.4: *1941–1945*, Bolchazy-Carducci, 2004, pp.2965—2966, 1944年11月12日希特勒的讲话,由希姆莱发表。
23. 出处同上, p.2993, 希特勒1945年对国防军发表的新年讲话。
24. Danuta Czech, *Auschwitz Chronicle 1939–1945: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Auschwitz Memorial and the German Federal Archives*, I. B. Tauris, 1990, p.783, Józef Cyrankiewicz and Stanislaw Klodiński 的报告,1945年1月17日。
25.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29. Andrzej Strzelecki, *Auschwitz, 1940–1945: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 vol.5: *Epilogue*, Auschwitz Birkenau State Museum, 2000, pp.29—36.
30.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2. Shmuel Krakowski, “Massacre of Jewish Prisoners on the Samland Peninsula—Documents”, *Yad Vashem Studies*, vol.24 (1994), pp.349—387, 此处见 p.367。亦见 Janina Grabowska, *K. L. Stutthof*, Temmen, 1993, p.60。
33. Schoschana Rabinovici, *Dank meiner Mutter*,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9, pp.220—247.
34. Daniel Blatmann, *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Das letzte Kapitel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ssenmords*, Rowolth Verlag, 2010, p.203.
35. Irene Sagel-Grande, H. H. Fuchs and C. F. Rüter, *Justiz und NS-Verbrechen. Sammlung deutscher Strafurteile weg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Tötungsverbrechen 1945–1966*, vol.XIV, University Press Amsterdam, 1976. *Massenvernichtungsverbrechen in Lagern, KZ Stutthof, Herbst 1944* (Lfd. Nr. 446; LG Bochum vom 16.12.1955, 17 Ks 1/55), pp.147—234, 此处见 pp.156—160。

36. Ian Kershaw, *The End: Germany 1944–1945*, Allen Lane, 2011, p.234.
37. Strzelecki, *Auschwitz*, vol.5, pp.35—36.
38. Kershaw, *The End*, p.334.
39.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以及 Rees, *Auschwitz*, p.270。
40. 瑞典隆德大学所藏证词, www.ub.lu.se/en/voices-from-ravensbruck-3 第 22 号证词。
41. 出处同上, <http://www3.ub.lu.se/ravensbruck/interview18.pdf>。
42. Nikolaus Wachsmann, *KL: 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Little, Brown, 2015, p.568.
43. Laurence Rees, *Their Darkest Hour*, Ebury Press, 2007, p.112.
44. Rees, *Auschwitz*, p.272.
45. *Himmler, Hitler and the End of the Reich*, BBC2 于 2001 年播出。
46. 出处同上。
47.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I: Diktate 1941–1945*, vol.15, K. G. Saur, 1995, p.514, 1945 年 3 月 15 日。
48. 出处同上, p.521, 1945 年 3 月 16 日。
49. 出处同上, p.564, 1945 年 3 月 22 日。
50. Felix Kersten, *Totenkopf und Treue. Heinrich Himmler ohne Uniform. Aus den Tagebuchblättern des finnischen Medizinalrats Felix Kersten*, Mölich, 1952, pp.358—359, 希姆莱给克斯滕的信, 1945 年 3 月 21 日。
51. “白玫瑰”小组的第二份抗议传单, http://www.white-rose-studies.org/Leaflet_2.html。汉斯和肖菲在 1943 年 2 月被捕并处决。
52. <http://db.yadvashem.org/righteous/family.html?language=en&itemId=9221536>。
53. 根据德国抵抗运动纪念中心主任约翰内斯·图赫尔的估计, <http://www.raoulwallenberg.net/press/2007/museum-created-germans-hid/>。
54. Ian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29—230.
55. Ian Kershaw,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and German Popular Opinion in the Third Reich”, *Yearbook of Leo Baeck Institute*, vol.26 (1981), pp.261—289, 此处见 p.284。亦见 Laurence Rees,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 1997, p.223。
56.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以及 Rees, *Darkest Hour*, p.210。
5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59. Felix Kersten, *The Kersten Memoirs*, Hutchinson, 1956, pp.286—290.
60. 证词见 *Himmler, Hitler and the End of the Reich*, BBC2 于 2001 年播出。
61. Kershaw, *Hitler: Nemesis*, p.819.
62.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vol.2, pp.2236—2237, 2239, 希特勒的政治遗嘱, 1945 年 4 月 29 日。
63.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Phoenix Books, 2002, p.221, 1942 年 1 月 18 日。

64. 劳伦斯·里斯和伊恩·克肖教授的谈话,2009年,见http://ww2history.com/experts/Sir_Ian_Kershaw/Hitler_and_the_Holocaust。
65. 见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I, vol.3, K. G. Saur, 1994, pp.557—563, 1942年3月27日。
66. Peter 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731.
67.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后 记

1. http://ww2history.com/experts/David_Cesarani/Hitler_s_ruthlessness_vs_Stalin_s.
2. Laurence Rees, *Their Darkest Hour*, Ebury Press, 2007, pp.viii—ix.
3. 出处同上,尤其是p.ix。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Q3NzM0Mjk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773429.zip",
  "filesize": 56318649,
  "md5": "0088e562562fc875e6b948cf976dda5c",
  "header_md5": "3efe6601ce4a19ad90216543a2eff99b",
  "sha1": "ab9040c503b1fe4ecac378da799c5ba11177e119",
  "sha256": "642d955f3e7a100190abb6641d99dd1a04fab80a32815641508adbab8e0d249f",
  "crc32": 238592376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73132692,
  "pdg_dir_name": "\u2524\u2264\u2550\u2514\u2554\u2592\u2565\u2557\u2593\u2510\u2568\u252c\u2561\u2500\u2514\u00b7\u2569\u2556=THE HOLOCAUST_A NEW HISTORY_14773429",
  "pdg_main_pages_found": 481,
  "pdg_main_pages_max": 481,
  "total_pages": 493,
  "total_pixels": 215891792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